

# 風暴歷程

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

上册



余汝信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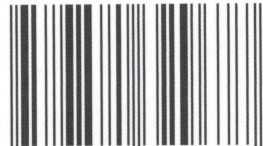


THROUGH THE STORM:  
The PLA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1

新世纪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上册 (全二册)

ISBN 978-988-13296-7-7



9 789881 329677 >

HK \$ 468 (二册)



# 風暴歷程

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

上册

余汝信 著

THROUGH THE STORM:  
The PLA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1  
by Yu Ruxin

新世纪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書名： 風暴歷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軍  
上冊（全二冊）  
作者： 余汝信  
封面設計： Renee Chiang  
出版社： 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聯絡方式： editors@newcenturymc.com  
國際統一書號： 978-988-13296-7-7  
定價： 港幣 468 圓（精裝版 兩冊）

香港出版，2021 年 8 月。

#### 版權聲明

沒有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的書面同意，本書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媒介中複製或傳播。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nglish Title: Through the Storm: The PLA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1 of 2  
Author: Yu Ruxin  
Cover Design, Layout  
& Production: Renee Chiang  
Publisher: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editors@newcenturymc.com  
ISBN: 978-988-13296-7-7  
Price: HK \$468 (hardback, 2 volum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August 2021.

Copyright ©2021 by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atsoever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 Image credits:

All images courtesy of the author. Images in the public domain are used as permitted. All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respect the copyright holders of images; please contact the publisher if any credits are missing and they will be corrected in future editions.

Printed in Hong Kong.



# 目录

## 上册

序	暴风眼中看文革 .....	秦 晖 1
导	言 .....	5
第一章	1965：风起苹末 .....	23
第一节	文革前夕的军事体制及军事实力 .....	25
第二节	毛林治军与毛林关系 .....	38
第三节	“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	50
第四节	取消军衔制度 .....	58
第五节	加强战备，准备打仗 .....	64
第六节	“援越抗美”启动 .....	70
第七节	莫文骅事件 .....	75
第八节	罗瑞卿事件之一：上海锦江饭店会议 .....	83



第二章 1966·上：山雨欲来 .....	97
第九节 对“突出政治”的高调宣扬 .....	99
第十节 江青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纪要》 .....	104
第十一节 罗瑞卿事件之二：京西宾馆会议 .....	117
第十二节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	129
第十三节 “五七指示” .....	135
第十四节 首都工作组成立与北京卫戍区扩编 .....	142
第十五节 撤销公安部队，启用第二炮兵番号 .....	152
第十六节 贯彻执行“五一六通知” .....	158
第十七节 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 .....	166
第三章 1966·下：乌云压顶 .....	173
第十八节 军队院校文革的初始阶段 .....	175
第十九节 海、空军的两个会议 .....	181
第二十节 八届十一中全会 .....	190
第二十一节 军队对全会精神贯彻 .....	200
第二十二节 全会后的总部、军兵种机关“四大” .....	207
第二十三节 全会后的大军区机关“四大” .....	219
第二十四节 国防科委机关及院校“四大” .....	230
第二十五节 “一〇五紧急指示” .....	239
第二十六节 两次十万人大会与叶剑英公开检讨 .....	249
第四章 1967·上：淫雨霏霏 .....	259
第二十七节 全军文革改组 .....	261
第二十八节 萧力在解放军报社夺权 .....	268
第二十九节 贺龙身陷缧绁 .....	276
第三十节 “大闹京西宾馆”与“烧掉”杨勇、廖汉生 .....	284
第三十一节 军队正式介入地方文革 .....	297
第三十二节 军队面临冲击与“军委八条”的颁布 .....	309
第三十三节 二月镇反（一） .....	319
第三十四节 二月镇反（二） .....	330
第三十五节 “二月逆流” .....	340
第三十六节 三个野战军调防 .....	350
第五章 1967·中：阴风怒号 .....	361
第三十七节 青海：从“二二三事件”到省革委会成立 .....	363
第三十八节 军以上干部会议 .....	376

第三十九节 对重点部门及地区的军事管制 .....	391
第四十节 总部、军兵种机关的内部争斗 .....	399
第四十一节 “军委十条” .....	410
第四十二节 内蒙古：“红八条”公布前后 .....	418
第四十三节 四川：成都军区改组后的两年 .....	429
第四十四节 “五一三事件” .....	452
第四十五节 毛对香港采取军事行动的念头一闪即逝 .....	463
第四十六节 军队的造神运动 .....	471
<b>第六章 1967·下：浊浪排空 .....</b>	<b>489</b>
第四十七节 国务院系统的军事管制 .....	491
第四十八节 国防工业各部、院的军事管制 .....	505
第四十九节 介入铁路系统：从全面军管到国防军护路 .....	517
第五十节 “七二〇事件” .....	527
第五十一节 十二军入皖 .....	546
第五十二节 江西：野战部队入赣 .....	558
第五十三节 湖南：四十七军主湘 .....	572
第五十四节 总政瘫痪与军委办事组成立 .....	585
第五十五节 浙江：驻浙三军的支左态势 .....	596
第五十六节 天津：实际上是军人一统天下 .....	610

## 下册

<b>第七章 1967-69·上：日星隐曜 .....</b>	<b>623</b>
第五十七节 黑龙江：北疆前线的三支两军 .....	625
第五十八节 山东：济南军区与王效禹的斗争 .....	638
第五十九节 贵州：李再含上下台之间 .....	656
第六十节 山西：夺权后驻军支左综述 .....	673
第六十一节 内蒙：从“挖肃”到全面军管 .....	687
第六十二节 甘肃：兰州军区直管下的支左工作 .....	699
第六十三节 河南：省军区改组前后 .....	710
第六十四节 河北：驻军三支两军述略 .....	722
第六十五节 广东：从军管到省革委会成立 .....	735
第六十六节 吉林：军队为稳定局势所作的努力 .....	752
<b>第八章 1967-69·下：山岳潜形 .....</b>	<b>767</b>
第六十七节 江苏：从军管到省革委会成立 .....	769



第六十八节 宁夏：康健民率部入宁与“青铜峡事件” .....	783
第六十九节 陕西：驻陕部队的三支两军 .....	790
第七十节 辽宁：沈阳军区主导下的三支两军 .....	805
第七十一节 云南：动荡的西南边陲与军队 .....	820
第七十二节 福建：东南前线的三支两军 .....	837
第七十三节 广西：军队对一派的强力镇压 .....	853
第七十四节 西藏：西藏军区控制下的西藏文革 .....	870
第七十五节 新疆：文革进程与军队 .....	881
<b>第九章 1968：樯倾楫摧</b> .....	<b>897</b>
第七十六节 对中共中央工作机构等的军事管制 .....	899
第七十七节 “杨余傅事件” .....	907
第七十八节 新的军委办事组成立 .....	920
第七十九节 军内“清理阶级队伍” .....	927
第八十节 红卫兵运动的终结与军队 .....	942
第八十一节 八届十二中全会 .....	957
第八十二节 军管总政 .....	968
<b>第十章 1969-70：魃风骤雨</b> .....	<b>981</b>
第八十三节 军队院校的调整撤并 .....	983
第八十四节 珍宝岛事件 .....	991
第八十五节 九大：“团结”“胜利”表象下的暗涌 .....	999
第八十六节 九大以后的毛、林关系 .....	1011
第八十七节 军委办事组主导的全军战备工作 .....	1022
第八十八节 国务院机构改革中的军人 .....	1043
第八十九节 四届人大的筹备与修宪 .....	1052
第九十节 九届二中全会 .....	1064
第九十一节 吴法宪、叶群检讨 .....	1079
第九十二节 华北会议与改组北京军区 .....	1092
<b>第十一章 1971：回穴冲陵</b> .....	<b>1103</b>
第九十三节 军委办事组检讨 .....	1105
第九十四节 林立果及其“小舰队” .....	1113
第九十五节 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	1128
第九十六节 表面平静的四个半月 .....	1139
第九十七节 毛泽东南巡“吹风” .....	1149
第九十八节 “九一三事件”过程述略（一） .....	1165

第九十九节 “九一三事件”过程述略(二) .....	1180
第一〇〇节 毛周收拾残局 .....	1196
第一〇一节 外间对“九一三事件”的猜测和调查 .....	1206
第一〇二节 受“九一三事件”牵连的军人 .....	1219
第十二章 1972-76：波澜不惊 .....	1237
第一〇三节 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 .....	1239
第一〇四节 纠正军队不正之风 .....	1251
第一〇五节 退出三支两军 .....	1261
第一〇六节 十大：确立新接班人的失败尝试 .....	1274
第一〇七节 邓小平复出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	1284
第一〇八节 江青插手军队的批林批孔运动 .....	1294
第一〇九节 大刀阔斧的军队整顿 .....	1305
第一一〇节 军队在粉碎“四人帮”中的决定性作用 .....	1320
后记 .....	1337
附录：1965-76年军事工作大事摘要 .....	1339





# 序 暴风眼中看文革

秦 晖

文革中的军队，不仅在今天，就是在文革的当时，在作为是非漩涡和矛盾焦点的同时也是一个神秘的黑箱。著名的“造反派”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曾经成立过闻名遐迩的情报机构八大“动态组”，其中“三动”（第三动态组）就是专门收集军方各部“动态”的。三动的“简报”成为今天极难一见的文革史“黄金文献”。而余汝信先生几十年来搜罗的军队文革史资料，很多的价值超过了那些黄金文献。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告诉了人们很多事情发生的背后逻辑。

余汝信先生对文革史的研究功力深厚，成果迭出，而新出的这本书尤其重要。它揭示了文革期间中国军队作为政治斗争工具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和军队内部权力争夺的种种惊人内幕。

本书用新的材料提出了一系列与历来官方观点不同的新看法。如罗瑞卿问题使用了新发现的唐平铸笔记；1966年10月5日军委、总政“紧急指示”的由来以新发现材料否定了陶斯亮告状说；论述1967年1月刘志坚倒台、阎红彦自杀时引用了当时周恩来对这些人的负面评价；指出“七二〇事件”导火索其实是周恩来的讲话，等等。尤其是1971年5月林彪给毛的信的复印件，1971年11月蒙古官方关于“九一三”坠机的调查报告中文译本等，都是余汝信先生首次向外界提供的。

而本书对“九一三事件”经过的详尽分析，则以林立衡1971年10月给中央的报告这一当时林家知情人最早、最具体的亲述文献为依据，这份文件虽然早就被提到，但就我所见，最详尽的文本披露还是在余汝信先生的这本书中。他依据这份第一时间和第一手资料，结合其他重要信息来源，对该事件的真实过程也做出了迄今为止笔者认为最可靠的考证。这些考证澄清了由于各种原因在后来的几十年间出现的主要争论，包括林立衡本人后来因政治气候变化改变说法而导致的许多混乱。可以说，经过余汝信先生和其他学者的持续考证，这场石破天惊的文革时期政治大地震的真相已经基本大白。

本书关于军队文革内幕的一些考证，更可以给今天的一代人以深刻的历史启蒙。如本书提到的青海核武器研究基地“221”，如今是著名的红色旅游热点“金

银滩”“西海原子城”，作为文革时期两弹一星成就展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天游客看到的只是一片满满的“正能量”。但本书揭示了文革中这里的一幕幕恐怖剧：1966-67年间，该单位文革造反、派争、武斗严重，导致业务瘫痪。1967年实行“军管”后，“造反派”的派斗趋于平息，按过去官方“否定文革（实际上主要仅否定‘造反派’）”的说法应该算是恢复正规了。

然而“军管”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才真正开始了恐怖高潮。特别是1969年11月发生所谓“三大案件”后，周恩来指示派海军副司令、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启民、公安部领导成员、原空军副军长赵登程前往清查。二赵调入大批复员军人作为“打手”，对原基地的科学家、干部与群众进行大规模整肃，“大搞刑讯逼供，提出‘革命群众掉几斤肉，让阶级敌人去几层皮’的口号”；实行“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抓“五一六”分子“一个不漏”，破“四旧”要“刺刀见红”。

当时全基地被圈禁，人人过关，“整个二二一厂成了一个大监狱”。赵登程带头搞“逼、供、信”，亲自动刑。使用的刑法闻所未闻，什么“站圆筒”、“冻冰棍”、“烤电炉”、“假枪毙”、“假活埋”等无所不用其极。今天被当做红色样板的二二一基地，当时却被说成是“小香港”、“小台湾”、“资产阶级大染缸”，反革命分子是“一串串的”、“一窝窝的”；“要杀一批，清一批，还要控制使用一批”。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二赵倒台时止，该基地已有3,200余人被整肃，被逼自杀108人，被打致死4人，包括副院长王志刚和炸药专家钱晋；冤杀5人，被关致死3人；因刑讯致残、致病400余人，九院创始人之一吴际霖也因备受摧残英年早逝……。

尤其恐怖的是1970年“为揪运动高潮，草菅人命，枪决无辜职工”，当时一次就当众枪杀5人，其中三名科技人员，还有一个不到16岁的孩子；本书揭示了当时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

“开大会时，会场四周架上机枪对着全场群众。‘犯人’剃光头，绳子套在脖子上，令全厂职工面向杀人现场。枪杀人后，赵登程讲话称，‘你们听到枪声没有？没有听到枪声，下次我拿大炮轰，拿机枪扫。’”

这些情况，不仅在对文革灾难了解极少的今天中国应该让后代人知道，即便在改革初期“彻底否定文革”的时期，文革的罪过也基本仅由“造反派”和“林彪、四人帮集团”背锅。而二二一基地最可怕的一幕却不是“造反派”得势时，相反所谓抓“五一六”还主要就是针对造反派的。主持整肃的赵启民并非林彪或四人帮所派，后来也没有作为林彪四人帮死党定案。这些灾难究竟因何种机制发生？怎样才能杜绝这类悲剧发生的根源？在二二一基地成为缅怀国防科研先驱纪



念地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他们当年蒙受的冤屈和苦难？如何告慰那些屈死的亡灵？

笔者少年时亲身经历过广西的文革，对当时军队各部分的差异、矛盾与对立，尤其对不少军队与各派关系的翻云覆雨、变化无常感到极为困惑。当时的军队对外都以数字代号“××××部队”见称，而实际番号保密。民众对各部队的历史渊源来龙去脉一无所知或众说纷纭。我们那时就搞不清楚，为什么广西军区支持一派而广西几支野战军却曾经支持另一派？为什么“6955”、“6936”、“6984”、“广字104”等部队各唱各的调？“北京”曾经派“6984部队”来保护受压的“广西四二二”造反派，不久却又在对方武力威胁日甚时调走了该部，甚至把“挽留亲人6984”的民众打成“反共救国团”操纵的“X匪”来剿灭。而当后来人们得知6984中的一些部队也参与了这类剿灭时，就更惊讶得如雷轰顶。余汝信先生的这本书下了很大功夫，基本还原了文革中这些“××××部队”在军中的真实番号及其军史上的组织渊源，有助于人们理解它们政治态度的差异和变化，澄清了很多萦绕人们心中的谜团。

我们很早就隐约知道，地方军区由于与当地党政机关关系密切，往往支持“保守派”，而“中央”直接掌握、调动频繁的“野战军”则往往按北京文革策划者的意图支持“造反派”。但是这种粗略的感觉往往让人上当。例如广东文革中，野战军第41军等部对造反派的镇压比地方军区还厉害。为什么？后来我们知道，1950年代北京派来“南下干部”掌权，大反“地方主义”，整肃广东地下党与游击队出身的本地干部，广东文革受到此举后遗症的严重影响。在很多地方，“造反派”同情被整的本地干部，视长期掌实权的北方籍“南下干部”为“走资派”而力图打倒之。而野战军领导恰恰多为北方人，因此在这个地区他们反倒大概率地同情“南下干部”，支持敌视本地干部的所谓“保守派”。本书对各地驻军真实组织体系和历史渊源的梳理，对理解这类现象极有帮助。当然，这也反映出军队文革与地方文革的错综复杂关系。军史上的亲疏恩怨是影响文革中军队态度的一个因子，但是这种态度绝不是仅用军内渊源所能解释的。

军队在文革中可以说是“风暴眼”：表面上是乱局中的静点，实际却紧邻风暴最烈处。军队作为最讲纪律的秩序力量，逻辑上与“造反”可以说是最对立的。但文革中的军内造反却一度如火如荼，乃至由于失控而出现“军管总政”这种荒唐现象。毛泽东在大讲整肃“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两年之后，1968年却有

一段时间密集地大讲文革就是整“国民党”，还暗示指的是文化教育界和社会上的“国民党”残余。军内立即有人敏感感到这是对造反派兔死狗烹的信号，不仅放出造反派是国民党潜伏组织“反共救国团”操控的说法，把军内曾经奉旨支持“造反”的人员打成“国民党政治部”，甚至在军内提出“‘老保’不翻天，天下不太平”的口号。军队是最讲统一的，尤其是中共的军队最强调“党指挥枪”、“一切行动听指挥”，但文革中的军队却显示出极为分裂的一面，不仅派系倾轧，不同部队各支一派大打内战，甚至出现林立果谋刺毛泽东这种任何“造反派”都不敢想象的策划。

在过去强调文革“造反”犯上作乱无法无天的一些著述中，文革，尤其是派战激烈的前几年常给后人以“无政府状态”的印象。实际上尽管毛泽东绝非无所不能，他的决策后果也多次超乎自己预料、甚至自己都不易收场。但是文革在整体上从未脱离过毛泽东的掌控，所谓天下大乱、全面内战等语，往往是毛泽东有意翻云覆雨、借力打力、自诩“乱了敌人”，即便在毛泽东始料不及难以收场的尴尬时期，也常常是以新的错误来文过饰非，为纠正自己的前一个失算而让别人和国民付出代价。军队正是毛泽东用以控制文革的最后底牌，尤其“北京派来的”野战军的态度，曾经是民间百姓揣测圣意的依据。我所在中学的一位老师，本是根正苗红的青年党员，思想正统，原来曾经是“保守派”，后来正是因为“毛主席派来野战军”保护四二二造反派，以为这就是圣意所在，遂反戈一击成为了四二二成员。不料数月后“中央”再次变卦，在四二二最终被军队支持的保守派镇压时，他被深恨其“叛变”的本校“保守派”成员当场枪杀。

但正如本书揭示的大量事例所证明的：军队在这种翻云覆雨中既成为毛泽东控制乱局的“定盘星”，又成为助长各地乱局的肇祸者，而军队自己也被折腾得遍体鳞伤，付出了惨重代价。余汝信先生的这本书，既留下了大量详实史料，又令人深省反思，在资料与思想两方面都很有价值，我先睹为快，也特此向读者推荐。

# 导言

## —

众所周知，毛泽东于1929年为古田会议所写的决议案中明确宣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中共建政后，毛时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绝非单纯的国防军事力量，而是毛泽东“五七指示”中所说的“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被视为中国共产党须臾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同时也是党内斗争的重要工具。文革十年，尤为甚之。

本书以纪事本末体编写。力求将人民解放军在十年文革风暴中所走过的艰辛而曲折的历程，勾勒出基本的轮廓，完整地予以呈现，并揭示这一军事力量与整个文革进程息息相关的紧密联系。

此十年间（并上溯至文革前一年），以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位的时间计，大致可分为林彪的前五年与叶剑英的后五年（其中包括陈锡联的八个月）。前五年，军队登上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并一度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位置。后五年，军队从舞台逐步后撤，影响力大减，最终又对结束文革起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若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处理军委日常事务性工作负责人两个层面计，则又可以分为若干子阶段。概述如下：

### （一）文革准备发动阶段

本时段为1965年一整年。

年初，人民解放军的总人数达到447万。这一支全球人数最多，绝对服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指挥的庞大武装力量，是毛泽东敢于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力量和有力保证。

在此之前，经历了两年之久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运动，人民解放军声誉日隆。军队“学毛著”运动及政治工作的经验被广泛应用到地方，中共从解放军中抽调了大批干部到新建的地方政治机构工作。1965年2月，调南京军区第二政委萧望东任国务院文化部第一副部长（部长陆定一兼）、部党组书记，以改组、调

整文化部领导班子。“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一系列举措，已经具有文革中三支两军的雏形。

这一年，已经实行了十年之久的军衔制度被视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产物，与人民军队的“革命化”不相适应。作为“突出政治”、“防止修正主义”的措施，人民解放军取消了军衔制度。这一倒退性做法，使军队正规化建设遭受重创，进一步趋于政治化。

这一年，毛泽东对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愈加不满并决心将其打倒，因而对党内第六号人物、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愈加寄以厚望。1月底，林彪的形象首次出现在纪念邮票上，这是中共建政后除毛泽东、朱德外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未有过的殊荣。2月中，毛泽东高度赞扬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声称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他还进一步发挥道：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其潜台词是，将在今后政治斗争中依靠和运用军队的力量。

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权倾一时的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被诬指为觊觎军内更高权力的“野心家”和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的两面派，遭到毛泽东、林彪的合力清洗。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和批判罗瑞卿的“错误”，剥夺了罗瑞卿的权力，从而在军内“消除隐患”，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使军队成为其发动文革的保障，以及震慑政敌的武器。

## （二）毛 - 林（周） - 叶、萧、杨“三驾马车”时期

本时段由1966年1月至1967年上半年，约一年半时间。

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秉承其一贯做法，对军队大权一人独揽。林彪名义上是以军委第一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惟自1967年1月军队介入地方文革后的具体任务，往往是周恩来以中央碰头会主持人身份布置的。文革时期，虽然周恩来在军队中没有任何职务，惟以其在中共党政军历史上形成的威望，对军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在毛泽东的认可下，由于周恩来的作用，林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当“甩手掌柜”。

上海会议后，1965年12月，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1966年1月，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增补为军委副主席。同年5月，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原毛泽东—林彪—罗瑞卿（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军委秘书长）的军委领导架构，被毛—林（周恩来）—叶剑英、萧华（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秘书长）、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副秘书长）“三驾马车”所替代。



进入1966年，罗瑞卿问题升温。三四月间，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彻底弄清罗瑞卿的问题”。会议领导小组负责人邓小平为罗问题定调：“罗担负的职务很多、很大。书记处书记、副总理、总参谋长、秘书长等等，掌握了军事大权。军队是党的命脉，无产阶级的命脉，让这样没有党性、作风这样恶劣、资产阶级思想充满脑袋的人掌握军队是极危险的。退一步来说，即使没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凭他那种思想作风也是危险的。他确实是个隐患，拔除这个隐患就是个大胜利，何况他又有伸手问题。一旦天下有事，那就不堪设想。”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五一六通知”中提到，“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第一次将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纳入“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之中，要求进行清洗。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周恩来约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等军队系统负责人谈话，通报了毛要与刘少奇摊牌的紧急要况，要求他们坚定地站在毛一边。在此次全会上，政治局常委会改组，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并被称为毛的“亲密战友”。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大大加强了军队领导人在政治局中的份量，充分体现了毛依靠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图。

至于军内文革，1966年5月的设想是，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各大单位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和组织的整顿，彻底批判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言论。此计划在三个月后发生变化，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林彪指示：“军级机关、军区、军兵种机关和总部机关及各院校，都要进行一次大整机关。”8月，第54次军委常委会议确定，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大体上从九月份开始，用两三个月的时间进行。惟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一时间的设想很快被突破。

1966年9月，毛同意将有关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的问题在高级干部中打招呼。1966年底至1967年1月初，贺龙问题公开化，贺于1月中旬失去人身自由。1967年9月，毛批准对贺龙立案审查。贺龙在被关押的状态下，于1969年6月9日病逝。



毛泽东与萧华、杨成武在天安门广场，1966年10月1日。

1966年10月5日，经毛批准，中共中央批转林彪指示起草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自此，全军院校十万青年军人解除束缚，汇成造反洪流，其巨大的冲击能量波及军内外。

1966年底，在文革狂潮冲击之下，中共原有的地方党政权力架构根基已然动摇。翌年1月全国性的夺权风暴，使各地党政权力架构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这一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去填补地方党政机构坍塌而形成的权力真空，承担稳定全国局势的重任。

1967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正式介入地方文革。3月，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这五项任务被简称为“三支两军”，是军队介入文革的基本任务。“三支”中最重要的是支左，“两军”中的重点是军管。

文革期间，军队干预国家及各级政府事务的广度、深度及时间长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就其广度而言，1967年初最具战斗力的陆军机动部队（野战军），全部介入并领导所驻地区以支左为核心的三支两军。年内，各野战军的三支两军地区和范围迅速扩展。

就其深度而言，军队几乎接管了各级政权组织、社会团体和重要企业事业单位。1967年1月后展开的“军事管制”，是在原有党政权力架构处于坍塌状态之下采取的一种措施。根据军管对象的不同情况，军管的形式大致分为三种；一为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二为建立军管小组，三为派出军代表。

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67年3月至5月间，由中央批准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有8个，占总数的28%。

1967年，国务院共有正部（委）级机构48个，除国防部为虚设，公安部、文化部未实行军管外，实行军管的部（委）共45个。其中，国防工业6个部（第二至第七机械工业部）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国防工业口以外的部（委）39个，其中组成军管会18个，军管小组3个，派出军事代表18个。国务院21个直属机构中，除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已由空军接管，国家海洋局由海军代管列入军队序列，两个局情况未详外，其余机构及国务院秘书厅共18个单位全部实行军事管制。其中组成军管会的1个，军管小组4个，派出军事代表13个。

1968年4月至8月间，对中共中央主要工作机构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调查部等分别实行军事管制。中央组织部虽未实行军管，但早已于1967年5月派驻由军人组成的业务组，以负实际领导责任。

最令人惊诧的是，军事管制的形式竟然延伸至军内单位。1967年4月，军委决定，对大军区级的军队最高学府——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10月，对军队最高政治首脑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实行了不符常理的军事管制。

军队作为国家机器最重要组成部分，偏于保守，追求稳定为其必然。故而，在介入地方文革之后，大部分军事机关、部队和军人往往比较倾向于维护旧秩序的保守一派，与群众组织中所谓“组织成份较纯”、“出身好”、党团员较多的保守或稳健派思想感情接近，关系天然地较为亲和。这就难免与造反派、或造反派中的激进派之间感情疏离以至产生对立情绪。1967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的“军委八条”颁布，使军方以为拿到了对付曾冲击军事机关的军内外造反派的“尚方宝剑”。1月底至3月间，各地普遍发生军队镇压造反派、激进派的事件，史称“二月镇反”。

1967年4月，又经毛泽东批准发出“军委十条”，对“军委八条”引发的军队对造反派、激进派的镇压进行纠偏。“军委十条”解救了造反派，却又引发了其对军队及保守派、稳健派的报复。军队及保守派、稳健派不服，两派矛盾加剧，武斗频仍。7月，在倾向保守派的武汉军区眼皮底下，发生了武汉地区部分军人与保守派群众冲击毛泽东及中央要人居住的东湖客舍，要挟中央改变对武汉地区既定政策的“七二〇事件”。该事件是社会上两派矛盾激化反映到军内的一次大爆

发。“七二〇事件”中，毛泽东趁夜仓促转移，并打破十年来不乘飞机的惯例，清晨离汉飞沪。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一事件对毛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冲击，反而使毛看到文革局势演变下去将难以收拾的严重性，促成他一改初衷，将文革的战车骤然改变轨迹，逐步从“乱”走向“治”。

全国范围的武斗逐步平息下来，两派纷争走向缓和，经历了年许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军队尤其是野战军，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不排除在个别地方，军队的介入加剧了两派的矛盾，但总体而言，在平定大局方面，军队的正面作用远大于负面作用。

在军内，“军委十条”颁布之后，一度受压的军内造反派重新抬头。大部分驻京军内单位中分为两派，一派是受萧华、杨成武及年初成立的新军委文革小组实际支持的造反派（“新三军”又称“反三军派”），另一派是受军内实力派支持的保守派（“老三军”即“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两派相互对峙的局面，在“五一三事件”发生后被打破。毛泽东、林彪支持了参加演出的“老三军”（“演出派”），而冲击演出的“新三军”（“冲派”）随即一蹶不振，萧华在“五一三事件”两个多月后也被打倒。

### （三）毛 - 林（周） - 杨成武时期

本时段由1967年9月至1968年3月，为期仅有半年时间。毛、林、周的作用与影响力基本与上一个时段相同。

1967年8月，由于萧华的倒台，加上批判“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在军内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三驾马车”仅余杨成武一人。此时，总政和军委文革小组实际处于瘫痪状态，根据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4人组成军委办事组，9月，又决定增加杨成武为成员，并指定杨为组长，吴为副组长。

军委办事组成立之初，任务主要是“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工作，看着总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而“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

“五一三事件”之后，杨成武的日子亦不好过。1967年9月间，江青指责杨成武整她的黑材料，杨是“放长线钓大鱼”。年底前，毛泽东在“绝对权威”的问题上不点名地重重敲打了杨。文革以来位高权重的杨成武实质上存在的“华北山头”倾向，引致毛、林及部分军队实力派人物的警惕与不满，最终酿成了1968年3月的“杨余傅事件”，杨成武倒台。



#### (四) 毛 - 林 (周) - 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时期

本时段由1968年3月至1971年9月，为三年半时间。若再细区分，又可分为两个子时段：1968年3月至1969年4月，为林彪尚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名份时期；1969年4月至1971年9月，林彪已失去此名份。而毛、周的作用与影响力与上两个时段相同。

1968年3月25日，“杨余傅事件”后，经毛、林同意，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以黄永胜为组长的新的军委办事组名单。三天后，毛、林、周接见黄永胜、吴法宪等，周恩来称，“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毛称，“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林彪称，“把它悬空起来。”毛称：叶剑英说过，杨成武是接班人。现在换了黄永胜，你这个黄永胜为什么不可以接班？毛泽东的话里，隐含以黄代替林主军的意图。

此一时期，中央一方面发出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一方面将军队的“支左”方针调整为“支左不支派”，对各派群众组织号称“一碗水端平”，以促进“革命大联合”，促成“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实际上由军队为主导。到1968年9月，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现役军队领导干部20人担任了省一级革委会主任，占同级革委会主任人数近七成。其余原地方领导干部9人，亦分别兼任了大军区第一政委、政委。

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后，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在此前后，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这些全国性的以及各地名目繁多的各种运动，一个接一个，两年多时间没有消停。这些运动，基本上是由各级革委会尤其是革委会中的军队代表为主导，相当多的干部、群众受到批判和政治迫害，“逼供信”盛行一时，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成员25人，其中现役军队领导人13人，占52%（四野系5人占20%）。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讲话时，有意提及苏联攻击中国是“军事官僚专政”等言论，显示出他对军队干政掌权心存疑虑。

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军委未设常委，军委办事组部分行使军委常委职权，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1969年3月，毛泽东借中苏边境发生的小规模冲突“珍宝岛事件”，明确提出“要准备打仗”，使全国进入紧张的战备时期。1969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部队的部署调整。10月，军委发布命令调整战略预备队，加强了“三北”地区尤其是北京周围的兵力部署，并在战略纵深留置强大的机动兵力。至年底，部署在“三北”地区的陆军共有16个军，为全国陆军军总数的44%。

1969年之前的几年，军队的兵力已呈逐年递增趋势。1969年为适应战备需要，开始大量组编部队，军队员额持续上升。至当年底，全军在编人员增加至631万余人，超过朝鲜战争时期的最高数额，成为中共建政以来军队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

1969年9月中下旬，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研究苏联的战备动向和对付苏军突然袭击的各项具体措施。毛、林、周分别到会强调：要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全军的中心任务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10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定。之后，毛泽东即离京赴武汉，林彪随后疏散至苏州，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留守北京。10月17日，林彪就军队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作出指示。这个指示被称为“林副主席的第一个战斗号令”，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快和猜疑，以致于后来成为军内清查的重要事件。根据林彪的这个指示，全军各部队立即行动，当夜即疏散到位。在随后半年多的时间里，部队一直处于紧急战备和疏散待战状态，到1970年4月底稍有缓解。

自1967年初开始，军队通过三支两军，修复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被打倒后陷于坍塌状态的权力架构，加之1969年对苏战备形成的客观情势，使国家大部分权力归集于军队。毛泽东对林彪等军队领导人产生了戒心，担心其“尾大不掉”。而林彪对毛的“继续革命”渐生厌倦，态度转为消极。在此情况下，毛有意在文革极左派中另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传承者。而林彪虽然在中共九大当选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被确立为毛的“接班人”，但他的权力并未因此增加，反而有被架空的迹象。在新军委中，林彪为六位副主席之一，但没有第一副主席的名份，也没有像十年前那样被授权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70年3月，毛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6月，经毛同意，国务院由文革前的90个单位精简为27个单位，各新单位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委会。虚设的国防部没有任命实际负责人，林彪仍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中央政府架构中的地位低于周恩来。周试图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向毛提议解决此一问题。8月，周恩来与陈伯达、康生向毛提出：“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也要一元化，尽管是个形式，但群众热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当然副主席。这样就满足



“五一三事件”三周年，左起李作鹏、邱会作、胡敏、叶群、陈绥圻、吴法宪、黄永胜同游长城纪念，1970年5月13日。

群众愿望。领导嘛，当然是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了。但在国家形式上，是国家元首、副元首。”对此，毛有意不予回应。在修改的宪法草案中，称毛泽东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惟未给予林“副元首”的尊称。

1970年8、9月间，中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在如何对待以张春桥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派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出现严重分歧。庐山会议之后，毛明批陈伯达，实则剑指林彪。毛通过逼迫军委办事组诸成员一再做检讨，试图迫林彪低头认错，惟林不为所动。毛决心弃林，于1971年八九月间“南巡”，采取“吹风”方式，发动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倒林，毛、林关系濒临决裂。毛一贯采用的整人手段，令林彪及家人（林立衡除外）深生恐惧，在林立果刺杀毛未遂之后，林与妻、子于9月13日零时后在山海关机场乘专机强行起飞，逃出境外，在蒙古肯特省苏布拉嘎盆地坠毁，机上九人无一生还。

#### （五）毛 - 叶、邓时期

本时段由1971年9月至1976年1月，为四年又四个月时间。叶剑英被毛授权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周恩来主持处置“九一三事件”后，在军队事务中逐渐淡出。

蒙古草原深处的一声巨响，宣告了毛泽东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的破产。毛的身心均受到沉重的打击，步入黄昏岁月，文化大革命从“辉煌”走向衰落和破产。“九一三事件”之后，被视为林彪派系的军人遭到大规模清洗，“批林批孔”运动持续经年，军队的形象黯然失色。

1972年8月21日，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及附件《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至此，参加三支两军的官兵陆续撤回部队，需要留地方工作的军队人员就地转业，各地方权力重新回到地方党政官员手中。

“九一三事件”后，军委日常工作由叶剑英主持。1973年12月，邓小平恢复工作，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5年1月，邓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后又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明确提出：“军队要整顿。”在邓、叶主持下，同年六七月间举行了军委扩大会议，集中研究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会议决定军队消“肿”，三年减少兵员160万，全军总人数精简26.2%。到1976年，全军总人数比1975年减少13.6%。后因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军队精简整编和整顿工作中断。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并未将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权力交予势力膨胀的极左派。1973年，王洪文一度成为毛预设的又一接班人，但并未成为军委副主席。即使是最受毛青睐的张春桥，也只是出任没有军事指挥权的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这一尚存理性的安排，使党内健康力量在1976年十月之变中得以依靠军队的力量轻易取胜，从而使中国避免了在黑暗中继续徘徊。

#### （六）毛、华 - 陈锡联时期

本时段由1976年2月至10月，为期八个月。陈锡联名义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76年1月，毛泽东取消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权力，同时决定由陈锡联代替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密谋，以汪掌握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部分兵力，猝然起事，一举抓获“四人帮”，清除了中央的文革极左派全部势力。对于毛泽东家族而言，毛犯的最大历史错误就是让汪检讨过关，“信任如故”，而对中国而言，中南海御林军的掌控权仍旧在汪手中，这未免不是一件幸事。毛放过了汪，汪却没有因此放过江青和毛远新。没有叶剑英、汪东兴等军方领导人的主动参与和坚决支持，1976年十月之变绝对不可能成功。

如此说来，结束文革的历史性任务，实际也是由军队最终完成的。



## 二

以上，仅是军队与文革进程关系的大致脉络，并非是军队文革史的全部。在这段历史中，尚有另一个阴暗面应予揭示。

文革对人民解放军的摧残、对军队建设的破坏，也是非常严重的。文革十年间，对军队高级将领曾进行过三个阶段的大规模清洗。

### （一）第一阶段的清洗

此阶段自文革前夕至“九一三事件”前。被清洗者，大部为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所指的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一阶段遭受不同程度冲击、诬陷、迫害以至被隔离审查、予以逮捕的高级将领（包括文革前经历历次运动而被降职或离开军队者），据不完全统计，正军职以上共204人，名单如下：

贺龙（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军委副主席）、陈毅（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军委副主席）；罗瑞卿（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张宗逊（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副总参谋长）、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部长）、刘少文（总参情报部部长）、吕正操（总参军交部部长）、傅秋涛（总参动员部部长）、叶运高（总参政治部主任）；萧华（总政主任）、刘志坚（总政副主任）、徐立清（总政副主任）、梁必业（总政副主任）、傅钟（总政副主任）、袁子钦（总政副主任）★、贾若瑜（总政代理秘书长）、徐文烈（总政副秘书长）★、李曼村（总政宣传部部长）、史进前（总政保卫部部长）、谢镗忠（总政文化部部长）、鲍奇辰（总政群工部部长）、金如柏（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胡痴（解放军报社代理总编辑）、赵易亚（解放军报社总编辑）、饶正锡（总后副部长）、汤平（总后副部长）★、李耀（总后副政委）、李雪三（总后副政委）、彭嘉庆（总后副政委）、杨恬（总后参谋长）、卢南樵（总后政治部主任）、周长庚（总后政治部副主任）★、张和（总后工厂管理部部长）★、傅连璋（总后卫生部副部长）★、苏焕清（总后管理局局长）；萧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路扬（军委办公厅主任）、郑汉浩（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王兴纲（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刘转连（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吴保山（沈阳军区副政委）；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廖汉生（北京军区第二政委）、傅崇碧（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司令员）、索立波（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必成（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鲍先志（南京军区副政委）、王蕴瑞（南京军区参谋长）、史景班（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赵俊（江苏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浙江省军

区司令员)、廖政国(上海警备司令员);刘培善(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吴瑞山(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林忠照(江西省军区第二政委);文年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晏福生(广州军区副政委)、郭成柱(广州军区副政委)、陶汉章(广州军区参谋长)、相炜(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江民风(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谭文邦(湖南省军区政委);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汉华(武汉军区第二政委)、李迎希(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杨秀山(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唐金龙(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广才(武汉军区副政委)★、吕炳安(武汉军区政治副主任)★、何运洪(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阎红彦(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昆明军区第二政委)、胡荣贵(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子明(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力雄(云南省军区政委);黄新廷(成都军区司令员)、郭林祥(成都军区第三政委)、甘渭汉(成都军区第四政委)、李文清(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何正文(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杰(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余洪远(成都军区副政委)、余述生(成都军区副政委);杨嘉瑞(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王庆生(兰州军区副政委)、张子珍(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朱声达(宁夏军区司令员);王恩茂(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左齐(新疆军区副政委)、张仲瀚(新疆军区副政委)、何家产(新疆军区参谋长);谭冠三(西藏军区政委)、王其梅(西藏军区副政委)★、桑颇·才旺仁增(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阴法唐(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乌兰夫(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孔飞(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廷懋(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刘昌(内蒙古军区副政委)、王良太(内蒙古军区参谋长)、塔拉(内蒙古军区副参谋长)、张德贵(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苏振华(海军政委)、刘道生(海军副司令员)、陶勇(海军副司令员)★、杜义德(海军副政委)、张学思(海军参谋长)★、李君彦(海军政治部副主任)、方正平(南海舰队政委)、卢仁灿(北海舰队第二政委)、李呈瑞(海军航空兵部原政委)★、康志强(海军学院政委)、雷永通(海军学院第二政委)★、齐勇(国家海洋局局长)★;余立金(空军政委)、刘震(空军副司令员)、成钧(空军副司令员)、徐深吉(空军副司令员)、张廷发(空军副司令员)、何廷一(空军副参谋长)、黄玉昆(空军政治部主任)、王平水(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空军政治部副主任)、漆远渥(空军后勤部部长)、石忠汉(空军后勤部政委)、杨文安(空军第二炮兵指挥部副司令员)★、黄立清(沈空政委)、聂凤智(南空司令员)、顾前(南空参谋长)、张少虹(空四军政委)、吴富善(广空司令员)、安志敏(广空副司令员)★、王定烈(广空副司令员)、刘善本(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吴克华(炮兵司令员)、苏进(炮

兵副司令员)、吴信泉(炮兵副司令员)、匡裕民(炮兵副司令员)、向守志(炮兵副司令员)、孔从周(炮兵副司令员)、欧阳毅(炮兵副政委)、刘何(炮兵副政委)★、谢良(炮兵副政委)、丁本淳(炮兵政治部主任)、李铁砧(炮兵政治部副主任)★、高存信(炮兵学院院长)、贾陶(原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李天焕(第二炮兵政委);许光达(装甲兵司令员)★、贺晋年(装甲兵副司令员)、张文舟(装甲兵副司令员)、程世才(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装甲兵副司令员)、邱相田(装甲兵政治部主任);谭友林(工程兵副司令员);崔田民(铁道兵第二政委);陈鹤桥(通信兵政委)、樊哲祥(通信兵部副主任);张震(军事科学院院长)、王平(军事学院政委);莫文骅(政治学院院长)、邓逸凡(政治学院原副院长);陈伯钧(高等军事学院原院长)、李聚奎(高等军事学院院长)、李志民(高等军事学院政委)、解方(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林浩(高等军事学院副政委);钟期光(军事科学院副政委)、胡秉权(军事科学院教研馆主任)★;安东(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国防科委副主任)、蔡顺礼(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国防工办副主任)★。

文革前已被降职或调离军队:萧克(原训练总监部部长)、李达(原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彭德怀(原军委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黄克诚(原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邓华(原沈阳军区司令员)、周桓(原沈阳军区政委)、洪学智(原总后方勤务部部长)、万毅(原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钟伟(原北京军区参谋长)、谭政(原军委常委、总政主任)、欧阳文(原解放军报社总编辑)、刘其人(原总政组织部部长)★、范明(原西藏军区第一副政委)、张经武(原西藏军区第一政委)★、贺振新(原炮兵科研院政委)★、萧望东(原南京军区第二政委)、颜金生(原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庄田(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以上204人中,取消军衔前少将以上者200人。其中元帅6人,大将4人,上将25人,中将59人,少将106人。大部分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恢复了名誉及职务,惟有37人(名字后有★者)在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

此外,在此阶段死于非命的还有谭甫仁(昆明军区政委)。谭于1970年12月17日在其住所内被正在受审查的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科长枪杀。

## (二) 第二阶段的清洗

“九一三事件”发生当月直到1973年,除林彪(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叶群(军委办事组成员)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死于外逃坠机事故外,众多被视为林彪派系的军队高级干部先后遭到清查清洗。受牵连的军队高级干部

被予以逮捕、隔离审查、免职审查等不同程度的处分。事后复查，绝大部分人与“九一三事件”并无直接关联，其罪名查无实据。

### 1. 正军职以上军队干部（不含空军）

正军职以上军队干部（不含空军）被解职审查的，据不完全统计为38人。其中，取消军衔前的上将1人，中将12人，少将19人，大校6人。以党内职务计，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4人（含中央政治局委员4人），中央候补委员7人。在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举行的两案审判中，被判刑4人，免于起诉9人。其余各人处理轻重不一。

黄永胜（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李作鹏（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邱会作（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阎仲川（副总参谋长）、黄志勇（总政治部副主任）、陈庞（总后副部长兼司令部参谋长）、王希克（总后副部长兼供应部部长）、伊文（总后副部长）、张明远（总后副部长）、严俊（总后副部长）、丁先国（总后副部长兼重庆办事处主任）、戴金川（总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靳来川（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兼解放军总医院院长）、白辛夫（总后西安办事处主任）、萧建飞（军委办公厅主任）、袁升平（济南军区第二政委，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山东省委第二书记）、南萍（陆军第二十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主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熊应堂（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周赤萍（福州军区政委，福建省委第二书记）、程世清（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江西省革委会主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栋梁（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韦祖珍（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广西区革委会副主任，广西区委书记）、卜占亚（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南省委书记）、刘丰（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王新（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河南省委书记）、蓝亦农（昆明军区副政委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梁兴初（成都军区司令员，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四川省委第二书记）、陈仁麒（成都军区政委）、温玉成（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龙书金（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新疆区委第一书记）、吴瑞林（海军常务副司令员）、张敬一（海军政治部主任）、易耀彩（北海舰队政委）、辛国治（北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军政大学政委）、王秉璋（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罗舜初（国防科委副主任兼国防工办副主任）。

## 2. 空军副军职以上干部

在“九一三事件”后的清查清洗中，空军是重灾区。空军副军职以上干部被解职审查的，据不完全统计为43人（吴法宪主要工作在军委办事组，王秉璋主要在国防科委，未计算在空军人数内）。其中取消军衔前的中将1人，少将13人，大校8人。以党内职务计，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人，中央候补委员2人。两案审判时被判刑4人，免于起诉2人。

曾国华（空军副司令员）、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空军市委常委）、何振亚（空军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司办公室主任）、朱虚之（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第三十四师党委书记）、江腾蛟（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戚先初（空军后勤部副政委）、王宝功（沈空政治部主任）、张永亮（空军第三军政委）、吉世堂（空军第六军军长）、司中峰（空军第六军政委）、王绍渊（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李全春（空军第九军第一政委）、齐国忠（空九军参谋长）、陈冠（空九军政治部主任）、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王维国（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副书记兼空四军第一政委）、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副书记兼空五军第一政委，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胡立信（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郑长华（空军第四军军长兼政委）、姬应伍（空四军第二政委）、张启文（空四军政治部主任）、刘忠林（空四军副政委）、冯键（空五军第二政委）、王是桥（空五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马运河（空五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王璞（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林虎（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解耀宗（空军第十二军军长）、沈科（空军第十二军副军长）、张守恩（空军第十二军副军长）、马进修（空军第十二军政治部主任）、解长林（武汉军区空军副政委）、查全伦（任福州军区空军副政委）、鲁鸣（空军第八军政委）、李登云（空军第八军副政委）、吴宗先（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员）、马杰三（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张东梅（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副主任）、丁钊（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委）、周德润（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副政委）、李万增（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治部主任）。

此外，1972年10月，赵登程（原空八军副军长，时任公安部革委会副主任）因在国防科委九院221厂制造假案事件被关押审查。

12月，萧劲光（海军司令员）被指为“上了林彪的贼船”受到审查。

1973年1月26日，王良恩（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自缢身亡。



7月24日，赵启民（海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因在国防科委九院221厂制造假案被免职接受审查。

10月21日，李震（原沈阳军区副政委，时任公安部革委会主任）★自缢身亡。

### （三）第三阶段的清洗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除王洪文（军委常委）、张春桥（总政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被逮捕外，一批被视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等原因的军队高级将领被清洗。这批人包括：

胡炜（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徐海涛（总政保卫部副部长）★、毛远新（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伯秋（沈阳军区副政委，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王淮湘（沈阳军区副政委，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孙玉国（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丁盛（南京军区司令员）、杨广立（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宋佩璋（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张宜爱（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杨新亚（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李彬山（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冼恒汉（兰州军区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刘贤权（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青海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张江霖（青海省军区司令员，青海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马宁（空军司令员）、邹炎（空军副司令员）、郭玉峰（原陆军第六十四军政委，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施义之（原陆军第二十一军政委，时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陈绍昆（原沈阳军区副政委，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刘传新（原陆军第二十七军副政委，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以上23人中，取消军衔前的上将1人，中将1人，少将12人，大校4人。这些人的种种罪名，大部分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另有个别人如吴忠（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在1979年后，竟又接受了长达八年的审查，终以“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反党篡权阴谋活动”的结论解除审查。

### （四）我们绝不能再重蹈覆辙

以上三阶段合计，波及少将以上高级将领265人，占文革前少将以上1,614人的16%。其中元帅7人，占元帅总数的70%；大将5人，占大将总数50%；上将27人，占上将总数47%；中将74人，占中将总数42%；少将153人，占少将总数11%。总的趋势是军阶越高，波及的比例面就越大。而据官方统计，至1975年，全军受审查共4.4万多人，其中正军职以上干部361人。

在和平年代，军队高级将领由于政治原因而大规模倒下，绝非正常现象，令人痛惜。此情况在全球历史范围内，只有苏联的大清洗时代可与之相比。

1937年苏联大清洗前，苏军共有5位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布留赫尔、叶戈罗夫、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1937年10月，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旋即被枪决。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其他4名元帅，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活了下来，布留赫尔于1938年11月遭到秘密逮捕，后被处决。叶戈罗夫则于1939年2月开枪拒捕，当场殒命。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军的军官阶层。苏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除清掉了5名元帅中的3名之外，还清掉了4名一级集团级将领中的3名，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名，199名师长中的136名，397名旅长中的221名。

大清洗导致了苏军在对德军的卫国战争初期频频失利，损失惨重，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称，“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所幸的是，文革时期中国没有面临如苏联卫国战争般的全面战争！

惟人民解放军当时介入的，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国内政治斗争和党内斗争。人民解放军担负了世界上现代国家军队所不必担负、不胜负荷的沉重政治任务。而军队干政的结果，亦使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蒙受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这是军队作为政治斗争工具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著名美籍西班牙裔哲人乔治·桑塔亚纳有云：“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牢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惨痛历史吧！除非我们愿意再次承受这样的苦难，否则，我们绝不能再重蹈覆辙！



# 第一章

1965：风起苹末



## 第一节 文革前夕的军事体制及军事实力<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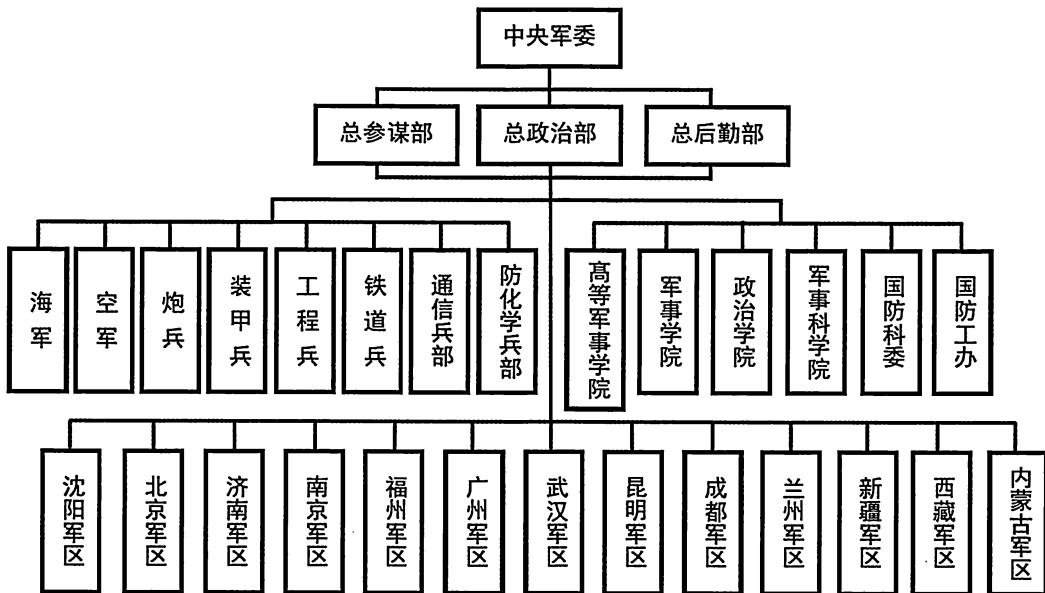
自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新军委成立，解放军实行的是中央军委领导下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1960年4月改称总后勤部）三总部体制。中央军委为最高军事统帅机关，通过三总部对全军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等实施领导指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名义上隶属国务院，实乃虚设，具体工作由解放军三总部和军委办公厅（兼国防部办公厅）分别处理。

在这一体制之下，1965年初<sup>【2】</sup>的高级军事领导率机关概况如下。

军事指挥系统（大军区以上单位）一览表

（1965年1月-1967年5月）



【1】 本节资料来源：总政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四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

【2】 以1965年1-2月为基线。个别单位在叙述时适当向前或向后稍作延伸。



## 一、中央军委

1965年的中央军委，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这一全称，在文革中逐渐演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庐山会议之后的1959年9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等21人组成中央军委，毛泽东任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任副主席，罗瑞卿任秘书长，苏振华、萧向荣任副秘书长。由毛泽东等13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sup>【3】</sup>

1959年10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中共中央批准在中央军委常委之下，由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萧向荣等组成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工作。同时增补萧华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60年5月，又增补张爱萍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秘书长主持。<sup>【4】</sup>

至1965年初，因军委常委中罗荣桓元帅1963年已病故，谭政大将已于1961年被撤销职务，<sup>【5】</sup>委员中陈赓大将1961年已病故，常委还有11人即除毛、林、贺、聂外，另加元帅5人：朱德、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大将1人即罗瑞卿，另外，特殊的非军籍1人——毛泽东属意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是军委常委。委员还有18人，除常委均为委员外，尚有大将4人：粟裕、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上将3人：萧华、刘亚楼、苏振华。从实际作用来说，委员并无军委办公会议成员重要。事实上，军委常委、委员均为资格和名份的象征，真正的实权为毛泽东——林彪——罗瑞卿所掌控。

军委办公厅为军委办事机构，同时对外兼国防部办公厅。<sup>【6】</sup>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副主任王兴纲少将、黎化南少将及潘振武少将。军委办公厅党委归总参党委领导，书记萧向荣（同时为总参党委委员），副书记王兴纲。

【3】 林彪元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贺龙元帅，时任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59-1963年兼任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1963年9月撤销）主任。聂荣臻元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罗瑞卿大将，时任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62年9月又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振华海军上将，时任中央军委委员，海军政委，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萧向荣中将，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4】 谭政大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杨成武上将，时任副总参谋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萧华上将，时任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邱会作中将，时任总后方勤务部部长。张爱萍上将，时任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2年11月又任国防工办副主任。

【5】 详见本章第二节。

【6】 1965年11月以后又兼总参办公厅。

## 二、总部机关

1958年12月，恢复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方勤务部（1960年4月改称总后勤部）三总部体制。

三总部名义上并列，惟从其首长在军委中的地位及军衔级别即可看出，总参的地位实际高于总政、总后，总政在谭政被撤职、罗荣桓病故后地位明显下降，总后的地位低于总参、总政。

### （一）总参谋部

所属工作机构：作战部、情报部、第三部、军训部、军务部、动员部、装备计划部（简称装备部）、军事交通部、政治部、机要局、测绘局、气象局、出版局和管理局。<sup>【7】</sup>所属军级以上单位：技术工程学院、外国语文学院、测绘学院和解放军体育学院。<sup>【8】</sup>所属师级学校：机要学校。

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上将、彭绍辉上将、张爱萍上将、杨成武上将、李天佑上将、王新亭上将。<sup>【9】</sup>总参党委书记罗瑞卿，副书记杨成武、张爱萍。

### （二）总政治部

所属工作机构：秘书部门（正副秘书长）、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保卫部（兼公安部武装保卫局）、文化部、青年部、群众工作部、联络部、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sup>【10】</sup>、军事检察院、国防科学工作部<sup>【11】</sup>和直属政治部。所属军级以上单位：解放军报社、政治学校<sup>【12】</sup>、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解放军艺术学院。<sup>【13】</sup>

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副主任刘志坚中将、徐立清中将、梁必业中将、傅钟上将、谭政大将<sup>【14】</sup>。总政党委第二书记萧华（原第一书记罗荣桓病故），委员<sup>【15】</sup>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傅钟、甘渭汉中将（总政干部部部长）、蔡顺礼中将（总政保卫部部长）。

---

【7】 原属军委办公厅领导的外事局（对外称国防部外事局）1965年12月划归总参建制。

【8】 解放军体育学院由广州军区代管。

【9】 按到任先后排列。

【10】 1965年5月改称军事法院。

【11】 1965年5月划归国防科委建制，成立国防科委政治部。

【12】 由广州军区代管。

【13】 电影制片局（对外称八一电影制片厂）从1965年11月起执行军级权限。

【14】 谭政于1965年11月调任福建省副省长。

【15】 书记、副书记均为常委及委员，从略，下同。

### (三) 总后勤部

所属工作机构：司令部、政治部、财务部、军需部、卫生部、军械部、运输部、油料部<sup>【16】</sup>、营房部、第一物资计划部<sup>【17】</sup>、第二物资计划部<sup>【18】</sup>、工厂管理部<sup>【19】</sup>、军马部和管理局。所属军级以上单位：白城办事处、大同办事处、西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青藏办事处、后勤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二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第七军医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兽医大学、后勤工程学院、后勤学校、后勤技术装备研究院、第三十一训练基地<sup>【20】</sup>、五三研究院。所属师级学校：通县军械学校、南京军械学校、大同汽车学校、镇江汽车学校、运输学校。

### 十三大军区分布图(1965-1966)



【16】 1965年4月并入运输部。

【17】 1965年10月改称物资部。

【18】 1965年9月改建为国防科委后勤部，归国防科委建制。

【19】 1965年3月由军需生产部和总后司令部工厂管理局合并组成。

【20】 1965年5月划归国防科委建制。

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中将，政委李聚奎上将，副部长张令彬中将、饶正锡中将、张贤约中将、周玉成中将、汤平中将、张池明中将、韩振纪中将、张天云中将，副政委李耀中将、李雪三中将、彭嘉庆中将。总后党委第一书记邱会作，第二书记李聚奎，副书记张令彬，常委饶正锡、张贤约、汤平、张池明、卢南樵少将（总后政治部主任）、汪易少将（总后参谋长）。

### 三、军区领率机关

1965年，全国共设立13个大军区，即：沈阳、北京、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兰州、新疆、西藏、内蒙古军区。各大军区是战略区域内合成军队的指挥机关，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辖区内陆、海、空军部队的作战指挥和所属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以及领导辖区内的民兵、兵役动员工作和战场建设。

沈阳、北京、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兰州等10个军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均由驻地级别最高的地方党委第一把手兼任。

#### （一）沈阳军区

所辖军级以上单位：旅大警备区及其所属外长山要塞区，陆军第十六、第二十三、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六、第五十、第六十四军，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军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

党委第一书记宋任穷（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赖传珠上将（第二政委），第三书记陈锡联上将（司令员），常委曾思玉中将（副司令员）、曾绍山中将（副司令员）、刘转连中将（副司令员）、唐子安少将（副司令员）、吴保山少将（副政委）、李震少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拥辉少将（参谋长）。<sup>[21]</sup>

#### （二）北京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二十一、第二十四、第六十三、第六十五、第六十六、第六十九军，北京卫戍区，河北省、山西省军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

党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杨勇上将（司令员），第三书记廖汉生中将（第二政委），副书记郑维山中将（副司令员），常委韩伟中将（副司令员）、滕海清中将（副司令员）、吴先恩中将（副司令员）、

【21】 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党的领导高于行政领导，故单位领导仅列出其核心成员即至党委常委一级，不以行政职务排列，下同。

张南生中将（副政委）、王紫峰中将（副政委）、萧文玖少将（参谋长）、黄振棠少将（政治部主任，1965年1月任副政委）。

### （三）济南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二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山东省军区，内长山要塞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军区步兵学校。

党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政委，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杨得志上将（司令员），第三书记袁升平中将（第二政委），常委王建安上将（副司令员）、陈庆先中将（副司令员）、范朝利中将（副司令员）、杨国夫中将（副司令员）、张仁初中将（副司令员）、刘昌毅海军中将（副司令员兼北海舰队司令员）、李耀文少将（政治部主任）、陈美藻少将（政治部副主任）、傅家选少将（参谋长）。

### （四）南京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十二、第二十、第二十七、第六十军，舟嵎要塞区，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军区，上海警备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军区步兵学校。

党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许世友上将（司令员），第三书记萧望东中将（第二政委），副书记杜平中将（第七政委兼政治部主任）<sup>[22]</sup>、张才干中将（副司令员），常委郭化若中将（副司令员）、王必成中将（副司令员）、林维先中将（副司令员）、陶勇海军中将（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鲍先志中将（副政委）、王蕴瑞少将（参谋长）。

### （五）福州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二十八、第三十一军，闽北指挥部，福建省、江西省军区，军区炮兵、工程兵，军区步兵学校。

党委第一书记叶飞（政委，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韩先楚上将（司令员），第三书记刘培善中将（第二政委），副书记皮定均中将（副司令员），常委卢胜中将（副政委）、廖海光少将（副政委）、朱绍清少将（副司令员）、邓克明少将（副司令员）、周世忠少将（参谋长）、严政少将（政治部主任）。

【22】 南京军区最多时共有七位政委，为全军设置政委最多的大军区。第三政委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兼，第五政委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兼，第六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兼，以上均非军区党委成员。原第四政委萧望东1963年12月接替唐亮上将升任第二政委。

### (六) 广州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七、第五十五军，湖南省、广东省军区，广西军区、海南军区，万山要塞区、榆林要塞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军区步兵学校。

党委第一书记陶铸（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黄永胜上将（司令员），第三书记刘兴元中将（第二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副书记文年生中将（副司令员），常委詹才芳中将（副司令员）、梁兴初中将（副司令员）、温玉成中将（副司令员）、晏福生中将（副政委）、萧元礼少将（政治部副主任）、王阑西少将（政治部副主任）、邱国光少将（后勤部部长）、杨梅生中将（副司令员）、陶汉章少将（参谋长）。

### (七) 武汉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一军，湖北省、河南省军区，军区炮兵。

党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兼），第二书记陈再道上将（司令员），第三书记钟汉华中将（第二政委），副书记张广才少将（副政委），常委李迎希少将（副司令员）、孔庆德中将（副司令员）、姚喆中将（副司令员）、毕占云中将（副司令员）、杨秀山中将（副司令员）、叶明少将（副政委）、闵学胜少将（参谋长）、何敬之少将（后勤部政委）、颜金生少将（政治部主任）、韩东山少将（副司令员）。

### (八) 昆明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十三、第十四军，云南省、贵州省军区。

党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政委，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秦基伟中将（司令员），第三书记李成芳中将（第二政委），副书记陈康中将（副司令员），常委鲁瑞林少将（副司令员）、陈鹤桥少将（副政委）、崔建功少将（参谋长）、胡荣贵少将（副政委）、何德庆少将（后勤部部长）。

### (九) 成都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五十四军。

党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书记郭林祥少将（第二政委）、黄新廷中将（司令员），副书记韦杰中将（副司令员），常委李文清少将（副司令员）、何正文少将（副司令员）、余洪远少将（副政委）、余述生少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茹夫一少将（参谋长）、孔骏彪少将（政治部副主任）、金世柏少将（后勤部政委）。



### (十) 兰州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军区，宁夏军区。

党委第一书记刘澜涛（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洗恒汉中将（第二政委），第三书记张达志中将（司令员），常委杨嘉瑞少将（副司令员）、徐国珍少将（副司令员）、康健民少将（副司令员）、李书茂少将（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庆生少将（副政委）、黄曹龙少将（后勤部部长）。

### (十一) 新疆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南疆军区、伊犁军区。

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中将（司令员兼政委），第二书记赛福鼎·艾则孜中将（副司令员），书记郭鹏中将（副司令员）、张希钦少将（副司令员）、左齐少将（副政委），常委曹达诺夫·扎伊尔少将（政治部第二副主任）、熊晃少将（政治部主任）。

### (十二) 西藏军区

所辖无军级以上单位。

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中将（司令员），第二书记谭冠三中将（政委），副书记曾雍雅少将（副司令员）、陈明义少将（副司令员）、詹化雨少将（副政委）、任荣少将（副政委），常委王其梅少将（副政委）、王亢少将（副司令员）、邓少东少将（副司令员）、吕文山少将（副政委）、阴法唐大校（政治部主任）、张经武（第一政委，中共西藏工委第一书记兼）<sup>[23]</sup>、赵文进少将（副司令员）、廖步云少将（副政委）、王诚汉少将（副司令员）。

### (十三) 内蒙古军区

所辖无军级以上单位。

党委书记乌兰夫上将（司令员兼政委）<sup>[24]</sup>，副书记吴涛少将（副政委）、刘华香少将（副司令员）、萧应棠少将（副司令员）、廷懋少将（副政委），常委刘彬少将（副司令员）、孔飞少将（副司令员）、刘昌少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厚少将（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德贵少将（政治部副主任）、郗瑞卿大校（后勤部部长）。

## 四、军兵种领率机关

1965年初，解放军有海军、空军2个军种领率机关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部、防化学兵部6个兵种领率机关。

【23】 张经武常委的安排出人意料。以张第一政委的身份应是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才对。1965年8月，张调北京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24】 1965年3月军区第四次党代会选出并经中共中央批准，下同。

当时未设陆军军种领率机关，陆军司令部职责由总参谋部兼任。

### （一）海军

所辖军级以上单位：东海舰队及其所属舟山基地、福建基地、东海舰队航空兵部，南海舰队及其所属榆林基地、南海舰队航空兵部，北海舰队及其所属旅顺基地、北海舰队航空兵部，海军航空兵部，海军训练基地<sup>[25]</sup>，海军学院、海军工程学院、海军政治学校、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国家海洋局<sup>[26]</sup>。所辖师级学校：海军指挥学校、海军潜艇学校、海军通信学校、海军军械学校、海军第一航空学校、海军第二航空学校、海军第四航空学校、海军预备学校、海军潜水艇士兵学校、测绘学院综合系<sup>[27]</sup>、海军卫生学校<sup>[28]</sup>。

党委第一书记萧劲光海军大将（司令员），第二书记苏振华海军上将（政委），副书记王宏坤海军上将（副司令员）、李作鹏海军中将（副司令员）、杜义德海军中将（副政委）、刘道生海军中将（副司令员），常委赵启民海军中将（副司令员）、周希汉海军中将（副司令员）、张秀川海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张学思海军少将（参谋长）。

### （二）空军

所辖军级以上单位：沈阳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军第一、第二、第三军，北京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军第六军，兰州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军第九军，南京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军第四、第五军，广州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军第七军、空军兴宁指挥所，武汉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降兵第十五军，福州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军第八军，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空军学院、空军工程学院、空军技术学院、空军政治学校、空军第一、第二高级专科学校，中国民用航空总局<sup>[29]</sup>。所辖师级学校：空军第三高级专科学校、空军高射炮兵学校、空军雷达学校、空军后勤学校、空军通信学校、空军卫生学校、空军第一预备学校、空军第二预备学校、第一至第十三航空学校、第十六航空学校、第十七航空学校。

党委书记刘亚楼空军上将（司令员），副书记吴法宪空军中将（政委）、王秉璋空军中将（副司令员）、成钧空军中将（副司令员），常委刘震空军上将（副司令员）、曹里怀空军中将（副司令员）、谭家述空军中将（副司令员）、常乾坤空军中

【25】 1965年7月划归国防科委建制领导，改称第二十三训练基地。

【26】 国务院直属机构，由海军代管。

【27】 1965年3月22日军委批示归海军建制领导。

【28】 归海军后勤部领导，学员不列入海军院校定额。

【29】 国务院直属局，业务、党政、干部人事工作等由空军负责管理。

将（副司令员）、徐深吉空军中将（副司令员）、张廷发空军少将（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辉球空军中将（副政委）。

### （三）炮兵

所辖军级以上单位：炮兵学院，炮兵技术学院，炮兵工程学院<sup>【30】</sup>、炮兵第五十一基地，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所辖师级学校：高射炮兵学校、重庆炮兵学校、

南京炮兵学校、郑州炮兵学校、武威炮兵学校。

党委第一书记陈仁麒中将（政委），第二书记吴克华中将（司令员），常委匡裕民中将（副司令员）、吴信泉中将（副司令员）、苏进少将（副司令员）、陈锐霆少将（副司令员）、欧阳毅中将（副政委）、刘何少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宋承志少将（参谋长）。

### （四）装甲兵

所辖军级以上单位：装甲兵学院，装甲兵工程学院，第一、第二坦克学校，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所辖师级学校：第四坦克学校、第五坦克学校。

党委第一书记许光大中将（司令员），第二书记向仲华中将（政委），常委程世才中将（副司令员）、贺晋年少将（副司令员）、张文舟少将（副司令员）、钟人仿少将（副司令员）、邓家泰少将（参谋长）、宋庆生少将（后勤部部长）、邱相田少将（政治部主任）。

### （五）工程兵

所辖军级以上单位：工程兵学院，工程兵工程学院，工程兵科学研究设计院。所辖师级学校：第一工程兵学校、第二工程兵学校、第三工程兵学校。

党委第一书记陈士榘上将（司令员），第二书记黄志勇中将（政委），常委谭善和少将（参谋长）、李良汉少将（政治部主任）、徐德操少将（副司令员）、谢明少将（副政委）、谭友林少将（副司令员）。

### （六）铁道兵

所辖军级单位：铁道兵学院，铁道兵科学研究院。所辖师级学校：铁道兵学校。

党委第一书记吕正操（第一政委，铁道部党委书记兼），第二书记崔田民中将（第二政委），副书记李寿轩中将（司令员）、王集成少将（副政委）、刘金轩中将（副司令员）、罗华生少将（副司令员），常委王贵德少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30】 1965年7月移交国防科委建制领导。

郭维城少将（第二副司令员）、何辉燕少将（参谋长）、邱子明少将（政治部副主任）、张崇文少将（政治部副主任）、别祖后少将（后勤部部长）。

#### （七）通信兵部

所辖军级单位：通信兵学院，通信兵工程学院。所辖师级学校：上饶通信兵学校、宣化通信兵学校、通信兵雷达技术学校、汉口通信兵技术学校、重庆通信兵技术学校。

党委第一书记黄文明少将（政委），第二书记江文少将（主任），副书记范阳春少将（副政委），常委黎东汉少将（副主任）、龙振彪少将（副主任）、周涌少将（副主任）、陈挽澜少将（副主任）。

#### （八）防化学兵部

所辖军级单位：防化学兵学院，防化学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所辖师级学校：防化学兵学校。

党委书记曹广化少将（政委），副书记张迺更少将（主任），常委裴宗澄少将（副主任）、毕庆堂少将（副主任）、王绍南少将（副主任）、蓝文兆少将（参谋长）、桂生芳少将（政治部主任）、阎廷泰大校（后勤部部长）。

### 五、军委直属院校和国防科研机构

1965年初，直属中央军委的大军区级院校有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大军区级军事科学和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领导机构有军事科学院、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工业办公室。

#### （一）高等军事学院

所属军级以上单位：速成系第一期第一班，基本系第二期第三班、湖南班（训练越南留学生）、军事理论研究班、战略、战役、炮兵、工程兵、空军防空、海军、社会科学教研室、通信联络教授会。

党委书记李志民上将（政委），副书记陈伯钧上将（院长），常委刘忠中将（副院长）、王宗槐中将（副政委）、解方少将（副院长）、林浩少将（副政委）。

#### （二）军事学院

所属军级以上单位：六个系，十个教研室。

党委第一书记王平上将（政委），第二书记张震中将（院长），常委张藩中将（副院长）、萧新春少将（政治部主任）、胡秉权少将（副教育长）、董超少将（政治部副主任）、王子修少将（院务部部长）、吴华夺少将（教育长）、张献奎少将（训练部部长）。

### (三) 政治学院

所属军级以上单位：三个学员大队和五个教授会（教研室）。

党委书记莫文骅中将（院长），副书记孔石泉中将（副院长）、邓逸凡中将（副院长），常委李丙令少将（政治部主任）、余潜少将（政治部副主任）、杨世荣少将（政治部副主任）、魏泽南大校（学术研究部部长）。

### (四) 军事科学院

所属军级以上单位：战争理论研究、战术研究、战史研究、外国军事研究部和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

党委第一书记叶剑英元帅（院长兼政委），第二书记粟裕大将（副院长），第三书记王树声大将（副院长），第一副书记宋时轮上将（副院长），第二副书记钟期光上将（副政委），常委阎揆要中将（副院长）。

### (五) 国防科委

1965年，国防科委的全称是“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为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机关，受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列入军队序列。

1965年5月后所辖军级以上单位：军事工程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三、第三十一训练基地，第二十二器材基地。

党委书记聂荣臻元帅（主任），副书记张爱萍上将（副主任）、钟赤兵中将（副主任）、罗舜初海军中将（副主任）、唐延杰中将（副主任），常委安东少将（副主任）、路扬少将（副主任）、张震寰少将（副主任）、朱卿云大校（政治部主任）、范子瑜少将（后勤部部长，因病未到职）。

1965年10月19日，军委在给中央的《关于军事工程学院等三所院校改变管理体制的报告》中提出：目前，国防科委领导的11所国防高等院校，只有军事工程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和炮兵工程学院属军队序列，其管理体制和待遇，与其它8所院校<sup>[31]</sup>不同。鉴于这3所院校同其它8所院校，都是担负培养国防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技术干部的任务，毕业生也基本都是分配到国防工业部门工作，领导关系均属国防科委，但管理体制和待遇不同，既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工作，学生入学时穿军装，毕业时脱军装，也容易引起思想问题。因此，中央已批准将这3所院校集体转业，不再列入军队序列。今后，军事工程学院改称哈尔滨工程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改称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改称

**[31]** 指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南京航空学院和太原机械学院。

华东工程学院。《报告》中提出，改变管理体制工作从1966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10月21日，中央批转了军委的报告。<sup>【32】</sup>

1966年1月8日，军委办公厅发出《关于军事工程学院等三所院校管理体制改为地方性质推迟到4月1日执行》的通知。通知称：关于军事工程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改变管理体制问题，1965年12月29日第261次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并已报告总理同意科委意见。军事工程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的管理体制改为地方学校性质问题，可推迟至1966年4月1日起执行。

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炮兵工程学院简称“南炮工”。文革前期，“哈军工”、“西军电”、“南炮工”闻名于世（尤其前两者），盖因三院校中人多欲隐瞒已脱离军队序列的事实，在外串联造反、参与地方夺权时均沿用旧称。

#### （六）国防工业办公室

1961年12月，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其编制属于军队序列。国防工办负责协调和组织国防工业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和日常工作，直接对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负责。1963年9月，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撤销，其任务合并到国防工办。1964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国防工业党委，对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和国防工办的工作实施统一领导。

国防工业党委第一书记罗瑞卿大将（国防工办主任），第二书记赵尔陆上将（国防工办副主任），常委郑汉涛少将（国防工办副主任）、李如洪少将（国防工办副主任）、袁成隆（国防工政副主任）、高德西（国防工政副主任）、罗舜初中将（国防工办副主任）、黄远（国防工政副主任）。

#### （七）军事实力

据中共军方2011年公开资料，至1965年初，陆军兵力为：“陆军达338.5万人。陆军31个军部95个机动师等共162.2万人；炮兵18个地面炮兵师、7个高射炮兵师、14个独立团（含5个近程地地导弹团）共16.7万人；装甲兵3个坦克师又10个坦克团共6万余人；通信兵17个团共4.5万人；防化兵6个防化团又5个防化营共1.4万人；汽车部队30个团共5.8万人；工程兵4个建筑师99个独立团共43.9万人；铁道兵13个师又3个独立团共37万人。”<sup>【33】</sup>

【32】 中发[65]620号中共中央文件，1965年10月21日；孙有贵：《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发展简史》，北京：蓝天出版社，1996年，页502-503。

【3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页303。惟陆军兵力中未列出陆军守备部队、省军区部队具体人数。



1965年初，海、空军兵力为：“海军部队共18.2万人，编组9个舰艇支队共65个舰艇大队，7个航空兵师共16个航空兵团，6个炮兵团，23个勤务保障团。舰艇共895艘，其中战斗舰船416艘。”“空军共43.3万人，编组10个军部50个师，共214个团及相当于团的大队。其中36个航空兵师，3个空降兵师，1个地对空导弹师，10个高射炮兵师。装备各型飞机4300余架，其中战斗机2500余架。”<sup>[34]</sup>

“全军经过连续的调整整编，至1965年初，人数增至447万人（含公安部队30.3万人，铁道兵、工程兵80.9万人），其中作战部队占总人数的79.4%，机关占总人数的15%（含5个后勤办事处，311所医院，544个仓库的人数）。官兵比例为1：3.2。”<sup>[35]</sup>

## 第二节 毛林治军与毛林关系

### 一、林彪的“政治挂帅”治军理念

1959年7至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打倒，林彪接替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此后，林彪秉承毛泽东的政治建军原则，并迎合当时毛对军队的要求，提出了按“政治挂帅”模式建设军队的理念，采取了一系列“突出政治”的举措。

1960年1月，林彪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时提出：“我们要树立一个作风，就要提出要求，就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三句话、八个字。三句话是：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毛主席以最简单朴素的语言，概括了很多很重要的道理。有了这三句话、八个字的作风，就会使我们的军队生龙活虎，朝气蓬勃。”<sup>[36]</sup>上述三句话，八个字，随后被概括称之为“三八作风”。

1960年一二月间，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2月12日，毛泽东在广州听取了林彪等汇报会议情况。其后，林彪在会议上讲话时称：“军队建设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进行物质上的建设，一方面要进行精神上的建设。精神的东西可以转化为物质的东西，精神的东西和群众结合起来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搞军事训练、政治训练、文化训练，都不是物质的东西，但是它能够使物质发挥作用。作

<sup>[34]</sup>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页304。

<sup>[35]</sup>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页306。惟疑尚有军事院校师生人数未计算在内。

<sup>[36]</sup>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64年，页221-222。

风也不是物质的东西，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假如人人都养成了好作风，不仅平时，特别是到了战时，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林又称：“关于作风问题，在上海曾向毛主席请示过，在广州又谈了一次。毛主席很同意在部队中提倡他在一九三九年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这三句话、八个字，是我们部队的好作风。”<sup>【37】</sup>

1960年9月12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讲话时提出“四个第一”：

在政治工作领域中，要正确处理四个关系。

一是武器和人的关系。打仗时武器也要，人也要。但是武器要人去使用，人不勇敢，武器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战争的胜利还是靠人。……

二是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军队工作有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有军事训练，文化教育，等等。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起来了，各种工作就都能做好。……

三是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中有些是事务性、行政性的工作，有些是思想性的工作。各种工作都要做，不能只做一个，但是重点要摆在思想上。……

四是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书本要读，但是重要的是掌握活的思想；书本教育要同实际相结合。部队有什么问题，党中央有什么政策，国际形势如何，这是现成书本上没有的，都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来回答。……

……

这就是说，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更应该紧紧掌握这个方向。<sup>【38】</sup>

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中称，“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sup>【39】</sup>1965年2月22日，毛泽东更称赞道，“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

【37】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页223-224。

【38】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页205-208。

【3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455。

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sup>【40】</sup>

林彪治军的这一套，对军队进行了政治训练，使军队在后来参与文革、干预政治有了理论依据和精神准备。

## 二、确立林彪治军理念地位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1960年9月14日至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林彪的提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议题。10月7日，毛泽东听取了林彪、贺龙、罗瑞卿汇报会议的情况。<sup>【41】</sup>会议最后一天，10月20日，对有关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林彪作了如下阐述：“我们强调政治挂帅，但是，不要以为政治挂帅就不要军事，那是不行的。事情总是由几个方面合成的，缺了一样就不行。军事和政治比较，哪个重要？当然是政治重要。政治是基础，什么工作都要政治挂帅，政治起主帅作用，军事要为政治服务。”<sup>【42】</sup>

军委扩大会议形成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草案。12月14日，毛泽东在审阅了经修改后的决议草案后批示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称：“此件经过修改，修改处并已征得军委及总政方面几个同志（罗、萧、刘志坚）的同意，现送上，请审阅。希望在十天左右时间内阅完，交尚昆印发党、政、军、民各系统，先发军事系统。文件虽长，但不难读。修改是陈伯达、田家英诸同志的一个小组进行的。”<sup>【43】</sup>

经陈伯达、田家英修改并经毛泽东审阅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称：“会议认为，毛泽东思想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我军建设的指针，也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在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在批判和纠正了以彭德怀、黄克诚同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以后，我军的政治工作又有了新的的发展。在这次会议上，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历来的指示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正确处理政治工作领域中的四个关系问题。到会同志一致认为，林彪同志提

---

【40】 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的指示，1965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页482。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页459。

【42】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页213—214。

【4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383。罗，指罗瑞卿；萧，指萧华。尚昆，即杨尚昆，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陈伯达，时任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出的这四个关系问题，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范例。”“这就是说，人的因素第一，政治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更应当紧紧掌握这个方向。”<sup>【44】</sup>

12月2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共中央转发时的批语全文称：

中央看到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日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认为会议开得很好，决议也写得很好。这个决议，继承和发扬了一九二九年古田会议的传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全面地总结了解放十一年来军队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丰富经验，明确地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提出了措施，打中了要害。决议阐述了政治工作领域中的四个关系问题，强调指出在政治工作中要着重抓思想工作，而在思想工作中又要着重抓活的思想，指出在军队中贯彻“三八作风”，改进工作方法，把根子扎在基层的重要性。决议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中央认为，决议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正确的和适时的。中央批准这个决议，希望能定期检查，贯彻执行。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可以发给地委以上的机关阅读。军队中有文化条件的干部必须研究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研究方法，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而去作研究，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方法也应当是这样。过去军队中理论研究工作的方法是读死书的方法，那是不正确的，十月军委扩大会议已指出了这一点，中央认为是正确的。<sup>【45】</sup>

### 三、对谭政等人的批评和处理

《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还称，“正如林彪同志和到会的同志们所指出的，政治工作还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一个时期在工作方向上发生了偏差。”会议认为，谭政对“总政治部工作方向上发生的偏

【44】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页150-153。

【45】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页149-150。

差”“应负主要的政治责任”，并因此作出《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

早于9月12日，林彪即在军委常委会议上批评谭政称：

中央同志的看法，我们的看法，谭主任哪！缺乏干劲，缺乏朝气，缺乏热情，思想上概括能力差，创造性、主动性差，就是说靠他不能吃饭的，带不起头的。总政应该搞个党委领导，党委书记不能让他当，但是还继续要他工作。他这人的毛病这次检讨要进步，罗总长说他三个方面，八个字。“三八”，又碰到个三八了啊，我看是有道理的。我对他了解，我觉得他这个人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革命的朝气、锐气、革命的热情……这个人没有动力，缺乏精神上的动力。本来决议上写上他的名字，后来考虑写上名字不好，不要写名字。后来中央也同意不写名字的意见。另外再写个决议。现在起草了个决议的稿子，下午在这个会上要念，但是我同谭政同志讲过的，万物可以变，人也可以变，坏人还可以变好人，好人也可以变坏人，说不能变是没有道理的。第一条是可以变的。他的工作，这八年和彭、黄比较起来，还是好的，所以我在上海说他好，那时我对他不太很清楚。后来他表现不太好，因此就说坏。但是估计是可以变的，将来还准备说他好。所以，我就说他好，不好，再好。<sup>[46]</sup>

军委扩大会议之后，总政治部从10月25日到翌年1月25日进行了整风。1961年1月30日，总政党委向毛泽东、中央、军委作出《总政党委扩大会议整风工作的报告》称：

总政治部的整风，根据军委扩大会议的决议，在中央、主席、军委、林彪同志和各位元帅的关怀和指导下，从去年十月二十五日开始，到今年一月二十五日结束，历时三个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次整风，除了揭发批判甘泗淇同志和傅钟同志的错误外，<sup>[47]</sup>着重揭发批判了谭政同志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通过对谭政等同志错误的批判，端正了总政治部的工作方向，进一步肃清了彭黄影响；使广大干部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就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方向，就是我军建设的方向；这次整风对犯错误的同志和参加整风的全体干部，都是一次十分生动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这是此次整风的最重要的收获。

【46】 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10月20日。国防大学训练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教学研究资料》，1987年，页281-282。

【47】 甘泗淇上将，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4年2月5日病故。傅钟上将，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这次总政整风的胜利，也是全军全党的胜利。

谭政同志的错误性质是反党，反毛主席的。他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他自己不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也不准别人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他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荒谬地认为毛泽东思想不是系统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排除对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学习。谭政同志几年来在总政工作中，对上封锁中央，对下不传达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他与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社总编辑欧阳文一起，<sup>【48】</sup>进行反党宗派活动。他包庇恶霸地主家庭，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谭政同志的作风也极其恶劣，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谭政同志在大量事实面前和大家严肃批判和诚恳帮助下，已经承认自己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并作了检讨，但还不彻底。

甘泗淇同志的错误也是反党性质的。他在历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上都是站在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路线方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坚决执行了王明路线。抗日战争时期，又积极执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在彭德怀同志的指意下，反对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贺龙同志。在抗美援朝时期，他对彭德怀、高岗向他所散布的许多反党言论，不向中央报告，并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到总政工作后，积极充当彭德怀的打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借口检查总政文化部的的工作，打击总政领导，直接攻击毛主席。甘泗淇同志公开反对经中央和毛主席批准的侦察工作方针，并说中国要出贝利亚。甘泗淇同志品质恶劣，有个人野心，善于投机取巧。他对彭的反党活动，从来不作揭发。甘泗淇同志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和总政整风中，对大家的批评，一直是顽强拒绝，现在虽然作了检讨，有了进步，但还很不深刻。

傅钟同志的主要错误是在四方面军的工作中，和张国焘一起猖狂反党、反中央，诋毁和辱骂毛主席，成为张国焘反党反毛主席的得力助手，但他对自己历史上的严重错误，一直不作自我揭发，长期拒不检讨，发展到近几年来斗志衰退，傅钟同志对自己错误现已作了检讨，基本上还好。

1月25日，萧华在总政党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性发言时称，“谭政同志和他的几个亲信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父子关系。他们对谭政同志唯命是从，谭政同志对

---

【48】 欧阳文，1955年授衔中将。刘其人，1955年授衔少将。姜思毅、白文华，1965年大校军衔。



他们则是言听计从。”“彭<sup>[49]</sup>骂人训人，谭也训人顶撞人，谭骄横跋扈，唯我独尊，对中央领导同志和元帅们极不尊重。”

2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总政党委扩大会议整风工作的报告和萧华在这个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此前，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罗荣桓重任总政主任，增加徐立清、梁必业为副主任。总政党委组成人员为：第一书记罗荣桓，第二书记萧华，委员罗、萧、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傅钟、甘泗淇、甘渭汉、蔡顺礼。谭政由总政主任降为副主任，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委员、常委和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职务<sup>[50]</sup>。傅钟、甘泗淇虽保留总政副主任、总政党委成员职务，但排名改在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之后。总政党委决定，给刘其人、姜思毅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由部长降为副部长。给白文华以留党察看两年处分，白文华、欧阳文调离总政。1963年12月，罗荣桓病故。翌年9月，萧华继任总政主任。萧华对林彪是绝对服从的。

#### 四、1960年代前期的毛林关系

1960年代前期，毛泽东与军队、与林彪的关系是甚为密切、甚为融洽的。

这种密切、融洽关系，首先表现在军队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思想的高度评价、大力宣扬上。《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的首项，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决议首次提出：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因此，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

**[49]** 彭，指彭德怀。

**[50]** 谭政1962年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1965年11月调离军队任福建省副省长。1967年起被关押八年，1975年解除监禁并出任中央军委顾问。

这是由军队首倡的新提法，也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新“高度”。1963年3月27日由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在条例总则中重复了上述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新定义。

1961年8月29日，林彪给毛泽东写报告称，“军队广大士兵热爱和迫切要求读毛主席著作，但由于书籍缺乏，且不善于选择必需读的文章。为着解决这一问题，总政从《毛选》中抽选了一部分文章拟印发到连队，以适应现实需要。但所选文章和章节，不知是否恰当，盼主席交有关人员予以审查。如有意见，即请指示，如无指示，即由总政出版了。”毛泽东当时即将报告批告其秘书田家英称：“请你看一下。如大体可用，即退回林彪同志办理。”同年，总政宣传部即编印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印发到班，每班两本，供士兵学习。<sup>[51]</sup>1964年，解放军报社首先编印的《毛主席语录》在全军推广。

1965年8月1日，总政治部再版了1964年5月初版的《毛主席语录》。以总政名义撰写的“前言”，起首一段基本重复了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新提法（个别字句作了细微调整）。

其次，毛、林的密切、融洽关系，表现在毛泽东对林彪的支持、倚重以及林彪对毛泽东坚决拥护的态度上。

林彪在中共建政后即称病，公开场合甚少露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除必要场合仍旧如此，但他下部队进行调查研究是常有的事。1961年5月7日，毛泽东批告他的机要秘书徐业夫称，“请用电话告林彪同志：他在四、五两月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五月去杨村七天，下连调查，极为有用，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有益的。十天后，我返京找他长谈一次（两小时）。请他好好保养身体，是为至要，是为至要。”<sup>[52]</sup>连续两句“是为至要”，凸显了毛对林的关切之情。

1961年1月，林彪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学习毛著的“三十字方针”。

当时党内军内高层中不少人对此提出异议，提出要“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系统、完整地学习领会毛主席著作”（罗荣桓元帅语），指责“三十字方针”为“实用主义”“庸俗化”。毛泽东支持了林彪。早在1960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修改批文时所加的一段话——“军队中有文化条件的干部必须研究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研

【5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544。

【5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487。



林彪视察海军旅顺基地，图右男孩为林立果，右下角女孩为林立衡，1961年8月。

究方法，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而去作研究，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方法也应当是这样。过去军队中理论研究工作的方法是读死书的方法，那是不正确的，十月军委扩大会议已指出了这一点，中央认为是正确的。”<sup>[53]</sup>就是支持林彪、批评谭政等人的。事实上，1960年代，军队尤其是军队干部，文化水平相对还是比较低的，林彪提出的“三十字方针”，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

林彪投桃报李，在1962年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候，坚定地支持了毛。1月29日，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称，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林称，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依靠和相信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他的讲话中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段话：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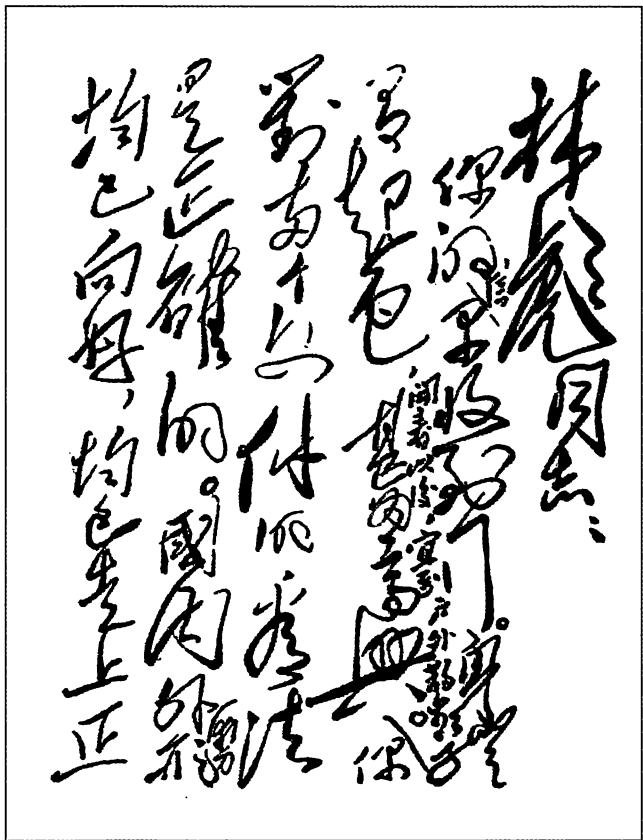
【5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385。

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sup>[54]</sup>

毛泽东听了林彪讲话后非常高兴。2月24日，他批示给邓小平道：“林彪、恩来、朱德三同志的讲话，请紧催，速送来，看一下，以便早日印成一本，早日下达。”3月20日，毛在看了林彪的讲话稿后又批示给田家英、罗瑞卿称：“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sup>[55]</sup>

七千人大会之后，1962年3月，贺龙代病中的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sup>[56]</sup>这并不妨碍毛泽东对林彪的持续倚重。

1963年12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称，“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你对两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毛对林的身体状况甚为关心，在信的末尾，毛称，“曹操有一首题名《神龟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sup>[57]</sup>毛又亲笔手书这首诗送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首页，1963年12月14日。

【5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63-64。

【5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53、62。

【56】关于贺龙代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未见有中央或军委的正式文件通知。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起始及终止时间，也有多种不同说法。惟此后军委的重大问题，仍须向林彪报告，依林彪的意见行事。

【5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49-450。

给林彪，惟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怀疑林彪有贰心，便借故将手书条幅收回了。

1964年，处在中央二线的毛泽东与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方针政策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此一分歧在翌年1月在党内高层公开化。1965年元旦后继续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1月3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1月5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1月13日下午，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共17人，刘少奇在生活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sup>[58]</sup>

中央工作会议最后形成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纠正了前期刘少奇指导社教运动时出现的一些“左”的倾向。遵从毛泽东的意见，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据《毛泽东传》称：

亲身经历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并当场目睹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严重分歧的薄一波<sup>[59]</sup>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sup>[60]</sup>

正当毛泽东对原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产生了极大的不满与不信任情绪之际，林彪的政治地位再悄然上升！1965年1月，适逢遵义会议三十周年，邮电部发行了

【5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页1375—1379。

【59】 薄一波，时任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60】 《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383。又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1169—1170。

林彪的形象首次出现在新中国的邮票上，1965年1月31日。



一套共3枚的纪念邮票。图案分别是毛泽东像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决战前夕》两幅油画。其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总政下属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彭彬，根据毛泽东的词《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画面中虚构了毛泽东与林彪长征途中在遵义娄山关上的形象。同时间出版的《人民画报》1965年第一期，亦以两版的显著篇幅，刊登了这幅油画。

这一幅油画，将毛、林在一起“并肩战斗”的艺术形象首次公开呈现在全国公众面前。它在毛对刘少奇不满的时候出现，准确地预示了一年多以后“刘下林上”的政治变局。

1965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再次任命林彪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与6年前的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不同，林彪取代陈云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一。陈云退居为次，邓小平则名列第三。

其实，林彪的擢升并非偶然，建国后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倚重他。尽管林彪以怕光、怕风、怕水为由长期养病，但他在党内地位仍不断上升。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他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5月，更是第一次超越彭德怀，在八大二次会议和八届五中全会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一年后彭德怀被打倒，林彪又取代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毛泽东重用林彪的原因，除了在长期的战争年代形成的信任、器重和关爱之外，更重要的是，他非常需要林彪协助他执掌军权。

了解毛泽东思想的人都知道，毛有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曾评价蒋介石称：“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的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的确是这样，毛泽东一生也是视军队为命根子，最重掌控军权的。他始终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枪杆子上，称：“我们的原则是党指



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

建国后，毛泽东一直亲自执掌军权，紧紧抓住不放。他可以不当国家主席，但一定要当中央军委主席。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几个关键时刻，他也特别强调军队的作用。例如1970年5月他称：“什么叫政权？什么叫力量？什么叫权力？没有别的，只有军队。”1975年5月，毛泽东谈及读史心得时称：“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

中共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键时刻，林彪在政治上都是支持毛泽东的，使毛看到林对他的忠诚和作用。而毛即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时候”，是他所说的“关键时刻的政治”，因此，毛必须通过林控制军队，“靠军事实力来说话”。

### 第三节 “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 一、毛泽东号令全国学解放军

自1963年后，毛泽东大力提倡学习解放军，力图将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应用到地方，以促进地方的“革命化”建设。

1963年12月间，毛泽东在一个月数次提及要学习解放军。

12月11日，毛泽东将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给他的关于企业思想工作问题的报告批给薄一波称，“此件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sup>[61]</sup>

三天之后，12月14日，毛泽东又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编印的《群众反映》登载的《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强》一文去信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称：“这个文件请你们看一看。它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否在生产队里设一个政治委员，或者叫政治指导员，或者叫宣传员，让一个不脱离生产的小知识分子（高小毕业生有的是，初中生也可找到），把思想政治工作，在几亿农村人口中抓起来。在城市工业、商业、居民方面也仿军队办法从上到下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指导员。此事请书记处议一下。然后常委再议。”<sup>[62]</sup>

【6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32。

【6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52。

又过两天，毛泽东就薄一波12月15日给他的信<sup>[63]</sup>致函林彪等称：“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sup>[64]</sup>

毛泽东这一封信在文革中广为流传。尤其是信中最后几句话，更被认定为是毛泽东对林彪的赞扬和肯定。其实，当时学习解放军最积极的是薄一波。

12月19日，薄一波又就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情况写报告给毛泽东称，“根据你12月11日的批示，对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检查。”最后报告称：“为落实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的指示，我们准备采取以下措施：（一）工业、交通各部，都要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用毛泽东思想、革命精神把全体职工重新武装起来。所有工业部门都要仿照解放军的办法，从部到企业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统。（二）拟出一个工业、交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三）从中央各个工业、交通部门所属的企业中，选拔优秀领导干部分别到政治学院或军队中去学习政治工作经验。（四）目前，先从军队抽调三百名到五百名熟悉政治工作的干部，到中央工业、交通各部和重要的企业担任政治工作。（五）中央工业交通各部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统以后，似有必要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管理工业、交通部门政治工作的机构。”毛泽东对此批示道：“报告已看过。请你考虑，可否印发到会同志研究，并加以讨论。”<sup>[65]</sup>

---

**[63]** 薄一波在信中说：学习解放军，调一批解放军的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确是加强工业企业政治工作的好办法。几年以来，石油工业部就是这样做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且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企业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其他工业部门如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也正在开始学习石油部的经验。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56。

**[6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54-455。

**[6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57-458。

毛泽东一声令下，从中央到军队各部门哪敢怠慢！据有关资料称，次月，即1964年1月9日，中央决定，在中央、大区两级的工业交通、财贸、农林部门及省、市、自治区的工业交通、财贸系统普遍建立政治机构。并决定第一批从军队抽调205名师以上各级政治领导干部，分别去工业交通、财贸、农林部门的政治部担任领导工作。所调干部的条件必须是，政治思想好，干劲大，有比较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身体健康，年龄在50岁以内。<sup>【66】</sup>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总政治部和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从军队选调10万转业军官到商业部门服务完成情况的报告》。该报告反映，1962年11月3日到1963年9月，共选调和接收了军队转业军官85,000多人到商业部门工作。总政和财贸办公室报告说：准备在1964年再选调3万转业军官到商业部门服务。1963年转业到商业部门的军官，绝大多数分配到县和县以下的基层单位，其中有70%以上的干部担任了基层单位的领导职务。中共中央对报告的批示指出：商业部门必须学习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要千方百计地把几百万商业人员的革命精神振作起来。要像人民解放军那样，认真在商业部门贯彻执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像军队抓“四好”连队“五好”战士那样，抓好“五好”企业“六好”职工工作。<sup>【67】</sup>

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社论开头即称：“一个学习解放军的热潮，正在全国兴起。在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共产主义竞赛中，‘向解放军学习’，已经成为新的战斗的号召。”“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军队，最根本的原因是：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解放军坚持我国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三八作风’；解放军注重创造四好连队、加强基层建设等等，这些都是解放军无往而不胜的原因。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是要把解放军这些方面的宝贵经验学到手，真正活学活用这些宝贵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中，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化和战斗化的革命精神。”<sup>【68】</sup>

自此，“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一起，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经典口号。

---

【66】 马齐彬、陈文斌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页239。

【67】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页240。

【68】 《人民日报》，1964年2月1日。

1964年2月6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国防工业部门抽调干部和训练干部问题的通知》，遵照毛泽东关于从军队抽调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和军队院校为工业部门训练干部的指示，总政治部决定抽调2,048名干部到国防工业政治部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机械工业部工作，并为上述工业部门训练4,315名党政干部。<sup>[69]</sup>

1964年2月13日，春节。下午3时，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座谈会，与党内外人士16人“谈谈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再次提出，“每一个部都应学石油部，学解放军，搞一套好经验，对敌人是战斗队，对自己是工作队。大学生也要学习解放军。要发扬成绩，树立标兵，多表扬，同时也批评错误。”“各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sup>[70]</sup>

## 二、地方各部门建立政治工作机关

1964年三四月间，全国工业、交通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对工业交通部门政治机关的性质，政治工作机构的建立，政工人员的配置，政治工作的方法和作风问题，政治机关同有关各方面的关系问题，作了研究和规定。另据报道，工业交通系统15个部和两个局，都已陆续建立了政治部。其中除铁道部等建立较早外，其余大都是在今年第一季度建立的。<sup>[71]</sup>

1964年5月1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从军队抽调五千三百名干部到地方政治机构工作的通知》称，“中央批准从解放军抽调五千五百名连以上干部到地方政治机构和企业、事业政治机构工作。除去前已抽调分配的师职以上干部二百余名以外，还应抽调五千三百名（其中：师级干部七十九名，团级干部一百七十四名，营级干部四十七名，连级干部五千名）。”“这五千三百名干部，确定分配给中央工交、财贸、农林部门所属企事业单位二千三百三十五名，其中：师级干部五十七名，团级干部一百三十一名，他们可担任中央直属企事业政治机构的主任、副主任；营级干部四十七名，连级干部二千一百名，他们可担任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车间的支部（总支）书记或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分配给各中央局的二千九百六十五名，其中：师级干部二十二名，团级干部四十三名，他们可担任十一个大城市（天津、沈阳、鞍山、旅大、抚顺、长春、哈尔滨、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和十六个重要省辖市（唐山、太原、包头、本溪、吉林、济南、青岛、南京、无锡、杭州、洛阳、黄石、长

【69】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页240。

【70】 佚名：《毛泽东思想万岁》，页92。

【71】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页242。

沙、成都、昆明、兰州)工交、财贸政治部的主任、副主任;连队干部二千九百名,他们可担任地方国营企业事业单位车间的支部(总支)正副书记或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所调干部一律办理转业手续,并直接办理调动手续(随军家属可以随干部一同前往)。其中师级干部由各军区报解放军总政治部备案。”<sup>[72]</sup>

1964年五六月间,全国财贸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据新华社报道,商业部、粮食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财政部税务总局都已陆续建立了政治部。6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罗瑞卿《关于在国防工业系统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关的若干问题的建议》。罗瑞卿建议:设置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统一领导和管理国防工业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国防工业各部设政治部,统一领导和管理部属企业、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各国防工业企业、事业单位,凡职工在1,000人以上者设政治部,1,000人以下500人以上者设政治处,500人以下者设政治教导员、协理员或政治指导员;成立国防工业党委,在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对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和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工作,实行统一的集体领导。<sup>[73]</sup>

1965年5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决定》,提出:中央设置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工业交通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央委托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管理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的日常工作;中央工业交通各部党委,设置政治部;各中央局设置工业交通政治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以及其它大、中工业城市的党委,设置工业交通政治部。省、自治区的工业交通厅、局,可视工作需要,设政治工作机关;小城市和专区、县的党委是否设置工业交通政治工作机关,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党委决定;工业交通企业(包括托拉斯)、事业单位,根据规模大小和任务繁简,分别设置政治部、政治处或者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在生产班组,设置不脱离生产的政治宣传员,协助政治指导员在群众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sup>[74]</sup>以上,亦即为各部门、各地方设立政治工作机关的范式。

自1964年初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央先后设立了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农林政治部、财贸政治部、基本建设政治部,以后,又设立了中共中央外事政治部、文教政治部。在国务院各部、局亦先后设立了政治部。据不完全统计,被选调至上述部门政治部任职主要领导的少将以上者有:

【72】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九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页1087-1088。

【73】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244-245。

【74】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九卷,页1146-1149。

中将 1 人：

谢有法，原军事工程学院政委，军事工程学院集体转业后于 1966 年 2 月调任中共中央基本建设政治部主任。

少将 24 人：

李人林，北京军区炮兵政委，调任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邓东哲，福州军区空军副政委，调任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秦化龙，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调任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副主任；

杨树根，广州军区后勤部政委，调任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副主任；

黄远，第十研究院政委，部院合并后调任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副主任；

高德西，陆军第四十六军政委，调任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副主任；

李桂林，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调任中共中央基本建设政治部副主任；

王屏，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调任中共中央外事政治部副主任；

孙正，工程兵援越修路工程指挥部政委，调任中共中央文教政治部副主任；

吕清，沈阳军区工程兵政委，调任林业部政治部主任；

江学彬，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调任水产部政治部主任；

胡立声，外长山要塞区政委，调任冶金部政治部主任；

张向善，陆军第二十军副政委，调任化工部政治部主任；

刘鹤孔，空军第五军副政委，调任一机部政治部主任；

萧友明，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调任三机部政治部主任；

黄忠学，海军北海舰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调任六机部政治部主任；

张家洛，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调任水电部政治部主任；

赵承丰，总政副秘书长，调任地质部政治部副主任；

朱致平，陆军第一军副政委，调任纺织部政治部主任；

梅盛伟，空军第二军政委，调任交通部政治部主任；

朱春和，南京军区工程兵副政委，调任邮电部政治部主任；

颜金生，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

耿道明，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军区军事法院院长，调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政治部主任；

此外，陕西省军区第二政委牛书申少将已于 1963 年 4 月调任二机部副部长，1964 年后兼二机部政治部主任。

### 三、调萧望东主持国务院文化部日常工作

1960年代前期，毛泽东对文化艺术工作多有严厉批评。著名者如1963年12月12日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sup>【75】</sup>1964年6月27日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sup>【76】</sup>

以上两个批示，见于官方文献。而其他著述所披露的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及其主管部门——文化部的批评，更是多不胜数。

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插话称：“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三十？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sup>【77】</sup>

接着，就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文化部党组书记齐燕铭的问题，毛泽东捎带敲打了周恩来：“齐燕铭也不好，听说他是你的秘书长。这个人不能当秘书长。你还不如到解放军找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整个文化部都垮了。”<sup>【78】</sup>

面对毛泽东的指责，文艺界在1963-1964年连续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整风。整风后期，调整文化部的领导班子，已是势在必行。随后采取的调整措施如下：

1964年12月，调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任文化部副部长。

---

【75】 毛泽东给彭真、刘仁的批示，1963年12月1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36-437。

【76】 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批语，1964年6月2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91。

【77】 参见萧冬连：《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年，页1090。

【78】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页1090。齐燕铭建国后为周恩来所重用，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秘书厅主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1965年1月，由陆定一兼任文化部部长，以取代挂名多年的党外人士沈雁冰（茅盾）。

1965年2月13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致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请示：与罗瑞卿、安子文商后，拟商调萧望东、赵辛初等到文化部任副部长。<sup>[79]</sup>

1965年2月24日，彭真同意中宣部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的方案，提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核阅。中宣部报告称：根据毛泽东指示，文化部开展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半年来，部长一级的批判已告一段落，经与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商洽，拟调萧望东为文化部第一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石西民为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赵辛初为副部长、党组成员，颜金生为副部长、党组成员兼政治部主任，刘白羽兼副部长、党组成员。免去齐燕铭的副部长、党组书记，夏衍的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职务。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sup>[80]</sup>

1965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文化部党组改为党委，萧望东任书记，实际主持文化部日常工作。未知他是否达到毛泽东所称“头脑清醒”的要求，而选调军队领导到地方机构主政这种办法，实为文化大革命中军管形式的滥觞，更贴切地说，是开创了向地方机构派驻军代表的先河。<sup>[81]</sup>

有关是谁又是如何选中萧望东到文化部的，文革结束后有多种说法。其实，1967年1月周恩来对文化部领导班子改组的过程已有过解释：“改组文化部，这是毛主席的主张，我支持。当时考虑，文化部仍由解放军来搞为好！但现在看来，实际上是改良主义，没有像现在采取革命办法。文化部实际上没有必要，除了电影局和一些业务局外，其他的由政治机关领导就行了。当时改组，调解放军的同志，陆定一通过中央组织部，向解放军要人，找到萧望东，这个人政治上不太强，担任文化部长，实际上不够条件。我问陈毅同志，他也说不太行。因为解

---

【79】《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页397。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萧望东，时任南京军区党委第三书记、军区第二政委，后于1966年5月任文化部代部长，文革中被关押九年，1975年8月复出回军队后历任济南军区政委、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三、第一书记。赵辛初，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80】《彭真年谱》第四卷，页401。颜金生，时任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革中被关押，1970年回军队后历任陕西省军区政委，新疆军区副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军委纪委副书记。刘白羽，1950年代初曾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81】此处未将中共建国前后新解放区的军事管制形式考虑在内。原因为彼时的军管为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过渡，而非类似文革中以军管的形式接管共产党自己的政权。

放军支持，就调来了。这里陆定一是否和安子文、罗瑞卿有什么默契，不知道。现在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不是适当人选。他的几个助手也不行，如石西民，上海市委、华东来的，也不行。从华东第一任调夏衍，夏衍是三十年代人物，调他离开上海，打破他那一伙，始终让他担任党组书记。后来调徐平羽，也不行。石西民也不行，在柯庆施领导下，可干些工作，但到文化部不行。赵辛初是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做农村工作有些见解，但是调到文化部当副部长也不行。班子不强，调来一个一军的政委，后来当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颜金生，两年前搞机关革命，推荐他来的。搞军队机关革命有些经验，但到文化部不合适，这个班子是陆定一组织的，不是强班子。”<sup>【82】</sup>

当时，周恩来认为是选错了人。又把选错人的责任，推到了陆定一的头上。而按彭真1965年2月13日的请示函，人选应是彭真、罗瑞卿与安子文三人商定，且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同意的。

综上所述，“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一系列举措，使军队政治工作中一整套带有形式主义倾向的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自然亦使全社会具备了高度“革命化”、军事化的表征，为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条件。

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热潮中，1965年8月1日，适逢建军38周年，邮电部特地发行了一套8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邮票，并专门请林彪为发行这套邮票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因而是战无不胜的队伍。”邮票发行和林彪题词，无疑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热潮增添了热度，也使军队再次站在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之下。

## 第四节 取消军衔制度

### 一、贺龙率先提出动议

取消军衔制度的动议，是1964年间代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率先向毛泽东提出的。比较确切的具体经过，可见代表官方观点的《罗瑞卿传》：“1964年8月间，毛泽东吩咐贺龙、罗瑞卿一道到北戴河，向他汇报军队高级干部减薪问题，作为防止现代修正主义的一项措施。讨论中，贺龙建议：‘是不是连军衔一齐取消算了？’毛泽东立即回答，‘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

【82】 周恩来在接见解放军参加文化部文化革命工作队造反联络站代表和部分四清工作队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1月11日。哈尔滨工农兵大学红色造反派团驻京联络站、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材料》（第二集），1967年，中国科学院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页4。

想搞掉它。’回京后，罗瑞卿打电话给林彪的秘书，请他报告此事并请林彪指示。经几次催问，秘书均说：‘已报告了，林总未说什么。’罗瑞卿察觉到林彪可能又不满意了，仍硬着头皮请秘书去请示，并对秘书说：‘如果林总没有指示，我们不好执行。’两天后，秘书回电话说：‘林总同意。’”<sup>[83]</sup>

以上叙述，其实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即林彪对取消军衔制度的态度，并非主动亦非积极。即便他知道了毛泽东的态度，还是几经催问迟迟不表态，最后，只是勉强同意。如果说，取消军衔制度是中共1960年代左倾思潮在军内重大影响的产物，贺龙不是比林彪走得更远吗？！

除了积极推动取消军衔制度，贺龙此一时期主导的左的倾向，还表现在批判吴自立一事上。1964年5月28日，贺龙作为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就“吴自立反党问题”报告邓小平并报毛泽东、中央称：

今年一月十九日我在广州时，张平化同志乘来广州开会之便，向我反映了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自立同志，利用编印“平江革命斗争史”吹捧彭德怀的情况。我认为，这是有人在为彭德怀翻案，向党进攻。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必须严肃对待。我当即把这件事在电话中告诉了彭真、萧华同志。一月二十三日，我又邀集了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陶铸、黄永胜等同志，一起听取了有关这一情况的汇报，一致认为必须把这个问题审查清楚，并确定由总政治部、中南局、广州军区派人前往湖南，在省委统一领导下，组成专案小组，调查这一事件。一月二十七日，我已将这个问题电报中央。

调查工作于一月底开始，现已告一段落。调查材料充分说明，吴自立利用编印“平江革命斗争史”为彭德怀翻案，向党进攻，是经过精心策划和缜密安排的。<sup>[84]</sup>

可见，当时左的思维在中共内部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既然已获最高领袖首肯，取消军衔制度的工作随即次第展开。

1964年八九月份，召开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和军委第223次办公会议，对取消军衔制度问题专门进行了研究，并制订初步方案。方案初步确定先由薪金改革小组就取消军衔制度向中央军委提出报告，然后由中央军委组织实施。

9月7日，罗瑞卿在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上谈及关于军队薪金制度和军衔制度的问题时称：

<sup>[83]</sup>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页479-480。

<sup>[84]</sup> 《贺龙同志关于吴自立反党问题的报告》，1964年5月28日。吴自立随即被撤销职务，文革中被关押七年，1975年因车祸去世，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

军队薪金制度要搞得合理，有利于加强军队内部上下之间和加强军队同地方之间的团结，有利于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要组织一个专门小组进行研究，提出适当的方案，报请中央批准后施行。现在在薪金问题上，赵燕侠、红线女尚且有较高的觉悟，我相信，经过党长期教育的革命军队的干部，一定会热烈拥护合理的改革。当然，在实行新的薪金制度时，有相当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我们一定要加强教育，进一步提高干部的阶级觉悟，自觉地愉快地执行新的薪金制度。军队超期服役士兵的薪金制度和军事院校学生的补贴制度，也要进行适当的改革，搞得更合理。

军衔制度也要由专门小组研究，提出方案，加以改进。<sup>【85】</sup>

10月17日，薪金改革小组向军委提交了《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称：我军的军衔制度，基本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我军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实行以来，利少弊多，副作用很大。同年11月24日，军委办公厅向全军转发了这个文件，要求结合开展取消军衔制度思想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11月30日，对取消军衔制度持积极态度的贺龙，在听取高等军事学院有关人员汇报时称：

我们的薪金制度不合理，特别是营级到军级。将军以前还降了一点，但也不合理。元帅、大将有的薪金比主席还高。我们过去还不知道。营、团、师、军四级，有的比地方上同级干部的薪金高80%。明年一月份准备先取消军龄补助，全军不行，先从少将以上开始，第二步全取消，与地方干部拉平。这样做了，要有震动，要先做好思想工作。

牌牌（指军衔）我们上了当，也准备取消。内战时期，抗日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发几块钱，发套布衣服，实行供给制。一进城，有人批评我们“游击习气”，以后就分十九级，将、校、尉。下级见上级，进门要报告，允许了才能进；进来了要坐下，允许了才能坐；坐下了要讲话，允许了才能讲话；讲话中间要抽烟，要吃水，允许了才能抽烟，才能吃水；完了要走，允许了才能走。以前我们那有这一套！过去，在一个房子里几个人谈话，先解决你的问题，后解决他的问题，有水就吃水，有烟就抽烟，办完事就走，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有钱就花，无钱不花。官兵一致。薪金制我们上了当，军衔我们

【85】 罗瑞卿同志在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总政治部：《工作通讯》第142期，1964年9月19日，页7。

上了当。明显地讲，人家就是要控制我们的军队。那时我们不自觉，没有顶住，要作检讨的是我们。【86】

## 二、毛泽东批准取消军衔制度

1965年1月12日，军委向毛泽东并中央正式提交《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请示》，全文如下：

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问题，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和军委第223次办公会议作了研究，并征求了各军区、军兵种、院校党委的意见，一致同意取消军衔制度。

军衔制度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与我人民军队的本质不相适应。九年来实践证明，这一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传统作风，等级表面化，助长了干部的等级观念和名位思想，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同时，也增加了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不少繁琐事务。

鉴于存在上述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军衔制度，采取“名存实亡”的办法，大将以下各级军衔一律取消，元帅军衔予以保留。

取消军衔以后，凡属现役军人，仍保留领章上的军兵种符号，今后参加外事活动，除元帅外，可用职务名称。

军衔制度是根据兵役法和军官服役条例制定的。取消军衔制度，必须修改兵役法和军官服役条例。在中央批准取消军衔制度后，再按法律手续报人大常委通过。

取消军衔制度，在军队人员思想上不会引起太大的波动，但也必须和对待薪金改革一样，在部队进行充分的思想教育工作。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87】

当月，毛泽东在该报告上批示：同意。

此后，军内各单位对取消军衔制度的方式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如：要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不要“名存实亡”，而要名实皆亡，元帅军衔也不要保留；陆、海、空军服装上已有区别，因此，军兵种符号也可以不要，或者和解放军的符号统一起来，一律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礼服、大沿帽等，也可以取消。

【86】 贺总对高等军事学院整风的指示，1964年11月30日。

【87】 军委[65]军呈字第1号，1965年1月12日。

全军上下，对内对外活动，皆实行一种服装样式。这些意见和建议，比军委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更加激进，大部分被采纳了。

在取消军衔制度的同时，军队薪金制度的改革也在同步进行。2月11日，军委发出《关于改革军官薪金制度的决定》称，“军队现行的薪金标准，是全国现行的各类工资标准中较高的一种，这是由于我军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搬用了外国一些不好的经验所形成的。它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并已带来一些不良影响。薪金高了没有好处，还有坏处，容易忘掉过去，忘掉贫下中农，忘掉阶级兄弟，忘掉革命，也不利于军队同地方的团结。为了缩小军队干部同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之间的生活差距，并将军官薪金标准与国家机关行政干部的工资标准大体取得一致，因此，必须降低现行的军官薪金标准，改革军队的薪金制度。”为此决定：废除现行的军官薪金制度，取消军龄补助金。参照国家机关行政干部工资标准，结合军队情况，制定军队的统一工资标准。将军官现行级别改定为国家机关行政干部级别。从1965年6月1日开始执行新的工资标准，按新定级别发薪。<sup>[88]</sup>

2月18日，以国防部名义发布《关于停止授衔、晋衔工作的通知》称，“中央已经批准取消军衔制度，现正按法律手续报请人大常委会审议，待人大常委会通过后，即行公布取消，现决定从即日起，停止授予和晋升军衔的工作。望遵照执行。”

4月24日，军委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请示：建议在取消军衔制度和减薪的同时，对现行军帽、帽徽和领章的式样，也可以彻底改革，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请示中还拟定了三军统一戴解放帽、佩红色领章，帽徽也改为全红五角星。毛泽东于同月29日批示：照办。<sup>[89]</sup>

4月28日、29日，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计划。在谈到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时，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他还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sup>[90]</sup>

5月18日，军委关于兵团级别以上干部的工资定级问题向中央提交请示报告。其中提出，大将军衔的现为大军区级的七名（原有八名，其中陈赓于1961年

**[88]** 军委[65]7号文件，1965年2月11日。

**[89]**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征求意见稿，2001年，页458。

**[90]** 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备战计划时的讲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391—1392。



身穿 65 式军服的将领们。左起：王宏坤、李作鹏、苏振华、杨勇、吴法宪、王树声。

病逝)。张云逸原为地方三级，仍为三级；罗瑞卿、粟裕、徐海东、萧劲光定为四级。谭政、黄克诚定为六级。这个报告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圈阅批准。<sup>【91】</sup>

5月21日，军委发文转发其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式样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请示和毛泽东的批示。

实质性的内部程序完成以后，还走了个形式上的公开程序。

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决定：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主席令，予以公布。5月24日，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决定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已经通过了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现行的军衔制度。为了能够充分体现出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国务院对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决定如下：

一、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

【91】 《张云逸传》编写组、海南省档案馆：《张云逸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页469。



二、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沿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

三、海军军服的样式改与陆、空军相同，其颜色为深灰色。

四、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

五、原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

本决定，从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起开始实行。<sup>[92]</sup>

取消军衔制度，为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次大倒退，为文革前夕党内极左思潮在军队建设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其最大的作用，是使军队更加政治化，更便于参与和融入国家及各级地方政权的政治运动之中。试想一下，如果军队等级鲜明，军人仍戴着将校尉官的等级肩章，军内的文革怎么搞？军队怎么介入地方文革？

这种做法，也进一步加重了党内和全国的政治气氛，为文革中部分特殊的非军籍人员穿上军装开了方便之门。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身着65式军服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大部分没有军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穿上了65式军服以公开示人。

被毛泽东誉为“欧洲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的阿尔巴尼亚，亦跟随中国于1966年5月取消了军衔。二十三年之后，中国于1988年恢复了军衔制度，阿尔巴尼亚比中国迟了三年，1991年政体改变后才得以恢复这一世界军队普遍实行的行之有效的制度。

## 第五节 加强战备，准备打仗

1965年春，面对越南战争升级和中苏交恶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将国家建设思想，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国防建设及战争准备为中心；军事斗争准备的战略方向，不仅包括针对美、台的东部沿海，而且包括针对美国的南部边疆，和针对苏联的“三北地区”<sup>[93]</sup>；军事战略方针从“积极防御，北顶南放”<sup>[94]</sup>，转变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

【92】 《人民日报》，1965年5月25日。

【93】 “三北地区”，指东北、华北、西北地区。

【94】 “北顶南放”，1960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重点讨论了总参关于调整军事战略方针的建议。该建议的核心内容是：未来卫国战争的主要作战对象是美国及其在亚洲的军事同盟国和台湾国民党军，战争准备的基点是打反侵略全面战争；主要战略方向是东部沿海地区；战略指导思想是积极防御，基本作战思想是在浙江省三门县以北至鸭绿江入海口的沿海地区要顶住敌人，在浙江省三门县以南至北仑河口的沿海地区要诱敌深入至纵深地区聚而歼之，防御的重点是三门县以北至鸭绿江入海口的北部沿

自此，从1965年4月到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前，是中国立足于“早打、大打”而进行大规模长期备战的前期。事实上，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在紧张的战备氛围中度过的。

### 一、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

1965年4月9日，总参谋部参加召开会议，对全军进行战备动员部署。同日，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书记处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文件。该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美帝国主义很可能把战火烧到我们国土上来；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轰炸中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4月1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sup>[95]</sup>

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5]208号文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至县团级党委。指示称：

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已经向全世界一再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准备随时同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我们还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致我们的国土上来。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

.....

对于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的步骤，必须认真对待，绝不能有任何的麻痹大意。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冒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

指示又称：

---

海；作战样式是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战争过程包括防御、反攻、追击三个阶段。上述思想概括起来就是“积极防御，北顶南放”。对此，林彪在会议上指出：什么叫顶呢？顶就是不后退，把它顶住；什么叫放呢？放就是诱敌深入，把蛇引进来好歼灭。在战争初期我们是防御的，在顶的地方我们要下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等到把敌人消耗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可以转入反攻，最后还要进行追击，不仅从陆上追，而且从海上追，能追到什么地方就追到什么地方。

【9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动员史（1949—1978）》，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年，页409。

对于美帝国主义这只纸老虎，在战略上要藐视它，但是，在战术上要重视它。我们要充分估计到敌人还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占有海空优势，目前敌人在太平洋地区加紧进行的军事部署，主要是针对我国的。我们必须把情况设想得严重一些，把备战工作做得充分一些，特别是在重要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突袭的准备。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有所准备。这样，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一切盲目侥幸和麻痹松懈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指示提出：

目前的具体备战措施，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

一、大城市和大的工矿交通企业，要建立和整顿防空委员会，做出必要的防空规划，进行防空教育。

二、在沿海地区，要切实整顿和加强民兵工作。其他地区的民兵，也要注意进行最基本的训练，讲究实用，避免烦琐，切不要搞形式主义。

军队的备战动员，按军委的命令和总政治部的指示执行。

总参作战部在中共中央发出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后，与有关部门研究拟制关于加强战备措施方案，经杨成武签呈，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实施。

## 二、对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

自1964年中期始，毛泽东对军事战略有了新的考虑，多次对“北顶南放”的军事战略方针提出异议。

1964年6月16日，毛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明确表示，“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敌人一定要从东北来？还是走日军的老路？我看不一定。从广东来，得到什么东西：也不一定。”“至于打法，无非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打歼灭战。还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顶，要顶一下，顶不住还不是走？不能放在顶得住上。”<sup>[96]</sup>

1964年7月15日，毛在听取周恩来等汇报时称，“我们的打法是，我能吃下你时，就吃你；吃不下你时，也不让你吃了我。时机不成熟，我主力不同你硬拼，同你脱离接触。……无非你占了我什么地方，听起来名誉不好。名誉不好就名誉不好，主要不是名誉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最后胜利的问题。（罗瑞卿：第二次

**[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页229。

世界大战，敌人打到了莫斯科城下。）敌人打到莫斯科困难一些，打到北京还容易一些。就是失掉了北京，也不要紧。失掉了，我们也不到重庆，民主人士可以去。我们到北京、太原之间的山洞里去，就在这里同敌人斗。”<sup>[97]</sup>

1964年9月14日，毛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称，“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不会走日本人的老路。日本人吃亏，就是吃亏在先搞东北。”<sup>[98]</sup>1964年10月5日，毛在会见北越总理范文同时称，“我们准备美国打进中国大陆。……我们不怕。还是这个办法，在沿海建工事，也准备它打进来。中国领土相当大，它想到哪里就让它到哪里，这个办法比较好。我们和它打游击战，可以吃掉的就吃，要想吃掉它就要把它引进国境。”<sup>[99]</sup>

1965年4月12日至5月31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军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司令员、分管作战的副司令员、参谋长和各总部、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93人。会议根据毛泽东自1964年以来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对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调整，将此前的“积极防御，北顶南放”，调整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从而解决了“早打、大打”的作战指导和作战方法问题。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了全军作战计划和战备计划（草案）。军委7月底将会议情况上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5月19日，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人员并作了指示。5月21日，总参报送政治局常委接见时的指示纪要。纪要提出：我们要准备大打，准备快打，但战略工作的落实还要一步一步地来，先搞临时来不及准备的，就是加快尖端技术，搞大小三线。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兵种，要特别重视民兵、小三线和地方部队。民兵是最可行的兵员。我们要有全局观念，要注意国家经济问题，照顾到地方生产、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建设。兵要少一些，挤出钱来多搞武器、兵工厂、飞机、军舰、大炮、导弹、原子弹。战备工作要有重点，现在必须搞好工事，搞好部队的武器装备，不能搞全面紧张、全面膨胀。海军、空军、导弹、坦克、大炮，凡是临时来不及搞的现在就搞，来得及的，现在就不搞。最关键、最主要的是搞好三种准备，即军事思想的准备、军事上物质基础的准备和军队的政治工作。纪要指出：主席对于战略方针，从去年十三陵指示以后，又给了多次指示，都很重要，我们就按照主席指示去办。比如说，中间突破，切断南北；搞大小三线；民兵三落实；你打你的，

【97】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251-252。

【98】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265。

【99】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270。

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主席最近在武汉又指示，前面不要放那么多人，不要怕敌人突破一点。毛泽东5月25日阅后指示：“此件已阅，退林彪同志。所提各项意见，都同意。所谓十三项物质准备工作，如有文件，盼送一阅。”<sup>【100】</sup>

军事战略方针确定之后，总参在原有的基础上，很快研究制订了新的《全军作战计划》。6月28日，总参将《全军作战计划》呈报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久，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全军作战计划》进行了审议并给予肯定。<sup>【101】</sup>

1965年上半年，国家计委在协助总参拟制完成《战时武装力量动员计划》的基础上，主持完成了《战时人力动员计划》及其附件的起草、修改工作，为下半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做准备。<sup>【102】</sup>6月，全军作战计划确定后，战时动员计划的拟制工作也随之加快。总参的预想是：战前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约500万人，战争初期6个月内，约需动员800万人，伤亡补充按年40%计算，半年需补充伤亡260万人，总共在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需要动员补充兵员1,260多万人，并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在1,200万—2,000万人，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如战争持续4年，则总计需动员3,060万人。战争后期如果兵力达到2,000万人，除伤亡补充外再增加动员700万人。这样预计总动员量为3,76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5.4%。按照上述预想，国民经济动员将首先满足战争初期1,200万军队作战的动员需求，并通过持续动员以满足1,200万—2,000万军队作战对经济动员的需求，动员高峰时则要满足3,760万军队作战对动员的需求。<sup>【103】</sup>

### 三、对毛有关战备和战略思想的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就关于加强备战工作作了指示及全军作战会议对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调整后，毛泽东仍在不同场合不懈地对战争准备和作战思想进行了阐述。军委、总参及时地对毛的思想进行了贯彻落实。

1965年6月2日，毛在看了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印的《帝国主义动向》第十五期上刊登的一份材料后批示：“他们认为有可能马上打仗。我看也许如此，也许暂

【100】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页495。

【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动员史（1949—1978）》，页412。

【102】 这一会议后来并未召开。

【1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动员史（1949—1978）》，页417—418。

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是我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中央已作了决定。”<sup>【104】</sup>

6月9日，毛在会见一位外国客人谈话时称：“现在我们要准备打仗。准备打，也许打不起来；不准备打，打起来就措手不及了。这点在人民中间要进行宣传。看来，帝国主义是准备打的，不然军火商发不了财。”<sup>【105】</sup>

6月16日，毛在杭州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称：“华东开会，许世友讲，要把敌人完全顶住，不准它进来，在沿海打光。我说，你不给它点好处，不使它感觉到有点味道，这不成，那样它就不来了。要使它感觉到有一点味道。请问，一个国家打仗，这么大国家，纵不是像日本人那样长驱直入，也要给它一些味道，才会给我们机会打大胜仗。我看，就是怕它不进来，它只在边沿上搞一下，那就实行许世友的建议，在边沿上把它整下去。还是要诱敌深入才好打。人家得不到好处不行，那样就不能诱敌深入。”“姜太公钓鱼钓不到，就是因为不给鱼东西吃。你钓鱼不给些东西不行。你拿破仑不到莫斯科，怎么会打败仗？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从来就说不是好办法。”<sup>【106】</sup>

10月10日，毛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称：“你天天说打仗，他不来打怎么办？那不变成了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起来了怎么办？战争不准备不行，有备无患。”“现在敌人听不听话，也不一定，要放在两个可能上。一个可能按我们讲的早打、大打，一个可能它不来，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sup>【107】</sup>

1966年1月8日至19日，总参在北京召开小型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沈阳、北京、内蒙古、兰州、济南、武汉军区以及各军兵种负责作战的副司令员和参谋长、作战部长，总部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学习了毛泽东自1965年6月以来有关诱敌深入战略问题的指示、修改和调整了1965年军委作战会议制订的五年设防规划，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叶剑英到会讲了话。

2月21日下午及22日上午，毛在长沙听取叶剑英、杨成武等汇报军事工作。汇报到诱敌深入问题时，毛说：诱敌深入，过去对日本人灵，现在在越南不灵了。它不会轻易长驱直入，要做两手准备，它不深入怎么办？朝鲜战争，诱敌深入第一阶段灵，第二阶段不灵了。可以搞些小的诱敌深入。例如几十公里之内。还是要堆山，你不搞，敌人就占了。我看美国不会走日本、希特勒的老路。像日

【10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312。

【10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313。

【10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314-315。

【107】《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326-327。

本、希特勒长驱直入的办法，美国不敢搞，它没有多少兵，它怕死人，怕我们消灭它。所以要有第二手准备。诱敌深入，我们搞了几十年。第五次反“围剿”吃了没有诱敌深入的亏，现在大家都相信了，因为再没有其他办法。日本人长驱直入，除西北、西南地区以外，差不多交通要道都占了。今后诱敌深入，可能不灵。不管怎样，我们在第一线总得顶几个月，使后方有所准备。还要考虑顶不住。我们不可能一点空子都没有，敌人不从你设防周密的地方来，它要钻你的空子怎么办？汇报到沿海城市如何打法时，毛说：利用城市打，也是个办法。采取斯大林格勒的办法。总不能把城市空出来，像上海人口七百万，搬到哪里去！工厂当然要搬出一些。沿海城市要多修几层工事，它突破一层，还有一层。还要注意城市侧翼的设防。敌人如果巴在沿海不前进，纵深工事等于浪费。同时，沿海城市它不可能都占，只能占一些地方。一个国家要消灭另一个国家，只要军队存在，人民大部存在，敌人就没有办法。因为要消灭一个国家，首先是消灭军队，然后是征服人民，强占土地。汇报到全军总定额及其他军兵种等问题时，毛说：总定额现在不要缩小。铁道兵有几十万在西南修铁路，划得来嘛！省公安部队拨归省军区领导，这个办法我赞成。单独搞一个公安部队，搞两套，这是从苏联搬过来的，我从来不赞成。汇报到周恩来、邓小平设想把全国工矿企业基建部队在今后三五年内逐步军事化、实现义务兵役制时，毛说：这个办法我赞成。3月27日，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这次谈话纪要上批示：“此件看了，记录得不错，就照这样吧。”<sup>[108]</sup>

4月9日，总参在北京召开全军作战会议，进一步贯彻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出席会议的有各军区、军兵种和各总部负责人。会议学习了毛2月份作出的关于诱敌深入和诱敌深入可能不灵，要做两手准备的指示，重点调整了今后五年设防规划，并研究了其他战备工作问题。叶剑英作了指示。会议于18日结束。5月，总参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提出今后设防，第一位的是迅速完成首脑防护工程和对北边的设防。

## 第六节 “援越抗美”启动

### 一、北越请求中国支援

1960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对北越提供了极其巨大的全方位援助，其中秘密军事人员援助于1962年开始筹划，1965年大规模展开。

<sup>[108]</sup>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页559—560。

1962年8月，北越总理范文同访问中国，请求中国支援。1963年10-11月，越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分别批准《中越两军协同作战计划》，就协同保卫中越两国边境地区安全问题达成初步协议。1964年越战升级，北越派出代表团到中国，请求加强对越援助。6月24日，毛泽东、刘少奇接见北越代表团和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上将。毛泽东在接见时称：“你们对各种可能都要做准备。第一是像朝鲜战争那样，准备它出兵打北越。准备好了，它不来，那好嘛。第二是它不来北越，在南越范围内打。”刘少奇补充说：“还有一种可能，美国的军队不来进攻北越，美国飞机来轰炸。”毛泽东明确表示：“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的事就是你们的事。就是说，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6月30日，越南提出请求中国援助的初步方案：如果美国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初步考虑请求中国加强装备、物资、技术援助；如果美国直接出兵南越，请求中国增加武器、弹药、装备、物资、技术援助，如有可能，协助越南加强防空；如果出现美国大规模出兵越南的情况，建议中国派兵支援。<sup>【109】</sup>

1965年1月8日至24日，北越国防部副部长兼副总参谋长陈参少将率军事代表团访华，周恩来、罗瑞卿大将接见。中方组成以杨成武上将、李天佑上将为正副团长的代表团，就中越两军协同作战保障工作和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问题进行会谈。24日，中越双方签订了《关于中越两国军队协同作战保障工作的补充协议》、《关于中国向越南北方提供军事装备和主要后勤物资援助的补充协议》、《关于中国援助越南南方军事装备和主要器材的协议》3个协议。2月9日为落实中越两军协同作战保障协议，总参作战部向总参上呈了派人赴越南、老挝进行现地勘察的建议，提出组成50人的勘察组，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杰中将任组长，总参军务部副部长陈彬少将任副组长，成员由总部、有关军区、军兵种派人参加。3月18日，杨成武批准。勘察组出国勘察四十余天，主要勘察了越北、越西北、越东北的地形和道路，同时派少数人勘察老挝桑怒、川圹地区。回国后，参与起草关于越老地形分析和建议的报告，6月30日上报。报告分析越老地形对作战行动的影响，提出了整修越南通向中国、老挝的公路、桥梁、渡口；调整出国作战部队编制，增加火炮、轻武器等装备和针对热带山岳丛林地进行训练的建议。<sup>【110】</sup>

3月24日至25日，文进勇上将率军事代表团访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刘少奇表示：越南需要的高炮和其他武器、弹药，凡是能够办到的就一

【109】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页416-417。

【110】 本段及其后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史》第二册，页805-849。并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征求意见稿，页496-499。



定供应；为对付敌人破坏越南陆上交通线，中国准备了1个铁道兵师、2个高炮师和其他一些保障部队，越南什么时候需要，中国就什么时候派去。罗瑞卿、杨成武就越南斗争形势的估计、越东北群岛设防和安沛机场选址等问题与文进勇进行了会谈。

4月9日，北越国防部部长武元甲大将随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访华，杨成武与武元甲就军事工作进行了会谈。会谈中，武元甲提出请中国派工程部队援建越东北群岛设防工程，派工作组入越研究铁路干线防空问题，并请尽快帮助修建安沛机场。杨成武答复，前两个问题，我们已作准备，越方什么时候需要，需要多少，我们就派多少去；修机场问题，过去越方没有提出，我们需要研究。20日至22日，武元甲再次来访，罗瑞卿、杨成武先后同武元甲进行会谈，杨成武对越方提出的援越施工、抢修铁路等问题答复：援越工程兵准备了3个团约1.2万人，拟设1个师级指挥部；援越铁道兵准备了1个师部、5个团约2.5万人；援建安沛机场准备了1个工程兵团，约2,500人。供应全部由中国负责。

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总参作战部立即与有关部门研究拟制关于加强战备措施方案，经杨成武签署，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实施。

## 二、中国军援人员分批进入北越

4月18日，为了援助越南铁路、机场和设防工程建设，总参谋部下达预先号令，确定：以铁道兵第二师师部为基础，铁道部、铁道兵和总参军交部派人参加，组成铁道工程指挥部，称工程第一支队，率5个团入越，担负友谊关至克夫109公里铁路改建和克夫至太原50余公里铁路新建任务，河内至友谊关、河内至河口两条铁路的抢修任务。以工程兵建筑第五十三师为主，海军、炮兵、通信兵部派人参加，组成设防工程指挥部，称工程第二支队，率3个工兵团和部分通信工程部队入越，担负东北群岛设防工程修建任务。空军工程兵第二总队入越担负修建安沛机场任务，称工程第三支队。

设防工程指挥部由工程兵司令部副参谋长曾旭清少将任主任，工程兵政治部主任李良汉少将任政委，工程兵建筑第五十三师师长王辉大校任副主任兼参谋长，6月9日晚，其第一梯队秘密通过友谊关开进北越，揭开了中国军队援越抗美的序幕。铁道工程指挥部由铁道兵学院副院长龙桂林大校任主任，铁道兵科学研究院政委郭延林少将任政委，6月23日，指挥部及所属部队开始从云南、广西两个口岸进入北越。

5月25日，周恩来接见拟与越南交通代表团会谈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罗瑞卿、杨成武汇报了援越工作有关问题。周恩来对援越工作作了指示：总的原则是尽量满足越方要求，尊重越方意见。援越工作要讲时效，援建越北方的12条公路，肯定不能同时并举，应将经济建设和作战需要结合考虑，以作战需要为主，要以轻重、难易、快慢、粗固八字方针安排，先粗通，再加固，既要快，又要用得上，总的完成时间两年。交通部等有关部门要用支前的精神办事，由总参挂帅，国务院有关部门积极支援。修路施工力量以工程兵部队为主。河内以北的铁路、公路要包修，河内以南的应该包补。交通部、铁道部等有关部门可给越方介绍一些抗美援朝的经验，并派一批专家去越南帮助研究抢修技术。这项工作由罗瑞卿挂帅，李天佑具体负责，计委、经委等有关部门都要听调用。杨成武汇报援越修建12条公路，工程部队需要扩编10万人，周恩来表示同意。根据罗瑞卿、杨成武提议，为了统一组织指挥援越工作，周恩来同意成立中央国务院支援越南工作小组，由国家部委、军委总部及军兵种21个单位各派一名领导参加，杨成武、李天佑任正副组长，负责经常性的组织工作。由李先念、薄一波、罗瑞卿、刘晓、杨成武、李强、李天佑7人组成领导小组对中央负责，掌握援越的方针政策 and 重大支援任务的决定及新增项目的审批事宜。<sup>[111]</sup>

6月4日，为保证援越修建公路协定的贯彻实施，李天佑召集有关单位进行研究，杨成武、李天佑向罗瑞卿、邓小平并援越领导小组报告，9日罗瑞卿、邓小平批准。主要内容是：①施工任务全部由军队承担，需投入10万人，拟抽调和组建20个团，分两批入越。②这项工作由中央国务院支援越南工作小组统一领导下，由总参谋部抓总（日常工作由军交部办理）；总的技术指导、勘察设计和施工力量调配由交通部负责；施工组织指挥、力量调配、经费、施工机具、车辆和材料的申请分配与结算等，由工程兵负责；施工部队的党政工作和后勤供应，分别由广州、昆明军区负责。以工程兵为主、交通部参加，成立精干的入越工程指挥部，作为工程兵派出机构，负责具体计划、技术指导、组织协同和施工力量的调配。③全部工程分两期进行，力争1966年底达到粗通，1967年第二季度全部按标准建成。

6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批准的援越修建公路实施方案，总参作战部起草施工力量抽组和工程任务区分问题的报告呈总参谋部。报告提出援越修建12条公路需抽组部队24个团（每团4,000人）。26日，作战部根据罗瑞卿“先少去一些

【111】 李先念，时任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刘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李强，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人也有试点作用”的批示精神，又提出第一批抽调2个师部（铁道兵第十三师师部和沈阳军区组建1个师部）率9个团约3.5万人，于9月底赴越南；第二批广州军区组建1个师部，广州、成都、武汉军区组建15个团约6万人的抽组方案，经罗瑞卿批准下达。7月1日，作战部经与有关单位研究，提出入越施工部队的名称、编组等问题的建议，报罗瑞卿批准。建议提出修路部队按中越协议对外统称“中国交通部修路工程队”，师、团、营、连分别称支队、大队、中队、分队；师部按800人至900人编组、团按4,000人编组，建议还提出了防空兵力兵器配备及施工机械、通信保障等问题。

7月6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援越修建公路方案，总参谋部下达抽组部队赴越遂行公路修建任务的预先号令。主要内容：①第一批抽调的部队7月底解除现有任务，进行赴越施工准备。广州、沈阳军区组建的师部8月底前完成，预定9月中下旬入越。第二批入越部队夏季补兵后组建，预定年底赴越。②广州、沈阳军区组建的师部和抽调的铁道兵第十三师师部分别授予中国交通部修路工程第四、五、六支队番号。整个修建工程以军委工程兵为主组建工程指挥部，由工程兵科研设计院副院长罗洪标任第一副主任（代理主任），调陆军第四十七军政委孙正任政委，统一领导援越筑路工程。<sup>【112】</sup>7月中旬，越南政府提出只修7条公路，其中新建664公里，改建547公里。8月27日至9月19日，中越双方在河内就援越修建7条公路的实施计划达成一致意见，9月20日总参作战部起草了实施计划通知，由总参谋部、交通部下发。

7月20日，根据越南政府请求，总参谋部下达调高炮第六十一、第六十三师入越作战命令。命令要求立即动员，月底前做好各项准备。27日，总参谋部下达入越开进计划。计划确定两个高炮师分别称工程第六十一支队和第六十三支队，从8月1日开始入越，担负北宁至谅山和安沛至老街两条铁路线的防空作战任务。

11月23日，根据周恩来指示和10月越南党政代表团军事小组提出向南方再援助装备8万人份的要求，李天佑召集总参、总后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研究。会后，总参作战部起草了援助方案，由李天佑报罗瑞卿并周恩来。12月9日，总参作战部根据周恩来批示和李天佑的指示，与有关部门研究起草电报，由总参谋部致函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确定至1966年春季向越南南方提供：枪5万余支（挺），火炮1,850门（具），枪弹7,000万发，炮弹40万发，反坦克手榴弹1万枚等。

---

【112】 罗洪标、孙正，1961年晋升少将。

翌年（1966年）3月8日，为使军委、总参掌握援越情况，总参作战部统计了中国建国后至1966年向越南提供的军事援助：①军事装备和主要后勤物资援助。向越南提供可装备部队100万人的轻武器和装备器材，折合人民币7亿余元。②部队援助。从1965年6月至1966年3月，高炮和工程部队共赴越14.1万余人。其中：铁路工程部队2.5万余人，公路工程部队7.4万余人，设防工程部队1.3万余人，修机场工程部队6,372人，通信工程部队2,000余人，高炮部队1.7万余人。计1个公路工程指挥部，8个支队（师）部，25个工程团（含1个民工总队），9个高炮团，1个机场工程总队，1个公路测设总队，2个通信工程大队，18个后勤保障单位。援越部队的吃、穿、用全部由中国负责。③其他军事援助。

越战期间，苏联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亦曾向越南提供了援助。这些国家提供的援越物资多由中国帮助转运至北越。1966年3月24日总参作战部对1965年免费经中国铁路转运苏联、朝鲜和东欧等国家援越物资、人员情况进行了统计：共转运12.9万吨物资和1,047人。其中转运军事物资4.7万吨，经援和外贸物资8.2万吨；转运苏联人员339人，朝鲜工兵708人。另外，办理过境苏联飞机28架次、运载495人次，东德飞机4架次。为转运各国援越物资，中国派干部、战士押运1,300人次，为过境物资换装和警卫，使用6万人日，为保障防空导弹运输，沿途组织警卫16.3万人次。

## 第七节 莫文骅事件

### 一、莫文骅挨整过程

1964年9月，解放军政治学院根据军委指示，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9月18日，贺龙元帅、徐向前元帅、罗瑞卿大将等军委领导到学院接见学员，在接见前，他们和院长莫文骅中将谈了话，对政治学院和莫文骅提出了批评，实际上为整风运动定了调子，在学院内引起极大震动。

1965年2月9日，派驻政治学院的总部工作组，向军委呈送了《关于莫文骅同志的错误的报告》，提出撤销莫文骅职务的建议。3月13日，军委批准撤销莫文骅的院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5月7日，军委指定总部工作组成员、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中将为政治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孔石泉中将为第二书记。5月26日，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名义，任命蔡顺礼为政治学院院长，孔石泉为政治委员，宋维斌少将为副院长，免去邓逸凡中将的副院长职务。<sup>[113]</sup>

【113】 参见国防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史》第二卷，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94。孔石泉，原政治学院副院长，1955年授衔中将，政治学院整风后，建立

宋维斌晚年回忆道：

1965年4月，政治学院教育长李丙令到首都机场直接把我接到学院。刚到职的蔡顺礼当院长，孔石泉当政委，我当副院长，就三个院领导。政治学院最早是罗荣桓任院长，萧华任副院长。后来院长是莫文骅，领导班子按大区配置。1964年院校整风，莫文骅有错误被免了，副院长邓逸凡也被免了。莫文骅的主要错误我不太清楚，一般说是“右倾”，说他不尊重领导。他写回忆录，说邓小平在最紧张的时候脱离部队，就是逃跑的意思。蔡顺礼是总政保卫部长，参加整顿院校，是政治学院的工作组组长，孙毅是副组长。为什么派我到政治学院，搞不清，我根本不知道院校整风的情况。<sup>【114】</sup>

莫文骅的免职，与院校整风有关，更与“对总书记邓小平造谣诽谤”有关。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材料，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莫文骅挨整的过程。其中一份材料称：

一九四五年，中央七大召开之前，为了总结经验，中央委托朱德，陈毅召集原七军干部举行座谈会。会上，同志们提出邓逃跑的问题，由莫文骅同志整理成“红军七军简史”送交中央参考，莫文骅同志忠实地记载了历史和同志们的意见，写下这么一段：“而邓斌（邓小平）、邓岗、陈豪人（陈后来脱党）等领导人未与士兵同甘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

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在20年后，居然成了邓小平伙同罗瑞卿、贺龙等反党份子迫害莫文骅同志，整垮他所领导的解放军政治学院的理由！<sup>【115】</sup>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狼狈为奸，篡改历史，公然对抗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利用这一事件疯狂地进行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是全国第一个用毛主席著作作为教材的学院，64年前这样的学院只有一个。毛主席曾经在63年12月16日亲自指示：地方干部“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学习。”林副主席说：政治学院成立以来是有成绩的，学毛著学的最早，这是对的，这是由于罗元帅（罗荣桓同志）领导和上级指示的，莫文骅照办了，是好的。从这里可以看到，解放军政治学院

---

政治委员制度，孔被任命为政治学院首任政委。宋维斌，此前为中共海南军区党委书记、军区第二政委，1955年授衔少将。

【114】 宋维斌口述历史记录，未刊稿。

【115】 据莫文骅称，《红军第七军简史》写后作为秘密文件存档。1964年，高等军事学院政委李志民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这本小册子，拿来作为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印发给学员参考，并送政治学院10份，院校整风工作组看到这本小册子后，“拿来大作文章”。见《莫文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页676-677。

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好学校。正因为这样，邓小平，罗瑞卿，贺龙这些反党份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对他恨之入骨。在64年9月竟盗用中央军委的名义，指使工作组，以莫文骅同志在20年前的那段记录“诽谤总书记”为理由，把莫文骅同志定为反党性质，妄图整垮最早开始毛著上课堂，认真传播毛泽东思想的解放军政治学院，把矛头指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副统帅，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疯狂至极，我们决不答应！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

65年2月19日通知莫文骅同志去参加军委办公厅会议<sup>【116】</sup>，蔡顺礼讲：莫文骅对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缺乏阶级感情，对刘主席，彭真，贺龙，特别是对总书记邓小平造谣诽谤。罗瑞卿立刻插话说：“就是这个问题，人家是中央调走的，你说是开小差，造谣诽谤！如果邓是别人那好办，不是总书记也好说。其他思想作风问题也好说，而你是诽谤总书记，造谣！我们不能那么没有原则，你是犯了反党性质的错误，不能思想不通，撤了你的职！”

事后莫文骅同志找蔡顺礼谈。莫文骅同志说：“从我整个历史来看，没有犯过大错误，我一直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说我是反党性质的错误，不是事实。”蔡说：“你有你的理介，元帅，总长，我们有我们的理介。”

由此可见，把莫文骅同志打成“反党”，就是由于他忠于历史事实，不替贪生怕死的胆小鬼邓小平文过饰非，就是因为他热爱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他们对这样的好同志千方百计地陷害，贺龙、罗瑞卿亲自到政治学院开展对莫文骅同志的斗争，撤了他院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邓小平一伙反党份子结党营私，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妄图篡党，篡国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sup>【117】</sup>

以上材料注明：“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等揭发，北航红旗编辑”。

## 二、操刀者是贺龙、罗瑞卿

还有一份材料，在莫文骅的问题上指责了罗瑞卿及贺龙：

罗贼对政治学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听从他们的摆布并与他们的阴谋活动坚决斗争，万般仇视，一心想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特别是他们要篡军反党，没有培养其反革命骨干力量的基地是不可能

【116】 应为军委办公会议，下同。

【117】 《打倒邓小平》（一），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1967年5月，页46-47。文内错别字颇多，本书引用时保留原样，未作更改。

的。1964年6月底学院××队学员毕业，为了抬高自己，打击莫文骅同志，罗跑来与同学照相，当着学员的面，故意训斥莫文骅说：“你们就那么好，没有错误？要工作组来检查！”这就暴露了他们处心积虑想砍掉这面红旗的黑心。

事情没过几天，7月2日，罗瑞卿、梁必业就派其老部下，得力打手蔡顺礼带着工作组杀气腾腾地进入了政治学院，这个工作组集中了几个检查组的力量，来势汹汹，拉开了一场蓄谋已久的政治迫害和夺权斗争的序幕。

工作组一进院就大量搜罗政治学院的“阴暗面”，审阅各种资料，工作组的后台贺龙、罗瑞卿迫不及待地在9月18日亲自跑到政治学院点邪火，工作组紧跟贺、罗。9月22日作了全院“整风”动员，事隔一日，连莫文骅同志检讨都未让作，贺龙就指示工作组：“莫文骅检讨不好就要考虑谁挂帅的问题”准备马上就把莫文骅同志一脚踢开，9月26日工作组常务付组长蔡顺礼便毫不隐晦地宣称：“我们这次整风是根据贺帅、徐帅、罗总长的指示，后来张副总长（张宗逊）、徐付主任（徐立清）亲自布置，现在看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盘算着，原来直接负责抓政治学院的罗荣桓同志已经逝世了，这一次贺、徐、罗一压，莫文骅倒台无疑了。

在“整风”期间贺、罗给工作组下了20次黑指示，他们下令把“整风”简报发给邓小平、彭真、林枫、吴冷西等根本与政治学院无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要审莫文骅同志历史的讲稿；要调查莫文骅同志的“宗派”活动；要查莫文骅同志写的“红七军简史”等等，为了把莫文骅整下去，他们组织了专门人员翻阅，竟审查了几百万字的材料。

林副主席对政治学院整风非常关心，多次给予重要指示，但都被贺、罗工作组封锁、扣押或拒不执行。林副主席明确指出：“政治学院成立以来，工作是有成绩的，读毛著最早的。罗帅指示，莫文骅同志这样办了是好的”，可是贺、罗工作组却大肆收集“阴暗面”材料，并派人把它送到当时正在长沙召开的政干校现场会议上广为散发，把政治学院说得一无是处，打成全军院校四个坏典型之一。他们企图在长沙会议上一举搞臭政治学院，然后再打掉莫文骅便易如反掌了。可是他们的阴谋被林副主席察觉指出：“四个坏典型不要点政治学院的名。”还指出：“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莫文骅不是反毛泽东思想，……要用他，当然要看一看他的问题。”但是贺、罗之流根本不把林副主席的指示放在眼里，真是猖狂至极。罗公开说：“莫有反党性质的错误”，又说“新老账一齐算……现在停职反省”公开与林副主席的指示对抗。贺龙则是更加露骨，他声嘶力竭地叫嚷：“要把他（莫文骅）五张王牌剥掉”。（贺所指的五张

王牌是①政治学院“通读”毛著全国全军最早，②长期在罗帅领导下，方针明确，方向对头，③在全军院校中教改最早，④毛主席1963年亲自批示地方干部到莫文骅管的学院学习，⑤没有请苏修专家、反党分子杨献珍、邓子恢等人作报告)。罗贺之流他们千方百计要搞臭政治学院，赶走莫文骅矛头究竟对准谁不是很清楚了吗?!贺龙、罗瑞卿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罪该万死!

贺、罗工作组通过一系列幕前幕后的活动，把莫文骅的材料整出来了。请看其中的“反党”主要罪状：①反刘少奇：莫文骅不完全同意刘少奇所谓“干革命就如同开飞机到莫斯科，总是时左时右才能到达”的谬论，认为人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了，在政治上就不会犯大错误，②反邓小平：莫文骅1945年根据红七军整风时同志们发言整理出一本《红七军简史》，上面实事求是地写上了“邓斌(邓小平)、邓岗、陈豪人(陈后来脱党)等领导人未能与士兵同甘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邓小平脱队当逃兵，周总理也说过是错误的。③反彭真：1964年莫文骅说：“彭真在东北时期搞得乱七八糟，可以说是路线错误，不是林总出来纠正，东北站不住脚。”④反贺龙：1962年莫文骅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尚荣等写的一本回忆录吹捧贺龙不满，说：“这三位老兄怎么能这样写：那时他(贺)知道个啥?关于错误路线问题，除了毛主席明白以外，别人怎么能知道!”这几个罪状就是“损害中央领导同志威信”的反党罪状。这些罪状首先在工作组内部就没有通过，1964年11月24日工作组讨论莫文骅同志错误性质，到会有组员24人，有6人认为反党性质，3人态度不明确，15人认为莫不是反党性质。可是罗贺之流硬是狗胆包天，背着林副主席，不顾广大工作组员和广大群众的反对，在1965年2月19日罗主持召开的讨论莫的性质的军委办公会议上，工作组组长蔡顺礼根据罗贺的旨意说：“莫文骅同志对中央许多同志缺乏阶级感情，对刘主席、贺龙、彭真，特别是对总书记邓小平造谣诽谤”。然后罗便专断下了结论，定莫为反党性质，并宣布撤消政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职务。罗贺之流就这样在他们黑司令刘邓的支持下，凭借他们窃踞的中央要职和掌握的大权，背着毛主席，林副主席，采用欺上压下等卑劣手段把莫文骅同志打下去了。而那位罗瑞卿的得力打手和帮凶蔡顺礼却爬上了院长兼党委书记的宝座。<sup>[118]</sup>

【118】《斩断罗瑞卿的魔爪——打倒篡军反党分子罗瑞卿》(四)，首都红代会中国科技大学东方红公社革命大批判联络站斗罗兵团编印，1967年9月，页27-29。文内标点符号及文字错误甚多，本书引用时保留原样，未作改动。



以上两份材料，描述了莫文骅事件的大致轮廓，并清楚表明，莫文骅撤职事件的直接操刀者是贺龙、罗瑞卿。至于邓小平在其中是否有什么指示，材料没有披露。

### 三、邓小平心病

1965年6月17日，总政治部以绝密文件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了“莫文骅同志所犯错误的问题”。

莫文骅有关红七军的历史回忆，其实有“内部版”和“公开版”之区别。延安时期整理内部存档的《红七军简史》，外间难以寻觅。而1960年代公开出版的《回忆红七军》，有“诽谤”嫌疑的一句话是：“军长张云逸同志在前线观察地形（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在红七军诞生后不久，即经龙州出越南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指挥队伍作战。”<sup>【119】</sup>

因为这么一句表面看来并无大的不妥的表述，总政治部文化部于1966年4月8日专门发文通知，要求在军内停止借阅《回忆红七军》一书。

1967年1月9日，周恩来接见政治学院部分群众组织代表，谈及邓小平与莫文骅的问题时认为“从军事上看，政委离开是不对的，这是个错误。他自己也承认是事实。”而“把莫文骅说成是反党严重了”“是罗瑞卿定的”：

代表：③整风时群众给莫文骅提了不少问题，可只是抓住反邓小平的问题，也不实事求是定性。据说是蔡顺礼写报告给张宗逊，张宗逊给贺总，贺总交给邓小平，邓小平推给罗瑞卿处理。我们怀疑。④定莫文骅反党性质错误时，是由军委办公会议由罗定的，军委未讨论，中央怎么看法，我们不知道。

总理：中央根据罗的报告，当时就有些矛盾，当时邓离队伍说是请了假的，到上海，莫当时在连队。现在看在困难时应该跟着，跟着部队到比较安定的地方以后，去中央是可以的。有个小册子，莫文骅关于七军决议草案，中央未批准，他自己写的文章，在手续上有缺欠，在七大前后对这个问题没有作结论，人不齐未搞。这次张云逸同志给中央写信，证明邓小平那时离开队伍是不应该的。

代表：听说是中央让邓小平到上海去的。

总理：有介绍信，临时中央叫他到江西苏区去，我碰到过一次，是在一个同志家里。他本来是中央秘书长，后来派到七军。以后邓小平在江西被左倾

【119】莫文骅：《回忆红七军》，南宁：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1年，页20。

机会主义打成右倾，大家觉得他正确。我知道这件事，这次莫文骅的文件发现后，我看了一遍，分开之前前委讨论了，决定到江西，但当时环境艰苦，军事行动，两军未汇合，他写了封信，没有回去。从军事上看，政委离开是不对的，这是个错误。他自己也承认是事实。红七军决议是一部分同志搞的，中央未通过。事情就是这样。把莫文骅说成是反党严重了。当时，我们只提了个人意见没定反党，是罗瑞卿定的，你们说得对，不是军委，是办公会议，是罗。<sup>【120】</sup>

1968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在向中央写的《我的自述》中，也承认这是他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等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〇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个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上海了，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于我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后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sup>【121】</sup>

【120】 周总理接见政治学院部分革命组织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1月9日。佚名：《一月革命风暴》，1967年，页99-100。

【121】 《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附件二：邓小平同志的《我的自述》（摘录），1968年6月20日-7月5日。中发〔1973〕14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3年3月16日发出。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再次为此检讨：“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应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sup>【122】</sup>

#### 四、文革结束后莫文骅将被整的责任推到了林彪头上

文革结束后，莫文骅一改文革中他对邓小平、贺龙、罗瑞卿的揭发，将1964年被整的责任推到了林彪头上。他在回忆录中声称：

1964年7月，军队院校开展整风，政治学院又成为运动的重点。工作组进院搞了一个多月，抓住了我抵制林彪实用主义学习方法的“罪行”，说我对新军委的方针和林彪的指示阳奉阴违，另搞一套等等。9月16日，工作组向林彪汇报，林彪对工作组恶狠狠地说“政治学院很不政治，莫文骅不知天高地厚，要和他摊牌！”于是，工作组便发动学院开始了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后来，他们挖空心思，找到了我在延安时期写的一本《红军第七军简史》，说这本小册子中有诽谤原红7军某领导人的话，给我又加了一条“罪状”。<sup>【123】</sup>

然而，随后莫文骅又说：

1966年7月，组织上分配我到福州军区担任副政治委员。虽是降级使用，但让人从中也看出些变化，先前决定说得那么重，怎么又让去紧张的前线军区任职呢？8月初我去福州军区报到，8月下旬便赶回北京，准备搬家到福州。

当我整理好行李准备启程时，我打电话向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辞行。叶帅说：“暂不要走，等一等再说”。过了几天，叶剑英同志又来电话告诉我：“你的问题可以平反了，你也可以不走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志也来电话说我的问题将很快得到平反，平反后的工作将有所变动。

不久，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总政作出决定：撤销原来对我的处分决定，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sup>【124】</sup>

---

【122】《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附件一：邓小平同志的信，1972年8月3日。中发[1973]14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3年3月16日发出。

【123】《莫文骅回忆录》，页675-676。

【124】《莫文骅回忆录》，页678。1966年11月24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废除总政《关于公布莫文骅同志所犯错误问题》的通知。1967年4月军委重新任命莫文骅为政治学院院长，原院长蔡顺礼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叶剑英告之莫文骅可以平反了的1966年8月底，林彪已被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为党内第二号人物。如果是林彪要整莫，为什么在林彪的地位正迅速上升之际，他倒可以平反了呢？其实，他可以平反的真正原因，是不悦于他的邓小平当时已经失势！莫文骅文革后的“回忆”竟扭曲史实到如此地步，夫复何言！

## 第八节 罗瑞卿事件之一：上海锦江饭店会议

### 一、产生罗瑞卿问题的原因

1959年9月，在周恩来、林彪力荐之下，<sup>[125]</sup>罗瑞卿从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任上重返军队，填补黄克诚被打倒后的空缺，担任军委常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批准了罗瑞卿的新职，这也是他对罗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积极表现的奖赏。

罗瑞卿作风强悍，能力过人，但也有人认为他揽权，不注意工作方法，不注意团结同志，容易得罪人。在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任上，罗的上头除毛之外，基本没有婆婆。回到军队，则婆婆多矣！除毛之外，还有林彪和其他两位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同为军委常委，众元帅的军衔、资历也都比他高。以罗的性格，很难不得罪人，实际上也得罪了一些人。

产生罗瑞卿问题的原因，罗的性格缺陷固然是重要的主观因素，客观上，军内权力配置的失衡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罗重返军队后，身兼十数个职务，除上述军委常委兼秘书长、总参谋长外，在国务院层面，他仍然是国务院副总理，挂名为国防部副部长，1961年12月，兼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编制属军队序列），1964年6月，又兼国防工业党委第一书记；在军委层面，他是极有实权、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的军委办公会议召集人；在中共中央层面，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0月，又任中央专门委员会<sup>[126]</sup>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在总参，他还任总参党委书记；1965年1月，又挂名为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这么多显赫的头衔，很难说是罗自己去争取的，但据说罗对赋予他的职衔，从不推却，这恐怕至少是缺乏自知之明吧，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外人看起来，就

**[125]** 据叶剑英称，“罗瑞卿同志当总参谋长也是林彪同志和总理推荐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对他工作中的错误，多次批评，诚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见叶剑英：《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126]** 又称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为中共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与组织协调机构，委员会主任为周恩来。

是乐于揽权揽事。最明显的是，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初衷，就是“负责协调和组织国防工业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和日常工作”，以一位大将去“负责协调”两位元帅，以一位军委常委去平衡两位军委副主席的关系，也亏罗接受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愿意去干这么得罪人的差事。

性格往往决定命运。罗的性格，以毛泽东的说法，“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据说，毛还说过罗“浑身是刺”。告诫过他，“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罗的性格缺陷随着权力的增长更为显露，更为惹人侧目，“揽权”被放大为“有野心”，成为政治品质问题。

## 二、罗的问题是林彪首先提出来的

罗瑞卿的问题，是林彪首先提出来的，这无疑是当时党内高层的共识。邓小平后来称，“解决罗的问题，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没有察觉，林总首先察觉，很负责地向中央、主席提出，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主席亲自关怀、指导这个斗争。”周恩来也称，“林总揭发了罗的反党问题，主席亲自抓了这个问题。”<sup>【127】</sup>

林彪最早对罗瑞卿的不满，目前可从官方材料中得以证实的，是林1964年12月的一次讲话。

1964年12月29日晚11时，林彪在广州接见了刘志坚和唐平铸。据1966年1月军委重新印发的《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称，此前，林彪看了刘志坚和叶群<sup>【128】</sup>在一二七师三七九团红一连蹲点写的几份报告，并听取了叶群的汇报。林彪当晚称：

一九六四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毛主席思想红旗举得高。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东西冲垮，也会把军事训练本身冲垮。要敲警钟，如果听其自流，不加纠正，那就不得了。<sup>【129】</sup>

林彪的指示，实际上是对罗瑞卿不点名的批评。

【127】 唐平铸工作笔记，未刊稿。唐平铸，1965年大校军衔，时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为1966年3-4月参加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的42人之一。

【128】 叶群，林彪夫人，时任“中央军委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1965年上校军衔。

【129】 《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军委办公厅1966年1月21日印发。

1965年1月4日，军委以[65]1号文件将林彪这天晚上的谈话冠名为《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转发至军以上党委。1月13日，林彪将其指示报送毛泽东，同日军委办公厅发出《转发〈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重新印发的通知》，收回军委[65]1号文件。1月15日，军委以[65]4号文件转发毛泽东当日对《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批示及林彪1月13日给毛的信。毛的批示为：“林彪同志：此件早已看过，完全同意，照此执行。执行中逐步总结经验，大约一年总[结]一次，至多两次也就够了。这是就军说的。中、下级单位，则要一年总结多次。”<sup>[130]</sup>1月18日，刘少奇对林彪指示作出批示称：“此件前次已经看过。完全赞成。退军委总参。”<sup>[131]</sup>以上均可视为毛泽东及刘少奇对林彪的支持。2月9日，军委以内部文件形式（注明：发至连，向战士认真传达，组织讨论），重新印发经修改后的《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sup>[132]</sup>

据后来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2月14日、15日，刘亚楼<sup>[133]</sup>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在上海）向叶群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还对叶群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刘亚楼提出后，叶群说，“这样大的问题，你和我讲是不合适的，你要说，请你直接和林彪同志说好了。”<sup>[134]</sup>

刘亚楼向叶群讲的“四条”一事真伪，历来史学界争议颇大。其实，“四条”既然出自中央工作小组的正式报告，又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党，真伪问题当时

---

【13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页314。

【131】见1965年2月9日军委文件。

【132】1966年1月，又再次以军委名义重印了《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下发部队。军委1月18日在重印说明中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现在重新印发《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这次印发的是林彪同志指示的原文。毛主席、少奇同志批注的，也是这个原文。以前《工作通讯》一五四期刊登过并且印发到连队的那一个是当时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日常工作的负责同志错误地修改过的，应予作废。”

【133】刘亚楼，时为中央军委委员，空军司令员，空军上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因肝癌正在上海治疗。

【134】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中发[66]268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6年5月25日发出。

就应有所判断。否则，以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为首、杨成武参加的中央工作小组为什么会认可这个报告呢？<sup>【135】</sup>

当时是否有一定的政治气候产生“四条”？回答是肯定的。毛泽东在党内高层已公开表露出对刘少奇的不满及对林彪的倚重，以及对林彪不寻常的公开宣传，政治嗅觉灵敏的罗瑞卿应心知肚明，<sup>【136】</sup> 寄望于林彪“要出政治舞台”而少管军队的工作，军队“一切交给罗去管”，实质以摆脱林对罗的批评，罗存有这样的心态，并不令人奇怪。

据《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2月19日，刘亚楼到林彪处（在上海），向林彪讲了2月14日、15日向叶群讲的第四条意见的大意，说要多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林彪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并向刘亚楼指出了1961年以来罗的思想情况、恶劣倾向及近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2月23日，罗瑞卿上午去见在上海的林彪，向林彪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的领导，更拥护林彪的领导，说今后是“跟定了”。林彪指出，“要跟党中央、毛主席。”并要他今后改正过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因罗对刘亚楼谈了许多不应该谈的话，批评了他。<sup>【137】</sup>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4月22日，林彪与毛泽东谈及了杨成武的提升和扩权，以削弱罗瑞卿权力的问题。4月23日，林彪写信给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并报军委、中央称，“4月22日，我见到了毛主席，谈到了两个问题，都得到了主席的同意和指示”。该信的第一个问题涉及为了备战而学游泳和修工事。第二个问题是：“由于战争威胁的加重，主持军委经常工作的力量应当加强。军委原来有三个副秘书长，其中萧华同志患病短期不能痊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军委副秘书长之一，同时担任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这样就能使瑞卿同志有时不在时、病时和太忙时，能代理主持办公会议。且由于担任副秘书长的的工作，还可以加强直接向中央报告、请示；联系军政两方面的工作；和与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直接联系，以加强上、中、下的通气和商量问题的便利。”<sup>【138】</sup> 6月10日，以林彪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6月7日命令形式，任命杨成武为第一副总参谋长，6月14日，中共中央批复中央军委，同意增加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

【135】 《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提及，“关于这件事”，杨成武“也都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

【136】 罗是1965年1月13日刘少奇召集的作自我批评的党内生活会参加者之一。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379。

【137】 《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138】 军委文件[65]13号：《林彪同志给军委、中央的报告》，1965年4月23日。

5月19日，林彪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与会人员。据《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罗瑞卿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就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他发言后，就要求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马上表态。罗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和其他中央常委的严厉批评。罗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主张，林彪多年来是一直不赞成的，并且向毛泽东请示报告过，毛完全同意林的意见。<sup>【139】</sup>

5月25日，林彪看到军委作战会议简报第63期后立即指示：“作战会议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会议多数人的意见和会议文件作为结论，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元帅、总长和副总长都可以发言，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宣布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号简报，关于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要具体进行的问题，以后可以逐步用军委常委或军委办公会议的名义发出指示。”林彪的秘书立即将此指示用电话通知罗瑞卿的秘书。<sup>【140】</sup>

1965年四五月间，应是林、罗关系最紧张的阶段。除军委作战会议问题上林对罗的批评外，《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又称，“一九六五年四月，林彪同志又明确指示，今后军队六级（中将）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部长的任免，要先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各同志，然后再上报党中央审批。罗瑞卿同志对这一指示却置若罔闻，一九六五年五月，全军中将以上干部的定级，他不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即擅自决定用军委的名义上报党中央。罗瑞卿同志还经常以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各位同志身体不好为借口，不准别人去请示工作和汇报情况，谁去请示工作或汇报情况，他就训斥、打击。”<sup>【141】</sup>叶群在1965年12月上海会议发言时说过，“今年5月罗和林几乎闹翻了，文件都发了又收回来，因罗检讨了，我劝林彪压了下来，未搞翻。”

### 三、一个针对罗的行动正悄然展开

10月25日，雷英夫<sup>【142】</sup>给林彪送去一封信及一份题为《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的材料。信中写道：

---

【139】 《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140】 《罗瑞卿传》，页506。

【141】 《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142】 雷英夫，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1961年晋升少将。



林副主席：

最近期间，我多次想向你报告一件事，但因事关重大，未找到适当的机会不便轻率。

我觉得罗总长骄横懒散，心怀不测，值得警惕。我这个感觉，是经过6年的观察得出的。6年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962年5月去上海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以前，我对罗总长极为信任和尊敬，认为他是坚决执行主席和你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你最信得过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

1962年5月到今年7月，从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作法不对，甚至他对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的，特别是你提出要突出政治，他是不赞成的，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用了两面手法，搞了一些伪装。但这个时期，我对他的本质还看不透，虽有上述怀疑，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想他……

直到今年七八月，在参加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修改罗总长9月3日的讲演稿时，我才大吃一惊，才发现他是心怀不测的人……<sup>【143】</sup>

如果没有人在背后支持与点拨，雷英夫是绝对不敢写这封信的！

11月15日，被视为罗瑞卿亲信的萧向荣，被宣布犯有“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的严重错误”，责令停职检查，并受到内部批判。18日，被免去一切职务。<sup>【144】</sup>

11月26日，据新华社电讯：毛泽东今天下午接见了柬埔寨王国朗诺中将和他率领的柬埔寨王国军事代表团。接见时在座的有罗瑞卿、许光达。这是罗瑞卿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此后不到10天，毛即决定召开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由此可见，毛对罗瑞卿问题的解决，是极为隐蔽、突然袭击式的。这次由罗陪同的接见，是毛有意为麻痹罗而施放的烟幕吗？

11月30日，林彪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143】《罗瑞卿传》，页523-524。

【144】萧向荣免职后，杨成武任军委办公厅兼总参办公厅代主任，路扬任第一副主任，增加金涛、郑汉浩为副主任。萧的免职比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11月10日免职仅迟了数天。参见萧迎宪、彭宏伟：《萧向荣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页360-361、426。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叶剑英讲的）觉得必需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

十一月三十日

12月1日<sup>[145]</sup>，叶群携带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有关罗瑞卿的材料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从南空调派的里-2飞机秘密赶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汇报。

第二天，12月2日，耐心听取了叶群“七个多钟头的汇报”的毛泽东，在林彪报送的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陆军第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批示：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此件如转发时，请先给少奇、恩来、彭真同志一阅。<sup>[146]</sup>

陆军第五十五师是兰州军区的直属部队。兰州军区的报告，述及该师在战备和演习中贯彻执行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比较落实的方面，及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林彪在报送报告时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

【145】 据《罗瑞卿传》，叶群向毛汇报时间为11月30日。而据随卫毛泽东的张耀祠的回忆，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的杨成武要他去一趟，在杨处，张见到叶群，翌日早晨五时，毛通知要见叶，叶即到毛处面谈。按张说推算，这一天应为12月1日。见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年，页4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页544亦记载为12月1日。

【14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页486。

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五十五师的报告及林彪的附言，均没有只言片语涉及罗瑞卿。毛是借题发挥，虽然他的批语通篇也没有点罗的点，但知情者一看就明白矛头所向。

一个针对罗瑞卿的行动，已在极其隐秘中悄然展开。

#### 四、毛亲自坐镇主持锦江饭店会议

12月5日，毛泽东从杭州抵达上海。

12月7日，毛泽东几次批示身边工作人员，通知一些负责人来上海：“请用电话，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在杭州）、谢富治四位同志，于本日下午到上海一谈。”“宋任穷、陈锡联（东北）、李雪峰、杨勇、廖汉生（北京）、杨得志一架飞机共七人，于八日上午来此。”“贺龙、董必武、王尚荣、李天佑、张爱萍、雷英夫、徐向前、刘伯承（如卧病，可不来）、朱德，共八人，于十二月八日上午来此。”“许世友、韩先楚、陈毅、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七人于十二月八日来上海。”“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三同志：请于本日或明日到上海一谈。在四川，由成都转告。”<sup>【147】</sup>

12月8日-15日，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简称党中央上海会议），“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同志的错误，和他进行了背靠背的斗争”。<sup>【148】</sup>

参加会议共61人。其中政治局常委6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未到会）；政治局委员7人：董必武、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彭真在京“看家”未到会，刘伯承请假）；政治局候补委员5人：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6人：谢富治<sup>【149】</sup>、徐子荣、吴冷西、汪东兴、李质忠、刘宁一；各中央局负责人6人：陶铸、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陈丕显、李雪峰；军委、总部、军种和大军区负责人28人：徐向前、叶剑英、萧华、杨得志、张爱萍、吴法宪、李作鹏、苏振华、王新亭、张国华、秦基伟、刘志坚、邱会作、韩先楚、黄永胜、李天佑、杨勇、梁必业、张达志、黄新廷、杨成武、陈锡联、萧劲光、许世

【14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页545。

【148】《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

【149】谢富治，时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5年授衔上将。

友、廖汉生、陈再道、张宗逊、郭鹏；另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sup>【150】</sup>，副部长雷英夫，林办主任叶群3人。

到会人员除毛泽东、刘少奇、林彪3人不编组外，其余编为三组，第一组召集人邓小平、陈毅，第二组召集人谢富治、李井泉，第三组召集人周恩来、贺龙。

上海会议既然名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说明其规格是最顶尖的。这样高规格的会议，只有毛泽东动用其中央主席的权力才有可能召集。毛尤喜欢使用类似“扩大会议”的形式，随心所欲地将与会者等扩大至他本人认为合适的范围。上海会议到会总人数61人（原定63人，刘伯承、聂荣臻2人请假未到会），已经是常委人数的八至九倍。以党内最高层加上其他重量级人马共61人去对付罗瑞卿一人，充分说明了毛对罗问题的极其重视程度。同是大将级别，当年以军委扩大会议形式即可将谭政解决掉。

会议印发了十一份材料，即：1. 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2. 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3. 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4. 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5. 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6.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7.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8. 1965年11月27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9. 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10. 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11. 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

叶群在分组会议上，分别介绍了林罗关系的有关情况：

过去对罗毕恭毕敬，没有想到罗和林的关系搞得这样紧张。

以后发现一些问题，不敢轻易上报，一怕看不准，二怕材料不够过硬，三怕给中央军委出难题，四怕转移工作重点。

今年五月罗和林几乎闹翻了，文件都发了又收回来，因罗检讨了，我劝林压了下来，未搞翻。

罗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

罗个人主义已到野心家，除非把国防部长让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林今年问主席在哪里，罗明知他不告；罗见林是突如其来，但总理交代他报告的事都未报告。后来林觉得不向主席报告不行

---

【150】 王尚荣，1955年授衔中将。

了，要我把材料和情况向主席报告一下，请主席考虑。主席很耐心的听了我七个多钟头的汇报，并要我马上离开，以保安全。

这个问题的开端，1959年庐山会议后，罗向林报告如何开会。林告罗要请示各位老师。

1961年陈赓同志逝世，林参加了吊唁后，在家里等罗汇报工作，连等三天未来。林问罗能否来谈一下？罗要秘书答，罗不能来，因听邓的报告。又说明后天也不能来，要三天后才能来。林以为是否广州会议批评了林，别人不敢来见了。后林强制罗来，只几分钟就走了。过几天罗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八时来见林，但直等到十二时不来，林打电话去问，罗的秘书告说罗不来了。林很气，事后了解，罗上午十一点半前一直在家。

林要告罗以后多通气，以利团结。经叶群当面劝说，罗答应去见林，第二天罗来说，自己太随便，太轻率了。林为他开脱了。以后罗每次来都穿礼服，十一点半后才来，实际上是外事活动中顺路来的。这一时期，罗就在外散布流言蜚语，如说老师太多了，真难呀！

1963年可能是武元甲来北京时，罗顺便又到林处说，林彪同志，我有什么错误，你指出，若不能当总长，就要陈士榘当总长好了。林解释后才完事。

1964年后逼林退位。林从包头回来时，刘亚楼来说，罗听主席说，“希望林多活二十年，因林有马列主义”。林约罗来，罗只待十几分钟又走了，并说明天即出发，去看地形。在林问到主席有何指示时，罗才说，主席是说了希望林多活二十年，因林有点马列主义。

国庆节后，罗见林，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出门后又大声喊“不要挡路”。林气得昏迷过去。

林对叶群说，我是让贤的，但国防部长是主席、中央封的，我让贤也得让给真正的贤者，罗凭此就不能让他。

人代会后，进入新的阶段，逼着要交权。罗和陶铸到上海见林，第二天罗又见林说，“问题不在于通气不通气，而在做的对不对。”罗随后又见刘亚楼说，“想不到林彪又东山再起了”，“你和林彪能不能疏通疏通，我今后烧成骨头也拥护林彪，跟定了，今后棒打不飞，弹打不走了。”刘向叶群说，罗体重减两公斤，既知改悔就算了。

刘对叶群说，（一九）六三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四点意见，是罗交代的。

四点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出政治舞台的。

二、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身体。

三、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

四、放手要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罗负责。

叶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的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谈的问题。

刘说，你怎么这样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这是对我最大的污辱。回来路上，小孩都说刘讲的不对，你答的对，“爸爸没有野心”。回家林说，“你答的对，今后不准谈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2月19日刘要见林，刘又谈四条说，要团结罗，尊重罗；林说，够放手了，罗没人缘，政治不挂帅，封锁我，对罗要一分为二。林无意中罗看人，（一九）六二年罗要陈士榘当总长。刘听后大惊说，“哎呀，原来总长不是我，我上当了，被玩弄了，我是贫农的儿子。”过了三天，罗来上海，从十二点一直和刘密谈到下午六点半。第二天罗来见林说：“林彪同志，你是主席的学生，在进步，我看准了，跟定了。”林说，“跟是跟主席、中央，我若不跟主席、中央，你们可以走开，连妻子儿子都走开，但不要发妖风。今后多通气，放手工作好了。”罗谈话后到刘亚楼处说，“一切都谈好了，林总又信任我了。”

叶帅要见罗，罗不见，说走，无时间。罗告叶：“主席对军训工作批评得一塌糊涂。”叶一晚未睡，第二天一早叶向林问主席怎样说，林说，“没有什么嘛？”叶说能否给我看文件，林同意，要叶群、杨成武马上打电话给萧向荣马上发，萧在电话上马上顶回来说，“他不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副总理，不是军委副主席，他没有资格看文件。”后萧又写信印成文件，发给大家，说叶无资格看文件。叶帅很难过，流了眼泪。

罗第二天到广州一见陶铸就说，“林是有缺点的，我先说几点，一、突出政治，我是委曲的，陶铸顶了回去；二、林不能团结人，又把罗死的事说了一遍（陶说若这样，林就不对了）；三、林和贺的关系是不好的（贺说，我多次见林都被罗挡住了）（陶未表示态度）。”这完全是谣言，无中生有。

这时刘亚楼又对叶群说“我被罗玩圆了，我一夜未睡，罗不好，请林警惕，还要多通知几个人：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注意，不要上当。我收回

四条，我坦白，四条中后两条是重点，是要林退出军队。”刘哭了，说对不起主席、中央、林彪同志，但又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

刘还对人讲“林彪是主席的儿子，罗瑞卿是林彪的儿子，刘亚楼是罗瑞卿的儿子。”

这次林彪同志才说罗是野心家。“长子这样坏呀！”刘曾向罗说，“林对你不好，你可向总理、中央反映一下吗？”罗说，“你这是蠢主意，这些事还能向中央说？中央到底是信林彪还是信我罗瑞卿？”

罗对刘说“柯老为什么抬得这样高，一当副总理就排在我前面。”

刘临死前，罗给刘写信，实际上起了“催命符”的作用。

刘死后，罗和郝治平几次到林处探听刘对林说了些什么？

刘的追悼会开后，当晚罗和老婆到刘家，把刘全家集合起来说，“我和刘那样好，还对我误会。”弄得全家不安。

到夏天，刘妻子被罗拉了过去，罗对刘妻讲“你的政治问题，是我1956年包了的，不然你就完了。”（陈锡联说，这完全是谢富治同志处理的。）“今后你的政治问题，我包了。”今年四月份，军队定级，根本不报告军委常委，罗和萧向荣私报中央批准后，才给林彪同志看。

作战会议要中央常委接见也是很反常的，是逼中央的阴谋。当众向中央要人要钱，大军区合并小军区，兵种合并，这是大阴谋，逼着林彪同志不能不起来反对。当晚林决心要揭盖子，斗罗，把问题摊开。罗接到电话后，深夜到林总处质问“为什么揭我的盖子？”罗大哭，很凶，并说“林彪，干部问题为什么要报告他？为什么要请示老师们？这是技术问题。老师们不了解情况。”后被驳斥后，罗哭到三点多钟，要求不要揭盖子。林第二天原谅罗后，罗又改变了手法。

罗假借林总的名义，不准萧华到北京。

罗对主席、中央的关系：

七千人大会林的讲话稿，罗主持草拟，叶群提出稿中所写“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应改为“是集体智慧和天才的结合”。罗大怒说“现在谁还敢讲个人天才？”叶群向林总汇报后，林说：“你的意见对，不能提天才是修正主义观点。”并要叶给罗打电话说“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后罗又给林打电话质问林：“我的稿子，你用不用？”后罗把电话机都摔了。<sup>【151】</sup>

【151】 叶群在1965年12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摘录）。

可以合理地推断，叶群上述发言，应是12月1日她向毛泽东“七个多钟头的汇报”的主要内容。上述发言，亦成为1966年4月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的主要依据。

上海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sup>【152】</sup>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sup>【153】</sup>

12月23日，毛泽东与彭真单独谈话时提到调查罗瑞卿问题，要彭真回北京后找公安部和中央军委同志谈，注意“地下活动”，并说：在党内军内永远不准搞地下活动。<sup>【154】</sup>

上海会议结束后，随即停止了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所有职务。12月29日，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调查罗瑞卿问题、肃清罗瑞卿影响的工作亦随即在党内、军内高层中展开，直至1966年三四月间的北京京西宾馆会议，方作了一阶段性的了结。

---

【152】 彭，指彭德怀；黄，指黄克诚。

【153】 王任重日记，1965年12月8日。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00。

【154】 《彭真年谱》第四卷，页456。





## 第二章

1966·上：山雨欲来



## 第九节 对“突出政治”的高调宣扬

### 一、林彪关于继续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

1965年12月27日至1966年1月18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军以上单位政治工作负责人和部分师政委共186人参加。由总政唱主角的类似会议，上一次已是在整整两年前。这次会议，原定在1965年12月中旬召开，由于要让位于重要得多的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故推迟举行。

根据会议结束后第二天即1966年1月19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报道称，“总政治部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认真学习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同志关于继续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指示，全面地总结了两年来的政治工作的经验，安排了一九六六年的政治工作。”报道中没有提及的是，会议还秉承上海锦江饭店会议的精神，对罗瑞卿进行了批判。

所谓林彪关于继续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最早见于1965年11月14日林彪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名义颁布给海军舰艇部队的嘉奖令。<sup>[155]</sup>嘉奖令指出，在今后工作中应该特别强调的是：1. 更加加紧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联系实际，在“用”字上狠下功夫；2. 更加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特别是要大抓狠抓活思想；3. 领导要深入基层，进行面对面的领导；4. 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5. 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技术。<sup>[156]</sup>

1965年11月16日，林彪电话报告乘专列于11月11日晚离京到南方地区的毛泽东，“我根据海、空军最近的情况，提出了五条原则，拟作为明年全军工作的方针，用以统率各种业务和任务。”随电话报告记录附送了《人民日报》昨日发表的载有五项原则的嘉奖令电讯。11月20日，已抵达杭州的毛泽东在上述电话报告记录上批示：“此件已阅，同意五项原则。”<sup>[157]</sup>

1966年1月19日《解放军报》关于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报道还称，“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同志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分别向会议作了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叶剑英同志在会上讲了话。”“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主持了这次会

**[155]** 据海军资料，海军东海舰队护卫艇二十九大队和快艇三十一大队，于11月14日凌晨在福建崇武以东海域，击沉台炮舰“永昌”号，击伤台大型猎潜舰“永泰”号。

**[156]** 《人民日报》，1965年11月15日。

**[15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480页。

议，作了关于贯彻执行突出政治五项原则问题的报告。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会上讲了话。”<sup>【158】</sup>

中央常委关于“突出政治”的口径与军队是一致的，这体现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报告中。据官方称，1月17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报告分三个部分：（一）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二）国内形势问题。（三）军队问题。”“在谈到军队问题时指出：一旦天下有事，将来仗打得好不好，要靠军队，要靠军队与人民结合。帝国主义怕我们，当然怕我们的全民皆兵，同样的是怕我们这个人民武装的骨干。全国学习解放军，军队工作就必须搞好。我们军队打的是政治仗，政治第一。战争是政治，战略指导思想本身就是个政治，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是什么？是政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是政治，是战略原则。基本上来说，我们是打政治仗。我们全民皆兵本身就是政治。解放军的战斗力量是建筑在政治思想上面的。”<sup>【159】</sup>

## 二、萧华不点名批判罗瑞卿

1月11日，萧华在会议上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主报告。报告开头即称：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中央上海会议精神，根据毛主席对五十五师报告的批示和林彪同志的指示，研究如何坚决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会议全面地检查和总结了两年来的政治工作，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批判了反对突出政治的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澄清了模糊认识，提高了对突出政治的自觉性，并且按照五项原则安排了今年的政治工作。这是又一次“复古”的会议。一九六〇年军委扩大会议“复”了古田会议的“古”，这一次会议又“复”了一九六〇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古”，“复”了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的“古”。

会议期间，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负责同志接见了到会的全体人员，林彪同志还从外地打电话来向到会的同志祝贺新年，都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sup>【160】</sup>

萧华在报告第一部分不点名批判罗瑞卿称：

【158】 《解放军报》，1966年1月19日。

【15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页1891-1892。

【160】 总政治部：《工作通讯》第190期，1966年2月24日。



林彪同志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典范。一九六〇年，林彪同志亲自主持作出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就是“复古”，“复”古田会议之“古”，批判了谭政同志的错误，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第一。这几年来，由于扭转了政治工作的方向，肃清了彭德怀、谭政错误的影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狠抓政治工作，军队工作就出现了新的飞跃。

当然，就是在这两年中也不是没有斗争的。一九六四年搞什么全军大比武，以比武为中心，以军事为第一，大大冲击了政治，削弱了政治工作，违反了毛主席的建军原则，助长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这是个方向性的错误，是个转向。由于这个错误，削弱了基层建设，四好连队大幅度下降，影响了部队的团结，使得军政关系、上下关系、“尖子”和非“尖子”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拼凑“尖子”，弄虚作假，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败坏了部队的优良作风，助长了歪风邪气。为了比武，有些单位提拔干部只要求“个头、长相、虎劲、口才、技术”，不注意政治标准，直接违反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的指示。比武之风还扩展到民兵之中，影响了民兵政治工作的加强，妨碍了民兵工作的三落实，影响了生产，增加了群众的负担。这种方向性的错误，严重地削弱了战备工作，损害了部队的战斗力。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的指示以后，有的人又刮起了一股反对突出政治的阴风，拣起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些破烂，胡说什么：“军事就是政治”，“军事政治同等重要”，“军事政治要轮流突出”。在林彪同志刚刚提出突出政治的时候，他们就唱反调，仍然强调突出军事，提出反对所谓“空头政治家”。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打了几十年的仗，难道他还不知道军事训练的重要？他们这是公开和林彪同志唱对台戏。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有的人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这样，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和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指示的贯彻又受到了阻碍。这种人打着红旗反红旗，用折中主义迷惑和欺骗群众，口里说的是拥护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实际上是搞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口里说的是拥护林彪同志的指示，实际上是和林彪同志唱对台戏。一九六四年军事冲击政治这个方向性的错误，不能怪下面，只能怪上面，主要责任在当时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日常工作的负责同志。幸亏林彪同志发现得早，抓得紧，才使工作未受很大损失。<sup>【161】</sup>

【161】 总政治部：《工作通讯》第190期，1966年2月24日。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结束后,《解放军报》从2月3日起到4月5日止,连续发表了“七论突出政治”的社论,分别是:《永远突出政治》、《提倡一个“公”字——再论突出政治》、《最重要最根本的战备——三论突出政治》、《政治统帅军事、政治统帅一切——四论突出政治》、《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五论突出政治》、《提倡唯物论,抓好活思想——六论突出政治》、《关键在于党委的领导——七论突出政治》。其中《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五论突出政治》称:“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用毛泽东思想回答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突出政治,就是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一切,推动一切,改造一切。一句话,就是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一定要坚信不疑,坚决照办。读毛主席的书,不是一般地读书。一般地读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指示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执行。毛主席的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sup>【162】</sup>这七篇社论,在全军、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加重了“突出政治”的氛围。

紧随《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从4月6日到22日也发表了三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

2月1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三个文件。以中央名义发出的批示称:“中央完全同意萧华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同意会议通过的《继续大力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和《继续大力突出政治,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建设》两个文件。望全军在过去几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充分做好战备工作,再接再厉,把军队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sup>【163】</sup>实际上,“突出政治”不仅成为了此一时期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而且迅速地推向地方,成为1966年5月之前全国的主旋律。

### 三、林彪的思想与地位得到进一步的肯定

4月11日,林彪看了云南边防驻军连续发生外逃事件的情况反映和西藏军区部队两起外逃事件的报告后,给萧华打电话指示称:

【162】 《解放军报》,1966年3月2日。

【163】 中发[66]109号中共中央文件,1966年2月13日。

看了总政三月十九日关于云南边防军连续发生外逃事件的情况反映、三月二十三日关于西藏军区两起外逃事件的调查报告，以及其他一些不良现象的材料，感觉到号召全军突出政治已经一年多了，可是，看来离落实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不要以为，提出了号召就能完全改变情况。下面执行指示的情形，有些部队还是很差很差的（估计有些非边防部队政治工作落实的情况，可能比边防部队还要更差）。因此，总政治部、各级党委、各级政治机关和各级军政干部，要狠抓政治工作的落实，狠抓基层情况的了解和指导，绝对不要粗心大意，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以为万事大吉，而要认真检查帮助，切实抓紧落实。要大力加强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大抓活思想。既要推广先进单位、先进人物的好思想、好经验，发扬各种好的方面，又要十分重视对薄弱环节、薄弱单位和后进分子的帮助，尽可能地克服和减少各种坏的方面。必须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深入、更踏实，坚决反对那种忽视国内外尖锐的阶级斗争对我军影响的思想，坚决同官僚主义作风和满不在乎的态度作斗争。

我这里讲的，不只是一个防止外逃事故的问题，而是整个政治工作落实的问题。我的这个意见和你们关于昆明军区、西藏军区外逃事件的报告，望能一并发到全军团一级，引起大家的重视，去掉大家的麻痹思想，使大家都高度重视政治工作的落实。

这样作是否恰当，请你们酌量，并请征求军委常委同志的意见。<sup>[164]</sup>

6月19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经修改的林彪3月11日就工业交通系统突出政治、学习毛泽东著作问题给薄一波的一封信，<sup>[165]</sup>全文如下：

工交系统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政治，这种做法很好，对于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很大益处的。这样做，会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兴旺。你们把大学毛主席著作作为工交系统全部工作方针的第一项，很好。

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种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164】总政治部：《工作通讯》第195期，1966年4月20日。

【165】林彪的原信刊载于国家经济委员会、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办的《工业交通战线》1966年第10、11期合刊上。



毛泽东思想，反映了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劳动人民自发地产生的，而是毛主席在伟大的革命实践基础上天才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是综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因此，必须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思想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才能使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近几年来，工交系统开始这样做了，这次工交系统的会议，又总结了经验，提出了新的做法，定会进一步取得成效。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此举十分炫目地公开表明：林彪有关“突出政治”的思想，不仅在军队适用，而且在全国也适用。同时，林彪作为党的领导人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 第十节 江青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纪要》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文革中被称为“是我国文化斗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会后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定稿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当时亦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sup>[166]</sup>

带队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sup>[167]</sup>，文革结束后发表了回忆录《〈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sup>[168]</sup>该回忆录尽管有不少套话，但并不妨碍它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相当一部分历史真相。

#### 一、江青请“尊神”

刘志坚称，“1966年1月下旬，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总政治部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我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

【166】《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重要文件》，1967年5月29日。

【167】刘志坚，时任总政副主任，总政党委副书记（1965年12月起），为排名萧华之后的总政第二把手。1966年兼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1967年1月被打倒。

【168】原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期，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后编入刘志坚：《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本节中刘志坚的回忆文字，除另有说明外，均引自该文，不再一一注明。

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萧华去。叶群还说：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

根据以上回忆可以得知：座谈会的事，是江青找到了林彪，而不是林彪去找的江青。江青后来在1967年4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如是说：“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sup>【169】</sup>江青的话，也就道破了真相——是她请的“尊神”，而不是“尊神”去请她。

刘志坚把这个情况向萧华作了汇报。两人研究，决定座谈会由刘带队，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sup>【170】</sup>

1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我说，江青确定会议在上海开，你们2月2日就来上海。在出发去上海的前一天（2月1日）叶群又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念了林彪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我一字一句记录后，叶群又叫我复述了一遍，她逐字逐句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待，我们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

林彪所说，大体上都是些应景的话，且仅限于部队文艺工作，公平地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并无过分之处。

刘志坚接着回忆道：“2月2日上午，我们一行6人（包括秘书刘景涛、编辑黎明）乘飞机去上海，为行动方便，6人都着便服，到上海后住延安饭店。”当天下午，江青叫刘等四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sup>【171】</sup>在座）。一开

【169】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中央文化革命小组，1967年，页39。

【170】 谢镗忠、李曼村，1955年授衔少将。陈亚丁，1965年大校军衔。三人均为文革初期军内重要人物。谢于1966年5月后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谢、李均于1967年1月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

【171】 张春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始，江青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他们带窃听器没有。接着，她就谈了一通文艺方面的问题。江青讲话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请参加座谈会人员一起吃晚饭。晚上同江青一起看电影《逆风千里》。刘志坚这里无意中“揭发”了陈丕显——座谈会不仅张春桥参与了，陈丕显也知情。

从2月2日下午开始，到20日结束，“座谈会”分两段：2日下午至10日为一阶段；16日至20日为一阶段。其中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2月9日下午江青说她有事，“座谈”得停几天。我当即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汇报了江青同我们四次谈话的精神，并请指示。2月10日，我和李曼村乘飞机回京处理工作，16日返回上海继续开会。

刘志坚向林办的汇报“并请指示”，没有下文。可见，所谓“委托”者林彪，对座谈会既不积极，也不重视。

刘志坚又说，座谈会11天里，主要活动是四项：1. 看电影、戏剧。这是“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三场戏。2. 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个别交谈时“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我只好每次听江青谈话回来，就凭记忆给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说一说，并让陈亚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3. 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4. 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在‘座谈会’期间，杨成武路过上海，去看了江青，同时也看过我们，说：江青抓部队文艺工作，机会难得，要很好重视。”

## 二、“纪要”首稿及修改稿的产生过程

在回忆录中，刘志坚以“‘纪要’的炮制”为题，叙述了“纪要”首稿的产生过程：

2月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我当时想，看了10多天电影，江青谈了这么些没有条理的、零零碎碎的话，总得理出个头绪来，回去才好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我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和陈亚丁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汇报提纲”）。

以上叙述，至少使我们明白了如下几个情况：

1. 按刘志坚的说法，江青在谈话一开始就宣布“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江青强调谈话不准记录，不仅避忌自己的谈话外传，且没有要求将谈话整理成文。

2. 林办对江青的谈话如何处理，并没有作过任何具体指示，更没有要求记录江青的谈话，将其整理成文。

3. 《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刘志坚等人觉得江青谈话重要，要向总政党委汇报，主动追记、主动整理而成。说坦率一点，是刘志坚自作多情。“纪要”的出笼，刘志坚等人也是有责任的。

这个“汇报提纲”约3000字，写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座谈经过。写了四层意思：一是叶群要我向江青转达的林彪吹捧江青的那段话。二是萧华、杨成武重视这次“座谈会”的话。三是会议过程中看了些什么文件，看了多少电影和戏，江青分别谈了几次话。四是对江青谈话的一般性评价，说她“对主席思想领会深”；“亲自种试验田”等。

第二部分写江青在座谈中谈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根据“追记”，把江青的多次谈话内容综合了八条，……

第三部分写落实措施。为了使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准备采取八条措施……

20日晚，“汇报提纲”写好后，即送上海警备区打印了30份。……2月21日，我把“汇报提纲”送一份给江青。22日下午，我们一行6人乘飞机到济南后，我给住在南山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汇报提纲”，并简要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第二天（23日）上午，我们一行由济南回北京。

“纪要”首稿（即“汇报提纲”）报到林彪处即获通过，可见林彪根本未予重视。事情坏就坏在刘志坚等人此番再次自作多情，主动将“汇报提纲”送了一份给江青，不料平地又起波澜。

据刘志坚回忆：

我们乘飞机刚到北京，在机场上即接到了江青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我派人去上海，她帮助修改。她还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

修改。当天下午，我立即将上海座谈会的情况和林彪意见，向萧华作了汇报，商定陈亚丁带原稿去上海参加修改。并向陈亚丁交待：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

……

这次修改，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第二、三部分的“双八条”，增加为“双九条”。全文由3000字增到5500字左右。……

……

陈亚丁带着修改后的稿子回北京后，便把修改情况向我和谢镗忠作了汇报。3月1日，我批：“打印，除文化部自己所需外，送总政党委、宣传部、报社各一份，送我五份，拟批送林副主席、江青同志、萧主任、杨代总长等”。陈亚丁按批示，将修改稿打印了100份。

### 三、毛泽东亲自操刀三次修改

刘志坚接下来的回忆十分重要。回忆证实了江青所说，毛泽东对“纪要”“很重视”。对“纪要”的主要观点，毛不仅未有反对意见，而且亲自操刀，对“纪要”作了多处修改：

本来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征求我们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了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毛泽东第一次审阅时，修改共11处，其中重要的有：

1. 标题上加“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标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2. 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

以上回忆文字关键之处，是刘志坚作为当事人指出，“纪要”标题上的“林彪同志委托”和正文中“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均为毛泽东所加。官方编纂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证实：“纪要”原题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修改”。<sup>【172】</sup>

【17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28。

毛泽东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表面上是突出了林的地位，是对林的倚重，其实是不征询林彪的意见，不由分说地将林拉上了他的文化革命战车。毛将“委托”二字强加于林彪，目的是给外界造成一种错觉：没有军籍的江青干预军队事务，是林彪主动邀请的，而江青的意见得到了军方的支持。对毛的做法，林无法公开否认。由此可见毛的霸道，以及政治手腕之老到！

毛泽东对“纪要”最重要修改处是：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并在这一条之后，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由此可以得知，贯穿整个“纪要”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等等，均为毛泽东本人的思想。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充实和修改。据刘志坚称：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主席审阅”。3月14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因为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四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纪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也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批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说的比前次的充分一些，缺点是长了一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又影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日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议四月初才开。”

毛泽东收到江青的信和稿子后，“再次作了修改”。根据陈亚丁当时的传达，毛泽东第二次修改，重点是第二部分，在十几个地方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的修改，……

……

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于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这一批示，是写给江青的。毛“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纪要”这一做法，事前并无征求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又是“委托人”林彪的意见。

据刘志坚回忆：“3月18日，江青又通知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去上海讨论纪要定稿问题。3月19日上午，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到达上海，下午江青就召集我们（还有陈亚丁、张春桥），看毛泽东修改过的稿子，并征求意见。……江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就算定下来了。’并交待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还说‘这个稿子要给林总一份。’她要亲自给林彪写一封信。当时，修改稿由张春桥拿去印成大字铅印稿。陈亚丁则为江青起草了给林彪的信。”

陈亚丁起草的江青给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二月二日至二十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一起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十九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

刘志坚称，“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他收到江青的信和‘纪要’后，就把我找去，要我代为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我让陈亚丁执笔起草了一个稿子送去，

林彪认为调子太低，陈亚丁又改了一遍，加上了一些对‘纪要’评价的话，又送林彪审定。”

陈亚丁起草、经林彪审定的信全文如下：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三月十九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注意林彪信中第一句“送去江青同志三月十九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绝口不提这个座谈会是他“委托”的。连刘志坚都说，林彪这些话是颇费苦心的。

3月22日晚，林彪修改审定后，交待刘志坚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3月23日上午刘等人带着定稿的“纪要”和林彪的信返回北京后，即按林彪的交待，分送给军委各常委。同时交待陈亚丁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经过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算最后定稿了。毛泽东对江青主持搞出来的“纪要”文本，三次作多处修改，倾注了大量心血。反之，林彪这位“委托人”，对此“纪要”却一字未改，不着点墨。显然，“纪要”的中心思想是毛的。



#### 四、“纪要”的批发

刘志坚随后谈及了“纪要”由中共中央批发的详细过程：

3月30日，我看军委常委们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都划了圈，就找陈亚丁修改以军委名义向中央和毛主席写的请示（即《军委的请示》）。全文如下：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委

1966年3月30日

当日，即将“请示”、“纪要”和江青给林彪的信、林彪给军委的信，一起上报中央。因当时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外地视察工作，不在北京，报中央的一份就送给了常务书记彭真。彭真看后，说一份不够，要20份。我又让人送去19份。3月31日，彭真办公室通知，要总政替中央起草一个转发“纪要”的批语。当日我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商量起草了一个批语，立即送彭真。批语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彭真收到批语后，立即于4月1日以传文(66)8748号批发“纪要”，分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核阅，同时另送陈伯达和康生。毛泽东于当日批示：“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4月2日康生在传文上批道：“彭真同志，这个文件很重要，写得很好。同意中央的批语。第七页有一句作了一点文字调整，请核定。”4月3日下午，我去看望中央文化部副部长萧望东，向他谈了上海文艺座谈会的情况。回家后，我着重看了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信后，感到我们替中央写的批语太一般化，当晚，我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到京西宾馆，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



难得一见的林彪与江青握手的一瞬间，1966年9月15日。

重要性的话。第二天送给彭真，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第二个批语就没有用。

刘志坚在此再一次表现了他的积极性——“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可能只是托辞，其实就是不买刘的账。到了4月中旬，刘志坚到上海修改“五一六通知”草稿及附件时，就曾“揭发”彭真称：新批语于4月4日送给彭真，“被他压下没有采用”。<sup>【173】</sup>4月10日，中央用传文的批语，以中发[66]211号文件，将“纪要”批转下达到县团级党委。

这是中共建国以后第一个将江青的名字列入大字标题并为内文主角的中共中央文件。可以想见，毛泽东是如何煞费苦心，将他那本不为全党所知、默默无闻的老婆，一下子推上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前台，这亦为次月江青成为新设立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小组排名第一的副组长，作了政治上的铺垫。

【173】 见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风雨征程》，页240。又见中发[66]267号中共中央文件附件二，页16。

刘志坚称，“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所谓错误。撤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领导同志认为我们替中央起草的那个批语，对‘纪要’的评价讲得还不够，要重写。陈亚丁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口授的要点，重新写了一个批语，并交江青修改。江青找张春桥推敲了一遍，即送中央。”

所谓“中央领导同志”是哪一位？刘志坚“为尊者讳”，说了一半，又不愿意说明白。有研究者称，这位“中央领导同志”，指的就是周恩来。<sup>[174]</sup>“纪要”批语的重写，这位“中央领导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刘志坚对彭真“压制”的揭发，同样也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回忆中称：

5月2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54号文件发出《关于收回第211号中央文件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批语上中央有新的补充，现将已经印发的文件收回，限5月10日前由各级党委(党组)办公厅(室)负责，如数收齐，退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新的文件将于5月10日前发出。”随后，中央发出了有新批语的文件。新批语就是由陈亚丁起草，江青、张春桥修改后送中央的那一份，经中央审定后，还是以中发(66)221号文件发出，批语落款时间还是4月10日。新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修正主义的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精神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

【174】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48。

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为我们的文艺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全国解放以后，文艺战线上的多次重大斗争，和近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但是，中央有关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委，对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一直认识很不够，抓得很不够，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种严重的情况必须迅速地切实地加以改变。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此件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作者可以适当放宽。

中共中央

1966年4月10日

中央两次批转“纪要”都是以机密文件下发的，传达范围限在县团级以上。在第一次批发后，中央办公厅还于4月15日发出通知，说：“中发(66)221号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勿遗失。”4月初，解放军报当时的负责人提议把“纪要”改写成社论发表，我请示萧华，他批准了这个建议。于4月18日以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在解放军报发表。全文9800多字，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社论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

刘志坚说轻了，社论的发表，何止“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4月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4月29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亦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这么大的动作，明显是带有全局性的，不啻为军队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 五、全军创作会议上批判“文艺黑线”

“纪要”在“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建议军队采取以下措施”项下提出：“四月份召开创作会议。仿照江青同志组织这次座谈会的方法，把这次会议开好。要把这次会议当做一次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的骨干训练班，一次使部队文艺工作者投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总动员。并在此基础上，对全军的创作队伍，逐步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

根据上述要求，4月8日到6月11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创作工作会议，全军各军兵种、大军区的文化工作负责人和创作人员共249人参加。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会议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仿照江青在上海座谈会的办法，“看电影，破黑线”，共看了建国前、建国后及苏联的影片上百部，对64部存在各种“问题”的影片进行了批判。据全军创作工作会议讨论结果整理的《对一部分影片的意见》分类称：第一组影片：美化敌人，丑化自己，包括《兵临城下》、《红日》、《逆风千里》、《岸边激浪》；第二组影片：如何塑造革命英雄人物的问题，包括《英雄虎胆》、《铁道游击队》、《狼牙山五壮士》、《黑山阻击战》、《独立大队》、《林海雪原》、《红霞》、《长空比翼》、《碧海丹心》、《战火中的青春》、《水手长的故事》；第三组影片：中间人物的问题，包括《列兵邓志高》、《哥俩好》、《两个巡逻兵》、《三个战友》、《花好月圆》、《两家人》、《三年早知道》；第四组影片：关于写爱情问题，包括《阿诗玛》、《我们村里的年青人（续集）》、《五朵金花》、《柳堡的故事》；第五组影片：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包括《谁是被抛弃的人》、《青春的脚步》、《布谷鸟又叫了》、《人民的巨掌》、《不夜城》、《球迷》、《桃花扇》、《抓壮丁》；第六组影片：如何正确地描写革命历史斗争的问题，包括《革命家庭》、《星星之火》、《在烈火中永生》、《聂耳》、《女飞行员》、《万水千山》；第七组影片：三十年代的作品，包括《青年进行曲》、《压岁钱》、《脂粉市场》、《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第八组影片：苏修肖洛霍夫的作品，包括《静静的顿河》上、中、下三部，《被开垦的处女地》上、下两部，《一个人的遭遇》；第九组影片：关于如何写奴隶反抗精神的问题，包括《木木》、《农奴》；第十组影片：描写革命战争、革命斗争和表现群众的问题，包括《五更寒》、《前方来信》、《暴风骤雨》。

第二阶段为破“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立“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阶段是破“八条”（即1962年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若干问题的意见》），立“纪要”。<sup>【175】</sup>

【175】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体育工作六十年大事记（1927—1987）》（内部征求意见稿），2001年10月；胡居成：《我所经历的1966年全军文艺创作会》。《党史文汇》2005年

全军文艺创作会议在大会上重点批判了6个人(包括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总政创作室创作员白刃、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导冯毅夫、武汉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所云平等),对其他56人分别在中、小会上进行批判。会议以后,军队各大单位均按照这次会议的规定,相继召开了类似的会议,揪斗或批判了一大批部队文艺工作者,使更多的人受到打击迫害。<sup>[176]</sup>因不堪忍受沉重的政治压力,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周洁夫、济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李淦相继自杀身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军内首批罹难者。

## 第十一节 罗瑞卿事件之二：京西宾馆会议

### 一、军委各副主席对罗问题纷纷表态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上海会议)停止了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所有职务。会议结束,罗瑞卿的实权性职务一分为二。军委部分,由叶剑英承接;总参部分,由杨成武承接。叶剑英、杨成武加上萧华,为1966年间实际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工作的“三驾马车”。

1965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上海会议的决定,成立中央工作小组,以审查罗瑞卿的问题。中央指定,工作小组由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负责。<sup>[177]</sup>

196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增加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2月1日至4日,军委第51次常委会议在广州召开,出席的军委常委有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会议由萧华汇报关于罗瑞卿问题和1966年1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情况,由杨成武传达毛泽东、林彪1965年12月22日、25日关于罗瑞卿问题等的指示。出席者对罗瑞卿问题发表了看法和意见。<sup>[178]</sup>

2月22日,遵照邓小平指示,杨成武陪同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关于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准备并听取指示。叶、杨汇报了准备召开小型会议,面对面地批判罗瑞

---

第12期,页45-47。

【176】 参见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页14。

【177】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页1898;《彭真年谱》第四卷,页471。

【178】 国防大学《徐向前年谱》编委会:《徐向前年谱》下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页143。

卿的问题。杨成武报告了军委第 51 次常委会议出席常委对罗瑞卿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毛泽东表示：我赞成。<sup>【179】</sup>

在此前后，军委各副主席对罗瑞卿问题纷纷表态。<sup>【180】</sup>

林彪称：“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它问题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的危险分子。取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林彪又称：“罗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他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的承认。他跟一般的好同志不同，他要报复、反扑的。这个炸弹不搞掉，将来第二次爆发更难说。在战争爆发时，或党和国家发生困难时，就要造反的。这个人比彭黄<sup>【181】</sup>危险得多。过去是枪归他指挥，现在背着枪也归他指挥。不要小看，不能放松对他的警惕性。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全国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可以造反的人，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要长期管制，到下面去，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改造。放松了警惕将来会出乱子的。他跟其他同志犯错误不一样。如果第二次爆炸，他要炸掉我们的国防，炸掉我们的团结。”

叶剑英称：“揭露这件事是空前的，这件事的危险也是空前的，事情的恶劣性质也是空前的。公开在林总面前要国防部长，病人要像病人的样子，不要挡路啊！我是当接班人拥护的，林告我后，我对他的认识一百八十度转弯。这种人拿了军权就要拿党权，已经是书记，副总理，还要什么，这是大地主的集中表现。要用这件事情教育全党全军，要靠四十二条柱子<sup>【182】</sup>撑着。”“要把这个仗打好，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三个主题，其它问题就不搞了。材料要一件件落实，做到无懈可击。要明瞭罗的本质，明瞭罗的事实，还要明瞭中央的意图。主席说，搞这种事的人，总有一伙人，刘、杨、杨、萧<sup>【183】</sup>四个人经常去。”“不可能希望他会好转，这不是一般性的批评自我批评。这个人不能拿枪杆子，也不能做单独负责的工作，只能在党和群众监督下做些具体工作。要看透他的本质，要到劳动中去改造。要狠狠地斗，对这种人就是要残酷无情，他对我们、对林总残酷无情嘛！我们自己有了错误，就作自我批评。通过自我批评揭发他更有力，搞得才深。”

---

【179】 《杨成武年谱》编写组：《杨成武年谱》，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页429。

【180】 军委各副主席对罗瑞卿问题的表态，见唐平铸工作笔记。唐平铸在记录时有所省略，故有的语句显得欠通顺或费解，引用时未作改动。

【181】 彭黄，指彭德怀、黄克诚，下同。

【182】 指参加中央工作小组第一阶段会议的四十二人（包括罗瑞卿本人）。

【183】 刘指刘亚楼，萧指萧向荣，杨、杨指杨尚昆、杨献珍。

贺龙称：“这个人很坏的，什么怪事都可以干得出来。林总和中央的暗情<sup>【184】</sup>要注意。他在公安部搞了什么，要防止暗杀，主席指示很重要，看得高，看远，看得深，主席的话是灵的，要大大怀疑，防止出事。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贺说不应让他搬回去，怕他灭证据。（他现在要严看）要儿子学射击，家里26个电话机子。还有一个无号码的机子，十几条枪。总参、总政要抓警务工作，特别林的安全。”贺龙又称：“这个人是没有改造的人。”

聂荣臻称：“这个人的弱点，长期以来看得很清楚，过去谅解，现在不是作风问题，他自己不舒畅，我想找他说，说不进去。……我们按党的组织纪律办事。对罗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会变色，适当时候要作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不要看他的表面，要看到他的本质，他是危险人物，要防万一，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会完全拥护中央、主席、林总。”

刘伯承称：“对这个人不要低估了。”

陈毅称：“到一定时候，要面对面的斗争，要搞突出政治，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伸手。”

徐向前称：“这是个危险人物，林总都不在话下，我们更不在话下。专门出风头，到处演讲。”

## 二、会议第一阶段

3月4日至4月8日，根据毛的指示和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为了彻底弄清罗瑞卿同志的问题”，<sup>【185】</sup>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讨论罗瑞卿问题小组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上海会议的继续。上海会议没有来得及对罗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京西宾馆会议则须对罗瑞卿问题作一了结。

在会议前，中共中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组成会议领导小组，另成立由叶剑英领头的七人工作小组，由叶主持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成员包括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负责人，以及罗本人，共42人。这一阶段会议，“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sup>【186】</sup>

3月4日上午，邓小平对会议的开法和指导思想作了明确指示：

---

【184】暗情，警卫工作用语，“秘密保卫”的意思。

【185】《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186】《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小组成立会，开张，还不是正式进行工作。小组42个人。为什么成立小组，为罗的问题。罗的问题，十二月中旬在上海谈了这个问题，根据主席指示，背靠背的方法，罗没有跟大家见面。常委指定恩来和我与他谈，把会议情况告他，要材料看，没有记录。这次会议就有记录，上海会议个人也不搞记录。开始讲了五点，常委、主席说的，一个是问题性质严重的，二是区别于彭黄，三是一分为二，四是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五，主席说有内疚，要负责任，常委同志说，书记处说，也有责任。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察觉，感到有责任。告诉了罗。罗对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见，主要是对抗林总、政治挂帅、封锁，与老总的关系。有很多理由说不是事实。即使那方面的问题不说，罗在五个方面有错误，一是关系问题，二是作风问题，三是思想意识问题，四是工作做得不好，五是组织纪律。这五点，每点都承认有缺点，但都有辩驳。在上海，常委、主席决定，不谈上面那问题，就这五点，担任军队工作不适当，多方面的工作不适当，同志意见也很多。方法是调离军委系统的各项职务，罗本人写了封信，后来发了个通知，没有讲任何理由。

这问题不能说已经完了。上海三个小组分别进行，但是没有完。常委、主席指示周、邓、彭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帮助罗认识错误改进错误。在上海说过，还有谢<sup>【187】</sup>、陶<sup>【188】</sup>、李井泉也说过。回北京后，彭、富春、周、邓都谈过几次，帮助他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军队的同志传达了这个问题。政工会议势必接触这个问题，而且很强烈。罗也觉得不是如大家讲的那么严重，总觉得有出入，实际上带委屈的情绪。这个问题怎么办？根据党内向来的办法，摆事实，讲道理，讲清楚嘛。罗区别于彭黄，彭黄的问题也采取这个态度，对王明采取这个态度。原则的坚持，……；可允许同志们把对罗意见讲完，也允许罗把自己意见讲出来。最后怎么样，这总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中央作出自己的决定。

还背靠背就扯不清楚了，还是要议论。统一看法得不出来，不如花一点时间，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在主要问题上搞清楚，枝节问题、无关紧要的问题，扯多了没有意义，特别是对方针、原则性的问题，大家要扯清楚。根据常委的讨论，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同意，考虑需要两步，一步上海式，一步是在一起谈一谈，包括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各军区都有人，说清楚对军队的工作也有积极的作用，对毛泽东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有益处的。42个人说这个

---

【187】 指谢富治。

【188】 指陶铸。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问题，主要问题不花很多时间，可以告一段落。实事求是，对罗也是一看二帮，任何人准许革命，允许他们申辩。彭<sup>【189】</sup>在62年还有八万言书，我们本着党的传统，不是过去有的，是毛主席树立的好传统。会议搞主要问题，实事求是，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同意就不同意，党从来不强制哪个人承认错误。八万言书搞全部推翻，彭到现在也不承认错误，△后分配工作，还分辩一些意见，主席说你保留你的，我们保留我们的。王明每年写几篇文章骂我们。

42个人小组，并不是哪个为一方，罗也是小组成员之一，有话就讲。

会议的进行，中央决定由彭、叶、我三个人主持会议领导小组。我们事情多，到外面去跑，总理要出去，不能靠我们天天搞。另外成立工作小组，叶、谢、萧、杨、王、廖、刘共七个人<sup>【190】</sup>。叶领班。我们有空就听听汇报。<sup>【191】</sup>

3月12日，罗瑞卿作第一次检讨发言。3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扩大会议范围，请中央、国务院有关各部委及各大区中央局和一些军区、兵种、学院等派人参加。会议通知罗瑞卿休会两天后再继续开会，而罗瑞卿于3月18日晨跳楼自杀（未遂），触发众怒，批判升级。“因为摔伤了医院，罗就不能参加会议了，以致会议又由面对面，转为背靠背。”<sup>【192】</sup>

### 三、会议第二阶段

3月22日开始，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中央指示，增加了53人，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人，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负责人。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95人。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7日下午的会议，主要谈罗瑞卿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插话时说：我在去年九、十月份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sup>【193】</sup>

---

【189】 指彭德怀。

【190】 应指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廖汉生、刘志坚七人。

【191】 见唐平铸工作笔记。△为字迹未能辨认。

【192】 叶剑英：《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中发〔66〕268号中共中央文件附件一，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6年5月25日发出。

【193】 《彭真年谱》第四卷，页473。

京西宾馆会议期间，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联名）作了主要发言。会议的绝对主角，是主持会议的叶剑英。他在会议结束时的总结性发言中称：

“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做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

会议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共开了一个月又五天，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除事假病假外，发言的同志有单独发言的，有联合发言的，共有八十六篇发言稿。从全部发言中可以看到，同志们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有揭发、有批判、有建议。差不多全部的发言，都肯定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认为罗瑞卿同志在工作上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又加上跳楼自杀的叛党行为，已经不能继续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了，应下放改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古人说的话。看来这句话对罗说来，不恰当。罗跳楼前，写了两封没有签名没有月日的遗书，都印发给同志们看了。他说，“自杀是可耻的”。但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他竟恶毒地说是会议把他逼死的，说他的可耻行为是被迫的。这简直是对会议的诬蔑，是垂死的反扑。证明罗对自己的错误是想抵赖，也可能是想掩埋不可告人的东西，想把错误带进棺材去。<sup>【194】</sup>

叶剑英在总结发言中列举了罗瑞卿“篡军反党”的“事实”。这些“事实”的纲要是：“（一）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反党的。（1）他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2）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3）他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4）他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5）他歪曲贬低毛泽东思想。（二）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林彪同志的，是要篡夺军权的。（1）他对林彪同志欺骗封锁，当面拥护，背后搞鬼。（2）反对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3）他恶意地攻击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

叶剑英接着说：

（4）他把林彪同志当作敌人，公然伸手抢班夺权。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可免地去向党伸手。他私自封官许愿，拉拢一些人，为他效劳，派人当“说客”，以林彪同志迟早要登上政治舞

【194】 叶剑英：《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台为名，劝林彪同志让权。此外还亲自出面，当着林彪同志的面大喊大嚷地说：“病号嘛，要像个病号样子嘛！要让贤嘛！”“不要挡路！”最后还想乘林彪同志有病，把林彪同志气死、逼死、折磨死。其实林彪同志的身体，据医生多次检查的结果，内脏各部都是很好的，只是负伤以后神经功能有点毛病，现在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这是全党全军一个喜报。而罗瑞卿却说想不到这个人还能东山再起！使罗瑞卿大失所望，啼笑皆非。这个人还能算是我们的同志吗？！

他拼命反对林彪同志，绝不是什么个人恩怨。罗瑞卿同志跟了毛主席近四十年，受过毛主席许多年的言教身教。在近四十年中，也在林彪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过许久的的工作，耳濡目染，宁有几人？罗瑞卿同志当总参谋长也是林彪同志和总理推荐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对他工作中的错误，多次批评，诚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罗瑞卿同志对林彪同志的批评、指责、教育，如果自己认为有委屈之处，何以不报告毛主席？而竟同刘亚楼等同志密谈！跟毛主席几十年，还不把毛主席看作父兄师长。难道这样做法，不是有意背着毛主席，故意和林彪同志作对吗？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友，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好、跟得最紧。他对党忠诚，对同志和善，几十年刻苦自励，好学不倦，带病不休，一生以毛主席的理论与实践为准则，他是我们全党最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林彪同志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主持军委的工作。在罗瑞卿同志看来，不反掉林彪同志，就不可能实现他篡军的野心。我看这就是罗瑞卿同志拼死反对林彪同志的根本原因。

罗瑞卿同志的错误多得很，什么“一言堂”、蛮横霸道、抢功诿过、包庇坏人、生活糜烂等等，我们都不去讲了，就是上面的两条也足以证明，罗瑞卿同志是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不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人，他不是毛主席的学生。他是要篡军反党的。事实俱在，铁证如山，无论如何也是抵赖不了的。<sup>【195】</sup>

4月8日，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代表三人小组作重要讲话，对罗的批评比会议开始时严厉得多。邓讲话称：

---

【195】 叶剑英：《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常委决定由周、邓、彭三人来处理罗的问题，以后又指定三人小组管这个会议。这个会搞了一个多月，党对他很耐心，负责，帮助。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的问题，过去我不知道，到上海还不知道，只知道他作风不好，但思想还开放。现在揭发出来，特别他这一跳，就更没有话说了。

我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我认为，解决罗的问题，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没有察觉，林总首先察觉，很负责地向中央、主席提出，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主席亲自关怀、指导这个斗争。罗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比上海估计的还严重得多。我们还是帮，希望他改正错误。开始是背靠背、“调离”军队，他抵触情绪很大，只有面对面。来了个自杀，自己作了结论，无非是抵抗到死。

如果你是正确的，应当坚持。主席受过机会主义多次打击，开除党籍，就是坚持，不怕孤立，正确的总要胜利。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彭德怀作了结论，几万言翻案，还分配工作，主席对他说，你保留你的，我保留我的。是不是还有不可告人的事，最少说明抗拒到底。

罗担负的职务很多、很大。书记处书记，副总理，总参谋长，秘书长等等，掌握军事大权。军队是党的命脉，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脉，让这样没有党性、作风这样恶劣、资产阶级思想充满脑袋的人掌握军队是极危险的。退一步说，即使没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凭他那种思想作风也是危险的。他确实是个隐患，拔除这个隐患就是个大胜利。何况他又有伸手问题。一旦天下有事，那就不堪设想。

罗瑞卿的错误性质，同意报告中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军内的反映。他对毛主席思想是反对的，当公安部长时就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十无运动。到军队后又同林总唱对台戏，一个稿子修改七八次，真不可理解，就是要宣传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他还到处讲话，煽动，反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反对林总的正确领导。罗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不是普通的，而是极端的。过去只知道他锋芒毕露。他私心很重，我字第一，个人打算很多，不能得罪他，得罪他一句，成百倍地回敬你。他记性又好，伸了一下舌头也记几年，极端个人主义已发展到狂妄的程度。他不守纪律是一贯的，走后门，不走正门，走邪道，不走正道，不搞党的正常生活，而且背后搞鬼。在我们党内，一切问题都可以经过党的原则来解决。我们也经常犯错误，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有时有主观主义，片面性，通过党的生活改正就行了。罗的错误也没有什么，改正就行了。十年改正就行了。但是他是不会

改的。我们不是因为他十年，犯了军事路线错误，而是他的错误与个人野心结合起来。他在党内不守纪律，发展到狂妄的地步，对林总那样恶劣、伸手。军队的大权已经到他手里了，放手让他工作，书记处也让他工作，希望他搞好，但他有个人打算，发展到伸手。高、彭也是这样的。

当然，伸手不是天天伸。高不在陕北伸，也不在东北伸，而是当了国家副主席后伸，把总理、少奇要当挡路人搞掉。彭也是这样。在我们党困难的时候伸。罗也是到了气候才伸。首先伸向军队，挡路的是林总，逼林总让位，那就不是一般的错误。大家揭发的事实，可能有个别有出入，但无伤对罗这个人的评价和他问题性质的确定。有点出入无关，十件八件也不要紧。自杀本身就作了结论。

对罗的问题，我们应当吸取教训，特别是高级干部，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我们国家的命脉还是掌握在这些老家伙手里。△我们在当大权。党内一般性错误总是常有的，但有了彭高饶△的事件，又有了罗的事件，我们应当吸取教训。

……

书记处对罗的问题，失于察觉，只知道一般的问题，我们有责任。主席了解得更深，林总提出，主席马上就抓住。

对罗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常委会根据工作小组的报告来决定。我赞成撤消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现在停职，还要经过法律手续。自然我们还希望罗改正错误，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毛主席的党是允许革命的。

工作小组的报告，不用通过。如何作结论，由主席、林总和常委来决定。报告可能有个别的改动，但不用通过的形式。如何传达，中央将有一个规定，以发下的正式文件为准。现在可以在高级党委先讲，传达的范围将是县团以上。文件有很多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不必传达，只传达工作小组的报告，有的文件可重印。<sup>【196】</sup>

#### 四、对罗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意见

京西宾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彭真均对会议及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予以肯定。周恩来称：

---

【196】 见唐平铸工作笔记。△为字迹未能辨认。

这个会开得好，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林总揭发了罗的反党问题，主席亲自抓了这个问题。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家。他有修正主义思想，他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他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必然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反对突出政治。个人主义到了一定气候就要向党伸手。

主席提出接班人的问题，在车上同罗说了这个问题，我们得到教育。主席想到全世界，想到后代，是个伟大的思想，还想出大小三线、地方武装、战略方针。罗听到了这几条，得到法宝，到林总处要他让贤，不能等待了，逐步升级，自然流露。大比武外出十三次，原子弹爆炸他都不回来，别有所好。另外搞一个东西，得意忘形，正中下怀。他把主席的伟大思想当作他肮脏的个人欲望，到了一定时候就向党伸手。

我支持这个会议，讲一点历史教训……。

解放后六年一次，高饶、彭黄、罗。当时搞宪法，高岗想当部长会议主席，夺权。主席要到第二线，少奇到了第一线，他就向党伸手（53年）。彭黄是在党遇到困难时，总理不在话下，直接与主席较量。彭德怀59年周游列国回来，在庐山会议，时机到了就伸手。这次是在64年，主席讲了接班人，罗瑞卿得意忘形，他就伸手了。他对林总是敌对的，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党。

解放后是三次。这次是革命力量大发展，帝、修、反在挣扎，结合在一起。这个斗争要看长不看短，要看大不看小。主席讲大小三线、全民皆兵、备战备荒为人民。罗这个野心家掩盖不住个人的欲望，他不是突然的，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他在“遗嘱”中要老婆孩子相信党，自己却不相信。自杀是反党行为，两封信就是反党。党是很信任他的，给他很高很大的职务。常委是有责任的。我们接触多，没有察觉出来。彭德怀有不同意见还可以保留。罗自杀不仅是向党示威，还说明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双脚下地是不是自杀，还要继续查。【197】

彭真称：

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其实他一跳就作了结论。目的是为了消毒。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军队，军队一定要掌握在忠实于党的人手里，决不能掌握在罗那种人手里。用这件事作反面教员来提高我们的觉悟，把我们头脑武装起来。这个会开得好，方法好，领导得好。有人说太文了，我们是抓大

【197】 见唐平铸工作笔记。

问题，不抓细节，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严肃性。材料不可靠的就不要，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罗善于造谣、抵赖，在铁的事实面前他无法抵赖。我们这样做，不是怕伤了他，而是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处理党内问题的方针、政策和作风。我们的事实根据够不够，会不会有点出入，有一点出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主要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可靠的，错不了的。将来是不是罗会说冤枉了他，我看不冤枉他。说他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说他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品质恶劣、逼林总让位、篡军反党，是不是事实，这些问题也是逐步升级的。他能推翻哪一条，我们可以取消。但是根本的、主要的问题，恐怕是准确的……。

胜利以后党内出了不少问题。六年一次，有点偶然性，但也是必然的。它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一百年，几百年都会有。罗的错误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过渡时期主要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赫鲁晓夫、铁托……都是资产阶级的。吴晗这个人反党的，我和老虎在一块睡觉，也未察觉。阶级斗争反映在各个方面，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战无不胜的。<sup>[198]</sup>

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邓小平执笔）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情况及《中央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一并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sup>[199]</sup> 信中就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称，“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问题，4月8日已经结束小组会议，工作小组起草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征求了会议各同志的意见，没有采取会议通过的方式。现将这个报告和中央批语草稿送上，请你看看是否可以。我们已在会议上宣布，这个报告须经主席、常委和林彪同志审阅后定稿。”<sup>[200]</sup> 4月14日，毛泽东复周、邓、彭：“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毛对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作了精心修改，对《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则没有改动。

4月24日，在毛泽东主持的批判彭真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当天，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联名致函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揭发“彭真同志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信的开头即称：

【198】 见唐平铸工作笔记。

【199】 《彭真年谱》第四卷，页480。

【200】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页38。



最近在北京召开的揭发、批判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错误的小组会议，根据主席、中央常委确定的方针，在恩来、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在到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彭真同志在会议过程中，特别是在会议将近结束，工作小组草拟向中央、主席的报告的过程中，态度极不正常。他作为具体领导这个会议的领导小组成员，不仅不贯彻执行主席、中央常委的方针，支持大家彻底揭发批判罗瑞卿错误的斗争，相反，他却采取种种手法，限制、阻挠会议的进行，为会议规定了许多清规戒律，束缚群众的手脚，给会议泼冷水，并且千方百计为罗瑞卿的错误开脱。表面上他是代表中央具体领导会议工作，实际上他是假积极真包庇，是打着红旗破坏会议。

5月16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的同一天，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省部级以上党委、党组及解放军总政治部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批语，为罗瑞卿作了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意见，全文如下：

现将中央工作小组四月三十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转交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

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次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耐心教育和严肃批判。罗瑞卿同志不仅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于三月十八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错误的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的检讨，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事实上，罗瑞卿最后是被毛所指挥的全党全军高层所打倒的。惟回过头来看，在罗瑞卿的问题上，不能不说毛林之间隐含着某种政治的交易：林彪要看毛是否会为他而牺牲原本最为亲信的“大警卫员”罗瑞卿，以此考验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倚重到什么程度；而毛则以拿掉罗来显示对林的最大信任和迁就，以换取林彪对扳倒刘少奇的全力支持。况且，在政治舞台上日渐炙手可热的军委第一副主席与低了一个层次的军委秘书长之间权衡，毛必然只能选择前者。

## 第十二节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 一、通过中共中央《通知》

依照毛泽东4月间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作出的部署，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当时仍在杭州，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情况则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集中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人的错误，讨论并通过已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

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董必武、陈毅、李富春、彭真、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候补委员5人：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列席63人，主要为在京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准备重新设立的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军队列席的12人（包括“文件起草小组”成员2人）：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军委副秘书长、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军委副秘书长<sup>〔201〕</sup>、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副主任、“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刘志坚，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文件起草小组”成员陈亚丁，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北京军区第二政委廖汉生。

出席与列席人员除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外，分为三个小组，每个小组各25人。第一组组长李富春，副组长江青（未参加会议）、张春桥；第二组组长李雪峰，副组长王任重；第三组组长叶剑英，副组长刘志坚。

5月4日，会议开幕。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讲话，说明会议的开法。康生说明毛泽东对通知草稿的修改情况。5月5日下午，第一次座谈会。由叶剑英主持，

【201】 中共中央1966年3月6日批准。

康生介绍情况。5月6日上午，第二次座谈会。由李富春主持，康生继续介绍情况。5月6日下午，第三次座谈会。叶剑英主持，张春桥介绍《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过程。5月7日上午，第四次座谈会。李富春主持，陈伯达介绍情况，谈彭真在历史上的错误。5月7日下午，第五次座谈会。李雪峰主持，萧华介绍情况，谈彭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和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错误。

萧华在谈及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表现时，称彭真“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萧向荣、梁必业等极不正常的关系”，“对杨尚昆的问题，办了两年没结果，就是因为彭、罗自己有鬼”，“到会同志对罗越权越位对地方工作横加干涉，横行霸道，很有意见，揭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富春、陈毅、先念、震林、富治等同志对罗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sup>[202]</sup>

萧华在发言中还称：“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最近几年来，主席又反复地提醒我们说，党内是不太平的，党内出了乱子怎么办？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并一再问大家，他的这些话传达下去没有？去年上海会议后，主席又问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sup>[203]</sup>

5月10日至14日，各小组以小组会形式，讨论中央通知稿及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5月16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通知》（该《通知》后按通过日期习称为“五一六通知”）和同意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下午为小组会，杨成武在第二组发言批判彭真。杨讲了三大点：第一，彭真在晋察冀的错误；第二，彭真在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第三，彭真极力插手军队工作。<sup>[204]</sup>

“五一六通知”开头即称，“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202]** 中发[66]267号中共中央文件附件三：《萧华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20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17。

**[204]** 1966年5月19日，中共中央《通知》以中发[66]267号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党内。该文件有六个附件，其中附件一《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及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与《通知》一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附件三《萧华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附件四《杨成武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附件五《关于彭真同志在国际活动中的王明路线（刘宁一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及附件六《关于彭真同志错误的一批材料》于6月19日发到地委和军队师一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干部。

毛泽东于4月在杭州为《通知》所加写和改写的两段涉及“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重要文字，也毫无悬念地被会议一致通过：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发动。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两段话清楚地表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不仅要冲击到整个文化领域，同时还涉及“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军队揪出罗瑞卿，仅是开了个头，以毛泽东的说法，战斗未有穷期！

## 二、林彪与周恩来的讲话

5月18日，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林彪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

林彪在讲话的前半部分，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大量事例，尤其针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问题，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反革命颠覆”作了阐述。在讲话的后半部分，林彪强调了全党“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强调“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

林彪在讲话前半部分的开头即称：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

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林彪在讲话前半部分提及：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林彪特别提及：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在讲话后半部分，林彪称：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sup>【205】</sup>

林彪大讲防政变问题的本意，是渲染彭、罗、陆、杨问题的严重性，为毛泽东的做法背书。但他如此耸人听闻地谈政变，并揭了毛处理有关问题的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安。会后，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表达了自己的疑虑。六年后的1972年，毛的这封信成了批判林彪的武器。

5月21日，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周恩来发言，讲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sup>【206】</sup>在讲到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时，周恩来称：“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周恩来又称：“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领导军队造（反）革命反的人，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代传下去。……彭、黄、张事件发生在我们国家里遇到暂时困难，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彭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彭、罗、陆、杨的问题，早有察觉，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有中央信任各霸一方，对彭是逐步认识的，对罗也是逐步认识的，罗是林总发现的，彭也是林总发现得最早，林总在东北讲的三句话最生动，最形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两面三刀，没有章法，本质

【205】 林彪这一讲话，经四个月的润色，迟至1966年9月中旬才以中发[66]500号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县团级党委。形成文件的讲话，当有相当部分并非原话。

【20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页32。

是政治掮客，投机分子。他们是在国内外形势大好的时候搞起来的，他们三人在党内地位相当高的，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因林彪病），彭实际上是第二书记，邓小平对他很放手，为什么他还要伸手，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从最近二十三条下达后，彭打出反左的旗号，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条黑线，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sup>【207】</sup>

在讲到保持晚节问题时，周恩来称：“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像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sup>【208】</sup>

### 三、叶剑英成为军内人事调整的大赢家

5月23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主要是批评朱德，并通过对彭、陆、罗、杨的组织处理及一些人事安排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四）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五）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

通过上述决定，叶剑英成为军内人事调整的大赢家。他的实际作用，超过了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甚至超过了党内地位比他高但在军内已无实权的贺龙。

【207】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1967年12月5日。

【208】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1967年12月5日。

5月24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sup>【209】</sup>

5月25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邓小平作长篇发言，就毛泽东批评中央书记处是独立王国及自己对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作自我批评。<sup>【210】</sup>

5月26日上午，周恩来主持全体会议。刘少奇发言，“谈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文化革命的意义等问题，并作了自我批评，他在谈到对文化革命的认识时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sup>【211】</sup>当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

5月28日，中央以中发[66]281号中共中央文件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至各中央局、省部级以上党委、党组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并要求将此通知发到县、团级以上党委。军队系统参加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是刘志坚（任排名第三的副组长）和谢镗忠（任排名第一的小组组员）。据刘志坚后来称，刘、谢两人是叶剑英提名的。<sup>【212】</sup>

### 第十三节 “五七指示”

#### 一、毛泽东的“五七指示”

1966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以中央名义，转发了毛泽东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

【209】《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6年5月25日发出。

【210】《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页1915。

【2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638。

【212】《风雨征程》，页244。



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sup>[213]</sup>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后按写信日期简称“五七指示”，广为人知。所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本来不过是一件一千一百多字普通的工作简报，毛泽东借题发挥，洋洋洒洒一大通，将其赋予了特别的政治含义。

中共中央在转发通知中高度评价毛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不仅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可能的进攻，加强国防、贯彻人民战争思想方面，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213】《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1966年5月7日。中发[66]271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6年5月24日发出。



驻牛田洋陆军第一二二师官兵欢呼毛“五七指示”发表，1966年5月。

文件原规定仅发至县、团级党委，不登党刊。1966年7月31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同意湖南省委的建议：将中央转发的《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像一九五九年主席的六条指示信（党内通信）一样，印发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的基层支部中去，直接向广大党员和群众宣读，并认真组织讨论。文件由支部委员会负责保存，经常检查执行情况，每年向群众宣读和组织讨论一次或两次”。<sup>【214】</sup>

8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发表纪念建军三十九周年社论。社论同时用黑体字公开了经过文字修饰的“五七指示”的主要内容。《人民日报》社论称：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

【214】《关于印发“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的通知》，1966年7月31日。中发[66]389号中共中央文件。

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就可以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大大加强我们的战备工作。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我们，就会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

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来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办事的，现在还在不断发展提高。解放军是最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全国的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学校、商店、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要以解放军为榜样，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sup>【215】</sup>

## 二、滥觞于毛青年时代的乌托邦思维

“五七指示”是毛泽东逆社会发展潮流的、军事共产主义思维的产物。其思想根源，滥觞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信仰。

毛泽东早于1919年便服膺于“新村生活”的构想。所谓新村主义，原为二十世纪初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所提倡，武者小路实笃心目中的“新村”，人人平等，人人劳动，财产公有，各取所需。1919年12月，毛泽东将其草拟的新村计划书中的一章——《学生之工作》发表于《湖南教育月刊》。毛的新村，是从创造新学校始，“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新学校中的新学生，为创造新家庭之成员。“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举其著者，如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

---

【215】《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1966年8月1日。

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毛泽东还认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sup>[216]</sup>

青年毛泽东要将其乌托邦式的新村计划试验于“湘城附近”，无论有无去试验或试验成功与否，均无伤大雅。问题是四十年之后，毛泽东已是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的“伟大领袖”，一旦要将全国都作为实现他那些花样翻新的乌托邦式理想的试验场，破坏力不可谓不惊人。

新的乌托邦，叫人民公社。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称：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sup>[217]</sup>8月29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在决议稿上加写了一段话，内称：“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质量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sup>[218]</sup>

毛泽东不仅要求普遍推广人民公社，而且还要求推广军事化的民兵师组织。1958年9月，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谈话时称：“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sup>[219]</sup>军事化与人民公社化伴随而生，11月10日毛泽东批示要“研究一下”的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的报告中也说：“这里的劳动组织

【216】 胡长水、李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页124。

【2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页318。

【2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360。

【2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430。

完全按军队那样编成连和营，劳动是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很严，为突击收秋种麦，还组织了一个野战部队，在地里吃饭宿营，是劳动中的一支突击力量。”<sup>【220】</sup>

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一个利用行政性权力，超越社会发展的现实阶段，赋予强烈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和军事共产主义形式的畸型混合体。到了1959年，人民公社的名称虽还保留（且一直存在到文革后的1984年），但实质内涵已有极大变化，供给制、公共食堂、免费吃饭等等已不能再实行，所谓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狂妄计划，只不过给历史留下了一个笑柄。始料未及的是，1964—66年初国民经济刚刚有所恢复，日子刚刚好过了几天，毛泽东头脑中左的一套又故态复萌，“五七指示”，就是承继和发展了人民公社运动极左的空想社会主义——军事共产主义思维的典型。“五七指示”中军事共产主义的色彩，更甚于人民公社化时期，其中体现出来的毛的“理想社会”模式，更接近于试图将整个中国社会工、农、学、商各行各业全面纳入一个划一思想、划一意志的军事化大兵营（美其名曰“大学校”），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样一个社会模式，其实不就是与社会法西斯主义距离很近吗？！

### 三、事实证明毛的“理想社会”此路不通

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是由部队从事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而作出的，林彪的内心是否支持毛的主张，不得而知。从现有的史料看，林彪对部队生产问题仅作过一些具体的、不带毛式理想主义色彩的指示。如1966年8月10日，许世友向林彪汇报工作时提出，要求调陆军第一七九师三个步兵团参加围湖农业生产劳动两季，或者另给他九千人的定额，和过去拨给他的五千人数编成一个师，专门参加围湖和农业生产劳动。林彪有保留地答复称，同意调部队去参加围湖劳动，但倾向于部队轮流参加这个生产劳动，不要拨定额专门组织部队，这样会增加军队定额。华东方面现在没有什么大的情况，可以放手生产，不要紧，不同于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许世友又提出，部队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时间如何安排？林彪称，部队政治训练时间应当增加。比如步兵，可以用更多的时间进行政治教育，因为步兵容易学，技术不复杂。怎样具体安排，由总政治部研究提出一个方案。技术兵种，如海、空军和陆军的技术兵，也要增加政治教育时间，但是，军事技术训练的时间，要比步兵多一些，要保证有足够的时间，他们可以少搞一些生产。<sup>【221】</sup>

【2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523。

【221】南京军区《当代中国》军事国防卷编辑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部及其领导同志对南京军区的指示选编》，1986年，页441-442。

毛泽东这类军事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倒是并非军人出身的张春桥曾在1958年就阐述过并得到毛的赞赏。当时张春桥写了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认为：“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张春桥还称：“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张春桥美化战争年代军队的供给制，并要将其作为一种制度延伸至和平年代的全社会，其思想之“左”，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春桥该文1958年9月在中共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发表。毛泽东看到后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加编者按称，“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目。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sup>【222】</sup>

毛泽东对张春桥的一贯赏识，不由得令人产生联想：毛一直认为张的思想与他接近，是不是毛泽东晚年试图“换马”，要抛弃林彪这位毛认为已是尾大不掉的“接班人”而换上张春桥的一个原因呢？

就在毛泽东津津乐道他那限制并消灭商品生产、将原始共产主义式的所谓“公平”作为最高目标，不以社会效率为价值取向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想国”的当月，中国实际上已揭开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国家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相反，同一时期的西方各国，却是另一番气象。一度被认为是“垂死”、“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其经济正经历一次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以毛泽东的所谓“理想模式”改造中国，事实证明，此路不通！在整个1960—1970年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西方各主要国家大大地拉开了距离，个中缘由，值得反思。

---

【222】《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 第十四节 首都工作组成立与北京卫戍区扩编

### 一、首都工作组成立

5月1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周恩来、叶剑英依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sup>[223]</sup>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sup>[224]</sup>

从首都工作组的组成人员来看，其为一跨军、地两方，跨党、政系统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的高层次协调性机构。半年多以后，周恩来在两次与群众代表谈话时特地解释了首都工作组成立的缘由。1967年1月21日，周恩来称：“我总想向你们说一个问题，一直没时间，去年三、四月份罗瑞卿的问题被林副统帅揭发出来，后来彭真的问题也揭发出来了，首都安全问题也被提出来了。主席上半年没回来，就是因为不安全，主席在北京总的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搞四大、搞大串连，就有秩序，既有民主又有集中，首都警卫部队要加强，要保卫中南海、钓鱼台、人大大会堂，保卫首都的机要地点、电台、尖端要害部门，要保卫首都的安静，要把过去公安、保卫系统掌握的地、富、反、坏分子清洗出去，根据主席指示，林总提议成立一个北京工作组，准备处理这个问题，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步骤是首先从中南海开始，杨尚昆在中南海搞了廿多年的警卫，中南海首先是不安全的，我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先把中南海的问题解决了，……为了首都的安全，五月中央扩大会议，调来了部队，加强卫戍，使主席十次接见红卫兵都没出大乱子。只有一次组织工作不够好。三次在街上接见也没事。加强守卫，还要在人民中宣传，人民绝大多数拥护党和毛主席，党和毛主席有极高的威信。但是机关、工厂、公安部门准还有坏人，当然他们很少，很不甘心失败，一方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经济主义，矛盾上交，把人集中到北京。”<sup>[225]</sup>

【223】李雪峰，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兼政委，1966年5月23日起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办警卫局局长，1955年授衔少将。周荣鑫，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郑维山，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中将。傅崇碧，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66年5月北京卫戍区扩编后兼司令员，1955年授衔少将。万里，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苏谦益，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224】《周恩来年谱（1898—1976）》下，页31。

【225】周总理接见科学院及各单位代表谈话纪要，1967年1月21日。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中央首长讲话（1）》，1967年3月，页191。

1967年1月27日，周恩来又称：

关于首都工作组，是在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发现后，主席感到首都的保卫很重要，责成我管这件事，组织了首都工作小组，由军区，公安部，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和其他一些部门组成。

任务：

1. 保卫中南海安全。
2. 保卫首都，增强卫戍力量。
3. 保卫要害部门，如中南海，钓鱼台，国防部……等。
4. 为保护首都安全，把黑户口、五类分子搞走。
5. 处理外国侨民中一些不受欢迎的人。

以上五条，六月初向主席汇报，主席对第四条原则上不太赞成。主席提出：把矛盾上交中央，中央怎么办，矛盾下放到公社没有土地也不好办，交到其他省，是以邻为壑，还是自己消化。

这个指示，我已通知首都工作组，但因工作人员的问题和当时红卫兵运动的迅速发展，有的单位没有传达下去。现在各单位在查封黑材料中，如果发现有时排的黑户口、五类分子名单，要鉴别开来，封存起来。<sup>【226】</sup>

周恩来的两次讲话，起码传递了以下五项信息：

1. 首都工作组是因应彭、陆、罗、杨事件而成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2. 毛泽东1966年上半年没有回京，是怕首都“不安全”。首都工作组的成立，是根据毛泽东指示，林彪提议，毛泽东“亲自批准”的，毛泽东责成周恩来管这件事。林彪“五一八讲话”重点提出防政变事出有因，是对毛指示的诠释。

3.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的首要工作，是“保护中南海安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先把中南海的问题解决了”。

早于196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中办机要局局长李质忠分别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原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免职。1966年5月，怀疑与海外有联系、外泄机密而被令停职反省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自缢身亡。主管中央档案事务的副主任曾三停职审查。6月，周恩来亲信、国务院副秘书长（前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调任中办第一副主任。8月，

---

【226】周总理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讲话摘要，1967年1月27日。《一月革命风暴》，1967年，页438。



成立中办政治部，将中办的组织人事统归其管理，调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sup>〔227〕</sup>为中办政治部主任。

4. 其次，“保卫首都，增强卫戍力量”，“首都警卫部队要加强，要保卫中南海、钓鱼台、人大大会堂，保卫首都的机要地点、电台、尖端要害部门”。

仅以电台保卫方面来说，周恩来作了一系列布置。早于1966年1月14日，周即约丁莱夫、杨成武、徐子荣谈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问题。3月27日，周在杨成武、王尚荣、吕展及丁莱夫等陪同下，检查广播事业局大楼安全警卫情况。3月28日及4月12日，周分别检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位于北京市郊的两个发射台的安全警卫工作。4月8日，拟调广播事业局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陆军第六十三军参谋长王寿仁抵京履任，5月30日，王被任命为广播事业局副局长。5月14日，周指示广播事业局代管北京市台。5月27日，公安部队司令部作出《关于加强广播电台武装警卫情况的报告》。<sup>〔228〕</sup>

5. 再次，“要把过去公安、保卫系统掌握的地、富、反、坏分子清洗出去”，“为保护首都安全，把黑户口，五类分子搞走”，“处理外国侨民中一些不受欢迎的人”。上述第3、4项，针对党内高层，本项则是针对社会底层。

在此之前，先对公安系统内部作了清洗。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公安部和北京市一批干部的审查和任职作出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前局长冯基平和现局长邢相生及其他局领导实行隔离反省，同时任命以李钊为局长的新领导班子；对公安部技侦局局长、部党组成员狄飞实行隔离反省，公安部于6月6日宣布执行。

5月26日，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讲话称：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sup>〔229〕</sup>

〔227〕 王良恩，1964年晋升少将。

〔228〕 丁莱夫，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原陆军第六十三军政委，1955年授衔少将。徐子荣，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吕展，时任北京市公安总队总队长，1965年晋升少将。王寿仁，1965年大校军衔。

〔229〕 《周恩来年谱（1898—1976）》下，页33。

首都工作组的日常运作班子，主要由军队人员组成。以总参谋部作战部人员为主，组成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办公室下设7个小组和若干分组，由总政、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公安部和公安部队等单位抽人参加。办公地点开始时设在京西宾馆，随后迁至军委办公厅所在地三座门。<sup>【230】</sup>

有关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下设的7个小组具体情况，据一位参加首都工作组工作的总参作战部参谋介绍称：

1. 部队指挥组。“主要负责有关警卫部队的调动，首都重要目标的警卫，派遣警卫部队执行各种临时性的任务等。”“后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组织指挥工作也归这个组管。”这个组全部是总参作战部抽调的人员。

2. 治安组。“主要负责社会治安工作，清除和整治各种不安全因素。这个组主要由公安部有关部门派人组成。”

3. 枪支弹药清查组。主要负责对军队、地方个人、单位使用、保存的所有各种枪支弹药进行登记、管理。这个组主要由总政保卫部和公安部人员组成。

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在首都进行枪支弹药登记、管理的通知》，对清查登记的范围、枪支弹药管理和使用原则、清查登记工作的组织领导等作出了具体规定。通知称成立以谢富治为组长的各有关方面负责人组成的清查登记领导小组，按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军队、华北局、北京市公安局五大单位，分别成立清查登记小组，开展工作，限于7月15日前完成。<sup>【231】</sup>

4. 电台组。“主要负责对地方团体（包括体育训练用无线电）和民间各种无线电收发机的清查、整顿工作。”

5. 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这项工作主要是通过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具体组织实施。”<sup>【232】</sup>

6. 监狱、看守所。“主要负责北京市各监狱、劳改场、拘留所和看守所临时关押人员的安全警戒和清查、清理、整顿工作。”

7. 外事、侨务组。“主要负责各国驻京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安全警卫工作；负责北京华侨的清查和安全工作。”<sup>【233】</sup>

---

【230】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史》第二册，页852。

【231】 《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年，页304-305。

【232】 这项工作，其实就是周恩来所说，“要把过去公安、保卫系统掌握的地、富、反、坏分子清洗出去。”

【233】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一个工作组成员的亲身经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页96-98。

首都工作组成立之初，权力很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曾经发文声称，“北京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的指挥权，必须集中于首都工作组。”惟随着北京卫戍区扩编完成、北京新市委成立以及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活动的结束，首都工作组的作用日渐式微。1967年2月，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停止办公，有关工作由总参作战部办理。<sup>【234】</sup>

## 二、北京卫戍区扩编

1966年3月前，北京市的警卫工作统由公安部队负责，北京卫戍区虽在北京军区的争取之下得以保留，<sup>【235】</sup>惟仅负责北京市的民兵工作，负责首都的战备工作和一般卫戍勤务工作及负责指挥几年一次的阅兵和每年五一节、国庆节司礼的组织工作等，辖下并无团以上部队建制。

2月4日，中央军委下达“组建北京卫戍区独立团”的指示。3月2日，北京军区命令：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番号称“北京卫戍区独立团”，组建后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护社会治安等任务，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北京军区责成六十三军负责组建该团。该团编制员额1,500人，代号4885部队，3月27日移交北京卫戍区，3月29日进驻北京南苑西营房。文革初期，北京有所谓贺龙、彭真要搞“二月兵变”的传闻，即为组建该团初期曾有意借北京市的大学房子临时使用，学生牵强附会、捕风捉影所引致。其实，组建工作与贺龙、彭真毫无关系，一个仅有1,500人的新组建团，又如何能够“兵变”？

1966年2月毛泽东决定撤销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后，<sup>【236】</sup>为北京卫戍区的前景带来新转机。撤销公安部队番号后，在北京地区的两个师一级警卫部队（首都警卫师及北京市公安总队），必然要转隶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

5月18日，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陆军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和陆军第六十五军第一九三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区司令员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阅后批示：照办。<sup>【237】</sup>

---

【23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史》第二册，页853。

【235】1963年2月6日，军委第168次办公会议曾提出考虑将其改为北京市人民武装部。

【236】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编史办公室：《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大事记（1949-1994）》，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页154。

【237】《周恩来年谱（1898-1976）》下，页31-32。后北京军区决定调入的部队有所变化，原拟调陆军第一九三师改为调入陆军第七十师。



二、部队的建制、领导关系改变后，警卫师和北京公安总队的番号，分别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一师和警卫第二师；第一八九师番号不变，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九师。

希北京军区、北京市卫戍区、公安部队司令部，立即对部队进行整编的政治动员，迅速办理各项交接工作。在整编交接工作中，公安部队司令部和北京市卫戍区应密切协同，保证交接好。有关问题应及时请示首都工作组，一切行动应严格遵照首都工作组的指示执行。<sup>【238】</sup>

6月3日，周恩来批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所提的首都警卫部队的部署调整方案，请即组织实施。根据该方案，担负首都警卫任务的4个师，以2个师又1个团担负重要目标警卫，以2个师欠1个团担负机动支援任务。

同日，首都工作组和北京军区在京西宾馆召开北京卫戍区部队营以上干部大会。周恩来和军委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副主席，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和北京军区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并宣布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卫戍区扩编的命令；叶剑英和杨成武讲话。叶剑英讲话摘录如下：

今天的大会，是一个隆重庄严的大会。总理，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以及北京军区的负责同志，都来参加和作指示，对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

在今天的会议上，将由杨代总长向到会同志，并通过你们，向首都卫戍部队全体指战员，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军委给予你们的保卫首都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所在地，是领导全世界人民反帝、反修、反对一切反动派的总司令部的所在地。现在，全世界都注视着北京，一切革命人民把北京看作是他们的希望，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则把北京视作眼中钉。我们保卫首都，就是保卫世界人民革命的根据地的中心，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就是保卫伟大的革命旗帜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的导师。保卫首都不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破坏和颠覆，就给世界革命人民以最大的鼓舞和信心。

.....

为了保卫首都的安全，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加强首都卫戍部队，除了原来的部队，又增加了2个师另1个团。这几个部队各有特长，有的熟悉警卫勤

---

【238】 中央军委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的命令，1966年5月27日。

务，有的善于野战。为了把任务完成的更好，你们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同时，还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要向全体同志讲清楚，这种调整是必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保卫首都的任务。

首都增加了警卫力量，经过适当部署和必要的调整，再参加一个时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更加落实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我相信，困难一定能够克服，光荣的任务一定能够完成。<sup>〔239〕</sup>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电示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单位，并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为了加强首都卫戍工作，确保首都安全，经中央批准，在北京军区建制内成立北京卫戍区，已于6月1日正式组成，并开始办公。今后，驻京各单位有关警卫工作，以及北京市区民兵的组织、训练、指挥和武器弹药的分配管理等，一律归北京卫戍区负责。<sup>〔240〕</sup>

北京卫戍区组建后为军级单位，司令员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兼任，第一政委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兼任（1966年7月后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兼任），第二政委黄作珍，第三政委刘绍文，第四政委刘福，副司令员石志本、李钟奇、潘永堤、张西帆、钟辉琨、曾绍东，副政委张廷桢、范普权、白儒生，参谋长商正因，政治部主任周树青。<sup>〔241〕</sup>

6月15日，军委命令：

为了加强首都的警卫力量，兹决定：

一、自1966年6月3日起，将陆军第二十四军第七十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由北京卫戍区领导、指挥，担负首都地区的警卫任务。

二、部队的建制、领导关系改变后，陆军第七十师番号不变，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七十师。

三、北京军区对部队应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迅速组织第二十四军、北京卫戍区办理各项交接工作。在交接过程中，必须大力突出政治，认真抓好活

【239】中央军委叶剑英副主席在首都卫戍部队营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6月3日于京西宾馆。

【240】其实，北京卫戍区早已存在，这里所指似应为完成扩编后执行警卫任务的新北京卫戍区。

【241】黄作珍、刘绍文、石志本、李钟奇、钟辉琨、张廷桢，1955年授衔少将。刘福，1962年晋升少将。范普权，1964年晋升少将。潘永堤、张西帆、白儒生、曾绍东、周树青、商正因，1965年大校军衔。

思想，密切协同，保证交好接好。有关问题应及时请示工作组，一切行动应严格遵照首都工作组的指示执行。<sup>【242】</sup>

6月16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批复北京军区，同意6月1日所报北京卫戍区编制方案。军委决定将2个警卫师、2个步兵师划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后，北京卫戍区直接领导4个师、1个独立团、18个区县人民武装部和两办（国家机关民兵办公室、中央机关民兵办公室）、三局（地下铁道工程局、华北铁路工程局、北京铁路局）的人民武装机构。为适应任务需要，北京卫戍区机关、直属单位共编938人。

6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重申北京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的指挥权的规定，全文如下：

近来，发现首都地区有些单位或个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过程中，擅自指挥调动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这种做法，极易造成混乱，有碍首都治安。

为了确保首都安全和首都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特重申，北京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的指挥权，必须集中于首都工作组。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的任务部署和指挥使用，都必须经首都工作组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决定，由北京卫戍区具体组织实施。

以上仰即教育所属严格遵行。<sup>【243】</sup>

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的4个师简况如下：

#### 1. 警卫第一师

原称首都警卫师。1966年5月前，除仍保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番号、建制属北京军区外，该师的指挥使用、训练和部队一切日常工作均由公安部队负责。1966年6月1日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番号改称警卫第一师，代号4874部队不变。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团，代号依次为4876、4877、4878、4879、4716部队，负责北京市西半城和西部郊区的警卫任务。

#### 2. 警卫第二师

原北京市公安总队。1966年6月1日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番号改称警卫第二师，代号编为4510部队，原总队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团番号依次改称警卫第二师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团，代号依次改称为4511、

【242】 中央军委关于陆军第二十四军第七十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的命令，1966年6月15日。

【243】 室编[66]70号中央绝密文件，1966年6月19日。

4512、4513、4514、4515 部队（驻黑龙江省执行任务的第四团暂仍沿用原番号和部队代号），负责北京市东半城和东部郊区的警卫任务。

### 3. 陆军第七十师

1966 年 6 月 15 日，军委电令，决定自 6 月 3 日起，将陆军第二十四军第七十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建制和领导关系改变后，陆军第七十师番号不变，代号 4561 部队不变。师下辖机械化步兵第二〇八团（4562 部队）、第二〇九团（4563 部队）、第二一〇团（4578 部队）、炮兵第三五〇团（4579 部队），坦克第二七五团（4581 部队）和高射炮兵团（4580 部队）及直属分队，师部仍驻北京市顺义县城，负责北京北部郊区警卫任务。<sup>【244】</sup>

### 4. 陆军第一八九师

1966 年 5 月 27 日，军委电令，决定自 6 月 1 日起，陆军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建制和领导关系改变后，陆军第一八九师番号不变，代号 4768 部队不变。5 月 31 日至 6 月 3 日，第一八九师从石家庄市获鹿县进驻北京，师部驻长辛店。下辖步兵第五六五团（4792 部队）、第五六六团（4614 部队）、第五六七团（4883 部队）、炮兵第五六九团（4617 部队）和坦克自行火炮第三九四团（4890 部队），以及师属高炮营、工兵营、通信营等，负责北京西南部郊区的警卫和对首都的支援任务。<sup>【245】</sup>

毛泽东并不讳言，所谓“保卫首都”，其实是针对彭真的。正如 1967 年 2 月他会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所说，“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到处保卫。”<sup>【246】</sup>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下了很大的工夫，在军事方面做了三件事：第一，加强对军权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刻意拔高林彪，解决罗瑞卿问题，以争取

【244】 1969 年 12 月 19 日，北京军区电示，根据中央军委电令，陆军第七十师改称警卫第三师。所属团番号亦作相应改变。

【245】 1969 年 12 月 19 日，北京军区电示，根据中央军委电令，陆军第一八九师改称警卫第四师。所属团番号亦作相应改变。

【246】 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的谈话（节录），1967 年 2 月 3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上册，1981 年，页 173。北京卫戍区扩编前，原首都警卫师负责中央系统，北京市公安总队负责北京市系统，由于中央和北京市两个系统是插花居住，故两个师也是交叉部署，混布全市。北京卫戍区扩编后，调整为警卫第一、第二师各负责西、东半城及西、东部郊区。



军队的全力支持；第二，更换中央办公厅主要领导，解决杨尚昆问题，由汪东兴取代，控制中枢及中央警卫部队，防止祸生肘腋之下；第三，成立首都工作组，严格规定北京军队调动权限，并对京畿地区军事部署做了调整和加强，以防不测。这些行动，旨在发动文革、清洗政敌之前，消除可能存在的隐患，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透露，毛为这件事多少天没睡好觉，用了几个月做这件事，这是“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这是大实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深谙权术，其政治斗争谋略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 第十五节 撤销公安部队，启用第二炮兵番号<sup>[247]</sup>

### 一、撤销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

1966年2月22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接见叶剑英和杨成武时指示：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

中共建政之后至1966年间，公安部队体制历经多番变动，共经历了五个时期：（1）自1949年10月至1955年7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时期。军委组建了公安司令部，统一全国公安部队的领导。（2）1955年7月到1957年8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时期。1954年12月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对公安部队进行整编。翌年5月后，公安部队的番号改称公安军，各大军区设公安军司令部。全国专、县公安部队全部移交公安部门，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3）1957年9月至1958年12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备部时期。1957年1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公安军的军种番号，将其领导机构缩编为总参谋部警备部，这次整编以后，执行公安保卫任务的部队绝大部分移交地方公安机关。（4）1959年1月至1963年1月，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时期。总参警备部与原公安部十六局合并，改为公安部四局（武装民警局），省、市、自治区设人民武装警察总队。部队改编后的番号统称人民武装警察，原部队的番号和师部的领导机构撤销。1961年11月，公安部党组就改进人民武装警察领导体制问题，专题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央批示：人民武装警察番号可不改变，建制仍属公安机关，领导体制改由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实行双重领导。（5）1963年2月至1966年6月，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时期。1963年1月2日，周恩来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的决定。1月16日，军委、公安部发布命令，自1963年2月1日起，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改称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其建制和领导关系不变。

<sup>[247]</sup> 本节内容除另有注明外，主要参考：《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大事记》，页154-156；第二炮兵：《第二炮兵史（1957-1988）》，北京，1992年。不再一一加以注明。

实践证明，双重领导体制，适应当时的需要，符合公安部队的性质、任务和特点。然而，在“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巨大阴影之下，毛泽东显然对这种双重领导的体制放心不下，为此，不惜将此稳定了五年的体制又重新拉回到建政初期的状态，将公安内卫部队与国防军混为一体，将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

1966年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第407次会议，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康生等出席，谢富治、林枫<sup>[248]</sup>、叶剑英、杨成武、萧华、汪东兴等参加。会议决定：“经请示主席批准后，决定撤销公安军这个军种。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撤销后，分别划给各军区管辖，城市可留一部分警备司令部指挥。具体问题，由杨成武同志和谢富治同志商办。”

5月16日至22日，公安部队党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总队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中央和军委的决定，部署贯彻执行办法。杨成武代总长、总政治部徐立清副主任、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到会讲话。会后，由谢富治、杨成武、李天佑、杨奇清、徐立清、邱会作、李天焕<sup>[249]</sup>等人组成公安部队整编小组，负责提出整编实施方案，开始进行整编工作。

5月29日，公安部队整编小组向中央、军委报送全国公安部队整编报告称：

一、全国公安部队现有三十六万八千余人（不包括警卫师）。其中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和三所院校五千余人，二十八个省、市公安总队部队直属的一百一十二个团零二十二个营二十二万二千余人，二百二十八个专市支队、大队部及直属中队六万九千余人，二千一百九十七个中队六万余人，四十九个机场、港口检查站三千四百余人，一百零四个中朝、中越边境工作站和沿海二百四十三个边防哨所，九千四百余人。

二、（略）

三、整编方案：

1. 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总队一般可改为独立师（警备师），归省军区、警备区建制领导。其番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省军区独立师或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备区警备师。

2. 专市公安支队、大队，可根据其直属中队的多少分别编成独立团、营、连，归所在军分区建制领导。其番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省××军分区独立团、独立营、独立连。整编后，支队、大队机构编余定额充实省军区、军分区领导机关。

【248】 林枫，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249】 李天焕，时任公安部队第二政委（司令员和政委由谢富治兼任）。1955年授衔中将。

县、市公安队，原则上拨归县、市人民武装部建制领导。其番号按人数多少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省××县(市)大、中、小队。

3. 机场、港口检查站，中朝、中越边境工作站和沿海边防哨所，均拨归省军区或军分区建制领导。

4. 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和现炮兵管理××部队<sup>【250】</sup>的机构和人员合并，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领导机关。直属三所院校(在北京的公安部队学院、公安部队医科学学校和在武汉的公安部队干部学校)、一所医院的整编另作研究。

5. 公安部队划归解放军序列并归各军区建制领导后，省军区、军分区司、政、后领导机关的任务有所加重，应适当加强领导充实编制，所需定额由原公安部队编制数额内调整解决。

6. 公安部队整编为解放军后，战士的服役年限由五年改为四年，即按陆军步兵部队规定执行。

具体整编方案，由各大军区同当地党委商量提出，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批准后实施。交接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总队直接向各省军区、警备区办理。<sup>【251】</sup>

6月1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公安部队整编小组提出的全国公安部队整编报告。6月6日，中央、军委将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市警备(卫戍)区组织实施。

6月7日，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6月底前，将28个省、市、自治区公安总队(含西藏)和首都警卫师，全部拨归各大军区、省军区、北京卫戍区、上海警备区建制领导。公安部队学院、干部学校、医科学学校、总医院的整编另作研究。<sup>【252】</sup>

6月13日，公安部队党委向军委及总参、总政、总后、公安部专题报告关于首都警卫师、北京总队移交情况。报告说，根据周恩来关于北京总队应在5月底移交完毕的指示和军委有关要求，首都警卫师、北京公安总队，已于5月27日拨归北京卫戍区建制。自6月1日起，一切工作由北京卫戍区领导。

【250】 原文如此，应指导弹部队。

【251】 《军队财务史料(1966年度)》，总后勤部财务部、军事经济学院，1993年，页43。

【25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公安部队·综述 大事记 表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页327-328。

6月14日，总参谋部将各省、市、自治区公安部队的编制员额通报各大军区。公安部队共向各军区移交编制定额360,886人（实有377,613人）。<sup>[253]</sup>

6月30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总队（师）全部移交完毕，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名称奉命撤销。

## 二、整编后的新番号

7月1日，8省（区）和上海市公安部队整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批复同意新疆、内蒙古、沈阳、南京军区公安部队精简整编方案。据此新疆军区命令新疆公安部队整编为新疆军区独立师。内蒙古军区将内蒙古公安总队整编为内蒙古军区独立第二师。沈阳军区在8月中旬前，将东北3省的公安总队，分别改编为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军区独立第二师；原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军区独立师，分别改编为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军区独立第一师。南京军区于9月14日命令，将江苏、浙江、安徽省和上海市的公安部队划归军队建制，分别改编为江苏、浙江、安徽省军区独立第二师，上海警备区警备师。原江苏、浙江、安徽省军区独立师改称江苏、浙江、安徽省军区独立第一师。

7月11日，西藏公安部队整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电复西藏军区，基本同意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军区党委6月24日所报公安部队整编方案，自1966年7月1日起，撤销西藏公安总队及所属的支队、大队、县队番号，将公安总队直属第一、第二、第三营和新组建的第四营，组建为1个团，归军区直接领导，称西藏军区独立团。总队机关作为组建陆军第五十三师的基础。

7月18日，四川省公安部队整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电复成都军区6月29日请示，基本同意所提公安部队整编方案，授予以原四川省公安总队改编的独立师番号为成都军区独立师，辖3个团。

7月18日，河北和山西省公安部队整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电复北京军区7月1日、2日请示，基本同意河北、山西省公安部队整编方案，同意将河北省军区原6个独立团，合编为1个独立师，称河北省军区独立第一师；河北省公安总队，改编为河北省军区独立第二师，辖5个团；山西省公安总队，改编为山西省军区独立师，辖5个团。

7月25日，山东、福建和江西省公安部队整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分别电复济南军区7月4日、福州军区7月9日和12日请示，同意以山东省公安总队改建的独立师，称山东省军区独立第二师，原山东省军区独立师改称山东省军区独

<sup>[253]</sup> 《公安部队·综述 大事记 表册》，页164、310。

立第一师。以江西省公安总队改编的独立师称江西省军区独立师；福建公安总队改编为福建省军区独立第二师。

7月26日，云南和贵州省公安部队整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电复昆明军区7月7日请示，同意以云南、贵州两省公安总队改编的2个独立师，分别称云南、贵州省军区独立师。

8月24日，广东、广西和湖南省（区）公安部队整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批复广州军区7月25日请示，同意将广东省公安总队，改编为广东省军区独立第二师；广东省原地方武装整编的师，称广东省军区独立第一师。广西公安总队，改编为广西军区独立第二师。湖南省公安总队，改编为湖南省军区独立师。各独立师均辖3个团。另海南公安支队整编为海南军区独立团。

8月24日，河南等6省（区）公安部队整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电复武汉军区7月23日、兰州军区7月25日请示，同意所报公安部队整编方案，授予各省（区）公安总队改编的独立师以番号：河南的称河南省军区独立第二师，原河南省军区独立师改称河南省军区独立第一师；湖北的称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陕西的称陕西省军区独立师；甘肃的称甘肃省军区独立师；青海的称青海省军区独立师；宁夏的称宁夏军区独立师。

至此，共有28个总队和首都警卫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中，山西、江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11个省、区公安总队改为省军区独立师；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河南13个省、区公安总队改为省军区独立第二师；四川公安总队改为成都军区独立师；西藏公安总队直属第一、第二、第三营和已批准组建的第四营，合并组建成一个独立团，归西藏军区领导，公安总队机关作为西藏军区组建陆军第五十三师的基础。各专、市公安支队、大队，各县中队分别交由所在地的军分区和县武装部领导。北京公安总队从6月1日起改为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二师，上海公安总队7月10日起改为上海警备区警备师；驻天津市河北总队第一团改为河北省军区独立第二师第七团，仍驻天津市。

文革三支两军时期，以原公安总队整编而成的各省军区独立师部队，由于文革前和地方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倾向于支持保守派。

### 三、启用第二炮兵番号

1966年3月14日，炮兵司令员吴克华在向总参、总政并军委的报告中，反映军委炮兵机关已不能适应导弹部队发展的需要，考虑到长远建设，迫切需要建

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导弹部队。为此，建议把将要撤销的公安部队领导机构与目前炮兵机关分管导弹的部门合起来，组建导弹部队领导机关，并申明这样做，有利于新建兵种机关作风的交流，有利于机构早日组建起来，尽快开展工作，有利于不再新建领导机关的营房，为国家节省经费。

这一意见，被中央、军委所采纳。

6月6日，中央、军委同意“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和现炮兵管理导弹部队的机构和人员合并，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领导机关”的方案。关于兵种名称问题，当时总参提出的正式名称为导弹部队，对外称第二炮兵。在向周恩来汇报时，周称：“还是直接叫第二炮兵吧！”

7月1日，总参发出“公布第二炮兵番号”的通知称，“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自七月一日起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关的名称，同时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的番号。其领导机关各部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有关第二炮兵领导机关的任务、编制和与现炮兵领导机关管理××部队<sup>【254】</sup>的机构和人员合编等问题，待后另定。”

7月8日，总参在北京召开第二炮兵整编会议，会议由副总参谋长彭绍辉主持。吴克华、李天焕等有关兵种和三总部有关部门领导参加了会议，李天焕、吴克华作了汇报。会议就二炮整编问题交换了意见，确定成立以彭绍辉为组长的第二炮兵领导机关整编小组，并对下步整编工作做了安排。

8月29日，总参、总政、总后批复炮兵、第二炮兵，同意将原公安部队学院和公安部队干部学校机构作为组建第五十四、五十五基地的基础，组建工程指挥部，其番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第三〇五、第三〇六工程指挥部。同意原公安部队医科学校由二炮继续开办，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军医学校（师级）。

第二炮兵奉命组建之际，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军委只任命了第二炮兵党委成员，并未明确行政职务。1966年7月任命的二炮党委成员：书记李天焕，副书记吴烈，常委熊伯涛、查国桢、盛治华、欧阳平、严家安<sup>【255】</sup>。

---

【254】 原文如此，应指导弹部队。

【255】 吴烈、熊伯涛、查国桢、盛治华，原公安部队副司令员。欧阳平，原公安部队副政委。严家安，原公安部队参谋长。上述各人除严家安为1962年晋升少将外，均为1955年授衔少将。

直至一年后的1967年7月4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方任命炮兵副司令员向守志为第二炮兵司令员，<sup>【256】</sup>李天焕为第二炮兵政委，10月18日又任命吴烈为第二炮兵第二政委。同年9月12日，军委颁发《关于第二炮兵的基本任务和领导关系的暂行规定》。9月16日，军委下达《军委关于第二炮兵领导机关接受任务的命令》，命令称，“中央军委决定：第二炮兵领导机关自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起开始接受任务。按逐步接收的原则，做好交接工作。原属炮兵领导的各导弹基地、导弹部队、工程部队、研究所、军械仓库，即拨归第二炮兵建制和领导；属于地区性的工作，仍接受所在军区的领导。炮兵领导机关负责导弹部队工作的人员，根据文化大革命进展情况和工作需要，分批地调到第二炮兵领导机关。”

## 第十六节 贯彻执行“五一六通知”

### 一、总政要求全军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习称“五一六通知”）后，军队方面如何动作，刘志坚称，“我在请示叶剑英后，主持起草了《关于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5月25日以总政治部[66]32号文件下发部队。”<sup>【257】</sup>

总政的《通知》，对全军如何贯彻执行“五一六通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了要求。《通知》认为，“五一六通知”“所指出的文化战线方面的问题，以及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方针政策，对我们军队也是完全符合完全适用的，全军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坚决贯彻执行”。《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研究“五一六通知”；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文章。《通知》提出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各大单位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和组织的整顿，彻底批判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言论；各大单位要组织精干的写作班子，撰写重点文章。《通知》规定，总政治部设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也要在党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公室等；各人武部门要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发动民兵积极参加和保卫文化大革命。<sup>【258】</sup>

【256】 向守志，1955年授衔少将。实际未到职，同年8月撤销任命。

【257】 《风雨征程》，页242。

【258】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征求意见稿，2001年，页2-3。

刘志坚称，“总政通知下发10多天后，由于地方和部队运动进展不一，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刘把情况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并根据几位老师的指示精神”，组织起草了总政给中央的《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由中央加上批语，6月15日以中共中央[66]302号文件转发至全国县、团级党委。请示报告全文如下：

中央：

目前，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军轰轰烈烈地展开。广大干部战士热烈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斗号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猛烈开火。部队的报刊、广播、黑板报、墙报以及课堂、饭堂等，都成了声讨反党黑帮的斗争阵地。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正在兴起。在这个期间，十七级以上干部，普遍学习了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八级以下干部及广大战士正在深入地学习《解放军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对已经揭发出来的混入军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在进行严肃批判。同时抽调了大批干部参加地方的社教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整个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广大的干部、战士，受到的教育是极为深刻的。大家认识到，过去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对党内、军内的阶级斗争，正如毛主席所批评的，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那些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牛鬼蛇神，天天在放毒，搞“和平演变”，我们却麻痹大意。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睡在我们身边，我们却对他们警惕不够。广大指战员，决心永远站在保卫毛泽东思想的最前线，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且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现在运动正在深入发展。

部队开展这项运动，总的步骤是先搞正面教育，使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对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物进行充分揭露，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彻底批判。这个步骤和某些地方单位的步骤不尽一致，因此在运动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有的地方要部队上街游行；有的要部队领导干部放手发动群众，引火烧身；有的要部队参加联合声讨、联合批判；有的给部队贴大字报，责问“为什么按兵不动，居心何在？”甚至有的单位为此在大字报上指责某某部队“是‘三家村’的合伙者”，等等。所以产生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上的某些同志和一些群众，不了解部队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情况，不了解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已有的具体措施。



对于军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曾经发过四次指示和作过一些口头规定，先后提出了如下十条措施：

第一，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常委，认真学习中央五月十六日的《通知》。然后，再由军以上负责干部首先在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以及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等系统的全体党员干部中，原原本本地宣讲《通知》。对十八级以下党员干部，由师、团干部亲自传达《通知》的大意。所有干部，都要联系实际，深入展开讨论。

第二，推迟原来布置的关于人民战争思想的教育，所有干部战士首先集中精力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文章。干部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的五篇著作、《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有关社论、文章。战士主要学习《毛泽东著作选读》、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以及《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社论和文章。

第三，在连队和师以下的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要求团一级党委深入基层，抓活思想，本着少而精的精神，由营团干部进行深刻而通俗的讲解。机关、院校、连队在学习中，都可以组织座谈和出墙报、黑板报，刊载学习心得和展开讨论，清除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写的文章、小册子在部队的影响。要注意实效，不要光图形式，走过场。要使这一教育同狠抓突出政治的落实，同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在连队中，不搞重点批判。有特殊问题的调离连队处理。

第四，各大单位党委要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对这些部门所属人员的摸底排队工作，必须在普遍学习和放手发动群众、揭露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然后由文化革命小组提出名单，报上级党委批准，再组织重点批判。这种批判一定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不搞则已，要搞就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搞深搞透。在斗争中要大力支持左派，积极提高和扩大左派队伍。

第五，凡是确定要夺权的军以上机关的个别单位，经上级党委批准，可以运用贴大字报、开批判会等形式，以便充分发动群众。

第六，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声讨大会。对于地方夺权单位的左派，要采取多种方式，如派少数代表送支援信、大字报等，大力支持。对情况不明的单位，不要盲目支持，以免被右派利用。

第七，军区、军兵种的报刊应拿出足够的篇幅，报道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刊载干部战士的有关文章，启发和引导部队运用毛主席著作来回答和解决干部战士的活思想。

第八，要积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各大单位组织精干的写作班子，撰写重点文章，培养和锻炼自己的理论队伍。同时，要积极参加当地报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斗争。

第九，各县人武部门要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发动广大民兵积极参加和保卫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民兵在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受到深刻的锻炼和教育。

第十，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各大军区、各军种也都要在党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公室。

上述措施，已报经军委批准。我们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我们在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还负有保卫文化大革命运动，保卫国家安全，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必须严守岗位，保持戒备，统一指挥，防止混乱。因此，我们意见，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执行上述规定比较适宜。如果中央认为可行，请批转县以上党委，以便他们了解部队的做法，加强对当地驻军的领导。

总政治部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

以上总政《请示报告》所提10项措施，以第四、五、八项为重点。《请示报告》是与运动初期刘少奇、邓小平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思维相吻合的，可以说，《请示报告》是刘邓路线在军内的体现。

## 二、全军各有关单位闻风而动

“五一六通知”及总政5月25日《通知》、6月14日《请示报告》下达之后，全军各有关单位纷纷闻风而动。

### （一）总参谋部

6月7日，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会议由李天佑主持，王新亭传达了周恩来的报告及萧华、杨成武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示。总参党委委员、总参政治部主任叶运高<sup>[259]</sup>汇报了总参机关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问题和下一步工作的安排。会议就如何进一步加强领导，把文化大革命切实

【259】叶运高，1955年授衔少将。

抓好的问题，进行了讨论。6月19日，总参机关开始贯彻总政《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批示。8月23日，总参文化革命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王新亭主持，总参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各部局文化革命小组的负责人和指定的部局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宣布了经总政批准的总参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名单。组长王新亭，常务副组长叶运高，副组长军委办公厅副主任路扬、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总参军务部长苏静、叶剑英办公室主任莫阳。会议决定成立总参文化革命办公室，办公室主任莫阳（兼），副主任总参政治部副主任高天辉、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张桂文。下设秘书组、情况简报组、调查研究组、联络组。<sup>【260】</sup>

## （二）总政治部

3至4月的京西宾馆会议期间，萧华在会议发言中点了总政副主任梁必业的名。萧华称，“梁必业同志和罗瑞卿同志的关系也是很不正常的。”“梁必业同志跟罗瑞卿同志跟得很紧，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罗瑞卿同志一唱一和，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sup>【261】</sup>

2月至5月，总政治部“整顿机关”。梁必业后来称：

5月上旬，总政治部召开了副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会议在对我进行了又一轮批判之后，按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给我横加上种种罪名，并宣布建议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6月2日，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将《关于总政治部整顿机关和梁必业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印发到全军师以上单位，口头传达到团一级党委。此外，还对我所谓“篡军反党的罪行”进行了“彻底清算”。6月17日，总政治部秘书处发出《关于今年清理销毁〈工作通讯〉的通知》，要求将总政编印的《工作通讯》第191期以前的，凡是由罗瑞卿、梁必业签发的文件一律销毁，“文件中提到彭真、罗瑞卿、梁必业名字的，或有他们讲话内容的，一律涂掉或剪掉”。“文革”开始后，我完全“靠边站”，并陷于无休止的关押和批斗之中。<sup>【262】</sup>

【260】 总参政治部编研室：《总参谋部政治部大事记（1950-1994）》，1995年，北京，页178-181。路扬，1961年晋升少将。苏静，1955年授衔中将。张桂文、莫阳、高天辉，1965年大校军衔。

【261】 萧华：《坚决保卫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篡军反党的阴谋》，1966年3月25日。中发〔66〕268号中共中央文件附件二，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6年5月25日发出。

【262】 梁必业：《我在人民军队》，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356-357。梁必业被撤销总政副主任职务后，被降职任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但未能到职。1966年12月，总政又以其“态度恶劣，死不认罪”为由，向中央作了《关于改变对梁必业同志的处分

总政5月25日《通知》规定设立的军队文化革命小组，亦称全军文革小组。据刘志坚1967年1月称，其第一任组长是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8月18日，总政发出关于加强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决定该小组改由刘志坚任组长，袁子钦（总政副主任兼总政干部部长）任常务副组长，谢镗忠、李曼村（总政宣传部长）任副组长，胡友之（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痴（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陈亚丁（总政文化部副部长）、王峰（总政干部部副部长）、彭飞（总政政工研究处处长，1966年10月任总政副秘书长）为组员；全军文革小组由总政党委领导。<sup>[263]</sup>另刘志坚称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为总政青年部部长辛国治。<sup>[264]</sup>

### （三）海军

5月27日至6月16日，海军党委在北京召开了第三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党委委员26人，监委委员15人，列席会议的有军级党委负责干部4人。会议首先学习和讨论了文化大革命问题。学习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四篇著作，学习了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和总政治部《关于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并且对照研究了中央“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六月三日，海军党委向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作了报告。会议一致认为，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纲领，并表示完全拥护。同时谴责和反对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会议还认为，中央通知中指出的绝大多数党委对开展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的情况，在海军也存在。对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特点认识不足，表示要更加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克服个人主义，永远突出政治，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接班人标准，培养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sup>[265]</sup>

6月25日，海军司令部军校部作为海军直属机关重点先行单位之一，开始文化大革命。军校部副部长、党支部副书记李盈久<sup>[266]</sup>主持支委会提出了《海司军校部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计划》，于6月29日上报海司党委。《计划》提出运

---

及任职的报告》，撤销任军事学院副院长命令，决定梁到总后所属青南马场任副场长。1967年2月起，由总政机关监护审查，同年12月列入中央专案审查。1969年10月送至安徽省军区直属的一个农场监督劳动达两年之久。1974年12月恢复原职，先后任总政副主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263】 参见《大动乱的年代》，页25。袁子钦，1955年授衔中将。胡友之，1960年晋升少将。胡痴、王峰，1965年大校军衔。

【264】 《风雨征程》，页259。辛国治，1964年晋升少将。

【265】 海军司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编年史（1949—1983）》，北京：海军出版社，1995年，页734。

【266】 李盈久，1965年海军大校军衔。

动的重点是揭露批判违背、抵制毛泽东办校思想和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挖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坏根，把院校办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熔炉。运动按照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大鸣大放揭发问题、分析批判3个步骤进行，预计7月底完成或告一段落。海司党委7月5日批示：同意。时间暂定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最后需要加一个总结提高阶段。并决定军校部的文化革命由海司党委直接领导，具体工作由海司文化革命办公室负责。<sup>[267]</sup>

#### (四) 空军

5月24日，空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成。当天，空军党委发出通知称：为了适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加强对空军文化大革命的领导，空军党委确定，以吴法宪、余立金、成钧、王辉球、黄玉昆、姚克祐、王静敏、夏梨8人组成空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sup>[268]</sup>吴法宪为组长，余立金为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王静敏为办公室主任，夏梨、李洪林<sup>[269]</sup>为副主任。办公室设在空军政治部。26日，空军党委常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研究部署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与会人员首先听取了黄玉昆传达的总政5月24日电话会议精神，学习了“五一六通知”。会议决定：各师校以上党委必须抽出三四天时间学习“五一六通知”和中央批转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然后向干部进行传达。对17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宣传、文化、报刊、院校、科研等系统的全体党员干部，由军以上领导干部采取分片分点的办法原原本本地宣传中共中央的通知；对17级以下的党员干部由师、团负责干部口头传达通知的大意。<sup>[270]</sup>

#### (五) 沈阳军区

6月6日，军区召开团长、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学习“五一六通知”精神。为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军区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在军区党委的领导下，负责文化大革命的日常工作。

【267】 海军司令部军校部：《海军院校建设大事记（1949—1986）》，1992年，页209。

【268】 1965年5月刘亚楼去世后，原空军政委吴法宪改任空军司令员，同年8月，中央批准为空军党委书记。原空军副政委兼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余立金（1955年授衔空军中将）任空军政委，同年7月，中央批准为空军党委副书记。成钧，时任空军党委副书记，空军副司令员。王辉球，时任空军党委常委，空军副政委。黄玉昆，时任空军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姚克祐，时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961年晋升空军少将。王静敏，时任空军政治部副主任，1961年晋升空军少将。夏梨，时任空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

【269】 李洪林，时任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270】 空军政治部编研室：《空军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2年，页247—248。

军区机关根据总政6月14日《请示报告》精神，军区党委确定，宣传、文化、报社等部门作为这一阶段军区机关运动的重点。这些重点部门的运动，大体上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学习毛泽东有关指示和中央文件，批判“文艺黑线”。

第二阶段，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揭发内部的所谓问题，确定重点人后，经党委审查批准，进行大小会批判。7月11日，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根据机关党委的安排，首先贴出大字报，揭发文化部领导存在的问题。接着，各部门都贴出许多大字报，重点是揭发宣传部、文化部和报社的问题。到7月15日，文化部副部长丁洪、李树楷、陈果先后被大字报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同时，宣传部、《前进报》社和旅大警备区政治部文化部也都揭发出不少问题，并都形成了重点人。7月20日，军区党委常委批准丁洪、丁帆（歌剧团副团长）为重点批判对象。在此期间，宣传部、前进报社党支部，也都批判了重点人。

批判重点人之后，文化部、宣传部和报社等部门还检查了受黑线影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够的教训。

在这一阶段，军区后勤部揭发批判了卫生部部长宫乃泉<sup>【271】</sup>的“罪行”。把他说过的“光有革命的人道主义之心，没有救死扶伤之术是不行的”论点和不准在医务图书室放政治书籍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把他翻译外文书籍《化学和生物武器》下发部队和批准订购外文图书、借阅外文医学科技书籍说成是崇洋媚外，把他说过“有的领导不懂装懂，粗暴干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话说成是右派言论。军区党委认为：宫乃泉资产阶级世界观长期未得到改造，有洋奴思想，崇拜外国，技术至上，反对突出政治，但还不能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第三阶段，进行组织整顿。

军区文体单位文化大革命前，军区编有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杂技团和体育工作队、军乐队，旅大警备区编有一个文工团。这些文体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开展“四大”的重点单位。为加强对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军区政治部党委于5月24日，决定成立文化系统文化革命小组，在部党委领导下具体指导文化系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6月，军区党委提出，文体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受时间限制，一定要大破，把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破完、斗垮、搞臭。把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根子扎深。对

【271】 宫乃泉，原为总后卫生部副部长，1955年授衔少将。1957年被划为右派，1959年下放任西藏军区卫生处副处长，后任沈阳军区卫生部副部长、部长。1975年去世。

运动的安排大体可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学文件批黑线，提高觉悟；第二步是大鸣、大放，揭发问题，批判斗争本单位黑线代表人物；第三步是整顿纯洁组织。

5月16日开始，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五篇著作和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清算文艺黑线对自身的影响。6月6日开始，转入个人对照检查，查黑线对自己的影响，挖思想根源。基本上搞了人人过关。7月中上旬，转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揭发内部问题。揭发的重点是团（队）的领导、导演和创作人员。几天当中，有7人被大字报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sup>[272]</sup>

沈阳军区的做法具有代表性，其他大军区机关也都是类似情况。

7月21日，总政在《关于当前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提出：在连队中开展一次控诉“黑线罪行的教育运动”；军以上机关的宣传、文化、出版、新闻、科研等重点部门，以及“问题严重需要夺权的单位”，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对全军院校，要着重加强23所高等技术院校、医科大学和科研单位的文化大革命的领导。<sup>[273]</sup>

## 第十七节 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

### 一、军队派出干部参加工作组（队）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碰头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sup>[274]</sup>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商定后，周恩来当场用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获得同意。<sup>[275]</sup>次日，刘少奇起草并发出署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致毛泽东的请示信称，“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日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五月三十一日即进报馆工作。吴冷西和其他副总编辑的职务暂时不动。”毛泽东于当日夜在这封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sup>[276]</sup>

【272】沈阳军区军史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史》第二卷，1994年，页11-12、14-15。

【273】《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页1065。

【274】张承先，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275】《周恩来年谱》下，页34。

【276】《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页639。刘、周、邓致毛的信并未提及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事。

6月1日，经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6月4日改名为中共北京市委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6月3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了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革情况的汇报。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北京市的一些大、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这些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许多省、市也仿照北京的做法，相继向当地的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派出了工作组。

按照中央的指示，军队奉命派出干部，作为工作组（队）成员，参加了上述及其他工作组（队）的活动。其中参加的重要工作组（队）有：

### （一）人民日报社工作组

据工作组军队成员尚力科回忆，“6月1日前夕，党中央决意要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成员由军队抽调3人，《红旗》杂志社1人，上海《解放日报》社2人。名为‘中央工作组’，组长是陈伯达。军队的3人是总政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sup>[277]</sup>，《解放军报》社记者处处长朱悦鹏和通联处处长李久胜。因李久胜提出，他不熟悉版面，最好另派一个同志参加。当时我是《解放军报》军事宣传处副主编，于是，我就成了‘替补队员’。”<sup>[278]</sup>

工作组另一名军队成员朱悦鹏回忆称，5月31日，钱、朱、尚三人等到钓鱼台八号楼听取陈伯达、康生面示。“陈伯达讲了很多，先讲了派中央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的重大意义。他说，今天下午3点半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宣布中央决定，今晚工作组进人民日报。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接着，他主要讲了正在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说这场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反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等等。快中午12点了，康生没讲什么，只是表示同意陈伯达讲的内容。谈话将要结束时，陈伯达说：明天6月1日，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他并要钱抵千、尚力科和我起草。钱抵千说：‘社论的内容，是不是就按伯达刚才讲的内容来写。’陈伯达同意。”<sup>[279]</sup>

朱悦鹏接着回忆称，“5月31日下午3时半，中南海怀仁堂一个会议厅里，参加会议的首都主要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部主任以上干部陆续到齐（只有《解放军报》报社是社领导参加）。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康生（此时陈已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康为“中央文革小组”顾

【277】 钱抵千，1965年大校军衔。

【278】 尚力科：《在那狂热的岁月里——文革初期在〈人民日报〉社值夜班的亲身经历》。《我亲历过什么》，北京：长征出版社，2002年，页279。

【279】 朱悦鹏：《漫漫人生路——朱悦鹏自述》，北京：北京金岛宇文化发展中心，2013年，页55。



问)就坐了。邓小平同志……他严肃地宣布开会。他说,今天召集北京各个主要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的中层以上领导开会,宣布中央一个重要决定: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从今晚开始,《人民日报》由工作组领导。接着,邓小平同志解释为什么要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他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先由《解放军报》报道。外电说,现在是军队的报纸领导中央的报纸,这是个极不正常的情况。他要求首都各新闻单位都支持中央工作组把《人民日报》办好,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支援给《人民日报》。工作组要把报纸宣传管好。最后,邓小平同志正式宣布了中央工作组成员名单:组长陈伯达,成员有钱抵千、朱锐鹏、尚力科、杨丁,上海两位同志还未定下来。……下午5点多,会议结束后,陈伯达率工作组成员(另有穆欣同志),驱车赴《人民日报》。”<sup>[280]</sup>

关于钱、朱、尚三人起草《人民日报》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过程,尚力科称,“工作组进驻报社后,当务之急,就是撰写社论。第一篇社论,确定由钱抵千同志、朱锐鹏同志和我先起个草稿。于是半夜三更,我们前往钱抵千同志的住处,因为是单门独院,没有什么干扰。在我的印象中,钱抵千同志文思敏捷,可以出口成章。为了节省时间,他一面在屋里来回踱步,一面滔滔不绝地口述,由我和朱锐鹏同志记录整理成文,在陈伯达主持下修改定稿。……社论的题目也是他<sup>[281]</sup>亲自拟定的。这就是1966年6月1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轰动和震惊全国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sup>[282]</sup>

朱锐鹏的回忆则更为详尽:

陈伯达要钱抵千、尚力科和我,赶快回去吃晚饭,晚10点以前把社论稿子起草好,带到人民日报社修改。

我们3人如果各自回家去吃晚饭,再集中一块写社论,时间显然来不及了。钱抵千要我们到他家(东四演乐胡同,距王府井并不太远)吃点便饭,边吃边商量,丢下碗就可以动笔。

万事开头难,何况这是明天将要向全中国、全世界广播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钱抵千在中苏两党论战时,曾参加过起草“九评”

---

【280】《漫漫人生路——朱锐鹏自述》，页55-56。

【281】指陈伯达。

【282】《在那狂热的岁月里——文革初期在《人民日报》社值夜班的亲身经历》。钱抵千文革结束后的仕途,并未因起草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受到影响。1980年代他历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解放军报社代社长、国防大学副校长,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翌年2月,因突发脑栓塞去世。

的写作班子，所以他与陈伯达、康生接触较多。他对我们两人说：陈伯达有个脾气，他说照他讲的写，你就得尽量做到一字不漏。陈伯达上午讲的，我们各人都做了记录。是3人分段写，再统一修饰，还是1个执笔，2人补充？钱抵千说这样太费时间，提议由他按他的记录口述，我2人各记一段，然后统改一遍。这样，奋笔疾书到夜里10点，社论草稿虽2000多字，但颇费周折。有时一句话，一个字，要抠半天。起草过程中，钱抵千拿出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稿。他一定要把讲话中关于政权那一段话加进去。我说，写上这段话是否妥当？这不是陈伯达说的，他会同意？钱抵千似乎知道底细，他说，林总这个讲话，陈伯达和康生参加修改过，可以写上。于是，社论第4个自然段，关于政权问题的论述，几乎全是林彪的讲话。

《人民日报》总编辑办公室很大，外间是秘书办公，里间足有三四十平方米，还有一个长会议桌，可供10几个人开会。不知为什么，陈伯达不愿在这里办公，偏要挤到副总编辑胡绩伟那间办公室。当晚10点以后，我们3人拿着社论草稿到胡绩伟办公室，等待陈伯达。

陈伯达来了。跟他来的还有王力、关锋、穆欣。不一会儿，《解放军报》的唐平铸、胡痴也来了。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下子挤了10多个人。陈伯达坐在办公桌前，其他人按各自地位依次就坐——王力、关锋等人围在桌子旁边，其他人离桌子有远有近。陈伯达叫人把社论用大字排出小样，然后统改。排字车间工作效率很高，不大一会儿，小样送上来了。因为是按陈伯达的谈话写的，所以改动不大，念到第4个自然段时，钱抵千稍作解释，为什么要把林彪这段话用上去。陈伯达同意了。关于社论题目，抠了半天。我们原定的题目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本来想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因为早在4月18日，《解放军报》把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改为社论发表时，题目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大家一时想不出更确切、更有号召力的题目了。这时，陈伯达用铅笔在另一张纸上画了半天，拟好几个题目，最后圈定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定稿后，陈伯达规定：标题要通栏，字要用楷体。当晚，我们将第二天要见报的小样，一一审查，确定6个版的版面。一版社论，这是旗帜，鲜明的旗帜，向中国、向世界宣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正式打响了。<sup>【283】</sup>

【283】《漫漫人生路——朱悦鹏自述》，页56-58。

6月16日,《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被宣布停职反省。6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代理《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

## (二) 北京大学工作组

6月1日晚,华北局、北京新市委负责人率领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华北局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32人进校。6月7日,从中央国家机关、海军航空兵、各省、市紧急抽调来的大批工作队员进校。6月8日,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办公室通知,经请示李雪峰,同意彭林<sup>[284]</sup>等三人参加工作组领导小组,此前,该领导小组成员中并无军队领导干部。6月10日,工作组统计:迄今,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工作组共有208名队员,其中地方干部122人,军队干部86人。按此计算,军队干部占41%。7月6日,北京市委通知,北京军区政治部郑希文<sup>[285]</sup>参加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7月17日,工作组办公室发出通知称,“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领导小组由下列同志组成”:组长:张承先(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组长:彭林(海军航空兵部政委),杨以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武振声(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秘书长),郑希文(北京军区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张德华(团中央候补书记)。组员:曹轶欧(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芳林(中央监委研究室主任),杨文谟(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戈华(北大原党委第一副书记),崔雄崑(北大原党委常委、教务长),蔡润田(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sup>[286]</sup>

以上军队领导干部4人,占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的三分之一。

## (三) 文化部工作队

军队参加文化部文化革命工作队的人数,据1967年1月周恩来透露,共有1,500人。这一部分人,实际上是准备留在文化部工作。周恩来称,“这一决定,是中央决定的,报告了主席,派干部加强文化部。至于到文化部干什么,那是中宣部、文化部的事。得到中央指示,总政很热心,从沈阳、南京军区,各军种、兵种、各总部调来了一批干部。调来时已经是六月份了。陶铸兼宣传部长,陶铸、萧望东直接负责这件事。目的是达到加强、改造文化部的直属机构、直属单位,目的很清楚。但调来以后,碰到文化大革命展开了。这个问题,和工作组有联系,但目的、任务不同。”<sup>[287]</sup>周恩来还称,“另一批是搞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部

【284】 彭林,时任海军航空兵部政委,1955年授衔海军中将。

【285】 郑希文,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1965年大校军衔。

【286】 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下册,征求意见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643-649。杨文谟,1965年海军大校军衔。

【287】 周恩来在接见解放军参加文化部文化革命工作队造反联络站代表和部分四清工作队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1月11日。

分人是调来参加工作组的”。这一部分人，以总参谋部为例，“6月16日总参谋部机关派往国务院文化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工作队全部进点工作。遵照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总参机关抽调了126名干部负责文化部所属艺术系统14个单位的文化革命运动。加上沈阳军区的100人和炮兵的57人，共计283人，组成第三大队，编成10个工作队。由总参气象局副局长贺格非任大队长，二部武官李钟玄任政委，军务部处长叶萍和沈阳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申曙任副大队长，炮兵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刘书才任副政委。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工作队进点之前进行了10天集训，集训工作统一由总参政治部负责。副总参谋长王新亭接见了总参和炮兵工作队的全体同志，代表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各位副总参谋长表示欢送，并根据大家在集训期间提出了问题作了指示。”<sup>【288】</sup>

## 二、总政《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

7月23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6]378号中共中央文件批示同意军委转来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请总政“即按此执行”。总政6月29日的请示全文如下：

叶副主席并军委：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不少地方单位要求军队抽调干部支援地方文化、教育战线。目前，除已抽调二千六百多名干部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工作队（北京地区一千九百多名、华东地区七百名）外，又有中央文化部向南京军区要一百名团以上干部，华东局向南京军区要五百名团以上干部，转业到地方文教部门工作。华东地区还要求派工作队员八百名，并提出从工作队员中留一些干部转业地方工作。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其他地区也会要求军队抽调干部支援。我们考虑，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和处理军队干部转业地方工作，既要照顾到地方建设，特别是当前文化革命的需要，又要注意军队工作特别是战备的要求；既要经常使军队干部有进有出，又要注意保持军队干部相对稳定。今年全军准备处理转业干部五万余名，这个计划已送内务部人事局统一分配，文教战线所需要的干部可以在这个计划之内统一调整解决，否则，势必增加转业数字，削弱部队工作。为了更好地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积极地投入文化大革命，对于抽调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288】《总参谋部政治部大事记（1950-1994）》，页179。贺格非、李钟玄，1965年大校军衔。

一、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革命。工作队任务完成后，回原部工作。这样可以适当多抽一些干部参加，既能适应当前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又可以使军队干部得到锻炼。

二、从今年拟转业的干部中，选调一部分到文教战线工作。据各单位初步摸底，今年拟转业的干部中，政治上较好，适合到文化部门工作的，有团职以上干部二千二百余名，营职干部二千九百余名，连、排干部四千余名，这些干部的转业，拟请中央组织部和内务部根据各地需要，统一分配。

三、对于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所急需的个别领导骨干，遵照中央指示，可以个别抽调，但也须由总政统一掌握。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总政治部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革，刘志坚后来回忆称，“那时总政治部正掌握着3,000多名准备去农村搞四清的干部，各大单位都已经报上了名单，但还没有分派下去。军委叶副主席问我：地方上要人去当工作组，我们有没有人派？我说：人是有，问题是派不派？当时许多单位在中央常委召开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上提出要求派工作组，中央常委照例也同意派出并提出要军队派，军委领导此时也同意派，因此，以后凡是地方院校要军队派工作组的，经过有关领导批准同意，就都派出去了。这样，派工作组的问题就把许多军队同志也牵连进去了。”“对国务院文化部系统各单位也派了许多军队同志组成的工作组。这是当时上任不久的文化部副部长萧望东（原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提出要求派的。总政先派出了300人，这是经叶副主席批送林彪同意的了。后来文化部因文艺单位多，嫌派的人少，萧望东又直接同南京军区商量，要来了500人。一共派出800人的工作组到达文化部所属单位。”<sup>[289]</sup>

7月24日、25日，回到北京已有一周的毛泽东同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对工作组问题<sup>[290]</sup>提出严厉批评，称：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7月28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派驻《人民日报》及文化部的工作组（队），并非毛泽东批评的对象，仍旧保留。

【289】《风雨征程》，页246。

【290】毛泽东所指的，是派至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工作组。



# 第三章

1966·下：乌云压顶



## 第十八节 军队院校文革的初始阶段

军队院校是军内文革初期的重点部门。运动初期，军内各大单位均向所属院校派出了工作组。7月下旬，在中央决定撤出派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情况下，全军文革小组下令撤出工作组，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仍由各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同时规定，军队指挥院校学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与连队相同，只准在军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兵种院校范围外进行串连。

以下是部分军队院校文革初期的情况（有关资料均出自官方出版物）。

### 一、高等军事学院

1966年初，当社会上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学院的绝大部分干部还在农村“四清”。5月底，学院主要领导率领部分干部先期返回学院，并立即召开常委会，对学院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出决定，要求全院人员，采用半天工作、半天搞运动的方法，有计划、分批次学习中共中央《通知》和有关文化革命的其他文件、文章，边学、边议、边揭、边批，积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战。

6月20日，参加农村“四清”的干部全部返回学院。6月25日，学院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政委李志民作动员，新任院长李聚奎讲话。他们一致强调，学院刚经过历时10个月的整风，全院上下以院的领导为重点，深入进行了一次思想革命，检查了建院以来的教学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进一步批判了“教条主义”，进行了教学改革。整风结束后，多数干部又去农村参加了9个月的“四清”，经受了一次最实际的锻炼和最深刻的阶级教育。在全院的职工、战士和家属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一次清理工作。学院近两年来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搞运动。……根据上述情况，学院开展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干部和学员中深入进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学好毛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文件，联系实际，清理、批判资产阶级黑线的影响，巩固和提高整风成果。院党委对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总的部署是：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到1966年7月底基本告一段落，以便接收新的教学任务，并适时召开学院第三次党代表大会。<sup>[291]</sup>

### 二、解放军政治学院

6月7日，院党委作出决定，全院继续深入学习和贯彻“五一六通知”，6月初到7月中旬，集中时间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扭转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291】《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史》第二卷，页295。



认识。在此基础上，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资产阶级代理人”和“资产阶级权威、专家”，肃清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黑线的影响。同时，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

6月上旬，参加农村“四清”的干部陆续返回学院。6月8日-11日，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在深入学习《通知》精神的基础上，揭发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对学院的影响，把建院以来在教学方针上的不同认识，提高到“两种教学思想和两种教学路线”上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学者、权威”的“修正主义”路线，严重干扰了无产阶级教学思想和教学路线的贯彻。其表现是，学院的部分阵地为黑线所占领；坏戏、坏电影在学院大量上演；图书资料馆收藏大量古书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品；有的教员、干部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脱离政治，埋头读书、教书，迷信权威，追求学术成果，向往成名成家，等等。

6月27日，院党委向全院人员传达了总政关于学院可以出大字报的指示，全院上下群情激奋，积极响应。7月5日，院党委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蔡顺礼代表院党委要求中层以上领导干部积极行动起来，到群众中去，敢于领导，善于领导，引导群众把学院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sup>[292]</sup>

### 三、后勤院校

总后勤部根据上级要求，于7月召开后勤院校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后勤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步骤。“第一步是放手发动群众，认真贯彻总政在《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中指出的：部队开展这次运动是先搞正面教育，使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对重点单位的重点人进行揭露，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批判。第二步是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建设，要对广大干部进行一次兴无灭资的思想教育，大兴无产阶级世界观，大破资产阶级世界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联系实际，自觉亮思想，摆问题、谈认识、讲教训，在自觉革命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觉悟，但不搞人人过关。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新高潮。”会议明确了后勤院校开展运动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要正确分析院校知识分子现状，充分理解毛主席指出的，在我国‘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有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二是要坚持贯彻总政治部对大字报的规定，一定要有

<sup>[292]</sup>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史》第二卷，页198。

组织有领导地去做，要向群众讲清楚，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应注意保密，大字报要贴在领导指定的地方，对于个人私生活、政治嫌疑问题和涉及军事机密的问题，应直接向领导和工作组反映，不要贴大字报，以免为坏人利用。”<sup>[293]</sup>

第二军医大学校党委5月下旬研究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决定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下设文化革命办公室，校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余树棠为办公室主任。7月，校党委报请总后党委批准，对17名“三反分子”在全校开展批判，持续近三个月。<sup>[294]</sup>

第四军医大学于6月中旬起开展了“四大”，掀起揭发批判一批校、部、院、系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字报高潮。副校长郝哲生、副政委张希平、范博渊等受到批判，<sup>[295]</sup>并收集上报了他们的“罪行材料”。经总后党委批准，停止了郝哲生、范博渊和副校长汪石坚、附属一院副院长王槐寿、训练部副部长牛联棣等对文革的领导。<sup>[296]</sup>

#### 四、空军院校

文革开始的前一年，空军院校按照全军院校的统一部署，开展了院校整风运动，重点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端正所谓的办校方向，把院校办成“抗大式的学校”。在院校整风中，一些干部教员受到了批判和伤害，也造成了教学思想的混乱。1965年下半年，按照全军的统一部署，空军院校的干部、教员和学员又分批下农村，参加“四清”，致使院校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四清”运动没有结束，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根据总政《关于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空军党委对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安排。各院校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正面教育，以座谈会的形式，学习文件，“揭露批判文艺界、教育界、学术界等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肃清资产阶级黑线的影响”。不久，运动很快升温，各校又按照上级的要求，开展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党委以教学为中心安排各项工作，领导干部抓教学，教员钻研业务，一概扣上“不突出政治”、“单纯

【293】总后勤部档案馆，司令部类，第10卷，1966年。后勤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院校教育发展史》后勤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页118-119。

【294】《第二军医大学志》，1994年，页23。

【295】张希平、范博渊，1965年大校军衔。

【296】第四军医大学校史办公室：《第四军医大学史》，1994年，页98。

军事观点”、“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把院校多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我国许多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以及学习借鉴外军的军事理论和有关经验等，一律视为“封、资、修”的错误东西加以批判；教学规章制度更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和“烦琐哲学”加以批判。空军政治部、军校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对1963年以来制定的学校工作方面的各种规定和要求进行一次清理。这次共清理出10种，决定全部取消，停止执行。根据国防部关于废除《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工作条例》的通知精神，5月14日，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下发通知，对1962年5月1日下发的《空军军事学校教学工作条例》宣布予以作废；空军军校部还将1964年5月1日颁发的《教学文书制度的规定（草案）》也宣布即行废止；还以“颁发证书制度是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产物”为由，经请示总参军训部批准，下发了《废除颁发毕业证书制度》的通知，改为民主评议、领导审定的办法，做一个毕业鉴定，装入学员档案。<sup>【297】</sup>

**空军学院** 6月11日根据空军党委常委制定的《空军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安排》（初稿），结合学院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学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实施计划》。主要内容是：（1）目的要求。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性质和伟大意义；肃清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影响，进一步明确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办好学院；提高突出政治战略意义的认识，克服重业务、轻政治的单纯业务观点。（2）方法步骤。分2个阶段进行，总时间为25天左右。（3）组织领导。学院文化大革命由学院党委领导，下设学院文化大革命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7月18日，空军派工作组检查学院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工作组由空军政治部5人组成，空政王静敏副主任任组长。<sup>【298】</sup>

**第八航空学校**为航空机务地面学校。6月2日至8日，学校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组织科、团以上领导干部先学一步，并决定从6月8日开始，组织全校人员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指示。6月10日，学校党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成立了文化革命办公室，并作出了《我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安排》，规定文化大革命与整风运动、教学改革结合进行，运动的重点是领导班子和教员班子。6月29日，学校机关干部和教员转入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及其影响的揭发批判，把过去教学工作的某些实际问题，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纲上来批判，全盘否定了过去学校教学改革的成果，特别是对考试制度列出了种种罪状，对教学工作“不突出政治”

【297】 空军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院校教育发展史》空军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页139、140、152。

【298】 《空军指挥学院大事记》，北京：蓝天出版社，2002年，页100-101。

的表现也进行了揭发。7月13日-14日，在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基础上，学校党委又重新组织干部教员学习文革文件和上级关于教学改革的指示及总政治部对西安地区几个工程院校文化大革命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批语等，认为：1960年以来我校虽然经过了四次教学改革，但由于“对学校存在的问题没有提高到两种教育思想、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和防止修正主义的高度来认识，所以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彻底改革，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正是在这种“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甚大、政治生活不甚正常的情况下，学校党委提出了教学改革设想方案，其要点是：①突出政治，加强政治教育，“政治教育时间占整个教学时间的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二十”；“毛主席的著作是最根本的必修课，坚持天天读”。②缩短学制，减少课程，“修理、军械专业六个月；仪电专业六至八个月；无线电、雷达专业八至十个月”；“专业技术教育，一般设两至三门学科”。③改革考试制度，“取消一切学科考试和毕业考试”。④改进教学方法，“实行启发式，废止注入式”；“提倡教员精讲，学员自学”。<sup>[299]</sup>

第九航空学校为航空机务地面学校。6月6-13日，学校党委在中层以上干部中，传达了空军院校会议上空军领导对文革过程和性质的讲话，指出：“当前是处于阶级斗争最剧烈的时期，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是关系全国全世界命运的斗争。”并明确在这场运动中，院校是重点，而领导班子和教员班子又是院校的重点。这两个班子，领导班子要比教员班子更好解决些。因为教员班子知识分子成堆，剥削阶级出身的不少，受苏联影响大，受“三家村”毒害深。为此，学校先在中层以上干部中统一思想，并决定用25天时间，迅速在全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同时，在校内成立文化革命办公室。一时间全校上下，层层声讨“三家村”，人人自我检查，揭发问题，肃清黑线影响，并开展了军事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7月15日，学校根据上级指示，把运动转入教育革命。7月16日，全校动员，以“五七指示”为依据，动用“四大”（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方式，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开展教育革命。并提出过去在学制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思想的斗争，从未打破过框框，没有彻底革命，只是修修补补。认为过去的东西，都是苏联的一套。培训时贪多求全，过分强调航校教学的复杂性，夸大了“师”和“员”的技术差别。各学科各自为政，故弄玄虚，教学内容脱离实际。学制长，坏处多。并根据空军军校部指示，首先拟定了一个教改设想方案。方案中提出：地勤各类“师”实施培训、轮训并举，以轮训为主，培训学制为8-10个月，轮训学制为3-4个月；取消基础课，建立新的学科体系；以平时考试代替毕

【299】《空军第一航空学院史》，北京：蓝天出版社，2001年，页120-122。

业考试，不记分；大力组织教员下部队巡回教学，发扬“红色背篓”精神；大力组织教、学员参加本校农、副业生产，促进思想革命化。在方案中还提出合并机械专业，取消基础和军事教研室。在此基础上，学校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先揭发学校在教学中的问题，然后形成学校训练的长期方案。截至7月23日，全校已贴出大字报近3000张，形成了第一个鸣放高潮。<sup>【300】</sup>

## 五、工程兵学院

5月10日，学院便成立了由政治部副主任孙耀忠为主任的文化革命办公室，并向各支部布置学习中央报刊发表的何明和高炬的两篇文章。它标志着学院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

5月17日，学院召开院、部两级党委会，传达贯彻总政治部关于全军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广州军区、工程兵政治部的要求，进一步部署学用毛主席著作和彻底清理批判邓拓小册子的问题。6月21日又召开全院讲用大会，批判“三家村”、“四家店”，进而掀起了向黑线猛烈开火的浪潮。

根据总政通知和全军电话会议精神，6月22-24日召开了由18级以上干部参加的院党委扩大会议，主要是学习领会“五一六通知”精神，研究安排全院人员传达贯彻此通知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等问题。在7月4日向全体军人传达“五一六通知”大会上，孙耀忠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彻底革命派，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从此，学院开始了面对面、背靠背、会内与会外、口头与书面相结合，不限时间、范围、对象的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问题的运动。7月16日，院党委召开有文化革命办公室人员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工程兵党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电报指示，研究进一步发动群众、重点挖“牛鬼蛇神”和揭批两条军事路线斗争中的问题。7月21日，工程兵政治部姚国民<sup>【301】</sup>副主任率工作组到学院指导运动，并于23日向全院排以上干部作动员，号召动用“四大”形式，把所谓资产阶级代理人、黑帮揪出来，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揭出来。于是，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也由正面教育为主进入了全面开展“四大”阶段。<sup>【302】</sup>

【300】《空军第二航空学院院史》，长春：空军第二航空学院，2002年，页93-95。

【301】姚国民，1955年授衔少将。

【302】工程兵指挥学院院史办公室：《工程兵指挥学院历史》，1994年，页265-266。

## 六、沈阳军区学校

文化大革命前，军区只有锦州步兵学校和大连军医学院<sup>[303]</sup>，另四所护士学校属各医院建制。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军区党委决定，两所学校是重点整顿单位，要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开展“四大”。运动的重点是揭发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肃清文艺黑线、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教学思想的影响。原来部署，学校的运动大体上分四个步骤：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彻底揭发问题；二、搞好重点人的批判斗争，群众进行自我教育；三、发动群众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试、招生制度等问题，进行鸣放，进行改革；四、总结经验，落实改革措施，整顿组织。

7月，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运动一开始，两所学校都把重点放在宣传部门和教研室，贴出了大量大字报，对几名写有文艺作品的宣传干部和几名有独到见地的教研人员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同一月，军区派工作组帮助校党委领导运动，8月，根据军委总政关于撤销院校工作组的通知精神，工作组当即撤销，运动仍由校党委领导。<sup>[304]</sup>

## 第十九节 海、空军的两个会议

### 一、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会及党委扩大会议

5月27日至6月16日，海军党委在北京召开第三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党委委员26人，监委委员15人，列席会议的有军级党委负责干部4人。经叶剑英批准，李作鹏5月中旬离京到江西庐山休养，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会议以“彻底肃清罗瑞卿的错误对海军的影响”为中心议题，学习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传达了1965年12月上海会议和1966年春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京西宾馆会议）精神，“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

全会于6月16日结束，翌日，海军即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参加扩大会议的除出席三届三次全会人员外，还增加了师（支队）以上单位的主要领导，共计136人。会议原定议题为：传达贯彻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精神，学习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惟在党委扩大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会议领导小组便作出决定，撤销海军党委4月25日向军委报告中关于党委扩大会议不谈常委内部团结问题的决定，提出“海军党委常委的团结问题，是两种建军思想、两条建军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现

<sup>[303]</sup> 1966年初，各军区卫生学校更名为军医学院。

<sup>[304]</sup>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史》第二卷，页20。

在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会议在王宏坤<sup>[305]</sup>、张秀川等引导下，对萧劲光、苏振华进行批判，并提出“萧、苏不能领导会议，要王宏坤领导。”王宏坤则提出要因病未参加会议的李作鹏回来领导。<sup>[306]</sup>

7月3日，叶剑英认为会议出现异常现象，指示会议4日休会一天。当晚，叶剑英与在大连休养的林彪通了电话，汇报了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情况。有关海军的问题，林彪从海军稳定的大局出发称，“海军现在领导不能改变，萧、苏两同志的领导不能改变。”“要自己洗澡，互相擦背，提高思想，但不能夺权。”林彪又称，“李作鹏、张秀川同志三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作上好的。”“萧、苏要支持李、张去工作，李、张要维护萧、苏的威信。”叶剑英听了林彪的意见后，当晚就报告了邓小平，邓说他完全同意。<sup>[307]</sup>

7月4日，在刘少奇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了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和军委贺龙、聂荣臻、陈毅、叶剑英副主席参加。会议由邓小平亲自记录。常委会议指示要点如下：

（一）党绝对不能允许搞地下活动。刘少奇特别指出，犯错误，路线错误是第二位的错误，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应该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公开讲自己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二）萧劲光、苏振华、吴法宪、余立金四同志，已经进行了自我批评，不够的，以后还可以再讲。常委其他同志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挖一下。

（三）用党委全会和党委扩大会议这种方式撤换领导的做法是错误的。<sup>[308]</sup>

7月7日，贺龙主持召开第52次军委常委会议，讨论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和海军领导班子问题。海军在京党委常委参加了会议。叶剑英在会上传达了政治局常委和林彪对海军问题的指示并讲话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前段会议，着重指出三点：第一，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应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公开讲自己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二，萧劲光、苏振华等已经进行了自我批评，应该欢迎，不够的以后再讲，其他同志也应深刻地谈一谈；第三，由会议本身作出决议撤掉领导，这种方式是错误的。他接着指出：海军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必须解决。萧劲光、苏振华在海军工作十多年，工作中虽然犯有错误，但那是属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有人要把他们打成黑帮，

**[305]** 1966年3月，王宏坤由海军副司令员转任海军第二政委。

**[306]** 海军政治部编研室：《海军政治工作大事记》，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267-268。

**[307]** 范硕：《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基金会，2001年，页44。

**[308]** 《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44-45。

甚至要罢他们的官，这种做法是危险的。一个人除非他不工作，只要做工作，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总会有错误。萧、苏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深刻检讨，中央常委、军委常委的同志都看了，我们认为是很好的，是满意的。我们应当欢迎这种进步，准许改正错误，准许革命，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李作鹏等人要维护萧、苏的威信，支持萧、苏的工作。萧、苏也要主动工作，不能放弃领导。后一阶段的会议，必须坚决地、诚心诚意地按照中央常委的指示方针办，同心协力把会议开好。基本的方针是团结，基本的方法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充分发扬民主，摆事实，讲道理，分清是非，消除成见，按照主席指示，“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sup>[309]</sup>

7月8日，叶剑英出席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向会议传达了7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7月7日第52次军委常委会议精神。叶要萧劲光、苏振华高姿态，注意掌握会议，不要矫枉过正。<sup>[310]</sup>之后，海军党委扩大会议重点是对王宏坤、张秀川进行揭发批判。王宏坤、张秀川分别作了检查。<sup>[311]</sup>

据海军材料：8月17日，林彪找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谈话，提出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批判王宏坤、张秀川适可而止，应立即“收兵停战”。8月18日，叶剑英、萧华向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林彪的指示。<sup>[312]</sup>

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于8月25日结束。会议通过了《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的决议<sup>[313]</sup>。决议强调团结，正是因为难以团结。决议虽勉强得以通过，惟海军党委尤其是常委内部的意见分歧，仍旧难以愈合。

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约一个月，9月23日，林彪到海军领导机关视察。林彪先后视察了海军政治部各部（处）、报社、法院、检察院和海军司令部作战、情报、通信等部门，同海军负责人一起合了影，并对海军党委常委讲了话。

【309】军事科学院：《叶剑英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页940。

【310】《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46。

【311】《海军政治工作大事记》，页268-269。李作鹏8月中旬方回到北京。

【312】《海军政治工作大事记》，页269。林彪指示的另一个版本是：8月17日晚，“杨成武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和萧劲光同志以及苏振华，传达林副主席八月十三日的指示：‘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工作转变作了很多工作，反对罗瑞卿是有功的。’林副主席对苏振华未作评价，只是说‘苏振华是反对我的。’并明确指令苏振华停止这个错误的会议，指出：‘必须立即收兵停战’，‘再开下去就会错上加错。’”见海政“红联总”红色新闻战士革命造反派、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编印：《海军两个司令部斗争大事记（1962年-1967年）》，1967年7月，页80。林彪指示应约为8月13日发出较为准确。

【313】决议的标题，为毛泽东1963年5月2日对海军的指示。





林彪视察海军大院，1966年9月。

9月30日，萧劲光、苏振华、李作鹏、王宏坤向叶剑英、萧华、杨成武报告了林彪对海军党委常委的讲话记录稿。内容是：

你们开了几个月的会，会议的情况我了解一些，但又不完全了解。你们争论的一些具体问题，谁是谁非，我没有兴趣。最有兴趣的是你们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把工作做好，各项工作不能退下来。

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你们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解决好了就可以发挥大家的力量。你们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应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搞清是非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要识大体，顾大局，团结起来，做好工作。要争取主动，不要被动。

一个领导班子，多一个人好，还是少一个人好？一般说来，多一个人比少一个人好，如果多一个人起反作用，那是特殊的情况。你们觉得在海军不行，到别处还可工作，不能把人排挤走。希望你们原班人马继续在海军工

作，我们没有要把你们那一个人调出海军，你们要把谁排挤出去我们也不赞成。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多做一分工作，多出一分成果。工作成果是不会自发和自流地产生的。

我们军队威信很高，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我们一定要做模范，做个好样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团结起来。战无不胜的力量靠毛泽东思想。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头脑，使我军彻底革命化，使我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sup>【314】</sup>

从以上讲话中可以体会到，林彪对海军党委内部的纷争，大体上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

## 二、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会议

6月6日，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党委委员32人，列席30人。会议由吴法宪主持。

1966年春的京西宾馆会议，在批判罗瑞卿时涉及了刘亚楼的问题。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在提及1965年2月间刘亚楼分别向叶群、林彪转达了罗瑞卿“四条意见”后称，“林彪同志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并向刘亚楼同志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同志的思想情况、恶劣倾向及近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中央在转发这个报告时所附的萧华在会议上的发言更称，“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的关系就很不正常，和刘亚楼同志的关系也极不正常。当然，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的工具，直到临死才说出自己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sup>【315】</sup>

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的召开，主要目的是联系空军的实际批罗。而中共中央[66]268号文件将罗与刘亚楼联系起来，为一些不满刘亚楼生前强悍、霸道作风的党委成员找到了出气的机会，并延及受到刘亚楼重用的吴法宪、余立金。

【314】《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编年史（1949—1983）》，页742—743。

【315】萧华：《坚决保卫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篡军反党的阴谋》。

据一本聂凤智<sup>[316]</sup>的传记形容：“会议一开始就秩序大乱，吴法宪、余立金根本压不住台。有的对吴法宪、余立金义愤填膺；有的对刘亚楼痛心疾首。有的常委在说到刘亚楼一言堂、一长制、飞扬跋扈、压制民主时，竟痛哭流涕。”<sup>[317]</sup>



空防合并后的空军党委会。前排左起成钧、刘亚楼、吴法宪、刘震，后排左起徐深吉、曹里怀、谭家述、王辉球、常乾坤。

空军党委会时由 11 人组成，即吴法宪（书记，司令员）、余立金（副书记，政委）、王秉璋（副书记，副司令员）、成钧（副书记，副司令员）、刘震（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司令员）、谭家述（副司令员）、常乾坤（副司令员）、徐深吉（副司令员）、张廷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辉球（副政委）。据吴法宪回忆，反刘、吴、余的，“只见刘震带头，不仅曹里怀、徐深吉、成

钧，甚至连谭家述、常乾坤、王辉球都跟了上来。”<sup>[318]</sup>吴法宪、余立金在常委中成为少数派。

党委委员中反刘、吴、余的，据吴法宪称，<sup>[319]</sup>有黄立清、聂凤智、吴富善、傅传作、廖冠贤等。<sup>[320]</sup>

全会甫一召开，总政即派了以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友之为组长的工作组列席会议。叶剑英也直接派了他的秘书李文芳列席。6月9日，叶剑英写信给空军党委会常委会议称：“我听了办公室李文芳同志关于你们党委会七、八日下午会议情况的汇报，很高兴。特别是空军各军区的同志，对空军党委常委的批评，有高度的严肃性和原则性。空军党委常委各同志应该严肃地对待来自下面的批评。这种批评对我个人来说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空军党委领导核心一定要从

【316】 聂凤智，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空军党委委员。1955年授衔空军中将。

【317】 松植：《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页301。

【318】 《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页573。

【319】 《吴法宪回忆录》下，页576。

【320】 黄立清，时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1955年授衔防空军少将。吴富善，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1955年授衔空军中将。傅传作，时任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廖冠贤，时任武汉军区空军副政委，1955年授衔少将。

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党委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经常思想见面，相互间要常提意见，对其他同志的错误不要当作某种资料去收集，看到同志有了错误，要随时提出来，不要使问题成堆。希望你们这次会议是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胜利的会议，是团结的会议。”<sup>【321】</sup>

叶剑英此时所表现的，更多的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全会批刘、吴、余的气氛，亦并未因叶剑英这封信而有所减弱。

关于刘亚楼在空军中的问题，聂凤智在全会期间于6月14日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颇为典型。聂称：用中央军委立空军为标兵的三条理由衡量，显然不够。一是“抓两头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实际上，“上头”就没有抓好。刘亚楼主持空军工作期间，毛主席的许多指示，如关于未来战争战略方针问题的指示，大军区传达了，空军都听不到；有时传达了，又用自己的话讲，让人分不清哪些是毛主席的指示，哪些是刘亚楼自己的东西，搞得思想十分混乱。因此，空军党委并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个第一”也更谈不上“落实”。二是“党委班子团结好，有个好班子”。什么好班子！党委常委内只有刘亚楼的“一言堂”，根本没有其他成员的应有地位，本身就没有搞好团结。三是“要求严格，雷厉风行”。其实是打着严格要求、雷厉风行的旗号，通过生硬粗暴的做法，大搞惩办主义，形式主义，使得空军内部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相互吹捧，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加上刘亚楼本人有些问题也影响极坏。“如果放到下面”，聂凤智最后结论说：“任何一级党委，都应属于烂掉了的单位！”<sup>【322】</sup>

会议上批刘的火药味十足，“与此同时，下面部队如武汉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沈阳军区空军等，却由于在学习268号文件中揭发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纷纷打来电报开始向空军党委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sup>【323】</sup>

6月19日晚，空军党委在研究如何答复下面部队的意见时，大多数人认为精神是好的，是贯彻和执行中央指示，应该表示鼓励。只有刘锦平<sup>【324】</sup>说，电报中有许多严重的不健康因素。聂凤智站起来大声说：“不能同意刘锦平的看法！以前刘亚楼主持空军工作，下面不敢对空军党委提意见；谁提意见，谁有一点个人独立的见解，谁就会遭受打击。现在刚刚提了一点意见，就说人家是不健康因素，

【321】《叶剑英年谱》下，页938-939。

【322】《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页303。刘亚楼生前，空军曾被树为全军标兵。

【323】《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页304。

【324】刘锦平，时任民航总局政委，空军党委委员。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

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是无法让人信服的！”聂凤智甚至提出，刘亚楼不能“盖棺论定”，而应“盖棺重定”！<sup>【325】</sup>

据《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称，“几天后，贺龙听到了空军会议的一些情况。”贺龙称，“看来，空军这个标兵是有些问题。过去不但你们受了蒙蔽，我们也受了蒙蔽，林副主席也受了蒙蔽。有问题揭开来好。有问题不揭，将来焐出大事来，那损失就大了！”<sup>【326】</sup>而据吴法宪、余立金 1966 年 9 月 3 日给林彪的报告则称，“大概是 6 月 19 日晚饭后，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等三人到贺龙同志家里，贺龙同志主动问及空军党委全会情况，说了一些看法，和林副主席、叶副主席的看法是对立的。”<sup>【327】</sup>

据中央 [66]268 号文件精神，贺龙的说法表面似无什么大碍。但贺龙错在：一、未经与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商量，对空军高层的矛盾匆匆表态，有越权之嫌；二、其政治敏感度显然不足，未有预料到几句话就可以激化矛盾。对比起来，叶剑英的处事手法就圆滑、聪明得多。

7 月 3 日晚，叶剑英与林彪通电话，汇报了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据吴法宪 1980 年 10 月 14 日的交待，林彪当时表态称，“在空军现在这个领导班子中比较起来还是吴法宪、余立金比较正，刘震、成钧等人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是不允许的。”<sup>【328】</sup>

在林彪 7 月 3 日表态及 7 月 4 日刘少奇处召开的专门研究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后，7 月 11 日，贺龙主持第 53 次军委常委会议，讨论空军党委扩大会议和空军领导班子问题。

据《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一书称：

贺龙首先说明，最近中央常委召集军委常委同志开了一次会议，陶铸同志也参加了，专门讨论了海军和空军的问题。他先请叶剑英进行传达。

叶剑英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专为解决空军问题而召开的。空军建军以来，据说已经开过六十多次全会了。中央、军委是很信任你们的，从来没有像这次会议这样来抓。

【325】《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页 305。

【326】《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页 306。

【327】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北京：《党史研究资料》，1992 年第 6 期。

【328】《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

他批评空军前一段会议，不像个老干部开会，像个小孩子开会，讲了些错话，作了些错事，弄得军委不能不出来过问。他说，“等到你们陷下去了，再要我们这些老年人来抬你们，就抬不动了。因此，这个会是非开不可的。”

叶剑英先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针对空军常委中有人搞小动作，企图撤换空军两个第二把手的问题，提出批评。他形象引用三国人物的典故，批评某些人“罢官”“夺权”斗争，真是“天下英雄谁敌手，可惜今天无曹刘。”

叶剑英在发言中再次传达毛泽东主席1963年5月2日对海军的指示，“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他强调空军的同志也一定要认真学习，坚决执行。他意味深长地说：“同志们，空军的任务是很繁重的，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空军要成倍的发展。这样繁重的任务，不团结起来，不以大局为重，怎么行呢！”

叶剑英讲完后，空军常委11位同志即先后表态发言。一致表示拥护中央和军委和叶副主席的意见。多数人主动检讨自己的错误。

在听取各同志发言过程中，叶剑英和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陶铸时有插话，无非是劝告大家多作自我批评，搞好团结。<sup>【329】</sup>

据《聂荣臻年谱》，聂荣臻“7月11日上午，出席第五十三次军委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空军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聂荣臻在会上说：‘空军建设已有十多年，应该肯定是有成绩的。我们建设一支空军是不容易的。这虽然不能归功于刘亚楼一个人，但刘亚楼是有一份的。……你们硬是要把刘亚楼同志搞得很臭，说标兵也是假的，硬要把空军几十万人搞得灰溜溜的，这是否有利？这是一个关系到几十万人的荣誉问题，这会有什么严重后果？我很担忧……中央已经明确指出，搞地下活动的性质最严重。’”<sup>【330】</sup>

由于林彪的表态，到了此际，军委常委包括贺龙，意见一致，都是支持吴、余，批评“搞罢官夺权”的空军党委常委中的几个人。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自此风向逆转。

8月中旬，从大连回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林彪，约吴法宪向其汇报空军三届十一次全会的情况。8月24日，空军党委向军委报送关于刘震停职反省问题的请示报告。9月12日，军委批准了这一报告。

9月3日，吴法宪、余立金向林彪书面报告空军三届十一次全会的情况。该报告除附上了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4人关于贺龙6月份有关三届十一

【329】《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47-48。

【330】周均伦：《聂荣臻年谱》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021。

次全会的表态所写的材料外，还转述了吴富善8月20日对贺龙的揭发，然后说：“我们觉得空军党委这次全会所以在会议前期方向偏了，是和贺龙同志在上面的幕后活动有很大关系的。”林彪将此报告和所附材料报送毛泽东。<sup>【331】</sup>

9月7日，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叶剑英和总部领导萧华、杨成武、张宗逊、彭绍辉、张爱萍、刘志坚等接见了参加全会的人员。接见后，叶剑英、杨成武作了讲话。9月8日上午，吴法宪在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会议于当日结束。

三届十一次全会在最后阶段调整了党委常委成员。除全会期间军委指示须停职反省的刘震、张廷发<sup>【332】</sup>外，党委常委中其他参与“罢官夺权”活动者，包括成钧，都没有动，都未作组织处理。10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吴法宪为空军党委第一书记，余立金为第二书记；增补罗元发、邝任农、刘锦平为空军党委常委，罗元发并为副书记。调整后的常委会由十二人组成；吴法宪（第一书记，司令员）、余立金（第二书记，政委）、王秉璋（副书记，副司令员）、成钧（副书记，副司令员）、罗元发（副书记，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空司令员）、曹里怀（副司令员）、谭家述（副司令员）、邝任农（副司令员）、常乾坤（副司令员）、徐深吉（副司令员）、王辉球（副政委）、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sup>【333】</sup>

## 第二十章 八届十一中全会

### 一、“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王年一认为：“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文化大革命被认为压下去了。为了再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使文化大革命更加合法化，决定召开全会。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仓促召开的，7月24日才发出通知，一周后即正式召开会议。<sup>【334】</sup>

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央委员67人到会，约占在世中委、候补中委的78%。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列席会议。刘志坚、谢镗忠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身份列席会议，也是列席人员中仅有的两位军队代表。

【331】《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

【332】张廷发的罪名是“罗瑞卿在空军的代理人”，“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罗瑞卿分子”。

【333】空军政治部：《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1集，北京：蓝天出版社，1991年，页34-35。罗元发，邝任农，1955年授衔空军中将军。

【334】《大动乱的年代》，页51。



左起：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刘少奇、朱德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1966年8月。

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开幕。毛泽东主持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陈伯达先后讲了话。

邓小平宣布会议议程称：“会议的开法刚才主席讲了，要开五天，今天算第一天，正式开会的的第一天，以后开三天小组会，最后一天再议一下，通过文件。”“这次会议主要的工作是：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全会要搞公报，最后要通过公报。……四、就是法律手续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曾经决定撤销彭、罗、陆、杨中央书记处和政府的职务，决定补充陶铸同志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按法律手续要在这一次全会上决定。”刘少奇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工作组问题。二是简要地叙述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陈伯达主要讲了两点：一是工作组做了坏事。二是官做大了不要脱离群众。<sup>【335】</sup>

当陈伯达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时，毛泽东说：“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

---

【335】《大动乱的年代》，页51-52。



播，乱子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只有依靠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最后强调要由中央全会就文化大革命问题正式作出决定。他说：“要决定。要推翻这个决定，也要到下次全会。”<sup>[336]</sup>

8月2-3日，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8月4日，全会发生异常情况。原定下午召开大会，与会者到会后改开小组会。下午在人大会议福建厅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十分激烈的讲话。

毛泽东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肃处理。<sup>[337]</sup>

当刘少奇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称：“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毛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称：“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sup>[338]</sup>

至此，毛、刘的矛盾已在中央全会上公开化。毛泽东在会上决定，当日不开大会了，各组传达、讨论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全会议程也随之改变。

【336】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记录，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26。

【337】 《大动乱的年代》，页51-52。

【338】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6年8月4日。《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27-1428。

## 二、炮打司令部

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发文宣布：“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同日，会议印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作为会议文件时，毛泽东在其中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后面，加括号写了一段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sup>【339】</sup>

同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的“大字报”是写在一张6月2日的《北京日报》上，当天的《北京日报》头版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的那段话写在社论的左边，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作了誊清。原文无标题，毛泽东在誊清稿上加了标题。

同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周同日约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谈话。次日，再约军队系统一些负责人谈话。<sup>【340】</sup>周恩来将毛泽东要与刘少奇摊牌的紧急情况，及时告知了军队负责人，告诫他们，必须站在毛一边。以后的情况清楚表明，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中，军队确实坚定地支持了毛。

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表明毛已经下了决心，要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他考虑接替刘位置的人是林彪。8月6日，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初步商定了调整后中央领导成员名单和排列次序。据《周恩来年谱》称，周今日“到毛泽东处开会，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根据会议商定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sup>【341】</sup>同日晚，毛泽东要徐业夫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来京参加会议。林彪在吴法宪陪同下，乘专机回到北京。<sup>【342】</sup>

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毛泽东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33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93。

【34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46。

【34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46。

【342】《大动乱的年代》，页56。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sup>[343]</sup>

8月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全体会议，周恩来主持，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十六条”强调：“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接受刘志坚的建议，对军队文革专列了一条（第15条）：“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 三、林彪取得党内第二号人物地位

回到北京的林彪，毫无疑问地、坚决地站到毛泽东一边，给予了毛最有力、最及时的支持。8月8日晚，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林彪在讲话时称：

昨天主席要我和同志们见一下面，认识一下。

这次文化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主席。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同志们进行过紧张的劳动，你们的工作碰到困难，有很大困难。运动开始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现在重整旗帜，再进攻，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变人的灵魂，把旧思想打垮。

林彪又称：

---

<sup>[343]</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90。

你们这些同志这几个月起了作用，今后还希望起更大作用。当然，泼冷水泼下去，靠毛主席扭转过来，不然，大山压下来顶不住，大石头挡住通不过去。

我是打仗的，对毛泽东思想，拼命想学、想用，但是了解很少。毛主席说：破旧的思想，用新的思想来代替。新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大学大立毛泽东思想，因为它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能改造人的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国是七亿人口的大国，要使全国有统一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才能有统一行动。七亿人口的大国家，没有统一的思想，还是一盘散沙。张三一篇，李四一篇，不能统一全国的思想，只有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才能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苏联没有把列宁主义思想灌输到人民中去，没有统一的无产阶级思想，是大错特错，必然向资本主义倒退。我们不要再犯这个错误，要把人民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变成全党的指南，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用孔孟之道巩固了它的政权，资产阶级有他们的思想体系巩固他们的政权。我们要用我们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人民利益的新的思想体系，就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驳倒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代替他们的思想体系。<sup>【344】</sup>

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闭幕会，林彪主持。大会有四项内容：一为通过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的名单；二为通过撤销和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三为选举；四为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在林彪的主持下，第一、第二项议程顺利通过。

大会进行第三项议程：选举。总监票人为李富春。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补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1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2人：谢富治、刘宁一。林彪在会上说明：今天选举不对外公布，不上报纸。

这次全会后，刘少奇在党内的排名由第二位贬至第八位，原来由刘、邓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体制不复存在。林彪取得了仅次于毛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地位，被冠之以毛的“亲密战友”称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军委副主席补选为

【344】 林彪同志接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时的讲话，1966年8月8日，记录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6年8月17日印发。



意气风发的毛林与落寞的刘少奇，1966年11月3日。

政治局委员，具军方背景的谢富治补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加强了军队在中央政治局的份量，充分体现了毛依靠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图。<sup>【345】</sup>

第四项议程为通过公报。康生在大会上宣读了公报，并且作了说明。林彪在会上宣布：（除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外）列席的都有表决权。场上全体举手，一致通过了会议公报。公报突出了毛泽东和林彪。公报称：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最后称：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已经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今天，主席又在会议上对我们作了极为宝贵的指示。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了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现在如果是没有别的问题，就宣布散会。<sup>【346】</sup>

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及时转向，没有林彪及军队的坚定支持，毛泽东要“扭转了这种局势”，“重整旗鼓，继续进攻”，基本没有可能。

8月12日全会闭幕后，紧接着于8月13-17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贯彻全会精神。8月13日，主持这次会议的林彪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发表讲话时，最后作了一些谦逊的表示：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

【345】 全会对彭真、彭德怀、张闻天、陆定一的政治局成员身份未作处理。全会以后，除彭德怀及已去世的罗荣桓外，十位元帅中其余八人皆为政治局委员（两人为常委）。

【346】 林彪同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1966年8月12日，记录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6年8月17日印发。





林彪坐在天安门城楼上休息晒太阳。

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持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就是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



身穿军装的周恩来、陶铸与江青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1966年9月15日。

示主席，一切照主席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就是朝令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sup>[347]</sup>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有首都和全国各地师生参加的百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穿上65式军装出席大会。同样身穿军装的林彪，在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副手以后，第一次以毛“亲密战友”的身份，紧紧跟随毛公开亮相。林彪发表了一个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在新华社的报道中，中央领导人的排列顺序是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结果排列的，实际上，这也就不动声色地向外界公布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改选的结果。

毛泽东第一次身着军服出现在公众场合，林彪作为军队主要领导人成为党的二号人物，这些举措旨在向外界发出强烈的明白无误的信号：军方拥护和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这场政治运动的坚强后盾。

【347】 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记录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6年8月17日印发。



## 第二十一节 军队对全会精神贯彻

### 一、林彪关于军以上机关文革和干部路线问题的指示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总政拟了一份电报，内容有三条：（1）派往军事院校的工作组也要撤销；（2）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委领导下进行；（3）在必要的时候，上级还可以派人到军事院校去。林彪同意，转毛泽东。毛泽东8月7日批示：“此件已阅，很好，同意发出。”总政当日发出。<sup>【348】</sup>

8月10日，林彪接见了几位在京及来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军队重要负责人。上午九时半，许世友向林彪汇报工作，提出了一些问题向林彪请示，林彪都作了具体指示，在座的有杨成武、刘志坚。许世友走了以后，林彪又和杨成武、刘志坚专门就干部路线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下午五时，林彪就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问题和干部路线问题，再次作了重要指示，在座的有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许世友、黄永胜、陈锡联、韩先楚。<sup>【349】</sup>



林彪与新晋政治局常委陶铸及政治局委员徐向前、聂荣臻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1966年9月15日。

关于干部路线问题，8月10日上午，林彪称：

今后，我们的干部政策，应该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罢谁的官。谁不突出政治，就是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这是我的话，请你们向军委常委报告，看看有什么意见。这个问题要和部队同志讲。这是方向性的问题，要把这个精神贯彻下去。

【348】《大动乱的年代》，页63-64。

【349】许世友、黄永胜、陈锡联、韩先楚均为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两种政策，两条路线，一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一种是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突出政治，单纯军事观点、技术观点，谨小慎微。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庸俗的、腐败的部队，不要把我们的军队变成萎靡不振的部队。对有错误的干部，能教育的要教育，能争取的要争取。不可救药的就罢官。

干部政策要注意。请杨成武同志注意一下这方面问题。请刘志坚同志好好和徐立清同志谈谈。现在我们解放军地位那么高，干部不要再出乱子。军队干部中，再出反毛主席的人，是最大的耻辱。要坚决按主席指示的五条接班人的原则和我今天讲的具体意见来办。

委托刘志坚同志好好把《解放军报》搞好，《解放军报》搞好了，部队突出政治了，抓好了这一主要环节，全面工作就带动了，毛主席思想就挂帅了。

去年冬天我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时，梁必业加进了几句话。他提出突出政治落实战备。这是错误的。战备不能和政治相提并论。<sup>【350】</sup>

10日下午，林彪就干部路线问题又称：

干部有几种。一种干部，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但是小节方面有毛病，有缺点。一种干部，他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反对毛主席，不突出政治，没有革命干劲，但小节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两种干部都是偏才。这两个偏才中应用哪一种人？要提拔第一种人，不用第二种人。对第二种人教育不改的，不可救药的，要罢官，要大大的罢。这样就使我们的军队有朝气，有强大的战斗力。不能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庸俗的、腐败的军队，不能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北洋军阀的军队。当然，第一种人中间，小节方面有毛病的，也要批评他，要他改正。批评他是为了用他，信任他。

还有一种干部是全才，大节也好，小节也好，当然很好。但是全才是不多的。

要通过这一次运动，全面的审查干部，该升的要升，该罢的要罢。我们军队干部如果再出反毛主席的人，就是最大的耻辱。<sup>【351】</sup>

关于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问题，林彪称：

【350】 林副主席八月十日指示纪要。总政治部：《工作通讯》第204期，页2-3。

【351】 林副主席八月十日指示纪要。总政治部：《工作通讯》第204期，页3。

部队要根据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决定，军级机关、军区、军兵种机关和总部机关及各院校，都要进行一次大整机关。我们借中央决定的东风，搞一次大整机关。把明年春节的整机关工作提前到现在九、十月进行。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民主，轰轰烈烈的点火大烧一阵。要认真地、切实地搞一下，不是走过场（师以下部队按军委总政指示。搞正面教育）。要全面审查干部，破“四旧”，立“四新”，精简机关。大整官僚机构，大整官僚作风。这次大整机关运动，从全军范围说，要搞两、三个月，各单位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安排，大体准备从九月份开始。

大整机关的主要任务、主要目的是检查：第一，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不是拥护毛主席；第二，是不是突出政治，还是单纯军事观点；第三，是不是有革命干劲（包括作风）。

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大整机关，改造思想，使机关思想革命化，破“四旧”，立“四新”，全面的审查干部，精简机关。

这个运动要结合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反党集团的错误进行，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贯彻中央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决定。根据运动中检查的结果，升官，罢官，该升的升，该罢的罢。大升一批，大罢一批。<sup>【352】</sup>

## 二、对林彪指示的传达贯彻

接着，林彪要求军委召开一次常委会，讨论几个问题：

请军委常委开一次会，把今天讲的问题讲一讲，我能到会我就到，不能到会就请你们讲一讲。

第一，干部路线问题。

第二，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问题。

第三，缩短兵役制问题。过去我的想法是多留点超期服役兵，但罗瑞卿另搞一套，把步兵服役期改为四年。服役期要缩短，是服两年，还是多少，请军委常委讨论，请示中央。

第四，部队军事政治训练比例的安排问题。

第五，部队的生产问题。请邱会作根据主席给我的信的指示精神，和部队的情况，提出一个全面方案，报军委讨论决定。

【352】 林副主席八月十日指示纪要。总政治部：《工作通讯》第204期，页4。

第六，加强边防问题。主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群众工作，搞好政治边防，做好边防群众工作，创造战场。不然，就不是巩固的边防。

第七，还有战备问题、民兵工作问题等等。<sup>[353]</sup>

林彪以上讲话，军委整理成《林副主席八月十日指示纪要》，以军委 [66]14 号文件传达至军内相当级别机关。

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谈及军队的文化革命时称：

前天晚上我同主席谈军队的文化革命问题，主席叫我向大家讲一讲，供地方工作参考。

现在军队里师级以下的单位，只搞正面教育，宣传文化革命的意义，学习文件，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军级以上机关，则发动群众搞大民主，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搞文化革命，大体上准备搞三个月。

同时，在运动中解决机关的精简问题。过去我们提倡四轻四重，主要的是机关轻，连队重。但是，机关还是很大。主席说，地方上也要注意这件事。<sup>[354]</sup>

林彪8月10日、13日讲话清楚表明，经他与毛泽东商讨，军级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大体上准备搞三个月”。惟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一时间上的预设，很快就被冲破。

8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第54次军委常委会议<sup>[355]</sup>，以传达、贯彻林彪8



林彪与政治局成员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董必武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1966年9月15日。

**[353]** 林彪关于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和干部路线等问题的谈话（节录），1966年8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教学研究资料》，1987年，页417-418。

**[354]** 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记录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6年8月17日印发。

**[355]** 此次会议，在下达会议纪要时，又称其为军委常委扩大会议。

月10日指示。会议由叶剑英主持，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和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出席。会议讨论了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干部路线等问题，对军队文化大革命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要根据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全军的军、省军区、军区、军种、兵种、院校和总部机关，开展一次轰轰烈烈的深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和目的，就是要根据中央十六条的精神，彻底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根据军队的实际情况，着重是：检查是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不是真诚拥护毛主席；二、检查是不是突出政治，还是单纯军事观点；三、检查是不是有革命干劲（包括作风）。

这次运动，要结合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错误，彻底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单纯军事观点，要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使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使干部思想和机关组织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革命化。

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大体上从今年九月份开始，用两三个月的时间进行。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整个运动大致分为鸣放辩论、重点批判、整改建设三个阶段。运动可以梯次展开，分批进行。具体部署由各大单位自行安排。明春就不再整顿机关了。

在运动中，有严重错误受到群众批判的人，在最后要定性质和罢官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干部任免的程序，报告上级党委审查批准。受批判的人中，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分子外，要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要通过这次运动全面地审查和调整干部，重点是军以上干部。军队的各级领导，一定要掌握在真正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干部手上，在这些关键的岗位上不能埋下颠覆的种子。

根据林彪同志早已提出的上轻下重的组编原则，在这次运动中要采取革命措施，坚决精简军以上机关。

师团机关和连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仍按总政治部已有的指示进行。

我军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担负着保卫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任务。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加强党委领导，一定要按照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精神，结合军队的实际情况，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进行。

军以上机关的四清任务，就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加以解决，不再单独搞四清运动。师团机关、连队和军以上机关的职工、家属的四清运动，仍按总政治部已有的指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后期，继续分期分批进行。<sup>【356】</sup>

### 三、关于军队与文革的一系列指示与规定

8月21日，中央以中央文件形式批转总参、总政《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央的批语称，“同意总参、总政的这个规定。军队发到团，传达到连的干部；地方发到县，传达到学校、工厂和公社党委。”该规定全文如下：

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各院校，各总部：

最近桂林、西安、兰州、包头等地相继发生学生上街游行、集会后，地方党政机关要求部队全副武装警戒会场、机关，据说桂林已调进一个营的武装部队，以应万一；还有的要求部队派人坐汽车向游行集会的学生或到工厂、学校去作宣传劝说工作等。结果搞得学生和部队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有的学生群众来到部队进行辩论，贴大字报；有的院校师生接连给军委发来电报，说部队围攻革命师生，等等。这种情况，已经造成部队和革命学生的对立，应引起极端重视。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所有部队绝对不准动用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更不得向学生开枪，就是向学生放空枪，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将要受到严格的纪律处分。

二、如地方党政机关邀请部队参加庆祝集会时，经大军区党委批准，可派少量部队参加，但一律不准携带武器。

三、在任何情况下地方党政机关要求调动部队时，必须报经军委批准。

四、学生与学生或学生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军队不要介入，如发现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由本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如公安机关力量不足，请求支援时，军队可予以协助。

五、部队不得派军队进入工厂、学校去搞宣传劝说活动。

【356】 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要。总政治部：《工作通讯》第204期，页5-7。

六、军队不得给地方学校、工厂、机关贴大字报，地方学校、工厂、机关给部队贴大字报时，应表示热烈欢迎。

七、任何逃避斗争，跑到军队躲藏的人，军队要他们回去，不得隐藏他们。

以上规定，希各单位切实遵照执行。

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8月23日，召开第55次军委常委会议。会议首先由刘志坚汇报全军文化大革命情况，当他谈到前一段运动中，只发现两个单位战士贴了大字报并已纠正时，叶剑英说：“社会上大乱一下不要紧，就靠军队不能乱。”<sup>【357】</sup>

林彪出席会议并在会议上对突出政治问题再次作了指示。叶剑英在会议最后讲话中，继续强调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军委常委来抓。今后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每周要向军委常委汇报一次。如有重要问题，临时召开军委常委会议。他重申，军队是专政的主要工具，师以下部队工作要抓紧；部队、院校机关，都一定要加强党委领导，有什么意见，可以找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总政治部要“把关关闸”，不要什么事都直接找中央。他要求党委指导斗争，必须让双方充分发表意见，尽量搞文斗。斗争中也可能产生一些问题，矛盾不要上交，要依靠自己解决。罢官问题，放到运动后期去处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要派一些人到重点单位去了解情况，他们只带耳朵听，不说话，几方面意见都要听。要全面地、准确地、及时地反映上来，把双方意见都反映上来。对一些科研单位的运动，他强调可以推迟，科研不要中断，并要军委另发一个通知。<sup>【358】</sup>

8月25日，中央以中央文件形式批转总政《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电报。中央批语称，“同意总政治部这个电报所提的三条意见。军队发到团，传达到连的干部；地方发到县，传达到学校、工厂和公社党委。”电报全文如下：

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各学院、总参、总后、国防科委政治部：

【357】《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57。

【358】《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57。

根据内蒙古军区报告，最近有些学生群众到军队来抓黑帮分子，戴高帽子、游街，进行斗争；有的地方要求部队交出重点批判对象；有的学生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这方面的问题，要很好处理：

一、学生和群众到军队机关抓紧黑帮分子，要向他们说明，他们要斗黑帮分子的革命热情，我们表示热烈欢迎。请他们相信解放军，一定会把军队内部的黑帮分子斗倒，斗臭，斗垮。军队中的黑帮分子，由军队负责处理。他们对军队内的黑帮分子有意见，有材料，有大字报，欢迎送来。

二、各大单位可向各地党委建议，在地方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如确有严重错误缺点，应当在所在工作的单位进行批判令其检讨，回军队后再酌情处理。

三、军队干部宿舍有武器、机密文件和常通军事机密电话，建议地方学生不要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

总政治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9月1日，叶剑英主持召开第56次军委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总政负责人关于驻京各大单位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汇报，决定除总部机关、各军区的宣传文化部门继续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外，总参三部、军队的工厂、师以下部队和边海防部队，都暂不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sup>【359】</sup>

9月2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第57次军委常委会议。会议听取刘志坚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讨论决定了《关于干部战士亲属被斗被抄情况及处理意见》、《关于安排地方院校及外国留学生到军事学院学习》等事项。叶剑英在会议最后作了讲话，指出：各大军区目前工作重点应即转向抓好部队工作，保持部队的正常秩序。全军的文化大革命，在抓好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紧跟着要注意抓好组织革命化的问题。首都复员军人要求成立红卫兵总部问题，要耐心进行解释，请总政注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sup>【360】</sup>

## 第二十二节 全会后的总部、军兵种机关“四大”

依照林彪8月10日“部队要根据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决定，军级机关、军区、军兵种机关和总部机关及各院校，都要进行一次大整机关。……搞大

【359】《叶剑英年谱》下，页943。

【360】《叶剑英年谱》下，页945。



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民主，轰轰烈烈的点火大烧一阵”的指示，军兵种机关和总部机关随即开展“四大”。具体情形，本节以总参、工程兵和通信兵部机关为例（部分叙述上溯至1966年6月）。

## 一、总参机关

### （一）总参“八二五事件”

8月22日，总参机关召开行政17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和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要。杨成武在大会上就总参机关文化大革命作了布置。<sup>【361】</sup>杨成武并宣布：在总参，“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司令部同时存在”，总参有一个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司令部，就是“以罗瑞卿为首的反革命司令部”。对“以罗瑞卿为首的反革命司令部”，“我们要把它消灭，把它打垮”。<sup>【362】</sup>

时为总参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又在总参文化革命办公室工作的陈虹文革结束后著文称，杨成武讲话后，“下午通信兵部就有人到旃坛寺<sup>【363】</sup>贴大字报，说杨成武的讲话是压制革命运动。随后，总参的一些部、局，也贴出一批大字报，其矛头大部分是对着总参领导的。”<sup>【364】</sup>

8月25日，毛泽东要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拟由总参外事局局长潘振武担任接见时的引见人。外事局的部分干部对潘振武有意见，曾向杨成武和分管外事局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建议，要求取消潘振武作引见人的资格，然而直到接见快要开始时，尚未得到答复。外事局的几个人为申述他们的意见，就直接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了电话，并提出建议不让潘振武作为引见人。陪同接见的周恩来得知后，没让潘振武参加接见。<sup>【365】</sup>

外事局部分干部获悉未让潘振武作为引见人的消息后，“写了《毛主席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的‘喜报’，送到总参党委会上。作战部部分同志写大字报表示支持，在群众的要求下，部长王尚荣同志和副部长雷英夫、王强、孟平等同志及李静签了名。”<sup>【366】</sup>这张大字报贴出之后，在总参机关随即出现一些揭发、批评杨成武的大字报。

【361】《总参谋部政治部大事记（1950—1994）》，页180。

【362】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总参领导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1978年11月2日。

【363】指旃檀寺大院，习称“国防部大院”，时大院内为总参、总政和国防科委机关所在地。

【364】陈虹：《总参“八二五”事件真相》。《党史博览》1999年第9期。

【365】《王尚荣将军》编写组：《王尚荣将军》，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页524；《总参领导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366】《总参领导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孟平，1965年大校军衔。李静，1961年晋升少将。

王尚荣、雷英夫在三四月中央工作小组会议期间，曾与杨成武联名作了《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的书面发言。王、雷此时所为，使貌似团结一致的总参批罗联盟出现了裂痕。

同日，贺龙办公室工作人员写了一张《炮轰办公厅党委》的大字报。杨成武把军委办公厅（兼总参办公厅）副主任金涛找到他家，让金以办公厅三个领导的名义写一张小字报，对“贺办”提出质问：为什么要炮轰办公厅党委？是谁指使他们这样搞的？金涛当即执笔起草。这张小字报，由路扬、金涛、郑汉浩三个副主任署名，打印后分发给军委常委和总参各副总长等。随后又组织一些部局给反帝路17号（贺龙住地）贴大字报，追后台。<sup>【367】</sup>

总参机关同一天发生的这两件事，后来被联系到一起。

陈虹称，王尚荣、雷英夫参与署名的总参作战部的大字报贴出来后，“周总理知道了很生气，很快给杨成武打来电话，询问情况，要杨提高警觉，并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随即亲笔写了一份证明，寄到总参党委来。”<sup>【368】</sup>

陈虹称，周恩来的证明原文是：

杨成武同志转告总参谋部各部、局党委：

昨（25）我陪同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杨成武同志向我反映，总参外事局同志提出不要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杨成武同志同意这一要求，并向我建议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我同意他的意见，并于事后报告了主席。可将这一情况转告有关同志。

周恩来

1966. 8. 26

8月27日，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也写来亲笔证明：

总参党委：

8月25日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之前，总参外事局孙启祥同志打来电话说，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我当即报告了杨成武请他决定。这时总理已到，他即向总理反映了我接外事局电话的情况，并向总理建议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总理当时同意了杨成武同志的意见，并及时告诉了潘振武同志不要参加了。

【367】《总参领导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金涛，1965年大校军衔。路扬，1961年晋升少将。

【368】《总参“八二五”事件真相》。

陈虹称，“总参党委收到这两件书面证明后，第二天公布于众。”“8月30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在三座门召开会议，萧华、张爱萍、王尚荣、雷英夫和杨成武都参加了。叶剑英主持会议并作了指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也讲了话，指出王尚荣、雷英夫的做法是错误的。他说，杨成武有什么缺点，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但不允许这么搞。张爱萍副总长也讲了话，批评了王、雷二人。”<sup>[369]</sup>

陈虹称，林彪得知8月25日总参机关发生的作战部大字报与“贺办”大字报等情况，坚决要撤王尚荣、雷英夫的职。

8月31日，杨成武主持召开总参党委扩大会议，由叶运高在会上宣布“王尚荣、雷英夫是反党阴谋活动”，“是利用外事局事件攻击、颠覆以杨成武为首的总参党委领导”。会议传达林彪的指示称：“八二五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王、雷要夺总参党委的权，要追后台。<sup>[370]</sup>9月1日，以军委名义宣布了王尚荣、雷英夫停职反省的决定。<sup>[371]</sup>9月3日，又派两位副总长到作战部召开干部会，动员对王尚荣、雷英夫开展揭发批判。9月26日，以李天佑兼任党委书记的作战部党委向总参党委写了建议组成专案小组的报告。10月4日，总参党委批复作战部党委：同意关于成立王尚荣、雷英夫专案小组的报告，并已报军委批准，专案小组以李天佑为组长。<sup>[372]</sup>

王尚荣、雷英夫因在大字报上署名参与批评杨成武而迅即被打倒，史称总参“八二五事件”。事件发生之后，对给杨成武贴的大字报，总参文化革命办公室在旃檀寺大院搞了集中展览、拍照，整理成文字材料，总参党委召开会议布置“反击”。而后，总参两次办“站错队”的干部的学习班，解决对“以杨成武同志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sup>[373]</sup>

【369】《总参“八二五”事件真相》。

【370】《王尚荣将军传》，页525；《总参领导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371】王尚荣此后被关押长达8年，1974年11月复出后任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雷英夫亦被关押多年，1978年7月任后勤学院训练部副教育长，后因写过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被审查，惟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372】《王尚荣将军传》，页525-526。

【373】《总参领导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杨成武此后一直对王尚荣、雷英夫耿耿于怀。1968年2月20日，他在总参第四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上说：“总参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八二五事件’，是反革命阴谋事件，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的。王、雷及其同党，有的在空军、海军，有的在兵种，他们的口供讲得清清楚楚的。65年就开了会，就准备好了的。他们那时说机会来了，外事局有坏人，来了个贺喜，欺骗受蒙蔽群众来夺权的，王、雷清清楚楚知道这个内容，……老早在首都工作组问题上，他们就想把我挤出首都工作组，谭与王、雷是三家村黑党委，出点子的是谭旌樵（总参作战部副部长），不亚于雷

对于总参“八二五事件”，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叶剑英等当时的态度是一致的。毛泽东翌年2月3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和巴卢库时称，“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sup>【374】</sup>

## （二）军委办公厅（兼总参办公厅）档案处

时任档案处业务指导科科长刘振杰（1980年代曾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兼档案处处长）在长篇回忆录《是这样走过来的》（自印本，2002年12月）一书中回忆道：

六月二十日，主管总参政治工作的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发的《关于揭发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通知》上批示：“肖向荣在档案工作上同曾三也是有联系的，请叶主任同路、金、郑副主任考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对我们档案馆（处）也要以主席思想为武器，发动该馆（处）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检查和清理，清除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根据这个批示，总参把档案处作为运动的重点单位，派来工作组，在处内展开揭发批判在档案工作中贯彻曾三、肖向荣“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斗争。档案处即陷于瘫痪状态，对全军的业务指导工作濒于停顿。

支部委员会立即召集会议，座谈关于揭发曾三反党罪行，并决定立即表态。支部会指定由我起草向中央办公厅的表态信。我当晚起草完毕，找甲义、志诚、玉润同志作了研究，同意后报厅党委批示。为了更好的、更深入的揭批曾、肖等的罪行，支部决定把国家档案局成立以来所发的文件摆出来，把我们转发的和自己制发的，及每个人的笔记本子都交出来，展览在西山办公楼二层靠最南头的会议室里的大桌子上，供同志们翻阅，以提供作为批判的资料。

总参政治部派来了以叶允初为组长的十六个人的工作组。当时档案处包括公务员在内编制二十一人，派这样一个强大的工作组，不能不使人感到问题的

---

英夫，是狗头军师。……最敬爱的林副主席英明伟大，站得高，看得远，他说是反革命行动，是夺权反夺权行动，要立即采取行动。现在铁证如山，事实证明，他们是贺龙、罗瑞卿、萧华、徐立清、刘邓、彭罗陆杨早就是勾结在一起的阴谋集团。”“他们恨我们毛主席、林副主席，恨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他们自己讲的最难办的是总参，主要是我，整掉杨成武是主要的。我有病，让我去养病，让许光达当总长，就是要整掉空军吴法宪、余立金，就是要整掉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就是要整掉邱会作、李天焕，快要整死了，叶群同志很勇敢，自己去的。”

【374】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的谈话（节录），1967年2月3日。

严重性。工作组进点后，即分别找同志们背靠背的揭发问题，办公厅参加工作组的王骏文找我个别谈话，在聊天中，他提出说：“听说你们跟档案局跟的很紧的？”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召开支部会座谈军队档案工作和曾三的关系问题，……

……

七月四日，军委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办公厅六月十三日《关于揭发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通知》，要求按通知精神，发动档案工作同志，对国家档案局以曾三同志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积极进行揭发，有关材料和意见由各大单位汇总后报军委办公厅。

对军委办公厅档案工作方面的意见，也希望提出。

金涛副主任在我们的会上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把档案处作为运动的重点单位，彻底肃清曾三、肖向荣的黑线影响，应看到作为重点，是组织上的“政治关怀”，是根据你们的工作性质和任务决定的，的确有修正主义的东西，这是必要性。你们要善于领导，敢于领导，大胆放手地发动群众。晚上即召开支委、小组长联席会，座谈金副主任的指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支委会号召八日中午以前写小字报表态，同志们对此非常积极严肃，二十个干部都写了表态的小字报，我写了题为《把自己作为重点的必要性》的表态小字报。我这种表态是真实的，我认识到运动的重点单位必然有重点人物，我担任业务指导科科长，全军档案工作规章制度的制定，指导性文件的起草发出，培训档案干部，办集训班的讲授材料，下部队指导工作等都出自我们科，有许多是我的主张或建议，在业务思想上接受曾三、肖向荣的影响是必然的，并且对我的使用都是肖向荣决定的，自己作为运动的重点人是自然的，我不是重点谁还是重点呢？如果说还有别人，那我是重点的重点，所以我诚心地作出了表态。

全处口诛笔伐揭露曾三的罪行，主要是口诛，笔伐费时费物，又没人看，或看不全，不如口诛好。口诛可以说全，说细，说的深刻，即转为大会小会的口诛。

### （三）总参军训部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简史》（总参军训部，1999年11月）一书披露：

6月至7月，按照总政治部的统一部署和总参谋部党委的要求，总参军训部批判了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副部长孙毅<sup>【375】</sup>因曾在一些讲话和报告中引用过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专栏中发表的文章，而受到群众的批判。后上级机关决定他“停职反省”，而后又进行审查。

8月12日，军训部召开大会，动员开展“四大”。当天就给部、处领导贴出大字报88张。截至9月20日，部内群众给部、处领导写大字报1964张，小字报84张。运动中，群众批评部党委对运动的领导软弱无力，要求停止张宗逊党委书记、彭施鲁<sup>【376】</sup>党委委员职务。总参8月25日决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张宗逊、副部长彭施鲁不参加军训部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而后张宗逊、彭施鲁受到批斗和审查。

9月11日，根据军委9月3日关于军队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律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坚持正面教育的指示，军训部对部属4个工厂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军委对军队工厂文化大革命问题指示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南京一一〇一工厂和长沙一一〇三工厂转入正面教育，不搞“四大”。正在进行“四清”的沈阳一一〇二工厂和上海一一〇四工厂继续搞好“四清”。工厂的正面教育和“四清”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要抓革命，促生产；工厂人员不许到地方进行串连，不准给地方贴大字报，不准地方学生、红卫兵到军队工厂进行串连；坚持文斗，不许武斗，不经上级批准，不许抓人；不准把武器借给地方；各工厂一律不组织红卫兵。

1967年1月，军训部机关成立了“红色革命造反兵团”、“东风兵团”、“东方红公社”等群众组织。2月1日，军委作出《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明确“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据此，各群众战斗组织立即自动解散。

1967年3月21日，为了解决领导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问题，根据总参党委的统一部署，军训部部、处领导进行“洗澡擦背”。首先进行动员，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共贴出大、小字报260余张。在鸣放的基础上，召开部党委扩大会和支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部、处领导分别在党委扩大会和支部会上作了检查。至4月13日“洗澡擦背”结束。

【375】 孙毅，1955年授衔中将。

【376】 彭施鲁，1961年晋升少将。

## 二、工程兵机关<sup>【377】</sup>

8月22日，工程兵机关群众贴出大字报，揭开了工程兵领导机关的文革序幕。8月23日，工程兵党委常委召开动员大会。工程兵党委第一书记、政委谭甫仁<sup>【378】</sup>代表常委讲话，对头一天贴大字报的群众表示欢迎，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号召大家“紧跟毛主席，彻底闹革命”；表示反对“创造许多框框条条去束缚群众手脚”，“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号召大家“……不管他是什么人，资格多老，职务多高，只要他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拥护毛主席，……就要揭发批判斗争。对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就更不用说了，必须斗倒、斗臭、斗垮！”谭甫仁还引火烧身，表示“热烈欢迎大家革到我们头上，首先向两个书记、常委开火，……”短短几天，机关贴出了数千张大字报。

由工程兵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于1967年12月撰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工程兵领导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回顾》一文称：

篡军反党分子谭友林<sup>【379】</sup>等人，面对着这场以他们和他们的主子为主要目标的文化大革命，立刻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迅速接过无产阶级的口号，转移斗争目标，开展了反党夺权活动。

首先，谭友林利用“信任群众，发动群众”的口号，伪装支持群众闹革命，摆出一副只有他支持群众的面孔，骗取部分群众信任，同时到处散布谭甫仁同志等革命领导干部“怕字当头”的舆论。这样，运动开始刚刚几天，他就以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的手法，和他的狗头军师反党分子王加当上了机关文革办公室正副主任，篡夺了文化革命领导权，控制了形势。

其次，谭友林以极“左”面目出现，以反对“框框条条”为名，大刮无政府主义风，把机关搞乱，从中浑水摸鱼。他们反对传达军委有关指示，煽动成立红卫兵，煽动按规定不参加“四大”的分队要求参加“四大”，亲自策划乱揪乱斗。为了制造白色恐怖，发展武斗，谭友林恶毒地歪曲最高指示，说什么“戴高帽子可以的，毛主席同意的。”一时间，机关乱揪乱斗现象此起彼伏，

【377】 主要资料来源：工程兵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天翻地覆慨而慷——工程兵领导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回顾》，1967年12月。

【378】 谭甫仁，1955年授衔中将。1965年7月，工程兵党委第二书记、政委黄志勇调任装甲兵党委第二书记、政委，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谭甫仁调任工程兵党委第一书记、政委，原党委第一书记陈士渠调整为第二书记，胡奇才、严庆堤、唐凯先后增补为党委常委。1965年12月，免去徐德操党委常委、副司令员及聂鹤亭副司令员职务。

【379】 谭友林，时任工程兵党委常委、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少将。谭自1966年9月后，失去人身自由长达六年半。1973年1月解除监禁。1975年7月重新分配工作后，历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政委，兰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

地方干部也被抓来戴高帽子游行示众。党的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十六条》得不到贯彻。

谭友林反党夺权的主要手段，是推行一条操纵保守派、镇压革命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千方百计转移群众视线，挑动部分群众大刮罢官风、停职风。文工团开展运动仅仅三天，把组长以上（除炊事班长）的干部全部罢了官，并且以“红卫兵”临场监督，强行改选了党支部。谭友林闻讯大喜，立即跑去支持，并且当着机关干部表扬他们“起了带头作用”，吹捧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骨干、主人”。在他的煽动下，革命派遭到围攻，干部人人自危。谭友林认为火候已到，立即把矛头引向党委第一书记谭甫仁同志。

谭友林总结了一九六四年假整风真夺权的经验教训<sup>【380】</sup>。加之他的黑后台已经放风要他当工程兵政委，因此，这一次首先打击谭甫仁同志。群众对谭甫仁同志的大字报很少，他找不出什么可以打倒的借口，就无中生有地给谭甫仁同志扣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帽子，说他成了运动的“绊脚石”。狗头军师王加则连夜编写谭甫仁、陈士榘同志的黑材料，借群众之名，向军委告状。同时接连抛出攻击谭甫仁的大字报。九月七日，谭友林精心策划，准备通过五至七天大会赶谭甫仁同志下台的所谓党委扩大会议开场了。这之前，要求“停止谭甫仁党内外一切职务，由谭友林领导运动”等大字报及时出笼配合。谭友林还别有用心地煽动说：“谭政委在武汉工作时，和司令员（陈再道）关系不好，团结不好调出来的。”会上，谭友林排斥了应该主持会议的陈士榘同志，以猝不及防的手段变党委扩大会为全体干部大会，逼使谭甫仁同志在大会上检讨。晚上，文工团部分受蒙蔽的群众在个别极“左”派的鼓动下，到办公楼抓谭甫仁同志，给了谭友林以有力的配合。谭友林这个野心家以为夺权登台在望，撕掉假面具，得意忘形地和他们一起声嘶力竭地大叫大嚷。但是，

---

【380】 1964年秋至1965年春，工程兵党委常委整风。据称此期间贺龙说过“对陈士榘要斗，不行就调离，还可以撤职。”贺还亲自跑到林彪处去告陈士榘的状，“企图撤掉陈士榘同志，换上他的心腹谭友林。”罗瑞卿称陈“儿子投修，是为老子打前站”，“是右派”。1964年10月29日，叶群传达林彪关于整风的指示称：对这些老干部有两个方针，一条是采取简单的办法，撤职，开除党籍，一棍子把他们打死，这不是我们党的方针；我们对这些干部还应该采取耐心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他们不是右派，不是牛鬼蛇神。还说：陈士榘和聂鹤亭问题不同。又说：总之，一不处分，二不撤职，只要他们把错误改了就好了。1965年1月，林彪称，对陈士榘的问题应当是：狠狠批评、狠狠信任，狠狠使用。见《天翻地覆慨而慷——工程兵领导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回顾》。



在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还击下，文工团的极“左”派和谭友林不得不色厉内荏地匆忙撤退，事态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当时，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发觉运动发展很不正常。数千张大字报中，对谭甫仁同志的很少，更没揭发出有打倒他的任何根据。虽然多数人还没有看清谭友林反党夺权的实质。但是九月八日，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部分同志根据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分析了当时一系列反常现象，认为谭友林有问题。有的贴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报。同时，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干部，职工自发地和文工团部分人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这场大辩论，教育了机关和文工团多数群众，扭转了少数人把主要矛头指向谭甫仁同志，抬谭友林夺权登台的错误方向，揭开了无产阶级反夺权的序幕，成为揪出贺龙死党篡军反党分子谭友林及其狗头军师反党分子王加的前哨站。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一直注视着贺、罗死党谭友林及其难兄难弟王尚荣、雷英夫等人借文化大革命实行反党夺权的罪恶活动。九月九日，军委派人传达了指示，指出谭友林是贺龙埋在工程兵的“定时炸弹”，王加是坏人；而谭甫仁、陈士榘同志是跟随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但是，由于“九九”会议牵涉到不仅仅是工程兵反夺权的斗争，不仅仅是谭友林的问题，因此，这个会议的内容规定不准传达。虽然如此，通过“九七”、“九八”的斗争，我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出了谭友林反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就在这天晚上，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部分战士，彻夜不眠，研究情况，分析实质，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造反精神，勇敢地站出来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工程兵的代理人谭友林及其狗头军师王加发动了猛烈的冲锋，一连串贴出了“《炮打谭甫仁》是株大毒草”、“谭友林扮演的甚么脚色”、“夺印”等革命大字报。一个晚上，反夺权的大字报贴满了整个大院。九月十日，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进一步揭发了谭友林反党夺权的罪恶事实，揪出了王加进行辩论。

就在这反夺权的关键时刻，保守派配合谭友林王加拼命反扑，他们大嚷大叫：“谭友林是红旗白旗还分不清！”“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有的人参加了“九九”会议，公开对抗军委指示，说什么“（抓谭友林）这个弯子不但群众转不过来，我也转不过来！”

在我无产阶级革命派义正词严的驳斥下，保守派节节败退。我无产阶级革命派猛打猛冲，仅仅两天时间，谭友林这个在工程兵隐藏了六年之久的危险人物和反党分子王加被揪了出来，机关文办改组，保守派威风大减，革命派意气奋发，文化革命领导权又回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领导干部陈士渠、谭甫仁同志手中，机关形势迅速好转。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九月十一日，林副主席亲自召见陈士渠、谭甫仁同志，向他们指出，谭友林为什么这样大胆？因为有××<sup>【381】</sup>这个根子。并指示他们：你们要提高警惕，你不打倒他，他就打倒你！谈到1964年假整风真夺权中贺龙等人利用国防工程总结问题压陈士渠同志时，林副主席一语道破了贺龙等人反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黑心，他说，他们这一手是很恶毒的。

### 三、通信兵部机关

通信兵部文革运动初期，即呈现了1965年8月由昆明军区副政委调任通信兵部政委的陈鹤桥与在职政委黄文明的尖锐矛盾。两人的冲突以陈鹤桥被宣布停职反省而告终。据黄文明的秘书吕若平后来回忆称：

1966年五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内乱。当时我不在北京，同机关的几十位同志跟着范阳春副政委、张凯参谋长到宁夏搞“四清”。8月份正值关键时刻，兵部通知：速返北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8月10日我们悄悄地撤离宁夏中宁县回到北京。刚一下车，有的同志对我和曹兰清（时任江文主任的秘书）说：“知情人回来了，等待你们揭发“重磅炸弹”呢”。我听后感到莫名其妙。什么“知情人”，什么“重磅炸弹”？一点也听不懂。后来到办公大楼一看，满楼大字报，特别是四楼（兵部首长办公室在四楼）有许多揭发批判江主任和黄政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大字报。我当时有些蒙，不知道为什么，从而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中。兵部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小组组长是陈鹤桥（时任通信兵第二政委），副组长是政治部副主任王善甫，后勤部副部长孙银彪是文革小组成员，也参与领导。兵党委书记兼政委黄文明、通信兵主任江文已不能领导文化大革命了。8月底至9月初，机关群众在陈、王、孙等领导鼓励和动员下，批判江、黄的大字报越来越多，要求江、黄向大家做检查。

---

【381】 ××，原文如此，指贺龙。

就在这个时候应陈鹤桥要求，召开了一次兵党委会。会上陈、王、孙批评江、黄、周涌和黎东汉等同志姿态不高，说要把通信兵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深入下去，江文和黄文明必须带头在机关群众大会上做检查，说清问题，逼着江文和黄文明分别上台做检查。江主任表态说：要让我上台挨批斗，不经军委批准不行。黄政委也说：我们都是军委任命的干部，在未经过军委批准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上台挨批斗。就这样把陈、王、孙的要求顶了回去，机关大会一拖再拖没有开成。

9月17日，总参王新亭副总长和总政徐立青副主任代表中央军委，在通信三团电话会议室召开了机关团以上领导干部大会，会上宣布通信兵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搞错了。江文、黄文明是革命领导干部，不应受到批判。陈鹤桥、王善甫和孙银彪所领导的通信兵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犯了方向性错误。消息传出，机关一片哗然，批判陈、王、孙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办公大楼。9月23日，中央军委通知：陈鹤桥停职反省。不久，王善甫和孙银彪二人由通信兵党委决定停职反省，从此通信兵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10月份以后，兵党委遵照中央的指示中断对各院、校的领导，外地军校学员开始来京串联。重庆工程学院的学生和宣化通校学生中的所谓红色造反派，肆无忌惮地冲击兵部的办公大楼，到处寻找可被利用批斗“走资派”的“黑材料”，抓住江主任或黄政委等领导同志没完没了地批判、哄斗，搅得办公室无法工作，有事也无法开会研究，弄得机关大院鸡犬不宁混乱不堪，使正常秩序被打乱，正常的业务工作无法进行，通信联络业务受到很大影响。

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中央军委对全军的指挥不中断，战备工作不受影响，兵党委12月初决定秘密离开北京，到通信四团驻地（京郊雁翅）开会，研究如何既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又能使部队稳定，通信联络不受影响。一天，黄政委让我悄悄通知各位兵部首长（有的通知了本人，有的通知了秘书），分别秘密乘车离开机关大院，到通信四团驻地。会议共开了两天，在会上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谈了感受，纷纷表示：这样搞下去全军非乱了不可，尤其周涌、黎东汉和龙振彪等人非常激动，讲了许多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话。江主任最担心的是通信联络出问题。黄政委很沉着，从开始到结束，始终诱导大家面对现实，出主意想办法，既要把运动搞下去又要保证通信联络。讨论研究的结果我记得有这么几条：

1、机关乱可以，但通信部队，尤其是三团绝对不能乱。坚持正面教育，绝对不准冲击，一定保持稳定，保证通信顺畅。这是铁的原则，必须始终坚持，如果军委通信出了问题就是犯罪，绝不允许。

2、分工江主任一部分精力抓通信业务，交待副参谋长屈培雍专门抓业务工作，不参加机关“文革”活动。

3、责成张凯副参谋长兼文革办主任，应付学生。

4、在“文革”形势发展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当前主要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准备应付困难局面。

散会后，常委们回到机关分别同学生座谈，做思想工作，不再到处躲藏了。我记得黄政委在西四的家中接待过几批造反派学生，龙副主任在兵部大院北门传达室接待过几批学生。

1967年初，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徐向前签署军委命令：军事院校学生一律回校闹革命。不准冲击领导机关，凡不服从者开除学籍，押送出京。这道命令公布后，吃住在兵部办公大楼的学生都撤了出来，匆忙返回学校，机关这才恢复了正常办公和生活。<sup>【382】</sup>

## 第二十三节 全会后的大军区机关“四大”

本节简述林彪8月10日指示后，沈阳、济南、广州、成都、兰州及内蒙古军区机关开展“四大”的情形（部分叙述上溯至1966年5月）。

### 一、沈阳军区机关<sup>【383】</sup>

8月底，军区党委召开三届六次全会，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要求部队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决定》、宣传《决定》的热潮；深刻领会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用《决定》精神，指导和推动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1月1日，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10月中央工作会议和总政10月29日会议精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总政会议精神，军区党委报请军委批准，对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作出安排：11月4日至12日，召开团以上干部会，部署研究军事训练和

【382】 吕若平：回忆黄文明政委在通信兵工作的一段情况。<http://www.szhgh.com/Article/red-china/redman/201712/155293.html>，最后访问：2020年3月1日。张凯，时任通信兵部副参谋长，1965年大校军衔。王善甫、屈培雍，1965年大校军衔。

【383】 主要资料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史》第二卷。

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13日至14日召开党委全委会，15日召开军区机关干部大会，正式动员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惟军区政治部机关于11月8日便提前贴出大字报。9-10日政治部党委委员泾水生（保卫部部长）、李树基（群众工作部部长）、张西潮（直属政治处主任）等也贴出大字报。三天中共贴出300多张大字报，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炮轰延安里，火烧陈锡联》（延安里是军区党委办公的地方）、军区首长《钓鱼十三例》等。

11日上午，军区政治部部分人把大字报贴到军区团以上干部会会场。11日下午，军区政治部120多人列队到延安里送《最后通牒》大字报。军区首长批评这种做法“违背十六条”，是“提前行动”。有些干部对此很不满意，认为这是压制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是所谓“双十事件”。11日下午，军区党委常委认为：军区政治部送大字报，说明我们平时脱离群众。对他们的革命热情要支持，但对他们采取《最后通牒》的做法，说钓鱼就是修正主义，我们提出保留意见是必要的。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对运动一定要敢于领导，善于领导，绝不能放弃领导。12日晚，军区政治部党委通过了军区党委犯了“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的看法。13日早，张西潮、李树基要求政治部党委副书记李少元<sup>【384】</sup>召开紧急部党委会。在这次会上，又把“看法”改成“部党委决议”。军区党委常委见群众已经贴出了许多大字报，便决定把原定15日的动员会提前到13日召开。陈锡联代表军区党委在会上对军区司、政、后、炮、装、工六大部机关干部进行文化大革命动员，检讨了对军区政治部部分同志送大字报问题处理不当，承认对群众的态度不好，犯了“严重的、不可饶恕的错误”。这虽然取得了一些群众的谅解，但有些群众仍然认为“没能接触实质”，“是假检讨”，并在大会上宣读了军区政治部党委关于军区党委犯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决议。14日，军区政治部的部分人，去军区司令部、后勤部串连，介绍所谓“双十事件”情况，争取他们一同起来，揭发批判军区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期间，军区司令部、后勤部、军区炮兵、装甲兵等机关都贴出许多大字报，揭发批判军区党委和本机关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军区炮兵政治部党委于11月14日也作出了军区炮兵党委犯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决定。各部门也有一些人的大字报提出了不同看法。16日，军区党委常委会不同意军区政治部党委关于军区党委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的决议，重申这次运动一定要发动群众，一定要加强党委对运动的领导。22日，军区党委常委发出指示：一、要政治挂帅，到群众中去；二、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三、群众中出

【384】 李少元，1955年授衔少将。

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要坚决防止群众斗群众；四、机关任何人不得到军以下机关串连，也不得到军区直属分队串连。23日，军区政治部召开支部书记联席会议，研究筹备召开“揭发批判军区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鉴于以上情况，军委于11月18日派来工作组，对军区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进行调查。12月2日，萧华代表军委在军区机关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上，宣布政治部带头造反的涇水生、李树基、张西潮是“政治扒手”，犯有“夺权反党”的错误。对涇水生进行隔离审查，李树基、张西潮停职反省。不久，李树基也被隔离审查。从此，军区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转入对涇、李、张等人的所谓“反党夺权”的斗争。这就是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所谓“前二十天”。

12月5日，军区党委常委决定：“当前，军区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进行对反党夺权的斗争。重点是揭发批判以涇水生、李树基、张西潮为代表的一小撮反党分子。要把绝大多数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解放出来，积极参加斗争。在这场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中，一小撮人所以敢这样搞，绝不是偶然的，一定要把根子挖出来。”12日，军区党委常委提出：当前，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还是继续深入地进行反夺权斗争，这是一场复杂的、尖锐的、严重的阶级斗争。要发动群众，进行“四大”，把一小撮反党分子的罪恶事实彻底揭露出来。各单位批判本单位重点人时要与涇、李、张等人结合起来。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军区炮兵等机关也都肯定本机关也有一小撮别有用心反党分子。因此，在进行所谓反击“反党夺权”斗争中，一些大字报给一些人戴上了“涇、李、张的大管家”、“参谋长”、“地下黑司令部成员”等帽子。几个大部机关的大字报都点了一些人的名，都形成了重点人，有的大字报还提出刘转连（军区副司令员）、吴保山（军区副政委）是涇、李、张的“黑后台”。1967年1月7-8日，军区召开六大部机关干部大会，批判斗争了涇、李、张。军区党委认为，这三个人确实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埋藏在军区机关内部的“定时炸弹”。至此，军区机关反击“反党夺权”斗争告一段落。这就是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所谓“后二十天”。

综上所述，“前二十天”，军区机关一些人起来“造反”，批军区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二十天”，是对“前二十天”有组织地进行反击，抓了人，整了一些干部。

从1967年1月23日开始，军区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转入揭发军区领导的问题。军区六大机关都贴出大量大字报，比较集中地揭发军区副司令员刘转

连的问题。3月7日，军区党委给军委上送《关于刘转连问题的报告》，列举刘转连反对突出政治、紧跟贺龙、支持涇、李、张反党夺权等所谓“罪状”。3月27日，军委批复：同意刘转连停职反省。此后，刘转连受到军区机关和军区“四大”单位多次斗争批判。<sup>【385】</sup>军区副政委吴保山也被认为是涇、李、张的黑后台，受到批判和排斥。<sup>【386】</sup>

1967年2月25日，军区党委请示军委：“目前，军区部队正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积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大联合、大夺权斗争，大力支持和帮助农村春耕生产工作。为此，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拟暂停一段时间。”3月3日，军委批复同意。至此军区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告一段落。

## 二、济南军区机关<sup>【387】</sup>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后，军区按照中央军委的规定和总政治部的指示精神，在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前卫报社以及歌舞团、话剧团、军乐队、体工队、印刷厂，军区卫生学校、总医院、军械修理厂、汽车修理厂、工程大队、军马场、水产养殖场、服务部，军区步兵学校，炮兵训练大队等部门和单位，开展了“四大”。另有16所军队医院未经批准，干部战士也自发地搞起了“四大”。这些开展“四大”的单位和地方一样，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大搞群众运动，成立了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运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抓黑帮”、“挖黑线”，对许多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人身攻击和政治陷害，各式各样的揪斗和打骂、体罚等违法行为泛滥成灾。据不完全统计，军区政治部、后勤部、内长山要塞区（该区机关是军区确定的先行开展运动的试点单位）、军区步兵学校等单位，到1967年2月下旬，仅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即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突出政治不好”等为由，将43名各级军政领导干部停职反省。其中有军区后勤部政委、内长山要塞区司令员和政委在内的军级干部八人<sup>【388】</sup>因“不突出政治”、“破坏‘支左’夺权”等被撤职的16人；因“从事反动宣传，破坏‘支左’夺权”被逮捕、拘留的十人，被行政看管的五人。另外，有40多名干部被抄家，四名干部被停发

【385】 刘转连此后被软禁、批斗，1975年8月方恢复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386】 吴保山1967年6月调离沈阳军区，任总参三部政委，后任福州军区副政委，1972年57岁时在福州逝世。

【387】 主要资料来源：济南军区史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史》第一卷，2008年。

【388】 时济南军区后勤部政委为唐健如，内长山要塞区司令员翟毅东，政委曹普南。

薪金。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耀文等 21 名领导干部的文件柜和办公室被造反派查封。第一四六、第九十一医院等七个单位和部门，被造反派夺取了领导权力。

### 三、广州军区机关<sup>【389】</sup>

8月9日，军区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会议检查了军区文化大革命情况，对深入开展运动作了新的部署。军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向常委作了汇报，认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发动群众问题上，不敢公开号召群众把主要矛头对准当权派，怕引火烧身；重点不重，打击面宽，揭露当权派不够；在贯彻政策上，依靠左派不坚定，冷落甚至打击中间派，不会瓦解敌人。针对这种情况，会议强调重点单位党委和领导要端正姿态，不要怕乱，要防右倾。会议决定撤回派到院校的工作组，改组军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重新成立的军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军区副政委郭成柱、陈发洪和政治部主任相炜、副主任江民风等 7 人组成，郭成柱任组长，陈发洪任副组长，相炜任常务副组长。同时，在领导小组之下成立办公室。这次会议表明，军区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指导思想开始由求稳怕乱向开展“四大”转变。<sup>【390】</sup>

军区党委常委传达林彪 8 月 10 日讲话后，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贯彻措施，对军区军以上机关运动作了新的部署。军区常委强调，两类矛盾都要批透，在批判过程中两类矛盾穿插进行；敌我矛盾要组织专案，有计划地组织斗争；四类干部要重新排队，由小组、支部组织实施，上级不要包办代替；“石头”（指妨碍文革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搬，搬了以后由本单位产生新的领导人，不要外来补充。会议决定增加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为军区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因群众有意见，旋即撤销），军区副参谋长胡继成、后勤部政委方毅华等为军区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并进一步加强文革办公室的力量。会议还决定，由军区文革小组组织一批人下到湖南省军区、广西军区、军区步兵学校、军区三局等重点单位去检查指导运动的开展。从此，军区部队军以上机关和院校、科研、文体等单位开始搞起了“四大”，文化大革命运动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sup>【391】</sup>

【389】 主要资料来源：广州军区史编纂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史》中册，2006年。

【390】 郭成柱，1955年授衔少将。陈发洪，1955年授衔少将。相炜，1961年晋升少将。江民风，1964年晋升少将。

【391】 胡继成，1955年授衔少将。方毅华，1964年晋升少将。



广州军区领导机关首先受到了冲击。在狂热的政治大气候下面，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在内，人们互相揭批和攻击。8月12日，军区文革小组负责人先后在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党委扩大会上提出，要“上下左右一起烧，什么人都可以揭，可以烧。”“运动中，群众的要求都要满足，如要求罢某某人的官，我们就同意。”“矛头要向上，先罢下边，再罢上边。”“有一百罢一百，有一千罢一千。”“要揭开军区领导的盖子。”军区政治部在4天之内就罢免了11名部、科长的职务，在机关掀起了“罢官风”。14-15日，军区党委召开军以上单位负责人和军区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文化大革命紧急会议，强调坚决贯彻十六条和林彪8月10日指示，对军区机关和部队的运动进行了新的部署，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强调不要把一般文工团员、体工队员、护士、学员等列入重点进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军区机关发生了“八一五事件”。

8月15日晚9时多和11时多，军区政治部约500名干部先后分成2批，打着彩旗，抬着大字报，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来到军区司令部，指责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不突出政治”、“搞折中主义”、“执行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要求广州军区主要领导当场表态，罢掉他的官，遭到了拒绝。情况反映到北京，军委领导人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并作了严肃的批评。军区党委常委随后多次开会，认定“八一五事件”的“大民主性质”，对参与其中的领导人给予了批评，并改组了军区文革小组，由军区党委副书记、副司令员文年生任组长，郭成柱任常务副组长，军区副司令员梁兴初任副组长。

在此前后，院校、医院、文艺团体和科研机构纷纷成立造反组织，其中文艺团体“造反”组织多达35个。

#### 四、成都军区机关

11月15日，成都军区被定为全军第一批开展“四大”的单位。同日，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代表军区党委常委作开展“四大”的动员报告。16日，大字报就贴满了机关办公区，矛头主要指向黄新廷和第二政委郭林祥，内容大都是揭发、批判黄新廷、郭林祥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18日，军区机关召开大会，批判、斗争黄新廷、郭林祥。第四政委甘渭汉、副司令员韦杰等被拉上台陪斗。一周以后，军委下达通知，令黄新廷、郭林祥“停职反省”，军区党委的工作由甘渭汉

主持。这期间，军区机关成立了不少群众组织，军事院校的学员从各地来到军区机关进行串连，军区领导受到内外夹攻。<sup>【392】</sup>

在成都军区大院子弟后来编写的《北较场风雨轶事》一书中，记述了当年批斗军区领导人大会的“盛况”：

1966年12月的一天下午约3点，北较场的二营门一阵骚动，从一辆卡车上押下来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第二政委廖志高，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一群身高体壮的体工队运动员冲过来，并把黄新廷、郭林祥、何正文、余述生以及七八个一、二级部的领导一起押过来，体工大队的两人押一个过去的领导，反拧双臂，像“喷气式飞机”一样走向数百米之外的北较场大礼堂。

大院里的干部和职工、家属约上千人一起跟着涌动。

被批斗的十多人在礼堂外的台阶上一字排开，反拧着的手臂被提得更高，头摞得更低。为了壮大批斗会声势，还调来了通信站和警卫营的部队，围观人甚众。

批斗会刚宣布开始，不知哪个部门的一个干部，就冲上前去抽打每人几记耳光，打得非常响亮。瞬间，围观的人都傻了，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围观的人群顿时躁动起来。接着，一个人开始念批判文章，因人声沸沸，没有人听清他念了些什么。这时，人群中又一个中年干部，冲到余述生副政委面前，喊了声：“余述生，你还认识我吗？”余述生正准备抬头，突被一拳重重地打在眼眶上，倾刻，肿起一个大包。原来，这是政治部群联部以前的一个副部长，因犯错误被组织处理调离，这次是回北较场“造反”的。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的批斗后，李井泉已经虚脱，眼看就要结束了，又从人群里冲出一个年轻人，拿着一根竹条子挨个地劈头盖脸抽打被批斗人。打完了，批斗会宣布结束。后来听说，这个青年是已故贺炳炎司令员的一个亲戚。以前，这些被批斗的领导，对他多有照顾，此人如此举动，可能是为了表白划清界线，大义灭亲，当然，文革后也没有谁再去理会这个以怨报恩的人了。



批斗黄新廷，1967年。

【392】 成都军区史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史》第一卷，2001年。

二营门前早已准备好几个大卡车，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廷、郭林祥四人立即被五花大绑，像是要推出午门斩首的架势，被造反派推上车头站立，然后开着车准备离开北较场，到市内游街示众。当车队要开出东营门时，被一群约近百人的军官拦下，声称要将被批斗的人交给他们处理。后来有人回忆，这是另一个造反组织，他们提出也要批斗这几个人。

双方当即发生激烈争吵，相执不下，一直到天已擦黑。

这时，不知谁大叫一声：“到5号楼开协调会。”或许因为天已黑暗下来，失去了押解他们到成都市区游街的效果，嘈杂的人群去了5号楼，协调一阵自然无果，大家散去。

批斗会的第二天，造反派就抄了黄新廷的家，那是原国民党中央军校校长的官邸，人称“黄埔楼”，蒋介石最后逃离大陆，就是从这个楼里出走。小楼被一个小院子围着，高大的围墙内外，是两排参天粗大的银杏树，大约近百棵，十分壮观。冬天，银杏的果实和树叶，洒满这个院落。此时正值冬季，树叶落尽，树干光秃秃，不再有往日的美好意境，显得有些满目苍凉，映应着这个小院此刻的变化。小院已没有哨兵站岗，铁门敞开，北较场的人可自由进出。

黄新廷一家人已被造反派勒令搬走，人走楼空，满地都是纸片，和黑胶木的唱片，一个华表造型的落地台灯，亦被推倒，斜靠在写字台旁，落地大窗帘被扯得七零八落，这情景很像电影里仓皇撤退的指挥部。有一个不大的腊化的灵芝草，完全是个摆件，军医学校的造反派走过之后，竟被掰掉了一大半。床上的席梦思床垫，也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搬到二营门去展览了。房子里人来人往，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干着顺手牵羊的勾当。<sup>【393】</sup>

## 五、兰州军区机关

有关兰州军区机关开展“四大”的情况，时任兰州军区政委、党委第二书记的洗恒汉，文革结束后在其自述《风雨八十载》中称：

对于军区机关开展“四大”，当时我们思想是不通的，弄不懂为什么要把军队搞乱？但“文化大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作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理解也得理解。当时林彪为此还有句名言：“理解的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执行”。因

【393】 黄西平、余昂、何凡、田小林：北较场开展“四大”的前后。《北较场风雨轶事》编委会：《北较场风雨轶事》，2016年，页195-196。

此回来后，仍然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这两个会议的精神和萧华的指示，并在军区机关作了动员。11月14日，军区机关“四大”就正式开始了。

……

机关“四大”一开始，政治部副主任张XX<sup>[394]</sup>就带头贴出大字报，给军区部分常委画了像，定了性。说张达志是“三反分子”；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达志、李书茂是“反党联盟”；张达志、我和高维嵩<sup>[395]</sup>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声称他有“重磅炸弹”，还要陆续不断地出大字报。这实际上是要把军区“四大”纳入他的这个框框进行。

他的大字报出来后，就得到了机关一部分人的拥护，说张XX同志站出来了。在我们召开常委会时，一部分“群众”和张XX同志就一起冲进了会议室，要求改组军区文革的领导，坚决反对由“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把持运动的领导权。在此压力下，我们作了无原则让步，由张XX接替李虎<sup>[396]</sup>同志担任文办主任，接着王XX<sup>[397]</sup>又接替高维嵩同志担任了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从此，王、张就掌握了兰州军区“文革”的领导权，军区党委领导实际陷于半瘫痪状态。

在王、张的一再威逼下，11月25日、26日召开了所谓的军区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有关“运动”如何深入开展的问题。但会议实际上无法正常召开，因为会议一开始，群众就闯进了会议室。会议室地方小装不下多少人，大部分群众就挤在会议室外面，由于听不清，有人就拉起了喇叭，外面的人就在喇叭底下听，群众称之为“喇叭会”。

会议名义上由我主持，实际上是王XX、张XX把持了会议。整个会议开成了由他们发问，我们被迫交代问题的斗争会。就连散会出场都按他们划分的左、中、右的顺序作了安排。第一个出场的是王XX，接着是张XX、杨嘉瑞、康健民、徐国珍、李书茂、高维嵩，最后是我和张达志。这个拉起大喇叭的“常委扩大会议”，我看也算是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一大发明创作了！

这个会散了以后，王XX、张XX便多次在常委会上根据所谓“革命群众”的意见，要求将张达志和我的印章收交文办管理，并公开宣布要窃听张达志

【394】 张××，指张子珍，时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晋升少将。1967年6月19日自杀身亡，年仅49岁。

【395】 高维嵩，时任兰州军区副政委。1955年授衔少将。

【396】 李虎，即李虬，时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5年大校军衔。

【397】 王××，指王庆生，时任兰州军区副政委。1961年晋升少将。1967年后被开除党籍、军籍，交群众管制。文革结束后获平反。

和我的电话，又宣布要限制我们的兵权，凡是要调动一个班的兵力，都要经过常委一致同意、一致签名才能生效。同时，又对张达志和我搞单线警卫（即由文办派人监视），就连徐国珍到北京参加军委碰头会议，文办也派权洪（原任军区老干部办公室主任）跟随到北京监视，从去到回一直跟着。

对我和张达志则到处是勒令、通知、海报，大会批、小会斗，搞车轮战，逼着要我交待同贺龙同志的关系问题；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们给我们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军区大院，压我下跪低头认罪，搞喷气式，站在桌子上弯腰，脖子上还挂上一个扩大器等等。由于没日没夜地挨批斗，吃不成饭也睡不成觉，有一次我实在是支持不住了，不知不觉中竟一头栽下台子来，当时就晕了过去……

……

1967年2月12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停止“四大”，准备参加“支左”。但实际上停不下来，张达志和我说话没有人听。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派群众组织拿出了红卫兵转来的王XX1933年在山西反省院写的反共宣言和反共文章，要求军区党委处理。

当时，我召集部分常委开了个会，要高维嵩同志去北京汇报，请求中央军委派人解决兰州军区的问题，并报送王XX自首变节的材料。高维嵩同志到北京后，当时萧华接见了他和原军区政治部部长刘凯（已病故）。萧华没有让他们汇报军区的情况，就说：“你们军区党委的报告我看了，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也了解。王XX这个材料是个高质量的叛徒（他连说了三声叛徒）。现在你们简单谈一下，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最后他答应军委派人到兰州军区解决问题。在这次接见中，萧华还指示兰州军区查一查王XX与黄克诚、薄一波的关系，（据萧华讲王当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是黄克诚提名的，又因王曾是山西牺盟会出来的干部，因此萧华要把王XX与黄克诚与薄一波挂上钩。幸亏我们没有查，否则又是一大罪状。）

过了两天，萧华又找高维嵩同志谈，大意是，军委不派人去了，你们自己解决，办法是整顿机关，有问题的部就停止工作整顿，有问题的人就停职检查，把张、洗、王、张都调到北京来，让群众在整顿机关中背靠背的揭发。揭发一段后，如果需要他们回去就让他们再回去。并说，张、洗来了住京西宾馆，王、张来了住海运仓。对你们的问题，军委还要开会研究，然后再正式批示。对王、张的问题，同意你们的意见，应该有所区别。王XX有历史问题，隔离审查；张XX没有历史问题，停职审查。高维嵩同志电话传达这些指

示后，他们于3月15日由北京返兰，我们四人于次日从兰州一起乘专机去北京。一下飞机，军委派来接机的两辆车已经在等待，其中一辆车将我和张达志同志直接送到京西宾馆，另一辆车将王XX和张XX拉到海运仓。

.....

由于在兰州军区机关“四大”期间，我是一直处于被批斗状态，“四大”停止以后，我又被暂时调到北京，让群众背靠背地揭发。所以军区机关搞“四大”、王XX的定性为叛徒、搞整顿机关，都是当时的总政主任萧华一手定的。特别是整顿机关，怎么定的、怎么搞的，具体问题我没有过问，也不便插手。

.....

1967年5月，军委让我回到兰州，紧接着我便奉命调出参加地方“支左”，并立即去北京领受“支左”任务，一直到8月5日我才又回到兰州，从此以后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支左”工作上了。<sup>【398】</sup>

#### (六) 内蒙古军区<sup>【399】</sup>

在5月22日至7月23日的华北局工作会议（北京前门饭店会议）上，内蒙古党、政、军第一把手乌兰夫被罗织罪名，受到严厉批判。会议声称乌兰夫有五大“罪状”：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号，自主体系；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三、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四、以1935年《宣言》为纲，进行民族分裂，搞独立王国；五、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会议给乌兰夫戴了三顶“帽子”：一、“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二、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分子；三、“走资派”。

8月1日至12日，乌兰夫尚可在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惟全会结束后的8月16日，中共中央即撤销了其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的职务。11月2日，又撤销其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职务，成为文革发动后首位被撤销职务的大军区级负责人。中央对其稍留有余地的是，他尚保留着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同时，中央对其采取了人身保护措施，并于1969年后在湖南长沙接受了两年多的军事监护。

【398】 洗恒汉：《风雨八十载》节选 <http://www.doc88.com/p-0512639228568.html>，最后访问：2020年3月1日。

【399】 主要资料来源：《乌兰夫传》编写组：《乌兰夫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乌嫩齐：《战地不了情》，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受乌兰夫的牵连，内蒙古军区蒙古族副司令员孔飞、副政委廷懋、司令部副参谋长塔拉、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简称孔廷塔鲍）相继被打倒受批判，军区副政委吴涛也被打成乌兰夫“黑干将”和“三反”分子一度被抄家、揪斗。

1967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1967年1月20日的电报和华北局1966年7月《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华北局的报告称，“在五月华北局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会议的一百四十六位同志（包括旗、县委书记），根据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揭露和批判了乌兰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根据揭露出的大量事实，乌兰夫的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上是内蒙古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乌兰夫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是挖出了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 第二十四节 国防科委机关及院校“四大”

### 一、国防科委机关

8月17日，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举行第46次会议，研究贯彻林彪关于军以上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决定国防科委机关开展“四大”。<sup>【400】</sup>

8月23日，国防科委机关部分群众用大字报形式，将“安东非正常死亡问题”<sup>【401】</sup>捅了出来，公之于众。这张张贴于国防科委大楼内的大字报，指责安东之死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自杀行为”，进而指安东为“反毛泽东思想的叛徒”。同时，该大字报还称，要以此为“突破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大无畏的造反精神”，“揭开国防科委的阶级斗争盖子”。<sup>【402】</sup>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顿时在机关内部引起轩然大波。一些人对此持激烈反对态度，认为安东之死尚属党内机密，况且中央关于安东死亡问题的指示精神也要求保密，不应该就此随便贴大字报。于是，反对者当晚趁夜深人静，将此大字报揭下并立即销毁。机关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为此展开激烈辩论。贴大字报的及其支持者认为，贴大字报是“四大”，是毛和党中央给予的权利，对方撕毁大字

【400】《国防科工委后勤工作大事记》，国防科工委后勤部，1989年，页101。

【401】1966年5月21日晨，受聂荣臻所倚重的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副主任安东，被发现处于昏迷状态，未几去世。当晚尸检报告的结论为：“误服”大剂量的安眠镇静药“眠尔通”，导致中枢神经麻痹死亡。安东在国防科委排名于聂荣臻、张爱萍、钟赤兵、罗舜初、唐延杰之后，为国防科委最年轻的副主任，去世时年仅48岁。

【402】参见王仲典：《安东将军之死》。《文史春秋》2007年第10期。

报，是反对“四大”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反动行动”；而揭撕大字报的那派群众则认为，这是保护国家机密的革命行动，同时指责对方有意将作为党和国家机密的事情捅出来，公之于众，是无组织、无纪律行动，应当批判。以这一事件为起因，是国防科委机关内部后来分裂成为观点严重对立的两大派的导火索之一。<sup>〔403〕</sup>

8月24日，国防科委机关举行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聂荣臻嘱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转达如下一段话：“国防科委成立十年了，我在科委工作时间是最久的，在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欢迎大家向我揭发批评。因身体有病，不能来参加今天的大会。”<sup>〔404〕</sup>

9月12日，聂荣臻在听取国防科委领导汇报运动情况时指出，科研工作不能停，国防科委领导要抓业务，要清理项目，疏通渠道。国防科委机关不能夺权。1964年，我因为身体不好，曾经想把国防科委的领导责任交给别的同志，但后来出现了取消国防科委的舆论，我不放心，没能交班。工业部和研究院合并的问题，不是别的单位不能领导研究院，问题是有些人指导方针不对头，想取消科学实验。科学实验是毛主席确定的三大革命运动之一，怎么能取消？1964年部院合并以后，从来没有想把研究院再要回来，变来变去，于工作不利。<sup>〔405〕</sup>

汇报中，又有人提到安东问题。聂对此称，你们说安东平时不突出政治，这有可能性，但是如果说他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看不是事实。<sup>〔406〕</sup>

## 二、国防科委所属院校

4月1日，军事工程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和炮兵工程学院正式改变名称、集体转业、不再列入军队序列之后，国防科委所属11所国防科技和工业高等院校已全部成为地方院校，受国防科委和地方双重领导。这些院校在国防科委内部的业务主管部门为第八局（院校局）。11所院校为：哈尔滨工程学院（军事工程学院改称）、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改称）、华东工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改称）、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南京航空学院和太原机械学院。

6月以后，这些院校泰半成为所在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中坚力量。以下，以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和哈尔滨工程学院为例。

〔403〕 王仲典：《安东将军之死》。

〔404〕 《聂荣臻年谱》下，页1026。

〔405〕 《聂荣臻年谱》下卷，页1028。

〔406〕 《安东将军之死》。



### (一) 西北电讯工程学院<sup>[407]</sup>

6月份，学院内即出现批判院党委的大字报。6月21日，国防科委联络组（组长为国防科委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刘景录）进院。6月23日，刘景录以电话向国防科委反映称，“院党委的确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二张（指学院党委书记张衍和政治部主任张路）<sup>[408]</sup>不是反党性质的问题。而运动的发展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领导上的缺点、错误，利用文革机会，又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缺乏经验，向党发动的一次猖狂进攻。”科委于6月24日回电，“同意汇报情况”。指示“不要组织反击”。6月30日，陕西省委工作组进院，直接领导运动。工作组支持学生给院党委提意见，与联络组有矛盾和斗争。

7月22日，钟赤兵将新任省委工作组组长刘镇<sup>[409]</sup>召至北京谈话，批评工作组称，“领导关系还是省委统一领导，统一安排，工作组受省委领导。这一次请刘政委来，主要是把军电的历史情况向你介绍一下，这对你工作有好处。这次要刘政委来，科委常委作了研究，并报聂副主席。这个学院刚转入地方，省委不太了解，总政比较了解。国防科委从64年才接过来，在王赤军、欧阳文时代把一些是非问题搞乱了，<sup>[410]</sup>同志间关系很不正常，互相猜疑，互相戒备，发展到非组织活动。我们开始去解决欧阳文问题时，差不多有20天没有讲话。经过反欧阳文三个月和部、系整风六个月，学校整风也还是搞得不彻底，……军电整顿过两次，头一次是总政刘志坚副主任在那里。第二次我和李信、徐平同志在那里搞。军电从64年才接收，还是心中有些底，领导改组了，调戴润生和张衍到那里去都是经过审查的，政治上我们信任他们。……这些情况陕西省委不知道，原来我不准备派联络组，后来考虑到这个学校复杂情况，还是派去了，随时向科委、省委反映情况，还有好处。工作组特别是王宗敏这个人，头脑不清醒，根本听不进科委联络组的意见。有意识地搞一场混战，不得已，才派徐平同志向省委介绍情况，介绍以后，舒同同志、萧潮同志也同意。考虑到工作组太弱，建议派人去加强，省委派刘政委去这很好，我们不知道你已到学校去了。……戴润生、张路有些右

**[407]** 主要资料来源：校史编委会编：《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校史（1947-1987）》，西安：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1987年；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赴京造反团：《我们坚决要求钟赤兵回西军电作彻底检查》，1966年12月。

**[408]** 张衍，1965年由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调任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政委。1961年晋升少将。张路，1965年大校军衔。

**[409]** 刘镇，时任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1961年晋升空军少将。

**[410]** 1961年至1965年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时期，曾进行过两次政治性整风。1964年3月前，着重批判了学院政委王赤军少将的“独立王国”错误，免去了王赤军的职务。1964年4月，国防科委又组成工作组到学院，经过近半年的调查，结论是院党委、政治部党委已经烂了，院长欧阳文中将“反党”被撤销职务。

倾，现在工作组不了解情况，我担心他们把左派当右派打，而把右派当成左派。总政62年搞，科委64年搞，但必定心里有底。联络组再可以给他们当个参谋嘛！经过大辩论，两张解放出来，我看就可以共同领导这次运动，这些人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运动过去了一个月，也没有揭出像样的材料嘛！一分为二问题实际上是强加在张路头上的。现在工作组陷得比较深了。他们把坏人当好人，把阵营搞乱，将来不好办，工作组糊涂就糊涂在这里。总政你也怀疑啊！科委你也不相信啊！科委是聂老总领导的嘛！我看工作组可以整顿一下，提高提高思想。”<sup>[411]</sup>

8月3日，省委工作组撤离学院。8月5日，联络组一手策划的“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成立。8月8日，国防科委联络组撤离。同日，与“筹委会”对立的“文化革命临时委员会”（简称“临委会”）成立。临委会以学生为主体，指称筹委会以干部和家属为主体。临委会自诩为造反派，指称筹委会为保皇派。8月18日，临委会派出首批代表80余人到北京国防科委，要求刘景录给他们澄清问题，并进行辩论。8月25日，钟赤兵和刘景录一起见了学生代表。9月3日，临委会又派出第二批代表80余人到京，要求国防科委交出刘景录回院对自己的错误作交待检查，9月6日，钟赤兵见学生代表，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9月15日，刘景录作书面检讨，国防科委将此检讨寄至学院。

“十六条”发布后，筹委会与临委会均走向社会，参与造西北局的反，炮轰陕西省委，频繁派人参加西安地区各种批斗会。临委会力量逐步壮大，而筹委会则受到排挤打击。

## （二）哈尔滨工程学院<sup>[412]</sup>

5月11日下午，全院召开文化大革命誓师动员大会，会上代理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居英宣布停课两周搞运动，并宣布成立院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刘居英，副组长张文峰（副院长）、卓明（党委副书记）。<sup>[413]</sup>

6月2日，学院各系陆续贴出不少大字报，质问院党委“为何压制群众，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晚上，各部系匆匆召开党员大会，要求“党员要站稳立场”，“学院是延安，不是西安”。6月3日，全院停课搞文化大革命。6月4日下午，刘居英从省里开会回来，传达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横扫

【411】 李信，时任总政国防科学工作部部长，1955年授衔少将。徐平，时任国防科委政治部副主任，文革期间为国防科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1965年大校军衔。戴润生，1964年8月由第七研究院政委调任军事电信工程学院院长，1955年授衔少将。舒同，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萧潮，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412】 主要资料来源：《哈军工传》（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作者滕叙究提供。

【413】 刘居英，原军事工程学院院长，1955年授衔少将。张文峰，原军事工程学院副教育长，1965年大校军衔。卓明，原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1965年大校军衔。

一切牛鬼蛇神……”此后半个月，两种意见的大字报展开激烈的斗争，保卫院党委的大字报占了上风。6月下旬，学院运动处于冷清状态，刘居英在全院做检查，表示与其胞兄陆平<sup>【414】</sup>划清界限。

7月16日，在五系（导弹工程系）大楼前一批学员自发组织辩论会，矛头直指刘居英。刘居英多次要求省委派工作组来学院领导运动。7月25日下午，在大操场召开全院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王一伦宣布刘居英退出院文革领导小组，检查错误。正式宣布省委派出以省军区副政委任允中<sup>【415】</sup>为首的省委工作队进驻学院，领导运动。7月30日，全院人员收听前一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实况录音。大会宣读了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全院群情沸腾。

8月1日，持不同观点的人在学院各处展开激烈的辩论。省委工作组已经无法控制局势。

8月2日晚，六系（计算机系）贴出海报：明日在俱乐部召开大辩论会。

8月3日晨，任允中向全院发表广播讲话，宣布省委工作组撤出学院。

院俱乐部里人山人海。大辩论会主题是“文革和各级党组织的关系”。

8月4日，大辩论会继续开。题目改为：“从前段运动看院党委能否领导我院文化大革命”。下午，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力安在会上代表省委宣布停止刘居英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8月5日，俱乐部大辩论会观点一边倒，主持人杜美平<sup>【416】</sup>宣读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语录，舞台上方便换了大字横幅“造反有理”。持造反观点的学员自称“造反派”，讥讽对立观点的是“保皇派”。

8月6日，院部分师生员工，在文庙图书馆东墙外小树林开辟与俱乐部大辩论会唱对台戏的另一辩论会，题目是：“当前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林彪长女林晓霖首先登台，发表影响很大的演讲。

8月7日，连续几天的俱乐部辩论会达到高潮，宣布成立“军工红色造反团”。

8月9日上午，成立“军工八八红旗战斗团”，至此，学院群众正式分裂为两大派。

8月10日下午，65级学员从绥化县“四清”前线造反归来，马上到俱乐部召开“造反有理誓师大会”，与学院将要举行的“庆祝党的十六条大会”发生冲突，

【414】 刘居英为已被中央点名并撤销职务的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原名刘志贤）的亲弟弟。

【415】 任允中，1965年大校军衔。

【416】 南京军区第七政委杜平之女。

工人与65级学员争夺话筒。学院各级党委已名存实亡。三天后，院办主任王序卿第一个被戴高帽游街。

8月11日，省委书记处书记王一伦、李力安来学院，在全院代表大会上，代表省委作第一次检查，承认省委在前一段运动中犯了方向错误。会后65级学员当面对王一伦，李力安说要继续开会揭发省委的问题。

8月16日，65级部分学生到省委贴出了“省委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的大字报，第二天，他们“向哈尔滨的混蛋们宣战”的大字报贴满大街。省委即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大、中学校，机关和开展社教的厂矿企业讨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大辩论”。院党委即号召全院党、团员响应省委号召，开展辩论。“造反团”抵制执行省委的通知。

8月18日上午，听完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北京和各地到北京的百万学生实况广播后，“造反团”和“八八团”分别上街游行，在北方大厦前广场上，受到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接见，潘表态支持“造反团”，引起“八八团”的愤慨。当晚，“八八团”在俱乐部召开红卫兵誓师大会，强迫潘复生与会讲话。

“造反团”用对联攻击“八八团”，两派矛盾加剧。

8月19日下午，“造反团”和由北京到哈尔滨串连的红卫兵一起，在院办公楼门前批斗了刘居英和政治部主任沙克，并给他们戴高帽子、抹黑脸、游街。之后，院、部、系的不少领导干部和一些基层干部也相继被批斗。

8月21日，“造反团”贴出“踢开绊脚石，解散院党委”的大字报，“八八团”贴大字报要“改组院党委”。两大派竞相批斗干部、教授和开始大规模恐怖的抄家，打砸抢行为层出不穷。

8月22-24日，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学院等49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起，召开“哈尔滨各界革命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点火大会”。潘复生参加了大会。大会提出要罢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李范五，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王一伦的官。<sup>[417]</sup>

8月23日，省委常委第588次会议，同意国防科委关于撤销刘居英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sup>[418]</sup>同日，“造反团”在体育馆门前再次批斗刘居英、张文峰和沙克。此后，在全市批斗刘居英，游街示众，成了家常便饭。

【417】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史志办公室：《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施政纪略》下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431。

【418】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施政纪略》下卷，页431。

8月24日,“造反团”发表紧急公告,宣布接管院、部、系文革办,并提出“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团”的口号。

8月25日,“八八团”发起召开批斗李范五、王一伦大会,要求把他们的“罪行”上报中央,并提出要把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揪回来。<sup>〔419〕</sup>

同日,全院人员收听“林彪副主席关于林晓霖问题的指示”。<sup>〔420〕</sup>

8月27日,全院第三大群众组织“东方红战斗团”宣布成立,但影响不大。

8月29日,“造反团”联合哈工大等高校,在红卫兵广场(八区体育场)召开70万人“火烧省委、炮打司令部”大会。

9月初,原军工毕业学员毛远新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10月以后,学院师生大多到全国各地串联并形成高潮。据有关史料称,文革期间,“军工造反团”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25个城市设立了联络站,到各地串联,鼓动并参与造反夺权。

### 三、北航“四大”与北航红旗二十八昼夜静坐事件<sup>〔421〕</sup>

6月2日,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出现批评院党委的许多大字报。翌日,一方面,批评院党委的大字报继续增多;另一方面,出现为院党委辩护的大字报,给院党委提意见的人受到围攻。6月4日,学院党委副书记程九柯在党委会上传达了国防科委八局副局长赵如璋<sup>〔422〕</sup>传达的科委指示及赵本人的意见。科委指示中的主攻方向仍是“三家村”黑帮,并要求在斗争中分左中右。据说赵如璋称,“什么时

〔419〕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施政纪略》下卷,页431。欧阳钦文革前曾长期担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

〔420〕 8月21日,林彪接见哈尔滨工程学院部分师生。在谈及有关林晓霖的问题时称,“林晓霖因长期不接受我的教育,屡教不改,处处与我作对,而且还有后台指挥她,政治上非常落后,表现不好,背着我在外面做了些坏事。因此九年来我拒绝见她。九年来已与她断绝来往,只是在经济上供给她,并屡次交代学校严格教育她,等待她的转变,但她一直表现不好,她一贯反对我,因此她在外边的一切政治表现都不能代表我的意见。她的所有错误言行,种种不良表现,都希望广大革命师生对她进行严格的揭露、批评和教育,使她的思想得到改造,痛改前非,请你们转告她,希望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听毛主席的话,真正和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向牛鬼蛇神进行坚决斗争和揭露,真正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上情况,请你们转告国防科委首长及潘复生同志并黑龙江省委,告哈尔滨有关院校革命师生员工同志。”同日,林晓霖被送到新疆国防科委第二十一基地软禁。

〔421〕 主要参考资料:北航红旗“伏虎”游击队:《北京航空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6年10月22日;罗舜初口述,罗小明整理:《国防部门前的二十八昼夜》。《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韩爱晶回忆(未刊稿);石兴国:《回忆45年前三次见毛主席》,http://blog.sina.com.cn/u/3667514280,最后访问:2014年1月20日。

〔422〕 赵如璋,1965年大校军衔。

候转到斗批学校的牛鬼蛇神，党委研究。”“大字报内容指定可靠人员去看，去抄录，将来斗争时有用的。叫大家放，才能放出右派。”

6月8日，以赵如璋为首的国防科委工作组（其中有毛泽东的大女儿、国防科委八局参谋李敏）进驻北航。赵如璋在全院欢迎大会上提出“工作组在院党委领导下工作”，“停课一周搞文化大革命”。

6月16日，国防科委责令院党委副书记周天行停职反省。中上层干部开始写大字报揭发周天行的问题。6月17日，赵如璋在全院大会上提出“有什么问题就揭什么问题，谁有问题就揭谁的问题”的口号，出现了“全面开花”的局面，各系纷纷将矛头对准了辅导员、干部、学生，引起了群众斗群众。6月22日，国防科委责令院党委书记王恒停职反省。

6月21日，3511班学生石兴国的大字报《一条“无头”黑线》贴出。大字报称，希望能发动群众揪出与北航有关的黑线及其后台，指出“工作组领导不力”。6月27日，赵如璋在全院大会上传达李雪峰报告，部署在全院开展大辩论，对象就是石兴国的大字报。从6月27日至7月6日，北航开展了“六二七大辩论”，其间，不少师生不认同工作组的观点，工作组接连组织批斗会，一下子点出了十几篇“大毒草”，对所谓“牛鬼蛇神”进行围攻。7月6日，赵如璋在全院大会上称，“大辩论性质是夺取文革领导权”，“扫出了石兴国之流牛鬼蛇神”。会后，工作组在全院师生中进行“左、中、右”排队，按其对待工作组的态度，将师生划分成4类：好的、犯错误的、犯严重错误的和右派。据韩爱晶称，“六二七大辩论”以后，约有1/5的师生被整黑材料，各基层单位对师生进行排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类分子约占近1/10，五千多学生中，约有四百多人排为四类分子，约一千人排为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三类分子。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在大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7月28日《关于撤销各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石兴国作为少数派代表与北航十多名代表一起出席会议，会后立即用广播向全院师生传达。8月2日，国防科委决定撤走北航工作组。8月3日，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北航红卫兵成立总部。

8月10日，北航师生四百多人到中央文革和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反映情况，要求赵如璋返校检查。翌日晚，工作组返回北航。8月14日晚，赵如璋在全院大会上作了为时12分钟的检查，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罗舜初等参加大会。8月19日，赵如璋第二次在全院大会上作检查，罗舜初在大会上宣读了聂荣臻的一封信。

信，并代表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作了检讨。会后，在文革筹委会和全院大部分师生员工同意下，工作组第二次离开北航。

8月20日，北航红旗战斗队正式成立，并提出“黑帮分子”游街以示庆祝。

据《北京航空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称：8月24日，“部分红旗战士找赵如璋要求当面澄清问题，赵如璋亲口答应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在国防科委接待站出来见红旗战士。”8月25日，“上午部分红旗战士应约到国防科委接待站找赵如璋澄清问题。”“9：00赵如璋送出信一封，说让红旗战士回去，说他开会不知到什么时间才结束。红旗战士决定等赵如璋开完会再澄清问题。”“红旗战士100多人在航校支持西电临委会与科委联络组组长刘景录（已停职反省）辩论。”<sup>【423】</sup>8月26日，“红旗战士在国防科委继续坚持斗争，赵如璋仍不接见。凌晨二时罗舜初到航校，罗舜初百般回避我们提出的问题，要红旗战士回学校。红卫兵、赤卫队<sup>【424】</sup>无理的冲进会场闹事。”“西电临委会的同志一直和航校红旗战士斗争在一起。”8月27日，“在科委的同志继续斗争，上午派出代表（哈军工、西军电也派出了代表）与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会谈没有成功，科委有人故意破坏会谈。”8月28日，“在航校的红旗战士们坚持斗争”，“地院东方红代表到航校支持红旗。”

进入9月，北航红旗仍坚持在业余航模体校静坐。此期间，据罗舜初后来回忆称，毛泽东也听说了国防部门口发生的事情。毛泽东称：搭起席棚，给他饭吃，给水喝，另开辟一个战场，让他闹几个月。（大意）<sup>【425】</sup>

9月8日，事情有了转机。据罗舜初称，这一天，“周恩来总理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报给毛主席的一期简报中对这一事件做了片面的报道，便立即将这期简报批转聂荣臻、我和赵如璋阅，并指示国防科委可以让赵如璋去澄清问题，甚至可以单独澄清问题，首先要说服多数，不要压制少数，澄清问题后双方要开会求得统一。”罗舜初还称，“9月9日晚上，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防科委决定让赵如璋单独和‘红旗战斗队’见面澄清问题。因为‘红卫兵’和‘赤卫队’坚决反对单独澄清问题，并阻拦了赵如璋到会，商量的通宵未果，澄清会没有开成。”<sup>【426】</sup>

【423】 航校，指旃檀寺大院南门侧旁的航模运动业余体校，北航红旗随后的所谓“国防部门前静坐”其实也是在此安营扎寨。大事记表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学生早于北航学生到此。

【424】 指北航红卫兵和赤卫队，为北航红旗的对立面群众组织。

【425】 《国防部门前的二十八昼夜》。

【426】 《国防部门前的二十八昼夜》。

据《北京航空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9月14日，“周荣鑫接见红旗代表，商谈赵如璋出来接见的问题，谈话中知道周总理对这一事很关心。”9月21日，“晚上陈伯达、关锋、王力、林杰等同志到业余航校接见了红旗战士。”“赵如璋在全体红旗战士的艰苦斗争和中央首长的支持下，今晚被迫出来和红旗战士当面澄清问题了。”“通过红旗战士和赵如璋的讨论，赵如璋答应了红旗战士关于澄清问题的几点要求，但赵如璋意图将来推翻，所以拒不签字。”9月23日，“下午五点赵如璋被迫在保证书上签字，这是红旗战士经过二十八天二十八夜的艰苦斗争的一个初步胜利。”

10月7日，张春桥证实毛泽东曾对北航学生静坐一事表态称“要谈”：“北航只要求工作组赵如璋谈谈话，到国防科委等了二十八天二十八夜，不谈。我们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要谈。他还是不谈。后来陈伯达同志说：‘你们二个住到学生中去谈，如果被打死，我陈伯达抵命。’还签了字，立下军令状。就是这样还不敢去。他们怕群众怕到这样的程度！10月1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和他辩论：为什么陈伯达的话你不听，连毛主席的话也不听？我们火了。我说：你们再不去，明天我和学生站在一起斗你。”<sup>[427]</sup>

北航红旗二十八昼夜与国防科委的理论与争持，以北航红旗的胜利而告终。经此一役，北航红旗名声大振，成为北京乃至全国高等院校最为著名的造反派组织之一。

## 第二十五节 “一〇五紧急指示”

### 一、“一〇五紧急指示”

在毛泽东8月18日、8月31日两次大规模接见红卫兵之后，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称，“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组织各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革命学生全部、革命教职工代表和中等学校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工代表从九月六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以利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sup>[428]</sup>

【427】 张春桥、关锋同志10月7日在中南海接见福建部分革命师生时的讲话，1966年10月7日。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页252。

【428】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1966年9月5日。中发[66]450号中共中央文件。





右起：萧华、杨成武、江青、刘志坚、张春桥在天安门城楼上，1966年。

按照上述文件精神，9月12日，总参、总政发出《关于组织军队院校革命教职员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称：根据毛泽东、林彪的指示并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军队院校应来京的学员和教职员代表约3.1万余人，可分两批来京，每批1.5万人左右。通知还对组成接待办公室、接待办法、来京活动内容等作了安排，制定了有关《接待军队院校来京革命师生生活保障办法》，并提出了有关选派和进行政治审查的要求。自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始，军队院校师生参加接见。<sup>【429】</sup>

据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一位学员的日记称，“9月13日：中午得知去北京的消息，群情激昂，外院沸腾。16日：中午十二时从学校出发。下午五时十分乘火车赴京北上。17日：晚七时三十分到达北京丰台车站。灯火辉煌，锣鼓喧天，受到热烈欢迎。当晚进测院<sup>【430】</sup>。18日：上午参观人大<sup>【431】</sup>。晚上‘欢迎晚会’。19日：

---

【429】 新华社9月15日电讯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院校的万名革命师生，同英雄的红卫兵一起，接受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检阅。”

【430】 指解放军测绘学院。

【431】 指中国人民大学。

下午听北大代表讲话。晚上参观军事博物馆。20日：全天参观北大。21日：下午得知在京延期，欢度‘国庆’的消息，欢欣鼓舞。22日：上午参观北大，下午游览颐和园。23日：下午参观团中央。在汽车上环城观光十大建筑。……29日-30日：队行操练，准备参加国庆。”<sup>【432】</sup>时为装甲兵工程学院的一位学员回忆称，“9月下旬，我们工院学生在院领导组织下进京住长辛店坦克二校：1. 到清华北大等地方院校参观文革，要求三五人一组看大字报，尽量不要和地方学生串联；2. 操练队列准备国庆活动，30日晚进入天安门广场，10.1. 国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我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组花图案，晚上观看焰火晚会。”<sup>【433】</sup>

9月底，在京的第二军医大学学员钱信莎<sup>【434】</sup>，通过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向林彪表达了对学校及总后党委“镇压”学生运动的不满。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称，“此时，又有上海二医大‘红纵’的一个红卫兵代表，拿着‘血衣’，来见林彪、叶群，要求给予支持。林彪脑子一热，又要采取行动了。1966年的国庆节一过，林彪告诉赵根生，立即把全军文革的负责人找来。他指着二医大送来的血衣对大家说：‘如果我们不支持学生造反，就要犯大错误。’接着他指示，要对军队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一律实行平反，要销毁一切有关他们的‘黑材料’，要允许他们搞‘四大’，要支持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准许他们去全国各地‘大串连’。林彪指令全军文革据此拟一份军委命令，准备以布告形式张贴出去。”<sup>【435】</sup>

钱信莎通过林豆豆送交林彪的其实并不是“血衣”，而是她受围攻时被撕坏的军外衣及一封血书。据二医大红纵《红色造反报》1967年2月4日第六期报道，叶群1967年1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会见总后机关和院校造反派代表时称，《紧急指示》与总后“九二七事件”有关，“有件衣服（指钱信莎受围攻时被撕坏的衣服）撕掉了扣子，还有一封血书，林豆豆拿着衣服给他爸爸看，几位副主席都在场，我在旁边看着哭了。林副主席看了很生气，由他建议起草了《紧急指示》。”

10月4日上午，叶剑英主持召开第58次军委常委会议。萧华传达了林彪10月2日下午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刘志坚说明了根据林彪指示起草的

【432】《张建明文革日记节选》，<http://www.xiaolaotou.com/new/diary.htm>，最后访问：2014年1月18日。

【433】《总字212的“文革”大事简略回顾与反思反省——我所了解的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和装甲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http://blog.sina.com.cn/u/1717607345>，最后访问：2014年1月18日。

【434】钱信莎的父亲钱益民战争年代曾任四野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其妹钱铃戈后来嫁予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

【435】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页42。

## 叶群同志会见红纵等革命造反派代表

〔本报北京二十五日讯〕昨天深夜至今日凌晨，叶群同志（全軍文革小組成員，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受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的委托，带着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亲笔信件，来到我校红色造反派勤务站，会见了红纵代表和总后机关，四、七医大、兽医大、后勤学院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随同叶群同志来到的还有林副主席办公室的秘书和全軍文革的工作人员。

大家很关心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副主席的身体健康，叶群同志说，林彪同志身体很好，他同疾病斗争了很多年。一边工作，一边向疾病作斗争。现在身体比过去有很大进步，越来越好。同志们都说，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健康，是我们红色造反者的最大幸福。

在提到二医大时，叶群同志说，二医大的问题很严重。

代表们汇报由邱会作一手策划的镇压革命学员的“九·二七”事件时，叶群同志告诉代表们，《紧急指示》与此有关。有件衣服（指钱信沙受围攻时被撕坏的衣服）撕掉了扣子，还有一封血书。林豆豆（林彪同志的女儿）拿着衣服给他爸爸看，几位副主席都在场，我在旁边看哭了。林副主席看了很生气，由他建议起草了《紧急指示》。

叶群同志说，我们认为你们红纵是很革命的組織，我們支持你們，向你們學習。

同志们怀着满腔愤怒，向叶群同志控诉了邱会作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和反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腐化堕落等部分罪行。叶群同志表示，对邱会作的问题，要揭深揭透，揭发批判邱会作的问题，不能叫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叶群同志还谈到，刘志坚是反对林副主席的，反对《紧急指示》的。根据林副主席建议起草的《紧急指示》，他在上面改了很多。他改的底稿我已经拿到手里。刘志坚是刘邓路线在軍內的代表。

二医大《红色造反报》对叶群讲话的报道，1967年2月4日。

###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总参、总后党委、政治部：

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院校作为重点之一，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联，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地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因此，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

《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稿。会议对此稿进行了讨论，同意送林彪最后审定。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了“紧急指示”。〔436〕

中共中央的批语及“紧急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中央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436〕《叶剑英年谱》下，页945-946。

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分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要相信院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好的，他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听党的话的，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同时要确实掌握林副主席对领导干部所提出的三条标准，即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拥护不拥护毛主席；是不是突出政治；是不是有革命干劲，进行检查。还要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

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今后各院校应照十六条的规定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指示，应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军委、总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王年一认为，“《紧急指示》是适应‘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求而产生的。它有正确的方面，为运动初期被冤屈地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人平反，这是正确的；但是总的说来，它有着十分严重的错误。它实际上规定了更大范围内的‘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它的要

害”。“在《紧急指示》下达后，军队院校和地方迅速出现要求平反、追查运动初期的‘黑材料’的热潮，在对某一给予不给予平反、材料如何处理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加剧了上下之间和群众之间的对立。上访因此增多，打、砸、抢、抄、抓等违法活动为之发展，一些学校开始发生武斗事件。”“《紧急指示》要求‘揪出’‘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对政策界限不加任何规定。什么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结果是乱揪一气，不仅是一批干部蒙受冤屈，而且造成了你‘革’我‘保’，你‘保’我‘革’的局面，更加剧了群众之间的对立。”<sup>【437】</sup>王年一对“紧急指示”的评价，无疑是中肯的。

10月5日，军委奉林彪之命，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有军队院校师生十万人参加的全军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叶剑英在大会上讲话，开头即称，“外地三万，观礼六万，驻京一万，一千转为地方院校的学生今天让我来讲话。我讲的焦点很小，针对院校同学讲院校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首先传达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林总建议的对当前军队院校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左起：叶剑英、杨成武、陈毅、萧华进入全军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会场，北京工人体育场，1966年10月5日。

【437】《大动乱的年代》，页102-104。

叶剑英在“原原本本地”宣读了“紧急指示”后，对毛泽东、林彪高调地给予了赞颂。叶剑英称：

如果说最初中国革命的根据地是井冈山，那么，现在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是中国。如果说，我们在一穷二白的井冈山的条件下经过二十二年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那么，毛主席能否领导我们取得世界革命的基本胜利呢？我说：一定可以！我这样说是根据的，根据就是在今天这样强大的中国，作为世界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下，主席很健康，主席的健康就是革命的胜利，主席的年纪最少要超过齐白石。我们主席今年七十三岁，还能横渡长江，一个多钟头三十多华里，到九十八岁还有二十五年。我们由井冈山根据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只用了二十二年解放了全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二十五年，在今天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和世界的形势下，一定能解放全世界。

最后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还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从一九二八年一起经过三十八年的观察，林彪同志从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特别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纪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五十九岁，是领导中最年轻的。而且身体经医生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因此，他是最优秀、最健康、最年轻，是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sup>[438]</sup>

---

【438】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2）》，1966年，页10-17-18。叶剑英在十天前也讲过类似的话。9月25日，他在接见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亦颂扬林彪称：“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祝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运动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10月6日，由首都三司发起，全国各地在京师生十万余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出席了大会，张春桥在大会上宣读了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称，“今天这个会开得好。不仅在这个地方我们把中央的决议宣布了。过去各级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志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受压迫之类，这些事情，宣布一律平反。所以不仅对你们说，而且要对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说，而且对各级党委、各级领导机关都要说。”<sup>[439]</sup>

## 二、“冲击国防部事件”

“紧急指示”发布之后，各军队院校以及领导它们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机关，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其中，以11月8日旃檀寺大院（国防部大院）受到的冲击最为引人注目。

据此次冲击行动的临时指挥部总指挥、技术工程学院四系学员方凡后来的有关审查材料透露，11月8日事件的起因，为技术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团”（简称“革团”）要求与大院内办公的李天佑副总参谋长“辩论”所致。有关材料称：

1966年10月17日，方凡率“革团”三十余人赴京学习，他们认为李天佑副总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sup>[440]</sup>要与他辩论。10月26日，方凡领人到国防部门前示威并强行进驻接待室。李副总长三次出见，批评了他们的错误。<sup>[441]</sup>鉴于辩论未胜，有人建议回院抢党委整造反派的“黑材料”。30日晚，方凡召集“革团”民主会，说“与李天佑辩论没有材料不好办，应赶快回校抢材料。”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回校抢，一路向三部<sup>[442]</sup>要。会后，方凡、张启发率十七人回张家口，并请来哈军工二人同行，作技术指导。31日晨抵张，方立即召开会议，明确砸抢目标及人员分工。上午，方指挥部分人员去院保密室，欲砸保密柜，因工作人员及群众劝阻未成。后经再三说服，才勉强同

【439】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2）》，1966年，页10-20。

【440】据方凡称，李天佑到张家口陆军第六十五军检查工作时，顺道到过与六十五军军部一墙之隔的技术工程学院（代号总字793部队），曾表态说过学院党委是正确的。访问方凡谈话记录，2002年1月27日。

【441】据方凡回忆：“当时，总参副总长李天佑曾到过张家口，表态说院党委是正确的。‘革团’听了自然不服气。10月17日，我与张启发、宋岷等十余人到北京要求李天佑接见，与他辩论。李天佑只在三座门见过我们一次，另两次单独接见了‘东方红’（抄注：与‘革团’对立的另一派群众组织）代表。”见方凡：《我的十个月“造反史”》（未刊稿），1984年12月4日。

【442】指总参谋部第三部，为技术工程学院的上级机关。

意按参政高天辉副主任电话指示，将保密柜封存。其时，另一部分人砸了院文革办公室的四个铁皮文件柜，抢出一些如大字报底稿等“文革”材料。下午，方凡带领“革团”人员砸政治部副主任梁德圻的办公室。张启发首先砸开一个抽屉，并逼梁打开另外两个，交出材料。晚上十一时半左右，方凡又领二十余人到院党委办公楼抢“黑材料”，与奉命徒手前来劝阻的警卫战士发生殴斗，双方十余人致伤。事后，方凡等率“革团”人员回京“告状”，将梁德圻也拉到北京。方凡亲手写出了名曰《一场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事件》的传单，歪曲、夸大事实真相，大量印发，流传极广。与此同时，方凡与军内外一些造反组织的头头共同策划，拟就“十·卅一事件”召开一次“控诉大会”，但遭总参文办拒绝。<sup>[443]</sup>

有关“冲击国防部”的具体经过，《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中称：

1966年11月4日晚，方凡等与空军一高专、北航、哈军工等一些群众造反组织的头头在国防部南门开会，策划召开“控诉大会”，企图以“十·卅一事件”为突破口，批判“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定要求总参出面支持，提供会场、经费，并要求李、王副总长到会。这些要求在联系中遭到拒绝。11月6日，发出大会“海报”。7日上午，方凡和一高专彭谦等人开会，研究是否冲击国防部，会上决定不冲，但要摆出冲的样子，以施加压力。同时，决定了调集人员的办法。当日中午，总参文办莫扬主任到国防部南门向方凡等说明上级意图。方凡对莫扬说：“我们已在国防部门口列队示威，如不答复我们的要求，一旦发生冲国防部事件，责任完全在你们身上！”方凡要莫扬向李天佑、王新亭副总长转达：“晚六时以前答复！”届时，方凡等向总参文办发出“通牒”。六时三十五分，“革团”人员高喊：“李天佑滚出来！”……方凡等每半小时向总参文办发一次“通牒”。九时已有千余人聚集在国防部南门。方凡任临时指挥部总指挥。<sup>[444]</sup>8日凌晨，方凡在广播车上宣读了由哈军工王怀清起草、指挥部通过的“四点声明”，发起了冲击。方指派于孟祥、孙明德等十人为“代表”，从警卫战士头上往里爬。甚至把木板放在战士头上作跳板，但被挡回。

【443】 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委员会：《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1985年4月19日。洛阳外国语学院为文革中技术工程学院内迁洛阳后改称。

【444】 方凡回忆：“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种场合。面对这么多人，早已六神无主，任其摆布了。晚上九点多钟，当北航‘红旗’和海军工程学院‘造反团’（从大连来京刚下火车）的大队人马一到，形势立即紧张起来。”方凡：《我的十个月“造反史”》（未刊稿），1984年12月4日。另11月7日晚，全军文革小组派出副组长谢镗忠、李曼村，小组办公室主任辛国治等去劝说，做了一晚上的工作，冲击者拒不听从。



此时，由海军工程学院“造反团”领头的一部分人撞开了警卫室门窗，跳了进去……随之百余人冲进国防部。方凡将他们组织起来，企图拦截汽车，找首长解决问题，未成。<sup>【445】</sup>8日傍晚，中央文革人员赶到现场后，他们才撤离国防部。此次行动开创了冲击最高军事机关的先例。<sup>【446】</sup>

上述材料所称的“中央文革人员”，指的是张春桥、谢镗忠和戚本禹三人。11月8日傍晚，他们赶到旃檀寺大院南门现场后，张春桥讲话并宣读了陈伯达的一篇书面意见，全文如下：

同志们：

我们感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但是，我们刚才考虑了一下，想多听一听你们的意见。看一看会场情况，你们再往后看一看就知道了，这个地方不宜再开下去。（众：对！）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是突然来的，我们已经在七点钟约好另一个会了，我们不能够今天继续开会，刚才，我和戚本禹同志商量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这个会，我下面念一念我来时陈伯达写的一个意见。然后，请你们考虑一下。然后我们再约一个时间，找一个地方，当然不会是很久很久了。不过，你们也知道，刚才这些纸条，包括刚才念的，都是要求接见的。然后我们再找一个时间，安排另一个地方，再继续听你们的意见。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众：好！）如果这条一致了，我想把伯达同志的纸条念一念。因为伯达同志身体不好，他很愿意自己来。我念你们可以记，你们记了以后，希望你们考虑。我就念：

#### 陈伯达同志意见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张春桥：讲道理嘛，造反有理，讲道理）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今天，不管你们有这样，那样，一千条或一万条道理，但是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神圣的国防部这件大事来，你们各种道理都是站不住脚的。你们忘记了大道理，把这样那样的小道理放在大道理之上，这怎么能说是正确的呢？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有什么事可以

【445】方凡回忆：“海工‘造反团’的人首先从值班室的窗户里跳了进去，警卫战士们发现已有人进了国防部大院，立即全部撤走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大事不好了，连忙随着人群进去，召集进去的人排好队，按单位清点人数并作了记录。同时，安排人员在门口站岗，防止他人随便进入。这些情况，当时的全军文革副组长谢镗忠同志是亲眼看见的。事后接见我们时，他说：‘你们进去以后是很守纪律的。’这件事虽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当时我们就认错了，并且很后悔。”方凡：《我的十个月“造反史”》（未刊稿），1984年12月4日。

【446】《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

一个一个的谈清楚，有什么委屈，可以一个一个的解决。在文化革命中，同学们要用大道理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骂人不好，打人不好，请同学们好好的想一想，不要在这个地方顶了。你们年轻，不要以为自己都对，谁也说不得。我说的这些都是好意，都是从大道理出发的。希望你们不要轻信，要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前进。再说一句，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今天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之后，还可以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因为身体不好，托张春桥、谢镗忠和戚本禹三个同志来见你们。说这番话，请你们考虑。

陈伯达

11月8日<sup>[447]</sup>

张春桥宣读陈伯达书面意见之后，僵持在“国防部大院”已达两天一夜、疲惫不堪的军队院校学员正好找个台阶下，随即撤离。由此亦可见在这些学员心目中，中央文革的权威性远高于军中“首长”。

惟旃檀寺大院虽暂时解围，其他总部、军兵种以及大军区领导机关大院所受到的类似冲击，仍频密发生。

## 第二十六节 两次十万人大会与叶剑英公开检讨

### 一、第一次十万人大会

11月13日，总政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系统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第一次十万人大会）。大会由萧华主持，周恩来、陶铸、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和各总部、军兵种的负责人出席。陈、贺、徐、叶几位军委副主席讲了话。

陈毅在讲话中，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军队院校造反派近期一些他认为是错误的做法。陈毅称：

搞路线斗争，第一要顾大局。毛主席几十年搞路线斗争就是顾大局，不是为什么个人利益，也不是为什么狭小的事、芝麻大的事。毛主席多年搞路线斗争成功的经验就是顾全大局。什么是大局呢？就是要顾中国革命的大局、世界革命的大局，为了大局、全局，牺牲局部利益、个人利益，也在所不惜。我就没学好这一点。有些人把小单位的事情，扩大到比全局还重要，有的学

【447】十一月八日张春桥同志在国防部南门对解放军总字793部队革命造反团及其他院校部分同志宣读陈伯达同志的指示。联合编辑组：《首长讲话选编》，1967年3月，页6。



周恩来率陶铸、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进入在第一次十万人大会会场，北京工人体育场，1966年11月13日。

生冲进中南海，把大铁门都冲坏了；有的人冲国防部，我坚决不同意！（热烈鼓掌，群众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我不怪年青同志们，怪我们事先没给大家讲清楚，讲了以后，希望再不要发生，要顾大局。你那个小单位的问题再重要，难道能比中南海会更重要吗？能比国防部还更重要吗？既是解放军院校的，还去打解放军，打解放军的干部，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事。我二七年当解放军，至今差不多三十九年还没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要顾大局，识大体，大道理管小道理，不要小道理管大道理。小单位受到压制，受了打击，完全有理由到国务院、中南海申诉告状，毛主席同意、林副主席支持，你们有问题，可以就在接待站等嘛！但是不能超过限度，不能采取直接行动，不能冲破大门，不能占大楼、砸窗户、剪电话线去。这样搞不好。……

……

搞斗争，我不赞成“逐步升级”的做法，好像口号提得越高、越左越好，请同志们考虑这是不是妥当？你犯了个错误，派了工作组，就是打击群众、压

制群众，打击群众就是破坏革命，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什么搞一般校长、党委不过瘾，搞处长不过瘾，对搞部长还不过瘾，意思是还要搞我们这些副总理吗？不是不可以搞，我是欢迎大家给我提意见的。搞路线斗争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哪个人有多大错误就算多大，要正确衡量，不能超过限度，超过了界限就犯错误。〔448〕

徐向前在简短的讲话中提及：“同学们，你们向很多干部提意见，向领导机关反映情况，要他们解决问题，这一切革命行动，我们是完全支持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同学们从全国最高利益出发，考虑到他们有重要任务，谅解他们，能使他们有从事指挥部队及日常工作的时间和精力，不要从白天搞到黑夜，又从夜间搞到白天，缠住他们，这怎么得了！你们人多，他们人少，这批完了，又来一批，要注意这样做是对领导干部是有害的，对国家是不利的。他们又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有的还有病。我这样说不是妨碍你们的革命行动，能照顾一下，就照顾一下。”〔449〕

叶剑英在讲话中多处批评军队院校造反派。叶剑英称，“应指出，二医大的那些同志就做得过分了，搞过了头就错了。错误带来的后果，不但对军队，对你们个人也是不好的。特别是领导人，要掌握火候，要掌握适当的温度，要懂得列宁说的‘真理跨过了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发生了质变，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会把群众的热情引导到错误方面去了。”“我们是闭一个眼睛，睁一个眼睛的。闭一个眼睛，尽量地放；但我们还是睁着一个眼睛，这只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看到运动的大方向，知道运动是向什么方向发展的。你们点名是不应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只占百分之一、二、三，以前有的人镇压学生运动是不对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是错误的。但是现在转过来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也是不对的。毛主席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阿Q正传》里有一个人就是只许自己‘革命’，不许别人革命。要准许人家革命，哪有不准人家革命的呢？”“运动是有方向的，不是乱斗的。最近有人围攻《解放军报》社，要砸《解放军报》。《解放军报》是军委、总政的机关报，是代表军队说话的，是林副主席亲自抓的，是毛主席肯定了的，受到毛主席赞扬的。去年毛主席说：《解放军报》比《人民日报》办得好。《解放军报》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是起了作用的。有意见可

〔448〕 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3）》，1966年，页11-70-71。

〔449〕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3）》，1966年，页11-74。

以提。你们要关心它、拥护它、支持它，换句话说，就是不要捣毁它。报社是机密机关，是保护单位之一，是要保卫的。林副主席说，要把《解放军报》办得好的上加好。”<sup>【450】</sup>

陈毅、叶剑英对军队院校造反派训诫式的尖锐批评，引致参加大会的部分军队院校造反派的质疑和不满，其中包括了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李基才。叶剑英在讲话将要结束时，把李挖苦了一顿。叶剑英称：

同志们，请大家静一下，我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有个战士叫李基才，递了一个条子给萧华同志，问我们：“第一，今天这个大会经过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怀疑这个大会是我们偷偷开的，同志们相信不相信？（答：不相信！）让我代表军委及总政全体同志向除去李基才以外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今天周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本来林副主席也要来，有点感冒，没让他来。有人怀疑这个会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可以允许有人怀疑。“第二，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否经林副主席看过了？”林副主席不但知道，而且看过，并且我们还集体讨论过。（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让我代表军委及总部的全体同志再次感谢同志们的信任。李基才要求大会广播他的条子，尊重他的“命令”。他想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同情，但是没有达到目的。他说他是兽医红色造反团的战士，他不是战士！（众呼：把他揪出来！）我是按照他的“命令”办了，按照他的意志办了，从口号，掌声来看，同情他的很少。李基才，你听到了吗？<sup>【451】</sup>

11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称，“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并宣布“以上规定，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等组织，也完全适用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军事机关和院校。”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称，“决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

【450】《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3）》，1966年，页11-76-77。

【45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3）》，1966年，页11-77-78。

## 二、第二次十万人大会

11月29日，总政再次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系统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第二次十万人大会）。这是宣布暂停大串连之后军委领导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接见。大会仍由萧华主持，周恩来、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出席。周恩来在与军委领导绕场一周后提前退席。一如11月13日的大会，陈毅、叶剑英在讲话时继续批评军内造反派。

周恩来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进入第二次十万人大会会场，北京工人体育场，1966年11月29日。



陈毅称，“上次七、八万在这儿开会，上次叶副主席讲话，有人不爱听，反映很坏，说泼了冷水，要批判，要揪出来批判。光听好话，说这好，那好，伟大又伟大！伟大的很！……这不好，我们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就是要听逆耳之言，不同意见，有不少领导干部就是不听逆耳之言，在运动中整的好苦，这是活该的。要听不同意见，要听逆耳之言，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这说明陈老总不老实，见到问题不讲，看到有同志犯错误也不帮助，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我接触过的同志，他们造反的搞法，我是不同意的，没有打中要害，打中了同志，他们的作法就是简单化。我对他们讲，你们的作法不纠正，我交班也不交给你们。现在你们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样凶，将来掌握了大权，还不整死人？我就是这样的讲话，刺激人，老毛病改不了，就是这个样，有什么办法呢？”<sup>【452】</sup>

叶剑英在讲话开头念了几条大会上造反派张贴的标语和递交上来的条子后，又再次挖苦讥讽了李基才：“下面是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给我的条子：‘敬爱的叶副主席，（叶插话：谢谢你们，对我们又敬又爱了）恳切地希望你能接见我们，（叶插话：我也很想你们，但如陈毅所讲的要看看我们有没有时间）希望你能为李基才恢复名誉。’不知用什么办法给他恢复名誉，是登《人民日报》，登《解放军报》还是用别的办法？”<sup>【453】</sup>

叶剑英又称：

我们军队院校的大部分同志是革命的，但是也确有这么一小撮人是不好的，这些人才学了雷锋，但外出串连时，冲上了火车就把门窗关上，不让红卫兵进来，结果红卫兵把玻璃打破上了车，对这些人说：“你们这样的解放军不能学。”我们解放军的名誉被这一小撮老鼠败坏了，丢光了。有些人外出串连到了上海要住好房子，要吃好的，要坐小汽车，……把我军的光荣传统、艰苦作风完全忘了。还有的人到了北京，天天讲要拥护毛主席，我们军队的最高统帅是毛主席，副统帅是林彪同志，但有这么一小撮不明事理的人，——我是把话讲轻一些——却向我们的最高统帅部、国防部猛冲猛打。对你们这些人，我们若不把你们当作反面教员来教育大家，我们就不算一个共产党员了。

【452】 新北大“为人民服务”战斗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负责同志讲话（十一月份）》，页186-187。

【453】 兰州军区卫生学校筹委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参考资料》，1966年12月，页297。

你们这些人应当警惕，如果你们不改，那只能成为废品，不能用的，要洗刷！

冲我们最高统帅部，把国防部当作敌人，这还不够严重吗？又说发脾气了，严格地说，这是反革命，我不是发脾气，我说话的声音就是那么大，只有敌人，才冲我们的国防部。<sup>【454】</sup>

### 三、毛要叶剑英“检讨一下，了此一案”

进入12月，叶剑英与军队院校造反派的关系似有所缓和。12月2日，叶剑英接见了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派李基才等三人。叶剑英称，“上两次军委开大会，也不是因为你（指李基才）递那个条子想打击你。我们支持你们，就是你们左派敢于斗争，不善于斗争。两次讲话就是要用很大的劲儿扭转，我们准备还要召集代表座谈会。”“今天接见你们，和你们交交心，我们交交底，主要是把十三日的讲话说一说，不要检讨。为什么十三日四位副主席都来了，就是要用大力量来扭，不这样不行。还有一点要注意，我在十三日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话不一定这样讲，但实际上应有这样一个警惕。文化大革命确实有坏人捣鬼，教员中也有，学生中也有，有些人的老子被打成黑帮、右派，有的自杀了，他们就打入左派，把左派打得乱七八糟，故意搞得越‘左’越好，利用青年的热情左搞右搞，使真正的反动派坐山观虎斗，使他们舒服了，这就不行。当然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要实事求是。这方面得向你们作检讨，有时就对你们发火。”<sup>【455】</sup>

12月10日<sup>【456】</sup>，全军文革小组主持召开部分军队院校代表座谈会，叶剑英又再次严厉批评军队院校造反派。在谈及冲国防部问题时，叶称：“冲进国防部不严格的说是政治上的大错误，严格的说那就是反革命。国防部那是毛主席办公的地方，这个尊严我们一定要维护，我们要维护毛主席和国防部的尊严，有的人口口声声说拥护毛主席，屁！你们都敢冲，我还不发脾气？我这个人就是粗，今天讲起来还是有气的。”关于总政召开的两次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的问题，叶剑英称：“我们狠抓了一把，把那些方向错了的人，搞修了的人，当头一棒。不这样就不能受教育，当然我的态度好些，那就更好了。十一月廿九日本来是来送行的，我本来不想讲，起了个稿，叫刘志坚念，后来萧华主任要我讲，才讲了几句。我三令五申，小声讲不行，就大声讲；肤浅批评不行，就严厉批评，错了我负责，

【45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参考资料》，1966年12月，页298。

【455】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4）》，1966年，页12-14-16。

【456】《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与《叶剑英年谱》均记载为12月8日。



当然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有人说我的讲话是棵大毒草，他们说黑话就是黑话吗？他们说毒草就是毒草吗？他们有他们的言论自由嘛！”<sup>【457】</sup>



叶剑英与毛同乘一辆敞篷车接见红卫兵，1966年11月26日。

到了1966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根据毛泽东“检讨一下，了此一案”的指示<sup>【458】</sup>，叶剑英最终不得不在全军各院校代表及驻京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为两次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错误作出公开检讨。

这次大会的主会场设在京西宾馆，同时又在政治学院礼堂、总后礼堂、后勤学院礼堂、总政排演场等五处地方同步转播。叶剑英在大会上检讨称：

我在11月13日同29日，曾经从第一次接见以后又连续二次接见来京院校革命师生，我在会上都讲了话，由于自己思想上面没有跟上毛主席的思想，没有跟上林副主席的思想，对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实的情况了解很少。这里附带说明一下，这个时期，我与萧华同志主要搞什么呢？搞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各个军区，十三个军区现在开展了六个军区，还有七个军区还没有开始，就是按主席讲的要按步骤分批分期的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457】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页539。

【458】《叶剑英年谱》下，页952。

命中，院校这个部门我同萧华两个人与刘志坚同志、谢镗忠同志有分工的，他们专门管院校，我们管机关就是说到总部、军兵种、各军区去了，因为他那个是指挥机构，如果瘫痪了，一旦国家有事，那怎么能指挥。因此我自己也没有觉悟，没觉得院校也是一个重要部门，应该抓，基本情况了解很少，所以这个问题向同志们首先要作自我批评。了解不够，因此有些讲话不完整、不准确，特别是我离开讲稿讲话的时候。所以有许多话离开了讲稿，离开稿子讲话就没有谱了，所以有些话讲得过头了，有些话是有错误的，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压制革命左派，挫伤了革命群众的热情，同时保护了坚持错误路线的那些领导人，起了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在军内、军外、全国范围之内，到处印发、散布很广，因此起了、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这说明我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贯彻执行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也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的思想上还是有影响的，……这就是林副主席所讲的一方面是革命的动力，同时又是革命的对象。这一点我认识不深，我的二次讲话起了很坏的作用，会后许多同志对我的讲话提出批评，我表示热烈的欢迎，衷心感谢，在这二次大会以后，某些机关和院校的领导人利用了我那些错误的话，来保护自己，压制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紧急指示下达以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本来是很好，刚才已讲过了，发生了个别过头的事情也是难免的，这不是主流。但我把这事看得过重了，怕不讲政策，不讲策略，做过了头，所以急急忙忙想出来纠偏，结果就形成了训斥压，开了二次大会以后，我虽然觉悟到话中有错误，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并没有挽回这种不好的影响，所以现在向你们作公开检讨，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欢迎批评。<sup>【459】</sup>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叶剑英首度在毛泽东指令之下不情愿的公开检讨。进入1967年1月，随着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徐向前成为新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尤其2月以后对“二月逆流”的批判，叶剑英的威信及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459】 军队院校来京（驻政治学院）部分革命串连同志整理。兰州军区卫生学校筹委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参考资料》，1966年12月，页393-394。





# 第四章

1967・上：淫雨霏霏



## 第二十七节 全军文革改组

### 一、抛出刘志坚

在叶剑英检讨后，军队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并未罢休。1967年元旦过后，几十个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群众组织在京人员策划在1月5日召开“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意在再次将批判斗争矛头对准陈毅、叶剑英。1月3日，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了大会筹备处人员。4日，全军文革小组院校组了解到大会要指名批判的有陈毅、叶剑英、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天焕，并指名谢镗忠、李曼村等人一定要到会。当晚，周恩来、康生、江青、萧华、杨成武等再次接见大会筹备处全体人员，对他们召开大会竭力进行了劝阻，并力求将其注意力引向全军文革小组和刘志坚，以保护陈毅、叶剑英。周恩来在讲话中称：

四、问题怎么造成的呢？关键的问题是军队文革小组，刘志坚只是初步的检查，你们的揭发，对我们很有帮助。全军文革小组放在总政之下，不伦不类，刘是中央文革副组长，应该向中央文革请示（康生插话：既不请示，又不报告），如关于文艺单位的“三点指示”，今天才查出来，江青同志是顾问，又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也没有向她报告，也没有请示林副主席，这三条是完全违背紧急指示的，全军文革组织形式不对，必然有问题，上不向主席、林副主席请教，也不请教中央文革，刘志坚每出席中央文革会议（江青插话：大多数会议他参加了）不说，林副主席、萧华同志不在京，他就派了工作组，叶剑英同志他管军事多，管政治工作、院校文革少。彭、罗、陆、杨的影响还要肃清，罗是参谋长、军委秘书长、副总理、中央书记，集党政军于他手中，他是两面派，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彭、罗、陆、杨他们的特点，要在关键时期才能发现他们，罗瑞卿不是没有手下的人，（萧华、杨成武插话：萧向荣、梁必业、王尚荣、雷英夫、史进前<sup>[460]</sup>、陈鹤桥、谭友林……）过去罗把叶副主席放在一边，元帅们都是受打击的，刘志坚的检讨是初步的检讨，中央文革有过批评，你们这样大揭发，我们才看清楚，刘、邓派工作组，他也派，主席回来要撤工作组，他迟迟不撤，八月五日林副主席从外地回来，萧华同志八月八日从外地回来，他才撤，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是林彪同志国庆节讲话中提出的，然后提出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全国文革跟不上，十月中央工

【460】史进前，原总政保卫部部长。1961年晋升少将。1966年8月被隔离审查，1975年恢复原职，1980年升任总政副主任。

作会议进一步揭发了，主席已经三次接见了，十一月就不需要单独接见了，大可不必了，林副主席是不同意的，大家积极要求见，也起了点作用，林副主席要管全国全党的事，不能使他太劳累了，只好请其他副主席出来，把我找来，绕场一周，这两次接见是多余的，一说话，没有准备好，即席讲话，言多必失，陈伯达同志说过，祸从口出嘛，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谦虚谨慎，四位副主席讲话都没讲路线，稿子是全军文革起草的，林副主席和我们都不知道，没有认真的讨论要不要开这样的会，这事情本身就不慎重，但是不能把他们两位作为刘邓路线的代表，他们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坚决反对彭、罗、陆、杨，反对刘、邓路线的，关键是全军文革小组负责，全军文革也有反对派，唐平铸、胡痴、谢镗忠、李曼村都提过反对意见，他根本不听，你们有人提议，陶友鉴同学提出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这有道理，我和萧华同志商量，可以考虑（康生插话：全军文革不像真革命），中央文革有这么高的威信，这是因为干革命，这从实际斗争中得到证明，刘志坚躲在机关办事，上不请教，下不接近群众，冲国防部，叫他去，他睡了不去，他没有关心群众的精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就没有按着林副主席的要求，吃透两头，全军文革要检查，我就不说了。

五、明天的大会，我们不赞成，不是不支持你们造反，我们不能参加你们的会，我们的任务是来劝大家不要开这个会，我们把你们的话听得差不多了，激愤的情绪也接受过来，你们的大会不宜开，因为于全军不利，攻击矛头错了，所以劝你们不开，这不等于停止这个斗争，还要继续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此来衡量本单位的领导，分清两类矛盾，就全军来说，我们比你们清楚，希望你们不开这个会，当然我们不能强加于你们，你们要开，我们中央、中央文革、军队负责的同志不能出席（康生插话：责任是刘志坚的，刘志坚矛头搞错了，责任不在你们），对，关键在全军文革刘志坚身上，（康生插话：责任是刘志坚的，刘志坚不是折中主义、和稀泥，而是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学生提出：刘志坚停职反省。）你们要求停职反省，一个人的反动路线还是先批判，依靠你们挖深挖透，不要过早停职反省。（学生提出：我们明天开会的票都发了，来不及了。）来得及，八、九月间我说服两个十万人大会不开，有这个经验，（江青插话：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调查研究，立于不败之地，你们可以商量一下。）（学生提：延期开，准备批判刘志坚，我们回去商量。）（江青插话：你们也可以批判本单位的问题，我们不包办代替。）你们自己商量，要批判刘志坚，你们同全军文革



联系。(江青插话：全军文革应设在中央军委之下，最近我们要他们汇报一次，我个人对刘志坚帮助过好几次，今天他初步作了些交代，今天以前，不知他干了些什么。)<sup>[461]</sup>

周恩来讲话中有三点值得注意：(1) 周称，1966年11月两次十万人大会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的讲话，“稿子是全军文革起草的，林副主席和我们都不知道。”(2) 周称，“全军文革小组放在总政之下，不伦不类。”有学员提出全军文革要改组，“我和萧华同志商量，可以考虑。”全军文革小组改组，由此被提上议事日程。(3) 刘志坚虽“不要过早停职反省”，但可以批判，“要批判刘志坚，你们同全军文革联系。”

1月4日晚，刘志坚作了“初步检查”，承认其“犯了许多严重的方向路线性错误”，“是刘、邓反动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刘的检查，披露了过去一年军队文革的若干内情，如：“我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八月前文革小组经过几次变动，最早是谢镗忠当组长，但萧华同志不在总政，我也是在总政主持工作的，都是我负责的，我犯了许多严重的方向路线性错误，我是刘，邓反动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应该受批判的是我，这一阵虽中央文革同志多次批评过我，但是我觉悟得太迟。我长期停留在军队和地方不同、军队要稳一些，强调十六条中的第十五条。”“今年六、七月间，我经常参加刘、邓所召开的汇报会，一个礼拜二、三次，那时萧华同志不在家，我去参加，军队一个是叶副主席，一个是我，我经常去参加汇报会，受到他们反动路线的错误影响，同他们站在一起了。六月底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情况，伯达同志提出少派或不派工作组，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来领导文化大革命，钓鱼台参加讨论时，我是同意的，后来在刘、邓召集的汇报会上，我没有支持伯达同志，这是严重的动摇，严重的政治错误，我在后来做了检查，在中央全会上也做了检讨，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政治错误。”“怕字当头，自己不上第一线，不出头，特别是接见问题，接见外地学生让陈、叶副主席讲话，很仓促，仓促上阵，我要负责任，把他们推到第一线，匆忙上阵。第二，发生冲国防部事情，我当时没有挺身而出，七日晚上听说技术工程学院学生要开控诉会，要找李天佑同志，要找王新亭同志，在国防部南门口。我在中央文革开完会议后，没有挺身而出作政治思想工作，第二天早上五点冲国防部了，我了解了一下，所以没有马上到现场，在叶副主席那里汇报后出来，当时下午一点，应不吃午饭就出来，到群众中去做政治思想工作，我没有去，二点，

【461】 总字 664 部队(整理)、大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驻京联络站：周总理接见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代表讲话，1967年1月4日。《一月革命风暴》，页 26-29。



总理叫到这里来，所以又没去。以后中央文革伯达同志叫戚本禹、张春桥二同志去，很顺利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当时不但不感谢，反而有一种很不好的情绪，认为他们不应该去告急，我们正在研究处理，没有按我们研究处理的方案去做，这是非常错误的。”<sup>【462】</sup>

刘志坚随即成为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商定的舍车保帅的牺牲品。1月8日，由萧华批准，袁子钦经手办理，将刘志坚送到北京卫戍区“监护”。10日，“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分裂为两派，一派要“打倒刘志坚，火烧叶剑英”（称“一筹”），另一派只提打倒刘志坚（称“二筹”）。12日，新军委文革召开成立大会，支持打倒刘志坚的口号，江青当即指定由关锋和谢镗忠协助“二筹”做好斗争刘志坚大会的准备工作。18日晚，谢镗忠、李曼村与“一筹”代表座谈未能谈妥，19日，“二筹”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斗争刘志坚大会，被“一筹”冲击会场。<sup>【463】</sup>

## 二、改组全军文革小组

自周恩来、江青1月4日放出风声称，“全军文革组织形式不对”，“全军文革应设在中央军委之下”，全军文革的改组，已是势在必行。1月9日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在接见军内革命群众时称，“全军文革已经改组。最近一两天就公布，有些问题还要做些调查研究。”“全军文革小组已经成立了，一两天就要传达了。”在场的胡痴插话称，“全军文革小组已经成立，江青同志是顾问，他们很快就要领导运动了。”关锋接着称，“他们还要研究军队的文革方针政策，他们会到你们中间去的，他们是受双重领导，即受军委领导，又受中央文革小组领导。”<sup>【464】</sup>

1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全文如下：

为了加强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并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批准，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462】 海军学院毛泽东思想青年红卫队、金猴造反团整理：刘志坚一月四日夜的初步检查。北航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1967年4月，页48-50。个别文字根据其他资料作了订正。

【463】 谢镗忠：《萧华、刘志坚及其同伙培植操纵保守势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谢镗忠的交代材料》，1967年10月26日。总后机关、院校、科研、设计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李曼村、谢镗忠小组，1967年11月。

【464】 关锋同志接见炮兵第二研究所、装甲兵研究院革命群众的谈话记录，1967年1月9日。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中央首长讲话（1）》，1967年3月，页74-75。

现将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公布如下：

组长：徐向前

顾问：江青

副组长：萧华 杨成武 王新亭 徐立清 关锋 谢镗忠 李曼村

组员：王宏坤 余立金 刘华清 唐平铸 胡痴 叶群 王峰 和谷岩 张涛<sup>【465】</sup>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sup>【466】</sup>

上述小组成员共 18 人。以萧华为首的总政系统 9 人，刚好占小组人数五成，其中解放军报社更有 3 人之多。但是，人数的多寡，却始终改变不了一个事实——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的成立，宣告总政失却了军内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地位。总政从此走向衰落。

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后，逐步完善了其内设机构。小组后设办公室、秘书组、机关组、院校组、简报组和联络站。内设机构人员从全军京内外单位调入。办公室成员曹宇光、沈辰、郑汉浩、丁克明、张立宪、夏光亚、冯达<sup>【467】</sup>。秘书组组长郑汉浩，机关组组长王峰，院校组组长李曼村，简报组组长江清飞，联络站组长曹宇光。<sup>【468】</sup>

### 三、“新官上任三把火”

徐向前在担任了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之后，一时间踌躇满志，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多番点名批判军内有关领导。

1 月 13 日晚，徐向前与江青、杨成武、关锋、谢镗忠、叶群等接见空军机关、院校的群众代表。徐向前在讲话时点了空军刘震、成钧、何廷一<sup>【469】</sup>的名，

【465】 刘华清，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1955 年授衔海军少将。和谷岩，时任解放军报社记者处副处长。实际主持军报内部文革运动。张涛，原总政干部部干部任免处处长，时任总政直属政治部代理主任。

【466】 《解放军报》，1967 年 1 月 12 日。

【467】 曹宇光，时任总参动员部副部长，1964 年晋升少将。沈辰，时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郑汉浩，时任军委办公厅（兼总参办公厅）副主任。丁克明，时任空军第一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立宪，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夏光亚，时任陆军第二十三军政治部主任。冯达，时任海军旅顺基地政治部主任。沈辰、张立宪、夏光亚，1965 年大校军衔。丁克明，1965 年空军大校军衔。

【468】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指南》第二册，解放军档案馆，2003 年，页 1-2。

【469】 何廷一，时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955 年授衔空军少将。1 月 13 日后被揪斗。1973 年从流放地回京，1975 年 10 月重新工作后任空军副司令员。



徐向前与林彪、董必武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1966年9月15日。

又批判了刘志坚。徐向前称，“刘震原来是四方面军的，他家是湖北孝感的，很小参加革命，以后在徐海东的部队里，照理说应该是革命的吧！可是到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就不行了，过不了这一关了，这不仅对你们是教训，对我们也是很大教育，军队中有一批牛鬼蛇神，他从革命的立场上转到反革命的立场上去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刘震这个人，去年七月间，他自己承认他夺权，成钧去年七月是要停职的，我们去保了他的。何廷一是坏蛋，杨尚昆的死党，事情明摆着的，昨天我讲了吴法宪同志的情况，说我是保吴法宪同志，你们说，我不保吴法宪同志，难道还保成钧、刘震吗？吴法宪同志是一方面军的，刘震是四方面军的，为什么保一方面军的不保四方面军的呢？这有个标准，就是看谁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杨成武插话：成钧在防空军时是副司令，我那时是北京军区司令员，那个时候成钧就不好，这个人很阴险，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是有后台的，这一点你们都很聪明，是……）（众高呼：打倒贺龙。）所以我们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分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分清敌我友，不然就要打错了方向。”“最高军事机关，他们的工作都很紧张，不能冲击，这点要明确，革命不能搞错方向，这些机关中都有牛鬼蛇神，要把牛鬼蛇神都揪出来。

牛鬼蛇神不仅空军有，海军、总参、通讯兵、每个部门都有，靠你们去揪。”“刘志坚的情况，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刚刚接见后，他还要我们接见部队院校革命师生。我们说：不要了。他不听，非要我们接见不可，（叶群插话：林彪同志不赞成接见。）林副主席的话他也不听，还要我们四位副主席都讲话，我们要他搞出讲话稿，在军委常委会上讨论通过，他是要在讲话了，才把稿子送来，叫你连看都没有时间看，（叶群插话：搞突然袭击。）对！搞突然袭击。陈毅副主席本来不准备讲话，他临时也拉上去讲。这仅是我最近对他的一些感觉，你们应该恨，应该气。恨谁气谁呢？不要把目标搞错了，就像飞机扔炸弹，不要扔到己人的头上，但有的同志打错了，应该向打得准的同志学习。我们就是把我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sup>【470】</sup>

江青在徐向前讲话后，当即表扬了徐向前，称“徐副主席要讲山头的话，他人最多，山头最大，但他没有私心，带病出来工作，担任全军文革的组长，他坚决斗刘震、成钧、何廷一，要坚决斗倒、斗垮、斗臭他们。”<sup>【471】</sup>

1月15日，徐向前在接见军内造反派时再次批判了刘志坚：“就是过去刘志坚这个坏蛋没有很好请示中央文革小组，他有些事情也不和军委成员报告，对待中央封锁，在总政他是一言堂，好多同志对他有批评、斗争的，他不听，所以这样搞下去把我们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坏了。”<sup>【472】</sup>

1月16日晚，徐向前在接见解放军测绘学院革命造反派部分人员时，保了王新亭，批了张清化<sup>【473】</sup>。徐向前称，“王新亭是个老干部，解放战争时，在打太原等地立了很大战功，好同志在平时工作中并不是没有错误的。我在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改嘛！他在总参工作，有一阶段杨代总长病了，工作都是落在李天佑，王新亭几个副总长身上，要备战，又有其他工作，他的错误犯在工作组上，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工作组的许多事情归叶运高直接指挥，王副总长分在总参机关，有几十个单位，管的工作很多。”“十七年来，刘、邓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一小撮干部慢慢蜕化变质，变成牛鬼蛇神，变成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这些人，只是一小撮人，整个解放军干部也是一小撮。目前我们的任务是打击一小撮，我们就要看他的言论，行动，看他历史。张清化搞了好多鬼，把你们打成‘反

【470】 全军文革徐向前、关锋、江青同志接见空军机关、院校革命群众代表讲话，1967年1月13日。《一月革命风暴》，页182-183。

【471】 《一月革命风暴》，页183。

【472】 全军文革小组领导同志接见部队科研单位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1967年1月15日。《一月革命风暴》，页210。个别文字根据其他资料作了订正。

【473】 张清化，时任总参测绘局局长。1964年晋升少将。

革命’主要就是他，所以分析张清化是牛鬼蛇神要斗倒斗臭他，不要把目标打错了。”“我再一次讲王新亭是个好干部，我们的目标是张清化。”<sup>[474]</sup>

1月17日，徐向前谈及海军问题时称，“最后讲海军问题。主要讲苏振华的问题。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不是肃清罗瑞卿的影响，而是把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置于死地，林副主席给海军的信，不知为什么落到刘邓手里去了。并且经过修改。苏振华要斗倒、斗垮、斗臭。海军文革要改组，萧劲光任组长，王宏坤任第一副组长，李作鹏任常务组长，以哪些人组成，他们三人提出。”<sup>[475]</sup>徐向前讲话后第二天，海军党委召开第174次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由李作鹏主持常委日常工作。同时会议还统一了对苏振华的认识，即苏是彭黄漏网分子，是刘、邓、贺龙、罗瑞卿安在海军的一个钉子；是海军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是海军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李、王、张表示，要坚决支持左派，“斗倒、斗垮、斗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苏振华”，同时提出要力争斗争面不要搞宽了。会议据此印发“纪要”，要求各级党委掌握。<sup>[476]</sup>

1月25日晚至26日凌晨，徐向前在听取了总后勤部系统61个群众组织代表“汇报了三反分子邱会作初步揭发的材料”以后称，“（1）全军文革热烈支持你们的造反精神。（2）希望你们继续揭发批判邱会作的问题。（3）王蜂那天去了解情况说了错话，我们全部收回。（4）邱的性质问题，你们继续揭发批判，根据揭发材料，你们再来定性质。”徐向前最后称，“（1）谢镗忠有问题，决定叫他回原单位作检查。（2）在太行山工作时，我对杨恬<sup>[477]</sup>这个人一直是不喜欢的。”<sup>[478]</sup>

## 第二十八节 萧力在解放军报社夺权

### 一、萧力领头造反

1月13日，化名萧力的毛泽东与江青的独生女儿李讷，与其他七人以“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名义，在解放军报社贴出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

【474】徐向前副主席接见测绘学院革命造反团部分战士的讲话，1967年1月16日。《一月革命风暴》，页216-217。

【475】徐向前同志关于海军问题的谈话，1967年1月17日。《中央首长讲话（1）》，页148。

【476】海字208部队红色造反团、海字205部队红色造反司令部：《海军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大搏斗和海军直属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李凯同志一九六八年六月在海军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报告》，页24。

【477】杨恬，时任总后党委常委，总后司令部参谋长。1964年晋升少将。

【478】徐向前同志接见总后勤部61个革命组织代表讲话，1967年1月25日。《一月革命风暴》，页330。

报称，“文化大革命初期，《解放军报》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曾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起了先锋作用，受到军内外群众的普遍赞扬。但是，从六月下旬以后，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在刘志坚的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报纸的宣传和社内的文化革命，就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了歧途。”“目前，全国发动了对刘、邓路线的总攻击。刘邓路线在我军的代表人物刘志坚已被揪了出来。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全军文革小组重新改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在这种形势下，军报为此发表的社论，却是一篇空洞无物，毫无热情的官样文章。社论只字不提军队内部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讲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胜利，也没有表达出全军同志对伟大领袖关怀的满腔热情。这样的时候写出这样的社论，是报社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解放军报》的耻辱！”“几个月来，军报宣传的方向偏了，报社内部的文化革命也相当一段时间冷冷清清。党委一开始就为运动划框框、定调子，继而又整理黑材料，抓扒手，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派工作组到工厂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直到广大革命群众纷纷起来革命的今天，社党委仍然以正确者的姿态出现，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军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完全是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这一段，报社党委在思想上贯彻了刘志坚的一套黑货，在组织上包庇了一批犯有反党罪行的，有严重错误的人，把他们放到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冯征过去是反党野心家彭德怀的吹鼓手，也是罗梁<sup>[479]</sup>反党集团的爪牙，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文化革命中，上窜下跳，大捞政治资本，在群众强烈要求罢官的情况下，依然稳坐副总编的太师椅。王焰，彭德怀的忠实走狗，是反党分子华楠的走卒。张秋桥，反对记者学毛主席著作，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采通处革命群众写了许多揭发他的大字报，他并不作检查交代，这样的人，却代表党委领导全社文化革命。吕梁一贯右倾，软弱无力，却主持报社的日常工作。另外，还有不少犯有严重错误的主编和处长，在党委的包庇下，也没得到充分的揭发批判。请问，报社具体工作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在这样一些人把持下的《解放军报》，怎么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怎么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的历史使命，怎么能不辜负

---

【479】 罗指罗瑞卿，梁指梁必业。



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将被革命的群众唾弃,以至彻底垮台。”<sup>[480]</sup>



李讷与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

继承了父母造反基因的李讷，1940年生于延安。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66年7月，以“萧力”之名，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同年11月，根据毛泽东、江青的意见，到解放军报社“锻炼”，在《快报》组任记者。

1967年1月4-6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被“左派”夺权。对此，毛泽东1月8日明确予以肯定称，“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sup>[481]</sup>萧力等人的大字报，就是在“一月革命”这个大气候下的产物，正如大字报中称，“学习《文汇报》《解放日报》闯将的革命精神，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

萧力等人的大字报，毫不客气地连续点了解放军报社胡痴、冯征、张秋桥、吕梁、王焰等主要领导的名。更直接导致了包括胡痴、和谷岩、宋琼<sup>[482]</sup>等人在内的“胡痴阴谋小集团”的垮台。

萧力领头造胡痴等人的反，必然有着我们至今尚未十分清楚的更深层次的背景。胡痴和宋琼，昨日还是频密进出钓鱼台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红人，胡痴、和谷

【480】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队星火燎原报编辑室：《星火燎原》第二期，1967年1月13日。个别错字及大字报署名根据其他资料作了订正。冯征，时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王焰，曾任彭德怀办公室主任，时任解放军报社总编室主任。华楠，解放军报社原总编辑，1966年12月任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社长，1964年晋升少将。张秋桥，张春桥胞弟，时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吕梁，时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王焰、张秋桥，1965年大校军衔。

【481】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65。

【482】宋琼，原解放军报社记者处副处长，1966年12月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

岩两人，刚刚在1月11日才被军委任命为改组后的新全军文革小组成员，胡痴1月9日才被陈伯达、王力宣布其代理新华社社长，<sup>【483】</sup>瞬间即被打入另册，其个人命运变化之快，令人唏嘘。

## 二、林彪对萧力划定框框，有所约束

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大字报一出，报社上下，都知道了萧力的来头。“胡痴阴谋小集团”垮了台，类似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行动是否会在解放军报社重演？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事隔四天之后，1月17日，林彪给解放军报社的“革命同志们”写了一封信。这封得到毛泽东书面认可“同意，这样答复好”的信函，全文如下：

同志们：

解放军报社由萧力等八位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解放军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的火焰。你们贯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的行动好得很！坚决支持你们！

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纸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

为了照顾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解放军报社的问题要采取“内批外帮”的方针解决。在报社内部，革命的烈火烧得越旺越好。但在形式上不能采取像《文汇报》、《解放日报》的作法，不能在解放军报发表像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这样做，完全是个阴谋，必须给对以彻底的揭露。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批判。

报纸的社论，评论，责成总政萧华同志和关锋同志负责。重要的社论、评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审阅。

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说服学生和其他机关干部，不要到办公大楼上去。你们可以在办公大楼外边设立接待站，接待来访的学生和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欢迎他们送大字报，劝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

致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483】新华社大事记编写组：《新华社大事记1950-1976》修改稿，页90。1月16日王力宣布，胡痴不再负责新华社的工作。



林彪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sup>[484]</sup>

碍着“伟大统帅”的面，林彪对萧力的大字报不得不表示支持。惟同时在信中对萧力的造反行为划定了一个明确的范围——“为了照顾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解放军报社的问题要采取‘内批外帮’的方针解决。在报社内部，革命的烈火烧得越旺越好。但在形式上不能采取像《文汇报》、《解放日报》的作法，不能在解放军报发表像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

林彪明知萧力背后是何人，仍直截了当地对其行为划定框框，有所约束。林彪能这样做，亦算尽了责任。

虽然林彪在信中提出“你们要耐心说服学生和其他机关干部不要到办公大楼上去”，解放军报社仍然受到了冲击。1月20日凌晨，总字212部队（装甲兵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头头，得到他们派驻首都高校联络员的报告，称北京高校造反派正在接管人民日报社，已经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红色造反团的头头接报后认为，既然地方院校红卫兵能接管《人民日报》，军队院校的造反派也应该接管《解放军报》，便马上联络串连了总字152部队（炮兵技术学院）等几个正在北京的军队院校造反派组织，发动和纠集了一千多人，先在装甲兵机关大院召开了准备接管军报的筹备和策划会议，成立了一个“接管解放军报社临时指挥部”，20日中午大队人马出现在解放军报社大院。

军队院校造反派派出212部队王澍及152部队隋振兴与报社内群众组织交涉未果。午后，军队院校造反派开始冲击报社大楼，报社内群众组成人墙阻挡外来造反派的冲击。双方激烈对峙期间，陈伯达两次来电话均未能有效阻止外来造反派的行动。傍晚，关锋来到报社，与军队院校造反派最终谈妥，让各自的队伍撤离报社，留下代表与关锋继续“谈判”。在关锋联系、请示之后，深夜，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率北京卫戍区武装人员抵达现场，将王澍及隋振兴逮捕。自20日中午开始的冲击军报风潮，至此总算完全平息。<sup>[485]</sup>

1月21日凌晨6时15分，关锋在解放军报社称，“有些单位冲《解放军报》社，不听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这里面多数同志是要革命的，承认了错误，我们欢

【484】 林彪：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1967年1月17日。中国科学院（京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资料组：《林彪同志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7年7月，页91。个别字句根据其他资料作了订正。

【485】 卢弘：《“红太阳”的影子——毛泽东和他身边人的故事》，香港：七星书社有限公司，2010年，页110-118；《总字212的“文革”大事简略回顾与反思反省——我所了解的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和装甲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



李讷与康生在天安门城楼上，1966年10月1日。

迎。其中有两个恶意攻击，我们就要专政。西城区纠【察】队早就镇压了，什么等运动后期处理！”<sup>【486】</sup>

“一一三事件”并未能使萧力即时得益。4月，在萧华的再三请求之下，陈伯达同意将原已转业到马列主义研究院任党委副书记的赵易亚<sup>【487】</sup>，调回总政任解放军报社总编辑。4月10日，军委公布赵易亚的任职命令。四五月间，张志、杜越凯<sup>【488】</sup>先后任副总编辑。

### 三、萧力终于坐上了解放军报社第一把交椅

到了8月23日，在萧华已被打倒的情势下，萧力、李志高、金锋三人署名，以“新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名义，又写了一张题为《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

【486】 总字六四二部队一〇五革命造反团等：金锋同志讲话，1967年1月21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页279。

【487】 赵易亚，1961年前历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总政宣传部副部长。1961年晋升少将，同年因病休养，1965年5月正式免职，同年12月经萧华、刘志坚建议，转业至1964年组建、陈伯达任院长的马列主义研究院，主持该院日常工作。1967年8月后被关押近八年，妻子林静亦受牵连冤死狱中。1979年恢复工作后任解放军报社顾问。

【488】 张志，原陆军第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1965年大校军衔。杜越凯，原解放军报社理论主编。

行到底——剥开假革命反革命赵易亚的画皮》的大字报。该大字报声称：“经过反复的调查和了解，我们认为赵易亚是个冒充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他是个打着红旗反红旗，在报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破坏总政文化大革命的极其危险的人物，下面我们就几个问题，剥开他的画皮，看看他的反动本质。……”“他拒不执行林副主席的指示。今年一月十七日林副主席给解放军报社革命群众一封信中指出：‘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又说‘在报社内部，革命的烈火烧得越旺越好’。并指示对胡痴小集团的阴谋要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军报只有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按着这个指示办事，才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可是，赵易亚竟敢违背林副主席这一重要指示，妄图扼杀报社文化大革命。”“赵易亚是个什么人呢？他是萧华的死党，他是萧华的‘秀才班子’中的得力干将，他去马列主义研究院是萧华和刘志坚推荐的，他来报社又是萧华点名要来的，他与萧华有着非常密切的、极不正常的关系。奇怪的是这次摇身一变成为反萧的‘英雄’。这就很值得人深思和怀疑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就是想搞假革命，真包庇，葬送总政文化大革命。”<sup>[489]</sup>

打倒了赵易亚，萧力最终得偿所愿。8月24日凌晨，以萧力为组长、王素之<sup>[490]</sup>为副组长的解放军报社临时总编辑小组成立。萧力终于坐上了正军级别的解放军报社第一把交椅。这一年，她27岁。后来，林家仿而效之，林立衡亦当上了《空军报》副总编辑。

8月24日凌晨，陈伯达来到解放军报社，对萧力等表示支持。他在讲话中称：

我完全支持刚才宣布的以萧力同志为首的《解放军报》新总编辑组。一年多来《解放军报》有许多变化。推翻胡痴的领导，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现在接着推翻赵易亚的领导，是又一个很大的胜利。就是因为有萧华、胡痴、赵易亚这些人作怪，使我们《解放军报》受到很多阻力。现在把他们推翻了，还要继续揭露。关于赵易亚的问题，我希望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同志们揭露赵易亚，到你们这里贴大字报，使大家晓得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真面貌，通知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同学<sup>[491]</sup>到你们这里来贴大字报，充分揭露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真面貌。因为到你们这里来他还有很多伪装，有很多内幕你们不清楚。他到马列主义研究院一年多，斗争相当激烈，时间长一些就暴露多一些。过去没有以很大注意力来揭露他，现在借这个机会可以让马列主义研

【489】 二二零七工厂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第20期，1967年8月24日。

【490】 王素之，原解放军报社军事宣传处处长。1967年后又被打成“反革命”受关押审查。1973年平反恢复工作后历任解放军报政工处、军事处处长，国防科委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

【491】 原文如此，似应为“同志”，下同。



李讷到海军大院庆祝林彪为海军题词，1967年11月29日。

究院的同学来大量揭露他。公开揭露他，到你们《解放军报》贴大量大字报。希望你们紧紧团结在以萧力同志为首的临时总编辑组周围。我再说一遍，这个报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的，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非常关心的，你们一定要以很大的力量来做工作，不辜负毛主席对《解放军报》的希望，不辜负林副主席对《解放军报》的希望！

庆祝你们胜利又胜利！<sup>【492】</sup>

萧力的临时总编辑小组组长一职，名义上从1967年8月一直延任至1969年8月。惟1966年底奉调与萧力一起工作、后被隔离审查清除出军队的宋玉芬，近年在《我曾陪伴过萧力》一文中写道：“从8月23日掌握军报全部大权，到1967年底，萧力因劳累过度病倒，遂回家休息。病愈后即留在中央文革工作，听说她担任了办事组长。但她在军报的职务，依然保留着。她从钓鱼台对平安里三号实行遥控。”“1968年，是解放军报社极端恐怖的一年。李××<sup>【493】</sup>等人根据萧力的意图，或者自以为是萧力的意图，或者出于对萧力的无限忠心，或者为了表示对萧力的无限忠心，在报社内大抓反革命。除了批斗‘胡痴小集团’和赵易亚等当权派及其‘同伙’之外，他们还把矛头对准报社另一些造反派，制造了一起又一起

---

【492】 二二零七工厂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第20期，1967年8月24日。

【493】 原文如此，应指李志高。

冤案。”“从1969年党的‘九大’前后，萧力便彻底离开了报社，她在报社的所有领导职务，都被免除了，同报社造反派的联系也割断了，原因不明，可能另有高就。1973年，中央发文件任命她和谢静宜等人为北京市委书记。她在报社的‘小将’们，曾到北京市委找她，但没有找到。报社同志也已多年见不着她了。”<sup>【494】</sup>

## 第二十九节 贺龙身陷缧绁

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代表中央与临时在中南海周恩来住处躲避的贺龙“正式谈话”。据官方《贺龙传》称：

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贺龙几次按捺不住，站起来想说话，但没有等他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1月20日凌晨4时，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除了贺龙、薛明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什么人也看不到。<sup>【495】</sup>

事实上，从踏出周恩来住处那一刻起，贺龙即失去了人身自由。

1927年南昌暴动失败后，在共产党最背运时（贺龙语），贺即追随共产党并加入其中，按理说周对其应十分了解。追随四十年的结果，是绝情地将其弃之如敝屣，对此突而其来的打击，贺一句“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道尽了心中的悲愤。

### 一、周恩来“正式谈话”前的贺龙

自1965年12月上海会议之后，叶剑英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性工作，贺龙的军内地位明显下降。1966年8月八届一中全会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徐向

【494】 宋玉芬：《我曾陪伴过萧力》。《往事》第117期，2012年9月19日。

【495】 《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引自该书电子版：<http://lz.book.sohu.com/book-7808.html>，最后访问：2014年4月18日。

前、聂荣臻均提为政治局委员，形式上与贺龙已平起平坐。正当此际，贺龙问题浮出水面。据王年一称：

吴法宪 1980 年 9 月 4 日交代：“1966 年 8 月中旬，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有一天上午林彪约我去汇报情况，即汇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精神，我说：‘据成钧、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等人交代，会议期间他们曾到贺龙家去谈过，说：吴法宪、余立金不能主持和领导会议，问题很多，又不积极，对开会采取消极态度。贺龙同志回答他们，那你们自己组织起来开嘛，继续把会开好。’林彪接着就大肆污蔑贺龙同志，林彪说：‘这不是明明指示他们夺你的权嘛，我早就知道贺龙插了手，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贺龙早就想叫成钧当空军司令员。你叫傅传作他们把材料写出来给我，并且写一个报告给我。’然后林彪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我就回来了。我回来后就叫成钧、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他们写材料，他们材料写好后交给我们，用吴法宪、余立金两人名义向林彪写了一个报告，将材料送给林彪。”

吴法宪、余立金给林彪的这个报告写于 1966 年 9 月 3 日。报告中说：“大概是 6 月 19 日晚饭后，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等三人到贺龙同志家里，贺龙同志主动问及空军党委全会精神，说了一些看法，和林副主席、叶副主席的看法是对立的。”报告中转述了吴富善 1966 年 8 月 20 日对贺龙的“揭发”，然后说：“我们觉得空军党委这次全会所以在会议前期方向偏了，是和贺龙同志在上面的幕后活动有很大关系的。”林彪将此报告和所附材料报送毛泽东。<sup>【496】</sup>

1966 年 9 月 8 日，林彪就贺龙问题向军队高级干部正式打招呼。王年一称：

1966 年 9 月 8 日上午，军委常委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林彪、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刘志坚、邱会作列席。据会议记录，主持会议的林彪说：“今天谈谈贺龙同志的问题。在主席那里谈过两次，主席已看了空军的材料，总参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参看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 33 页、34 页——引者注），只选看了一些综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级干部中打个招呼，找各位元帅谈一谈。主席已找贺龙同志本人谈了，要他以后不要这样搞，人家不满意。贺龙同志说，有些是事实，有些不是事实。主席找我、剑英、陶铸同志谈，主

【496】《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

席说贺同主席的关系不好。”“我们元帅中间，除了彭德怀外，贺是最不好的一个。”“过去早有苗头了，因为不那样紧急，所以拖着没有谈。我从没有同主席谈过。这次他搞到总参来了，利用外事局这样小的一件事，要把杨成武同志搞掉。要打掉杨成武，换上许光达。”“在空军大闹要搞掉吴法宪，就是他煽动的。打掉吴法宪，替成钧开路。”“空军开会期间，贺那里是地下司令部。”“海军他想扶苏振华，搞掉王宏坤、李作鹏、张秀川。”“材料很多了，总参、空军、海军、工程兵、政治学院、国防工办、公安部、卫生部，到处发现他伸手夺权。……他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关系很密切。”“现在主席说要向高级干部打一个招呼。”这是个打招呼会。会上没有异议。<sup>[497]</sup>

此后，打招呼的范围有所扩大。据谢镗忠 1967 年 10 月的交代材料称：

去年十月上旬左右，正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有一天下午散会时，在人大大会堂门口，萧华当面通知我吃过晚饭到他家里去一下（即景山公园的家）。大约下午七点多钟，我到达他家。那时他正在吃晚饭，李曼村、胡痴比我先到，王新兰拿了一盘花生给我们吃，然后萧华就出来了，他说：“有一个问题先和你们说一下，就你们知道，便于掌握宣传报导工作。××或××××<sup>[498]</sup>（具体记不清了，现在我认为萧华借口，也是萧华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恶劣手法）对我们的十个元帅作了分析，像贺胡子（重复了一句，贺龙），是土匪出身，是湘西有名的大土匪头子，大革命失败后投机参加革命的，这是个坏人。这个人打仗也不行，解放十几年来没有做什么工作。这个人是有野心的，是搞阴谋活动的，一有机会就要在部队中安插他的亲信，像谭友林、廖汉生、武汉军区有他的亲信（当时他没有指名，现在我认为他是否指××了的×××<sup>[499]</sup>），沈阳军区也有他的亲信（未指名）。”<sup>[500]</sup>

贺龙问题，毛泽东称“要向高级干部打一个招呼”。打招呼之后如何处置，毛没有交代。1966 年 8-12 月间，贺龙表面上如常参加了多次重要的公开活动，此期间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包括国庆十七周年庆祝活动），贺龙均有出席，并名列党和国家主要负责人之中。8 月 31 日第二次接见时，贺龙还显眼地与毛林

【497】《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

【498】原文如此。应为“主席或林副主席”。

【499】原文如此。应为“自杀了的唐金龙”。唐 1967 年 1 月 21 日自杀前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55 年授衔少将。

【500】《萧华、刘志坚及其同伙培植操纵保守势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谢镗忠的交代材料》，1967 年 10 月 26 日。





毛、林与贺龙同乘敞篷车接见红卫兵，1966年8月31日。

同乘一辆敞篷车。据新华社称，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贺龙同志，由谢富治、杨成武同志陪同，乘着敞篷汽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敞篷车绕场一周后，林彪、贺龙紧随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贺龙最风光的一次，谁能料到几天之后毛就“要向高级干部打一个招呼”呢？！

1966年11月13日，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老师接见军队院校来京师生大会，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先后在大会上讲话。全军文革小组为贺龙准备讲稿，生怕节外生枝，授人以柄，提出以推荐空军第十七航校的“搞好文化大革命的10点建议”为贺龙讲话内容，叶剑英、贺龙都表示同意。贺龙这次讲话，没让人抓到辫子。11月29日，在同一场合召开同一大会，没有再请贺龙出席。<sup>【501】</sup>

1966年12月18日，贺龙出席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声讨美帝轰炸河内和热烈庆祝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六周年”的十万多人集会。这是贺龙最后一次公开露面。<sup>【502】</sup>

---

【501】《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材料》。

【502】新华社18日讯，《解放军报》，1966年12月19日。



据《贺龙传》：“12月26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到新六所没有多久，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声称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及时得到回答。”不得已，贺龙暂避于中南海周恩来家中。<sup>【503】</sup>

1966年底至1967年1月初，贺龙问题呈公开化。

1月9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称：

刘志坚主张接见革命师生，把几个老师推向前线，推到第一线当“炮灰”，……这几个老师是好同志，他们是作工作不是不作工作，是正派的不是不正派，是光明磊落的不是不光明磊落，把他们炮轰打倒了，对军队是不利的，相反真正要打倒的并未打倒。在军内并未有炮轰贺龙，他到处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贺龙，他是不正派的人，是搞两面手法的……我们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是资产阶级进行反扑，刘、邓、陶、刘志坚他们向无产阶级挑战。贺龙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但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到处伸手。

贺龙搞比武是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是土匪出身。用送礼、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的一套。四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他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里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毛主席的，他是一个封建地主野心家，混进党内捞资本。<sup>【504】</sup>

同日，周恩来在接见解放军政治学院部分群众组织代表时称，“我本来不管军事，把军事也推到我身上了，今天要是贺老总，就不行，七十多了，经不了几下子，他错误也是有的，等他的身体好一点。中央决定我和他谈谈，还没有谈。这是中央决定的。”“当然贺老总的错误是严重的，主席讲，还是内部的，你们要体谅主席的意思。你们一斗就不行，我的身体比较好一点，要斗也不行。”<sup>【505】</sup>

同是一天内的讲话，周恩来的口径与林彪略有不同。周此际明显地在对贺龙态度上还有所保留。

---

【503】《贺龙传》电子版，最后访问：2014年4月18日。

【504】林彪同志在军委的一次讲话摘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页22。

【505】周总理接见政治学院部分革命组织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1月9日。《一月革命风暴》，页97。

贺龙历史上曾参与创建了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战争年代历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西南军区司令员。1966年下半年贺龙问题浮现后，其旧部中高级将领如王尚荣、谭友林、刘转连、黄新廷、许光达、廖汉生、成钧、唐金龙等广受牵连。

1月13日，杨成武在徐向前讲话时插话称，“成钧在防空军时是副司令员，我那时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兼防空军司令员，那个时候成钧就不好，这个人很阴险，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是有后台的，这一点你们都很聪明（众高呼：打倒贺龙）。”<sup>【506】</sup>

1月17日，徐向前称，“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sup>【507】</sup>

## 二、亲友的叛离

有关揭批贺龙的材料，自1967年1月即纷纷出现在军内外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上。

有小报披露了贺龙的秘书、贺龙办公室副主任何家为的“初步揭发材料”称：

前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篡军反党分子，是贺龙的老部下。他们关系很好，文化大革命中，王尚荣、雷应【英】夫给张爱莘【萍】副总长写了张大字报，我们办公室的王秘书等人看了后，说他们风格高，敢于给领导写大字报，而军委办公厅还没有给领导贴大字报。回来后，他们就起草了“炮轰办公室【厅】党委”的大字报，虽然不太长，但是攻击性的，矛头指向了紧跟林副主席的杨成武代总长（杨成武是军委办公厅党委书记），说什么军委办公厅同志要向王尚荣、雷应【英】夫学习。

当时总参外事局局长×××<sup>【508】</sup>是有问题的，外事局群众不同意让×××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杨代总长向周总理反映了这个问题，周总理同意不让他陪同毛主席接见。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但外事局群众敲锣【铙】打鼓报喜，说毛主席支持革命群众，杨代总长不支持，并给杨成武同志写了大字报。这件事王尚荣是知道的，但这个家伙怀着篡军反党的野心，鼓动作战部群众写大字报攻击杨代总长，妄想把杨代总长打下去，达到他夺权的目的。

【506】 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领导同志接见空军机关、院校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1月13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页198-200。

【507】 徐向前同志关于海军问题的谈话，1967年1月17日。《中央首长讲话（1）》，页148。

【508】 原文如此。指潘振武。

我们的大字报正好在这个时候，同样起到了攻击杨代总长的作用，大字报除了贺龙、薛民【明】（贺的爱人）外全部都签了名。贺知道写这张大字报但对大字报的内容不很了解。后来，一传达王尚荣、雷应【英】夫犯了错误，贺龙才让他的爱人薛民【明】到办公厅党委去做检查（薛民【明】是办公厅党委委员，贺龙在这里面是大有阴谋的，他是总参夺权事件的后台！——记录者）。

在同一“揭发材料”中，何家为还称：

上海会议是保密的，以后批判罗瑞卿贺龙就没再参加。六五年十二月中旬，他到广州去了。斗萧向荣的过程中，王新亭副总长领导，罗瑞卿为萧定调子，说他与彭德怀、黄克诚没什么关系，问题不大。王新亭向贺龙反映说，群众怀疑萧向荣有后台，贺龙却说：“不要怀疑，罗瑞卿是紧跟林总、紧跟毛主席的。”以后罗瑞卿的问题一揭发，贺龙就按人家的调子唱，在揭发罗瑞卿中没有任何贡献。<sup>【509】</sup>

1967年1月间，总政文工团话剧团一派群众组织，采访了贺龙与前妻蹇先任所生的女儿贺捷生，整理了九千字的材料。该材料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贺捷生逐渐打消了顾虑，离开了贺家，回到了亲生母亲的身边，站出来揭发三反分子贺龙反党篡军的罪行。贺捷生表示：‘谁敢反对党中央毛主席，谁敢反对社会主义，谁敢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坚决与三反分子父亲贺龙划清界线，坚决站在党和毛主席这一边，彻底揭发批判这个罪大恶极的三反分子贺龙，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坚决打倒反党篡军分子贺龙。’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小标题之下，揭发材料称：

贺捷生揭发说：“在我和三反分子贺龙接触的十几年中，从未见他学习过毛主席著作。经常见他手不离卷、赞不绝口、形影不离的书是：‘七剑十三侠’、‘小五义’、‘罗成征西’、‘说唐’、‘老残游记’、‘济公传’、‘西游记’、‘余赛花’……等武侠神怪小说。三反分子贺龙所到之处，都放着这些书，以便他随时翻阅，如床上、办公桌上，甚至在他的厕所里都摆着许多小人书供他

---

【509】 军队院校、文化团体红色造反者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根据记录整理：《打倒篡军反党分子贺龙！——贺龙的部分罪状》。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派星火燎原报编辑室：《星火燎原》第三期，1967年1月18日。

消遣。三反分子贺龙经常在厕所里看小人书；有时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一天当我为此向他提意见时，薛明说：‘你懂什么？大首长都是这样，这是第二办公室。’”

在“大土匪头子贺龙，广结党羽，阴谋政变”的小标题之下，揭发材料称：

薛明与贺龙结婚是彭真的大媒，这已是众人皆知的丑事。他们之间在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勾勾搭搭更是由来已久。贺捷生同志揭发“我母亲在延安”时，就对贺龙说过：不要与彭真拉拉扯扯。贺龙对此，不仅不听，反而把这些话告诉了彭真。可见他们之间的反党活动并非今天才开始的。贺龙与彭真开会经常坐在一起，散会又同乘一车回来。贺常把钓来的大鱼送给彭，这绝非生活小节。

贺捷生同志揭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贺龙曾对我谈起，彭真这个人很能干、很聪明，虽是高小生，能文能武。”并且说：“他是被培养的接班人”之类的话。

当“三家村”黑幕被揭出来之后，有一次贺问我（捷生）“文件你看过了没有？”并十分痛心的说：“二十多年的老相识，没有看透他，使人不明……。”

在“腐化堕落，任意挥霍人民血汗”的小标题之下，揭发材料称：

贺捷生揭发说：“三反分子贺龙，生活上充满了资产阶级腐臭味。只要贺龙的起床电铃一响，贺家全体工作人员就顿时为他一人忙碌起来，公务员赶忙进屋给他穿衣裳、穿袜子、穿鞋、系鞋带，医护人员急忙前来量血压，炊事员立即做美味的早餐。（他每餐的饮食都要保证一定的热量，为此特让北京医院营养科的人来贺处精密计数食物的含热量。）”

“他每天至少有两三次散步活动，还要老婆，秘书，警卫员，护士等人陪同。因怕冬天在院内散步冷，花了国家数千元，特将原来的走廊全都按上了大玻璃，专供冬季散步用。夏天，闲【嫌】院太小，有时要到体育馆去散步；但又闲【嫌】人多吵闹，就将体育馆的人全部轰出来。”

“贺龙是从来不看文件的，重要文件就让秘书讲给他听，而且每次不得超过半小时。他从不爱提笔写字，有时连签自己名字都不愿动手，因而经常家里人就代替他签名。（家里人都会仿他的字体。）他最热衷的是什么呢？打麻将，打扑克，争上游输了站桌子。离开西南时，贺龙，邓小平特意把一个所谓打了一二十年的“台球专家”××调来北京，专门陪他们打台球消遣玩乐。”

……

三反分子贺龙像“候鸟”一样，每年冬天要避寒，夏天要避暑。在西南时，每到夏季便带着家属及随从人员去南温泉、北温泉、昆明、安宁温泉去避暑。在北京时期，他冬季上广州、四川，夏季到北戴河、青岛。

“贺龙与薛明睡觉时飞机从他屋顶飞过都不行，有一点声音他都要发脾气，并命令在他睡觉时不许飞机从他屋顶飞过。真真岂有此理，简直是恶霸土皇上。”<sup>[510]</sup>

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称，“我们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sup>[511]</sup>毛泽东这两段话，为贺龙问题一锤定音。9月13日，毛泽东同意对贺龙立案审查。

1968年5月20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学习班学员时称，“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6月14日，原由中央办公厅保护的贺龙改由中央专案二办作为审查对象实行监护。12月30日，周恩来作关于使用贺龙历史材料的批示：“同意。使用这些材料，应与当时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并鉴别真伪。”1969年6月9日，贺龙在监护期间病逝。<sup>[512]</sup>

### 第三十节 “大闹京西宾馆”与“烧掉”杨勇、廖汉生

#### 一、毛泽东制止批斗萧华

自1月4日刘志坚被“揪出”后，总政机关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成立了几十个战斗组织，揭发了刘志坚大量的问题，其中不少涉及到萧华。

1月19日下午，在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萧华受到了陈伯达、江青的严厉指责，并要他到斗争刘志坚的万人大会上作检讨。<sup>[513]</sup>主持这次会议的徐向前多

【510】总政文工团话剧团“追穷寇”革命联合造反团：《打倒军内反党篡军大头目贺龙（三）采访贺龙女儿贺捷生》，1967年1月24日。该材料标点符号等多有错误，本书原文照录没有更正。

【511】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时的谈话（节录），1967年2月3日。

【512】《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974年9月13日《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问题的报告》及其附件。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513】总政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筹备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华会议纪要》，1967年9月18日。这一次会议，有材料称之为“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又有称之为“军

年后在回忆录中称，“因为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萧华的问题，我们又不知道江青、叶群<sup>[514]</sup>代表谁的旨意，事关重大，所以我在散会时郑重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但散会后，杨勇同志回北京军区作了传达，风漏出去了。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记录本未保存好，被群众组织偷看，知道了会议内容。于是，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的一些人，便抄了萧华的家，抢走了不少文件。萧华同志从后门走脱，跑来找我，因见我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又转到傅钟同志那里，坐车去西山住下，才免遭揪斗。我得知此事后，当晚令全军文革立即追查。发现杨勇传达了会议内容，我打电话找他，他表示诚恳接受教训。”<sup>[515]</sup>

杨勇回北京军区传达的详情，当时任郑维山秘书的杜辛在化名写作的《还历史真面目》一书中称：

十九日晚九点，杨勇司令员急忙赶回军区机关，让军区党委书记林国栋通知未回城里而在机关的副参谋长、副主任以上的首长开会。当时机关异常混乱，为防造反派冲击，会议没有在三楼常委会议室开，改在四楼郑维山的办公室开。郑维山当晚在城里家中，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会上，杨勇司令员首先传达中央文革指示，把廖汉生立即送工人体育馆，说那里正斗罗瑞卿，让廖去陪斗。接着传达了江青、叶群讲的萧华的“问题”。并分工由参谋长、主任向司、政机关传达；由政治部副主任姜林东、张正光分别向文工团和石家庄步校来军区住在“六一”学校的几百名造反派传达。姜副主任因文工团大字报污辱他“姜大麻子”，而不愿去文工团，于是姜、张改换传达分工，由张副主任去文工团。张正光当场写了一个传达条目，请杨司令员过目，杨说“可以”。

不料，张正光向文工团传达了杨勇司令员传达的江青、叶群讲的萧华问题，文工团的各战斗队，立即行动，联络总政、海政、空政文工团同观点的一派；加之总政机关也知道了下午会上江青、叶群所讲的萧华的问题，便紧

---

委碰头会扩大会议”，本书从后者。出席会议的有军委领导人，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40余人。参见《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112-113。

【514】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提及叶群在会议上发言批判萧华，惟事发当年的资料并未提及叶群。

【51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转引自《陈先瑞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页442。

急出动，一路人马沿着长安街贴“打倒萧华”的大字报、大标语；另一路由战友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同观点战斗队，和总政机关的造反派去抓萧华。<sup>【516】</sup>

至于杨勇的积极性为什么这么高，甚至公然违抗徐向前宣布的纪律？徐向前、杜辛却均未加以解释。

范硕称，19日的会议尚未结束，叶剑英与聂荣臻即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叶并马上将会议情况报告了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毛主席同意保萧华，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告？赶快制止，总政治部主任是能乱批的吗？’”<sup>【517】</sup>

## 二、“大闹京西宾馆”

徐向前称，“次日上午，继续在京西宾馆开军委碰头会。杨勇同志来到后，我又当面说了他。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在那里火上加油。这时，萧华来了，并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我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了地上。叶帅气愤地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他也拍了桌子，把手骨都拍伤了。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就是这样。事后，成了‘二月逆流’的一条主要‘反党罪行’。”<sup>【518】</sup>

有知情者称，徐向前拍桌子，是认为萧华四处躲藏是“胆小鬼”，怒其不争而生气；叶剑英拍桌子则是针对徐向前对萧华的态度有所不满。此说较为符合实情。

毛泽东对萧华问题表态，周恩来理应立即告知徐、叶和陈伯达、江青。叶剑英在20日会议上态度强硬，想必已得知毛是保萧的。惟根据当时群众组织的材料，直到20日上午，徐向前在三座门接见军队造反派谈到萧华问题时还称，“我不能表态，我还有这个权力，中央没有让我表态，我是党员，我要负责，还要请示军委、主席，关于他的问题，我们已经开了两天会，问题是很严重的，但扩展到什么范围还没有决定。”“我看总政党委必须改组……。”<sup>【519】</sup>不知为什么徐向前会比叶剑英慢了一拍？

1月20日，北京西单贴出《最新消息》：“陈伯达、江青同志关于萧华问题的讲话：‘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对中央文革不尊重，解放军的威信下降，把无产阶级军队变成资产阶级军队。’”“打倒萧华！”“砸烂萧华的狗头！”“把资产阶级

【516】 石言、木辛：《还历史真面目》修订版，香港：三次坊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页281。姜林东，1964年晋升少将。张正光，1955年授衔少将。

【517】 《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114-115。

【518】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转引自《陈先瑞回忆录》，页442-443。

【519】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页263-264。

的大绅士萧华揪出来！”<sup>【520】</sup>同日，杨成武传达陈伯达、江青关于萧华问题的指示称：

一、传达和记录一律收回烧毁。

二、凡是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传单都盖起来。

三、萧华同志的大字报不准上街，因为他是总政主任，有国际影响，中央未定性质。

四、向外传达了，告诉他们不要相信。

五、中央文革办事组准备发声明，对陈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有很大的歪曲和造谣，传到那里，从那里追回。<sup>【521】</sup>

实际上19日晚传出的陈伯达、江青讲话并没有什么“歪曲和造谣”，只是毛泽东对萧华问题发话之后，显得十分不合时宜而已。另据当时的有关材料称，“一月二十一日，萧华给袁子钦打电话时说：‘陈伯达同志讲：我的心情很难过，一夜没有睡好觉，违犯了纪律，在政治上造成很不利的影响。’以后，萧华又散布说：‘伯达、江青同志在会上作了检讨。’‘伯达同志向我道了歉，说他不了解部队情况，上了谢镗忠、李曼村的当。’”<sup>【522】</sup>

1月21日凌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了各军兵种机关、学校、科研等单位九百余名四清工作队员代表，在谈到萧华问题时周恩来称：“萧华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完全是军委内部讨论的，完全是人民内部问题，领导上还没有批准，为什么把他公布？党的纪律，军队的纪律，都有些废弛，应该采取措施，予以加强。因为，现在军队、院校和文工团同地方一样看待，它就漫无边际。现在，有些人不该问的也问，不该向外传的也向外传，甚至成立专门的泄密队，在军队是不允许的。我们现在应该采取一些措施。”<sup>【523】</sup>

1月22日，毛泽东、林彪在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时，作了长篇重要讲话。有关萧华问题，毛称：“萧华这个人有绅士派头，不交心。我在武汉同他谈过话，像打机关枪一样，听后没有印象。”<sup>【524】</sup>

【520】 彭健飞：《十年浩劫日记》第一卷，自印本，2006年4月，页248。

【521】 《中央首长讲话（1）》，页176。个别文字根据其他资料作了校正。

【522】 总政治部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筹备处：《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华罪行的初步报告》，1967年10月15日。

【52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页276。

【524】 总政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筹备处：《总政机关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100），1967年12月30日。



同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与北京大专院校师生座谈，江青谈到萧华问题时称：“萧华同志不是不可以批评的，但他与刘、邓不同，是在军委内部讲的，不知道谁传出去了，当天抄了萧华的家，这是别有用心的。萧华同志不是刘志坚的后台，你们不了解他么，我们也不了解他。有人别有用心地把我们的话歪曲了。党中央军委内部问题，但坏人传出去了，有人想引起混乱，搞垮我们，这是办不到的。”<sup>【525】</sup>

同日晚 21 点至 23 点，谢镗忠在接见军队院校等单位代表回答对萧华的看法时称：“同志们，我只发表个人的看法。同学们都知道，他从整个问题来讲，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大家知道，萧主任在内战、抗战、解放战争中都有功绩。解放以来，总政曾有三个主任，罗荣桓、谭政、萧华这三个同志比较，应该说萧华同志比他们两个工作做得多，成绩比他们大。萧华从去年八月八日回到北京，由于认识上不够，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点缺点、错误的。杨勇、袁子钦同志无组织无纪律，不经组织允许泄密给大家是决不允许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意见、批评是应该的。现在毛主席、林副主席还没做出结论，我们不能定性。另外在大街上的标语、大字报一律要覆盖。要保证萧华的安全、健康。中央文革小组指示：关于江青、陈伯达讲话的传单，是个反动的传单，应该立即收回销毁。我想对这个问题再谈一下，这两天来都看到这个情况，现在用大字报、广播正在辟谣。”<sup>【526】</sup>

3月3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在军委召开的总政机关干部会议上讲话，再次保了萧华，对萧华的检讨表示肯定，称其“是诚恳的，是实事求是的”。周恩来称，“我同意刚才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对萧华同志的错误检讨的估计，确实萧华同志刚才的检讨是诚恳的，是实事求是的。因为我们要求，领导同志作检讨，应该实事求是，合乎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把自己今天所认识到的错误，给大家很诚恳的说出来。不仅是而且首先教育自己、鞭策自己，同时，也可以帮助大家弄清，认识清楚一个问题。”“萧华同志是个红小鬼，参加红军的兴国佬（江西话：兴国老表），到现在是三十七、八年了，一个人总要看他的全部历史。我跟萧华同志认识，拿在座的同志说跟聂荣臻同志差不多，当他很年青的时候当青年干事就认识他，一直到他成长，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直接的培养教育下，由青年干事一级一级的上来的，内战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525】《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页 287。

【526】海军指挥学校红色革命造反团：谢镗忠同志接见三军代表的讲话，1967年1月22日。《一月革命风暴》，页 292。

都作过贡献。在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反对反党集团斗争是积极的，特别是最后，反对彭、罗、陆、杨，反对刘邓反动路线，这些斗争是同志们记得很清楚的。萧华同志，如果说缺点的话，他很热情，但有时轻率一些。热情的方面我可以作证明嘛！不管他写的《长征组诗》，有的革命的文学家有所批评，革命的音乐家觉得不够味，但是，拿我这个人来说，我很欣赏。他的《长征组歌》，我几乎能背能唱，而且我唱起来，不仅是欣赏而已，我是有感情，回忆到长征，歌颂我们伟大领袖，入云南的那一段，今天在座恐怕有同志会给我作证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句，那是得意之笔。萧华同志，在入云南那一首诗里，是把它描画出来了，这是要有真情实感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的，尽管他不是诗人，他在养病当中，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我觉得就这一点，是有充沛的革命感情的（热烈鼓掌）。大概因为前几个月萧华同志这一件事出来，连《长征组歌》有些人都不唱了，我还是唱的。因为这是代表一个时代。当然人都是有缺点的，萧华同志应该从这次教训中更虚心，更多地学习。要勤勤恳恳地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跟着林副主席学。因为萧华同志有很多有利条件，刚才伯达同志讲得很清楚，应该学得更好，这是我们大家期望他的。”<sup>【527】</sup>

众人讲话之后，萧华问题暂时得以平息。

### 三、首先“烧掉”廖汉生

1967年1月，按军委的部署，北京军区机关是开展“四大”的大军区机关之一。首先被“烧掉”的，是军区第二政委廖汉生。据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陈先瑞后来回忆：

1967年1月初，……林彪面示杨勇司令员：“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烧掉廖汉生。”杨勇同志感到很为难，于是请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问他怎么办，萧说由他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就有了答复，说由上面派人到北京军区贴大字报、点火，这样，机关的“四大”就可以乘势展开了。

5日，杨勇主持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传达林彪关于“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的指示，但没有传达“烧掉廖汉生”这句话。这时，廖汉生政委正在保定驻军参加“四好连队”年终总评工作，没有参加这次党委常委会。

会后，按照党委讨论决定，通知廖汉生政委务于6日回北京。同时，机关做好搞运动的准备工作，起草一个召开动员大会用的讲话稿。准备8日召

【527】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在军委召开的总政机关干部部会议上讲话，1967年3月3日。《中央首长讲话（3）》，1967年4月，页22、25。

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向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同志交代军区司、政、后机关开展“四大”，要他们抓好部队工作，保持部队稳定。

7日夜間，总政治部值班室通知说，上面去人到军区大院贴大字报，要军区迎接，帮助张贴。8日凌晨，大字报贴在了军区办公楼主楼横梁上。大字报中污蔑廖汉生“是贺龙的人”，捏造了数条罪状，署名的人都是中央文革或军委文革小组的成员。<sup>【528】</sup>这张大字报，煽动性极大，如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军区机关大院。早上一上班，机关干部就看到了，顿时议论纷纷，秩序大乱。

8日上午，军区党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是在北京城里定阜大街原军区政治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的。我对夜间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按照通知去参加会的。当我走进会议室时，看到与会者人人表情沉重，一种不祥之感在我头脑中产生。

……

杨勇看到人已到齐，便宣布开会。他还没讲几句话，军区文工团的造反派来了，要廖汉生到西山军区大院看大字报。会议骤然沉寂，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廖政委看到这种情景，便问：“你们看怎么办吧？”杨勇司令员说：“我看还是去看大字报，正确对待群众嘛。”廖说：“好吧，我看你们是商量好了。”边说边掏上衣口袋里装的小本，把记有机密的小本往皮包上一放，说：“小眼镜（戴眼镜的党委秘书），交给你！”然后，昂首挺胸地走出会议室。廖汉生就是这样，以看大字报为名，回到军区大院，遭受批斗，被非法关押起来的。<sup>【529】</sup>

廖汉生被“烧掉”，与其被视为“贺龙亲信”很有关系，何况他还是贺龙的前外甥女婿，杨尚昆的亲妹夫。此后陆续被“烧”的，还有军区副司令员吴先恩，副政委张南山、王紫峰，军区政治部主任吴岱等<sup>【530】</sup>（连郑维山也被“烧”了一阵）。最后，借前述1月19日杨勇泄漏萧华被批消息一事，“烧掉”了杨勇。

【528】署名者一说以谢镗忠为首，“1967年1月8日，郑维山一面串通谢镗忠等人在军区大院抛出了揪廖汉生同志的大字报；一面以在北京卫戍区开会为名，当场就把廖汉生同志抓了起来。”（见北京军区党委文件：《林彪反党集团的大将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汇编之六：郑维山在林彪授意和支持下篡夺北京军区领导权》，1974年4月29日）。一说为唐平铸、胡痴、和谷岩、宋琼等（见周恩来、徐向前接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的讲话，1967年1月29日）。

【529】《陈先瑞回忆录》页440-441。

【530】吴先恩、张南山、王紫峰，1955年授衔中将。吴岱，1955年授衔少将。

#### 四、叶剑英等布置“火烧杨勇”

即使没有1月19日的事，杨勇恐怕也是在劫难逃。郑维山后来称：“一九六六年十月以后，叶剑英同志和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曾向我说，杨勇也有问题，要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烧着看。我当时认为杨勇要倒台，我当军区司令的机会来到了。因此，十二月各军干部来军区开会时，我迫不及待地向部分同志打了招呼，说‘廖汉生是贺龙的人，杨勇也有问题’，实际上是告诉大家，我已经掌握了军区的领导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同志和萧华、杨成武向我布置要‘火烧杨勇，把他烧焦’，我在急于当军区司令的思想支配下，没有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报告，就连夜亲自布置了火烧杨勇的大字报，并派军区文革到杨勇家查封了材料。”<sup>[531]</sup>



批斗杨勇，1967年。

“一一九事件”为“烧掉”杨勇找到了最好的由头。有关“烧掉”的详情，杜辛后来称：“二十日晚上，军委叶、徐、聂三位副主席，召集驻京各大单位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召开紧急会议，因为杨勇司令员把萧华‘问题’捅出去了，叶帅办公室直接通知郑维山参加会。会议的主题是传达下午召开的军委碰头会的精神，要求各单位做好稳定军队的工作，不能因为发生了‘一二〇事件’，就怀疑萧华，要支持萧华和总政治部的工作，这是大局。会后，叶帅根据‘上峰’的意图，当着徐、聂副主席和军委办事组杨成武、萧华的面，布置‘火烧杨勇’，并且指示郑维山回去传达，郑维山因为不知道杨勇捅出萧华的事，感到副司令员传达‘火烧’司令员，很为难。散会后在

京西宾馆等到天亮，待到老师们起床后，再次说明苦衷，并建议军委发文件或由军委、总部派人传达。在得到老师‘你先按开会布置的传达，文件随后发’的指示后，二十一日晨才回到军区机关向军区领导和‘文革’办公室负责人传达了‘火

【531】 郑维山：《我的检查》，1971年1月26日。

烧’杨勇的指示。杨勇由此被司令部、政治机关和住在机关大院里的文工团‘揪出来游斗’。”【532】

“烧掉”杨勇、廖汉生之后，中央力保与聂荣臻、杨成武同为“华北山头”的郑维山。1月24日，周恩来在全军文革召集的三军各群众组织代表会上讲话时称：“如郑维山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是北京军区副司令，是个老红军，不讲别的，只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一千二百万，毛主席十次接见都是郑维山和傅崇碧同志主持的，有时首都同时集中近三百万，保证了首都安全，这样艰巨的组织指挥工作，做得好，我们信任郑维山同志，对这样好的同志，现在批评他时，把他扣起来是不公道的，还一定要徐副主席下命令才能解决，这就影响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533】



毛林周与负责接见红卫兵组织工作的郑维山，1966年11月10日。

### 五、周恩来等谈北京军区和总政问题

1月29日凌晨，周恩来、徐向前由郑维山陪同接见了北京军区“燎原”、“新燎原”、“重上井冈山”、“火炬”、“革命青年”及“革命敢死队”等几个群众组织的部分人员，在谈及北京军区杨勇、廖汉生、郑维山和总政萧华、刘志坚等人的问题时称：

【532】《还历史真面目》修订版，页288。

【533】《中央首长讲话（1）》，页224。参考其他资料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周恩来：他们做了几件事。大斗廖汉生，抄廖汉生的家，这是一件事；和军区大楼串联，后来发生分裂。（郑维山：捉廖汉生后就分了。）得了萧华同志的消息，要捉萧华同志，后来转向杨勇。这以后就扩大了，连郑维山都不信了，政治部一个组织扣郑维山，你们都参加了没有？（答：没有。“新燎原”的一个同志说：捉杨勇我们也没去。）没抄杨勇的家吧？（有人说：那是机关捉的、抄的。郑维山：没抄。）除去郑维山，其他副司令员、副政委还有没有被扣的？（答：有张南生、吴岱、吴先恩。周一一记下。）岱是一个代字下面一个山吧？他兼没兼副政委？（答：没有。斗他们三人是按三反分子斗的。“新燎原”一同志：那个会不严肃，让学校给砸了。）我问你们要不要继续扩大下去？（“燎原”一同志：不应扩大，要用材料说话。）

徐向前：扩大，我听说北京军区常委要一个一个来。（“燎原”一同志：我们不同意，那是秘书处一个组织的意见。）

□周恩来：刚才讲了，不管任何一个人民，一个战士，有权向林副主席提议罢杨勇、廖汉生的官，只是方式值得考虑。……廖汉生、杨勇的问题，要批深批透，由大家先揭发，不仅是军区大院内，北京是个大军区，又在首都，下面这么多部队，这么严重的错误，下面不理解，有人会问的。八号贴出了廖汉生的大字报，才二十多天；杨勇是二十一日才揪出来，时间这么短。当然有些人弄不清，首先要是在军区范围内，知道他们错在什么地方，要揭深揭透，不急于罢官，这是主席一贯的方针。对各部、各省都如此。现在知道廖汉生在北京军区一向不突出政治，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按林副主席指示办事，不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不认真学“老三篇”，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所以全国比，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北京军区表现最少，你们想想有多少？你说华北部队不强，不是，我可以作证，去年我两次到邢台，那里地震，看了，部队很好。

□徐向前：你们认为斗杨勇、廖汉生到时候没有？（答：没有。）没到，什么时候到？（徐很气愤站起来）你们认为阻力是什么？（答：爪牙没抓出来。）你们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你们这样搞会把打击面扩大，杨勇、廖汉生这样的活老虎毛没拔一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得很，刘、邓路线，刘志坚……。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少数。凡是斗群众，凡是犯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都是斗争目标？哪个军区、哪个部队没执行过？为什么

对杨勇、廖汉生这两只活老虎一根毛没拔？要扩大？要打多少人？杨勇、廖汉生你们斗过几次？我劝你们把廖汉生斗斗，杨勇是个什么东西，斗斗去。我非常不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不斗杨勇、廖汉生，要去抓郑维山，造郑维山的反，方向错了。你们造反，对，造什么反？要狠造杨勇、廖汉生的反，这个反不造，你们要扩大，就会扩大到你自己头上，如都搞成杨勇、廖汉生的爪牙、走狗，这就不得了啊！要集中火力，一个是对杨勇、廖汉生要斗垮、斗臭、烧焦；一个是团结到批评到团结，不要打击自己的朋友，……

……

周恩来：廖汉生和贺龙的关系，跟的很紧。如果他政治上很强，几个老帅就会帮助他。我们原来对他抱有希望，所以中央提拔他，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中央候补委员等职务，很信任他，但他没起好作用，竟向相反方向发展。

徐向前：搞独立王国。

周恩来：例子很多，比如，主席接见红卫兵，照片很多，为什么北京军区印的画页要加上贺龙的，贺龙就那么一次嘛！主席、林副主席的照片很多，为什么不用？这是对林副主席不尊重。

徐向前：政治局会议，林副主席关于夺权斗争防止政变的讲话，他不传达，只传达刘、邓和其他人的，企图何在？你们好好想想，你们去调查研究，我说你们目标搞错了，不然走下去错误更大。你们可以去作详细调查。

周恩来：为什么揪出杨勇，他在北京多年，从来不到林副主席那去汇报，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廖汉生封锁林副主席，杨勇也封锁林副主席。当然杨勇也揭了点廖汉生的问题。你们问我时方法也有问题，你们把郑维山与杨勇并提，我只能讲他们是好同志，这个话我讲过。我要守纪律，你要问，陶铸你也讲过，那是有人讲他是四号人物，这个不对，怎么能说几号人物？政治局一改选，国务院北门就有人贴他的大字报，是私人有意见，那时我只能说信任他，没有了解他现在这么多材料。杨勇也是这样，不能讲，讲了等于小广播。那么郑维山是不是这样，郑维山我们一直信赖，不是他组织几次接见，我们还会犯很多错误，经常下半夜决定接见，上百万的人，八个小时全出来检阅，工作那样紧张，没有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是不可能的。刘志坚问题揭出来，他在总部，在总政，萧华同志有责任，他只发现一部分。……萧华同志犯错误，是内部矛盾，解放军建军他是有功的，他是个红小鬼上来作总

政主任的，养病几年，刚回来工作，有错误主要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一棍子打死，萧华与刘志坚不同。

刘志坚六四年在广东参加调查大比武冲击政治，那主要是叶群同志的功劳，林副主席得到第一手材料，提出突出政治，所以重用他，才有六五年底到六六年初的文艺座谈会，那个座谈会，实际上是江青同志主持，是她的功劳，刘志坚是召集人，当然也有刘志坚一份。让他任全军文革组长，他就骄傲，放松自己的缺点，对全军文革和中央文革，他两头推，军委文革找他，他说中央文革有事，中央文革找他，他说军委文革有事，特别是冲国防部大楼那次，他应去，不去，我过问时，他还没去，结果其他人去解决不了，越挤越多，天亮了他还不去，越挤越凶，他把老师请去开会想办法，伯达同志让张春桥、戚本禹去，去就解决了，他如果早去早就解决了。两条路线问题提出来，《红旗》发表社论，主席接见，林副主席讲话，军委紧急指示发了，问题本来解决了，他十一月还把老师推向一线讲话，不需要嘛，他片面反映情况，只反映阴暗面，接见军队院校学生，连我也拉去奉陪，我那时忙的不行，只是转一圈。他说在天安门上看不清，还不是去了。他们讲话，讲的什么就不晓得，实际上是他制造圈套。他本身思想右，所以偏右。他本身过去有问题，投靠张国焘；和李伯钊<sup>[534]</sup>演反毛主席的戏，抗战时被捕，那时是王任重管他。在钓鱼台他和王任重一起，不揭发王任重。他个人主义极重，他支持一司，他女儿在一司，三司他就不去。（郑维山：我拉他才去了一次。）你拉他才去一次。全军文革是直属军委的，他放在总政以下，由他管，不是对军委负责。这个人够三反分子。

这时杨勇出个主意，把矛头对向萧华同志，这完全是错误的，搞的一部分人，有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爬门进去到萧华同志家里把东西拿出来，送给我，我怎么能收？萧华同志的爱人给叶群打了几次电话。她也是个红小鬼。这是个大方向问题，说明杨勇要把水搞混，他自己可以逃脱。他和刘志坚有关系。我就怀疑抓廖汉生是他布置的，你们很认真，来问我，你们应当揭。（贾全仪等几个人说：是他布置的。郑维山：这是个阴谋，他不揭发廖汉生的问题，王尚荣问题出来后，一天他问我，我无意讲了王有后台，他马上跑到杨代总长那里，要揭发廖汉生，要见林副主席，杨代总长问我，我才知道。）他总是不到林副主席那去，在这个情况下才去。他告诉你们，来试探我们，我们察觉，是否他来考察我们的态度，他有意把郑维山同志拖到一起。

【534】可能是指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创作的歌剧《长征》。



(有人讲：他是摸底了，第二天找我们，问我们信不信得过他。)那次，你们一走，我就打电话找他，有一刻多钟找不到他，总机讲，他在一个小屋，没有电话，找不到他。一个大军区司令，找个没电话的地方躲起来，(郑维山：后来我知道他在空军找个房子躲起来，心里没鬼躲什么?)拿你们来侦察党对他的态度。我说这些青年，你们问我，把郑维山与他一起提，我讲你们可信，你们高兴了。郑维山同志在，杨勇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有人讲：据我们知道，出廖汉生那张大字报就是杨勇搞的鬼。)

徐向前：唐平铸……(郑维山：他们要求贴大字报，不告诉杨勇，告诉我，要我通知西山，我过去和他们都不熟。)

周恩来：唐平铸、胡痴、和谷岩这些人是太行的。宋琼不是。(马国光：当时周广祥怀疑是杨勇搞的鬼，就被打成反革命了。“新燎原”贾全仪：这个话我说的，他当时说不能斗廖汉生，要等中央讲话……)

徐向前：讲清就行了。

周恩来：杨勇要转移目标。怎么传的那么急。一下子传到东北，东北军区政治部一下子就贴出大字报，围攻陈锡联。有些人坚决要保护，陈锡联是中央决定的，萧华同志代表去讲的。

□周恩来：你们开始闯司令部，人家受委屈，现在你们多受了点委屈，要看大前提。杨勇、廖汉生是罪有应得，还有很多老将被罚跪，南京军区，许世友以下的，他们文工团都把你们拉出跪下，他们就跪，共产党员对待群众的态度，群众要跪嘛，俯首甘为孺子牛。……

军区出这么多的事，是有阴谋的，今天揭露了杨勇搞的阴谋，安排抓廖汉生，抄了萧华同志的家，现在揭露出是杨勇搞的。现在要集中目标，要对杨勇、廖汉生挖的深，挖的透，再作结论。……郑维山没有阴谋，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郑维山同志回去会做工作的，我委托文工团开个大会，请郑维山给你们做个报告。不要让外单位乱冲机关大院。……你们只有大方向一致，团结一致，才能把杨勇、廖汉生挖深挖透，才能把刘志坚的问题批倒批臭，不要扩大范围，你们方向就作对了。……你们斗郑维山，我就不见你们。这是为什么？是郑维山把你们找来见我，你们还这样，怪事！完全意气用事。<sup>[535]</sup>

【535】周总理、军委徐副主席接见北京部队几个革命组织的讲话，1967年1月29日。《一月革命风暴》，页367-374，个别遗漏或不准确处参考其他资料作了订正。

2月3日，毛泽东称，“打倒萧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萧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山几个都倒了。”<sup>[536]</sup>毛的讲话，使北京军区的权力纷争终于尘埃落定。3月，军委批复，“责令杨勇、廖汉生停职反省”。<sup>[537]</sup>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郑维山代理军区党委书记。<sup>[538]</sup>

### 第三十一节 军队正式介入地方文革

#### 一、毛泽东：“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1月21日，南京军区党委向林彪并军委报告称，“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廿二日到廿三日，在合肥召开15万到20万人大会”，“要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警卫会场。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廿一日十四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林彪即将报告转予毛泽东，当日，毛泽东批复林彪称：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毛泽东

一月廿一日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sup>[539]</sup>

同日，林彪批示：完全赞成主席的方针，全军必须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

第二天，毛泽东在接见军委碰头会议扩大会议人员时，要求高级干部“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他批评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讲得一无是处，要求军队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林彪在1月23日接见军委碰头会议扩大会议人员时称，军队对文化大革命过去不介入，

【536】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时的谈话（节录），1967年2月3日。

【537】杨勇、廖汉生在1967年1月先后被关押及批斗。嗣后两人均失去自由长达5年之久。杨勇于1972年5月、廖汉生于1973年12月方重新恢复工作。

【538】1969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郑维山为军区司令员。

【53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197。

是时机不成熟，现在正式介入，公开介入，尽管左派不成熟，人数不多，也要支持。<sup>【540】</sup>

根据毛指示精神，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并转各级党委、人委、军区、分区：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我军全体指战员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540】《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19。

这一指示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sup>[541]</sup>

其实，在中央支左决定发布之前，部分地区如山西、贵州、黑龙江的军队领导人，已经介入地方文革。中央支左决定的发布，不过是使介入更为名正言顺，范围更为广泛而已。

## 二、夺权典范地区的支左行动

1967年1月，发轫于上海的“一月革命”，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夺权的风暴。在省、市一级的夺权中，被毛泽东及中央肯定的并不多，仅先后有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包括青岛）和上海。这些地区的夺权被承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到了当地驻军不同程度的支持。

### （一）山西夺权<sup>[542]</sup>

山西夺权的头面人物，是文革前被贬任山西省副省长的刘格平<sup>[543]</sup>，并且得到了山西省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第二政委张日清<sup>[544]</sup>的积极支持。

1966年12月，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与刘格平谈话。周对刘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要注意抓紧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sup>[545]</sup>1967年1月4日，王力、关锋在北京饭店与刘格平谈话，要刘格平回山西去，把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争取革命领导干部，把山西省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还说毛泽东表扬了张日清，说省军区党委九个常委只有他一人主张支左，他是少数，可他是正确的。你回去后要取得张日清的支持。<sup>[546]</sup>

刘格平1月6日回到太原，经山西省省委常委、副省长刘贯一介绍，与张日清谈话。此前，受刘格平委托，刘贯一与张日清联系并称：“我们都是新四军的老同志，彼此可以随便说说心里话”，“山西的领导权基本控制在走资派手里”，“山西

**[541]**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107-110。

**[542]** 主要参考资料：余汝信、曾鸣：《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华夏文摘》增刊，第514、517期，2006年7月24日、8月27日。

**[543]** 刘格平，回族，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1960年被定为“地方民族分裂主义者”而被调离宁夏。1965年12月任山西省副省长。

**[544]** 张日清，1955年授衔少将。1967年1月上旬，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书记、政委卫恒被造反派群众组织关押后（1月30日自杀身亡），张日清实际已为省军区第一把手。

**[545]** 刘格平：对山西省委审查结论的书面意见，1983年3月15日。

**[546]** 山西史志研究院：《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纪事1949.10—1976.10》，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页400。

的领导干部虽然派系很多，什么太行、太岳、晋西北、晋察冀，但是基本路线上是一致的。”他还向张日清介绍了刘格平的情况，又称有几位革命领导干部准备站出来“和群众一起革命”。张日清表示：“你们站出来革命，我支持你们，省军区支持你们”。

1月12日傍晚，山西左派组织联席会议在刘格平宿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23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和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守中，以及刘志兰<sup>[547]</sup>、丁磊<sup>[548]</sup>等人。刘格平称，今天晚上请来大家，是要研究夺权问题。我们认为夺权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非解决不行。今天我们向大家宣布，我们几个人，有贯一同志、张政委、袁振同志<sup>[549]</sup>、守中同志已经成立了一个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这个核心小组代行省委职权。但我们核心小组每个人都不参加总指挥部，我们核心小组是总指挥部的顾问机构，我们当你们的顾问。张日清也在会上表态支持总指挥部夺权。<sup>[550]</sup>

经与会者一致同意，决定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推定杨承效<sup>[551]</sup>为总指挥。当晚夺权过程中，张日清命令省军区在省委、省人委担任警卫工作的部队全部撤走。夺权的造反组织如入无人之境，查封办公室的文件档案柜，取走印章。

13日晚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下属各组织的代表一千余人在省委礼堂集会表示坚决支持夺权。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称，“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十二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卫恒等反党分子的巢穴。”

1月20日，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向中共中央并中央文革小组呈送《关于夺权前后十天工作的报告》。同日，张日清以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的名义给中央军委提交请示报告，反映山西省军区支持左派的情况，并提出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和支持左派的意见。

---

【547】 刘志兰，前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遗孀，后改嫁陈守中。时为省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

【548】 丁磊，省人委办公厅信访处干部，刘格平夫人。

【549】 袁振，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

【550】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一·一二”篡党夺权事件的专题资料（送审稿）》，1987年8月25日，页121。

【551】 杨承效，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工人，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总负责人。“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1970年被判处死刑。

1月24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传大胜利”的社论。社论称：“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

1月25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五一广场召开《革命派大联合夺权誓师大会》。张日清代表驻山西的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宣布：“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和革命造反派，如果你们需要部队支持，我们立即派出部队，支持你们，援助你们。”还称：“我们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我们坚决进行还击。”26日，省军区和驻晋陆军第二十一军指战员在五一广场武装集会，支持“一一二夺权”。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

2月10日，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决定增补徐志远、刘志兰、胡炜<sup>[552]</sup>、陈永贵为组员。

2月25日，陈伯达、王力、关锋将经整理成文的张日清一次汇报发言送林彪审阅时写道，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约张日清同志写的。我们认为很好，拟最近发表，并想建议军委把此文印发军级干部会议参考。”林彪将张日清的文章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于27日10时在送审稿上批示：“林彪同志：可以登报并广播，军队同志就看到了，不必再印发。如你同意，请退文革小组。”张日清的署名文章发表在2月28日的《人民日报》和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上，题目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文章称：“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实行了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三结合’，在联合夺权的斗争中，解放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3月12日至18日，在太原召开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产生山西临时权力机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批准，刘格平任山西省革委会主任，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郭永彪<sup>[553]</sup>、谢振华<sup>[554]</sup>、焦国鼎、陈永贵任副主任。3月19日，在五一广场举行庆祝山西省革委会成立大会。

---

**[552]** 胡炜，时任陆军第二十一军军长。1961年晋升少将。稍后因率二十一军移防陕西，中央未批准其为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中央决定六十九军调防山西后，2月25日回电山西核心小组：“中央同意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名单”，“驻军六十九军的参加核心小组的同志，由你们同军队议定，并报中央和中央军委。”3月，中央批准六十九军政委曹中南为中共山西核心小组组员。

**[553]** 郭永彪，时任山西省军区副政委。1965年大校军衔。

**[554]** 谢振华，时任陆军第六十九军副军长。1955年授衔少将。

## (二) 贵州夺权<sup>【555】</sup>

贵州省夺权的主导性人物，是时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的李再含<sup>【556】</sup>。

1966年6月11日，经西南局批准，中共贵州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任组长，李再含等为成员。当时李再含身为省文革小组中的军队代表，给贾启允先后写了六封信提意见。12月3日，西南局同意增补贵州省省长李立和李再含为省文革小组副组长。贾启允被揪斗后，陶铸来电，同意撤销贾省文革小组负责人的职务，由李立主持，李再含协助。从成为省文革小组成员后直至1967年1月，李再含避开省文革小组向中央先后发了18份电报，反映了贵州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王力觉得李再含能这样做很不错，便向毛泽东推荐。据说毛泽东曾赞誉“军队出了个李再含，地方出了个王效禹<sup>【557】</sup>”。

1月17日下午，贵州工人红卫军出动二十余人到省委大楼去夺省文革小组的权，因大楼内无人，未达目的，留下二十多人守候大楼，至18日凌晨1点多，发现两名武装流动哨兵。红卫军增派一车人来，并问：“是谁派你们来的？军委有命令，解放军不干预地方文化大革命，你们为什么要保旧文革？”双方发生了冲突。红卫军抢了手枪1支，子弹24发和军大衣1件，并拍了照片，作为军队干预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证据，打电话要求李再含处理。李再含拒绝答复，并于1月20日向总政并中央文革发出“对李铁乃总部一小撮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的电报。

1月21日，毛泽东对李再含的报告作出批示称：

总理：

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一日

【555】 主要参考资料：《贵州文革大事记》。地方文革史交流网，difangwenge.org，最后访问：2015年7月14日。

【556】 李再含，1965年大校军衔。1967年2月后任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69年4月中共九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71年5月被撤职。1975年8月14日在大连逝世。

【557】 王效禹，文革前任青岛市副市长。1967年1月领导青岛、山东夺权成功，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又破格提为济南军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1969年中共九大后失势，翌年被撤销一切职务后下放劳动，1995年病逝。

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558】

根据毛泽东批示，1月24日，周恩来派飞机接李再含、何光宇【559】等贵州代表团12人到达北京。

1月25日，贵州省和贵阳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成立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次日，《新贵州报》发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宣布：“为保证贵州省文化大革命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向全省人民庄严宣告：自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五日起，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党、政、财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1月31日，毛泽东看到了贵州的这个通告后批示称：“恩来同志：这个通告很好，你看是否可以发表？新近搞的那个文件，待他们回去商量修改后，可以再发表，作为第二篇。如何，请酌。”【560】2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个通告，并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称贵州的夺权是“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

2月2日，据新华社电：贵州省军区隆重举行誓师大会和示威游行，“进一步表示全力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决心”。省军区司令员何光宇宣读了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省军区政委石新安讲了话。【561】

2月10日，省革委筹备小组连续几次开会讨论省革委的组成人选。会上学习了《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社论称，“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会上同意由李再含任省革委主任。对常委名单分歧意见较大，同意由李再含圈定。

2月14日，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广场召开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宣布，报经中央同意，李再含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原省物资局局长张明为副主任。

2月17日，陈伯达向毛泽东报送四份新闻稿，分别是：《贵州革命造反派举行盛会庆祝贵州省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告全省人民书〉》、《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55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194。

【559】何光宇，时任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授衔少将。

【56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15。

【561】《人民日报》，1967年2月5日。石新安，1955年授衔少将。



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经验》。陈伯达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贵州省材料四份，内容较丰富，关于三结合的经验也说得较好。请主席审阅。如认为可以发表，名称是否简称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请批示！”2月20日，毛泽东批示：“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你们在四份材料一律改过来。”<sup>[562]</sup>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前三篇新闻稿；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第四篇新闻稿。这四份新闻稿中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一词，发表时均改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

### (三) 黑龙江夺权<sup>[563]</sup>

1965年10月方调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sup>[564]</sup>，及黑龙江省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司令员汪家道<sup>[565]</sup>，堪称黑龙江省夺权的双子星。

1967年1月16日，在潘复生、汪家道的支持下，哈尔滨工程学院等三十多个总部的“红色造反者”，宣布成立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发表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公告》，声言“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

1月18日，中共中央电告黑龙江省委，立即停止八八团、赤卫队和红旗军联合反扑，并逮捕几个头头（10人左右）。如不制止，出现流血事件，由省委负一切责任。潘复生、汪家道即派军队镇压，工人组织赤卫队、学生组织八八团及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简称三军一团一队）被解散。

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在哈尔滨北方大厦广场举行。大会宣布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并发表第一号通告，宣

【56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38。

【563】主要参考资料：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黑龙江省党史大事记（1949.10-1989.12）》，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564】在黑龙江夺权中大出风头的潘复生，一生可谓命途多舛。1949年潘复生任新建立的平原省省委书记，1952年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56年当选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58年因反对浮夸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撤职下放劳动。1962年平反后调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文革前夕调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5月兼任沈阳军区政委。1969年当选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军委委员，沈阳军区党委第三书记。1971年6月免职接受审查。1980年4月29日病逝于哈尔滨。1982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对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潘复生问题结论的请示回电答复中称，潘复生在文革时间，确实迫害了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造成一些冤假错案，错误是严重的。但鉴于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条件，同时考虑到潘复生参加革命较早，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对所犯错误曾作过检查，现已病故，因此，同意黑龙江省委对潘复生同志的审查和不作组织处理的意见。

【565】汪家道，1955年授衔少将。1967年3月后历任黑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主任，省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1977年被免去所任黑龙江省职务，淡出政界。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称：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自即日起归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停止省委、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10万名“红色造反者”、驻军和“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了大会。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决支持红色造反者”的讲话，潘复生发表了题为“让我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讲话，汪家道发表了题为“坚决用实际行动支持红色造反者”的讲话，领率机关驻哈尔滨市的陆军第二十三军军长游好扬<sup>[566]</sup>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红色造反者的坚强后盾”的讲话。

2月1日，新华社报道了黑龙江省造反派夺权的消息。同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勤务组召开会议，决定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为班长，游兴懋（哈尔滨工程学院学生）、刘雪峰（哈尔滨石油配件厂教员）为副班长，潘复生、汪家道为顾问。

2月2日，《人民日报》就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称“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的作用。”

2月9日，毛泽东在看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2月7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390期上登载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后批告陈伯达称，“请与小组同志研究，此文可否公开发表，并于广播？是否有要修改的地方，也请酌处。”<sup>[567]</sup>同日，新华社发布黑龙江这一材料，内称，“潘复生同志和省军区负责人，主动找到哈尔滨市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研究如何夺权；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在考虑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时，主动提出让潘复生同志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同志参加。”<sup>[568]</sup>

3月17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建议，会议决定，省革委会设委员51人，常务委员19人；班长改称主任。由潘复生担任主任委员，汪家道为副主任委员。3月23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

【566】游好扬，1955年授衔少将。

【56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24。

【568】《人民日报》，1967年2月10日。

#### (四) 青岛、山东夺权<sup>【569】</sup>

山东省的夺权是从青岛市开始的。青岛、山东的夺权，分别得到海军北海舰队、陆军第六十七军和济南军区的支持。

1月18日，《青岛日报》发表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的文章《坚决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1月22日，青岛东方红等二十多个造反团体在汇泉广场举行夺权大会，宣告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sup>【570】</sup>，正式接管中共青岛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并发布《告青岛全市人民书》。同日，王效禹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权》。

1月28日，按照军委指示，驻青海军北海舰队和陆军第六十七军举行武装游行，公开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权。

1月29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青岛市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的消息。

1月30日，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代表团”印发《最紧急呼吁》，号召山东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肯定和支持了青岛夺权。《解放军报》同日予以转载。

1月31日，王效禹率“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代表团”一行22人到达济南。济南军区负责接待。

2月2日，由25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2月3日，济南召开十万人大会，宣布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夺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sup>【571】</sup>和王效禹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告全省人民书》和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令》。《通令》宣布：前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权力，自即日起，全部归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所有，停止前山东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权力及活动；原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各部委负责人，原山东省人委省长、副省长、各厅局办委负责人，三日内向本委员会报到，听候处理。

---

【569】 主要参考资料：青岛史志办网站 <http://qdsq.qingdao.gov.cn/n15752132/index.html>，最后访问：2020年3月10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档案馆：《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1949年10月—1978年12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齐晋华：《齐鲁三年枭雄王（文革风云人物王效禹）》（自印本）。

【570】 3月1日，改名为青岛市革命委员会。

【571】 童国贵，1955年授衔少将。

2月7-14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先后增补北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胡汉生、六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耿焕林、海军胶县场站副政委刘同善、六十七军政委陈继德、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张元培、青岛市人民武装部部长何传修为常委。<sup>【572】</sup>

2月1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山东赴京代表团，听取了山东夺权斗争情况的汇报。2月22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再次接见山东代表团。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指示：山东要建立一个以王效禹为首的领导核心，王效禹从青岛到济南工作；山东省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的“三结合”，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核心领导小组”，临时代行省委职权，名单报中央批准。2月23日，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3月2日，驻济部队和二十五万群众在济南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庆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效禹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大会上讲话。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祝贺山东省夺权成功。5月9日，根据中央决定，省革委会公布：王效禹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杨得志任第一副主任。

#### （五）上海夺权<sup>【573】</sup>

从1月中旬到2月初，上海先后发生过四次造反派群众组织自发组织的夺权行动。受毛泽东委派自1月4日已回到上海处理文革事宜的张春桥、姚文元，对这四次夺权均采取了冷落及不予承认的态度。可以说，这四次夺权均以失败告终。

张、姚的态度，引致了部分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不满。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为代表的部分组织，自1月中旬开始调查、搜集张春桥的材料，而后决定“炮打”。他们将突破口选择在与张、姚关系密切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徐景贤身上。1月27日深夜，红革会多人将徐景贤劫持到复旦大学，要徐交代张、姚的问题。

复旦的学生抓走徐景贤后，留下三十余人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继续搜查，“他们搜查吵闹了近一小时，解放军驻沪部队赶到现场。部队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请来的。解放军到后除封锁现场外，没有采取其他任何行动，便立即召集各方代表进行调查。凌晨五时，几方面达成协议，派郭仁杰同志随同解放军去复旦大学接徐景贤同志回来（郭仁杰同志去后，复旦大学红革会头头不仅不放

【572】 胡汉生，1965年海军大校军衔。陈继德，1965年大校军衔。张元培，1955年授衔海军少将。

【573】 主要参考资料：上海文化大革命资料联合编辑部：《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1967年6月；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徐景贤同志，反将郭仁杰同志也强行扣押下来)。但市红革会负责人劳元一又气势汹汹地挑衅，责问：‘谁调动军队镇压红革会战士？’提出要上海警备区完全、彻底承认错误。当部队主动撤离时，复旦大学同学又挡住去路，逼问部队究竟是谁调动的。相持半小时多，才让他们离开。但又强行把带队的师政委和参谋留下，围攻追逼近一天。到二十八日下午四时半，数十名复旦大学同学又将他们拥到上海警备区大吵大闹，到二十九日上午才离开。”<sup>【574】</sup>

1月29日，中央文革小组以“特急电报”告“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们并转复旦大学的同学们”，内称：

(一) 复旦红卫兵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 复旦的某些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 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扣押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sup>【575】</sup>

1月30日清晨，徐景贤被放出。同日，据新华社电，“军事院校、部队文体单位的红色造反者和驻上海陆海空军部队指战员，一月三十日隆重举行军队支持上海市革命左派群众夺权斗争誓师大会，再次表示最坚决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最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最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最坚决地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会后，驻沪三军、军事院校、部队文体单位和公安战士分成三路，威武雄壮地举行示威游行，表达他们坚决支持上海革命左派广大群众的坚定决心。”<sup>【576】</sup>

据徐景贤称，2月4日晚，张春桥、姚文元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群众组织议决，建立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到会人员一致举手通过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并确定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由张、姚作主要讲话，“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sup>【577】</sup>代表驻沪三

【574】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以红革会某些负责人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纪要》未定稿，1967年3月，页11-12。

【575】 《十年一梦》，页68。

【576】 《人民日报》1967年2月3日。

【577】 廖政国，1955年授衔少将。

军、王洪文代表工人、夏桂伯代表农民、徐景贤代表机关干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陈敢峰代表红卫兵，在成立大会上发言。”<sup>【578】</sup>

2月5日下午，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大会宣读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宣布“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张春桥在大会上称，“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sup>【579】</sup>

2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延至2月27日，新华社方公布了上海2月5日夺权并建立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及2月24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全市规模大会的消息。而无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官方消息并没有明确是否有军队负责人参与其中。

## 第三十二节 军队面临冲击与“军委八条”的颁布

### 一、阎红彦等相继自杀

进入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军队面临的冲击亦愈加严重。据官方资料称，“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人遭到越来越猛烈的围攻或揪斗，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逼得东躲西藏，奔赴异地。军事机关被围攻冲击的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国防科委、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等领导机关，13个大军区、12个省军区、4个警备（卫戍）区、24个军分区的领导机关，7个陆军军部、1个要塞区、8个师部（工区）、1个空军军部、4个军区空军（空军指挥所）、2个海军舰队的机关等。”<sup>【580】</sup>

因受到严酷冲击，1967年1月里，曾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阎红彦、陶勇、唐金龙和吕炳安相继自杀身亡。

#### （一）阎红彦自杀

阎红彦为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资格甚老。1955年，已脱离军队、从事地方工作的阎红彦，作为西北红军的代表人物，仍被授予上将军衔。

1967年1月初，昆明军区、云南省委均受到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冲击和占据。1月4日，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的阎红

【578】《十年一梦》，页74-83。

【579】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造反报》第七期，1967年2月9日。

【580】《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12。

彦，躲避至地处昆明市郊的云南省军区警卫团驻地小麦峪。1月8日凌晨，陈伯达给电话阎红彦，要其到群众中去，性情耿直的阎甚感憋屈。黎明前，秘书发现阎红彦已经去世。事后查明，阎是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的。

阎红彦是文革中唯一自杀身亡的上将、大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一星期后，周恩来指责阎红彦“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周在1月14日一次讲话中称：

云南问题须要解决。可是一月四日，云南工人和学生中的革命造反派召开大会，要求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参加大会。他拒绝了参加革命造反派的大会，同时他也不参加保守派召开的大会，想站在中间、哪里都不支持，实际上是支持了保守派。省委也说过支持造反派，但实际行动不是这样，因而引起了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学生和南下同学的极大愤慨。他们要求工人检讨是合理的<sup>[581]</sup>。若省委是革命的，支持革命行动的，就出来嘛！躲着干什么？过去犯了错误，出来受点批评是应该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我们在大风大浪里经受锻炼，行动证明，云南省委是害怕革命，害怕群众，怕轰自己，怕做群众的学生，不敢与群众见面这不得了，这违背了毛主席的要在群众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指示，由于这样的原因，调职工，革命造反派进驻了昆明军区大院，他们所以进驻是激于义气，想以此行动来唤起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注意，但阎红彦更加害怕，不挺身而出反而坐山观虎斗，离开昆明躲到西山去了。这说明他是害怕群众，与群众对立，……

……

因为六日出了这事情，情况就变了，七日没进入军区、八日阎红彦就躲到西山去自杀了。可耻的叛徒，北京去的法医检查后，确实是自杀的，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现在公开给你们讲，这与进入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毫无关系。对保守派的工人学生也没有关系。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件嫁祸于人，那是空想，任何人要想造谣污蔑都不行。造反派要继续调查是可以的，有新材料就上报中央。同时我们，省委、军区进行调查、有的材料也要向中央、军委报告。

对阎红彦要一分为二，他过去有很多贡献，昆明有人说他是高岗的人，他是不满意高岗的，受高岗压制，是刘志丹的人，与刘志丹在一起。他也不满意

---

【581】 原文如此。

李井泉，说李井泉不民主，垄断，我到昆明时，他也详细给我汇报过李井泉的情况，他向中央很多领导同志也讲过。但为什么他自己的下场更可耻，这是个什么原因？我要讲一讲对青年人是要教育的。不管他过去有多么大的功劳，中国有一句俗语：“不进则退”，不合乎林彪同志说的吃透两头，把自己置于中间地位，也不愿意学习，他说那是那的，这是根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因此他落后了，成了可耻的叛徒。<sup>【582】</sup>

周恩来在同一天不同场合的另一次讲话中再次批评阎红彦称：

阎只批评李井泉而根本不批评自己。他和高岗不一定相同，他是和高岗不同自我标榜，上不请教主席又不自我批评，势必走到反党的道路上去。他给他父亲鸦片烟吃，张思尧<sup>【583】</sup>我们是为了利用他向蒋帮做工作，可以给点鸦片吃，革命干部的父亲为什么要给鸦片吃。反高岗使阎背负上了包袱，平时也只是抓生活不抓阶级斗争，思想历史根源如此必然要走上绝路，对红卫兵不欢迎是防是挡，十月工作会议后还是依靠保守派压左派，对造反派不相信不支持，十月以后支持造反派是对的。元月四日左派冲向军区大院，阎红彦、周兴<sup>【584】</sup>，一起逃跑，逃到西山，后又在西山开省委会，要周兴去见群众，群众叫周兴滚回去，阎红彦滚出来，更不敢出来了，把军区暴露在群众面前，冲向了大楼，把赵健民揪出来，一说群众是反革命，二说阎红彦的去向知道也不能告诉群众，群众烦了把他押在车上游街了三、四钟头，住到医院去当防空洞，扬言干部听到泣不成声，不吃晚饭。

我也犯了个错误，听说李葆华同志<sup>【585】</sup>在稻香楼被围四昼夜，签了许多条子，陶铸讲了后，中央通知叫李回来，造反派同意了，结果叫保守派放出来逃难到肥西县，发生了三天打架，这是什么样的感情？赵健民<sup>【586】</sup>完全歪曲事实，咎由自取。叫阎红彦出来见群众，陈伯达同志打的电话，阎听后，问周兴说怎么办？周说睡觉吧，明天再说。我们这里急如星火，不负责任，如此威风，吃眠尔通几十片就自杀了。这么大的事，用这么个态度，不单是压制群

【582】周总理接见云南各战线赴京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1967年1月14日凌晨。《一月革命风暴》，页191-192。根据其他材料对个别字句作了订正。

【583】原文如此。指的应是章士钊。

【584】周兴，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省长，并兼任昆明军区副政委。

【585】李葆华，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南京军区第六政委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

【586】赵健民，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初期支持云南“炮派”，1968年1月被监护审查。



众，而且是反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的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sup>【587】</sup>

## （二）同一天三位将军非正常死亡

1月21日，星期六。陶勇、唐金龙和吕炳安三位高级将领相继自杀身亡。

陶勇，新四军名将，1955年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1967年1月21日，性格暴烈、时任海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被发现死于舰队上海招待所的一口水井内，终年55岁。陶勇一死，东海舰队政委刘浩天<sup>【588】</sup>即以舰队党委名义，签署发出《开除叛徒陶勇党籍、军籍，取消一切革命军人待遇》的电报，上报海军。<sup>【589】</sup>

陶勇死后，陶宅被查封，全家被逐出家门，儿女蜷缩于一间低矮破旧的小屋里。大半年后，1967年8月，关押中的陶勇的夫人朱岚跳楼身亡。

陶勇生前，东海舰队机关及其本人并未受到十分严重的冲击。故而对于陶勇的死因，多年来有各种猜测，惟从未发现任何他杀的依据和痕迹。陶勇死于自杀应是迄今为止较为合理的判断。

唐金龙，红二方面军名将，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至1965年任红二军团的余脉——解放军第一军（后称陆军第一军）军长。1965年8月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1月20日，被军队院校造反派指为“贺龙的黑干将”，扯去了领章帽徽，戴了高帽子批斗。翌日凌晨，在家中吞枪自尽身亡。

吕炳安，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时为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文革办公室主任。1967年1月21日上午，在军区招待所被发现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身亡。

阎红彦等人都经过严酷战争考验，惟在文化大革命的滔天浊浪中，均不堪一击，过不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绝然离世，令人扼腕！从阎红彦等四人之死，亦可窥见文化大革命对军队高级将领同样有着强烈的冲击力。

## 二、林彪救出邱会作

出身四野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早于1966年下半年即被以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为首的总后院校、机关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批斗，主要是指责邱“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11月17日，邱会作在连续十多个小时

【587】周总理在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1967年1月14日。《一月革命风暴》，页196-197。根据其他材料对个别字句作了订正。

【588】刘浩天，1955年授衔中将。

【589】王彦、张小勇：《东海雄风》（内部赠阅），2002年，页46。

的大会批判中昏倒在会场上，随即被送到三〇一医院抢救，后又被送到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休养。<sup>【590】</sup>据邱会作自己称，“我病了住在医院，然后林副主席叫我去休养，到了一月十七日，徐向前这个家伙直接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今天不是以全军文革小组长的名义向你打电话，我是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下命令，你应当立即出去。我接着就按他的命令，六点接电话，八点出去了，不到九点就被当时的所谓造反派关起来了。一月十八日林副主席知道了，向徐向前下了三条命令，第一条要我能够领导总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条，不许关起来，一定要保证我的自由；第三条，只准开小会批判，不准开大会斗争。徐向前不执行。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四十分派了全军文革副组长汪峰跑到我们机关<sup>【591】</sup>，找了几个不三不四的人，传达徐向前的三点‘指示’，第一条说，邱会作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第二条说，同二医大的‘红纵’商量把他放出来；第三条说，邱会作、饶正锡都有错误，都可以批判，都可以斗争。”<sup>【592】</sup>

在被拘禁及批斗期间，1月24日，邱会作利用洗澡机会给林彪、叶群写了一封求救信，讲述了其挨斗的情况，又称，“我在文化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过不了关，向林总请罪！并向林总求救！今后要同过去一样，只要有一口气就坚决跟着毛主席、林副主席走。听说，现正筹备机关、院校联合的更大规模的斗争会，还会更难过。总之，求救！”

求救信托人送至林办，与此同时，胡敏千方百计给林办打通了电话，报告了邱被揪斗的情况。邱会作称，“二月<sup>【593】</sup>二十四日晚上八时到二十五日凌晨四十分，伯达同志亲自写的手稿，林副主席签了字，派叶群同志到我们机关把我抢救出来了。”<sup>【594】</sup>邱会作再次被送到西山休养。

徐向前事后称，“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今天我还是这样看，尽管他有错误、缺点，作了些错事，说了错话，但不是反革命，这我们军委都了解他，要看他的历史，他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的，是属于好人的，你们要认清什么是敌人，这两条路线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指向牛鬼蛇神和他们搞政变集团的那伙人。我们军队过去以彭德怀为首搞阴谋，以及罗瑞卿、廖汉生、梁必业等，这一类人都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刘少奇、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搞了许多坏

【590】《邱会作回忆录》上，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页485-486。

【591】据核查，应为1月23日，派去的是全军文革小组成员王峰。

【592】邱会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的讲话，打印本。

【593】应为1月。

【594】邱会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的讲话，打印本。

东西，刘志坚也对中央封锁消息，不请示汇报，搞了许多私货，他搞独立王国，这样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那时候刘少奇、邓小平是以中央名义，下面只好执行，如不执行不就是反党了吗？如刘志坚搞三条黑指示，下面的这些人都执行了，军队里大多数当权派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是资产阶级阵营里的人。他们有的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对邱会作我们并没有看成是三反分子，我以前是这样看，现在这样看，以后还是这样看，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材料说明他是三反分子，从你们揭发的材料来看，都是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的问题。不能说明他是刘邓的人，这些并不是我说的，军委对这些干部还是了解的。”<sup>[595]</sup>

3月30日，总后大院的混乱局面有所控制，邱会作的身体也有所恢复。这一天，周恩来率陈伯达、江青一千人，领邱会作回总后工作。周恩来在当天召集的总后机关干部大会上力挺邱：“在这个地方，我简单回述一下子。我曾经说过，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经过长征的，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红军，我还在江西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差不多到现在来说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认识，特别到了陕北，那时红军被迫地离开了老根据地，转战北上，集聚在陕北。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后方的工作，那个时候邱会作同志也就参加后方工作、后勤工作，我们差不多每天几乎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转战到西边，所以那一阵子共事最密了，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的，那时候青年有为，是个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觉得我的看法基本上还是没有看错。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先在后勤，然后又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解放战争，转到东北，然后南下，又做政治工作，最后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的时候，他又来做总后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红军战士，老战士。这是他整个历史的主流嘛，好的方面嘛！但是不是没有缺点，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有严重的缺点。所以，毛主席的学生，林副主席的战友，不可能在我们一生不犯错误，我就一个嘛，也犯过多次错误嘛！但是有决心，有了错误，敢于正视错误，而且决心改正错误。”<sup>[596]</sup>此次大会后，邱会作得以解脱。

【595】徐向前副主席接见总后系统造反派部分代表谈话记录，1967年2月1日。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中央首长讲话（2）》，1967年3月，页15。

【596】《中央首长讲话（3）》，页303-304。



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北京人民大会堂，1967年1月22日。

### 三、“军委八条”的颁布<sup>[597]</sup>

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称，“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决不准把事实真相掩盖起来，在幕前或幕后煽动群众把斗争锋芒转向军事机关。否则，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负全部责任。”

1月23日，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就军以上(不含军)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向毛泽东、林彪提出六条建议，内容如下：

一、大军区、省军区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分期、分批进行，要同地方文化大革命错开。何时开始，要经中央军委批准。日前，尚未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军区、省军区，宣传、文化、报社等重点部门的文化大革命，一律暂停，将来同机关其他部门一块搞。

二、坚决按十六条办事，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一定要遵照主席指示的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不许抓人，不许动手打人，不许戴高帽，不许游街，不许抄家。

---

[597] 主要参考资料：胡长水：《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产生》。《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6期。

三、军队不准夺权。如确有需要改组的，要经中央军委批准，按中央军委指示进行。罢官问题一律放到运动后期处理。

四、在外地串连的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的革命群众，一律于1967年春节回到本单位，搞本单位的斗批改。

五、运动一定要坚持党委领导的原则。如个别单位或个别成员问题严重，需要改组或撤换的，群众可以提出意见，但必须按照组织手续审批。

六、除坚决贯彻中央1967年1月14日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外，军队院校、文艺单位、医院、工厂、科研单位的革命群众，一律不许冲击和占领领导机关，以保证战备、指挥和日常工作的正常进行。

六条建议的基本思想是稳定军队。如果把六条建议和几天后的“军委八条”比较一下，可以说，“六条”和“八条”的基本思想一致，是“八条”的雏形。

1月24日晚，徐向前前往林彪住地毛家湾，向林彪陈述军队的混乱状况，反映出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军队高级干部的心情和愿望，提出要搞几条规定。林彪听了，表示军队不能乱，同意由军委发一个文件。林彪还当即讲了一些意见，其内容既有徐向前的意见，也有前一天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的建议，经书记录、整理，形成九条。接着，根据先期到达的陈伯达的建议，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到来，继续谈了这些问题。大家一致认为需要发出新的稳定军队的指示，并对“九条”共同斟酌，形成了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九条规定。

旋即，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等人带着“九条”到中央文革小组征求意见。为了增加支持的力量，徐向前还打电话请来了陈毅。参加讨论的除中央文革成员外，有周恩来、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杨成武。经过激烈的争论，在“九条”的基础上“写出七条规定”<sup>[598]</sup>，拟以中央军委命令的形式发出。“七条”的内容是：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不允许变相体罚。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598】林彪关于“七条”给毛泽东的信，1967年1月25日。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工团、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一切院校师生、文工团、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一切个人和团体，都不准冲击军事机关和保密系统。

六、军队内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25日上午10时，徐向前给林彪一信，再次重申：“总之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徐向前在信中还提出：“全军文革工作，或直由中央文革领导进行，由你直接挂帅抓总。层次不宜多设为好。否则甚易误事。我只能作一点具体工作，免吃老本。”同日，林彪将“七条”呈送毛泽东审阅，并给毛泽东一信，报告了“七条”产生的过程。

毛泽东对林彪的信和“七条”十分重视，在林彪的信上多处划了着重号。林彪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同时附有五个附件。这些附件同样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附件一是1月25日上午10时全军文革办公室一工作人员的电话记录，内容是：“乌鲁木齐第二造反司令部、军区步校造反团、新疆军区参加五大的代表共五六百人，1月23日到司令部大楼，要开大会，罢官夺权。”

附件二是1月25日上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及其秘书的电话记录。9时，许世友的电话内容是：“现在军区很乱。全国三军院校各造反团体，都在南京闹。军区3个常委被罚了跪，政治部正副主任都罚了跪，后勤部正副政委被拳脚踢。司令部把张才千副司令抓走了，现在下落不明。”10时，许世友秘书报告了“昨天下午，军区首长被罚跪、撕掉帽徽、领章”的具体人员名单。这个电话记录引起了毛泽东的很大关注，多处都划了杠杠。

附件三是1月25日下午1时40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的电话记录，内容有二：

一、许司令来电话说，可调一个营的部队，保护军区机关，如果有坏人来搞，可以自卫。

二、如果有人来搞我们军区的指挥所，如何处理。

附件四是邱会作给林彪、叶群的信和邱会作妻子胡敏的电话记录，反映了邱会作被总后造反派揪斗的情况。

附件五是前述徐向前于25日上午10时给林彪的信。

毛泽东对“七条”采取了支持的态度。1月26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并在林彪的信上作了旁批：“附件都已看过。”同时毛泽东还以“又及”的形式作了补充：“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来北京开会的同志，停一周后再回去。”【599】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七条”很快修改成“八条”。新增加严格管教子女的第第八条，同时，第五条对于冲击军事机关问题，按毛1月26日批示作了修改。1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审阅了修改稿。在修改稿上，毛泽东又将第五条的“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修改为“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同时，将打印稿上的“所定七条，很好，照发”的“七”字改成“八”字，变成“所定八条，很好，照发。”原落款的“一月二十六日”的“六”字，改为“八”字，变成“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天，“军委八条”发出，全文如下：

#### 中央军委命令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展开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

【59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03。

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sup>[600]</sup>

“军委八条”的颁布，使军队自以为拿到了对付军内外造反派的“尚方宝剑”。然而，这柄剑却是双刃的。它在力图保护军队免受冲击的同时，必然会借机对冲击的一方——一部分激进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进行无情镇压。冲击与反冲击、镇压与反镇压相对峙，使进入2月以后的全国局势更形混乱。

### 第三十三节 二月镇反（一）

1966年底至1967年初，地方造反派因地方党委按中央要求“把重要档案材料，电台机要人员和机要交通人员，暂时转移到军事机关”的过程中，“有一些地

【600】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页112-117。



方党委，却借此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整革命群众的材料，也塞进军事机关”<sup>【601】</sup>等原因，冲击军事机关，引致了军队与造反派的严重对立。周恩来为此在2月中旬指责各地造反派称：“近来到处出现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昆明冲过军区大院，进驻了军区大院内，使我们军区很难堪，杭州也是这样。大概，正是这样，你们以为什么地方都可以冲。现在冲军事机关成了风，这怎么能行呢？长沙冲了，贵州贵阳要缴解放军的械。我们说有坏人指挥，长沙不仅冲了，而且占了军区大楼，最后我们下令抓头子。是‘红旗军’和‘湘江风雷’合起来搞的。广州、南京是军事院校文工团冲的，沈阳也是这样，萧主任去解决的。不久又扩大了，他们要捉我们几十年转战南北的陈锡联同志，还抄了家。北京冲中南海，冲三座门，不仅抄了萧主任的家，还要找徐向前同志出来辩论。一直搞了五、六天，那怎么能行呢？这是我们绝不答应的。”<sup>【602】</sup>

1月28日的“军委八条”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惟中央以至毛泽东本人，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何谓“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何谓“右派”，何谓“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并没有公布一个严格、统一的划分标准（事实上也难以有一个客观的划分标准），这就为各地军事机关（包括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以至人武部）留下了充裕的操作空间，换言之，划分标准全凭各地军事机关主观地自行掌握。而各地军事机关一般来说，与群众组织中所谓“组织成份较纯”、“出身好”、党团员较多的保守或稳健派思想接近，关系亲和，这就难免与保守派的对立面造反派，或造反派中稳健一派的对立面激进一派，感情疏离以至产生对立情绪。1月底至3月间，各地普遍发生军队镇压造反派、激进派的大小事件，史称“二月镇反”。其中，又以新疆、福建、湖南、内蒙、广东、四川、湖北、江苏等地为甚。

### 一、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石河子“一二六事件”，指1967年1月26日发生在新疆石河子市、造成百人死伤的重大流血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首次有准军事部队参与的开枪事件。关于该事件的经过内情，历来争议颇大。

【601】《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

【602】周总理第二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讲话纪要，1967年2月16日晚至17日凌晨。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联络总部：《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有关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一集，1967年5月30日，页20。

王年一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1967年1月26日发生了流血事件<sup>【603】</sup>。石河子是解放后新建城市。当时这里驻有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工二师、独立团（兵团武装部队）、汽车二团、毛纺厂、农学院等17个单位，近30万人。从1967年1月17日到1月27日，先后有七个“造反团”冲击了武装部门，有八个单位的造反团强行接管了武装部门管辖的通讯总机。1月25日下午，毛纺厂等八个单位的造反派约2000人，进入汽二团配合该团造反派夺权，汽二团掌权派请求独立团支援。当独立团的92名指战员赶到汽二团时，汽二团造反派抢夺枪支，夺去步枪19支、冲锋枪7支、手榴弹64枚、子弹1307发。1月25日下午7时，造反派增至4000余名。1月26日零点，在夺枪与反夺枪中，双方开枪，11人伤亡（5死6伤），当日，农八师武装处将一部分部队调进师部，对师机关进行保护。造反派要进入师部，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死2人，伤27人。在公共汽车站等处，双方进行枪战。这一天，双方共打死24人，打伤74人。……关于这一事件，新疆军区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简报》说法完全相反，军区认为这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中央文革小组认为这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sup>【604】</sup>

此后，公私著述对造反派是否有枪、是否独立团单方面开枪各执一词。

1994年官方编纂出版的《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称，“1967年1月，石河子地区以兵团农学院‘革命造反团’牵头的一派和以兵团汽二团‘八一野战军’牵头的另一派，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在各单位纷纷进行夺权。1月26日，两派于夺权中发生矛盾，农八师及兵团驻石河子单位的武装部门调值班连支持‘八野’派，两派严重对峙。下午3时许，值班部队采取火力突围，射发枪弹，投掷手榴弹，造成死亡26人、伤79人的震惊全国的石河子‘一二六’事件。”<sup>【605】</sup>

同样为官方编纂的《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则称，“1月26日在石河子兵团农八师的夺权中，两派发生了激烈冲突，掌握武装的一派组织开了枪，打死打伤数十人，酿成新疆‘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大规模流血事件。”<sup>【606】</sup>

1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新疆有关人员谈到石河子问题时称，“关于石河子死伤人的问题，即使是反动的群众组织，也不能开枪，只能揪住头头，我立即起

【603】 王年一原注：以下关于这一事件的资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生报社庄雪华提供的。

【604】 《大动乱的年代》，页202-203。

【605】 农八师石河子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506。

【606】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下册，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1。

电报，给区党委和兵团党委，命令停止撤出部队，立即派调查组去那里调查。新疆那位大学生死了，成了无头案，这次石河子事件，不能搞个无头案，一定要调查清楚。”谈到张仲瀚<sup>[607]</sup>问题时，周恩来称，“张仲瀚我本想挽救他，但他不努力，我在石河子，看到那样铺张浪费，批评了他，本来想调他，但考虑再给他个机会，他自己不想挽救，不接受批评，这次运动来，就把他的问题搞出来了。王震保张仲瀚，又保自己，王震调了一个学生团体来保护他。”<sup>[608]</sup>

同日，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sup>[609]</sup>率部进驻石河子，成立新疆军区驻石河子指挥部，随后，对石河子实行军事管制。<sup>[610]</sup>

1月31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照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石河子问题作出电示，全文如下：

新疆自治区党委、人委、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

（一）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如有群众夺取部队武器，首先应该劝阻；不听，也应向天放枪以示警告。对武装反革命分子和过境窜入的武装反革命分子，也要力求逮捕，只有敌人首先开枪时，才能自卫还击。

（二）新疆军区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值班部队，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繁重任务。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群众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

（三）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目前在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区已经发生的乱抓人、打人的行为，应该立即停止和劝阻，已经抓了的群众，必须立即释放。<sup>[611]</sup>

【607】 张仲瀚，原新疆军区副政委兼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1966年9月起遭揭发批判，1967年3月中办通知留京监护，隔离审查。1975年5月总政批准解除监护，1979年平反后任炮兵顾问。

【608】 周恩来同志接见新疆“12·19”绝食斗争革命造反派代表讲话（纪要），1967年1月27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页336。

【609】 徐国贤，1955年授衔少将。

【610】 《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页28、506、599。

【611】 新疆红二司《新疆红卫兵报》编辑部：《红日照天山：关于新疆问题中共中央文件及中央首长的讲话》，1968年10月。

2月7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告林彪、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有些问题处理得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2月7日、8日，周恩来约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认为新疆夺权条件不成熟，拟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

2月10日新疆军区一派群众组织，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围斗军区参谋长何家产<sup>[612]</sup>，强行戴高帽子，进行变相体罚。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拘留了这一事件的策划者和肇事者。2月11日，自治区夺权指挥部组织几千名学生和群众包围了军区大院，并“命令”军区将何家产停职检查，把军权交给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领导人。中央军委及时制止了这一行为，并明电指出：“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完全正确的，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持这个正确的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回到本单位去，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否则一切后果，由冲击新疆军区的人员负完全责任。”决定将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和四个部长调北京学习。事件得以平息。<sup>[613]</sup>

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内称：“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和战备的需要，决定在文化革命期间，对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事管制。”“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许干预和串连。”“由革命领导成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结合共同组成生产建设兵团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兵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新疆军区文革小组直接领导。”<sup>[614]</sup>

---

【612】 何家产，1961年晋升少将。

【613】 参见《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下册，页12。

【614】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页311-318。1968年5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京负责人时称，“处理石河子事件，不是我的意见，完全是主席的。主席看的材料比我们多，主席从头到尾把情况告诉我们。王、关、戚几次想翻石河子的案，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干，石河子问题是主席亲自处理的。生产兵团成份不纯，石河子就是有陶峙岳（原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的人在里边，有张仲瀚的人，去的劳改犯多，有盲流，情况复杂，边境还闹事，对保卫边疆不利，才决定军管，这是主席告诉的，所以才起草了二月十一日的文件（十二条）。是你们（指丁裴等）起草的，我修改的，中央文革讨论的，主席、林副主席审定的。”

3月26日新疆军区党委批复兵团党委，同意裴周玉、丁盛<sup>[615]</sup>等36人组成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裴周玉为主任，丁盛为第二主任，李荆山<sup>[616]</sup>、王振东<sup>[617]</sup>为副主任。3月28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恩茂等出席成立大会。<sup>[618]</sup>

3月，“一二六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认定是“武光<sup>[619]</sup>、张仲瀚等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有组织、有计划制造的，是他们妄图在新疆实行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严重步骤”，“是农八师副政委刘炳正、李光及师政治部副主任杨廷柱等人直接策划和指挥的”，并拘押杨廷柱。由此，以搜查武器、抓“黑头头”等名义，拘捕干部、群众49人，株连千余人，进行刑讯逼供，逼死6人，伤残数十人。<sup>[620]</sup>

## 二、福建：福州“一二六事件”<sup>[621]</sup>

1月18日，福州军区在福州市召开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从20日起，就有人对这个大会的方向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批判军区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1日下午，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的南下学生出动宣传车到大会会场并张贴大标语，声称“坚决反对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文化大革命对立起来，坚决反对脱离激烈的阶级斗争空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23日及25日，北广的学生两次到会场外要求军区负责人和韩先楚本人出来接见，均未果。

1月26日，根据中央最新精神，福州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安排进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声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会议上午即受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南下造反队领头，有福州军区卫生学校革命造反团（“革”字派）、军区话剧团和歌舞团、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等单位造反派群众组织约二百余人参加的冲击。下午，星火燎原南下造反队向军区党委“勒令”四条：1. 暂由星火燎原南下造反队接管大会的领导权；2. 军区党委靠边站，当权

**[615]** 裴周玉，时任新疆军区副政委兼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三政委。1955年授衔少将。丁盛，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少将。裴、丁时为生产建设兵团实际负责人。

**[616]** 李荆山，时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主任，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

**[617]** 王振东，时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参谋长，1964年晋升少将。

**[618]** 《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下册，页14。

**[619]** 武光，原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

**[620]** 《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页506。

**[621]** 主要资料来源：郑小娟：《福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二六事件——关于军队介入文革的作用与意义之个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4月1日。

派随叫随到；3. 代表一个不能走，否则由军区负责；4. 不按以上三条的，一切后果由军区负责。大会被迫中止。

当日下午，福建医学院东方红战斗团与军区卫校“革字派”五六十人冲入福州军区司令部大院，要求见韩先楚。军区机关派出负责人与之协商，同意派少数代表商谈。不久有首都三司的几个人出面居间调停。由于这几个人未能说服在场的造反派，他们征得军区同意给周恩来打电话报告情况，但未打通。以后韩先楚给徐向前打电话请示，徐的秘书接电话后答复需要研究。首都三司的几个人要求韩先楚一起等待徐向前的电话答复，他们便一直等到27日天明。

北京方面的电话答复一直没有等到。僵持之下，军区方面作出让步，由韩先楚在军区大院大门外接见了全体造反派学生。接见一直到27日下午五时多才结束。

对造反派的接见刚结束，对立面军区卫校“红字派”80人赶到，强行冲入军区大院营门百余公尺处被拦阻。不得已韩先楚接见了其中的六个代表，其余人由廖海光副政委接见，一直与廖纠缠至28日凌晨将近四时才离去。<sup>[622]</sup>

1月29日晚，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军区卫校“革字派”等再次冲进大会会场，破坏大会的设备等。30日，军内外一些造反派又抓走了几个军队干部，对他们进行了批斗。

“军委八条”发布后，福州军区态度变得异常强硬。1月30日晚，军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措词严厉的《福州前线部队公告》，并连夜印刷，次日清晨便在福州街头张贴、散发，同时上报中央军委。

2月6日，军委将公告转发至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基地，并各总部，“望参照执行”。公告称：“最近，正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实行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正当前线部队加强战备的时候，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进行造谣诬蔑、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军事机关，他们违背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规定，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两次冲进会场非法夺取大会领导权，破坏会场设备，二十六日冲击军事指挥机关，特别是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公布之后，三十日仍然有人明知故犯，乱抓军队干部进行斗争，

【622】《福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二六事件——关于军队介入文革的作用与意义之个案研究》。原注：以上有关内容主要参考：福建文革小报中有关文章，如：福州部队支持革命左派群众接待站发表的《关于1月26、27日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指挥机关受到冲击的事实经过介绍》，福建医学院东方红战斗团发表的《一二六事件的经过》，厦门八中八二九公社《永朝东》战斗队发表的《一二六事件中的几个真相》，福州军区卫校红色教工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发表的《把造谣者抓住——简评军区卫校“革”字派的“一二六事件真相”》等。

实行体罚，侮辱人格等等。公开违抗最高统帅毛主席批发的中央军委的命令，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应当受到纪律制裁。”“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sup>[623]</sup>

公告发布后，福建两派反映各异，激进造反派立即发表声明批驳公告。2月8日，福州街头贴满《北京来电——陈伯达同志的4点表态》：1.“一二六”事件是革命行动；2.韩先楚可以炮打；3.支持《福建日报》造反夺权；4.支持“首都三司驻榕联络站”的革命行动。<sup>[624]</sup>韩先楚不敢等闲视之。他立即打电话到北京，冀以求得指示。2月9日，林彪回电称：“陈伯达同志托王力同志的来电是造谣。中共中央军委批转《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是经过周密的研究，要一字一句往下发。”陈伯达也赶紧给韩先楚发电报指出：传单纯粹是无耻的恶意造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全体同志是支持韩先楚同志和福州军区的，根本没有也不会发出这样的电话和电报。请警惕敌人的造谣中伤和挑拨离间。并说：如果你认为必要，此件可以广为印发张贴。<sup>[625]</sup>

2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支持福建前线部队（福州军区）的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翌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有了中央的支持，韩先楚等军区领导开始旗帜鲜明地支持“保韩”派，压制打击“反韩”派。在军区的支持下，逮捕了王泉金、姜观、杨德桢<sup>[626]</sup>等“一二六事件”中的首要人物。

据统计，福州地区在批判“一二六事件”期间，中、小学均未抓人，五所大学共逮捕9人，拘留21人。省军区公开支持群众组织取缔了中医学院两个组织（职工造反团、赤旗舞），解散了六个组织（师院革委会分部、红九二、教工赤卫军、艺术前线兵团、附中66915、中医学院革联总部）。<sup>[627]</sup>此外，福建日报、省电台、省公安厅被打成了“三家村”；“三司榕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革命委员会”、“福州市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福建省直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被打成了“四家店”。

【623】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页306-310。

【624】 张正隆：《战将韩先楚》，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页236。

【625】 《八二九战报》，第2期，1967年2月12日。

【626】 王泉金，福建师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九二总部负责人。姜观，福建日报革命职工造反队负责人。杨德桢，福建省公安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勤务组负责人。

【627】 福建省军管会文革办学校组：《福州地区学校平反情况》，1967年6月9日。

福州军区后来称，据福建省军管会统计，“全省各地由军队和人武部和军管部门出面共逮捕和拘留两千多人，取缔和解散了八十多个大小组织”。“以军内四大单位和军区机关中少数人违反军委‘八条命令’问题的处理，逮捕八人，拘留六十五人，解散了几个组织。”<sup>【628】</sup>

### 三、湖南：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前后<sup>【629】</sup>

1967年1月，湖南造反派分裂的两大组织——激进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湘江风雷）与稳健的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势同水火。

1月17-19日，与湘江风雷关系密切的跨地区、跨行业复转退军人组织——湖南红旗军，以湖南省军区窝藏省委“黑材料”为由，冲击省军区并封了军区部分办公场所。1月20日凌晨，省军区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红旗军、红导弹等红卫兵组织到湖南省军区动手打人、抓人问题的来电指示称，“军队负有战备任务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任务，不能允许外人冲入指挥、保密等系统，不许接管。‘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必要时，将其少数头头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军区负责人应挺身而出，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午后，省军区开始逮捕湖南红旗军负责人。当晚，湖南红旗军总部被高司捣毁。

1月21日，湘江风雷与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在东风广场召开两万人大会，抗议湖南省军区镇压湖南红旗军，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翌日，湘江风雷得知中央对红旗军的指示是真的，立即再发表严正声明称，“红旗军、红导弹的少数头目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军区，冲入指挥保密系统，并扬言‘夺取军权’，这是一次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我纵队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元月二十日凌晨的指示。”

1月25日，湘江风雷总部再次通知停止发展组织，此时，湘江风雷号称已发展到93万人。

1月30日，湖南省军区举行武装游行，声言“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坚决打倒反动组织红旗军”。

【628】《福州军区党委常委关于在福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叶青：《“文革”时期福建群众组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10月。

【629】主要参考资料：湖南省长沙市高校风雷挺进纵队：《光辉的斗争史——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司令部大事记》，1967年7月；长沙市十中劲松、战优酣战斗队、长沙教联、湖南省直党群政法联络站、湖南人民出版社红色出版兵革命造反团：《湖南长沙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草稿）1966年3月-1967年8月》，1967年9月15日。



1月31日-2月3日，湘江风雷方面称，青年近卫军多人被高司“非法绑架”至中南矿冶学院。湘江风雷集结队伍到矿冶学院“营救被非法扣留的阶级兄弟”，冲进矿冶学院，与高司发生严重冲突。省军区调停失败。2月3日晚，省军区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称湘江风雷准备搞暴动，冲军区，要抓军区首长云云。

2月4日上午七时，全军文革办公室向省军区传达中央文革小组批示称，“湖南省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

2月5日，湖南省军区宣布全省戒严，出动飞机散发《“湘江风雷”一小撮反动头目的反革命罪行》，叶卫东<sup>[630]</sup>等湘江风雷负责人被捕。

据称，“湖南省军区统一部署，全省各级同时行动，三天内全省逮捕了‘湘江风雷’及‘红旗军’大小头目一万多人，其中大多数在当时问明情况，没有什么大的罪行，就立即释放了，真正关押起来的只有一小部分人。”<sup>[631]</sup>

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通告（第二号）”发布。内称，“一、‘湖南红旗军’和‘湘江风雷’，自中央指示宣布之日起，应一律停止活动，解散所属各级组织。不得招牌换字，改头换面，名亡实存。废止使用一切文书印信。如发现公开或暗地利用原组织从事活动，将严厉制裁。原为‘湘江风雷’、‘红旗军’所蒙蔽操纵的一般群众，必须分化，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通过个别申请的方式，参加革命组织。在二月五日宣布中央文革小组批示之前，正式发表声明，成建制地脱离‘湘江风雷’的，不予追究。”“二、‘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中、小头目，如罪恶多端、民愤很大，或本来就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应采取专政措施，逮捕法办。如不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民愤不大，愿向人民低头认罪，可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由本单位左派组织和革命群众酌情处理，但暂不得吸收参加革命组织，必须通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才能酌情吸收。对经过人民解放军和地方专政机关教育释放的中、小头目，如在释放后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反扑和有其他破坏活动者，必要时重新逮捕，从严惩处。对在中央一月二十日和二月四日指示发布之前，已脱离‘红旗军’和‘湘江风雷’的中、小头目既往不咎。中央指示公布之后有立功赎罪表现的中、小头目可将功折罪。”

同日，中央军委发布通知称，“最近在湖南长沙，解放军艺术学院三人参加了反动组织‘湘江风雷’，进行反革命活动，还有部分学生特别是艺院‘星火燎原’

【630】 叶卫东，原名叶冬初，长沙市第一中学教师，湘江风雷政治部主任。

【631】 李振祥：《四十七军在湖南“三支两军”纪实》，自印本，2004年，页21。李振祥，文革中为陆军第四十七军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在湖南、沈阳、福州等军区造谣，抄家，任意抓人，带头冲击军事领导机关，进行残酷武斗，抗拒毛主席批准的八条命令。为了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以护军纪，保卫文化大革命，军委决定：艺术学院所有人员，限五天之内返回本校进行整风，违者以军纪处分。”同日，驻长沙的工程兵学院（总字 341 部队）红色硬骨头战斗队李长元等十多人被摘掉领章帽徽，以“湘江风雷的死党”罪名，游街示众。

#### 四、内蒙：“二五开枪事件”<sup>【632】</sup>

1月11日，内蒙古日报东方红战斗队查封并接管了报社，宣布夺了报社的各项大权。1月18日，东方红的对立面红卫军总部在报社内进行了又一次夺权。嗣后，报社东方红串连呼和浩特大中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呼三司），再次酝酿反夺权，在此过程中，与已掌权的红卫军总部发生武斗。掌权的一派到军区请求支持。主持军区工作的副司令员萧应棠与其他领导商议后，决定先请示军委。1月22日，军区接到徐向前的答复：一、军队不得动武；二、对两派群众组织情况不明时，不要轻易表示支持任何一派；三、如群众组织发生武斗，派部队徒手前去劝解。

此时，内蒙古日报社的武斗正趋于激烈。军区领导决定派一个连赶往报社制止武斗。去制止武斗的部队支持了报社掌权的一派，激怒了对立派呼三司。1月29日，呼三司集合了几千人，包围了内蒙古军区南大门并静坐示威。为防止意外事变，军区在南大门修筑了临时工事，在楼顶架起了机枪，枪口直对南大门外。

2月5日，内蒙古军区大院已被呼三司、河西公司<sup>【633】</sup>八一八等造反派群众组织围困多天。下午时分，内蒙古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手持话筒，正在喊话，被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用手枪开枪击倒在地，经抢救无效身亡。

内蒙古军区发生枪击事件迅速上报中央。2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内蒙各方发出特急明码电报称：

【632】 主要资料来源：任亚平：《内蒙古自治区志·共产党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邢野、宿梓枢：《内蒙古文化大革命通志》，香港：中国科学教育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出版社，2005年；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

【633】 即中国河西化工机械公司，为1965年迁至呼市的七机部第四研究院的对外名称。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均请军区转）：

在内蒙古军区发生的事件，应该立即停止，事态不要扩大。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四方面各派3—5名代表来北京商谈解决。我们于二月六日派飞机来呼市接你们的代表。

据悉，军区周围有一师范学院同学中弹致死，如确，应严追凶手和指挥者，查出后应予法办，并向死者家属致唁和予以抚恤。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sup>〔634〕</sup>

2月10日，周恩来与萧华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周详细询问了打死韩桐的经过，称要派人进一步调查，“中央派法医去检验，内务部去一个部长或副部长，带上个秘书和两名工作人员，乘飞机去。”第二天，内务部部长曾山立即带领技术人员飞抵呼和浩特。经过调查，查清了柳青开枪打死韩桐的全过程。柳青遭到拘押。

从2月10日到4月13日，为了解决内蒙古问题，周恩来等六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最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作为中发〔67〕126号文件下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军以上单位。

### 第三十四节 二月镇反（二）

#### 五、广州：“二八冲军区事件”<sup>〔635〕</sup>

1月12日，军队院校部分造反派冲进广州军区司令部，逼迫军区文革负责人当场签认“军区彻头彻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封闭了军区文革办公室。1月中旬，全国各地军队院校师生先后十批到广州串连。解放军体育学院、军区步兵学校、卫生学校和北京来的“南下串连队”等单位的13人强行进入军区司令部，查阅和抄录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密码电报30份，有的被翻印成传单在社会上散发。1月21日，军区所属院校、文艺团体以及外地来穗串连的部队人员共一千五百多人，在军区礼堂联合举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当场批斗了参加会议的军区副司令员梁兴初。26日，军区步兵学校一些造反派为了取得攻击军区的材料，集合数百人冲进军区司令部，要求军区党委常委立即同意他们查

〔634〕《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有关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一集，页3。

〔635〕主要资料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史》中册；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自印本，2011年。

看军区司令部1966年的大字报，梁兴初不同意，就被他们戴上高帽批斗，并推倒在地。是日及28日，军区文艺团体和军区院校的造反派还以查阅军区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和“黑材料”为由，相继抄了军区文革小组前任和现任负责人相炜、文年生的家，抄走了相炜保存在家的有关文革的机密文件。<sup>【636】</sup>

1月28日晚，军体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部队文艺工作者红色联合造反团南下造反团、军区战士歌舞团千钧棒战斗队等组织，抄了部分军区领导的家，并把萧元礼副政委带走了。1月31日，军区造反派又冲击军区政治部。当晚，他们要在军区礼堂召开斗争胜利大会，并要军区副参谋长以上干部和警卫部队连以上干部参加。当时谣传陈伯达对桂林步校的人说，广州军区应撤销一切警卫部队，给革命师生一切方便，使造反派兴奋不已，中大八一发表了一份支持军区造反派的声明。

2月5日下午，广州军区部分文体工作者和军体院学员，联合了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等二十几个群众组织共四五百人，冲击军区第二门诊部，直到次日清晨才陆续离去。2月7日，军区卫生学校革命造反联络站等单位，包围冲击了军区后勤部和陆军医院。

2月8日凌晨，军内的造反组织在军区礼堂抓人打斗，气氛相当暴烈。事情的起因，是战士杂技团在一次开会，大家喊“毛主席万岁”时，有一名演员不喊，并说“不搞形式主义”。凌晨3时，军区派出部队，拘留了二十多名闹事人员。军区部分文体工作者和军体院学员两千多人，在军区门外举行静坐示威，并得到北航红旗、“哈军工”、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等组织的支持。

2月8日白天，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和警卫营的大门外，聚集了大批群众，他们来自省革联属下30多个组织。据说，是接到七中红旗的通知，说军区把千钧棒的人抓走了，于是赶来声援千钧棒的。

当日，广州军区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公告称：

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竟敢公然违抗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命令，知法犯法。他们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甚至假借中央负责同志名义，造谣惑众，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企图把斗争锋芒引向军队；他们随便搜家抓人，侮辱人格，实行体罚，甚至捆绑罚跪，毒打群众；他们到一些担负战备任务，按照中央军委指示暂不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或实行正面教育的单位去煽风点火，强行逼迫那里的群众和领导立即开展“四大”；

【636】《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史》中册，页636-637。

他们还提出一些无理要求，愿意刁难和要挟领导干部，甚至恶意诋毁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命令；等等。这是公开违抗最高统帅毛主席的命令、严重违犯纪律的行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战备的行为。

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人民利益的最忠实保卫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忠实保卫者，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忠实保卫者，谁违抗毛主席的命令，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当晚，中央军委曾两次来电制止事态发展。第一次是在傍晚5时30分：军队院校和文艺团体的同志们：

我人民解放军应该坚决捍卫和执行最高指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昨晚部分同志冲击广州军区领导机关和无命令自由抓人打人，是直接违犯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的，是一种错误行为。广州军区坚决维护军委命令，是完全正确的。希望你们分清是非，立即离开军区机关营区。

地方各革命组织和革命师生同志们：

昨晚所发生的事情，纯属于军队内部的事情，请你们不要介入。请你们自觉捍卫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立即离开军队营区。

第二道命令是在晚上8时30分下达的：

军队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的同志们：

今天下午17时30分，军委已经下了命令，要你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你们没有执行，现再命令你们，立即撤退。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立即向北京打电话或派代表来北京解决。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地方各革命组织和革命师生同志们：

广州面临港澳，情况非常复杂，希望你们提高警惕，不要介入这场冲击，应坚决拥护最高统帅的八条命令。

在中央军委三个小时内两次严令之下，冲击人员方于晚上10时前快快离去。对冲击军区的军内外造反派的打击，随之陆续到来。

2月9日，军区派飞机在市内散发中央军委昨天下达的两项命令。调走军体院原警连连，同时一个加强连配带报话机进驻军体院，门岗从原一人增加四至六人，院内派巡逻组；武装接管电话总机，对出入人员严加审查盘问，断绝军体院、话剧团、歌舞团和军乐团之间的互相联系。

3月1日凌晨，广州警备司令部在公安机关和民兵配合下，捣毁了参与一系列冲击军区行动的跨行业、转业复员军人组织——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地区总部及下属各分部，并宣布其为反革命组织，拘捕“首要分子”243人。

3月4日清晨，广州警司出动部队、公安及民兵，包围了珠影东方红，三名头头当场被捕，上午6时，宣布解散珠影东方红及其下属组织。

3月5日上午，中山大学武装部召开中大师生员工两千多人大会，宣布警司对冲击军区的造反派中坚力量——中大红旗、八三一实行打击的命令。警司派出全副武装的两个连进驻中大。中大红旗工人赤卫队未几被令取缔。此前后被取缔的地方造反派组织还有：电台东方红、红色广播兵、石井小坪红农友。

3月16日，广州警司宣布战士歌舞团千钧棒战斗队为反革命组织，逮捕其五名“首恶分子”。

## 六、四川：军委“二一七公开信”<sup>〔637〕</sup>

1月29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分团以查抄“黑材料”为由，冲击成都市公安局，并扣押公安局长等人员。次日，成都军区出动军队，协助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造反派头头13人，将其游街示众后，关进监狱。成都地区军内造反派对地方造反派冲击市公安局的行动表示声援，并对军区镇压地方造反派提出抗议。

2月11日凌晨，成都军区逮捕战旗文工团、空字028部队红总等军内造反派五十余人。当日下午，川大八二六工人造反兵团等地方造反派组织大规模游行，抗议军区“无理逮捕革命造反派战士”。他们到军区大院门口要求主持军区日常工作的军区副司令员韦杰接见，遭到拒绝，于是开始在军区大院南营门和东营门外静坐示威。

2月12日，成都军区发布《成都部队紧急公告》称，“一，凡公开违抗最高统帅毛主席批发的《中央军委命令》者，就是反对毛主席，坚决以现行反革命论处。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军事机关，不准围攻、架走我军人员，不准拦截军车，不准破坏、抢劫军用物资，不准散发、张贴反动传单和漫画，丑化、侮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戒严是一种军事行动，由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根据需要决定实施，各群众组织一律不得擅自实行戒严。四，现在强行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领导机关营区的外来人员，必须在本公告后迅速离开。否

〔637〕 主要参考资料：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四川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合编：《四川二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大事记》，1967年6月。

则，将采取必要措施。今后，军内外任何人员，未经许可，一律不准住在军事机关营区内。五，凡违背以上各条者，坚决依法惩处。”惟造反派群众组织未听劝阻，静坐持续了七天七夜。

2月14日，八二六战斗团在成都散发传单，称成都军区“用枪杆子为李（井泉）家王朝抢权、保权”，提出“成都军区黑司令部是李家王朝最后一张王牌，我们拿定了”，“成都军区黑司令部，我们砸定了！”“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等口号。在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八二六战斗团围困成都军区的影响下，四川省各地造反派开始把矛头指向军分区和人民武装部及驻军部队。

2月16日，解大联总<sup>[638]</sup>发出《紧急通知》，称成都军区“已经成了西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李、廖死党展开全面夺权的最大障碍”。通知所属组织于2月17日下午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砸烂韦杰、甘渭汉为首的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誓师大会”，并要求所属各组织“开动所有宣传工具，制作大字标语，广为张贴”，为冲击和围攻成都军区“准备舆论条件”。2月17日，解大联总在成都召开“砸烂以韦杰、甘渭汉为首的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誓师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2月18日凌晨，成都军区广播了叶剑英17日批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应革命群众的请求，派出部队协助公安机关逮捕抢劫成都市公安局几名首要罪犯的行动，是正确的，你们应给予支持。军区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区内极少数严重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人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这是军队内部的事，请你们不要介入，不要干预。请你们自觉执行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和最高统帅毛主席所签发的《中央军委命令》，不要围堵、冲击军区，不要干涉军人行动的自由，以利于部队执行国防战备任务和保卫四川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相信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的，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大部分是革命的师生组成的，一定能够做出执行最高统帅命令的榜样。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638】即解放大西南革命联合造反总部，以川大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为首在2月5日宣告成立。

同日下午，成都军区派出直升飞机在成都地区、其后又在全川散发了这封信。中央军委的公开信广播不久，围困军区的造反派开始撤离。下午，八二六战斗团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全团“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血战到底，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不达胜利，死不瞑目”。

2月19日，四川省各地公安部门开始收容审查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至22日，仅成都市公安机关就收容337人。

2月28日，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颁布。《布告》宣告：四川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进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时，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张贴、散发反革命标语传单，成立反革命组织，打着“造反”旗号，煽动群众，冲击军事机关和公安机关，抢劫武器弹药，盗窃国家机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工农业生产。为了彻底粉碎这股反革命逆流，各地公安机关应协同解放军，依靠广大群众，“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坚决取缔反革命组织”，以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保障工农业生产的安全，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布告》对“镇反”作出了五条具体规定。

3月2日，四川省公安厅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向四川省各市、专、州、县发出《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右派组织的意见》。此后，全省取缔造反组织700多个。

3月26日，成都军区政治部发出《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反动组织的批准权限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自即日起，凡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反动组织，一律由成都军区批准。各地对需要取缔的反革命组织和反动组织，应先将材料报市、专公安局、处和军分区审查同意后，送省公安厅审查，转报军区批准后，再由当地公安机关明令公布执行。

据官方统计，到3月底，四川省各地“镇反”中抓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乐山地区抓3,975人，成都市抓3,845人，温江地区抓3,808人，内江地区抓3,190人，重庆市抓2,105人，涪陵地区抓3,201人。全省总计抓32,554人。在成都抓的3,845人中，大部分属造反兵团、八二六战斗团及其所属166个组织的骨干分子，其中63%是造反派支队长以上成员。<sup>[639]</sup>

【639】《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页312。



## 七、湖北：“二八声明”与“二一八声明”<sup>[640]</sup>

2月8日，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工总）、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九一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后字248部队（后勤学校）红色造反野战军、红卫军、红工兵、大专红教工、中学红教工、《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北航红旗、西军电临委、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汉联络站等十二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声明提出要向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发动总反击、总清算，“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要丢掉幻想，投入战斗，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等等。“二八声明”把部分造反派群众组织说成是“机会主义”派别，因而，围绕拥护和反对“二八声明”，造反派分裂成了“香花”和“毒草”两大派，矛盾开始激化。

2月13日，武汉军区宣布，停止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

2月18日，经全军文革小组同意，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的，是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武汉部队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声明强调，武汉军区派部队到红旗大楼，是为维持正常秩序，防止发生械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某些军内个别人在这个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该声明用宣传车、直升飞机在全市和部分造反派集中的大单位散发。《严正声明》是武汉部队介入湖北省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份表态文件。它一发表就遭到发表“二八声明”的造反组织的激烈反对，攻击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

2月20日，武汉军区发布公告指出，凡是军事机关、部队或实行军事管制、守护的目标，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以任何借口进行围攻和冲击；对于已经封存的民兵武器、弹药，不准任意启封，更不准抢夺、窃用，否则定予查究处理，对顽抗者或主谋人，则予以逮捕法办。

2月21日凌晨，军区副司令员杨秀山和副政委叶明，率二十多个连队，包围了汉口高级步校，宣布高级步校红旗、红色造反团为反动组织，强令五个造反派群众组织解散，抓走这些组织的骨干分子十六人，其余的负责人交群众监督。2月23日，湖北省军区独立师（8201部队）对后勤学校进行军事管制。2月24日，

**[640]** 主要参考资料：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1949.5-1993.12）》，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7月）》，1967年8月。

武汉军区空军派出部队包围武汉军区卫生学校（武字 202 部队），向该校派驻工作组。同日，军区召开军区文工团、体工队、军乐队大会，会上，十几人被揪上台示众。

3月6日，湖北省军区在红山礼堂召开省直机关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陈再道在会上讲话时称，“为了实现大联合，必须彻底批判二八声明，把二八声明的幕后策划者和炮制者揪出来。在二八声明上签名的组织，支持二八声明的组织，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必须作公开检查。”会议之后，掀起了批判“二八声明”的热潮。

3月12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率三个营的兵力，前往河南信阳空军高射炮兵学校（空字 005 部队），宣布该校红色造反团为“反动组织”。其后连续三次逮捕该组织十四人，拘留二十九人，宣布看管九人，还把逮捕、拘留的人游街示众。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逮捕工总勤务组包括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sup>[641]</sup>在内的全部九名勤务员及各分部以上头头，“据说这天逮捕近 500 人”。<sup>[642]</sup>

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强令工总解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简称“三二一通告”）及附件《“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通告称，“‘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成立以来，在少数反革命分子操纵下，与湖北省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互相勾结，干尽了坏事。”“特宣布从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一律解散。”“一、对这个组织的反革命分子及其后台，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立功赎罪的政策，区别对待，彻底查处。”“二、这个组织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头目，凡自动投案，彻底坦白认罪者，允许他们改过自新，立功赎罪，给予从宽处理。抗拒、破坏或畏罪潜逃者，定予严惩。”“三、参加这个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牛鬼蛇神，一律不准改换姓名，伪造历史，再混入任何革命组织；如有破坏行为者，将依法严办。”<sup>[643]</sup>

3月21日，武汉军区派出部队包围空军雷达学校（空字 006 部队），当场逮捕十八人，并宣布该校红色造反总部为“反革命组织”。翌日，又包围武昌高射炮兵

---

**[641]** 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胡厚民，武昌造船厂工人。夏邦银，汉阳轧钢厂工人。

**[642]** 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7月）》，页28。

**[643]**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页128-130。杨道远1966年为武汉测绘学院学生，后为武汉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学校(总字 151 部队), 宣布该校红色革命造反团为“反革命组织”, 上午逮捕了六个主要负责人及十一名一般成员, 下午又召开控诉红总罪行大会。

3月28日, 陈再道、钟汉华在军区与武汉三司、新华工、新湖大等负责人座谈时, 陈再道称, “工人总部号称四十万, 被反革命分子掌握了, 解散工人总部对你们就是很大的支持。”“工人总部九个头头, 七个是政治严重不纯分子, 干了许多坏事, 破坏文化大革命。”“二司成员绝大部分是好的, 但二司做了许多坏事。工人总部干了的他干了, 工人总部没有干的他也干了。他们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了, 现在的总部在实现了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大联合以后, 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钟汉华称, “二八声明的出笼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一些坏人搞的鬼, 是反对革命派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方针的。对二八声明还没有批判透, 你们一定要高举批判二八声明的大旗。”

#### 八、江苏：军内造反与抓人<sup>【644】</sup>

1967年1月, 南京军区一如沈阳、北京、广州、福州、武汉等大军区, 也开展了自发的文化大革命。

1月18日, 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人员, 按照“志同道合, 自愿结合”的原则, 分别成立了“只争朝夕”与“捍卫东”两个群众组织。《人民前线》报社成立了“风雷激”战斗队。

1月26日, 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分人串联了后勤司令部、政治部、运输部、油料部、物资部等, 自行决定召开群众大会,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要求后勤首长澄清问题。后勤部郭金林<sup>【645】</sup>政委、钟贤文<sup>【646】</sup>副部长等被批斗。

1月27日, 宣传部、文化部和《人民前线》报社几个战斗队, 联合召开批判大会, 批判南京军区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出席大会的军区领导有副司令员王必成, 副政委鲍先志, 政治部主任王六生, 副主任史景班、符确坚。<sup>【647】</sup>各位领导在主席台上站成一排, 接受群众批判。军内造反派又强迫王必成、鲍先志等领导人下跪, 接受批判, 老将军不服, 他们就动手强迫他们跪下, 引起与会干部、战士反感, 人们纷纷离开会场, 批判会中断。

【644】 主要参考资料：爱新觉罗·里霜：《许世友与大民主》，<http://www.szhgh.com/Article/wds/read/201401/43367.html>, 最后访问：2014年1月25日。

【645】 郭金林, 1955年授衔少将。

【646】 钟贤文, 1964年晋升少将。

【647】 王六生、符确坚, 1955年授衔少将。史景班, 1961年晋升少将。

此期间，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杜平都在北京开会。得知司政后机关召开大会，批斗首长，搞戴高帽子、下跪、游楼等，许十分恼火，打电话给在家主持工作的王必成，要求对造反的骨干分子执行纪律。然而，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三人没有执行许的命令，对起来造反的人员，坚持采取劝说和教育的做法。杜平也不同意许世友过激的断然措施。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第二天，南京军区机关自发的文化大革命，遵照八条命令停止活动。但是，驻宁各军队院校、文艺团体，和北京南下“点火”的解放军艺术学院造反派这些外来因素的干扰，对军区机关的冲击起了重大的作用。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除许世友一人外，都不同意抓人。许世友说：“王老虎你大胆干放手干，把造反的通通抓起来，出了事我承担。”并威胁王必成“你不敢抓就给我滚蛋！”2月春节刚过，许世友命令王必成首先在政治部抓人。首批抓了宣传部的艾汉美、文化部的方泽甫、人民前线报社的洪期钧、高丕忠四人，并对抓人的事件要人人表态。第二批抓人更多，抓了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战士教育科科长杨炳仁、新闻科副科长李少白和摄影记者施关彬等人。不久，孙海云、杨炳仁、洪期钧、方泽甫被逮捕。后来，又扩大到秘书长卞庸中、青年部部长季遯年。被抓的军以上干部，有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再后来扩大到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许世友说他们三人是“黑后台”。许世友抓人抓红了眼，军区司、政、后下属单位，如：“三团两队”、军人俱乐部、各医院、仓库、科研所等均大批抓人，仅军区总医院就抓了五十八人。

2月9日，发生了八一医院事件。全副武装的一个团（缺炮营和迫机炮连）上了刺刀，包围了八一医院，与军队院校造反派对峙，引起了军内外群众强烈不满。

2月26日，军区后勤部张祥<sup>[648]</sup>副部长宣布，“对一小撮违反纪律的人员采取断然措施，实行行政看管”。所谓“行政看管”，实际上就是逮捕关押。

2月抓人之后，许世友以“支左”为名，把政治部二百五十多名干部作为“坏人”流放到浙江边远山区劳动改造。这批干部离开南京之后，军区政治部部长杨映雪打电话给浙江省军区，说：“这批干部我们不要了。”

2月军区后勤部党委奉许世友之命抓了370人，许世友不满意，认为后勤部政委郭金林“老右倾，豆腐渣”，部长谭友夫“胆小怕事，说软话，顾虑多”，副部长汪运祖“小病大养占着茅坑不拉屎”，副政委喻新华、张希才“同情造反派列为审查对象”，副部长张祥、参谋长王子乔，政治部主任徐放“同情支持平

---

【648】张祥，1965年大校军衔。

反”，副政委黎同新“伸手要官不干活”。洪洞县里无好人了！所以要“解散后勤党委”。<sup>【649】</sup>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 1968 年 1 月 5 日写给中央的“检讨报告”，反映了 1967 年 2 月军区在军内外抓人的情形：“在南京，我们抓住地方革命群众组织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错误地把十个革命群众组织，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抓了三百三十二人，把一些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二、三月间，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的所属部队，共逮捕二十二，看管、隔离反省四百七十五人。对逮捕、看管的同志，进行种种迫害和虐待，使它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更为严重的是，我们采取强制手段，把军区三个文工团、军乐队、体工队分给部队。对军区步校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看成反动组织，强行解散，并拆散步校，借‘三支’‘两军’之机，下放到各军，使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夭折。我们错误地把《人民前线》报社革命群众组织‘风雷激’，说成是反革命组织，停刊了《人民前线》报。同时，我们还把军区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一些出于革命热情自发起来的‘四大’的同志，随着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干部，调到军分区和人武部工作，并错误地介绍了情况，使这些同志遭到了种种歧视。”“我们对驻南京的某些军队院校冲击军区机关，看的过于严重，借口维护八条命令，对他们进行了压制。责令一些同志写检讨，并看管了十六人，特别对第一工校革命造反总部等革命群众组织，冲击八一医院事件，错误地定为‘极为反动的反革命事件’，使这些单位的革命同志，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遭到了各方面的压制和打击。”

### 第三十五节 “二月逆流”

#### 一、收紧军内文革的一系列措施

“军委八条”发布之后，军委对于军内文革，总的来说，采取了“收”的态势。为此，密集地颁布了一系列文件，以求达致目的。

1967 年 1 月 18 日，军委下发《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强调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各大军区、省军区机关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不要与地方同时展开，规定济南、南京、福州、武汉、广州、新疆、昆明七个军区推迟或暂停文化大革命。<sup>【650】</sup>

【649】 谭友夫、喻新华、张希才，1955 年授衔少将。黎同新，1961 年晋升少将。汪运祖，1964 年晋升少将。徐放、王子乔，1965 年大校军衔。

【650】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 15-16。

1月28日，在“军委八条”发布的同一天，军委作出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称：“帝、修、反正在加强反华，蠢蠢欲动，蒋匪也想乘机袭扰。因此处在反帝、反修第一线的军区（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新疆）和有随时策应各军区任务的武汉军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应照前次指示暂缓进行，把自己稳定起来，以便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何时开始，听候军委命令。”<sup>【651】</sup>

2月8日，军委发出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称：“为切实贯彻执行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军委决定：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机关、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的同志一律于二月二十日前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得再在外地逗留。革命群众组织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也一律撤销。各单位的接待站，从二月二十一日起一律停止接待。凡过期不归者，不予报销差旅费。凡违反上述规定者，一律按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给以纪律处分。”<sup>【652】</sup>

2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以军委名义，发布《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内称：

二、军以上机关（各总部、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区空军、海军舰队）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四大。由军委决定已经展开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军委决定暂时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必须进行正面教育，何时开始，必须听候军委命令。

三、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的基地以下单位，海、空军的飞行学校，北京卫戍区，上海、天津、旅大警备区，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

四、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帝、修、反加紧反华，我军更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和不间断的指挥。因

【651】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1988年，页263。

【652】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页234-235。

此，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司、政、后及其他领导部门）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

五、根据古田会议决议和一九六〇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所确定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党委个别成员问题严重的，可以撤换，党委不能领导的，可以改组，但都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这些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对党委有批评和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sup>【653】</sup>

据范硕称，军委“七项规定”制定和颁布之后，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发言，“本来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又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sup>【654】</sup>

2月16日，军委发布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对于军队内部的夺权问题，作出明确的界限划分：“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如果领导权确是掌握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的，要坚决夺回。”“各学院学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这些分队的指挥权，应按军委二月八日的规定移交各驻地军区或部队。”<sup>【655】</sup>

2月18日，《中央军委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通知》称：

军委二月八日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下达后，外地来京人员已大部返回，但近日仍有一些人来京。为切实执行军委通知，特重申如下：

一、请各单位大力宣传军委通知精神，要求全体人员严格执行军委规定，不再外出，集中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有什么问题，应报请军区、兵种领导机关解决，也可以写信向上级机关反映。

【65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页129-137。

【654】《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130。

【655】《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页141-146。

二、今后各单位来京和到外地去的人员，必须经军以上党委同意，报告军区、军、兵种领导机关批准。来京人员，要报经全军文革小组批准。未经批准外出的，各地接待站一律不予接待，各单位也不予报销差旅费。<sup>〔656〕</sup>

2月27日，军委又对2月11日发布的《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作出如下补充规定：

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颁发后，得到全军广大革命同志的热烈拥护。军委决定暂停四大的单位，有的已经转入正面教育，并撤销了文化革命战斗组织。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广大革命群众按照保持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要求，也自动撤销或改组了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为了保持军队领导机关严密、完整的指挥体系，进一步贯彻军委指示，特决定：

凡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应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用具等，应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sup>〔657〕</sup>

3月19日，《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首次提出三支两军的概念称，“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暂告一段落。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sup>〔658〕</sup>

## 二、“大闹怀仁堂”

1967年2月16日发生了“大闹怀仁堂”事件，即所谓“二月逆流”。这次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文革引起的一系列矛盾积累的结果，其诱因是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

据此一事件的亲历者王力回忆称：

---

【65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页149-150。

【657】《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页138-140。

【658】《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页176-177。支左，即支持地方“革命左派”；支工，即支援工业生产；支农，即支援农业生产；军管，即军事管制；军训，即对大中专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师生进行军事训练。



一、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毛主席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开会，就突然宣布打倒陶铸的问题，批评陈伯达。重要的话有“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陈伯达，过去专门在刘少奇和我之间进行投机！”“不是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接着批评江青说：“你这个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没有别人的事！”

二、这次会上，我注意到，毛主席虽然没有指名，但是面对着林彪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有事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sup>【659】</sup>毛主席还说：“总理除外，有重大问题，他是向我报告的。”

三、这次会上，毛主席做了两个决定：第一，由王力负责立即把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调来，开文革小组会议，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对陈、江错误问题，只准在他这里和文革小组会上讲，不准在别的场合讲。第二，以后在这里开会，增加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和叶群。<sup>【660】</sup>

党内一些老人<sup>【661】</sup>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到了1967年1月全国夺权阶段已发展至强烈不满。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严厉指责，正中这些老人们的下怀。据官方称，毛的指责及中央文革小组按毛的要求开会批评陈、江，“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也“促成了这种不满的爆发”。<sup>【662】</sup>

关于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王力称：

七、二月十六日下午，总理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例会<sup>【663】</sup>，这次通知议程是讨论经济问题。（不是聂文中所说的“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在我一九六七年八月被打倒之前，总理一次未主持过常委会。）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以上政治局正式委员依次坐在总理右首，

【659】王力称，毛泽东这句话是指责林彪。见《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页974。

【660】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29-30。王力原注：“本文原题：对《聂荣臻回忆录》中《所谓‘二月逆流’》一节的说明，写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661】主要指八届十一中全会保留及新增的政治局成员中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及叶剑英。

【662】《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80-1481。

【663】会议记录称此次会议为“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毛泽东传》亦将此次会议称为“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81。

座北朝南。其他有谢富治（候补委员）、余秋里、王力，坐在对面。张春桥、姚文元因经济问题上上海有关临时参加，也坐在朝北的这边。聂文中所列举的出席人名单中，有四个人并未出席这次会议，即聂荣臻、谷牧、关锋、戚本禹。在座位上也并没有如聂文所说的“两军对垒、阵线分明”。聂总是记错了。他老人家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sup>【664】</sup>执笔者根据臆测和传说来描写，这就不符合事实了。还有一个插曲：陈伯达不敢坐在原来位置上，一个人躲到后边桌子角上去了，总理还命令他坐在原来位置。

八、这次会议没有开始讨论原定的议程，总理就宣布散会了。副总理们（除谢富治）和老师们对文化大革命提出批评，你一句，我一句，持续三小时。最尖锐的是陈毅，他直接指向林彪（不指名），也批评到了主席。陈总提出：“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怎么样了？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又怎么样了？”最激烈的是谭震林，他最恨江青，也反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和华东的所作所为。（会议开头就是从上海打倒陈丕显问题和汛期要渔船停产闹革命问题同张春桥顶撞而引起的。）徐向前严厉地拍了桌子，提出：“还要不要解放军？”叶剑英、李先念都提出原则性的批评意见。李富春未发言。唯有谢富治不断说：“谭老板，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王力没有发言。我是同意老前辈们的意见的。有我写的《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红旗》社论为证。<sup>【665】</sup>

根据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事后整理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会议经过大致如下：

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订日程“抓革命，促生产”。

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是，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664】《聂荣臻传》及《聂荣臻年谱》均称聂出席了这次会议，王力的说法较为准确。

【665】《历史现场：文化大革命纪事》，页31-32。

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陈毅同志说：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

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办？

（谢富治不断插话，文革小组经常讲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先念同志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sup>【666】</sup>

【666】 根据宋琼、孙浩刚、邵一海：《所谓“二月逆流”的历史真相》（原载《解放军报》1979年2月26日，转引自《“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页307-308）及《毛泽东

根据以上记录，谭震林在会议上态度最为激越，陈毅次之，李先念、余秋里再次之。谢富治和稀泥。无论聂荣臻有无出席会议，当时的会议记录，并没有记载下他及徐向前、叶剑英的发言。

### 三、毛讲了一些分量很重的话

据王力称，2月16日会议结束后，他和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了未参加会议的江青，随后又马上报告了毛泽东：

九、会后，姚文元发起，说：“今天是一场大的斗争，王力，你要站稳立场。”张春桥说：“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我们先对对情况。”我说：“可不能随口乱讲，要如实，要准确。”这次对情况我记下了一个文字要点（这不是后来的“记录”，也没有用任何文字形式“上告”。）因此，聂文所说：“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当天……整理了一个记录，上送告状……”，并无此事。

十、张春桥说：“先找江青。”在十一楼江青那里，张春桥夹叙夹议地讲了一通，江青的“病”立即好了。江青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总理、康生、陈伯达是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江青立即拿起电话，要徐业夫报告主席：“张、姚就要回上海了，请主席今晚接见。”过一会，主席通知、叫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立即到北京厅来。

十一、在谈完正题之后，张春桥向毛主席报告怀仁堂会议情况，他大体上是照着“要点”说的。开头毛主席听了直是笑，说到陈总的话以后，再也不笑了。张春桥突然告了总理一状：第一，说李先念讲打倒干部是从十三期《红旗》社论开始的，总理也对这篇社论没有送给他审查不满。毛主席说了气话：“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送常委审查哟！”第二，张春桥又说：“主席还记得去年总理送的一个文件吗？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打倒干部，是他们这些人搞起来的，总理还说这个文件很好哩！”毛主席对张说：“你把这个文件马上找出来，送给我再看看。”

十二、毛主席最后说：“现在是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干部；第三要抓地方；第四经济上一要抓煤炭，二要抓铁路。”因张、姚要回沪，主席叫王力告诉林彪、周恩来和文革小组。<sup>【667】</sup>

王力先报告了周恩来，然后报告林彪：

十四、我要向林彪报告，江青说必须经过她。二月二十日下午<sup>【668】</sup>，江青约我和她同车到京西宾馆，叫我在那里等着，她先到林彪那里去了，然后又来接我去。我向林彪的报告，同向总理讲的内容一样，叶群作记录。林彪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另一句是：“陈伯达只是一个书生。”我谈完以后，江青叫叶群派车把我送回去，她自己留下了。这晚江青回中南海。当时我不知道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直截了当地称江青是“当代武则天”。（谭震林给陈伯达的那封暗示骂江青的信我是看过的。总理也看过。）<sup>【669】</sup>

有关谭震林给林彪写信，据《毛泽东传（1949—1976）》称：“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林彪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了‘已阅。’”<sup>【670】</sup>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在会上发了脾气，讲了一些在气头上分量很重的话。他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sup>【671】</sup>据王力称：

十五、当天，二月二十日下半夜，即二十一日凌晨<sup>【672】</sup>，康生突然来到我的房间，说：“我知道你还会睡，先告诉你。我刚从主席那里开会回来。出了大事了。我从来没见过主席发这么大脾气。立即找陈伯达、关锋、戚本禹（不

【667】《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32-33。

【668】王力所述时间有误，见林彪时间应在2月18日。《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为2月18日上午，见该书页142。

【669】《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34。

【670】《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82。

【671】《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82。

【672】王力所述时间有误，应为2月19日凌晨。《王力反思录》所述毛召集会议时间为2月18日深夜，见该书下册983。

在)传达。等江青起床后,我单独去跟他谈<sup>[673]</sup>。”主席召开的这次会到会者有:叶群(代表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谢富治。主席召开的这个会我未参加,我所听到的不是第一手材料,是康生的传达。(我所记忆的间接材料,文献研究室已向我作了详细调查,因此不讲了。)按照康生的记录,毛主席骂人确实很凶。这次会议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由周恩来、李富春同陈毅谈话,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同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谢富治同徐向前谈话。<sup>[674]</sup>

《毛泽东传(1949-1976)》称,“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等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以后称为‘二月逆流’。”<sup>[675]</sup>

王力则称:

十六、从二月下旬到三月下旬,总理主持,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地抽空开批评会。到会者有: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王力(这是二月十六日到会者),新参加者有江青、叶群、关锋、戚本禹、谷牧、萧华、杨成武、汪东兴。因为许多人新到会,总理叫王力整理一个二月十六日的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清样由总理和康生审定修改(有档案可查)。总理叫王力先在会上读一遍,核对情况。只有陈老总提出,有一句话他没有讲,要求删掉。总理说,讲是讲了,不要删了。这样就定稿印发了。陈老总这句话不删,历史更证明他正确。这才是现在档案中的《记录》。署名是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会议情况不必说了,只说一点,本来没有李富

---

【673】原文如此,“他”似应为“她”,即指江青。

【674】《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34。

【675】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间,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对“二月逆流”分别作了检查和检讨发言。陈毅称,“在‘二月逆流’中,我所犯错误性质最为严重,起的作用最坏,我对党对人民犯了罪。”(中共九大《会议简报》总334号,1969年4月9日)徐向前称,“在大闹怀仁堂的严重反党事件中,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充当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中共九大《会议简报》总270号,1969年4月8日)聂荣臻称,“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系列极端严重的政治错误,不但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的错误,而且还陷入了反党的‘二月逆流’,是这股逆流中的一员。”(中共九大《会议简报》总228号,1969年4月6日)。

春的事，但他主动承担责任，说副总理们的意见，都是在他家里议论过。因而他被康生攻击为“俱乐部主任”。这次会上，以康生和谢富治骂人最凶。<sup>【676】</sup>

“政治局生活会”之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sup>【677】</sup>在军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的权力不同程度受到削弱，徐向前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叶剑英的军委秘书长等实权性职务从此不再被提及。与此同时，3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为中央军委常委。<sup>【678】</sup>谢富治进入军队最高领导层，萧华、杨成武的军内地位亦得到相应的提升。

### 第三十六节 三个野战军调防

在文革进入激烈、复杂阶段之际，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对三个野战军的驻防部署进行了调整，重点着眼于加强对京畿地区的护卫力量。

2月15日，军委以作字80号命令告北京、兰州、沈阳军区称：

奉毛主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二十一、六十九、三十八军的部署作如下调整。

(一) 调二十一军进驻西安、宝鸡地区，归兰州军区建制。军部率六十一师进驻西安地区，六十三师主力进驻西安以西和宝鸡地区，以一部进驻天水，具体部署由兰州军区确定。驻甘肃省平凉地区之步兵六十二师，归还二十一军建制。

调六十九军进驻山西，接替二十一军防务。二十八师接替六十一师防务，一〇七师接替六十三师防务。军部位于太原。

调三十八军归北京军区建制，进驻高碑店、保定、定县一线地区，接替六十九军防务，具体部署由北京军区确定。

(二) 以上部队接到命令后，应迅速做好行动准备，尽快开动。二十一军、六十九军务于三月五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三十八军务于三月八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

(三) .....<sup>【679】</sup>

【676】《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34-35。

【677】《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83。

【678】总参谋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1949.10-1987.12）》上册，1988年，页97。

【679】本命令的引言、第（一）点二十一军部分及第（二）点，根据二十一军组织沿革资料，其余部分根据其他非官方资料整理，其余部分的准确性未能确认。

此为文化大革命以来野战机动部队的第一次大规模调防。接到上述命令后，三个陆军野战军立即行动，按时全部到达指定地点，并随即介入驻地的地方文化大革命。

### 一、二十一军移防陕甘

陆军第二十一军前身为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1958年从朝鲜回国后驻防山西，隶属北京军区。接到调防命令后，该军即率所辖陆军第六十一师、第六十三师，由山西移防陕甘地区，由北京军区转隶兰州军区建制，成为兰州军区辖内唯一一支军级野战机动部队。军领率机关由太原市移驻西安市，原代号4897部队改8133部队。军长胡炜，政委施义之，副军长彭思忠、苏锦章、刘江亭，副政委刘建功，参谋长马友里，政治部主任梁济民。<sup>【680】</sup>

陆军第六十一师，由雁北、大同地区移防至西安、咸阳地区。师部驻西安市，原代号4731部队改8118部队。师长徐春阳<sup>【681】</sup>，政委孙长兴<sup>【682】</sup>，副师长刘正昌、尹庆丰、马学俊，副政委费龙山、姬从周、洪意宁，参谋长许效民，政治部主任王克卿。所属步兵第一八二团移驻咸阳、兴平地区，原代号4804部队改8157部队；步兵第一八三团、一八四团<sup>【683】</sup>移驻西安市东、西郊，原代号4726、4736部队分别改8158、8159部队；炮兵第三四一团移驻临潼地区，原代号4762部队改8160部队。

陆军第六十二师，前于1960年11月归兰州军区直辖，3月5日起归还二十一军建制。师部驻甘肃平凉县，代号8037部队。师长姜玉安，政委李天冲，副师长徐洪学，副政委孟移山，参谋长魏尚友，政治部主任赵书堂。该师归建后，所属步兵第一八一团（8046部队）赴兰州市支左；步兵第一八五团（8047部队）、第一八六团（8048部队）仍在宁夏青铜峡、固原地区驻防；炮兵第三四二团（8050部队）在宁夏执行垦荒生产任务。8月，师部移驻宁夏银川。二十一军对该师只管部队工作，其三支两军任务由兰州军区直接领导。

陆军第六十三师，由山西榆次地区移防至陕西宝鸡、甘肃天水地区。师部驻宝鸡市，原代号4558部队改8145部队。师长孙玉水，政委魏宏武，副师长魏新民，副政委刘建德，参谋长魏骑象，政治部主任朱恭文。所属步兵第一八七团移

【680】 施义之1966年12月已调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但军内职务未免。1967年7月，刘建功接任政委。苏锦章，1964年晋升少将。施义之、彭思忠、刘江亭、刘建功、梁济民、马友里，1965年大校军衔。

【681】 徐春阳，1965年大校军衔。

【682】 孙长兴，1965年大校军衔。

【683】 1960年与步兵一八一团对调建制。



驻岐山县，原代号 4559 部队改 8163 部队；步兵第一八八团移驻宝鸡市，原代号 4560 部队改 8164 部队；炮兵第三四三团移驻宝鸡县，原代号 4577 部队改 8166 部队；步兵第一八九团移驻甘肃天水地区，原代号 4576 部队改 8165 部队，其三支两军任务由兰州军区直接领导。

胡炜晚年回忆称：

2月23日，我奉命赴京受领任务。当日下午，周总理当面指示说：“西安现在很乱，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你们的部队到西安后，要稳定形势，做两派群众组织工作，促使他们联合起来，两派负责人现均在京，你同他们见见面，了解情况，做点工作。”3月1日夜和3月2日下午，中央文革和总理先后接见了西安两派的数十名负责人，总理接见时将我介绍给大家，并讲了赞扬的话，他风趣地说：“这是小胡，他能文能武，你们要听他的话，支持他的工作。”这显然是为我们部队开展工作创造条件。3月2日夜，总理接见了我和陕西省军区王明坤副司令、兰空刘镇副政委、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西安市委书记薛焰，他询问了有关情况后，作了很多指示，主要内容是：现在陕西省党政机构已瘫痪，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要组成统一的支左领导机构，暂时把全省的工作管起来，要稳定形势，促进联合，抓好生产，现在春耕期到了，要快抓农业生产，军队负责同志要和群众组织协商，让霍、薛及其他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出来，一面接受群众的批评，一面抓好生产。接见后，总理要我留京参加军级干部会议，其他同志回去传达指示，开展工作。我陆续将总理的指示精神，通过电话，向二十一军领导同志作了传达，并要随行的军党委秘书卢念足于3月4日搭乘兰空飞机回西安，向军领导同志进一步具体传达，提出要立即着手办的几件工作：西安驻军组成统一支左机构，派人到省领导机关组织抓生产，特别是春耕，对总理指定的四所大学安排军训，组织宣传队，立即制止打、砸、抢。因此，部队抵达西安后，各项工作于3月份即先后展开。王、刘回西安后，向省军区、二十一军、兰空、总后驻西安办事处的领导同志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大家研究后确定组成西安地区驻军支左统一指挥部，由省军区胡炳云司令任主任，二十一军胡炜军长、兰空杨焕民司令为副主任，并初步研究了统一领导支左的有关问题。<sup>【684】</sup>

【684】 胡炜：《特殊情况下执行的特殊任务——二十一军在陕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始末》。《征程纪事（续集）》，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王明坤、胡炳云，1955年授衔少将。杨焕民，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

在军内没有职务的周恩来，为什么可以对一位军长发号施令？胡炜未有说明。其实，周恩来并非是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而是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碰头会（后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人身份向胡炜布置工作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周对军队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由此一斑，可窥全豹。

胡炜又回忆称：

军级干部会议结束后，我于3月26日回到西安，当日下午即向四个驻西安军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同志详细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和军级干部会议精神，通过学习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把总理关于“做两派群众组织工作促进联合”和“稳定形势”的指示，作为我们工作的指针。并研究确定了以下事项：把西安地区驻军统一指挥部改名为陕西省军区和驻军支左委员会，由新任陕西省军区司令黄经耀为主任，胡炜、杨焕民为副主任，省军区袁克服政委、二十一军刘建功副政委、兰空方升普副司令、西办白辛夫主任为常委（后增补省军区谷凤鸣政委为常委），统一领导全省三支两军工作；由四个单位抽调得力干部组成支左委员会办公室，联络组、军管组、军训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分管各方面的工作，为便于各单位及时了解情况，以利团结协作，各机构的负责人均由四家各抽调1名负责干部共同组成；由四个单位抽调大批干部、骨干组成数百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中型企业和一些事业单位执行支左任务，并按照总理的指示对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讯学院、西安冶金学院等四所重点大学展开军训；西安、宝鸡、铜川三市的支左工作，由四家部队抽调干部共同负责，主要力量由二十一军抽调，各专、县的支左工作，则主要由军分区、武装部负责。会后召开了四家部队的连以上干部大会，由我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和省支左委员会的工作部署，各家分别组织了学习讨论，陕西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二十一军是军委专门派到陕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理所当然地要全力投入这项工作。经军党委研究决定：军、师、团各级领导同志除留两人照管部队工作外，其余均以主要精力投入支左工作；我和刘建功副政委参加省支左委员会的领导，除留马友里参谋长、梁济民主任照管部队工作外，军其他领导同志也均投入支左工作；部队分驻各重要地区，视情况和工作需要，随时准备执行支左任务。<sup>【685】</sup>

【685】《特殊情况下执行的特殊任务——二十一军在陕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始末》。黄经耀，1961年晋升少将。袁克服，1955年授衔少将。方升普，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白辛夫，1964年晋升少将。谷凤鸣，1965年大校军衔。

## 二、六十九军移防山西<sup>【686】</sup>

陆军第六十九军为原董其武所部绥远起义部队改编、缩编而成，1950年代初从朝鲜回国后驻防河北保定地区。接到调防命令后，该军即率所辖陆军第二十八师、第一〇七师，由保定地区移防山西。军领率机关由保定市移驻太原市，原代号4642部队不变，隶属北京军区不变。军长董其武，政委曹中南，第一副军长萧选进，副军长谢振华、冯梓、钟辉琨、李金时、王一，副政委张宗文，参谋长曹西康，政治部主任戴秉孚。<sup>【687】</sup>

陆军第二十八师，由河北新城地区移防至山西雁北地区和大同市，接替陆军第六十一师的防务。师部驻大同市，代号4661部队不变。师长张广有，政委罗国斌，副师长杨茂林，副政委吕树品，参谋长王怀保，政治部主任刘一元。所属步兵第八十二团移驻太原市北营，代号4662部队不变；步兵第八十三团移驻大同市，代号4663部队不变；步兵第八十四团移驻阳高县，代号4664部队不变；炮兵第五八五团与坦克第二三三团移驻大同市，代号4665、4666部队不变。1967年5月至1968年1月，八十三团、八十四团和八十二团二营在张广有、吕树品指挥下，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担负三支两军工作。

陆军第一〇七师，由河北满城县移防至山西，接替陆军第六十三师的防务。师部驻榆次县，代号4655部队不变。师长丁汝勤，政委刘新田，副师长靳万起，副政委李华，参谋长张恒才，政治部主任周云涛。所属步兵第三一九团移驻祁县，代号4656部队不变；步兵第三二〇团移驻临汾地区，代号4657部队不变；步兵第三二一团移驻洪洞县，代号4658部队不变；炮兵第五八六团移驻太谷县，代号4659部队不变；坦克第三一二团移驻榆次县，代号4660部队不变。

2月15日，北京军区电令，北京军区工程兵第一工区（京字412部队）改归六十九军领导（仍隶属北京军区工程兵建制）。工区主任任云鹏，副政委周发言（1967年4月任政委），副主任胡玉肃，副政委李兴智、夏一超，参谋长严兆和，政治部主任朱德辅。

1967年上半年，山西省的支左由山西省军区负总责。参加山西支左的部队，统一在山西省军区党委领导下参加支左工作。当然，其中起主导的作用是张日清。山西省军区陆续发布了十七个军管布告，对一些厂矿企业、交通运输单位、

【686】 主要资料来源：曾鸣：《1967年上半年山西省军队支左的大致情况》，未刊稿。

【687】 董其武，1955年授衔上将。钟辉琨，1955年授衔少将。曹中南，1961年晋升少将。萧选进，1964年晋升少将。冯梓、李金时、张宗文、曹西康、戴秉孚，1965年大校军衔。

报社、公检法、金融、邮电和重要仓库实行军事管制，共计 614 家。执行军管任务的是省军区、各军分区、各市区人民武装部；二十一军于 1967 年 2 月 20 日以前参加了部分军管工作，六十九军移防山西后参加支左工作。军领导以军党委书记、政委曹中南负责支左，谢振华、李金时、张宗文协助，萧选进负责军内工作。曹西康、戴秉孚先后参加支左。

3 月 10 日，六十九军以 4642 部队名义，和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山西省军区共同发出《关于军队管理工业、企业、事业单位的通知》，对上述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同月，经中央批准，曹中南为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成员。又经中央批准，谢振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宗文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军直属队和二十八师派出部分干部战士参加太原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同时参加太原支左的还有山西省军区、独立师（4540 部队）和空军十航校（空字 025 部队）等部。太原市人民武装部部长刘生恺、二十八师副政委吕树品任中共太原市核心小组成员（太原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守中任核心小组组长）。二十八师和山西省军区独立师对驻太原的大型工矿企业和铁路局分别实行军管，向大中学校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967 年 4 月，省核心小组内讧，刘格平、张日清虽然在对待原省委及其负责人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人的态度上，在一一二夺权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权力方面却互不相让，你争我夺。曹中南在有的问题上倾向刘格平，在有的问题上支持张日清，总的态度是不偏不倚。谢振华等六十九军干部亦取同样的态度。各造反派群众组织围绕所谓“反对刘格平”的问题，分裂为支持刘格平、反对刘陈刘（指支持张日清的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反对张日清和反对刘格平、支持张日清、支持刘陈刘的两大派。前者以参加“一一二夺权”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山西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简称红总站）、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决死纵队（简称决死队）为主，后者以反对“一一二夺权”的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站）为主。据当年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会议上，空军十二航校（空字 027 部队）校长孟力发言称，张日清把支持红总站的 7 个团撤出支左，不支持红总站的部队留下来继续支左。换言之，就是支持刘格平、支持陈永贵的部队要撤出支左，不支持刘、陈的部队可以继续支左。

在大同市和雁北支左的部队，以二十八师为主。该师参加了山西省核心小组支持的 3 月 16 日夺权。师长张广有担任夺权后成立的雁北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政委罗国斌担任大同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大同市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主任。3 月

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支左领导小组成立，罗国斌任组长，参加领导小组的还有空十军、装甲兵学院、总后大同汽车学校等单位的有关负责人。雁北、大同各造反派群众组织因对3月16日夺权的不同态度，分为好派和糟派：支持这次夺权的，认为好得很，被称为好派；反对这次夺权的，认为糟得很，被称为糟派。好派占多数，受到二十八师、雁北军分区支持，省核心小组、革委会也支持好派。糟派虽然得到装甲兵学院、汽车学校等部队院校的支持，但从总体上是受到压制的。其中有的组织如“军团”、“红军”、“红铁团”被打成“反动组织”，负责人被捕。

在晋中专区，1967年2月，山西省核心小组决定任井夫（原晋中专署副专员）、王振国（原晋中地委副秘书长）、张怀英（原文水县委书记）（以下简称任王张）、丁汝勤（一〇七师师长）、魏宏武（留下交接工作的六十三师政委）、陈尔云（晋中军分区司令员）、崔冰（晋中军分区政委，原晋中地委常委）任中共晋中核心小组组员，同年5月任命丁汝勤为副组长，决定山西省军区副政委智生元代理中共晋中核心小组组长。10月，一〇七师政委刘新田任中共晋中核心小组组员。晋中军分区、六十三师、一〇七师都支持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总司），并支持其实施的1月31日夺权行动。晋中军分区派政治部主任郭炳章、一〇七师派政治部主任周运涛担任总司常委，参加日常工作。崔冰担任晋中区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主任。参加晋中支左的部队有晋中军分区、一〇七师和总后103部队、空军053部队等，以上部队负责人共同组成晋中专区支左领导小组，丁汝勤任组长。晋中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把反对“一三一夺权”的晋中革命职工造反兵团打成“反动组织”并予以取缔，逮捕了其负责人。陈永贵、任王张等人认为：总司夺权的大方向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夺权后受原地委书记王绣锦布置的二、三线人物操纵，其代表人物是晋中军分区政委崔冰，总司是保守组织。他们另成立了晋中地区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及其黑二三线人物联络总站（简称总站），其口号是“改组总司，打倒崔冰，解放晋中”，他们支持刘格平、陈永贵，支持任王张。总司则提出“支持解放军，炮轰任王张”的口号，与之抗衡。这样，总站被称为支持派；总司被称为炮轰派。陈永贵、任王张支持总站；军分区和一〇七师支持总司及其下属的大多数组织。当时晋中区辖20个县，各县人武部支持的群众造反组织大都与晋中总司观点一致，态度相同，在本县属于多数派。直至1967年7月康生、关锋主持的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会议后，军方才撤销了对总司和这些组织的支持。

晋南专区的支左，由晋南军分区负责。一〇七师成立驻晋南指挥部，由师政委刘新田、副师长靳万起负责。指挥部配合晋南军分区，同空军第十二航校、

3589 部队参加晋南区的三支两军。中共晋南核心小组组长石珉（原省粮食厅副厅长），组员：刘新田、王毅（晋南军分区副司令员）、孟力、冬青（原晋南地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卫树廉（女，原山西省妇联会驻晋南办事处主任）。晋南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石珉，副主任王毅、孟力、杨力耕（晋南军分区副政委）、冬青、杨茂林（二十八师副师长）、张耀庭（原中共晋南地委常委、山西省监委驻晋南监察组组长）。但是，如同山西的其它专区一样，晋南也有过两次夺权：1月26日，以山西师范学院革命造反大队和红教工兵团为主体的临汾与晋南的部分群众组织夺了地委、专署的权。3月18日，由省核心小组派到晋南的石珉等领导干部，在军分区和空军第十二航校的支持和参加下，联合另一部分群众造反组织再次夺地委、专署的权。各群众造反组织由此分为两派：参加或支持1月26日夺权的造反组织被称为一二六派；参加或支持3月18日夺权的造反组织被称为三一八派。省核心小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电祝贺3月18日夺权，实际上等于支持三一八派。军分区、十二航校是三一八派的当然支持者。省军区开始支持一二六派，后来因为省核心小组表态支持三一八派，转而支持三一八派。一〇七师驻晋南指挥部支持3月18日的夺权，但是，对把山西师范学院革命造反大队和红教工等组织打成“反动组织”并逮捕其主要负责人持有不同意见。当时晋南专区有29个县，虽然一〇七师也派出部队到部分县进行支左，但是大部分县的支左工作由县武装部实施。他们服从军分区，所以三一八派在晋南是多数派。但是，一二六派有一〇七师的支持也不屈服。因而，晋南的两派斗争也是长期而又激烈的。

### 三、三十八军移防保定<sup>[688]</sup>

陆军第三十八军前身为东北野战军主力第一纵队，号称东野“三虎”之一。朝鲜战场表现突出，获“万岁军”美誉。1958年从朝鲜归国后驻防吉林通化地区。将四野谱系的该军接替非嫡系的六十九军拱卫京畿，扼控华北，当合毛、林心意。接到调防命令后，该军即率所辖陆军第一一二师、第一一三师及第一一四师，由通化地区移防河北保定地区，由沈阳军区转隶北京军区建制。军领率机关由通化市移驻保定市，原代号3072部队改4800部队。军长李光军，政委王猛，副军长李忠信、刘海清、牟立善，副政委邢泽，参谋长范天恩，政治部主任萧健。<sup>[689]</sup>

【688】 主要资料来源：余汝信：《文革漩涡中的三十八军》。电子杂志《枫华园》第439期，2004年2月27日，第440期，2004年3月5日；邵宝殿、宋永佳：《猛将王猛》，北京：香港商务旅游出版社，2008年。

【689】 李光军、王猛、李忠信，1964年晋升少将。刘海清、邢泽、牟立善，1965年大校军衔。

该军军史称：“奉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命令，第38军于1967年2月18日至4月由吉林省通化地区移防河北省保定地区。2月18日19时30分至3月6日4时30分，前梯队（驻营区及附近执行生产、勤务的部队）分乘85个列车（军的部分主要领导于2月15日乘飞机先期到达）、后梯队（家属、物资、留守人员）分乘26个列车于3月9日至29日顺利到达保定地区。在沈阳军区执行伐木任务的两个营（第338团2营和第339团2营）乘两个列车于4月归建。整个移防工作比较圆满，部队没有发生逃亡、人身死亡等重大事故”。“2月15日4时许，第38军受领移防预先号令，16日零时15分受领沈阳军区转北京军区‘部署调整’电令。18日19时12分先头部队——第334团1营乘火车离开通化。从下达预先号令，到第一列车发出，中间只有三天时间，特别是离开营区执行生产、训练、施工、执勤的部队，零星分散，交通不便，更为紧张。”<sup>[690]</sup>

陆军第一一二师，由通化市郊移防至保北地区。师部移驻新城县高碑店，原代号3073部队改4793部队。师长朱家礼，政委刘鸣鹤，副师长刘庆贤、丁纪元，副政委苗敬芬，参谋长陈向善，政治部主任姜国政。辖步兵第三三四团、第三三五团、第三三六团，坦克自行火炮第三一七团，炮兵第三九二团。

陆军第一一三师，由通化地区移防至保定地区中部。师部移驻满城县于家庄营房，原代号3079部队改4886部队。师长朱月华，政委孙玉山，副师长裴飞正、王向清、尚鸣鹤，副政委宋树仁，参谋长钱巨胜，政治部主任王宪升。所属步兵第三三七团、第三三九团移驻满城县；步兵第三三八团、坦克自行火炮第三一八团与炮兵第三九三团移驻望都县。军指示该师除抽调部分人员在军领导下参加省、地、市三支两军外，将高阳、清苑、完县、望都、博野等五个县的三支两军交给该师。

陆军第一一四师，由通化地区移防至保南地区。师部移驻定县，原代号3085部队改4891部队。师长李连秀，政委王丕礼，副师长张成招、李宝贵，副政委王志远，参谋长刘成斋，政治部主任陈培民。辖步兵第三四〇、第三四一、第三四二团，坦克自行火炮第三一九团，炮兵第三九四团。

保定市为河北省会<sup>[691]</sup>，又是辖22县1市的保定专区所在地。1月23日，由河北保定红色革命造反者联合总指挥部发起，一举夺取了省、地、市三级领导

【690】《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打印稿），页793。

【691】1950年代初，河北省会、省军区、六十九军军部同驻保定。1958年，省会、省军区搬至天津。1966年4月，中央酝酿天津为直辖市，河北省会、省军区再由天津回迁保定。

机关的党、政、财、文大权。驻保定的河北省军区及六十九军介入文化大革命之后，表面上肯定了这一夺权的大方向。

2月6日，反对“一二三夺权”的河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筹备委员会成立。参与“一二三夺权”的部分群众组织认为，该委员会得到了省军区及六十九军的幕后支持。

2月11日，省军区和六十九军经过秘密布置，突然宣布参与“一二三夺权”的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八一总部）为反动组织，出动了27个连队的兵力，在省、地、市三级公安机关及部分群众组织配合下，对拥有三万多人的八一总部予以武装取缔，逮捕了骨干分子1200余人，关入监狱238人。随后，又成立河北省保定地区彻底粉碎反革命组织指挥部，在全区城乡大张旗鼓地开展肃清八一总部流毒的活动，凡参加八一总部或与其关系密切者，都必须请罪认错，导致180多个大小群众组织连带被整肃。

三十八军抵达新驻地后，于2月24日奉命与省军区一起担负保定地区的支左任务，成立支地办公室。军党委分工，第一书记、军长李光军管支左，常委刘海清、邢泽辅之，并主管保定市支左，挡在第一线。第二书记、军政委王猛管军内，对外不出面。

介入保定地区支左之初，三十八军尚无一定之见。军党委曾要求参加支左人员对友军（省军区及六十九军）原先支持的所有群众组织，一律予以无保留的支持。惟自4月初“军委十条”发布之后，三十八军主张为八一总部平反，省军区却持不同意见，坚持八一总部是反动组织，不准平反。由此两军关系出现裂痕。与此同时，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导火线，保定造反派群众组织重新洗牌，组合成工总派（即农大造反派）和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两大派系，较稳健、保守的工筹派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省军区排挤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主动对新来乍到的三十八军示好，寻求支持。三十八军与河北原地方当权势力无任何牵连，在感情上亦倾向于工总派，与工总派一拍即合。

三十八军与省军区在支持谁的问题上各抒己见，渐行渐远，裂痕加深，终致水火不相容。与省军区倾向一致的北京军区，对三十八军颇有微词。保定两派也各恃有军队方面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于6月22-23日发生在保定市内的河北农业大学，两派近万人大规模混战，虽得三十八军和省军区赶至现场试图平息，但未能奏效，造成7人死亡，近300人受伤（其中部队数十人）。



为解决保定问题，8月，中央通知保定两派代表进京汇报。期间，两派代表与两军——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政委曾美，三十八军李光军、刘海清，签订了双方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武斗稍歇，惟两派矛盾未能根本消弭。<sup>【692】</sup>

三个野战军的调防，除军事意图外，当有更重要的政治考虑：1、将原为林彪麾下四野主力的三十八军（也是全军最精锐部队）调至保定，既是加强拱卫首都的兵力，威慑军队的其他“山头”，也显示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强化林“接班人”的地位；2、北京周边的部队，分别来自原四野、三野和华野等几个“山头”，互为犄角，也互相牵制。3、与原驻部队共同支左，以防止这些部队因驻扎时间久，与当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过分陷入地方派性。

---

【692】 马辉、曾美，1955年授衔少将。

# 第五章

1967·中：阴风怒号



### 第三十七节 青海：从“二二三事件”到省革委会成立

#### 一、军委关于“可开枪镇压”的内部规定

在1月28日“军委八条”公开颁布十天之后，2月9日，中央军委又内部颁布了林彪2月7日送审、毛泽东作过两次修改的《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全文如下：

各军区、各军兵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支持真正的（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已经遇到各种复杂情况，以至发生武装冲突事件（如新疆、内蒙）。因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徒手的群众，不管属于哪一派，都不能开枪。

（二）对徒手的保守派、右派、反革命派，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在必要时，可以逮捕他们的头目，但不要开枪。

（三）略

（四）对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确实查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和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开枪镇压。

（五）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

（六）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

以上规定，大部分要向全军指战员认真进行宣传教育。但第三条（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只能临战时下达，事先必须保密。<sup>〔693〕</sup>

【69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原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给林彪写信说：‘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我们把六条作为五条发出，第三条只在会议上念了一遍（发稿呈上），会后各军区请〔求〕将第三条单独发给他们再读一遍，以便掌握，我们已单独打印发给他们，说明看后收回（已经收回），请报主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并没有透露第三条具体内容。据王年一称，“1967年2月上旬，毛泽东对如何处理军队受冲击问题作了书面批示。大意是：绝不容许右派群众组织肆意冲击部队，但处置要妥当。首先要做说服工作；如果无效，他们硬要冲，可以放他们进来。他们占了一楼，部队可以退到二楼，继续做说服工作。如果他们强占二楼，部队可以退到三楼。如果他们以解放军的一再忍让为可欺，进一步强占三楼，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于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对大多数胁从者，则重在批评教育，仍可放他们回去。这个批示，林彪看过后转给了叶剑英，叶剑英在他主持的一个小型军委扩大会上作了传达。”（见《大动乱的年代》，页201-202。）此说似与规定第三条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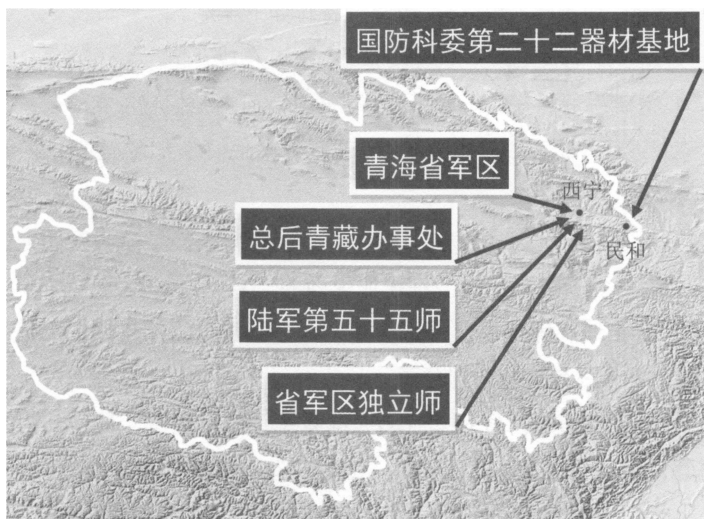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sup>[694]</sup>

上述规定虽然表面声言“不准任意开枪”，但其极端保密、特殊操作的第三条及内部半公开的第四条，实际上却开了一个在特殊情况下“可开枪镇压”的口子。在此背景之下，2月23日，青海西宁发生了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组织开枪、死伤高达三百多人的极其严重流血事件，史称“二二三事件”。

### 青海驻军分布图(1967-1968)



### 二、青海省军区内的“反革命政变”

1967年1月12日，在上海“一月风暴”感召下，青海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等二十七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接管了《青海日报》。次日，这些组织称：决定暂时封闭《青海日报》，在封闭期间，将以特刊形式印发新华社播发的重要新闻。

1月23日，中共中央等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据刘贤权夫人安绍杰后来主编的《刘贤权将军》一书称，“1月23日刘贤权主持召开了省军区常委会，学习中央决定以后，于下午6时，讨论确定支持左派群众的表态问题。一致通过支持‘八一八’群众组织，上报了兰州军区、党中央和军

【69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22-223。其中用黑体字排印部分，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委。可是这表态消息刚一公布时，就立即引起了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强烈反对，而且随即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激烈行为。当晚9时许，另一派造反者冲进省军区机关揪斗刘贤权，一下扒掉了他的帽徽领章。与此同时，省军区机关内部也出现混乱局面，一些人迎合军外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逼迫刘贤权和常委撤销军区常委的决定。这样一来，当地派性斗争的形势就更加激烈，局势更为混乱。为扭转这一局面，刘贤权于当夜零点再次召集常委紧急会议，商议举措，遂决定把支持一派群众改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sup>[695]</sup> 根据上文，支持八一八的表态，是刘贤权主持的常委会“一致通过”的。文中“另一派造反者”，应解读为八一八的对立面——保守派捍卫队。

文革后的青海省委，对这一天在省军区发生的事是另一说法：“1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之后，当天下午，刘贤权再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谁是左派问题，并进一步提出支持‘八一八’的七条理由，其中特别强调：‘八一八’既反省委又反王昭，应当支持。多数常委为避免造成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不同意刘的意见，而一致同意交机关干部讨论后再决定支持谁。”由于刘贤权的阴谋活动，造成了群众组织之间的严重对立。其他群众组织到军区质问刘贤权为什么不支持他们，群情激奋，形势极为混乱。省军区机关和驻军部队为了稳定局势和维护西宁驻军部队的团结，一致要求军区党委纠正刘贤权的支派分裂活动”<sup>[696]</sup>。根据该说法，多数常委不同意刘的意见。“其他群众组织”，应指保守派捍卫队，在1月23日这一天，在军区党委常委中最终未能形成多数。同时还受到军区其他干部的极力反对。

两种不同的说法，孰是孰非？

据查证，当时的省军区党委常委为：第一书记杨植霖（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王昭（省军区政委，省委第二书记兼），第三书记刘贤权（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军区司令员），副书记王文英（省军区副政委），常委曾征（副司令员）、赵永夫（副司令员）、刘斯起（副司令员）、吴士杰（副政委）<sup>[697]</sup>。杨植霖、王昭是省委领导兼职并已受到冲击不能与会，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常委至多六人。虽然刘的资历在与会者中是最老的，地位是最高的，但他的意见在常委中未能形成多数，常委中“一致通过支持‘八一八’群众组织”的说法，很值得

<sup>[695]</sup> 安绍杰：《刘贤权将军》，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页218、219。

<sup>[696]</sup> 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青海省档案馆：《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组织史资料》，1995年，页533。

<sup>[697]</sup> 刘贤权、曾征，1955年授衔少将。王文英，1964年晋升少将。赵永夫、刘斯起、吴士杰，1965年大校军衔。

怀疑，支持刘的似乎只有并非常委的副司令员张江霖<sup>[698]</sup>。支持保守派、在常委中地位、资历比刘贤权、曾征、王文英都低的校级军官赵永夫，却在实际过程中掌握了主导权。而这一现象也符合当时的一个普遍规律——在全国省一级地方军事机关中，支持保守派的力量占优势。像刘贤权这样支持造反派的省军区司令员，在全国确为凤毛麟角。

《刘贤权将军》一书接下来说：“从1月23日起，刘贤权的工作开始受到限制。在2月15日至3月8日这段时间里，刘贤权的行动就完全失去了自由。他这位老红军被造反派揪到军区机关批斗、毒打、隔离、武装看押、抄家受到羞辱”。<sup>[699]</sup>

以上过程，在3月24日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中，被定性为“反革命政变”。

### 三、青海日报社的枪声

1月29日，“八一八”宣告夺取了青海省委、省人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以及其他一切权力。该夺权并未得到中央的承认。

2月3日，以赵永夫为核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动用250多台军用车辆，进行“支持革命派，镇压反革命”的武装游行。公安机关同时将从八一八中逮捕的几名“反坏分子”，游街示众。

2月14日，赵永夫等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名义发布公告称：《青海日报》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歪曲事实，制造谣言，进行虚假的宣传报道，欺骗中央，欺骗青海省广大革命群众，对青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决定自即日起，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是日，部队包围了报社，要求报社中的造反派组织撤离，遭到拒绝，双方僵持九天九夜。

2月23日，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发布通令：“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sup>[700]</sup>及其所属组织。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

---

【698】 张江霖，1965年大校军衔。1967年8月-1977年6月任青海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成为青海省第二号人物，刘贤权调京后主持青海工作。1969年7月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1971年3月-1977年6月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1977年6月后与刘贤权一起在青海受到批判。1988年7月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699】 《刘贤权将军》，页219。文中的造反派，应解读为保守派。

【700】 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为青海八一八派除学生组织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外其他社会力量组成的另一主要组织。

时任兰州军区政委、与刘贤权观点相同的冼恒汉，后来在回忆录中称，赵永夫“于2月23日晨亲自指挥部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并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系统，还采取措施，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23日下午1时，赵永夫下令部队向阻拦的群众开枪，这样，一场流血惨案终于发生。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现场惨不忍睹。报社内惊恐的群众四处躲藏，没有死伤的抓到就投入监狱。”<sup>[701]</sup>

文革后官方编纂的资料则称：“2月23日，报社内外的人越来越多，在局势异常混乱的情况下，部队战士不慎枪支走火，误伤了自己的战士数人，误认为是占据报社的‘八一八造反派’先对外开枪射击，遂导致了部队开枪。部队现场指挥所的负责人虽未下令开枪，但在部队开枪后，没有采取果断制止措施，以至酿成‘二二三’流血事件（注：死伤群众347人，其中：亡169人，伤178人）。”<sup>[702]</sup>

冼恒汉说赵永夫下令开枪，文革后的青海官方称赵未下令开枪，又孰是孰非？

一位现场目击者（报社女工作人员）的回忆可能更客观一些：“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在军区政治部工作的一个熟人悄悄透信给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切勿再去报社，那里将有重大行动。我立即意识到即将发生流血事件。第二天清晨，也即1967年2月23日，我刚起床，就有一个同志神色仓皇地来我家告诉我，从北大街通向报社印刷厂（那时报社人都在印刷厂上班）的北门坡已经实行戒严，禁止人车通行。我急忙洗了把脸，随来人一起疾行至北门坡想看个究竟。在离北门坡大约还有50米的地方，就已感觉到气氛异常。坡上坡下布满了武装岗哨，战士们个个表情严肃，严密监视着周围动向。坡下通往报社的马路已被机枪严密封锁，除非有当时的特别通行证，否则，任何人休想通过。我和一些人只得站在坡头的封锁线外，挤在人群中踮脚翘首向下遥望。大约上午10点钟光景，报社方向忽然枪声大作，它告诉人们镇压行动确已开始了。我的心情不知为什么一下变得沉重起来。……我与‘造反派’虽格格不入，但他们中真正的坏人毕竟是极少数，尤其是那些数以千计的工人群众，他们中的大多数自以为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日夜守卫在报社。子弹无情，究竟打死了多少人，其中是否有我熟悉的？为了解确切情况，枪声一停，我便随着人流抄小路（小西门的城墙缺口）涌到报社印刷厂附近，这里正是多日来两军对垒的地方。我踮脚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一排排尸首倒卧在血泊之中，沾满血迹和尘埃的衣服、鞋、帽，散落得到处

<sup>[701]</sup> 冼恒汉：《风雨八十载——赵永夫事件》，最后访问：2014年6月29日。

<sup>[702]</sup>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组织史资料》，页124。



都是，有的挂在树梢上，有的飞到低矮的屋顶上。可以想见那些手无寸铁的‘造反派’，一旦看到子弹真的向自己射来时，是如何地惊慌失措。我万没想到和平时期斗争竟会如此残酷！”<sup>【703】</sup>

#### 四、叶剑英肯定了赵永夫的做法

冼恒汉在回忆录中称：

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二时，总参作战部打电话问及兰州军区青海西宁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军队、地方电话都打不进去？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西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便立即给青海打电话，根本打不进去。最后，只好通过兰州军区空军系统的电话才接通了青海省军区的电话。接电话的副政委王文英当时还不太了解情况，经他与赵永夫联系后，回话说：“西宁市‘八一八’群众组织发生武装暴乱，首先开枪打死打伤干部战士，军队为了自卫，实行了还击，现已平息暴乱。”

赵永夫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很快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编造假情况。晚八时许，有位军委领导给赵永夫直接打来电话，称赞“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赵永夫接电话后，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

24日上午，我和张达志电告青海，要省军区领导立即来兰州汇报，并派飞机将赵永夫、王文英及55师师长陈如意接来兰州。在汇报中，赵永夫表现非常狂妄，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事后我和张达志为了证实军委是否支持此事，曾立即向军委发电报请示确认，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sup>【704】</sup>

所谓“有位军委领导”，冼其实指的是叶剑英。叶剑英支持赵永夫的底气，则来自毛泽东作过两次修改的《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冼的说法从侧面证实，赵永夫与中央军委有着直接的联系。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兰州军区要赵永夫去汇报时，“赵永夫表现非常狂妄”。而赵永夫与北京的联系，一直以来是刻意绕开倾向于刘贤权的兰州军区的。赵永夫与军委的直接联系，在官方编纂并公开出版的《叶剑英年谱》中得到证实。该书1967年2月23日条目提及：“在电话中听取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关于对冲击《青海日报》的造反派的处理情况报告后，肯定了部队的做法。三月，中央

【703】 王秀明：《青海“赵永夫事件”亲历记》。《文史月刊》2001年第9期。

【704】 冼恒汉：《风雨八十载——赵永夫事件》。

文革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把是非完全颠倒过来，将赵永夫逮捕，并逼迫叶剑英多次检讨。”<sup>【705】</sup>

在2月23日以后一段短时间内，赵永夫仍然得到叶剑英等的肯定，并在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作过“经验介绍”。据安绍杰称，“到北京后，反革命分子赵永夫表了三天功，说：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他组织的，‘二二三’时他如何指挥，如何开枪……，什么功劳都是他的。中央作了记录和录音。”<sup>【706】</sup>

### 五、中央对青海问题重新进行调查

中央对青海问题的态度，在三月初发生了变化。洗恒汉在《风雨八十载——赵永夫事件》中称：“3月6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全副武装押送的。3月8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蒙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张江霖本人的回忆说法有所不同：“3月8日，刘贤权和我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第三天，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同志来看我们，一见面就说：‘你们受惊了，到北京就自由了，好好休息！’”<sup>【707】</sup>

刘贤权等到北京后的第三天，亦即3月11日，毛泽东、林彪分别批示，要求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缘由据说是听了中央文革的反映。据称，毛的批示是：“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sup>【708】</sup>3月13日、21日、23日及24日，中央有关负责人四次接见青海党、政、军有关领导及群众组织代表，以调查了解基本情况，其中又以以后两次规格最高，后两次，周恩来均出席。

在3月24日晚至25日凌晨2时半的会议上，在周恩来等的严厉质问之下，又再查清了“二二三事件”当天的一些细节：

#### 1. 谁决定武装镇压？

康生：你们的指挥部<sup>【709】</sup>什么时候成立的？

【705】《叶剑英年谱》下，页961。

【706】安绍杰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晚在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的讲话。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页44。

【707】《刘贤权将军》，页336。

【708】张云生：《林彪秘书回忆录》，香港：存真社，1988年，页74。

【709】指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

张晓川<sup>【710】</sup>：2月18日。（周恩来：嗯？）是1月18日。

康生：那天你讲的是刘司令员不能工作，不要组织指挥部，可现在你讲，1月18日就组织了。

周恩来：23日武装镇压，你参加了没有？联合指挥部讨论了？

张晓川：讨论通过了。

## 2. 现场谁指挥？

周恩来：谁指挥？

张晓川：用卫戍区司令部名义。

周恩来：现场上谁指挥？

张晓川：赵副司令员、陈师长。<sup>【711】</sup>

## 3. 报社内的“八一八”有没有枪支？

周恩来：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镇压时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永夫：……

周恩来：简单点，你的报告上都有。

赵永夫：以前了解有枪。

周恩来等：现场有没有？

赵永夫：……（回答文不对题）。

康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就说有、没有。

赵永夫：当时没搜出来。

……

周恩来：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没搜出来！（周愤怒地站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 4. 赵永夫有没有下令开枪及林彪有没有打电话给赵永夫？

赵永夫：不叫打，但管不住。（周恩来拍桌子，叶群、关锋等站了起来）

叶群：你还说林总来电，还感动得满脸热泪，什么时候给你来的电？

【710】 张晓川，1965年大校军衔。时任领率机关驻西宁的军级单位总后青藏办事处（代号后字205部队）副主任，联合指挥部成员。据康生了解，组织指挥部是张先找赵永夫及驻西宁的陆军第五十五师。

【711】 指赵永夫、青海省军区独立师师长陈明友。

赵永夫：我接电话，问是不是林副主席，对方说是。

叶群：林彪同志没有打电话！林彪同志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有接到电话。24号听到此事，毛主席、林总非常气愤，下令调查此事。<sup>【712】</sup>

叶群称林彪没有打电话，应是事实，电话是叶剑英打的。惟叶群以上所说的“24号”，似乎指的是2月24日，则很有疑问。在同一会议上，叶曾称，“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是你，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不知道？”这与安绍杰所称“到北京后，反革命赵永夫表了三天功”是相吻合的。如果毛、林在2月24日就下令调查，断不会出现赵永夫其后还到军以上干部会议介绍经验的情况。毛、林态度的转变，应该有一个过程。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已表达得很清楚，毛、林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是3月11日下达的，此距“二二三事件”发生足足已有十八天。

## 六、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直至3月25日凌晨2时25分才结束的第四次接见，最后由周恩来宣布结束调查，并即场宣布了青海问题的处理办法。处理办法能够即场宣读，可见中央（包括毛、林）在这一次会议前已形成了统一的框架性意见。周并命令北京卫戍区人员将被宣布隔离受审的赵永夫、隔离反省的张晓川、王昭三人押出会场。

周恩来宣布并于当天形成正式文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称：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

【712】中央首长接见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及原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和外地赴青红卫兵纪要（第四次），1967年3月24日11点35分到25日2点25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页4-15。

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 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〇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sup>[713]</sup>，二〇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 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 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五) 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六) 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七) 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sup>[714]</sup>

【713】 8061 部队，为陆军第五十五师的代号。8122 部队，为国防科委第二十二器材基地的代号。两部均驻青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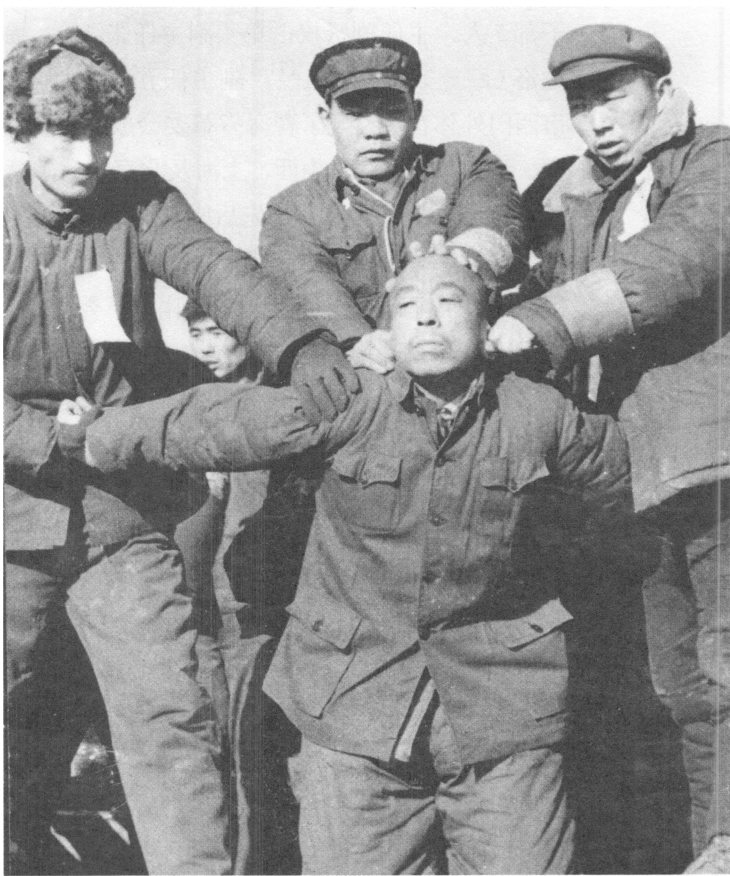
【714】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 年 5 月，页 319-324。文革结束后，对赵永夫的结论发生了极大变化。1978 年 8 月 13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称：“一九六七年二月，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工作中，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执行中央、中央军委的规定，将青海革命群众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四十七人（亡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的严重事件，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造成‘二二三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联办’领导小组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和武装夺占报社的错误决定与行动”，“赵永夫同志身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联办’副组长，积极参与了夺占报社的策划，并且是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对此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处理意见》不公平地将“二二三事件”的责任分了相当一部分给刘贤权：“刘贤权同志进行支派分裂活动，致使‘八一八’群众组织与西宁驻军严重对立，这与‘二二三事件’的发生，也有重要关系。刘贤权同志对这一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中央、军委在转发总政《处理意见》

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发布后，青海“二二三事件”各方胜负底定。毛、林对青海事件的态度转变，促成了对军队开枪镇压权的检讨，亦促成了4月6日“军委十条”的产生。

### 七、从军管到省革委会成立

中共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提出，“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3月28日，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发表第一号公告称，“现已组成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并开始工作，自即日起对青海省实行军事管制。”公告最后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联合指挥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联合指挥部’是非法机构，立即予以撤销。对青海省重要目标的军事管制，一律归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筹备委员会领导。”

4月3日，青海省军管会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正式成立。省军管会由七人组成，刘贤权任主任，张江霖、曾征、王文英、徐肇基、陆敬轩、姚书梅任委员。<sup>[715]</sup>



批斗王昭，1967年。

的通知中称，同意总政《处理意见》的请示，并称：“‘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

【715】徐肇基，时任陆军第五十五师政委。陆敬轩，时任总后青藏办事处主任。姚书梅，时任国防科委第二十二器材基地政委。徐肇基、陆敬轩、姚书梅，1965年大校军衔。

青海时辖1市6自治州。5月间，经省军管会批准，全部实行军事管制。西宁市军管会主任由省军区独立师副师长呼占山担任；玉树州军管会主任由玉树军分区司令员王干担任；果洛州军管会主任由果洛军分区司令员孙立明担任；海北州军管会主任由海北军分区司令员王其法担任；海西州军管会主任由海西军分区司令员莲金海<sup>[716]</sup>担任；海南州军管会主任由海南军分区副政委王星朗担任；黄南州军管会主任由黄南军分区司令员周龙担任。<sup>[717]</sup>

青海省军管会成立四个月后，8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青海省革委会常委、主任、副主任名单。常委24名（暂缺1名）、其中军队干部8人，群众代表8人，干部7人。主任刘贤权，第一副主任张江霖，副主任刘明乾、马集文、王中山、达洛（藏族）、薛宏福。<sup>[718]</sup>副主任五人均为群众及干部代表。8月12日，在西宁市西门外体育场召开了青海省革委会成立和庆祝大会。青海成为继中央承认的山西、贵州、黑龙江、山西、上海及北京之后，第七个成立的省级革委会。

随后，全省1市6州先后成立了革委会。11月6日，海北州革委会成立，主任为海北军分区副司令员邵云。11月17日，西宁市革委会成立，主任为新任省军区副司令员王干。11月21日，海南州革委会成立，主任为海南军分区政委贾彪。11月28日，玉树州革委会成立，主任为玉树军分区副政委段怀瑜。11月30日，黄南州革委会成立，主任为黄南军分区司令员周龙。12月26日，果洛州革委会成立，主任为果洛军分区副司令员杜炳光。1968年3月13日，海西州革委会成立，主任为海西军分区政委徐光宗。<sup>[719]</sup>全省1市6州革委会第一把手，全部为省军区系统的现役军人。

最后，说一下“二二三事件”后闻名全国的刘贤权。

刘贤权是出身自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四野系的高级将领。自文革前期至“九一三事件”之前，这一谱系的将领普遍受到青睐重用，刘贤权自不例外。

早于1967年4月，中央就有意调刘贤权到比青海更重要的内蒙，担任改组后降格为省级军区的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并决定“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sup>[720]</sup>后因青海工作繁重，中央不得不改变了此一业已形成正式文件的调动安排。

【716】 莲金海，1965年大校军衔。

【717】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组织史资料》，页129-148，页432。

【718】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组织史资料》，页397-399。

【719】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组织史资料》，页424-437。

【720】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1967年4月13日。

青海省革委会成立，青海局势得以平定之后。刘贤权的人生舞台很快就突破了偏远的西北一隅。1968年2月26日，奉周恩来、叶剑英指示，杨成武签发军委办事组《任命刘贤权同志为军委办事组政工小组副组长》的报告，呈军委批示。<sup>【721】</sup>待刘贤权于3月28日抵京赴任时，已发生“杨余傅事件”，政工小组随之无疾而终。据说，毛泽东指名刘贤权不必再回青海，留京参加军委办事组工作。<sup>【722】</sup>王年一也说，“1968年3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主席问办事组现有哪几个人，黄永胜等回答后，毛主席说：还可以增加刘贤权。政工小组可以考虑取消。”<sup>【723】</sup>惟不知为什么毛的这一“最高指示”并没有落实，刘贤权并没有即时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8月，经周恩来提名，任命其为铁道兵政委，随后任铁道兵党委第一书记。1969年4月，刘贤权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又任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5月，转任铁道兵司令员。

刘贤权离开西宁后，仍一直兼任青海省革委会主任（日常工作交张江霖主持）。1971年3月，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1970年4月起，又兼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文革期间，像刘贤权这样长期身兼军队、地方多项重要职务的情况，甚为罕见。

1971年10月“九一三事件”后，军委办事组撤销，组成军委办公会议，刘贤权所幸未受“九一三事件”牵连，仍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1975年4月邓小平、叶剑英主军时期，刘贤权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由大军区正职降为副职。文革结束后，其在青海、军委办事组及铁道兵时期的表现均受到审查，与张江霖一同在青海成为负面人物受到批判。1977年12月至1982年6月，退二线任济南军区顾问。作为1955年即被授予少将军衔的红军老战士，刘贤权出乎意料地在1988年没有任何授予红星勋章的记录。1992年6月15日，病逝于济南，享年77岁。

---

【721】《杨成武年谱》，页479。

【722】《刘贤权将军》，页222。

【723】《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



## 第三十八节 军以上干部会议

### 一、与会者为清一色的陆军军级干部

1967年春，为提高军队高级干部对文革和两条路线斗争认识，解决军队介入文革后遇到的思想和现实问题，军委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又称军级干部会议），会期为2月26日至3月25日一个月时间。<sup>【724】</sup>

据参加会议的陆军第六十七军副政委王金泉后来回忆称：

解放军刚刚介入“文化大革命”，2月中旬军区突然通知：军政各一去北京开会，军长或政委必须参加一人。明天直去北京，有人接站。军研究陈继德政委已去紧张的一线支左，很难脱身，确定李水清军长和我与会。

来到北京住京西宾馆。此次与会者既无各大区首长或机关人员，也没有海、空军、省军区系统的干部，清一色的陆军军一级。福州、南京、济南所属的9个军编为一个大组，我们济南军区三个军6个人是其中的一个小组。多数都是军长加一副政委或政治部副主任。

首次会上，叶剑英元帅讲，这是个临时决定召开的会议，主席决定解放军介入“文革”后，有的军提意见，怎么搞法请中央讲讲，开个短会，几天之后你们即可回去。你们可以先座谈，有哪些情况需反映，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把话说完。会间叶帅特别提问“青海的来了吗？”没人回答，叶帅自言自语说“他们打了一仗。”我有点糊涂，也听不明白是说什么。后来青海来了人，就住在十楼我的对门房间，叫赵永夫，是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特指到会的。有人私下向我们传说，他们与8.18组织打了一仗，死了一些人。不时有人到赵的房间看看。我也进去看过，他带来几面别满了各式各样毛主席像章的红旗，解释说，是革命组织群众赠给的，是对他的行动表示支持。

我们先是开大组会，各讲各地区的情况，说自己的问题。有的提问什么时候恢复党组织的活动？有的主要领导自杀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识别左派、如何支持夺权？怎么搞军管、是否可能犯工作组的错误？怎么训练红卫兵？工业、农业怎么支？有的单位情况讲得细，说地方很乱，造反派互斗，其中很多流氓等等。每天是开会听发言、看简报，几天过去大组会发言的少了，又转成小组会。

……

---

【724】《叶剑英年谱》下，页961。

一直到3月7日，总政治部萧华主任又讲了一次会议的开法，他说，昨晚军委、中央文革研究了一下会议如何开，时间还需要一周，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中心是解决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这个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伯达、康生负责。第二个问题是支工支农和军管问题，周总理负责。第三是对大专院校军训和军队本身的建设问题，叶帅负责。最后是林副主席讲话，毛主席接见。会议是座谈的方式，提问题回答问题。你们出来时间比较长了，有事可打电话回去，要安心开会、个别问题个别解决，如内蒙、青海、新疆问题，已调来北京解决。有重大问题也可以个别直接谈。从简报上看，消极方面的东西多，座谈时要实事求是。“文革”的收获，红卫兵的伟大功绩看得少，中央要交代这方面的情况，交代政策。昨晚决定大家再看几个文件，领会精神实质。

从8日开始，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陈伯达、康生等，每人都先后讲了两次，说是座谈，可是没一个人报名发言。每次会议都是叶帅主持，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都到会，有时还插话，补充几句道理或举个实例。

总理并没有提纲，看来是即席讲话，把他着急的几个事情讲给大家听。

总理又说，工业生产、农业生产，解放军一管有好转，现在在主席领导和副主席协助下，解放军几乎负责一切了。在党政机关里也要军训、军管。省军区系统可抓农业，野战军抓工业，要认真抓生产，业余时间去开会去争论，辩论不要在生产时间搞。解放军去宣传就很有作用。不能对各省都搞军管，还是要推动三结合，当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民主，之后如何建立新秩序。有困难、有办法，经验要交流，你们可以打电话回去，情况反映回来再讨论，要注意主席的批示。这个会不开则已，一开就长了，还得开十天。

3月13日，总理作了第二次讲话，他系统地讲了军管问题。……

……

总理每次讲话或先或后是李富春讲。看来他俩讲的内容是配套的，都是生产，李富春讲得更细，有各方面很多的数字或实例，关于农、工、财、贸、交通运输、科技应解决些什么问题，说得很细，他还说现在指挥失灵，一切都托付解放军去办了。<sup>【725】</sup>

【725】 王金泉：《经历与见闻》，自印本，页291-296。王金泉，时任陆军第六十七军副政委，1968年1月升任军政委，1975年6月后历任济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1965年大校军衔。

## 二、康生、陈伯达讲话

3月9、10日，康生、陈伯达每人讲两次，讲了两天。叶剑英主持会议，他说，用座谈方式，有什么认识提出来。

3月9日，康生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1966年5月同阿尔巴尼亚谢胡的谈话和1967年2月同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的谈话。在后一个谈话里，毛称，“我们过去只抓了个别问题，个别人物。五三年冬到五四年斗了高、饶，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已是知道的，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个形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解决了罗，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广播了，八月红卫兵出现，发动了群众。去年聂元梓写的一张大字报，当时我在杭州，一天中午我看到了这张大字报，我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广播这张大字报，这样，大字报就满天飞了。清华、北大两附中写了两件材料，我看了，八一我写了一封信给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红卫兵大搞起来，八一八我接见了八十万红卫兵，接着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我写了一张二百多字的大字报，就从中央到地方，一些负责人反对学生运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搞白色恐怖，这样才揭发了刘、邓的问题。现在双方决战还未解决，今年三、四月可能看出眉目，解决问题可能到明年三、四月份，也可能更长一些时间。”<sup>【726】</sup>

同日，陈伯达在会议上讲话，谈刘少奇问题，附带谈了彭真的问题。陈伯达称：

1964年刘少奇作了一个公开报告，反对毛主席。这个报告落到我们手里，把他反对毛主席的东西砍了，他就不让发了。他说：“这个报告修改后，有些地方还要斟酌。”这个报告讲毛主席提出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他对这个问题很强调，说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如不按他说的蹲点方法去做，按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去做，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支部书记，不能当干部。他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改组干部队伍，改组党中央。他说的蹲点，是王光美式的蹲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蹲点，没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蹲点是毛主席提倡的，不是刘少奇提倡的。毛主席提倡的蹲点是阶级分析的蹲点，

---

【726】《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1967年9月，页1-2。

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是调查研究的蹲点。刘少奇抓住蹲点这个问题，就是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刘少奇的这种观点，不是1964年开始的，也不是1962年开始的。大家知道，日本投降以后，他就提出有名的“理论”——和平民主新阶段，提出共产党员要当“红色买办”，不是当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买办，而是要当帝国主义的买办。那时候刘少奇是完全悲观的，对中国革命是绝望的。对中国的前途是绝望的。他要投奔另一条当美国买办的道路。刘少奇的这些东西被毛主席否定了，毛主席对他进行了教导，要他执行七大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全中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完全违背刘少奇的意志的。<sup>【727】</sup>

第二天，3月10日，陈伯达在会议上讲述邓小平问题。陈称，“昨天讲了刘少奇的问题，下面再把邓小平的问题讲一下。邓小平每次开会，基本节目就是打牌，每次开会都要打。有人找他谈话，他没时间，还要陪他打牌，成了个很大的负担。不陪不行，他是总书记，陪了又耽误时间。很多同志有议论，总书记带头打牌，每天都打，还打通宵。我想打牌这个风气传下去很不好。影响到小孩子也打牌，打扑克。下面地、县也打，各系统、各部门也打，形成了一个风气。在乡下不是一般的打牌，有的还赌钱。总书记打牌，下面不好说，就传开了，这决不是小事，作为总书记，有这样的作风，影响很不好。有时间为什么不找干部谈谈话，学习毛主席著作，接见群众。他找萧华谈话，不好好谈，谈几句就算了。（萧华：每次我去汇报情况，都是三言两语，卡住时间，所以我到他那里汇报最容易。）从这个小事，可以看到他的大的方面。……刘少奇同邓小平是有个人矛盾的，但在大的方面站在一个立场上。他们共同的阶级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共同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4年冬1965年春，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二十三条时，毛主席批评刘少奇，不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批评邓小平搞独立王国。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独立王国，就走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去了，这次会议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的个人矛盾就抛到后边去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同性就突出来了。”<sup>【728】</sup>

同日，康生在会议上讲述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文革必要性、两条路线斗争及“三结合”等四个问题。

【727】《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页6。

【728】《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页8-10。

## 二、萧华对刘邓问题表态

与会者讨论了几天。随后，萧华、杨成武在会议上相继讲话，代表军队对刘、邓和彭、罗、陆、杨问题明确表态。

3月17日，萧华在会议上论及加强文革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问题时称，“在当前斗争的主要矛头应该对准刘、邓，一定要把刘、邓批深批透。”

萧华称：

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长期地、一贯地抵制和反对毛泽东思想，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要用具体的事实来进行揭发和批判，尤其要结合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践来进行批判。要通过对部队的教育，剥掉刘邓的画皮，使广大干部、战士认清他们的真面目。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康生同志的讲话，已经揭发了很多，他们讲的很清楚了。特别是关于刘少奇的问题，讲的更系统。这里，我只把刘少奇的问题概括地说一下。

刘少奇在民主革命时期，一再推行投降资产阶级的路线。远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就大肆宣传活命哲学，叛徒哲学，指使某些被捕的“共产党员”投降阶级敌人。以后，又把他们包庇下来，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让他们窃踞要职。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准备向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屈膝投降。全国解放，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他拼命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一九四九年，他提出欢迎资本家剥削，发展资本主义，一九五〇年，他把卖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称之为“爱国主义”的，他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富农，反对变工队、互助组，反对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叫嚷“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提倡“四大民主”。后来，他又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一九五六年，他迎合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大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九六二年，他大刮单干风，鼓吹什么“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同时，大量印发他的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修养》。一九六四年，他执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长期以来，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

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最大的代表人物，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我再补充几点：

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恶毒地诬蔑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是“把个人神化。”对于林副主席领导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攻击说：“有人搞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像是捞资本”，并咒骂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形式主义”、“庸俗化”。

他长期以来支持刘少奇，并和刘少奇一起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在三年经济困难时，他同刘少奇一起刮黑风，搞“三自一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一同提出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路线。

他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时，把书记处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对毛主席实行封锁，不请示，不报告。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他，他不仅不改，反而心怀不满，变本加厉。刘邓在中央许多部门，在我们党的重要岗位上，安置了许多叛徒，许多坏人。旧中宣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部；旧中央组织部被叛徒控制了，几任部长，如饶漱石、习仲勋、安子文，都是叛徒。

他包庇篡军反党野心家罗瑞卿。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揭发罗瑞卿的错误。上海会议以后，去年三月又在北京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工作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邓小平的态度一直是保护罗瑞卿的，包庇罗瑞卿的。上海开会，他说：“我不知道啊，怎么一下子到这里来，开什么会呀，我们不清楚呀。”他在会上像个审判官一样。上海会议以后，邓的老婆还跑到罗瑞卿的老婆屋里，相抱大哭一场。在北京斗争罗瑞卿的会议，中央指定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彭真，一个是叶剑英同志组织三人小组。我和谢富治同志、杨成武同志几个人叫做工作小组，主持这个会议。会议开始之后，邓小平就跑到西北去了，彭真就跑到成都去了，和李井泉去挂钩，去部署。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要写一个结论，我们是经过仔细核对的，凡是有一点不合乎事实的，凡是过不得硬的，一件件都勾掉了，剩下的都是根据确凿，性质严重的。可是邓小平、彭真还包庇他，许多问题不准写，不准写罗对四个第一的造谣诬蔑，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等的不正常关系，不准写罗向地方伸手的问题，不准写罗恶毒诽谤主席的具体事例，不准写罗做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和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罗瑞卿回家对地主祖坟三鞠躬，也不准写，因为彭真回家也给地主祖坟行

了三鞠躬礼。所以，斗争罗瑞卿、以后斗争彭真，实际上是打在彭罗的身上，痛在刘邓的心上。刘邓就是彭、罗、陆、杨的后台，就是他们的祖师爷。【729】

王金泉回忆称：

萧华主任讲完后，军队文革组长徐向前元帅接着说，我见缝插针讲一讲，我没稿，讲点意见供参考。萧华讲得很系统，周总理作了指示，陈伯达、康生讲得很多很好。这个会比上次大军区级会议开得好，解决问题细透。“文革”不搞不行，刘、邓不打倒不行，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们到处安插自己的人，组织自己的势力，中央组织部、北京市水泼不进，派去的人也被人家改造了。刘少奇说，党内有斗争你们军队不要干预。军队也有斗争，罗瑞卿攻击林总，最低要气死你。军队不要组织战斗组到处冲。当然冲一下也有好处。院校主要是教员队伍，过去光搞技术不抓毛泽东思想学习，文艺团体最厉害，解放军艺院300多人打架打遍全国，在福州总发作，到军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抓住戴高帽子、斗一顿，引地方组织冲军队，军队两条路线斗争是激烈的。有人说，党内斗争你们军队别插手。因为林总主持军队工作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安子文想插手军队，进不来，历史上王明到中央苏区是篡军的，张国焘抓了军队，高岗也想抓。支左要调查不能急，不能随便表态。有坏人把头头拘留起来，不要乱抓人，不要靠逮人吃饭，逮头目是为了孤坏人解放群众，更不要随便给某群众组织戴反革命帽子，解散群众组织更要慎重。你们过去请示要解散某个组织，说它是反革命，我们只好置之不理，理了就要犯错误。只由你们调查研究根据情况搞。要教育子女，‘联动’主要是高干子女，活动猖獗，你们在抗战开始结婚的老婆有文化，大部分家庭出身是大地主中地主，过去穷人念不了书，不要让老婆拉着走，和平共居。政治上要帮助。3月份机关四大停下来是军委研究的，主席和林总批准了。院校团、师干部还搞武斗，有坐在某派一边寻求保护的蠢人。抽干部去支左，去前要整风、要学习。【730】

### 三、杨成武对刘邓和彭罗陆杨问题表态

3月19日，杨成武在会议上讲述“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罪行，以及彻底肃清他们对我军恶劣影响的问

【729】《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页44-47。

【730】《经历与见闻》，页299-300。

题”。杨成武在讲话开头称，“这次会议是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召开的，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这次会议非常重要，要解决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会议开的很好，是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训练班。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富春同志、徐副主席和萧主任已经作了指示。聂、叶副主席也要作指示，林副主席还要作重要指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还要接见到会的同志，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731】

杨成武称：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就是结成一伙来夺权，要夺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权。实际上，刘、邓就是他们的后台。如果没有刘、邓的支持，他们是不敢这样嚣张，这样疯狂的。

我们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绝不能低估。如果让他们阴谋得逞，那就会千百万人的人头落地，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世界革命的胜利就会推迟不知多少年。

他们都有一套假象，很能迷惑人。他们的反动思想有一定的市场。替他们吹喇叭，抬轿子的人大有人在，把他们揪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必须彻底地剥光他们的画皮，彻底地清算他们的罪行，彻底地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

去年以来，各军种、兵种、各军区和总部连续发生了反党分子跳出来夺权的事件。如空军的，工程兵的，通信兵的，还有二炮的，沈阳军区的，总参谋部的，总政治部的，等等。这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军内的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很尖锐的。我们总参谋部，就有王尚荣、雷英夫，疯狂的跳出来，要夺权。工程兵有谭友林，二炮有宋烈，空军有成钧、刘震等人。沈阳军区也有。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是有后台的。对这些事件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后台是什么人，不说自明。所以必须提高警惕，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

罗瑞卿是他们的急先锋，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急先锋。

罗瑞卿的罪恶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在毛主席健在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明目张胆地向党伸手，疯狂地篡军反党，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主要表现在：1、封锁林副主席。2、造谣、诬蔑、诽谤林副主席，挑拨林副主席和毛主席以及

【731】《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页57。



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3、向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出难题，百般折磨林副主席。4、公开向党伸手，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

罗瑞卿的问题，林副主席早就觉察了。林副主席为了挽救他，几年来，正式地对他进行过六次批评、教育。他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林副主席要他通气，非常严肃地、语重心长地教育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一百年不来我这里，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既然担任国防部长，一点情况不了解怎么办？耽误了工作我要负责的。而罗瑞卿仍然实行封锁，就连大比武这一件大事情，他都不报告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军委。这个大比武，是在南京决定的，毛主席不知道，林副主席不知道，军委不知道。叶副主席是主管训练工作的，也不知道。是他擅自决定的。许多重大的事情，他不但自己不去请示、报告，而且不准别人去请示、报告，谁去林副主席那里报告了，请示了，他就训斥、打击谁。

今天在座的李作鹏同志就是挨了打的一个。他就告诉李作鹏同志，你以后不许到林总那里去。一九六五年五月初。我和罗瑞卿到上海去，林副主席又当面批评了他，又一次说他不通气，要他通气，并且当面给他规定了五条，那五条可具体哩！可是罗还是顽固不改。<sup>【732】</sup>

杨成武又称：

林副主席已经看透了罗瑞卿已不可挽救了，加上当时又发现了杨尚昆的问题。这个时候，林副主席才向毛主席报告处理罗的问题。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召开上海会议，揭罗的盖子。

毛主席对罗的问题早有察觉。毛主席几次在谈到罗的问题时，曾经这样说过：罗的思想问题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不懂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个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搞几个人在一起。

毛主席把罗瑞卿看穿了。<sup>【733】</sup>

在谈到刘、邓问题时，杨成武称：

【732】《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页57-59。

【733】《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页62。

刘少奇在历史上是老犯机会主义错误的。解放战争初期，他就发表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对当时的对敌斗争起了极坏的作用。每一个纵队砍掉一个旅，是同他的错误分不开的。当时晋察冀边区就吃了他的大亏。晋察冀的不少同志提起这件事就有气。在当时敌我斗争那样严重的情况下，他不是加强战备，而是搞“精兵裁军”，这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思想的。以后有土地会议的形“左”而实右，村村点火，家家冒烟，扫地出门，“搬石头”。进城以后，同天津的资本家的谈话，以后接着反对合作化，刮单干风，一九六二年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七千人大会上他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又一次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大吹王光美，到处做报告。一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他都是反对毛主席的，和毛主席唱反调的。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大毒草，是欺人之谈，流毒很广，必须彻底批判。他自以为了不起，和毛主席平起平坐的呀！每年国庆报纸上登照片都是登两个。他的照片和毛主席的一般大，替他抬轿子、吹喇叭的有的是。

再看看邓小平。

邓小平更是百般包庇罗。在上海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他就讲：“请军队与地方的负责同志来，不是来作一个决议，而是审查材料够不够，对的不对的、有出入的都可以提。林彪同志很重视这个问题，向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不三不四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在小组会议上公开说：“关于罗伸手问题，林彪同志说有，罗说没有，×××已死，死无对证”。他是不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是相信罗瑞卿的。他别有用心地用“死无对证”来否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及其他同志提出的铁证。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又向刘伯承同志、叶剑英同志讲罗的伸手问题是“死无对证”。

这些事情今天在座的同志可能不清楚，所以要讲一讲。画皮不剥开，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上海会议后罗瑞卿回到北京以前，有一天下午，总理和邓小平去同罗瑞卿谈话。邓小平带着他的老婆一起去看罗瑞卿老婆。她一上楼梯就大哭特哭，痛哭流涕，哭得一塌糊涂。把警卫员、副官都弄得莫明其妙，问是怎么一回事。她上楼后，房子都没有走对，警卫员给了她手巾，擦完了眼泪，就钻到罗瑞卿老婆的房子里，关着门又大哭特哭。你们看一看嘛，这是什么感情！他们是有他们的阶级感情的。（萧华：郝治平的家庭是个恶霸地主，邓小平的老婆是宣威火腿总经理的女儿。）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观人先观其友。罗瑞卿回

到北京后，一直到他跳楼自杀（未遂，因他跳冰棍，如果他不是跳冰棍，脑袋冲下来就摔死了，他那是吓唬人的，不是真的想死），整整三个月，不仅不检讨错误，而且还狡辩。现在很清楚了，这是因为邓小平、彭真这些人在支持他。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中央召开工作小组会议批判罗瑞卿，邓小平在这个会议开场的时候（因为他是三人小组的组长嘛，三人小组里一个邓小平，一个彭真，一个叶剑英副主席），当着罗瑞卿的面说了这么一段话：“罗总觉得冤枉，有委屈，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不同意就不同意，我们党从来不强迫人承认错误。”实际上他是告诉罗不要承认错误，我支持你。他是领导小组的组长，可是会议开始两三天后，他就借故到西北去了，留下他的打手彭真跟叶剑英同志捣乱，以后连彭真也跑到成都活动去了。直到会议结束前一两天，在总理的催促下，他们才回来。回来以后，邓小平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又作了一个结论性的讲话，他对罗瑞卿跳楼自杀十分惋惜。他说：“他为什么自杀呢？如果你罗瑞卿认为你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坚持呢？还有揭发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嘛！彭德怀实际上已经作了结论，他写了几万言书，企图翻案，现在还分配工作。”“允许保留，党中央有这一条，你罗瑞卿为什么要自杀呢？”<sup>【734】</sup>

王金泉回忆称：

杨成武代总长讲完，聂荣臻元帅说，我没想讲，还有时间，话别人都说了，我没稿子，你们也别记，可以减轻我的负担。他说，刘少奇问题不是我高明，当年分二线时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此人有偏爱，主席决定了，我服从。林彪同志做接班人有伟大政治历史意义，有世界意义。军队罗瑞卿也不是他一个人，有后台，要向你们打个招呼，后台是谁呢？是贺龙。他们一唱一和，此人根本没改造好，到党内还是那一套，凶得很，讲话即骂人。（萧华插话说贺）不读报不学毛著，只会骂人，根本不能打仗，打过什么仗。军队的同志们要谨防被黑手抓住，不然你下不了台。刘、邓抓军队就是通过贺、罗。“文化大革命”军队要正面教育，不搞大字报，要民主整风这是过去的传统，要了解干部正确使用干部，入越作战的要重视，越南作战飞机比朝鲜还多。我是搞装备的，搞得不好。搞装备也是有斗争过程的，前期彭德怀、黄克诚为代表，后来是贺龙为代表，还有过其他人干扰。1959年前只是搞仿制、装配，有人说仿造几千架即可有制空权。仿制实际上是不前进的观点，再加苏修卡我们，海

【734】《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页66-68。

空军装备研制，耽误了2至5年。1956年毛主席就说独立自主搞自己的，要搞原子弹。彭、黄却宣传说，你打你的原子弹，我吃我的山药蛋。工业部门不支持，不相信自己可以搞出来，有人说是好高骛远脱离实际。1959年新科委成立，1964年原子弹成功爆炸，毛主席说感谢赫鲁晓夫，给他发勋章。我们宁可少养军队，抓了基础条件，材料、仪器、精密技术，两万多种材料，九大设备，计算机我们现在达到100万次/秒，比苏修的先进。赫鲁晓夫撕合同好，把我们逼上梁山。主席说要努力奋斗，敌有我有，敌无我也要有。告诉你们氢弹我们很快就有了（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林总指示：两弹第一，导弹第一。我们打算今后组织爆炸试验时，组织你们军师干部去看看。【735】

#### 四、林彪谈青海问题

3月20日，林彪在会议上讲话。林彪称，“我今天要讲三个问题。第一，讲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第二，讲主流、支流的问题；第三，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林彪的讲话记录稿于3月30日送毛泽东审阅，毛当日批示称，“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播放林彪这个讲话录音的通知。4月24日，中央印发了林彪的这个讲话。【736】

王金泉回忆称：

21日我们讨论，大家发言都颂扬林副主席不愧为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讲话内容深刻，看得远想得周到。对红卫兵摘制林语录一事表明非常谦虚、谨慎。

21号晚上9点以后，我们集合乘车去人民大会堂，说是毛主席接见，这是大家久盼的时刻。我们进入东大厅，背南面北照相队形已设计好。第一排座椅虽没贴着名字，一看就明白。因不是按号入位，我们这些人虽然都是些军领导职务的同志，年龄也不算小了，都像青少年一样抢占中间，尽量向中间挤，我的两边本已有人，65军长成少甫觉得空隙尚可，也插了进来，我们肩靠肩，臂好像没地方放了。有的同志一面挤，还颇有趣味地说，“今天我不能把方便让给别人”，现在的“私”心不能克服了。逗得同志们发笑。人们都理解他是出于对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热爱、忠诚、信仰和崇

【735】《经历与见闻》，页301-302。

【736】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00-302。

拜，一定要靠近些。元帅们逐渐地到场了，富春、康生等也到了，他们在前排择位入座。我们面向北站好，正前方这个东大厅的北端是一个大型屏风。此刻尽北头林副主席、周总理由东向西走出来，大家心情无比喜悦，忽然看见林彪副主席举手向屏风后边敬礼，头脑简单的我正想林彪这是为什么？高大健康的毛主席从屏风后边走出来了。大家沸腾起来，热烈鼓掌。主席向大家招手微笑，好像是在说，你们会议开得很好。此时叶帅照顾队形，表示大家安定，他喊，吴司令下来嘛，吴也可能是为了表示谦虚，把方便让给别人。在后排西角站着不动，叶帅再喊，毛主席问，哪个司令。有人回答是吴法宪空军司令。毛主席顺口说了一句下来嘛。大约10点开始照相，叶帅一看只有一个空位，在主席左侧。因毛主席就座时，林彪靠主席坐在右侧，周总理又坐在林的右侧。叶帅要与总理换位拉总理到毛主席左侧空位就坐，总理未动。总理说，你坐吧，今天是军队的会议。摄影机停转后，毛主席站起来向大家招手，缓缓向屏风方向走去。此刻军委办公厅的路扬主任领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林彪的夫人叶群也不失时机地喊起来。

讨论中不少同志说，主席70多岁，红光满面步履稳健，眼不花耳不聋，这是中国人民的幸福，是对帝、修、反及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威慑。

3月22日，叶帅讲话。此时，他是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人，是对此次会议的总结，讲话内容广泛，时间较长。会议要结束了。他首先说，我是在林总指示之后发言，与同志们一样是表示自己的意见体会、看法，没法律根据，这是我今天讲话的态度。

叶帅说，建国17年来，专门召集军级干部开会，这是第一次，过去都是捎带一下，这次是专门抓军级。“文化大革命”到了新阶段大联合、三结合、大夺权，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特别是工业生产有些问题，春耕季节，地方机构有些瘫痪，军队要参加进去时召你们来开会，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会议很重视。军委的同志、“文革”的同志全部看了会议的简报，根据反映的问题作了重要的发言。总理、富春对支工、支农、军管作了指示。康生、伯达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徐帅、聂帅对军队的路线斗争问题，萧华主任对军队政治工作、杨成武代总长还讲到了斗争的经过。同志们了解到很多情况，帮助同志们解决了很多认识问题，说明问题不是从今天开始而是早就存在。我们副统帅昨天作了重要指示，伟大统帅接见了我们。

……

叶帅最后还再三嘱托，三支责无旁贷，一定要调查研究，谦虚谨慎，群众路线，情况不明不表态，错了立即改，一定要支持左派，贯彻干部政策。不要轻易开枪，决不打第一枪。根本问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作好样子，并要求把会议精神尽快传达下去。

我们正要离京，又得到通知暂不返队，并把刚发下来的与会人员同主席的合影收回，说经过处理再发。这几天没集体活动，就翻阅和整理我已经记完了的两个笔记本。

.....

25日早晨我刚洗漱完毕，到走廊里散步。服务员问我，半夜抓走一个人你听见了吗？我奇怪地问她在哪抓的。她答，就是你对过住的那个，卫戍区来人把他逮走了，把手都铐起来了。抓走的就是赵永夫，很快传开。说青海省军区司令也到京西宾馆来了。

其中中央领导忙得很，会中有会，会外有会。我在餐厅碰到内蒙军区副司令黄厚，问他来干什么？他说群众冲军区，机关干部开枪打死了一个人，中央把我们找来，周总理亲自主持查询情况。

25日晚上我们又去会议厅集合，林彪在众人陪同下7时作第二次讲话。<sup>【737】</sup>

会议后期，中央对青海军队开枪镇压一事的处理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3月25日晚，林彪在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中强调，“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能随便开枪，不能随便抓人，一定要守住这一条死守线。”林彪称：

青海问题很大，是个严重的事件。前几天我们没有调查清楚，只听了赵永夫的谎言。原来他把问题完全弄颠倒了。青海问题是一个大案件，是实行法西斯的大镇压。元月23日青海军区接到中央的指示（五条），刘贤权同志召集常委会，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并向群众表明态度，支持八一八，本来是对的，是正确的。就在这个同时，赵永夫煽动机关造刘贤权同志的反，同时又勾结反党分子王昭，操纵支持保守组织捍卫队、红卫兵总部，来斗刘贤权同志。赵永夫这个坏蛋并停止刘贤权、张江霖同志的工作，然后就篡夺了军权。后来，又勾结总后青藏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非法组织了联合指挥部，反抗兰州军区，操纵了驻军镇压八一八。对内代替了青海军区党委，对外代替了青海省委，独揽了青海省党政军大权。并不经军区讨论和上级批准，张晓

---

【737】《经历与见闻》，页301-302。

川非法调动了200多辆汽车游行。二月十五日兰州军区党委有三条指示，叫把部队撤出来，赵又派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斯起到兰州搞“绝食斗争”。赵为了镇压八一八，对八一八制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想尽一切办法找根据，谎报军情说：“群众有枪”，“群众先开枪的”。实际上部队先开枪的。二十三日调动了十三个连围攻报社，并开枪，抓了一万多人，打死打伤几百人，这是残忍的反革命行动！赵造谣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总理也打了电话（周恩来插话：根本没有那样的事）。他说：我打电话说“打得好”，都是捏造。

三月十一日，青海问题，主席批了。经过调查，已经查清楚了，这是一次反革命事件。青海的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变，推翻了刘贤权同志的领导。赵永夫这个家伙，一九三三年在国民党南京教导总队受过几年反革命训练。他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是隐藏在党内二十多年的反革命分子。刘贤权同志是个好同志，老红军，是支持八一八的。去年反对王昭也是正确的（叫刘贤权同志起来大家看一看，又叫张江霖同志起来，大家看一看）。张江霖同志是支持刘贤权同志的，也是好同志。刘贤权同志也有个缺点呀！警惕性不高，你和老虎睡在一起，为什么没有发现？驻军其他同志也是警惕性不高，跟着跑，政治上麻痹，（犯了错误，……未记清）也应吸取教训。驻军调动十三个连，包围青海日报社，对八一八进行残酷地镇压，法西斯暴行，这是带枪的刘邓路线，这是个典型。就是对于那些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的组织也不能开枪呀！除非是武装暴乱，只要是徒手群众就不要开枪。这一点你们回到部队要好好贯彻，开枪是没有好处的，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能随便开枪，不能随便抓人，一定要守住这一条死守线。（记不清）开枪就变成大血案、大刽子手！西藏不也是为报社问题，几千人包围了六天，经过耐心的政策宣传教育，没有开枪，把群众争取过来了，也解决了问题。这样的例子其他地方也有。为什么要采取镇压的行为呢？开枪只能说明：只有那些仇恨人民的人，才能干得出来。不然是不可理解的，是想不到的事。赵永夫造了很多谣，说：八一八有枪，首先开枪，是100%的反革命。经调查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八一八没有枪，怎么能首先开枪呢？就是事后也没有搜出一支枪。当时，青海事情发生后，毛主席和我们都十分重视，觉得问题很大，打死这些人就是问题，经过一查就是有问题。事情发生后震动很大。即是反动的，也不能这样做。即是反动的，也是头头反动，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是好的嘛！报告都有倾向性，对报告要慎重，不能以报告者的观点去听报告。<sup>【738】</sup>

【738】《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页91-92。

王金泉回忆称，林彪讲完话后：

叶帅接着说，大家等三天就是为听林副主席的指示。群众工作近些年有点生了，成都、内蒙都有类似的问题，都想支援左派，也不见得，成都抓了几千人，那不成了一大撮了。林副主席今天的指示很重要，不能把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弄成带枪的刘、邓路线。

你们可以回去了，有人建议这样的会每年开一、两次，可以考虑。文件、传达内容按规定办。关键是你们学好。

第二天发回了用工艺换掉赵永夫头的全体合影照片，专机分头送大家。一架依尔-18大飞机，只载着我们四个人，先到烟台市的福山机场把26军赵峰军长两个人放下，马上起飞到青岛流亭机场，我们才算真正散会到家了。<sup>【739】</sup>

经此会议，军队高级干部对刘、邓问题的认识可能有所“提高”，惟从全军来看，尤其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对文革的不理解，对造反派的抵触反感，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虽然此后又有四月份的军委十条和军委扩大会议再做认识转变促进工作，顽疾还是未能得以根除，终于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七二〇事件”。

### 第三十九节 对重点部门及地区的军事管制

3月19日，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首次集中使用了“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即后来简称为“三支两军”的概念。

毋庸置疑，三支两军首位的是支左。支左可谓渗透至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军管则次之，主要针对重点部门、重点地区。实施军管的时间，早于支左。

3月13日，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首先讲到军管问题：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银行占很大数目，仓库三千一百多，约占一半；银行一千四百多，约占五分之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银行都要军事管制。将近七千个军管单位，已经用了团的兵力。<sup>【740】</sup>

【739】《经历与见闻》，页314。

【740】周恩来同志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13日。《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1967年9月，页22-29。



事实上，军管工作在1967年1月中旬已经展开。首先实施军管的是广播电台、银行、仓库和监狱系统等。

### 一、对广播电台的军管

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称，“我们的广播电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同那些控制电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中央决定：凡是发生这样情况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停止编辑和播送本地节目，只转播中央广播电台中的节目。已经进入广播电台的革命群众应当立即退出，广播电台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交给群众离开电台去斗争。群众有意见的领导人，应当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各地广播电台，应当一律使用原来人民广播电台的名称，不要改变。”<sup>【741】</sup>

1月2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补充指示称：

（一）坚决支持各省、市的广播电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成为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

（二）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尚不能控制局面，要求人民解放军保护时，军队应当立即实行军事管制。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军队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三）实行军事管制是暂时的、过渡的措施。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能够控制局面的时候，应当结束军事管制。

（四）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外，地方台可以自编一部分节目。这些节目必须是反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声音，而不得反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声音，不得反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音。<sup>【742】</sup>

据官方资料，截至1967年5月底，“全国实行军管的广播电台（站）547个，占全部广播电台（站）的24%，19个省级电台实行了军管。”<sup>【743】</sup>

【741】 西北大学文革筹委会山鹰战斗队：《中共中央文件》，1967年10月，页74。

【742】 西北大学文革筹委会山鹰战斗队：《中共中央文件》，页82。

【74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30。

## 二、对银行系统的军管和军事保护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称，“现在，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煽动一时被他们蒙蔽的、支持他们的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大批地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到北京来，或者流进大城市，甚至煽动罢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银行，强行提款。一切革命同志必须提高警惕，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今后，如果发现有人继续进行这种煽动，应立即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sup>[744]</sup>

官方资料称，截至1967年5月底，“全国有1219个银行实行军管和军事保护，占全国银行总数的42%，大部分专区以上所属的银行和仓库均实行了军管和军事保护。其中，辽宁省110个银行、上海市41个银行均全部实行军管”。<sup>[745]</sup>

## 三、对仓库、监狱的军管

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称，“现在发现有的坏人煽动抢劫仓库的事件。中央决定：一切重要的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都要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国家仓库中的一切物资，没有国家调拨的指示，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得私自动用，违背者以国家纪律严厉惩处。”<sup>[746]</sup>

据周恩来3月13日讲话，到2月中旬，全国实行军管的仓库三千一百多个。

## 四、对民航系统的军事接管<sup>[747]</sup>

1月25日，周恩来就民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嘱秘书告吴法宪：应立即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包括整个民航系统和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搞。<sup>[748]</sup>

【744】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一）》，1968年4月，页183-184。

【745】《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30。此资料有关实行军管和军事保护的银行数量比周恩来3月13日讲话中提及的1400多个要少一百多个。

【746】西北大学文革筹委会山鹰战斗队：《中共中央文件》，页79。

【747】军事接管，与一般意义上的军事管制有所不同。军事管制并不改变被管制单位的原隶属关系；军事接管则改变被接管单位的隶属关系，改归军队建制。其实，自1962年4月始，民航总局虽归国务院直接领导，惟民航的业务、党政、干部人事等工作已由空军负责管理。有关民航工作的重大问题，由空军报请军委解决，或由空军报请军委转报中央或国务院解决。

【74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17。

1月26日，国务院、军委发布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全文如下：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了战备的需要，为了保障国际国内航班的正常与安全，为了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现决定：

一、对民航总局、各大区管理局、省（区）局、航空站、指挥勤务保障体系、机场和飞行学校，一律由军队接管。接管工作由空军组织实施。

二、在军队接管后，民航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遵照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按军队系统的安排和做法进行。

三、在军队接管后，民航系统各单位的革命组织，对民航系统以外的革命组织，一律不进行串连。<sup>【749】</sup>

### 五、对公安系统的军管

2月9日，周恩来召集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公安部、北京卫戍区联合发布的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布告经毛泽东批准后于2月11日发出。<sup>【750】</sup>

2月11日，公安部、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发表布告称，“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牟立善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传新、王更印两同志为副主任，<sup>【751】</sup>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事管制。”

布告还称：

一、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维护革命秩序，坚决支持、保护无产阶级革命派，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北京市的全体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应当在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坚守岗位，积极工作，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二、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坚决支持公安局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闹革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同群众结合，从政治上、思想上、

【749】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234-235。

【75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24。

【751】 刘传新，时任陆军第二十七军副政委，1965年大校军衔。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1977年1月被免职，同年5月自杀身亡。王更印，时任陆军第五十五军第二一五师政委，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1984年2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10年。

组织上彻底肃清彭真、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彻底改造旧公安局，建立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非常革命化的无产阶级公安局。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有义务支持和协助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维护革命秩序。革命群众对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有意见，可以向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军事代表提出；问题严重的，可以由公安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同意，邀请有关的革命群众代表参加批判；有犯罪行为、证据确凿的，由军事管制委员会依法处理。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不得私自处理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sup>【752】</sup>

周恩来3月13日在向军以上干部讲解有关军管的文件时称，“目前省市公安局六十二个，大部接管了。公安机构过去长期受彭、罗影响，里面有一小撮坏人。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冲击了一下，揭发出一批坏人。公安部曾经试行夺权，但最后还是实行军事管制。内部即使是真正的革命派夺了权，但力量小，压不住坏人。南京、杭州公安局也有这样的情况。北京公安局，由政法公社一个单位包下来，结果不行。他们年轻，革命热情有余，但经验不足，坏人不但没有被揭发，反而保起来了，反而使他们被动。也有由内部坏人夺权的，他们拿权整好人，如天津公安局有一个时期，连交警警都不上岗了。这样的情况还是要实行军管，坏人才有所畏惧，广大革命群众欢欣鼓舞。”

9月6日，周恩来批示，鉴于公安部预审局（第十三局）两派斗争激烈，机构瘫痪，同意公安部党组提出的由北京卫戍区接管公安部预审局的请示。11月19日，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军事接管十三局的情况报告》。报告称，担任军事接管的同志10月27日正式进入，10月28日开始交接，11月7日基本完成（包括秦城监狱）。十三局建立军管会。原十三局的大部分同志撤出，参加公安部学习班。<sup>【753】</sup>

1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决定称，现在不少地方公、检、法机关造反派一方面作为革命群众组织与地方上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串连和联合行动，另一方面又作为专政机关执行专政职能。这种混淆两种职能的情况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为此规定：凡未实行军管的，应一律实行军管；为了防止各地公安机关档案的丢失或转移，一律由人民解放军接管；各地公安机关不论由机关内部或外

【752】《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页236-239。

【753】《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年，页318。

部造反派已经夺权的，仍应实行军事管制，外部造反派应立即退出公安机关，内部造反派应按行政系统接受军管委员会或军代表的领导，不许进行内外串连，也不要再参加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按系统的大联合和代表会，而只在内部协助军管会或军代表进行革命和业务工作。<sup>【754】</sup>

## 六、对重点省、自治区的军事管制

3月13日，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称：

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全国省、市、自治区，三分之一实行了军事管制，六分之一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剩下的十四个，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准备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夺权的，有七个：北京、辽宁、吉林、天津、湖南、河南、安徽；另一类，情况未定，到底是实行军事管制还是“三结合”，还需要摸一下，这一类也有七个：内蒙、河北、甘肃、宁夏、四川、江西、湖北。这七个省和自治区如何进行，正在考虑。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毛主席的思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站不出来，内部争论很多，甚至发现有的军区和地方党委完全处在对立的情况，所以要摸一下。<sup>【755】</sup>

在周恩来讲法前后，由中央批准实行军管的省、自治区共八个，按先后顺序为：江苏、广东、浙江、安徽、青海、云南、福建、西藏。周讲话中提及的陕西、广西，后来并未实行军管。

在同一讲话中，周恩来阐述了地区军管的一些具体做法：“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在军事管制委员会下，一般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全面领导所属地区

【754】《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页320。

【755】周恩来同志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13日。

的文化大革命，特别要作好支持左派的工作，把左派联合起来，帮助干部亮相，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另一个班子，全面抓生产指挥工作，把工业，农业，交通，财贸，文教，卫生全部抓起来。这个班子叫生产指挥部。”“各级军管会，受上级党委和军管会的领导，同时领导下级党委、人委和军管会。并代表本地区与其他地区党委、人委和军管会联系，军管会本身受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党委的领导。”“地委，军分区，如有军部驻在这个地区，应受军党委的领导。师住在县，应由师来领导。组织问题再具体化一下。”

周恩来还规定了军管的批准权限：“各省、市、自治区和边防沿海的专区、自治州，各省辖市，中央各部和直属大的企业、事业单位，由中央批准。各县，各省属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由省批准。”

各重点省、自治区的军事管制详情，见各地区三支两军专述。

### 七、对北京地区几个重点单位的军管

3月2日，周恩来同杨德中谈对北京饭店军管事。<sup>【756】</sup>3月7日，北京卫戍区司令部通知，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接管北京饭店，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徐广先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高长清、和仲仁为副主任。通知称，“饭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业务工作，在军管会的监督和党委领导下进行”，“在军事接管后，对外一律停止串连”。

3月13日，周恩来在向军以上干部讲解有关军管的文件时提及：二、军事管制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种是派出军代表，必要时可以派出军队保护。如北京饭店，派了三个军队干部去，订出几条规定，群众大多数是拥护的，其他大饭店，照办就行了，人数还可以更少。有的地方不行，需要派军队保护。”

3月17日，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发表布告称，“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对《北京日报》实行军事管制，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组成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特派曹增仪、李班军二同志为军事代表。”

3月22日，周恩来审改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北京医院实行军管的通知稿。<sup>【757】</sup>翌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通知，决定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医院，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赵欣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彬、傅吉庆为副主

【75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32。

【75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39-140。

任。通知称，“医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医务行政工作，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在军事接管后，对外一律停止串连”。

### 八、对各地报纸的军管

3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称：

现在，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情况错综复杂，各省市的报纸宣传工作出现一些问题，中央特作如下规定：

（一）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绝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组织攻击另一个革命组织的工具。

（二）各省、市、自治区的临时权力机构建立起来以后，地方报纸应接受其领导。在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地方报纸应接受当地军管会的领导。

（三）（略）

（四）在报社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控制局面，派别斗争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实行军事管制。如报纸不能正常出版，可以出《新闻电讯》，刊载新华社电讯和中央报刊上的文章。

（五）～（八）（略）

（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报纸都不能发表攻击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应当立即处理。

（十）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和单位，包括报纸和广播电台，都一律不要在报纸上和广播中公开宣布军事管制。<sup>【758】</sup>

据官方资料称，截至1967年5月底，“全国实行军管的报社111个，占全部报社的53%；22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社实行军管”。<sup>【759】</sup>

### 九、对高等军事学院的军管

在对地方重点地区、重点单位进行军管的同时，对部分被视为陷入混乱的军队内部单位，也实行了军管。比较典型的是对高等军事学院的军管。

4月19日，军委关于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称：“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

【758】 石家庄市人委机关革命联合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1967年9月，页152-154。

【759】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30。

示，为了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好地进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央军委任命陈奇涵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曹广化同志为副主任。”“高等军事学院的警卫、通讯和运输分队统归军事管制委员会指挥，有线广播设备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sup>【760】</sup>

## 第四十节 总部、军兵种机关的内部争斗

军委在3月19日发布的《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中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暂告一段落。”惟因受各种因素所左右，执行情况参差不齐。而即使各机关的“四大”停止，其内部争斗仍未止息。本节以总参、海军、炮兵和装甲兵机关为例。

### 一、总参谋部机关

据时在军委办公厅（兼总参办公厅）档案处工作的刘振杰后来称，1967年1月，“总参主持组织批斗张宗逊。总参负责人说张宗逊的问题是：他与彭德怀、黄克诚的关系问题；与贺龙的关系问题；与罗瑞卿的关系问题；关于教条主义问题；关于单纯军事观点的问题；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二月三日，金涛副主任传达总参党委和杨代总长的指示以及办公厅本身‘文化大革命’的布置。总参要掀起一个批判以刘、邓、陶、刘志坚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但要结合实际，这实际是张爱萍、张宗逊副总长、参政主任叶运高。说张爱萍是‘三反’分子，张宗逊有严重错误，犯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叶运高顽固的执行力了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办公厅提出不划界限，不分阶级，对谁有什么意见讲什么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抓住大方向，狠批张、张、叶。”<sup>【761】</sup>

刘振杰提及，2月间，“办公厅组织批斗王兴刚<sup>【762】</sup>。王兴刚是我党的老同志，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地下工作。尤其在国民党三十一军任副官处长时，解救了不少地下工作者。原在总政敌工部任副部长，因为国防部办公厅担负着国防委员会的工作，便于与国民党的起义将领联络，便于做军事统战工作，故调来办公厅

【760】《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页191-193。陈奇涵，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955年授衔上将。曹广化，时任军事检察院检察长，1955年授衔少将。

【761】《是这样走过来的》，页331-332。

【762】应为王兴纲，下同。



任副主任。批斗他的题目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开批斗会之前，必须作动员报告，叫大家不要笑，得保持会场的严肃性。这是因为王兴刚长期在国民党军队工作，养成了旧军队的习惯。他从来不留长发，不穿短袖衬衣，长袖衬衣还要系好袖口的扣子。坐着的姿势总是挺直的，说话时使用许多实在而陈旧的词语。”<sup>【763】</sup>

3月10日，总参党委向林彪并毛泽东、中央军委报送《关于张爱萍停职反省的请示》。其中提及，“张爱萍明目张胆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的为刘、邓和彭罗陆杨鸣冤叫屈。”“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是一系列的。”“至今还对党采取对抗态度。”林彪3月16日指示：呈主席阅。毛泽东5月30日批示：此件压了很久，今天才看了一遍，现退还。周恩来批示：周恩来已阅。3月29日，《建议成立张爱萍问题专案组》报告上送。林彪批：呈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照办。4月，张爱萍专案组成立。12月18日，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将张爱萍隔离审查”，因为“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审查张反党罪行和历史问题时，发



批斗张爱萍，1967年。

发现张爱萍有特务嫌疑和假党员问题，他还和潘扬案件有直接牵连……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交由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审查。”林彪12月28日批示：呈主席批示。毛泽东圈阅。12月26日，张爱萍被宣布正式逮捕。<sup>【764】</sup>

7月9日，经军委批准，总参机关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斗争篡军反党分子罗瑞卿”大会，张爱萍、萧向荣、王尚荣、雷英夫、陈鹤桥、郝治平<sup>【765】</sup>陪斗。参加斗争大会的有总参机关的干部、战士、职工和各总部、军兵种及北京军区等14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等，共万余人。大会在杨成武的领导下，由总参几个部

【763】 《是这样走过来的》，页334。

【764】 张胜：《从战争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页310-312。1972年11月22日，周恩来批准解除对张爱萍的监护。1975年3月，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1975年10月7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作出关于张爱萍的审查结论：“根据中央军委的报告，经中央批准，于1967年12月25日（抄注：实为26日）监护审查，1972年11月解除监护。经调查核实，张爱萍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

【765】 郝治平，罗瑞卿夫人，1965年上校军衔。



用箩筐将罗瑞卿抬出来批斗，1967年。

的代表和罗瑞卿原身边工作人员分六个专题作了批判发言。<sup>【766】</sup>

8月中旬，总参机关批斗副总参谋长彭绍辉。据刘振杰称：

八月十三日，总参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李天佑副总长主持，他说：这个会是经过林（彪）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批准的，解决彭绍辉错误问题，凡是脑袋里装着、隐藏着资产阶级思想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

彭绍辉检讨说：“我犯了政治的、立场的错误，和个素不相识的人谈话<sup>【767】</sup>，谈的很短，说了不该说的话。对武汉军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不了解，说陈再道同志是好同志，这就为反革命进行了辩护，极不严肃。[说]‘百万雄师’是革命的，是革命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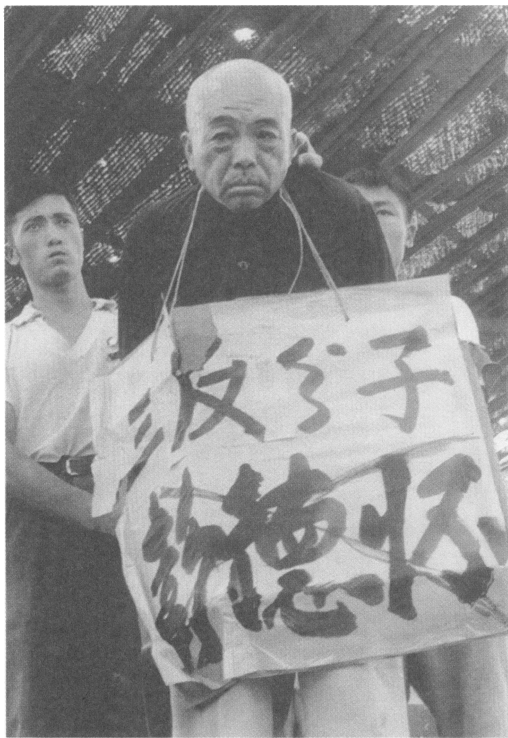
李天佑要彭绍辉交代：

1. 七月二十日和江谈话，谈了什么内容，怎么谈起的？
2. 七月二十一日，武汉事件发生后，为什么那么关心，到处打听，什么思想支配的，思想来由？
3. 七月二十一日晚上大游行，二十二日为什么和李强谈，为陈再道做辩护，一直到二十四日还讲，对反革命分子抱什么态度？
4. 茶岛作战失利，为什么七月二十日又向作战部查问，这和文化大革命有关系。
5. 为什么到总理那里去告状，无限上纲，什么时候谈的，什么内容？
6. 武汉事件，中央、中央文革对这个事件的处理你怎么认识做彻底的交代。
7. 和各方面的关系，为什么到处摸底，打听消息，什么目的？

【766】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总参谋部》卷编辑部：《总参谋部大事记 1927.8-1987.12》（送审稿），页 624-625。

【767】 1967年7月中旬，彭绍辉与其一参加武汉百万雄师的远房亲戚谈及对武汉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看法。

八月十四日上午，继续斗争彭绍辉，以后中会斗、大会斗。<sup>【768】</sup>



批斗彭德怀，1967年。

8月27日，根据军委斗批组的安排，总参机关在北京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大会，黄克诚等陪斗。中央军委常委粟裕、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以及各总部、国防科委、陆海空三军驻京机关的负责人等应邀参加了大会。<sup>【769】</sup>

9月25日，经中央批准，总参党委对总参情报部部长刘少文<sup>【770】</sup>进行监护审查。同日，刘少文家被搜查。据参与搜查的刘振杰称，“刘少文住在北京东城南小街苍南胡同老段府（段祺瑞的宅院）院内的一座两层小楼里。我们四人分别将楼上楼下所有的衣柜、书架上的书，写字台的抽斗，三屉桌的抽斗，凡该翻的地方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出一份有‘问题’的文件，至次日凌晨一点半结束。”“九月二十八日，总参情报部群众把总参党委处理刘少文的问题作为捷报公布于众了，并

写了许多大字报，说明他们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说明他们‘正确’。”<sup>【771】</sup>

11月3日，杨成武以个人名义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批判罗瑞卿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该文声称：“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罗瑞卿，是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他的根本罪恶，就是长期以来秉承中国赫鲁晓夫的旨意，恶毒诽谤毛主席，攻击和歪曲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

【768】《是这样走过来的》，页349-350。彭绍辉1967年8月被停职，同年12月，总参党委决定对彭绍辉进行专案审查，专案组由李天佑、王新亭负责。1969年4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同年8月复职。

【769】《总参谋部大事记1927.8-1987.12》（送审稿），页625。

【770】刘少文，1955年授衔中将。1967年9月起被关押七年之久。1974年9月解除审查，1978年6月任总参顾问。

【771】《是这样走过来的》，页355。

军路线，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反对树立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妄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改造我们无产阶级的军队。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强大的武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代理人罗瑞卿之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其流毒。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sup>[772]</sup>

## 二、海军机关

1月27日，海直机关和院校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苏振华，及“其部分狐群狗党”杜义德、傅继泽、李君彦、罗斌、赵晓舟。<sup>[773]</sup>苏振华等六人被反扭着双臂“喷气式”推上批斗台，颈上挂着写有“三反分子”等罪名的牌子，批斗当中不时被拳打脚踢。这次大会，开创了海军用武斗方式打击领导干部的先例。<sup>[774]</sup>

2月4日，海军政治部少数派红联总发起召开“斗争苏振华狐群狗党”大会，得到海军司令部红联总、海后、海工、海装、海航井冈山等群众组织的支持和声援。海军直属机关红流等一些组织称大会“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冲散了大会。通过此一事件，海军的群众组织都亮了相，海直红联总和海军工程学院红色造反派等坚定站在李、王、张一边，红流等则站到李、王、张的对立面。<sup>[775]</sup>

2月11日，红流和海军院校一部分群众组织在海军大院操场召开批判海军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通知李、王、张到会。以海军工程学院红色造反派为首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将大会冲垮。参加冲此次大会的还有：海军指挥学校红色革命造反派、红色革命造反派总部，海军通信学校革命造反派、红色反修总队，海军政治学校红四野造反派，海军潜校红色造反派，海测系红色造反派总部，海军总医院111造反派，海军总医院护士学校只争朝夕造反派、在险峰造反派、红色造反派等。<sup>[776]</sup>

2月16日，晚十时半，海军工程学院红色造反派纵队、红色造反派战斗团、红色造反派，海军通信学校革命造反派、红色造反派总队，海军指挥学校红色革命造

【772】《红旗》杂志1967年第16期（1967年11月23日出版），页30-39。

【773】傅继泽，时任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955年授衔海军少将。李君彦，时任海军政治部副主任，1961年晋升海军少将。罗斌，时任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授衔海军少将。赵晓舟，时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1961年晋升海军少将。

【774】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编年史（1949-1983）》，页751。

【775】《海军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大搏斗和海军直属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李凯同志一九六八年六月在海军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报告》，页25。

【776】《海军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大搏斗和海军直属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李凯同志一九六八年六月在海军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报告》，页26。

反兵团、红色革命总部、抗大革命造反兵团，海军总医院护校只争朝夕造反队、在险峰造反队、红色造反队，海军总医院 111 造反队，海测系红色造反总部，海情系红色造反司令部，北海舰队护校红色反到底战斗团，海军政干校红四野造反兵团、红色造反团、孙大圣造反兵团，潜校红色造反军，体工队红色革命造反队，海军学院革命造反总部，海军二航校革命造反总部等 24 个院校造反派组织一百二十余人，在海政红联总的配合下，查封了人民海军报社。红流派召集了海直机关和院校另一派群众组织，把海工红色造反团等围困在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和走廊里达七天八夜之久。2 月 17 日凌晨三时，李作鹏作出四点指示：①反对武斗；②双方撤离现场；③双方有什么意见提交海军党委再确定；④凡是查封《人民海军》报的材料一律不动。同日 22 时，海军党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关于处理人民海军报的决议，“认为海军报的问题严重，决定立即停刊整顿”，“双方各战斗组织应立即撤出，包围的战斗组织应首先撤出，限于一小时内撤出完毕。”惟后者并未奏效。2 月 21 日，以萧劲光、李作鹏、王宏坤名义发出海军特字第 1 号命令，2 月 23 日，又以海军党委名义发出《严正声明》，严令参加包围的战斗组织立即撤出现场。延至 2 月 24 日，红流派群众组织方撤出黄楼（海军机关所在地）。<sup>【777】</sup>

2 月 21 日，海军党委发出《关于调整海直各大部党委的通知》。通知指出，为认真贯彻执行 2 月 11 日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加强党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海军党委决定，海直各大部党委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提出方案报上级党委批准。通知提出了如下调整原则：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经上级党委批准停职反省的党委成员，不能参加党委工作；犯有较严重错误的党委成员，虽未作停职反省处理，但留在党委中对党委日常工作有不利影响的，也不宜参加党委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群众不信任的党委成员，可留在党委中工作，但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党委会议不宜参加；党委多数成员犯有严重错误，难以实行党委的正常领导的，可进行改组。<sup>【778】</sup>

3 月 1 日，海司红联总、海政红联总、海航井冈山和海后、海工、海装红联总形成了统一的海直机关红联总。

3 月 8 日，林彪指示李作鹏：“我想搜集一点具体事实来说明军队中间也存在着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方面的路线斗争，请李作鹏同志把海军

【777】 参见《海军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大搏斗和海军直属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李凯同志一九六八年六月在海军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报告》，页 27-28。《人民海军》报于 1967 年 9 月 23 日复刊。

【778】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编年史（1949-1983）》，页 754。



李作鹏在海司办公楼里观看大字报。

苏振华等人如何执行刘、邓路线，在上面勾结坏头头，在正面煽动群众向李、王、张进攻，要很好把材料给我整理出来，把事实摆出来，要采取列举事实的方法，拉条条的方法，不要写成文章，很快搞出来，三天交卷。”李作鹏命人整理出《海军党委内部两人司令部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交林办，并于3月12日致信叶群称，“海军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按照群众的讲法，一方是李、王、张，另一方是萧、苏、刘<sup>[779]</sup>。他们采取的手法，开始表示欢迎，后来采取疲劳战术，以后又采取破坏排挤，最后就采取彻底打倒。斗争是激烈的。这些问题，在这个材料中看的不那么明显，只有亲身经历才有所体会。其他不谈了，看林副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以便遵照执行。”<sup>[780]</sup>

【779】 刘指刘道生。

【780】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年，页220-222。

6月9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李作鹏为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同时命令免去苏振华海军政委职务。至此，除苏振华外，副司令员刘道生、副政委杜义德先后被停职。在任海军领导人排名：司令员萧劲光，第一政委李作鹏，第二政委王宏坤，副司令员周希汉、赵启民，参谋长张学思<sup>【781】</sup>，政治部主任张秀川。

### 三、炮兵机关<sup>【782】</sup>

1967年1月，宣化炮兵学院、西安炮兵技术学院、武威炮校、郑州炮校、武汉炮校、南京炮校、沈阳第三研究所等共三千五百多名学员来到炮兵机关造反，连已移交地方的华东工程学院（原炮兵工程学院）也来了不少人。时炮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陈仁麒，副司令员苏进、匡裕民、吴信泉、孔从周、宋承志、向守志，副政委欧阳毅、刘何、谢良，参谋长廖鼎祥，政治部主任丁本淳。<sup>【783】</sup>

在头一个多月里，对炮兵党委常委的揪斗是普遍性的。揪斗的形式有三种：一种是大会批斗，在电影场开大会，炮兵常委们戴着高帽子站在台上，战斗队的，代表上台发言批判，会后，戴着高帽子“游大院”，即在大院内“游街”。第二种形式是小会批斗，在小礼堂开会，几十人参加，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也叫“刺刀见红”，实际上就是逼供。第三种方式是抓走审讯。1月17晚，西安炮兵技术学院红色造反总团抄了陈仁麒的家，然后将吴克华和吴信泉一起抓走，第二天下午，吴克华被放出，1月19日下午，吴信泉被放出。

1月下旬，炮兵司令部装备处的战斗队出了五道问答题，要求炮兵领导干部作出回答。其中有“你对文化大革命抱什么态度？”“你认为炮兵常委内部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些人向造反派秘密亮相。至此，炮兵的领导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炮兵机关的形势发生了转化，一些炮兵领导干部成了支持造反派的“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sup>【784】</sup>

2月13日，炮兵机关的造反派和“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召开炮兵机关揪斗“走资派”大会，拉开了炮兵机关夺权的序幕。大会从吴信泉开刀，批斗了吴信泉三天之后，给他扣上“彭黄漏网分子”、“推行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表人物”、“三反分子”等一大堆帽子。批斗了陈仁麒四天，把他打成“三反分子”、“刘

【781】 张学思 1967年9月11日被捕并被抄家，1970年5月29日关押中病逝。

【782】 主要资料来源自俞惠如：《我和信泉——俞惠如回忆录》，自印本，2008年。

【783】 孔从周，亲家，1955年授衔中将。谢良、廖鼎祥，1955年授衔少将。丁本淳，1961年晋升少将。

【784】 《我和信泉——俞惠如回忆录》，页199。“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指的应是吴克华，欧阳毅等。

邓黑司令部里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批斗匡裕民一天，给他戴上“蜕化变质分子”、“推行罗瑞卿军事路线的顽固分子”的帽子。把陈仁麒、吴信泉、匡裕民定为了“陈、吴、匡反党宗派集团”。不久，政治部主任丁本淳被以“大叛徒”、“假党员”、“反党集团黑干将”罪名打倒，于是就成了“陈、吴、匡、丁反党宗派集团”。

“二一三”大会后不久，炮兵召开了常委会，在“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们的坚持下，三个造反派头头列席了常委会。内容有两项，一是改组炮兵常委会和政治部、司令部、后勤部三大部党委，二是上报吴信泉的“罪行材料”，给他扣了“五顶帽子”和“八大罪状”。陈仁麒、吴信泉和匡裕民坚决反对改组常委和三大部党委。结果在这次会上，改组常委和部党委的提议未能通过，吴信泉的材料也未能落实。俞惠如称，“几天后，在不通知党委书记陈仁麒和常委成员吴信泉、匡裕民的情况下，由‘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主持召开了常委会，通过了他们的改组决议。将陈、吴、匡排除出常委，吸收了新成员，成立了炮兵‘新常委’。”<sup>[785]</sup>

俞惠如又称，“第二天一早，‘坚决支持炮兵新常委’的大字标语贴满了大院。接着，司、政、后三大部党委、机关的8个党总支和所有的党支部全部进行了改组。司令部13名党委委员中有7名被打倒或停职，增补了造反派头头为部党委委员和支持造反派的副参谋长任党委书记；政治部党委瘫痪，由造反派头头充任总支书记，掌握政治部大权；后勤部的11名党委委员中被停职6名，增补造反派头头为部党委委员和党委书记。”<sup>[786]</sup>

3月23日，新常委主持召开了“三二三”群众大会，大会开了七天，上批“二月逆流”，“刘、邓、陶”，下批“陈、吴、匡、丁反党集团”。此时，总政副主任徐立清向新常委传达了徐向前的指示：“陈仁麒是炮兵政委，吴、匡都是炮兵副司令员，有错在常委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常委自己不能乱。立即停止召开群众大会，更不能呼打倒他们的口号。”并说：“吴信泉同志的问题是历史问题，已有结论，不要再批了。”但新常委仍然坚持继续开大会。会上，“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和群众一起举手喊“打倒陈、吴、匡、丁”的口号。在炮兵参加会议的全军文革观察组向全军文革汇报了会议情况后，徐立清再次召见新常委领导干部，制止他们继续开大会批判“陈、吴、匡、丁”，但是，他们仍然不执行，并组织人到全军文革去张贴“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的大标语和大字报。

【785】《我和信泉——俞惠如回忆录》，页202。惟目前在官方的炮兵组织史资料中，尚查不到这次常委改组的记录。

【786】《我和信泉——俞惠如回忆录》，页202。



俞惠如又称，“造反派和‘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不仅将‘陈、吴、匡、丁’打倒，还把已调任五机部部长的邱创成<sup>【787】</sup>诬陷为‘炮兵的黑司令’，1967年5月的一天晚上，造反派在邱创成犯心脏病的情况下，插着氧气管，用担架抬上大卡车，被赶出炮兵大院，住到亲戚家去了。”“遭遇最惨的是政治部副主任李铁占<sup>【788】</sup>，他被造反派批斗时，遭到造反派头头的殴打，致使他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严重摧残，1967年6月5日，在西办公楼楼顶坠楼。李铁占受伤后，神志还很清楚，他对医生说：‘我是军委炮兵政治部副主任，8级干部。’本应对他迅速地进行抢救，但三〇一医院要求炮兵领导表态，是抢救还是不抢救。炮兵‘新常委’开会研究后，做出‘不予抢救’的决定，致使李铁占在医院得不到救治而身亡。李铁占死后，炮兵‘新常委’给他定了一系列的罪名：‘一贯站在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谭政、邱创成、陈仁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对抗、抵制和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信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翻案，为大比武翻案’、‘党内走资派陈仁麒、邱创成的大帮凶’、‘埋在我军内部的定时炸弹、阶级异己分子’等等，从此‘陈、吴、匡、丁反党集团’就变成了‘陈、吴、匡、丁、李反党集团’，炮兵‘新常委’还做出决定，开除李铁占的军籍、党籍，火化后不得保留骨灰，火化费用由李铁占家属负担。经‘新常委’批准，三〇一医院还将李铁占的头颅做了标本，说是要研究一下为什么人从四层高楼跳下来头脑还会是清醒的。”<sup>【789】</sup>

7月，炮兵机关的形势发生根本性逆转。本月，炮兵司令员吴克华被令“停止一切职务，监护反省”。<sup>【790】</sup>7月26日，周恩来发函通知陈仁麒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前，周恩来与陈仁麒谈了话，让他回炮兵把工作抓起来。至此，陈仁麒解放了，炮兵的保守派也随之解放了。

#### 四、装甲兵机关

关于装甲兵机关的运动情况，时为装甲兵工程学院的一位学员回忆称，“1月8日晚上，装甲兵系统造反派在司令部大礼堂，召开了‘批判装甲兵内以黄志勇<sup>【791】</sup>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判黄志勇的‘三反’言行和生活作风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装甲兵所属单位的造反派，即：装甲兵学院、第一坦克学

【787】 邱创成，1955年授衔中将。1963年由炮兵司令员调任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

【788】 应为李铁砧，下同。1964年晋升少将。1967年去世时年仅52岁。

【789】 《我和信泉——俞惠如回忆录》，页208-209。

【790】 吴克华随后长期被关押，立案审查五年之久，至1972年7月方解除监禁。

【791】 黄志勇，1955年授衔中将。1965年8月由工程兵政委调任政委。

校、第二坦克学校、第四坦克学校、第五坦克学校、装甲兵工程学院、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以及装甲兵司令部直属机关等单位。出席会议的装甲兵领导人有：司令员许光达大将，政委黄志勇中将，及副司令员、各部门领导等。参加会议的还有陆海空军院校的造反派代表。一个造反派的代表刚发完言，从主席台的两侧走出几名我们工院造反团极左分子，拿出糊制的高帽子给黄志勇戴上，许光达当即上前制止，气愤地说，我是司令员，要戴高帽子，那就先给我戴上好了！许光达边说边抢高帽子。激动的情绪，无法抑制的愤怒，使许光达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倒了下去，全场哗然。台上的人忙着抢救许光达，随后被送到了解放军总医院。会场台上台下闹闹嚷嚷，礼堂外反对者往里冲，发生推搡冲突，其中我院院务部一职工动手打了人，对方的人可不干了，要揪打人凶手，造反团只好将此人送到槐树岭装甲兵科研院。给黄志勇戴高帽子，并非事先安排，几个极左分子，搅乱了会场，破坏了大会。”“元月15日，从海军司令部传来爆炸性消息，贺龙、许光达、苏振华等人搞所谓‘二月兵变’，许光达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有的说是国防部长）。元月16日，装甲兵机关一个造反派在装甲兵司令部大院内贴出了一张从海军司令部‘红联总’那里传抄来的‘二月兵变’大字报（海军副政委李作鹏根据副统帅林彪的旨意安排写出的）。元月16日下午，李作鹏在海军机关对军队院校来京的红卫兵代表及各总部群众代表说：“贺龙要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总参谋长，还有王尚荣、廖汉生、黄新亭……”这些人听见风声以后，便行动起来。当晚许光达被抄家，随后被关押、审讯。”<sup>【792】</sup>



批斗许光达，1967年。

1月21日，文革前已调至军事科学院任职的原装甲兵政委向仲华<sup>【793】</sup>，在装甲兵科研院解答许光达与贺龙等人关系问题时称：

### 一、许光达与贺龙的关系

（一）许光达从没有去过林副主席那里，其他几个老帅更不用说了。但到贺龙那里，就去得比较多。

【792】《总字212的“文革”大事简略回顾与反思反省——我所了解的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和装甲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

【793】向仲华，1955年授衔中将。1965年6月由装甲兵政委调任副政委。

(二) 贺龙常说要大将当总参谋长，别人压不住。大将中间：黄克诚、谭政垮了；徐海东、张云逸久病在身；王树声身体不好，只能在军事科学院。那就只能是许光达了。贺龙和彭真是串通在一起的，就是要许光达当总参谋长。

(三) 罗瑞卿在1964年带着一批人(各军种、兵种负责同志)到新疆看地形，装甲兵司令部的张文舟也去了。据说，新疆军区提出要一个坦克部队去。以后他们回来讨论，64年没有去，66年上半年又去了。罗瑞卿、贺龙是否想：因为许光达是装甲兵司令，利用他调动坦克部队来加强他的新疆力量。贺龙的手各地区都伸。武汉、成都、北京、新疆等军区，有计划地加强他的实力，准备搞政变。

(四) 据宋庆生<sup>【794】</sup>揭发，在写第二方面军军史的问题上，应当由了解的人来写。许光达有一段时间到苏联去了，很长一段时期不在二方面军，但军史实际上由许光达负责领导写的。

(五) 许光达本来不够大将资格，最多是个上将。但为了照顾山头，一、四方面军都有大将了，就是二方面军没有，所以给他个大将。但后来贺龙对许的级别还有意见。<sup>【795】</sup>

3月31日，许光达被放出。6月14日军委办公厅通知：经军委常委5月19日第69次会议研究讨论同意，对许光达、张文舟进行重点批判斗争，“并已报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8月14日，又再次被关押，遂进行专案审查。1969年6月3日，在监护状态下病逝。

## 第四十一节 “军委十条”

### 一、以“军委十条”否定“军委八条”

3月下旬，毛、林、周在处理完青海事件之后，开始着手对各地军队压制、镇压造反派群众组织的行为进行纠偏。

3月30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及其前面一个颇长的批语交毛泽东审阅。批语共五条，毛泽东在第二条文字之后加了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

【794】 宋庆生，时任装甲兵后勤部部长，1955年授衔少将。

【795】 向仲华在装甲兵科学院解答许光达贺龙关系问题会议记录，1967年1月21日。装甲兵工程学院红色造反派总团：《红色造反者》第23期，1967年6月23日。

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sup>【796】</sup>

4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发布。中央的批语称：

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第三，一个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但是，要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在取缔证据确凿的反动组织时，也要把为首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一般被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取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

第四，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第五，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sup>【797】</sup>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称：“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派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对毛主

【79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05。

【797】《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页325-329。

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否定前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对于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同日，林彪将旨在纠偏的军委命令稿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作出部分修改后告林彪：“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只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适当，请酌定。建议以草稿形式印发军区会议各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4月5日，林彪将修改过的命令稿再次送毛泽东审阅，毛阅后批予林彪称：“林彪同志：已阅。请再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sup>【798】</sup>

4月6日，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全文如下：

### 中央军委命令

林彪同志：此件很好。

毛泽东

四月六日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及时引起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79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06。

(五) 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 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 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 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 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 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sup>【799】</sup>

4月6日发布的《中央军委命令》，条文共有十条，故简称为“军委十条”，以区别于1月28日发布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林彪送交毛泽东审阅批准的“军委十条”，与周恩来送交毛泽东审阅批准的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决定的批语，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军委十条”实际上是对“军委八条”发布以后，有所加剧的军队与造反派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进行批评与纠正，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军委八条”。惟中央领导人不能承认这一点，而是对侧重点完全不同的两个命令作出了相互弥合的解释。

【799】《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页122-128。

典型者，如江青4月20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江青称，“一月二十八号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是正确的，有效的。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人民解放军，是讲拥军的。军队也要正确地对待群众，要爱民。……现在，四月六日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也是正确的，有效的。十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群众，是讲爱民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的精神，是一致的。把十条命令和八条命令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绝不要利用这个十条命令去破坏那个八条命令。如果用这个十条命令去破坏那个八条命令，那就错啦。”<sup>[800]</sup>

## 二、军队高级干部“转弯子”

4月上旬至下旬，军委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旨，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再次帮助军队高级干部“转弯子”。根据现有的材料可知，潘复生、张春桥在会议上分别介绍了黑龙江、上海的文革运动进程，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分别讲了话。江青4月12日在会议上称，“解放军要立新功。”“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错。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自己的思想明确，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查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我参加过两个小组。像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几个月以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sup>[801]</sup>

以上江青讲话并非原话，是经过整理的。江青说的所谓“立新功”，就是要军队彻底转变态度，站在文革造反派一边。4月15日、17日，江青将讲话记录整

<sup>[800]</sup>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中央首长讲话（4）》，1967年5月，页190。

<sup>[801]</sup> 江青同志讲话，1967年4月12日。《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页134-135。

理稿先后两次送毛泽东审改。以上“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毛对讲话记录整理稿批道：“退江青。可以，照办。”<sup>【802】</sup>5月，江青这一讲话被冠以“为人民立新功”的标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向全国公开发行。

4月11日，徐向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发言。发言内容据徐向前自己回忆称，“内容无非是担任全军文革组长的近三个月里，思想上怕乱，跟不上形势，工作没有做好；对毛主席的三支两军指示，领会不深，贯彻不力，像青海、四川、内蒙、福建、河南等地发生的事件，认为自己管不了，也不想去管；军内共抓了七百多人，取消战斗组织一百多个，打击了‘造反派’；积极争取中央文革的支持、帮助不够，有抵触情绪；等等。”<sup>【803】</sup>

4月14日，原力主对造反派采取强硬政策的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发言。叶谈了在处理青海问题、成都问题和万县问题中的错误，还谈了“对中央文革的态度问题”，“主要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有时尊重不够。在研究讨论问题时，在某些问题上虚心接受中央文革小组同志的意见不够，有时态度不冷静，不慎重。”<sup>【804】</sup>

“军委十条”发布后，各地军事机关纷纷对打击、镇压造反派群众组织的过往行为进行了深刻程度不一的检讨，与造反派的公开对立情绪有所收敛，并开始释放“镇反”中被抓人员。4月20日，新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向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文革小组报告：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四川地区截止4月19日，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共27,865人，占被抓人员总数的85%。4月21日，周恩来批示将梁兴初的报告“印发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参加四川会议各同志”。4月23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称，“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

【80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10-311。

【80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元帅回忆录》，香港：香港征程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11月，页646。

【804】《叶剑英年谱》下，页963。



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sup>【805】</sup>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称：“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岭。把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看得太严重了，是不对的。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处理除外。一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福州军区党委和韩先楚同志最近表示，用‘一二六事件’作为划分左派和右派，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是不妥当的。这个态度，是正确的。最近，他还向驻福建部队发出指示：除证据确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尽速放出被押人员，从速为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平反’。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采取这个措施是好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欢迎韩先楚同志的这些表示和措施。”“对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有意见，可以提。写信，送大字报，派代表，这些方式都可以，但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冲军区是不宜的，不对的，但对‘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予追究。”<sup>【806】</sup>

### 三、军队院校造反派再度杀向社会

“军委十条”发布后，虽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于4月20日发出通知称，“最近，有少数学生和群众又开始到北京和其他地区进行串连，北京的一些学校又派人到外地串连。因此，中央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的决定，各地已经外出串连的，应当立即返回。”<sup>【807】</sup>但却阻止不了军队院校造反派再度杀向社会，走上街头。据一份有关方凡（技术工程学院革命造反派勤务组主要成员）的审查材料称，“为了‘击退军内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打倒拿枪杆子的刘、邓’，方凡等人于4月8、9、10日连续开会、筹划、拟就《告全军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无产阶级革命派书》。4月11日，他们组织上千人于天安门广场集合，方凡讲话，宣读以上《告造反派书》并于会后指挥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发，经中南海前门、国防部至三座门止。沿途高呼‘解放全军造反派！’‘炮轰陈毅！’‘火烧叶剑英！’等口号，开创了军队上街游行的先例。4月14日晚，方凡等人支持军艺‘星火燎原’冲击北京军区的活动，并提出‘以解决北京军区的问题为粉碎逆流的突破口！’4月16日，方凡与军测的杨寅田等人接管全军文革接待站，并发表

【80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14。

【80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页348-351。

【80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二集，1967年6月，页96。

‘公告’称‘全军文革接待站顽固地执行了以叶、徐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宣判’它的‘死刑’。4月21日，总政萧华主任、总参杨成武代总长接见军事院校四个组织的代表方凡、杨寅田、王兴明等人，萧、杨二同志在谈及联络问题时，均谈及必要时可‘交换交换意见’，‘不要搞固定形式’。之后，方凡苦心琢磨并与杨寅田、刘正新、杜兆云、黄磊等人多次商议，决定以‘斗罗（瑞卿）’的名义联合起来，取得‘合法’地位，进而抓‘拿枪杆子的刘邓’。‘斗罗’计划得到萧华、杨成武同志的支持和批准。4月27日，‘斗罗筹’<sup>【808】</sup>正式成立。成立会上，讨论通过了方凡起草的给全军文革的报告和成立宣告。方凡被选为中心组一号成员。5月12日在全军文革工作人员的具体指导下，方凡主持召开了有三千多人参加的‘斗罗大会’，当时身体伤残的罗瑞卿同志遭受了无情的批斗，到会陪斗的有刘志坚、王尚荣、苏振华、刘震、宋烈等同志。”<sup>【809】</sup>



左：批斗罗瑞卿、苏振华，1967年5月12日。

右：批斗刘志坚、王尚荣，1967年5月12日。

据5月12日“斗罗大会”的组织者声称，这次大会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政治学院革命造反总部、后勤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团、穷棒子革命造反团、技术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团、测绘学院革命造反团、井冈山红色造反团、后勤工程学院红色造反者总团、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二医大红色造反纵队、七医大一〇五红色造反团、防化学院一〇五革命造反团、二炮医校红色造反队、三〇一护校红色造反队、无线电技校红色造反团、第三工程兵技校红色造反总部、空军学院东风造反总队、空军二高专红色革命造反纵队、

【808】“斗罗筹”的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革命造反派斗罗大会筹备处”。

【809】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委员会：《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1985年4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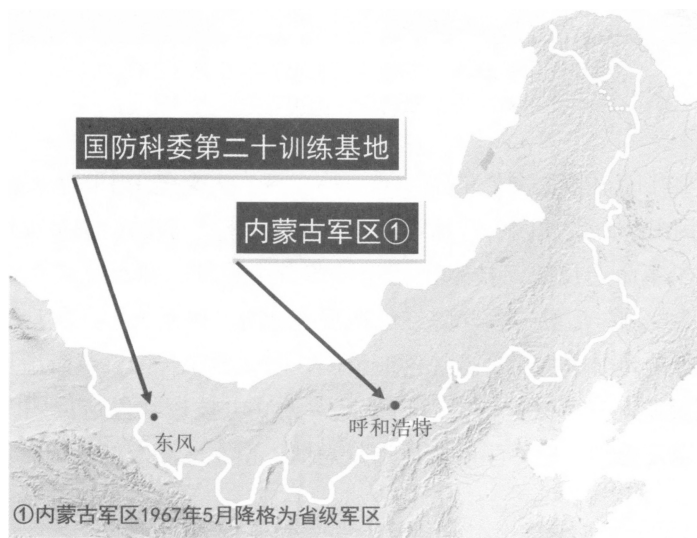
空军技术学院红色造反纵队、空军总医院护校红色造反队、空军政干校红色造反兵团、北空护校红色造反团、空军九航校一二二七革命造反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空军第一预校红色造反联络总部、空军十航校红色造反兵团、空军十七航校革命造反兵团、空军八航校红色造反总部等 25 所院校 28 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起和召开的。<sup>【810】</sup>以上组织应为“斗罗筹”的成员。这一名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军委十条”发布后军队院校造反派组织恢复活动的“盛况”。

## 第四十二节 内蒙古：“红八条”公布前后

### 一、“红八条”公布前的内蒙古军区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广袤，总面积约 118 万平方公里，在省级行政区中仅排名在新疆、西藏之后，名列第三。国境线全长 4,200 公里，在新疆之后名列第二。惟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内蒙古军区在全国 13 个大军区中实力排后。时辖呼和浩特、包头、昭乌达、呼伦贝尔、哲里木、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淖尔、伊克昭 9 个师级军分区，骑兵第五师，4 个步兵团、1 个骑兵团、2 个工程建筑团及军区步兵学校。1966 年 7 月，内蒙古公安总队整编为内蒙古军区独立第二师，归军区建制领导。

### 内蒙古军区态势图(1965-1968)



【810】 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革命造反派斗罗大会筹备处：《斗罗战报》第一期，1967年5月20日。

1966年5月，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为乌兰夫（蒙古族），副司令员刘华香、刘彬、孔飞（蒙古族，乌兰夫的妹夫）、黄厚、萧应棠，副政委廷懋（蒙古族）、吴涛（蒙古族）、刘昌，参谋长王良太，政治部主任刘昌兼。<sup>【811】</sup>

1967年1月，内蒙古军区介入地方文革，倾向于保守一派的红卫军。时乌兰夫早已被免职，孔飞、廷懋也已被打倒。2月5日在军区营区外发生“二五事件”后，国务院、中央军委翌日令自治区党委、军区、呼三司和红卫军四方各派三至五名代表到京商谈解决。军区方面参加的有吴涛、萧应棠、刘昌、黄厚，刘华香列席了中央负责人开头的两次接见。

内蒙四方代表在京商谈期间，内蒙古军区仍在内蒙与红卫军结合镇压对立面呼三司，又派兵到北京抓内蒙军内造反派。周恩来与中央各人在2月10日、16日两次接见中，对造反派与军区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不偏不倚态度，到了3月18日第三次接见时，周恩来等的态度突然有了明显的变化，对刘昌、黄厚提出了严厉指责。

当日接见时，周恩来质问刘昌：“你们是怎样处理不要对群众组织（如对‘八一八’）宣布是什么性质的组织的问题的？”刘昌答：“我们没有宣布‘八一八’是反革命组织。”八一八代表杨民众说：“不光宣布了，还抓起来不少人，打了不少人。”戚本禹插话说：“在总理面前你都不讲事实，你怎么对待总理？”16岁即参加革命的福建老红军刘昌回敬戚：“你不要吓唬人！我听总理的。”<sup>【812】</sup>中央文革要员在公开场合遭到如此强硬顶撞，此前未见！

在第三次接见将要结束之际，周恩来严厉指责内蒙古军区有关负责人：“你们表面上似乎听中央的话，实际上你们不听。我们办事都得请示毛主席、林副主席，但你们不是这样。你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耽心内蒙古军区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你们把那么多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同群众搞得那样对立。内蒙地处边防，背靠苏、蒙修正主义，我们怎能不耽心？吴涛同志，你是第一副政委，你应该两方面负责，派你去呼市看一下，你敢不敢？（吴涛：总理决定了我可以回去。）中央文革也去人，联络员也去一个。”<sup>【813】</sup>

在康生插话之后，周恩来接着代表中央表态：

【811】 王良太，1955年授衔少将。

【812】 《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有关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一集，页42。

【813】 周总理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第三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1967年3月18日凌晨。《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有关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一集，页44-45。周恩来表态后，由李天佑、吴涛率领的中央调查团，3月18日傍晚飞抵呼和浩特。

由于学生在军区门口静坐，发生了问题，调你们来商谈解决问题，找你们几方面谈。二月十七号定了四条，你们是同意了。但一个月来你们并没有按这四条办事。找你们来商谈，是要把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搞大联合，夺权。但这一段你们不是按中央意见办事。

第一，你们竟然在军区门口把《红旗》和《解放军报》记者扣起来。四大自由嘛，记者没有这个自由？萧主任打了电话，你们还要押送回来。扣留了笔记本，在黄厚手上一个月不报告。记者报导如不符合实际，你们可向上反映嘛，怎么能扣留？这件事就是对抗中央，没遵守军委的命令。在军区门口发生学生静坐以前，刘华香就请示过要调兵的（徐立清：叶总办公室曾告诉他们不要调兵）。

第二，刘华香开完会，本来想要留他商谈解决问题的，他不打招呼就走了。他回去后一个来月，办事是不合乎中央意图的，越走越远。

第三，河西公司的事，提醒过你们，不让你们宣布“818”是反革命组织，表面上你们听中央命令，但你们在下面宣布，这是要两面派么。

第四，宣布人家好多组织为反革命，怎么能这样压制？即使是保守的组织，也要教育提高，怎么能压制？完全不是对待群众组织应抱的态度。这是刘、邓路线（康老：这是反毛主席思想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五，你们派部队来北京，就是你们要指挥中央，你们目无中央。北京卫戍区是保护中央、保护毛主席的。你们派兵来大街上抓人，是要为所欲为。

第六，还有这样的传单（指军区印的陈鼎写的材料），还加上了按语。清华附中的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子，即使是他写的，也要劝说他不要写。你们还加上了按语，印发传单？如果是你们写的，这样做不是破坏解放军信誉吗？这怎么能这样对待红卫兵？何况对红卫兵，你们对中央文革的记者都那样对待，这是对抗中央！

第七，你们包围了师范学院，据这位同学（指郝广德）讲已经三天了。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那样对待？这是你们有指挥的，要把一个群众组织搞垮嘛。对这个问题，打电话你们没有回答，还要中央去调查！这一个月来你们进攻，不照中央的意图办事。清华附中同学的信，如调查属实是你们强迫写的话，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你们欺骗中央。

第八，开大会夺权，说是搞呼市的庆祝，实际上是夺区党委的权。权星桓、康修民实际上是让你们掌握的群众组织抓起来了。对区党委书记，你们军区政治部就定了性？你们比中央在先把名字点了，不夺权也等于夺权了，你们有

这么大的权吗？七、八号夺权（指呼市）根本没有报来，十五号登报，明天要开大会，还要批准登报，都不是商议，是给我们下命令，统统是先斩后奏，你们犯了多大错误！

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不能再忍了。这些你们都没请示过中央。你们想过没有？这么做对不对？<sup>【814】</sup>

周恩来3月18日这一讲话，实际上已为4月13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定下了基调。

## 二、内蒙“红八条”公布

4月13日晚上至14日凌晨，周恩来和中央其他负责人第六次接见内蒙来京四方面代表时，对即将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作了详细的解释，对内蒙古军区多有指责批评。周恩来称：

要集中力量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国要批判，内蒙当然是乌兰夫和他的一伙人，乌兰夫很早被拉下马来了，离开内蒙古，撤了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政委的职务，名义上留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主席，留在北京反省。把他拉下来，不是问题就解决了。他下面有党羽，有他的代理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还在支持他。以王逸伦、王铎<sup>【815】</sup>为首，确确实实就是他的代理人。在×区二月五日事件发生以来，他们很活跃。二月七日王逸伦就出来了，到军区和各处活动，本来生病嘛！不仅在内蒙，就是到北京来也是这样，还在继续指挥内蒙古。尤其王铎更加活跃，王铎的老婆在内蒙人委工作的喽（权星垣：内蒙人事局局长），不断打电话，还到北京劝降。

军区不是支持了左派，而是支持了乌兰夫的代理人，支持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也支持错了。跟革命造反派对立，被王逸伦、王铎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这是必然的。他们原支持的保守组织，本来可以教育，一支持他们，就被利用了，就发展了，跟上来了，问题大了。比如说：“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是跨行业的组织，在北京会谈时就变成了“无产阶级联合总指挥部”，有工人、农民、机关、铁路、学校，实际上还是个跨行业的组织。等一下我下面还要说。为什么这样变化，总有人在后面指

【814】周总理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第三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1967年3月18日凌晨。《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有关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一集，页45-47。

【815】王逸伦、王铎，原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

挥，所以指出：内蒙古军区内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他们在北京的六名党委委员也承认这一点。

内蒙军区党委某些领导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在乌兰夫下去后，吴涛不仅是第一副政委，他还是军区党委书记，他还是第一负责人。你们说是群众把他打成的，军区党委没写成决议，实际上是军区党委决定的。你们支持一部分人，名义上叫造反派，实际不能叫造反派。因为吴涛同志和军区的认识不一致了，因此就把吴涛同志打成了三反分子，停止了他的工作，行动受到限制，电话撤销了，不能办公了，不能行使职权，军区没有正式报告中央军委。青海司令员兼政委支持左派被免，形式上做了报告，内蒙军区还不如他们。你们看了青海的文件没有？（答：没有）看了安徽的文件没有？（答：没有）联络员，把青海文件找几份今晚回去读一读。青海刘贤权也是司令员兼第一书记，把职撤了，他们还承担错误。可是内蒙军区，还不承认，说是群众打成的，是三反分子，没有撤职。【816】

在康生插话谈了王逸伦问题之后，周恩来又称：

二、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调内蒙军区任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是被赵永夫罢了官的。这个同志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给中央写了信，很有立场，很有见解。当时，他就支持青海的革命造反派“八一八”。赵永夫已经查明，是反革命分子。把刘贤权同志调内蒙，青海还有另外同志担任。吴涛同志任政治委员。在华北局揭发乌兰夫时，首先是高锦明同志，吴涛在会上的立场很好。王铎很坏，和乌一起哭哭啼啼。当时在会上划分两方面嘛。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军区党委，并对军区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不要讲得太具体了，革命派会理解的，写在文件上就要出去，内蒙发生问题苏修、蒙修很快就知道了。在乌兰夫领导下的一小撮，还没有清理嘛，不仅是军区方面。但毕竟是一小撮，不要扩大，也要事实求是。对军区说的含蓄一些，军队还有高度集中，还有总政、总参、军委嘛。

刘贤权同志来之前，北京军区调一个副司令员代理一段工作。滕海清同志来了没有？请他来嘛，同大家见见面。

第三个问题，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样更会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

【816】 周总理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第六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1967年4月13日晚-14日凌晨。《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有关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一集，页93-100。

筹备小组，革命派有资格。必须左派占优势。也不要忘记保守派改变立场态度，保守派经过开门整风，改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基层有代表性的，也可以吸收个别的人参加，这有好处。他承认错误检讨的好，也可以嘛！不要有对立情绪，特别是三司、“八一八”等革命造反派组织要考虑这个问题，今后情况变化了嘛。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作个良好的开端。

自治区党委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sup>【817】</sup>经过革命群众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他们犯过路线错误，经过检讨、斗争，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嘛。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筹备、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

第四，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释放，包括军队内被打击的干部和战士，包括地方和军队，包括各地区、各分区，统统按这个处理（鼓掌，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对杀死韩桐的凶手，要依法处理。二月五日出生，二月六日发出电报就要追查凶手，到现在已七十天才解决。枪杀韩桐的就是×区柳青，内蒙×区一直不承认，有的人还想替他辩护，而且造谣说是学生自己打死的。吴涛，你打个电话要严加管制起来！（侯凤英：×区还给他送酒送肉，还过礼拜六。）（吴涛：已经戴上手铐了。）不准跑掉！跑掉你要负责任喽。这个在文字上就不要写了，你们知道，群众知道就行了。上次的电报你们登了小报，犯了错误。但是你们态度很好。提醒你们造反派注意，千万不要再加注解登出去了。对韩桐同志可以悼念，开个追悼会，但不要把这事儿过分扩大。悼念韩桐同志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三结合”搞得更好，这就是更好的纪念他。主席有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韩桐牺牲的有代价，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了，夺权了嘛！新生了！他也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第五，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从各个方面揭深揭透。去年华北局会议就把他揭出来了，拉下马了，撤了第一书记。司令员兼政委，就剩下名义主席了。从策略出发，主要是考虑蒙修、苏修问题，没登报公开揭露。斗争是逐步深入的，现在公开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天安门也有大字报了，去年我还劝，现在我就不劝了。

【817】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均为原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



乌兰夫的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但不登报，从政策各方面考虑。（郝广德：我们要求把乌兰夫揪回去斗！）先不要把人揪回去，以后再说嘛！你们的斗争对象很多嘛！

王逸伦实行隔离反省，实际上今晚已逮捕了（掌声，热烈鼓掌声）。

王铎停职检查，交给群众斗争批判（热烈鼓掌声）。你们负责带回去，保证按政策办事。<sup>【818】</sup>

周恩来在接下来的讲话中，还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余下的第六至第八条作了解释。纵观周的整个讲话，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内蒙古军区的个别领导人”“自2月5日以来”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时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对内蒙古军区前段支左工作，基本持否定态度。

翌日，4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正式公布。决定共八条，其中第一至第五条如下：

一、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

内蒙军区党委某些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至于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过的错误，应当接受群众批评，在斗争中改正。

内蒙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还采取两面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

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

二、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担任内蒙军区司令员，由吴涛同志任军区政治委员。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军区的领导，并对军区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

【818】周总理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第六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1967年4月13日晚-14日凌晨。

三、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自治区党委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经过革命群众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筹备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

四、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释放（包括军队内被打击的革命干部和战士）。对韩桐事件的凶手，要依法处理。

五、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王逸伦实行隔离反省，王铎应停职检查，交给群众斗争批判。<sup>[819]</sup>

明显倾向于内蒙造反派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被造反派誉之为“红八条”。

### 三、“红八条”公布后

“红八条”的公布，加深了内蒙已经存在的两派矛盾和保守派的怨恨情绪。出于对八条决定的不理解，内蒙保守派和军区部分干部、战士到京上访请愿。

据呼三司负责人高树华文革结束后称，“红八条”公布后，“内蒙军区领导人中，军区党委副书记、副司令员萧应棠将军，以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回到内蒙立即按中央指示整顿军区内部。……由于他和新到内蒙工作的滕海清将军是老战友，他对滕的工作很支持。萧还配合吴涛政委，在内蒙军区干部中进行教育工作，使司、政、后机关渐渐恢复正常。”“刘昌、张德贵则对八条持消极态度，对抗情绪最大的是黄厚和王良太。黄厚拍着胸脯说：‘内蒙五个第一也罢，十个第一也罢，说我是无产者后台老板也罢，让他们去说吧。’他表示，还要‘上大青山打游击’。王良太暗中支持受蒙蔽的部分群众、战士，大闹内蒙、大闹北京，直至在人民大会堂大打出手。”“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的代表，对中央的决定也不服气，他们认为呼三司能说会道欺骗了中央，是中央听了呼三司的一面之词。一时间，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上访的人逐渐增多。”“4月13日后，鉴于中央要求解散跨行业组织，按单位归口的规划，红卫军、无产者、工农兵改头换面，成立了红色工人、红色战士和无产者。”“4月15、16日，红色工人数万人在呼市

<sup>[819]</sup>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页338-345。

大街游行，高呼‘与高锦明血战到底’，‘坚持打倒呼三司’的口号，公开反对中央八条，并沿路拦截轿车，准备到中南海去闹事。”<sup>【820】</sup>

4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在给“呼和浩特各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指战员同志们”的一封公开信中称，“中央已经正确地处理了内蒙问题，内蒙各方面到北京来反映情况的人，都应当迅速返回内蒙。各方面都不要继续派人到北京来。更不得拦阻火车，妨碍交通，破坏生产。”<sup>【821】</sup>

4月27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及内蒙古军区吴涛、刘华香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内蒙无产者方面数千人，呼三司数十人。北京红代会数千人到场维持秩序。周恩来称，“最近这些天，因为内蒙古，特别是呼和浩特来了一些人，到北京来，一直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叫我们来给你们开一个会（鼓掌，长时间呼口号）。因为这个会不是简单的一个会，在北京发生这样的事情，可以说还是头一次。所以我们也邀了在北京的红代会的各方面的人来听一听（鼓掌，呼口号）。这个问题是由于《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发表以后发生的。我们首先请内蒙军区副司令员刘华香同志把他们的内蒙古军区所作的检讨先讲一讲。”<sup>【822】</sup>

在刘华香检讨后，周恩来在一片口号声、起哄声中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再作一点解释”。会场的混乱情况，从记录周恩来讲活时的情形中可见一斑：

刚才刘华香同志宣读了他们五个同志的检讨，刘华香和吴涛同志留在这里开会，回去的萧应棠同志就站出来作了比较好的检讨，可是其他的人还没有检讨。所以是考察考察，到底这些军区的个别领导人认识错误是诚恳的，还是不诚恳的，我们还要看一看。所以，当时不用点名的方法。这也是给群众通过斗争和运动来鉴别他们（长时间呼口号。有人喊：“我们想念毛主席！”）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现在（连续呼口号，有些人还在喊。康生同志插话：不要捣乱！）同志们！同志们！（连续呼口号）喂！同志们！同志们！你们要听我讲，我们几个同志是受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委托给你们讲的嘛（鼓掌）。如果你们不听我们的（长时间呼口号），同志们！（继续呼口号，吹口哨）同志们！同志

【820】《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页253-254。

【821】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等文件汇集》，1967年4月21日，页5。

【822】周总理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接见内蒙赴京上访人员时的讲话，1967年4月27日。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联络总部：《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1967年6月5日，页3。

们！我再要求你们一次，你们是听话的吧！你们得听我讲完以后你们再喊口号嘛！（鼓掌）！（康生同志插话：你们要听党中央的话嘛！同志们，你们相信不相信我们是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相信不相信？群众答：“相信”。如果不相信的，立刻走出去！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们不相信，立刻走出去！）同志们，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还继续讲。【823】

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接见会竟然开得如此窝囊，这恐怕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头一遭。

5月16日晚，周恩来及康生、江青、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内蒙古军区赴京人员共二千七百余人，其间会场一片混乱，周恩来最后称，“时间很晚了，明天大家是不是分头座谈一下，中央文革、军委文革、总政分头下去听听，我有时间一定也要去听听。”【824】

5月19日凌晨，周恩来与萧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最为倾向保守派的内蒙古军区警卫营代表。周恩来在讲话时以谆谆教导的口吻称，“军队无论如何要巩固、要稳定。这次你们到北京来，除七十三位代表是我请来的，还有自己来的十几位，起码这一点就不怎么讲纪律。你们在大会堂也看到了，有两千七百多人嘛！有许多是自己跑来的嘛，这就涣散了，这就不讲纪律了。这么多部队自由到北京来，还是第一次，但是我们没有责备你们，因为你们还是革命战士。”【825】

5月21日晚，周恩来、康生、徐向前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内蒙古军区滕海清、吴涛、刘昌、刘彬、黄厚、王良太、张德贵，内蒙区党委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周恩来这次口气强硬地声称，“明天开一专车，你们都走，参谋长负责。又一次对你们考验。中央做了这样的忍耐，警卫营行为不能不使人想：口头上拥护八条，但是不回去。是受了外界影响。有人故意歪曲调查组，要重新审定‘八条’。‘八条’是中央决定，根本不能改嘛！根本不能重新审定嘛！还有的说要搞什么‘新八条’，这简直就是捣乱，显然里面有坏人，就看你们来揭了。无产者，工农兵等跨行业上层组织要解散，中央‘八条’明文规定不能改变。明天要开好一个专车等着，如果再不服从命令，以自由脱离解放军，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要采取行动。”【826】

【823】周总理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接见内蒙赴京上访人员时的讲话，1967年4月27日。《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页5-6。

【824】《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页48。

【825】《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页50。

【826】《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页53-54。

5月24日，据高树华称，“总政治部在政协礼堂举行欢送内蒙军区赴京人员回呼大会。<sup>[827]</sup>在王良太策划下，少数干部战士在会场上拍桌子、跺脚、抢夺扩音器，冲上主席台，毒打在主席台就座的吴涛将军，殴打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陆杨<sup>[828]</sup>将军，并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反对中央的五条要求。当晚王良太回到住处，边喝茅台酒，边喊：‘好，好！’”<sup>[829]</sup>

5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以代理司令员滕海清、政委吴涛名义发布的内蒙古军区命令。命令强调“军区各单位到呼市和其他各地串连的人员，必须于五月底以前一律返回原单位，不得在其他地方停留。过期不归的，以自由离开部队处理。”“除步校、卫校、文工团、体工队和军乐队等开展‘四大’的单位以外，军区领导机关和部队一律进行正面教育。”“坚决支持和维护忠实执行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决定的单位和人员。对不满中央这一决定或言行不一、阳奉阴违的人，要进行教育和严格批评；对少数对抗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决定的屡教不改、坚持错误的人，要给予纪律处分。”<sup>[830]</sup>

5月26日晚至27日凌晨，周恩来及中央其他负责人在接见呼市造反派代表时提及了吴涛挨打一事及中央决定采取的措施。周恩来称，“从4月13日宣布八条以后，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们来说许多人到北京闹事、24号达到高潮，军委开的会，李天佑参加了，动手打人发展到高峰，有100多人冲上主席台，把吴涛打了半个多小时，让他签字，李天佑制止，他们不听，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上来讲，他们也闹。刘昌掌握会场也不制止，王良太发言鼓掌很厉害，他发言很有煽动性，问：‘今天的会开得好不好？’众‘好！’和中央唱反调，八百多人等不急[及]了，不择手段，估计形势不足，闹事把他们暴露了。接见警卫营时说了，给他们以后的考验机会，把军队秩序建立起来。昨天我们决定采取五项措施，不能等待了，我们已经说了，等待到一定程度。五项决定是经过林副主席主持的，经毛主席批准的，是根据内蒙形势采取的。”<sup>[831]</sup>

在周恩来讲话的同一天，5月26日，中央对内蒙古军区采取了断然措施，动了组织上的大手术。中央军委当日发布的[67]12号文件《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宣布：对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参谋长王良太实行隔离审查；对军区副

**[827]** 据乌嫩齐称为“中央军委领导副总参谋长李天佑，副主任徐立清，办公厅主任路扬在政协礼堂接见内蒙古军区领导和上访人员”。见乌嫩齐《战地不了情》页59。另据高树华、乌嫩齐称，事件发生在5月25日，周恩来5月26日讲话称为24日，此处从周说。

**[828]** 陆杨，应为路扬。

**[829]** 《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页257。

**[830]** 《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页59-60。

**[831]** 《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页62。

政委刘昌、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军区其他在京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调一个师的兵力移驻呼和浩特；将军区警卫营、通信营部分人员和高炮营、测绘大队调离呼和浩特市，分驻北京军区指定地区；将内蒙古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sup>【832】</sup>

根据军委决定的精神，北京军区随即在呼和浩特市东北平顶山设立了内蒙古前指，由滕海清负责。调六十五军一九三师五七八团（欠一个营）和五七九团一个营，六十九军二十八师八十三团、八十四团和八十二团二营及铁道兵五十二团，共一个师的兵力，移驻呼和浩特，归前指指挥。前指具体负责人为二十八师师长张广有。

内蒙古军区降为省级军区后，所辖部队和军分区不变。司令员刘贤权（未到职），代理司令员滕海清，政委吴涛，副司令员刘华香、刘彬、萧应棠，副政委杨永松（未到职），参谋长耿淑明（未到职），政治部主任郭云昆。<sup>【833】</sup>1967年12月，滕海清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吴涛任第二书记。

6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经报中共中央批准，由滕海清任组长，吴涛为副组长。11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滕海清任主任，吴涛、高锦明、霍道余<sup>【834】</sup>任副主任。

以后的事实证明，滕海清并非内蒙一把手的适当人选。内蒙古民众随即迎来的，是一场更为深重的灾难。

## 第四十三节 四川：成都军区改组后的两年

### 一、四川“红十条”与成都军区改组

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军委十条”公布之后，成都军区主导的四川“二月镇反”遭致否定。从4月初开始，被关押的人陆续释放并平反，被取缔的组织重新恢复活动。<sup>【835】</sup>

3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435期，刊登了原四川宜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禾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来信摘要《四川宜

【832】 《“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235。

【833】 杨永松，时任北京军区工程兵副政委，1955年授衔少将。耿淑明，时任陆军第六十三军副参谋长。郭云昆，原北京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耿淑明、郭云昆，1965年大校军衔。

【834】 霍道余，建工部八局第一建筑公司汽车司机，华建井冈山负责人。

【835】 整个平反工作在6月20日成都军区发布《平反公告》后基本结束。参见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大事纪述》下，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页137。

宾革命派大批被关，斗争十分艰苦》。毛泽东阅后批示称，“中央文革小组：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也应来。请商总理酌办为盼。”<sup>[836]</sup>

根据毛批示精神，4月1日至3日，由周恩来牵头，中央在北京连续三次召开会议解决宜宾问题。成都军区韦杰、甘渭汉以及四川省委，宜宾地、市委部分负责人，宜宾地区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文革前夕已结案的原宜宾地委第二书记刘结挺等人一案，被当事人及部分群众组织提出重新审议并得到中央响应。<sup>[837]</sup>

4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平反的通知称，“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革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我们根据主席指示，研究了刘结挺等同志的申诉材料，也研究了西南局、四川省委和中央监委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档案，听取了有关宜宾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问题是很清楚的”，“这个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刘结挺案应予平反。所有因为这个案件而受处分的同志，应一律取消处分，开除党籍的应恢复党籍，关在监狱里的，应当一律放出”，“受陷害的刘结挺、王茂聚、张西挺、郭林川、李良等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他们对右派分子郭一等人，对李井泉等人的翻案风，坚持革命原则的斗争，是完全对的。这些同志和同案的其他同志有权参加四川省和宜宾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地驻军的负责同志要协助他们，支持他们闹革命”。<sup>[838]</sup>

在宜宾问题告一段落后，中央召集的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紧接着在北京召开。5月初，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成都造反派与保守派产业军的矛盾冲突升级为武装械斗。5月4日，四川第一棉纺厂发生成都地区首次大规模武斗，双方各从厂外调来数千人增援，造成两人死亡，260余人受伤，该厂产业军重要据点被

**[83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97。

**[837]** 刘结挺等人案，涉及1960年代初宜宾地委第二书记刘结挺、宜宾地委副书记王茂聚、宜宾市委书记处书记张西挺（刘结挺妻）、宜宾地委组织部部长郭林川、宜宾市委宣传部部长李良等人。时指刘结挺等“实行封建家长式统治，对敢于揭发批评他们的人，利用政治运动和种种机会，进行残酷迫害，制造了多起冤案，在宜宾地区和军队干部中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给党造成严重损失。”1963年，刘结挺、张西挺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5年2月23日，经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批准，刘结挺、张西挺被正式开除党籍。参见《四川省志·大事纪述》下，页138。

**[838]**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办公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7月，页308-310。

摧毁。5月6日，造反派数万人发起对成都产业军势力最强大的西郊黄田坝132厂<sup>[839]</sup>的冲击。产业军退守厂区，逼迫在场领导“发枪护厂”，领出各种枪械二百余枝，向围攻者开枪射击，打死48人，伤127人。<sup>[840]</sup>

5月7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萧华、杨成武等接见四川造反派赴京代表。周恩来称，“今天开的这个结束会，刚才伯达同志宣读了，同志们都支持张国华<sup>[841]</sup>，同志们也表示坚决拥护，大家对萧主任、江青同志讲话也支持。韦杰、甘渭汉检查，同志们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们受压制，他们检查有一个过程嘛！但不一定在北京。要听其言观其行，在新的领导下，给他们改造的机会，这是第一。”“二、有些同志到北京，长的几个月，短的几天，我们要很好地估计形势。昨天成都事件，好像很乱，我看是大好形势，去年你们到北京来，那时喊口号‘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可是没有打倒。现在你们把他拉下马了嘛！”<sup>[842]</sup>

同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公布。决定共十条，故被称之为“红十条”，其中第一至四条称：

一、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李井泉的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军区在反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黄新庭、郭林祥的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成都军区在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

**[839]** 132厂为三机部大型歼击机总装厂，第二厂名为“国营峨嵋机械厂”。时已实行军事管制。

**[840]** 《四川省志·大事纪述》下，页138；《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页314。

**[841]** 张国华，1955年授衔中将。1967年5月任成都军区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仍兼西藏军区司令员至1968年12月）。1968年5月任四川省革委会主任。1971年8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2年2月21日在成都病逝，年仅58岁。

**[842]** 新湖大革命造反临委会宣传部：《首长讲话》第4号，1967年5月25日，页86。



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sup>【843】</sup>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改正。五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毛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

三、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sup>【844】</sup>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

四、宜宾地区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负责组织宜宾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

其他专区和省属市或者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请中央批准。

各专区和省属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按第三条规定的原则处理。

针对5月6日成都132厂流血事件，决定增加了最后一条即第十条称：

【843】 时成都军区除辖陆军第五十四军外，尚兼四川省军区，下辖康定、凉山、茂县、西昌、温江、绵阳、雅安、内江、宜宾、乐山、江津、涪陵、万县、南充、达县、重庆、成都共17个军分区，自贡市、渡口市2个人民武装部。并辖1个独立师（代号7825部队），20个军区步兵团，7个军分区独立团，8个军分区独立营，通信团、汽车团各一个，2个骑兵团及3个工程兵建筑团。上述军分区及地方部队绝大多数倾向保守派或造反派的右翼，但也有极个别例外，如1967年中驻四川永川县的成都军区工程兵建筑第三〇六团（代号7784部队）即支持永川红旗派（与反到底同派）。11月中旬该团奉命调离永川时，永川红旗派曾发动上万群众卧轨阻止军列开走，时间长达53天，史称永川“卧轨留军”事件。

【844】 梁兴初，1955年授衔中将。1967年3月由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5月任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68年5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8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二书记。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1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2年被点名定性为“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1973年3月下放到山西工厂劳动。1981年10月后被决定免于党内外一切处分，按大军区正职待遇。1985年10月5日在北京病逝。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sup>【845】</sup>

中央上述决定点了成都军区原司令员黄新廷、第三政委郭林祥的名，又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虽加上了一句“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改正”，但改正了也不行，成都军区要进行改组。当月，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3月已到任的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任第二书记，甘渭汉任第三书记。7月，军委命令，任命刘结挺、谢家祥为成都军区副政委，9月，任命胡继成、胡炳云为军区副司令员，郑本炎为军区后勤部部长。<sup>【846】</sup>不久前才恢复党籍、并非现役军人的刘结挺，成为成都军区改组的最大得益者。<sup>【847】</sup>



毛泽东接见左起：梁兴初、张西挺、张国华、刘结挺，北京，1968年5月。

四川省革筹小组的成立及成都军区的改组，使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人一时成为四川显赫人物。惟正如一位经近距离观察的论者所指出，“以后的事实表明，张、梁、刘、张四个人三种态度：刘、张二挺和兵团、八二六‘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梁兴初同情保守派，支持红成，利用他和五十四军的老关系在重庆另立中心；……作为一把手的张国华是骑墙派，两边和稀泥，人称‘八级泥水匠’。张国华在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与梁有区别，他吸取了在西藏差点被打成走资派的教训，坚决按照中央‘红十条’，以及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态度支

【845】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二集，1967年6月，页103-111。

【846】 谢家祥，前为五十四军政委，1955年授衔少将。胡继成，前为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1955年授衔少将。郑本炎，前为广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64年晋升少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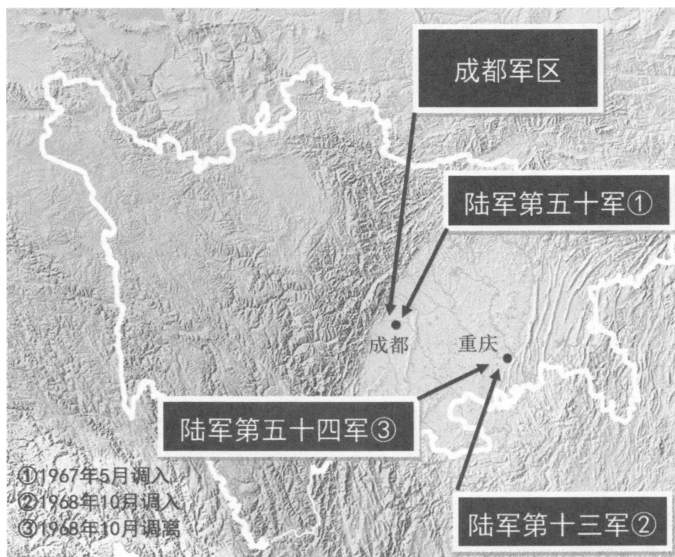
【847】 类似刘这样自己造反又支持造反派的地方干部被破格授予军内高级职务，在全国并非仅此一例。5月，张春桥已被任命为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王效禹被任命为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刘格平和潘复生分别被任命为北京、沈阳军区政委。

持造反派，支持刘、张，不像梁那样与造反派和刘、张格格不入，由此而与梁产生分歧，梁怒而出走到重庆另立中心。”<sup>【848】</sup>

张国华的态度，实际上是偏向八二六及刘、张的。因他在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期间已经明确了解到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偏向八二六派的态度，他不能不努力紧跟毛泽东，紧跟中央文革。他甚至提出在四川要武装左派。他在八月底的一次讲话中声言：“武装左派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四川有几个地方已经武装了经得起考验的革命左派，一个是万县，一个是涪陵，还有泸州。万县、涪陵革命派经过几个月同保守组织的斗争是经起了考验的。所以在前几天把他们武装起来了。革命派的武装要成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保护国家财产，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坏人杀害革命群众的强大力量。武装革命派要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要经中央批准后再作，一定要掌握在最可靠的人手里。我们这两个地方都报了中央，经中央批准才作的，不能随便武装。”<sup>【849】</sup>

张、梁的分歧，很快就半公开化。1967年10月底，梁兴初离开成都，住到重庆的五十四军军部，实际上形成了四川的另一中心。1967年冬，成都的红成、

### 四川驻军分布图(1967-1968)



【848】 陈永迪：《我在成都“二月镇反”前后的经历》。《昨天》2017年11月30日第100期。

【849】 张国华同志在四川省农业生产计划、财贸、金属材料生产供应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8月28日。东方红出版社革命造反总部：《蓉城快报》第一期，1967年9月。

重庆的八一五派联合其它地方的一派群众组织在全川掀起“打倒刘张”（打倒刘结挺、张西挺）高潮，四川以拥护刘、张与反对刘、张为分野，形成势同水火的两大派，对峙以至武斗局面为之加剧。

## 二、五十四军与重庆文革

在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公布九天之后，5月16日，中央又专门就四川第二大城市重庆问题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称：

中共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关于重庆市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第一、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第二、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sup>【850】</sup>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

中央同意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第四、……

第五、……<sup>【851】</sup>

【850】 蓝亦农、白斌、唐兴盛，1965年大校军衔。

【85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二集，1967年6月，页115-124。

上述意见中提及的“重庆警备司令部”<sup>[852]</sup>及重庆“当地驻军”，实指自1958年起领率机关驻重庆市的陆军第五十四军。1967年1月介入地方文革时，该军为成都军区所辖唯一一个建制军，辖陆军第一三〇师、第一三四师、第一三五师。军领率机关代号7788部队。军长韦统泰，政委谢家祥，副军长白斌、韩怀智、董占林，副政委钟池、蓝亦农，参谋长耿志刚，政治部主任梁大门。<sup>[853]</sup>7月，谢家祥升任成都军区副政委，钟池调任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蓝亦农提为军政委。

陆军第一三〇师，师部驻雅安，代号7790部队。师长赵举，政委支万鉴，副师长成德禄，副政委张示心、杨云汉，参谋长周云飞，政治部主任孟肖野。所属步兵第三八八团驻夹江县，代号7791部队；步兵第三八九团驻犍为县，代号7792部队；步兵第三九〇团驻彭县，代号7793部队；炮兵第五四〇团驻夹江县，代号7794部队。1967年1月介入地方文革后，一三〇师支左范围为成都市，雅安、乐山专区，宜宾、泸州市，夹江、犍为、彭县。

陆军第一三四师，师部驻南充市，代号7795部队。师长张进，政委李晋爱，副师长李富元，副政委朱志伟，参谋长史桂先，政治部主任汪永富。所属步兵第四〇〇团驻大竹县，代号7796部队；步兵第四〇一团驻南充市，代号7798部队；步兵第四〇二团驻潼南县，代号7799部队；炮兵第五四一团驻铜梁县，代号7801部队。1967年1月后，派出5,713名干部、战士分别在南充、万县、江津、达县、绵阳等五个专区，重庆、成都、南充、万县四个市的27个县（镇）共108处地区进行三支两军。4月运动进行到激烈时候，全师除高炮营执行援越抗美任务外，全部投入了三支两军的第一线工作。<sup>[854]</sup>

陆军第一三五师，师部驻江津县，代号7803部队。师长王明德，政委李蔚华，副师长郑金海，副政委孙呈祥，参谋长贾理，政治部主任丁文华。所属步兵第四〇三团驻泸州市，代号7804部队；步兵第四〇四团驻璧山县，代号7806部队；步兵第四〇五团驻重庆市沙坪坝，代号7807部队；炮兵第五四二团驻璧山县，代号7808部队。1967年1月后支左具体步署：四〇四团两个营和四〇五团在重庆地区随军部支左；师部负责江津县，并分别抽调四〇四团三个营和炮兵五四二团三个连负责川汽厂支左；四〇三团在泸州市、宜宾市支左；四〇四团（欠三个步兵营）在璧山县支左。6月，为加强重庆地区的支左工作，师各部队陆续

**[852]** 重庆警备司令部于1960年组成，具体办事机构由陆军第五十四军兼任，不另设机构。成立初期，五十四军军长丁盛为司令员，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为政委。

**[853]** 韦统泰、钟池，1964年晋升少将。韩怀智、董占林、耿志刚、梁大门，1965年大校军衔。

**[854]** 《陆军第一六一师师史》（初稿），页227-228。

奉命调至重庆（师部及四〇四团炮兵营仍担任江津县、璧山地区支左任务），基本部署是师部率四〇四团负责大坪、杨家坪、九龙坡地区，并担任机动任务，四〇三团在两路口、江北地区，四〇五团在沙坪坝区，炮五四二团在南岸区。七八月份，重庆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师各部队深入第一线制止，有六名干部为此而牺牲。<sup>【855】</sup>

军领率机关及直属部队（包括驻铜梁县、代号7789部队的军炮团）三支两军范围为重庆市，潼南、合川、大足县等地。

介入地方文革初期，五十四军党委书记、政委谢家祥与军党委副书记、军长韦统泰负责军的全面工作，参谋长耿志刚协助；副政委蓝亦农、副军长白斌负责重庆市的三支两军工作，副军长韩怀智协助；副军长董占林、副政委钟池负责抓全军的军事训练、行政管理和政治工作。<sup>【856】</sup>

在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公布前，由五十四军所支持、重庆八一五派所建立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革联会）已于2月8日宣告成立。该委员会的主任，由五十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出任，下属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均由军队干部担任。革联会成立、尤其在“二月镇反”后，在重庆两大派——八一五与砸派（1967年7月中旬后改称反到底派）的对立中，五十四军自然是偏向于自己从支左开始即明确支持的造反派中的主流派——八一五派的。这种倾向性，一方面在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中受到批评：“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另一方面，中央又认为五十四军“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尽管中央没有承认过五十四军主导的重庆“革联会”，但在决定组建重庆市革委会筹备小组时，仍主张由五十四军主要领导人负责，这也就充分表明，五十四军依然是北京解决重庆地区问题的主要依靠力量。

5月26日，五十四军致成都军区并报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电报称，这几天，军的领导同志全力以赴，在重庆先后十多次约见了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和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总等组织的负责人交谈，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此外，通过接待来访，对反对派的一般群众进行了工作，并同有的组织搞了军民联欢。通过这些工作和活动，消除了一些误解，对立情绪有所缓和，思想感情较前

【855】 中共步兵第一六二师委员会：《猛虎雄风——步兵第一六二师师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页180。

【856】 逯守标：《从书生到虎将——韦统泰将军》，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1年，页413-414。正式介入文革之前的1月8日，韦统泰曾在军部大门外遭造反派红卫兵绑架，扣留一周后方将其放出送回军部。

有所接近。反对派表示拥护中央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愿意接受市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原则上同意实现两派联合。但要真正实现两派联合，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翌日，毛泽东代军委拟转发该电报的批语，肯定了五十四军的工作：“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sup>[857]</sup>

毛泽东的批语，无疑被五十四军视为手中的尚方宝剑。然而，在砸派看来，五十四军虽说是两派调停人、裁判者的角色，但更多的是站在八一五派一边，故此，虽则有此“最高指示”，砸派对五十四军仍不大买账。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公布之后，重庆地区的武斗不仅没有消停，反而呈现出有增无减的态势。

8月，省革筹调查组调查重庆武斗损失情况。调查表明，重庆165个大中企业因武斗停产或半停产的达157个，其中完全停产的达109个，因停产减少产值3亿余元，厂房和大量物资遭破坏，直接损失达1亿元。主要公路被切断，交通基本瘫痪。

9月1日，重庆两派达成立即停止武斗的初步协议，商定于2日18时起无条件全面停火，4日前分点封存武器。9月8日至9日，重庆两派在重庆警司谈判停止武斗、收缴武器，达成协议。9月9日，重庆警司发布停止武斗、收缴武器办法。同日，重庆反到底派发表《紧急告全国人民书》，表示“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公开认错……未经中央允许动用了国防企业的武器、弹药是不对的”，保证“立即集中上交用于自卫的一切武器、弹药”，并抢先作出姿态将一批武器、弹药送往重庆警司上缴，中央调查组组长陈彬<sup>[858]</sup>、四川省革筹调查组组长张西挺接见了上缴武器、弹药的代表。

此后大半年，重庆局势反反复复。在1968年3月“三一五指示”中，五十四军被周恩来批评为“十条为五十四军说了几句好话，是否有点翘尾巴了”，“五十四军在重庆的态度有问题，助长了红成打倒刘、张的气焰”，“五十四军去年风格不错！就是回去翘尾巴了，不仅思想感情没转过来，立场也没有转过来”。五十四军上下，在“三一五指示”传达后受尽了窝囊气。因“三一五指示”对红成、八一五派的严厉批评激化了四川两派矛盾，导致许多地方武斗重起或升级，中央不得不

【85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56-357。

【858】陈彬，时任总参军事部副部长，1961年晋升少将。

在一个多月后又作出一个“四二七指示”，批评了借“三一五指示”之风掀起打谢（家祥）反梁（兴初）高潮的八二六派，叫五十四军把腰杆挺起来。

为使野战军从地方两派缠斗中摆脱出来，1968年10月，中央决定部分深陷派斗泥淖的野战军调防。五十四军调离驻防十年的川东地区，接替十四军驻防滇西，一并了结了与重庆及川东两派的恩恩怨怨。

### 三、五十军入川<sup>【859】</sup>

5月27日，军委命令：“调沈阳军区五十军进驻四川，归成都军区建制。”

此前，陆军第五十军驻辽宁丹东地区，辖陆军第一四八师、第一四九师两个师（原所辖第一五〇师已于1964年12月改编为辽宁省军区独立师）。军领率机关驻丹东市，代号3197部队。军长曾泽生，政委曲竟济，副军长郑志士、孙洪道、李佐、张玉成，副政委刘伯堂，参谋长杨增彤，政治部主任胡俊人。<sup>【860】</sup>1967年1月介入地方文革后，军直、一四八师、一四九师分别担负辽宁丹东、凤城、东沟等市、县的三支两军任务。

5月28日，杨成武、萧华、陈锡联、李天佑在北京京西宾馆召见五十军主要领导。杨成武称：“这次主席、中央决定调50军到四川，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措施。四川是我国的大后方，大三线在这里，人口多，物产丰富。几条铁路修通后就更方便了。成昆路预计明年七月通车。川豫、川汉路已设计完毕，通西藏的公路已改修取直了。四川面积57万KM，七千万人口。现有54军，一个独立师，29个独立团，但不敷分配，内地交通不很方便。现在文化大革命所需要，将来战争也很必要。这次调该军还有个因素，解放战争时50军曾进川到成都附近，当时未让进去。走得急是由于成都部队在支左中犯了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造成混乱。中央决定后已有好转。当前主要任务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4军负担太重，现分散到10个地专、48个县，主要是过去李井泉排挤野战军所造成的。你们到后准备到适当的时候再组建一个师起来，中央已经决定了。去了以后的部署，你们驻西部，以成都、双流、乐山为中心。雅安地区130师变动否以后再说。到达后会立即上马进入情况，虚心接受军区及筹委会的领导，立场不能站错。刚去各派都会欢迎你们，几天后要你表态，你表态后就会有不同的反映了。甘、韦他们

【859】 主要资料来源：陆军第五十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十军军史1949—1985》，1987年5月。

【860】 曾泽生，原国民革命军起义将领，1955年授衔中将。1966年8月后，五十军实际上主要由军党委代理书记郑志士及副书记曲竟济负责。曾泽生1968年9月离休，遗缺由孙洪道接任。曲竟济，1964年晋升少将。郑志士、孙洪道、李佐、张玉成、刘伯堂、胡俊人，1965年大校军衔。



就是越陷越深，抓那么多人，不听上边招呼，总有自己的看法。林副主席告诉我们：对主席思想指示你理解的办，你不理解也要办，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主席指示。”<sup>[861]</sup>

萧华在接见时指示：“你们军是第二次入川，和前次是很不同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二次解放四川，是支持革命派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战略后方任务是很重大，很光荣，对你们是最大的信赖，最大的鼓舞。在政治思想上：很好地宣传文化大革命，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四川是刘邓贺彭罗李一伙的独立王国，以此来对抗主席一系列指示，是贯彻执行刘邓的那一套。17年来四川是贯彻着两条路线斗争，他们是雀牌、弹子俱乐部的人，把持西南作为对抗主席的基地并伸手西北。在军区里安了他们的人，黄、郭就是他们的钉子，来控制军队。把他们挖出来之后，是个很大胜利，没有乘胜前进，而自满不清醒，又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支持了李、廖、程所操纵的组织，打击了首先起来揪李井泉等的革命左派组织，以韦杰、甘渭汉为首的不很好跟上头，而提出镇反运动，大批抓人，造成白色恐怖（重庆地支持了左派打击了左派），<sup>[862]</sup>很多人到北京告状，跑反，因而中央召开会，经两个月做出四川问题决定，把不正常的道路挽救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进川后就面临着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旗帜必须鲜明，要能抵制住逆流，一定要拥护执行四川问题，宜宾、重庆问题的决定，谁反对、违背就反对他，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插遍全四川，高举文化大革命的旗帜，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才能团结广大群众，你们还会遇到和军分区、独立团的矛盾。你们到四川后主要任务是支左。首先是政治思想上支左，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去识别、锻炼左派。在调查研究中不要光听军分区，武装部的介绍，要到群众中去，到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去了解。许多地方夺权是假夺权，还得重来，要有去做群众工作的本领，要相信依靠群众大多数。要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武斗在四川是最严重的，要很好宣传制止，不要带枪，军队本身要遵守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不开枪。就是宣传！告他们代表开会解决。支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现在搞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服从他们及军区梁、张的领导，服从军区党委的领导。四川工厂多，铁道兵28万。大三线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大后方，而是世界革命的大后方。过去刘邓抗拒主席指示，使

---

**[861]** 郑志士工作笔记，1967年5月28日。<http://www.wyxxwk.com/e/mp/content.php?classid=21&id=391035>，最后访问：2020年5月20日。

**[862]** 原文如此。

三线建设推迟 2-3 年，现在我们要力争，你们担负支援大三线的建设，还有担负保卫支援大西南的任务。”<sup>[863]</sup>

据五十军军史称，在接到军委 5 月 27 日命令后，“军长曾泽生、政委曲竞济、第一副军长郑志士，迅速收拢分散在辽宁、内蒙、黑龙江地区执行‘三支两军’和施工、生产任务的部队。五月二十八日，军前指率先头部队步兵第四四六团乘火车出发，主力于六月一日晚开始，按步兵第一四九师<sup>[864]</sup>、军直、步兵第一四八师的序列，分三个梯队由丹东地区开进，到六月十二日，全部到达指定位置。根据军委命令和成都军区的部署，军指挥机关和直属队驻成都市，一四八师师长张志礼、政委高星耀率指挥机关及各团驻双流、新津、温江地域；一四九师师长林长修、政委成锋率指挥机关及各团驻乐山、仁寿及五通桥地区。”

五十军领率机关抵达四川后，代号改为 7848 部队。军直属炮兵团代号由 3214 部队改为 7849 部队，直属高炮团代号由沈字 494 部队改为 7800 部队。一四八师代号由 3198 部队改为 7854 部队，辖步兵第四四二团、第四四三团、第四四四团及炮兵第五二八团。一四九师代号由 3204 部队改为 7861 部队，辖步兵第四四五团、第四四六团、第四四七团及炮兵第五二九团。

五十军领率机关进驻成都后，遵照军委 6 月 8 日关于“成都警备区由五十军军部兼（不另组警备司令部机构）”的指示，负责成都市区的警备执勤任务。同时，为了加强成都市的警备执勤力量，稳定形势，报请上级批准，于 1968 年 1 月 14 日，将陆军第一四八师部队调入成都市驻防，师部从双流县移驻成都市。

五十军调防入川时，军委已决定：待五十军入川后，从成都军区现有独立团、营中，抽调部队组建一个步兵师。11 月 15 日，成都军区根据军委指示，命令组建陆军第一五〇师，归五十军建制领导。执行南方步兵师中师编制，下辖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12 月 1 日，一五〇师在绵阳县召开建师大会。组建后，师代号 7797 部队。师长魏国鑫，政委张金省。师指挥机关及直属分队驻绵阳县，所辖步兵第四四八团驻什邡县；步兵第四四九团开始驻成都市，后移驻广元县；步兵第四五〇团开始驻广元县，后移驻江油县；炮兵第五三〇团开始驻三台县，后移驻德阳县。

据五十军军史称，该军调防入川后，“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都军区党委决定，以我军为主组成‘五十军支左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成都、温江、乐山、绵阳四个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工、农业生产，党、政建设和社会

<sup>[863]</sup> 郑志士工作笔记，1967 年 5 月 28 日。

<sup>[864]</sup> 正确番号应为陆军第一四九师，下同。

治安等各项工作。部队各级一、二把手都亲自抓这项工作，全军每年都派出两万余名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换言之，五十军入川后，五十四军退出了上述四个地区的三支两军。在这些地区，新来乍到的五十军主要倾向是支持兵团、八二六派，对红成派采取了压抑的态势。

1969年8月19日，中共中央电示，同意西藏军区陆军第五十二师和五十军陆军第一四九师于九月份对调防务。随后，成都军区授予调防的五十二师代号为0044部队。按照成都军区8月31日的指示，五十二师入川后，师部率一五六团驻乐山、五通桥地区，一五四团驻眉山，一五五团驻犍为，师炮团驻峨眉，师高炮营由简阳归建。从9月15日起至11月21日止，调防基本结束。12月10日成都军区又指示：将五十军的第五十二师改称第一四九师，其所属之步兵第一五四、一五五、一五六团依次改称步兵第四四五团、四四六团、四四七团，所属之炮兵番号亦作相应改变。

#### 四、四川省革委会成立

1968年2月，为推动四川的“大联合”“三结合”，促进四川各级革委会的成立，中央在北京举办了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在学习班期间的3月15日晚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成都军区和五十军、五十四军的领导并讲了话，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参加了接见。这次接见讲话，史称“三一五指示”。

周恩来在讲话中批评四川落后了：“现在是江苏、浙江、安徽、湖南、辽宁、陕西、宁夏、新疆，有八个省三月底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了。就看你们的了，你们落后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当然这是句古话，不能这么说。剩下后四个省了，四川、云南、福建、广西。（张国华：西藏也联合了。）还有西藏，也快了。要把矛头对准最大走资派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及其顽固追随者黄新廷、郭林祥，这样矛头集中对准主要敌人，就统一了，派性就少了，共同性就多了。要解决问题，还是按红十条办，破题还是破在这上头。”<sup>【865】</sup>

周恩来又批评重庆八一五派称：“去年把李井泉搞去，不给反到底斗，反到底扎了三个草人，斗了后把他烧了，‘纸船明烛照天烧。’为什么不给他们斗，这是大方向问题，我是听主席说的。主席看的比我们多，是主席看小报，看了给我们

---

【865】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同志时的讲话，1968年3月15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政工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政治部翻印，1968年3月20日。

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派批得一塌糊涂，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你们革命委员会三月份搞不起来，四月份总会搞起来，一推动就解决了。”周恩来批评张国华、梁兴初称：“你们在党委会上的发言，都没有把握大方向。反刘、张的材料，很多都是从李井泉那里搞来的，实际上是替李井泉翻案。……（张国华：记得总理还说，再打刘、张要通报全国。）是的，是在主席那里讲的。十条为五十四军说了几句好话，是否有点翘尾巴了。（兰：五条下达后，没有压过反到底，主要是感情上有问题。）对“反到底”不仅是感情的问题。”<sup>【866】</sup>

江青在讲话中称张、梁与刘、张“应该抱得紧”：“我今天放一炮，你们两位（指张、梁）是中央派的，一个从广东去的，一个从西藏去的。刘、张是中央平反的。你们是一起从这里回四川的，应该抱得紧。张、梁是军队的，更应该主动。我这样讲，不能说刘、张没有缺点，刘、张也有缺点错误。要顾全大局。四川已经乱得差不多了。不顾全大局的人，什么事情也办不好。”<sup>【867】</sup>

在江青插话后周恩来再次批评张国华、梁兴初及五十四军称：“他是了解情况的，有点吞吞吐吐（指张国华）。我问的那句话，就是要你直说，你要敢讲。你那发言是滑稽的，你对重庆两派的说法是矛盾的。八一五是响应红成在成都打刘、张的，你说他比反到底错误少，你的发言是有偏向的，没有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讲话。你在中印边界，主席交给你的任务，你的决心那么大，为什么这次你没有那么大的决心。十条对五十四军称赞了，五十四军有点翘尾巴。对八一五偏听，所以八一五响应红成打倒刘、张的口号，没有站在全局，五十军去年十二月的电报是好的。五十四军在重庆的态度有问题，助长了红成打倒刘、张的气焰。张、梁、刘、张是不可分的，是十条上肯定的。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指梁）你在重庆对反到底的讲话，敢那么批评，没有讲八一五。给八一五那样讲就好了。（梁兴初：给八一五讲了。）我没有看到。”周恩来还称：“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就是反中央。在四川就是站在李、廖一边，在全国就是站在刘、邓一边。今天就讲到这里，学习两天，明天就到学习班去讲，问他们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李、

【866】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同志时的讲话。

【867】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同志时的讲话。

廖走，刘、邓走。”“五十四军去年风格不错！就是回去翘尾巴了，不仅思想感情没转过来，立场也没有转过来。”<sup>【868】</sup>

“三一五指示”传达后，重庆反到底派和成都兵团、八二六派欢天喜地，

重庆八一五、成都红成派与五十四军垂头丧气。不料一个多月后的4月27日，周恩来、康生、江青等再次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成都军区 and 驻川部队有关负责人，对“三一五指示”下达后四川出现的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批评了成都兵团、八二六派和重庆反到底派一些头头指使下属把矛头指向军队，搞“打谢（谢家祥）反梁（梁兴初）”的错误。这次讲话后来被称为“四二七指示”。此次接见，扭转了重庆反到底派和成都兵团、八二六派“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的局面，四川两派重新得以表面的平衡。

5月28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北京接见四川赴京代表，由周恩来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其中称：“中央同意：由张国华同志担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大章、梁兴初、刘结挺、天宝、张西挺（女）、徐驰、邓兴国、江海云（女）、王恒霖、彭家治、张泗洲、冯玉德、蔡文彬、杨志诚、但坤蓉（女）同志担任副主任。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所提的常委和委员名单。”<sup>【869】</sup>

以上省革委会主任、副主任16人名单中，现役的张国华、梁兴初理所当然地为军队代表，刘结挺虽然不是现役军人，因有着成都军区副政委的身份，亦被列为军队代表。干部代表为李大章、天宝、张西挺、徐驰四人，其余九人为群众代表。

## 五、十三军入川

1968年10月，陆军第十三军遵照军委命令，由滇南调往川东，接替五十四军防务，隶属成都军区建制。时军长顾永武，政委段思英，副军长阎守庆，副政委何云峰、朱光海，参谋长赵静波，政治部主任袁明。所辖陆军第三十七师师长耿忠贤，政委陈占楼。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英才，政委杨振贤。第三十九师师长马玉芳，政委赵伟。<sup>【870】</sup>军代号由7557部队改为0010部队。

【868】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同志时的讲话。

【869】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1968年5月28日。中发〔68〕75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8年5月28日发出。

【870】 段思英，1961年晋升少将。何云峰，1964年晋升少将。顾永武、阎守庆、朱光海、袁明、耿忠贤、张英才，1965年大校军衔。

十三军调防入川之时，四川局势已大致平静，十三军算检到了一个便宜。据该军军史称，“从十月十九日起，部队开始部署调防工作。二十九日，首批部队出发，至十二月十九日，全部移防完毕，进入新的防区。军部驻重庆市市中区浮图关，并兼重庆警备区工作。第三十七师师部驻江津县，部队分布于江津、璧山、重庆等地；第三十八师师部驻南充市，部队分布于南充、阆中、遂宁等地；第三十九师师部驻内江市，部队分布于内江、泸州、隆昌、彭县等地；军地炮团驻铜梁县。”<sup>【871】</sup>

该军军史又称：

我军入川后，根据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和成都军区的指示，接替五十四军在川东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部队先后派出干部战士一万零九百五十七人（其中干部二千八百五十七人、战士八千一百人）担负重庆、江津、南充、内江、宜宾、自贡、泸州等地（市）和所属的三十七个县（区）、二百五十一个厂矿、四百六十一个企事业单位、六十一个公社、二百二十六所院校的三支两军任务；派出执勤部队八千六百六十六人（其中干部四百九十二人、战士八千一百七十四人）负责重要目标和国防厂矿、铁路交通等单位的警卫执勤。此外，还抽出部分人员参加成都、绵阳等地的三支两军工作。

按照四川省革委和成都军区划片包干的决定，以我军为主组成“十三军支左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川东部分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党政建设、工农业生产社会治安等各项工作。三支两军作为部队的中心任务，各级党委和领导都集中主要精力，由一、二把手亲自抓，有的还兼任了地方领导机关的一把手。

此时，川东地区绝大多数县团级单位尚未建立“三结合”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有的虽然勉强建立了，但由于派性干扰，经常处于纷争和动荡之中，无法行使其职能；一些单位由于两派造反组织之间继续存在严重的对立，使干部迟迟得不到解放，无法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大规模的武斗虽然已停止，但各方面的秩序还比较混乱，生产很不正常，交通运输不畅，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根据上述情况，军党委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和一九六九年元月，先后召开了党委会、党委扩大会和驻渝部队负责同志碰头会议，决定把正确对待两派群众组织，千方百计稳定川东地区局势作为我军和驻渝部队三支两军的工作方

【871】 陆军第十三集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三军简史》下卷，1993年，页178。

针和指导思想，明确提出了正确对待和处理两派群众、各级革委会和兄弟部队之间关系的原则。

……经过指战员积极努力的工作，到一九六九年上半年，我军部队支左地区的绝大多数干部均已得到解放，县团级以上单位基本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并恢复了从一九六六年冬即陷于停顿的党团组织。<sup>【872】</sup>

## 六、各地市三支两军及革委会的建立

文革期间，四川省下辖成都、重庆、自贡、渡口4个市，温江、绵阳、内江、宜宾、乐山、江津、涪陵、万县、南充、达县、雅安、西昌12个专区，阿坝、甘孜、凉山3个自治州，一直没有变动。以上各地市三支两军及革委会建立简况如下：

### 1. 成都市

成都市是五十军入川后三支两军的首要范围。1968年5月4日，四川省革筹小组、成都军区党委批准成立成都市革委会，五十军副军长孙洪道任主任。

### 2. 重庆市

不言而喻，重庆市是五十四军三支两军的重中之重。1968年10月五十四军调防后亦为十三军三支两军的重点地区。1967年5月16日，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委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为组长，白斌为副组长。1968年6月2日，经四川省革筹小组、成都军区党委批准，重庆市革委会正式成立，已升任五十四军政委的蓝亦农任主任。1968年12月，由十三军政委段思英接任。1969年12月，由升任十三军政委的何云峰接任。

### 3. 自贡市

1967年12月26日，经四川省革筹小组、成都军区党委批准，自贡市革委会成立，由自贡市人民武装部第一政委李宗白任主任。这是四川省第一个成立的地市级革委会。

### 4. 渡口市

1967年1月，成都军区党委决定，铁道兵第五师（代号7659部队）进入渡口支左，成立了以该师副政委萧戈为组长的渡口市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后由副师长顾秀继任组长）。1968年3月23日，四川省革筹小组、成都军区党委批准成立渡口市革委会，由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中共渡口市委书记徐驰任主任，已升任师长的顾秀等任副主任。1969年底，徐驰调省革委会，由顾秀接任主任。

【872】《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三军简史》下卷，页181-182。

### 5. 温江地区

1968年10月17日，经四川省革委会批准，温江地区革委会成立，由温江军分区副政委徐广生任主任。

### 6. 绵阳地区

1967年12月五十军一五〇师组建后，绵阳地区的三支两军由一五〇师及绵阳军分区负责。1968年7月2日，四川省革委会同意中共一五〇师委员会、中共绵阳军分区委员会“关于成立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并同意以一五〇师政委张金省任主任。

### 7. 内江地区

1968年7月1日，经四川省革委会批准，内江地区革委会成立，由内江军分区司令员陈崇礼<sup>[873]</sup>任主任。

### 8. 宜宾地区

1967年2月下旬，宜宾军分区奉命介入地方文革。在宜宾地区三支两军的，还有一三五师四〇三团（代号7804部队）。1967年5月7日，中央决定由原宜宾地委副书记王茂聚、原宜宾地委常委郭林川负责组织宜宾地区革委会筹备小组。1967年8月，王茂聚任宜宾军分区政委。1968年4月，宜宾地区革委会正式成立，王茂聚任主任，一三〇师政委张示心等任副主任。

### 9. 乐山地区

五十军入川后，一四九师负责乐山地区的三支两军。1968年3月7日，四川省军筹小组、成都军区党委批准成立乐山地区革委会，由一四九师师长林长修任主任。

### 10. 江津地区

1967年11月，以一三五师为主组成统一的“江津专区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以一三五师孙呈祥副政委为组长。1968年4月后一三五师撤回在支左办的工作人员和执勤部队。十三军入川后，三十七师负责江津地区的三支两军。1969年9月28日，四川省革委会批准建立江津地区革委会，由三十七师原师长耿忠贤（1969年10月升任十三军副军长）任主任。这是四川省最后一个建立的地区一级革委会。

### 11. 涪陵地区

1967年1月后，在涪陵白涛地区进行816工程洞体施工的工程兵第五十四师（代号8342部队）介入地方文革，参加涪陵地区支左工作，并对要害部门实行军

---

【873】 陈崇礼，1965年大校军衔。



管。师副政委黄鹤寿（后任政委）担任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组长。1968年5月8日，四川省革筹小组、成都军区党委批准涪陵地区革委会成立，黄鹤寿任主任。

#### 12. 万县地区

1968年5月16日，四川省革筹小组、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作出《关于批准成立万县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由万县军分区第二政委高恩堂任主任。

#### 13. 南充地区

一三四师及三十八师先后负责南充地区的三支两军。1969年1月8日，经四川省革委会批准，南充地区革委会成立，由一三四师政委李晋爱任主任。1969年4月，由三十八师师长王文辉接任。

#### 14. 达县地区

1968年9月，经四川省革委会批准，达县地区革委会成立，由达县军分区代政委王俊洪任主任。

#### 15. 雅安地区

1968年10月30日，经四川省革委会批准，雅安地区革委会成立，由负责雅安地区三支两军的一三〇师政委张示心任主任。1968年12月一三〇师调离后，由雅安军分区司令员董崇仁接任主任。

#### 16. 西昌地区

1968年11月10日，经四川省革委会批准，西昌地区革委会成立，由西昌军分区政委杜林任主任。

#### 17. 阿坝藏族自治州

1968年10月19日，经四川省革委会批准，阿坝州革委会成立。由茂县军分区司令员周子珍任主任。

#### 18. 甘孜藏族自治州

1968年10月2日，经四川省革委会批准，甘孜州革委会成立，由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天宝（桑吉悦希，藏族）任主任，康定军分区政委赵慧毅任第一副主任。

#### 19. 凉山彝族自治州

1969年1月2日，经四川省革委会批准，凉山州革委会成立，由凉山军分区政委王民英任主任。

以上19个地市级单位，由军队现役干部任一把手的16个，占84%（其中军分区、人武部8个，占42%；五十四军3个，占16%；五十军3个，占16%；十三

军1个，占5%；工程兵1个，占5%）。地方干部任一把手的3个，占16%。军队现役干部在一把手中占尽优势。

### 七、“一二二五批示”

1969年10月29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有关四川问题汇报。次日，就政治局会议情况函报毛泽东、林彪，提出：“目前，四川问题，中央非过问不可了”；“从九大后，四川掀起‘反复旧’运动，其性质与山东、贵州、湖北类似”，“‘反复旧’矛头虽也是对着军队，工代会也要超越于革委会之上，但四川究竟有四川特点，一切表现在派性和武斗上面”。又告：现已有必要先约四川党政军有关负责人来京商谈，“达到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然后再扩大商谈范围”。毛泽东于三十一日批示同意。<sup>【874】</sup>

11月5日至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会议向中央提出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加速四川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12月25日，经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共中央对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的报告作出批示称：

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望你们坚决贯彻执行。

为了迅速解决四川的问题，加强三线建设和落实战备，中央决定：

一、由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徐驰、谢家祥、刘结挺、张西挺、胡继成、谢正荣、段思英、何云峰、顾永武、郑志士、孙洪道、鲁大东十五名同志组成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李大章同志为副组长。<sup>【875】</sup>

二、增补谢家祥、谢正荣同志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胡炳云、胡继成、余潜、何云峰同志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增补邓经纬、顾永武同志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免去王英军省革委常委、梁善计省革委委员。省革委常委蓝亦农、委员韦统泰已调外省工作。<sup>【876】</sup>

【87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331。

【875】谢正荣，1969年9月由四十六军军长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组建的四川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授衔少将。鲁大东，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兼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

【876】余潜，1969年12月由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调任四川省军区政委，1961年晋升少将。邓经纬，1969年12月由北京军区炮兵副政委调任四川省军区政委，1964年晋升少将。王英军，原名王阴均，女，成都军区总医院司药，“八二六”派军区总医院红色造反者总团负责人。

三、由梁兴初、张国华、谢家祥、王诚汉、胡继成、王东保、谢正荣、段思英、茹夫一九名同志组成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梁兴初同志为组长，王诚汉、谢家祥同志为副组长。<sup>【877】</sup>

四、由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徐驰、胡炳云、胡继成、茹夫一、唐兴盛、何辉燕、李华安、蒋崇璟、鲁大东、顾秀、钱敏、丁钊、丁先国、冀绍凯十七名同志组成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李大章、徐驰、胡炳云同志为副组长。<sup>【878】</sup>

以上名单，清一色全部由军队及地方领导干部构成，完全抹去了群众组织代表存在的痕迹。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在会议期间受到批评，惟在四川、成都军区的报告以及中央批示中都没有点名。刘结挺、张西挺虽仍名列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但已边缘化，刘结挺在省领导层的排名，从第三位跌至第六位。

12月27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京西宾馆接见四川省委及成都军区赴京学习班全体人员。周恩来在接见讲话中批评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及郭林川称：

第四，是革委个别领导人，这个当然是指刘、张，没有点名。我们觉得这个决议上不要点名，你们看山东文件也没有点王效禹的名，贵州没有点李再舍的名，山西没有点刘格平、张日清的名，他们犯了错误，还是让他们改正嘛！所以他这回有了检讨。还给他改正的机会。我们主张不点名。但是性质很严重了。头一个是头脑膨胀，居功骄傲，争权夺位。这是不是个人野心家？就是个人野心家嘛！不必写上个名字，那个等一等再写。何必急呢？如果改了，这个就不写了。有人说还要加个“飞扬跋扈”，那个是形容词。要争权夺位，这不是个人野心家吗？第二个是利用职权，搞宗派主义，拉拢一些人，排斥一些人，还不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以我为核心，操纵办事机构，安插亲信，这不是“独立王国”吗？突出个人，独断专横，突出个人，利用一切文化工具，为个人树碑立传。这还不是给自己树碑立传？这不是为个人造舆论

【877】 王诚汉、王东保，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少将。

【878】 唐兴盛，时任省军区副司令员。何辉燕，时任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司令员，1955年授衔少将。李华安，时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65年大校军衔。蒋崇璟，原西南局国防工办主任兼四川省委第二工业部部长，时为四川省革委会常委、生产指挥组副组长。钱敏，原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丁钊，时任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委，1964年晋升少将。丁先国，时任总后重庆办事处主任，1955年授衔少将。冀绍凯，原五机部政治部主任。

吗？所以这个性质够了。我们现在希望他们二位，他们自己承认要改，还有“四看”嘛！这都是毛主席的话，批呀，保呀，帮呀，看呀，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了。这些都是主席的话。而且还有些领导同志，从张国华同志起，没有帮助他们，帮助不够，跟他们斗争不力，例如刚才说的，王茂聚的那个电报坏透了，没有对他们进行帮助，批判不够，郭林川又偏向他，支持他，站在他们一起嘛！一直到九大以后，感觉到“反复旧”不行了，他才纠正，但纠正得无力，所以还有嘛，冯德华<sup>[879]</sup>这些人，他就可以不听指示了嘛，为什么呢？在四川就是刘、张说话算数，别人说话不听，连张国华说话也不行。张国华同志也无可奈何。首先你们革委会要负责任，首先是张国华同志，别的同志对他们不注意，没有批判，所以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所以集体要负责任，所以倡导集体生活，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地都应该如此。这里也要说王茂聚这个人至死不改了，并以死来威胁，这种人自绝于党，自绝于群众，这种人不能当党员，要开除党籍。特别是刚才说的那封电报，王茂聚、郭林川两年多就那么个态度，所以他挑动、武装群众斗群众，那次省革筹小组也没有把“红联站”估计对，说他们都是保守的，上层不能承认，群众可以承认。这样就给王茂聚一个借口。就是他那武装打死群众的借口。我说这是犯罪的。省革筹小组制止他，他不听??找他来也不承认错误，你们对他无可奈何，这就放纵他了。这个放纵，首先是刘、张袒护了他。那么这个张国华、梁兴初同志，首先张国华同志。以后还有很多了。三次“武装支泸”，是三次嘛！所以这样情形，这样的班子，以前是革筹小组，以后是革委，再缩小就是核心领导小组。

就像王茂聚的死，<sup>[880]</sup>那他就“自作孽，不可活”了。但是他为什么放纵到这个程度？就是领导对他的事不负责任，放纵了他，从今以后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可是要抓紧。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这样的组织原则。<sup>[881]</sup>

1970年3月，四川全省开始公开揭发批判刘结挺、张西挺。8月16日，根据中央决定，四川省革委会将刘结挺、张西挺交北京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

**[879]** 冯德华，原空字028部队（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红色造反总团负责人。

**[880]** 王茂聚此次会议期间于11月21日在京西宾馆住处自杀。

**[881]** 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赴京学习班全体同志的重要讲话，1969年12月27日。阳增泰、何蜀：《写给历史的交代》附录，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页355-357。

揭发批判。1971年8月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刘结挺、张西挺党内外一切职务，此后，再次被开除党籍。<sup>【882】</sup>

刘、张的人生轨迹，兜兜转转地划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1963年的原点。

#### 第四十四节 “五一三事件”

“军委十条”颁布之后，一度受压的军内造反派重新抬头。在大部分驻京军内单位里，造反派与保守派形成了势力强弱不一、相互对峙的局面。军内造反派组织“斗罗筹”的头头方凡，对驻京军内两派作了简单明瞭的划分：“一派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支持的‘三军派’，另一派是萧华、杨成武支持的我们这一派，社会上称‘反三军派’，‘五一三’以后又称为‘冲派’。”<sup>【883】</sup>

5月13日，“反三军派”冲击“三军派”演出，酿成严重流血冲突，史称“五一三事件”。

##### 一、“五一三”前夕两派的活动

###### （一）保守派（“三军派”）的说法

“三军派”在“五一三事件”几天后即称：

四月下旬，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发出了文艺团体各派组织联合演出，纪念《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指示，我们三军部分文体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响应这一战斗号召，立即采取措施，极力促成内部的联合演出，战友文工团“临筹”多次呼吁“新燎原”同台演出《长征组歌》，而“新燎原”中一小撮人百般阻挠，极力破坏。最后，在周总理指示下，他们才勉强地参加演出了三场，还进行了许多捣乱活动。空政文工团革委会，团结了各革命派战斗组织，广大革命群众、革命领导干部，实现了联合演出；海政文工团、军乐队“红色造反舰队”早在四月底就多次呼吁，“响应总理号召，同台演出”。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遵义战斗队”等组织中的一小撮人，却蛮横无理地拒绝协商，百般刁难。海军党委和海军政治部多次动员无效，他们扬言，“总理指示是对新、老《燎原》的，我们的情况不一样！”公开抵制总理指示，致使团内大联合根本无法实现。二炮星火文工团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于四月底五月初

【882】 文革结束后，刘结挺、张西挺于1982年3月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和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3年5月二人保外就医。张西挺同年7月24日在成都去世。刘结挺同年11月8日在郑州去世。

【883】 方凡：《我的申诉》，1986年9月2日。

接连三次“呼吁”“紧急呼吁”积极响应总理号召，同台演出，但“鲁迅造反派”中的少数人却千方百计无理刁难。使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廿五周年的全团联合演出一直未能实现。

.....

由于他们一小撮人的破坏，内部联合演出已成泡影，我们为了在伟大的战斗的红五月里，以实际行动隆重纪念《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宣传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痛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驻京三军九个文体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在中央文革和各军兵种党委的支持下，于五月上旬联合了起来，经过很短的时间，排演出了几个晚会的革命节目。并给工农兵观众进行了演出。

但是，这却触怒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内的某些代表人物，他们对宣传毛泽东思想，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怕的要命，恨的要死。在背后煽动一些人拼命破坏。海政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竟有人扬言：“不把他们的演出冲了我死不瞑目！”“星火燎原”也有人叫嚷：“不冲垮他们的演出，我是儿子！”足见他们丧心病狂到何等地步。

为了破坏联合演出，他们到处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到空政文工团说：“你们是造反派，我们可以联合，但不能同海军的《红舰队》联合，他们是大杂烩。”而到海军的“红舰队”又说：“我们可以和你们联合，但不能同老‘燎原’联合，他们是‘老保’。”

为了破坏联合演出，他们东窜西跳，到处造谣，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组织和群众，跟他们一起去冲砸演出。并到北京展览馆剧场和东单体育场，对经理和管理人员进行威胁，不许借用场地。

为了破坏联合演出，他们在幕后人的操纵指挥下，明目张胆地组织了冲砸抢“筹备委员会”、“火线指挥部”，以及“宣传组”，印制了大量造谣传单。并于五月十二日召开密会，制订了冲砸方案。

事实俱在，铁证如山，海政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战友文工团“新燎原”、北京军区军乐队“星火”、空军体工队“战鹰红色造反团”、军艺“星火燎原”、军测“革命造反团”等组织中的一小撮人和他们的幕后操纵者，才是破坏大联合，冲砸“五一三”大会的罪魁祸首。<sup>【884】</sup>

【884】《“五·一三”严重流血政治事件的真相》。陆、海、空驻京部队部分革命文体工作者隆重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宣传组：《五洲震荡》第2期，1967年5月20日。

受到“三军派”指责的军内造反派组织有：海政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新燎原、北京军区军乐队星火、空军体工队战鹰红色造反团、空政文工团红旗、八一体工队革联、二炮文工团鲁迅革命造反队、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解放军测绘学院革命造反团、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空军学院东风等。

## （二）造反派（“冲派”）的说法

白而强，时为海军军乐队队员，海军大院“红流”派（少数派）成员海政文艺单位“东方红革命造反队”的头头。他在2011年时声称：

5月11日上午，知道三军要在北展演出的消息之后，我立即找到海政文工团“思想队”的郑邦炎商量对策。我们认为，一定要阻止三军的联合演出！一定要让中央知道，我们才是反对三军党委、反对三军保守派的“真正造反派”！于是我们俩借了两辆自行车，马上去找总政歌剧团的×××，又分别给平时联系紧密的军内一些群众组织头头打电话，煽动他们一起去组织冲击三军演出的“革命活动”。

第二天下午（或傍晚）在海军大院西门外，可能是后勤学院（也可能是总参通讯兵部）的一间屋子里开了一个冲击三军演出的预备会。到会的人都是我们同一派的组织头头。记得有海政的我和郑邦炎、郑国培，北京军区文工团胡××，空军体工队李××、林×，高等军事学院姜××、陈××，总政歌剧团娄××，后勤学院黄×，和解放军艺术学院、军事测绘学院及海军护校等一些单位的代表。大家一致同意不惜动用“冲击”的手段阻止三军的演出，决不能让“老保”突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从而争取中央支持的阴谋得逞！当天我们计划了各单位出动人员数量、车辆安排、上车地点和时间，确定了第二天晚上在北京展览馆集合的时间。<sup>【885】</sup>

## 二、“五一三事件”具体经过

### （一）保守派（“三军派”）的说法

“三军派”整理的《“五一三”严重流血政治事件的真相》称：

演出原定晚七时半开始。

六时半左右，当观众陆续开始进场的时候，军艺“星火燎原”、海军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二炮星火文工团“鲁迅造反队”和二炮医校“红色造

【885】 白而强：《我策划了冲击三军演出事件》。《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反队”、空军体工队“战鹰红色造反团”、八一体工队“革联”、军测“革命造反团”、北京军区文工团“新燎原”、北京军区军乐队“星火”、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空军学院“东风”等组织的人员，纷纷来到剧场门前集结。他们首先封锁检票口，蛮横无理地阻挠观众入场，甚至辱骂观众说：“今天是老保演出的，你进去看也是老保。”在这同时，开来一辆造谣车围绕剧场转圈，大肆污蔑革命造反派，甚至造谣说：“今天不演了，都回去吧！”观众根本不听他们那一套，坚持要求入场，粉碎了这一小撮人的阴谋。

六时五十分左右。他们集结了将近五六百人，大喊大叫地从正门和左右两个侧门，分三路向剧场里面冲击，我们高喊“反对武斗，坚持文斗！”他们竟用旗杆戳我们的眼睛，从我们的头上爬过去，从我们身上踩过去。一场令人发指的流血惨案开始了。

这时，我们的演员正在化妆，管弦乐队正在舞台上练习，……

他们专找主要演员打。北京军区文工团的贾世骏同志见他们冲了上来，刚问“你们为什么……”，下半句话还未出口，就被一暴徒猛一脚踢到肚子上，当场昏了过去。几个暴徒又连着拳打脚踢他一阵。独唱演员马国光十日在体育馆演出时，被这一伙打、砸、抢的“好汉”打伤了手。这次暴徒们又恶毒地专朝他的伤口打。在《槐树庄》中扮演郭大娘的于秀春同志，被几个暴徒猛卡脖子，昏了过去。空军文工团的张映哲同志被几个暴徒从二楼拖着滚到一楼，在水泥地上被他们像踢皮球那样踢来踢去，腰部和腿部都负了重伤。演员胡京华，被两个暴徒一人扯一条腿，悬空摔到凉台上，几个暴徒对着他的头又踢又踩，踢成严重脑震荡。海军文工团的赵云卿同志正在二楼，当海护一个女的一声喊“这就是赵云卿！”几个暴徒闻声而上，把她猛摔下去，扭伤了脚腕子，接着又要猛打，幸而被我们抢救出来。北京空军文工团演员赵良伟也遭到了毒打。

……

十点钟，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歌声中，同志们把重伤的战友送到医院，擦掉身上的血迹，包好伤口，挫败了这一小撮人的破坏，在观众的坚决支持下，正式开始演出。三千多人的会堂很快聚满了观众。台上台下，热爱毛主席的无限深情溶化在一起，歌颂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歌声交响在一起，无产阶级革命感情交织在一起。这是一次最激动人心的演出。许多革命造反组织代表和观众纷纷走上舞台发表声明，或递条子愤怒谴责这一小撮人的打、砸、抢的罪行，坚决支持演出，向受伤的



演员表示慰问；但是，这一小撮人并不甘心失败，又重新纠集力量进行第二次破坏，制造了更大规模的武斗。正当演出《长征组歌》，演员高唱“万众高呼毛主席”的时候，一小撮人又率领千余名不明真相的群众破窗砸门，毒打守卫人员。他们不让我们把毛主席的颂歌唱完就冲上舞台，猛力掀起合唱台，妄图将正在演唱的演员扣倒在合唱台下。我演员岿然不动，继续满怀激情演唱。空军体工队范景明同志用双手顶住架子保护阶级兄弟，被一暴徒猛打一棍，一下打得骨折带脱臼。有些暴徒大耍流氓，剥女同志的衣裤。……

……

两次冲击，计打伤我革命造反派战士204人，其中重伤57名。被打人员据不完全统计有五百多人。<sup>【886】</sup>

## （二）造反派（“冲派”）的说法

据“冲派”的白而强后来称：

5月13日这一天，我们都在联系组织晚上出发人员的事。中午和郑邦炎一起到（总）后勤学院找“星火燎原”的黄×，落实了晚上北展由他们派车的事（他们在学院里是多数派，后勤保障比我们好，能调动一批汽车）。下午大约五点半，天色还亮，我们就登上三四辆卡车出发了！

到了北京展览馆前，尽管天色渐暗，却还是能看到偌大的北展广场上人头攒动，各色彩旗飘舞，车声、人声交织，广场旁边的通道、剧场前面的大广场、甚至剧场外面通二楼的楼梯上都挤满了来自各个单位的“造反派”！全国闻名的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的大旗一面挨着一面，与军内文艺体育单位、各地军事院校“造反派”组织的大旗交集在一起，这很出乎我的意料——这么多单位来了这么多人，肯定不是我们前一天开的小会所能调动来的——我们下车以后，天色灰暗已经看不清彼此的面孔，只能大声叫喊着进行“联系”，谁也不知道这么多人集在一起下一步要干什么，结果只能是大家各自为战，跟着感觉、跟着人群，拼命地往剧场方向挤上去了！

我不知道先进去的人与演员之间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我进去的时候在剧场前厅看见一群人正在追打几个人，其中最容易辨认的是八一体工队的几个大个子。我不大认识这些人，也没和他们打招呼便径直往剧场里面走，一直挤到舞台前，看见舞台上已经是我们的人在挥舞占领中央高地的大旗；乐池里空无一人，一些大型乐器胡乱丢弃在那里……

【886】《“五一三”严重流血政治事件的真相》。

……

海政歌剧团高正路回忆说：5月13日下午三四点钟，萧华在军事博物馆二楼礼堂接见军内两派的人员。我是和海工的李××一起去的。会上萧华说了“演的不要演，冲的也不要冲”，听起来有点向着冲派。两派人员当场就争论不休，接见也就拖长了时间。萧华还让工作人员给我们发了果子面包当晚饭。接见完我跟着八一体工队的人从军博直接就去了展览馆。第一次冲上舞台以后，听说三军派已经调集大批人马将我们反围困在剧场里面，如果不立即冲破包围圈，我们就出不去了。于是，我们就赶紧聚集人马冲了出来。后来周总理和杨成武凌晨三点在大会堂接见两派代表，我是跟军艺的车一起去的。<sup>【887】</sup>

白而强以上叙述的是“冲派”对“三军派”的第一次冲击。而后，又发生了第二次冲击：

“全面胜利”的我们，挥舞着各自队伍的大旗，冲出了剧场，在混乱的人群中往北展正门前的大广场方向挤去——我们来时乘坐的汽车停在这里。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发生，可能我们的“冲击”就这样宣告“胜利成功”了！

在停车广场上，我看见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的赵××，在我和他谈话的时候，一个人向他报告了一条消息——清华“井冈山”蒯大富转告他：林副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说，冲击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演出是错误的！林副主席是支持演出的！林办让我们撤走。<sup>【888】</sup>现场的大专院校主要组织现在都要撤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林副主席受骗了！我们必须让林副主席了解部队‘文革’的真实情况！”我还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从这个对全北京公开的舞台上退出，回到军队里听从三军党委“落实林副主席指示”，就等于自投罗网。我们必须留在这里继续战斗，争取得到中央首长的接见，直接向中央反映我们的声音！

【887】《我策划了冲击三军演出事件》。

【888】林彪秘书张云生后来有一说法称，1967年4月，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曾造访毛家湾找到叶群，传毛的话，要叶群与经常出入中南海陪毛跳舞、“能通天”的空政文工团少数派（即保守派）女演员刘素媛等谈一谈。叶群不敢怠慢，随后在接见刘等时表示，她与林彪支持少数派的演出，称“你们人少，可以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同一观点的串连一下，与他们搞联合演出。”（《林彪秘书回忆录——毛家湾纪实》，页87-89。张云生所述叶群的话部分失实，总后并没有文工团之类的演出团体）如果确有其事，则叶群似乎并没有将毛、林及她本人对保守派的支持态度即时告之周恩来等，以致5月13日晚出现两派武斗的混乱局面时林彪才匆匆出面表态。这似乎还可以反映出叶群事前可能并未预料到一派演出会闹出这么大的乱子。

于是，我们立即鼓动身边的人：“杀回剧场，争取中央首长接见！”

再上舞台时我看到的仍然是我们一派的人们占据着舞台中央的位置。这时，剧场的广播中传出了“林副主席办公室电话指示……”的声音，我和赵××站在舞台最高层合唱台中间，鼓动群众高呼我们要见中央首长的口号。对立面的一些演员则仍然在舞台下面，不时向我们发出几声抗议。但是双方都基本脱离了接触，只是在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后来，从剧场后台传来消息：周总理要在大会堂接见我们双方的代表，让我们派人去。我们几个头头商议了一下，让海政话剧团的石静、军乐队的李希海等人去了大会堂，我们其余的人都在剧场等候消息。这样对峙到后半夜，外面传来消息；中央首长来了！<sup>【889】</sup>

### 三、林彪表态支持“三军派”

5月14日凌晨三时半左右，周恩来、杨成武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与“五一三”事件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周恩来在讲话中偏向“三军派”，批评了“冲派”。周恩来称，“为什么打成这样子，我们都是解放军嘛！（地方院校有人插话：周总理，我们支持解放军的造反派。）‘老燎原’和‘新燎原’都是造反的，你们学校的同学不了解情况，你们支持这一派，打击那一派，所以我对你们学校的同学挺有怀疑。同志，北京的情况现在不是以前的情况了。我有充分证据，我知道他们那里的事情（指战友文工团）。为什么因为观点不同就打，你们再在中间加油添醋，使问题更复杂了。陈伯达同志到那边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斗争矛头要对准刘、邓。在大批判当中考验对方，考验自己。我们活到七十多岁的人，有‘私’字还要去掉，你们这么年青看问题就那么准啊！来个电话，就去支持啦！”<sup>【890】</sup>

周恩来在讲话中正式透露，林彪支持“三军派”的演出：“林副主席说，要有革命性、科学性嘛，可是你们呢？（下面吵吵嚷嚷）你们是哪儿的？你们派别多，我搞不清，反正今天的演出，冲就不对。既然已经演出了，七点钟听说要武斗，我们正在议论这个事情，你们就打开了，本来想叫他们不要演了，后来他们要坚持演出。林副主席知道了，非常着急，马上表示支持，萧华主任忙着这件事，可是

【889】《我策划了冲击三军演出事件》。

【890】周恩来、杨成武接见“五一三事件”各组织代表的讲话，1967年5月14日。陆、海、空驻京部队部分革命文体工作者隆重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印，1967年5月15日，红代会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宣传组翻印，1967年5月24日。

你们从派别的利益出发，就这样干”。“人家演出，是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廿五周年，这样的演出，有什么不好。你们在这样的场合去冲，你们就这样热爱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吗？你们这样做，我们都感到难过。你们不难过吗？你们不感到羞耻吗？你们造的是毛主席的反。你们也喊：毛主席万岁！你们行动却不符。林副主席都睡觉啦。起来打电话，叫你们别打啦，你们不听，你们这样热爱毛主席吗？！”<sup>【891】</sup>

当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新燎原（“冲派”）一人称，老燎原（“三军派”）单方面不搞联合演出时，周恩来再次将林彪抬出来称，“如果他们不联合演出，这是他们的不对。总之，今天这个演出，你们去冲，就是不对。林副主席支持他们的演出。所以你们不是根据全国人民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为纪念这样辉煌的著作的演出，不管哪一派都可以演。就是你们说是个保守分子，你也不能这样搞，不能把保守当成两条道路的斗争。你们演出，我们一样的支持你嘛。至于说，今天以前他们不与你们合作，这是他们的错，如果‘老燎原’来，我还要给他们讲。不管怎么样，今天冲人家演出，在人家门口贴人家的大字报是不对的。人家演的是革命戏嘛，斗争也要讲政策、方法，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子能把人家斗垮呀！不一定。相反的，你们可能要被斗垮。”<sup>【892】</sup>

同日凌晨四时，陈伯达、萧华等赶到北京展览馆双方冲突的现场，陈伯达讲话称，“我们是为党的事业来的。为着祖国人民的事业来的，不是来听你们吵架的，不是来看你们打架的。我们有兴趣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誓言。对你们的打架，对你们的吵架，对你们的武斗，我们一点兴趣也没有。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没有事好干。跑到这里来玩的？”“一个文工团要表演，一个不要表演，有什么道理？一个要演，一个要冲，说什么‘打倒保皇派’，我说道理不算多。……我希望双方各自都做自我批评，不管怎么样，双方都有缺点，要做自我批评。但是我不是说，一派演，另一派冲。为什么不可让另一派来表演表演戏看看呢？戏是多种多样的，只准一个派演戏，不准另一家演戏，这是宗派主义”。“希望两派暂时都不要表演了。希望北京，地方的院校，不管哪一派，都不要到部队里来插手，你们学校自己很多事情没办好，文化大革命还没搞好，自己脑子里的思想革命化还没搞好，到这里来插手干什么？”<sup>【893】</sup>

【891】 周恩来、杨成武接见“五一三事件”各组织代表的讲话。

【892】 周恩来、杨成武接见“五一三事件”各组织代表的讲话。

【893】 红代会北京铁道学院红旗公社《红色侦察兵》战斗组翻印，1967年5月14日。红代会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宣传组翻印，1967年5月19日。

陈伯达讲话时，可能尚未得知林彪支持演出的态度，否则，他不会如此这般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同日清晨六时，未休未眠的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海军直属机关“三军派”代表时，再次批评“冲派”称，“昨天人家演出他们去打架干什么？人家演的，是为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这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嘛，为什么要打？打是不对的，打是错误的。你不同意你可以不参加嘛！你为什么要打呀？不管什么派，只要是演这种戏，就得让他们演么！但是，你们要心平气和地同他们说服，不要像他们打架。他们（指海政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不敢回大院去了，我说不要那样脆弱嘛！最后我派人把他们送回去了，你们回去后不要和他们又搞起来（指武斗）。”当有人提到了海直机关两派斗争的情况时，周恩来称，“你们三千人，他们一百来人，有一个对立面才好。有一百多人的反对派，就能很好地锻炼自己。如果你们被他们分化了，就说明你们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如果你们能比较好的掌握毛泽东思想，就能分化他们。”<sup>[894]</sup>

#### 四、自此以后军内以“五一三”划线

5月14日，“三军派”的中坚力量——海军司令部红色造反者联络总部（红联总）发表“严正声明”，称“强烈要求中央军委、全军文革立即追究制造‘五一三’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和操纵者，依法严惩首恶分子。”“海政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组织中的一小撮人，必须向被害者和死难同志家属低头认罪，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5月15日，第二炮兵“三军派”以“司、政、后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名义，发表“严正声明”称，“要求全军文革立即追究制造‘五一三’事件的幕后操纵者，并严惩首恶分子。”“对第二炮兵星火文工团鲁迅造反队和医校红色造反队等组织中的一小撮人，要求全军文革、第二炮兵党委查明情况，严肃处理。”<sup>[895]</sup>

5月15日上午，第二炮兵党委主要负责人李天焕、查国桢、欧阳平等接见了“三军派”的第二炮兵星火文工团文革筹全体人员。李天焕称，“周总理也支持你们，祝贺你们演出成功。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也支持你们，谢副总理也支持你们，他是副总理，又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当时讲，演出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谁冲击这个会，谁就要犯错误。海军党委支持你们，空军党委支持你们，

<sup>[894]</sup> 海军直属机关红联总：《四海翻腾》第四期，1967年5月14日。

<sup>[895]</sup> 《五洲震荡》第2期。1967年5月20日。

北京军区党委支持你们，我们二炮党委也支持你们！广大革命群众欢迎你们，支持你们！”<sup>[896]</sup>

5月16日下午，“三军派”在海军机关大院广场举行“隆重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廿五周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开展一周年”纪念大会，陆、海、空三军各领导机关、部队院校和北京市有关单位群众组织代表共两万余人参加。出席大会的有：海军萧劲光、李作鹏、王宏坤、赵启民、周希汉、张学思、张秀川；空军余立金、王辉球；北京军区黄振棠、王紫峰、宋玉琳、张正光；第二炮兵李天焕、吴烈、熊伯涛、查国桢、欧阳平等。“大会上，两万多名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同声斥责了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冲砸‘五一三’大会的可耻行为。强烈要求揪出‘五一三’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并对在‘五一三’大会上为英勇捍卫毛泽东思想，坚持演出的全体演出人员和光荣负伤的革命文体战士，表示亲切慰问。”<sup>[897]</sup>

5月20日，“三军派”声称，“在对‘五一三’问题的处理上，总政治部主任、全军文革常务副组长萧华同志是不公平的。全军文革院校组长李曼村，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等人是‘五一三’流血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连日来，北京市街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标语，‘炮轰萧华’、‘萧华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期望’、‘萧华应向三军党委和革命群众检讨’、‘李曼村、谢镗忠是‘五一三’事件的策划者’、‘李曼村、谢镗忠从全军文革滚出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蒙蔽一些革命群众，撕毁和覆盖对萧华的大标语。”<sup>[898]</sup>

5月23日，据“三军派”称，“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首都纪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空政文工团革命委员会常委刘素媛同志、空政文工团革命造反派张映哲同志代表五月十三日三军联合演出的全体同志出席了大会，并在主席台上入座。这是我团全体革命同志的光荣，这是参加三军联合演出的全体同志的光荣！他们在会上受到了很多首长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切的慰问。在纪念大会即将开始时，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办公室的主任，叶群同志，走到刘素媛和张映哲同志的面前，关心的问道：‘（伤）好点没有？你们为革命受了委曲了！你们一定要好好治疗。’特别值得我们高兴的是，叶群同志说：‘我代表林副主席向演出单位受伤的同志们表示慰问！’晚上，刘素媛同志、张映哲同志去观看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演

【896】《五洲震荡》第2期，1967年5月20日。

【897】《五洲震荡》第2期，1967年5月20日。

【898】《五洲震荡》第2期，1967年5月20日。

出。在休息时，杨代总长办公室赵主任也关心地问：“怎么样了？怎么没去住院治疗呢？要好好治疗啊！”又说：“听说你们当天晚上（指五月十三日晚）还坚持演出，你们真勇敢啊！你们做得对！我们都支持你们，首长们也都支持你们！”在演出结束时，杨代总长还走到刘素媛、张映哲同志面前鼓励地说：“你们做得对，好！就是要演，就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sup>【899】</sup>

6月1日晚，“三军派”在北京军区礼堂联合演出，谢富治、杨成武、关锋、戚本禹、叶群，北京军区郑维山、陈先瑞，海军李作鹏、王宏坤、赵启民、张秀川、张学思，空军吴法宪、余立金、曹里怀、常乾坤，二炮李天焕、吴烈，北京空军罗元发等出席观看。演出结束后，郑维山向到会全体人员一一介绍了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和三军首长，并作了简短发言称，“中央文革和军委的首长来观看我们海军、空军、二炮和北京军区的联合演出，这是对我们革命造反派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戚本禹讲话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很关心这次演出，他支持这次演出。在你们演出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特派叶群同志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你们，林彪同志很怕我们的小将挨打，所以才派叶群同志去看你们。”“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支持这次演出，关心这次演出。江青同志听说革命小将挨了打，她非常关心，她问过几次这件事情。特别是在五月二十三号这次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她特别嘱咐要你们的代表上台。”“有少数人受了别人的挑唆，攻击了你们，来打你们。江青同志很关怀这件事情。林副统帅也很关心同志们，林副统帅叫江青同志告诉我们，要慰问被打伤的同志。叶群同志刚才提议，演出完了以后，就要去看这些同志，到医院去慰问他们。”<sup>【900】</sup>

6月9日，据新华社讯，林彪以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今晚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驻京陆海空三军革命文艺战士”的联合演出。陪同观看演出的有萧劲光、吴法宪、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参加演出的“驻京陆海空三军文体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群众战斗组织”有：海政文工团、军乐队红色造反舰队，空政文工团革命委员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北京军区空军文工团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第二炮兵星火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北京军区军乐队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八一”体工队红旗革命造反队，空军体工队革命造反队，北京军区体工队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sup>【901】</sup>

【899】《五洲震荡》第4期，1967年6月3日。

【900】《五洲震荡》号外，1967年6月2日。

【901】《人民日报》，1967年6月10日。

“五一三事件”是“三军派”崛起、“反三军派”衰落的分水岭。方凡称，“自此以后，军内就以‘五一三’划线了，‘冲派’一蹶不振，萧华、杨成武的日子也不好过了，社会上流传着他们将要被打倒的传闻。”<sup>[902]</sup>其实，“五一三”之后，主要还是萧华的日子不好过。6月9日晚林彪亮相支持“三军派”，萧华并无出席。惟其此后还是在其他一些重要场合露过面。萧华真正倒台，要在“五一三”两个多月之后。

## 第四十五节 毛对香港采取军事行动的念头一闪即逝

### 一、北京着手部署对香港军事斗争的准备

6月3日，旨在“迫港英当局低头”（港英当局未有就范）的香港“反英抗暴”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的社论，这是北京自五月中开展“反英抗暴”斗争以来首度以《人民日报》社论方式表态。

社论声称，“一百多年来，英帝国主义在香港干尽了坏事，血债累累，罪恶滔天，必须清算！”社论号召“港九爱国同胞们，进一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勇猛地向着万恶的英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吧！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香港的命运取决于香港爱国同胞，取决于七亿中国人民，而决不取决于腐败衰朽的英帝国主义。”<sup>[903]</sup>

社论通篇意气高昂，给人以北京已下定决心在香港问题上大干一场，甚至可能要着手收回香港的强烈印象。而社论的这一基调，是得到毛、周尤其是毛首肯的。

毛在六月开头的几天里，的确有在香港问题上强硬一把，甚至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的打算。这一打算的源头，在于其关于中东局势对英美力量的牵制有一乐观而事后证明是错误的估计。

这一错误的估计，充分反映在6月6日他与锡兰<sup>[904]</sup>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的谈话中。根据官方记录，在谈到中东局势时，毛说：美、英在地中海和中中东相当被动。可能打局部战争，帝国主义在后面，主要是以色列和阿联<sup>[905]</sup>打。……战争既然打起来了，就可能要打一会。如果以色列在局部战争中

【902】方凡：《我的申诉》，1986年9月2日。

【903】《人民日报》，1967年6月3日。

【904】锡兰，今斯里兰卡。

【905】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1958年2月由埃及与叙利亚合组而成，次月也门加入，更名为阿拉伯合众国。1961年解体，惟埃及仍保留此国号至1972年。



得胜，战争可能上升。……谈到阿联可能采取的对策时，毛泽东说：他们可能会封锁苏伊士运河，至少在战时是这样。……这次战争爆发，如果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卷进去，有可能把苏伊士运河堵死。<sup>【906】</sup>

遵循毛有关美、英的力量会被较长时间牵制在中东而无暇顾及远东的思路，北京立即着手部署对香港进行军事斗争的准备。此一准备工作有迹可寻，惟其整个计划的广度和深度、计划要达致的最终目的和结果，却是我们至今仍然缺乏了解的。

据官方权威资料，就在毛泽东与桑穆加塔桑谈话的同一天，6月6日，根据总参谋部加强战备的指示，广州军区给陆军第四十二、第四十七、第五十五军下达《战备行动预先号令》，要求担负广东东江以南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做好必要的行动准备。

从地图上可以清楚看到，所谓“广东东江以南地区”，涵盖了香港全境。

与此同时，周恩来电告广州军区，关于收复香港问题，要谈一谈。为此，广州军区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温玉成，即率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sup>【907】</sup>、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乘专机赴京。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广东省军管会办公室主任李维英等随行。温、吴、吴三人在专机上兴致勃勃地议论起一旦中央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时的具体部署。吴瑞林称，收复香港，连南海舰队也不必动用，四十二军两个团加省军区一个边防团就够了。<sup>【908】</sup>

然而，中东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出乎毛泽东所料。6月5日，以色列空军倾巢而出，突袭阿联、叙利亚和约旦，并发起地面进攻，数日之内占领了阿联、叙利亚和约旦共6.5万平方公里土地。阿联等三国被迫签订停火协议。以色列以六天时间，赢得了史称“六日战争”的第三次中东战争。

毛泽东所谓“战争既然打起来了，就可能要打一会”的估计大失预算，随即便叫停了对香港军事斗争的准备。据李维英对笔者称，6月7日（或8日），周恩来单独接见了被其召至北京准备讨论对香港采取军事行动预案的温玉成。周向温传达了毛泽东的四点指示：一、弄不好，把第七舰队弄来了；二、拿回香港，几百万人还要吃饭，我们目前没有这个力量 and 精力；三、国际口岸只剩一个，需要出口一些物资，进口一些物资；四、香港是国际情报城市，它搞我们，我们也搞它的。周恩来告诉温玉成，毛最后拍板：“现在不打。”<sup>【909】</sup>

【90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91。

【907】吴瑞林，1955年授衔中将。

【908】访问李维英记录，2011年1月30日。

【909】访问李维英记录，2011年1月30日。

6月9日傍晚至10日凌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听取温玉成汇报时，周称：“香港问题，考虑到中近东的形势不会发展那么快，阿联已接受停火，要防止美国在香港搞一下。群众运动还是按计划进行。部队移动的问题暂时停一下。边界线是否都守了？有多少兵力？有没有铁丝网？是不是平地？（杨成武：按方案作点准备就行了。）”<sup>[910]</sup>

上述讲话清楚表明：在此之前，确有部队移动（调动）的预案，惟6月9日这一天周已明确指示“部队移动的问题暂时停一下”；杨成武插话亦称，“按方案作点准备就行了”，实际该方案已无实施的可能。

## 二、中港之间的小规模边境冲突

在毛泽东决定“现在不打”、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即周恩来所称的“部队移动”）停止之后，中港之间军事上只剩下小规模边境冲突的可能。

当时中方在宝安中港边境地区有两个团的兵力。处在边境一线的是守备第一一五团。该团原为公安部队，番号广东省公安总队第三团，1964年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备部队，改番号为守备第一一五团，移交广东省军区，归惠阳军分区领导，1965年8月改归广东省军区直属领导。处在边境二线的是陆军野战部队——陆军第一二八师步兵第三八三团。该团原驻防海南地区，1964年随师移驻大陆，时部队驻宝安布吉一带，执行边防警戒任务。中方在宝安一线成立深圳地区对敌斗争领导小组，统一领导这两个团。组长由最接近该地区的野战部队师级单位——陆军第一二八师师长王文德担任。

7月8日，在沙头角边境发生武装冲突。

沙头角位于宝安县东部。1898年中英勘界时将其一分为二，东侧为华界沙头角，西侧为英界沙头角，勘界后此地逐步形成一条圩镇，时为中港两地的边防禁区。

7月9日，港英政府新闻处公报中英边境冲突详情。中午十二时二十七分公报称：“上午十一时后，约三百名群众自华界冲入新界沙头角，在该区警局外进行示威运动，挥动着旗帜并呼喊口号。他们向沙头角警署投掷石块，警方人员被迫发射木弹以便驱散该批聚集群众。数分钟后，沙头角乡事委员会内建筑物内一队警员被射击，有三名警员被击毙，若干人受伤。聚集群众已散退，但未消散。今日中午警务处长命令辅助警员开始动员。”下午十二时五十五分：“沙头角警署仍

【910】 周恩来总理听取温玉成副司令员汇报时的指示，广东省军管办公室整理，1967年6月9-10日。

在狙击性射击下。”下午二时三十分：“沙头角被枪伤警员有八名。其中一名伤者已死亡。”<sup>【911】</sup>四时二十六分：“下午三时三十分报告：沙头角区警员约一百六十至二百人正在枪战中。中八十六名警察留于警岗，其他则驻于乡委会‘总部’，距警局约五十码之遥。”四时三十一分：“啍喀兵现已抵达沙头角，并在枪战中。”五时零五分：“第十啍喀兵团第一营现已进入沙头角，并开始采取军事行动，以解救现于乡委会被袭击的八十名警察。驻于乡委会警察现仍被边界另一方人员的冷枪射击。截至目前为止，未见敌方有任何穿制服的人员参与这次射击行动。”八时五十八分：“下午六时，乡委会在啍喀兵的解困下已退出。自五时以后，该区已呈现平静。”<sup>【912】</sup>

事件发生后，伦敦及港英政府低调处理。美联社伦敦今日电称，“英政府就今日华区居民袭击英界沙头角一警岗事件的初步报告，认为这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英官员对是否有中共武装军队卷入这一纠纷中感到怀疑。联邦事务部一发言人谓，根据接到初步报告，一群华籍示威者袭击沙头角村，暴徒们使用渔民用的炸药来击毁警岗周围的防卫网，警方人员开火，华人则用轻机枪回击。发言人谓，虽然香港政府曾发现袭击者有着制服者，但他怀疑这些人是否为军队。目前香港政府已派遣英军进入该村协助该地方警员平息骚动。与此同时，北京英国代办已接得指示，要求中共外交部澄清这一件事。发言人强调，这不是一项抗议，但仅希望澄清这一混乱局面。”<sup>【913】</sup>

据时驻守在沙头角华界的守备一一五团二营六连（红色前哨连）连长邹金凤后来回忆：

七月六日傍晚，我方有一家群众的小孩子得了急病，沙头角公社卫生院的医疗设备简陋而无法医治。按当地人的习惯，要到英界内的香港医院医治。

但是由于进出口处被英警严密封锁，根本无法通行。我方派出联络人员要求炮楼上的英警放行，他们对此无动于衷、不屑一顾。我方群众忍无可忍，于是派了十多个青年人用镐头去扒障碍物，英警见状随即施放了催泪弹，打伤了我多名群众。

这天，连队团临时指挥部除原班人马外，增加作战参谋和通讯等人员；省军区领导、团长李廷阁和营长于贵、教导员何昌等也来到连队；晚上八点三十分，团指挥所在连队召开了全团排以上紧急干部会议，团领导根据上级的

【911】 据翌日港府公报：一名受伤华警已死于英军医院，使死亡人数增至五名。

【912】 香港《明报》，1967年7月9日。

【913】 香港《明报》，1967年7月9日。

指示(据说是军委指示),对准备打仗进行了动员、部署和安排并通报了有关情况。主要内容是:要求处在第一线的我团二、三营要充分做好打仗准备,对各营连原来既定的作战方案要进行演练,对作战阵地和前沿阵地进行周密部署和加固;严守纪律,我们不主动挑起事端,不打第一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如果敌人向我们开火,挑起战斗,我们就要以第一时间占领阵地和制高点,军民团结战斗,实行自卫还击。

团领导把团机炮连调来进驻沙头角,加强六连火力(即我连),由六连统一指挥(团机炮连于次日凌晨进入沙头角);要求梧桐山哨所注意敌情观察并及时将敌人动向报告指挥部;要求沙头角镇所有高的建筑物堆上沙包;要求民兵连负责人罗九(化名)等干部做好沙头角民兵连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发动群众搞好支前;另外,上级已在梧桐山下横岗、盐田等地驻扎了野战部队,随时待命增援。

七月七日,沙头角群众举行集会抗议,甚至连沙头角镇以外的村庄和盐田公社的群众都来参加游行,整个篮球场挤得满满的,群情激奋地声讨港英当局的罪行。当天,英界各村庄群众也自发地集合起来游行,数百人到联乡会前强烈抗议,被英警放催泪弹追打,有上百群众被赶到我方一边。他们不顾英警施放催泪弹,振臂高呼:“打倒港英当局!”、“把英国佬赶出去!”等口号与英警斗争。在我方民兵群众支援抗议下,坚持到下午四点多钟才让他们回到英界。

这天晚上,团长李廷阁和省军区某师白政委也来到沙头角镇中英街一线,向我们了解了民众集会游行的情况。

为准备打仗,这天连队杀了两头大猪,晚饭后给连队干部战士分发了汽水和压缩饼干。晚上八点钟,我和指导员召开了连队(包括团机炮连)班排长以上干部会议(营长于贵、团参谋长石长福和几位作战参谋参加了会议),因团机炮连加强到我连,我对连队的作战方案和兵力、火力进行了重新调整和部署:指导员周永祥和副连长秦文海留守连部配合团指挥部工作;我和营长于贵副指导员刘柱成带领一排、二排、机炮连和前指在沙头角镇一线布阵;三排和军犬班留守连部(径口)担任机动。当时兵力火力大体安排是:前指设在沙头角综合商店楼上,楼顶和二楼各一个班(楼顶一班、二楼二班),每班十二人,各配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和其它火器。连队炮班配给一排,由副指导员刘柱成、一排长杨观生指挥;一排、二排其余兵力在新华书店至榕树头

一线各建筑物上隐蔽展开：团机炮连三门120炮在官路下海边隐蔽处构筑工事布阵；三门无座力炮和一挺重机枪留在沙头角镇一排营房内担任机动。

七月八日，事态进一步扩大。一大早，我方群众就一批批来到沙头角圩镇集中，准备搞大游行：沙头角英方华界居民，有上千人赶来参加。这时候的沙头角，人山人海，各路人马汇集在中心球场上。有地区、县、公社的各级干部，还有一批负责后勤供应的人员，同时还有《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报社的记者。部队根据上级的命令，各自进入了既定位置高度警戒，官路下三门120炮瞄准敌方炮楼中英街、新楼街一线的敌阵地，一挺机枪瞄准敌方一个窗口，严密监视敌人的动静。一切迹象表明，山雨欲来，战事一触即发。

上午九点三十分左右，游行示威的队伍从中心球场出发，经中英街到海旁路，之后转到海边，然后再转回中英街。大家高呼口号，摇旗呐喊。游行队伍沸沸扬扬……

在群众游行时，为更好地掌握敌方情况，有几个武装民兵悄悄地从中英街后面菜园角插到距联乡会大楼四、五百米处的稻田地里观察，不料被联乡会里面的英警防暴队发现，敌人见有荷枪实弹的民兵过来，立即用机枪扫射。

这是一片开阔地，全在敌人火力的射程之内。面对雨点般的子弹，几个民兵只好卧在稻田里进行还击，幸好稻田里有稻草和田埂作隐蔽，没有造成伤亡。时约十点钟。

敌军机枪大作时，我和营长等一时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一来我方没有弹着点，二来又不见对面敌人运动。我们即将情况报告了团指挥部，等待指示……（当时因没有得到上级命令，我们仍没有开枪）。

敌枪声一响，游行群众更是怒气冲冲！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头角警署时，荷枪实弹的警察和防暴队分三路包围游行群众，并向游行群众发射催泪弹，造成一片混乱。这时民兵张天生从商店里取出一桶火水（即柴油）浇湿棉被扔到敌炮楼底下，正准备点火时，炮楼里的英警用机枪向他射击，张天生立即倒在血泊里。

面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我方军民极为愤慨。与此同时，从联乡会大楼里又跑出来十几个英警，他们分两路包抄稻田地里的民兵并向他们猛烈开枪（子弹呼啸着打到我方境内），企图抓我们的武装民兵当俘虏作把柄。

在千钧一发时刻，我们接到指挥部开火的命令。于是，综合楼顶上的轻、重机枪便一齐向敌方鸣枪警告射击。顿时，中英街枪声大作，子弹像雨点般射向敌方大楼顶上的英国国旗，把英国国旗打得稀烂。

所有窗户和两路正在包抄围捕民兵的英军，被我军和民兵们打得没有还手之力。这次警告性自卫还击，我方轻重机枪足足打了十五分钟。由于事先摸清了敌方目标和制定了战斗方案，打得他们四处逃窜，充分达到了警告目的和效果。

据深圳梧桐山我军观察哨报告：我方的机枪响后，英界沙头角几个村庄的炮兵阵地上的大炮已纷纷将炮口对准了我方。然而，自我军警告性开火后，他们便再也没有开枪，之后我们便停止射击。<sup>[914]</sup>

### 三、“主席昨天讲了，还是不动武”

7月9日，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面交中国外交部照会，“就香港英国当局8日在沙头角又一次制造血腥暴行，开枪打死示威群众一人，打伤八人，对中国人民进行严重的武装挑衅，向英国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照会称：

7月8日，沙头角我方群众和九龙“新界”中国居民，为声援港九爱国同胞反对香港英国当局残酷迫害的正义斗争，在我方境内举行集会，会后分道举行示威游行。全副武装的港英警察和“防暴队”竟然对游行返回九龙“租界”的中国居民，进行蓄谋的血腥镇压，施放催泪弹和开枪射击；同时，还向我方境内开枪，对于英方的这种暴行和挑衅，我边防哨兵当即鸣枪警告。但是，港英警察和“防暴队”完全不顾我方的警告，继续向游行示威群众开枪射击，一人死亡，八人受伤。我边防哨兵对港英警察和“防暴队”亦进行了还击。<sup>[915]</sup>

中国外交部照会两次述及“我边防哨兵”在沙头角边境冲突中曾“鸣枪警告”和“对港英警察和‘防暴队’亦进行了还击”，亦即承认了在边境冲突中动用了军队（尽管动用的是边防部队而且是很小规模的）。这与港英官方公报中所称“未见敌方有任何穿制服的人员参与这次射击行动”大相径庭。惟中英双方（尤其英方）抗议的语气均并非异常强硬，双方似乎都不希望将事态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7月10日，下午十六时至十九时二十分，周恩来在北京京西宾馆第三会议室听取广州军区司令员兼广东省军管会主任黄永胜的汇报，列席的有叶剑英、戚本禹、叶群及广州军区副参谋长阎仲川<sup>[916]</sup>。周谈香港问题时重申了毛泽东对香港问

【914】 邹金凤、骆国京：《军旅情》，香港：银河出版社，2012年，页132-138。

【915】 香港《文汇报》、《大公报》联合号外，1967年7月9日。

【916】 阎仲川，1965年大校军衔。1967年12月-1969年5月任广州军区参谋长。1968年2月-1969年11月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5月-1971年10月任副总参谋长（曾兼任总参

题的态度，“主席昨天讲了，还是不动武。”周称，“香港不同于澳门，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澳门是唾手可得，一压就屈服。我们之所以不拿澳门，是保持一个口子在那里，市场是我们的，同时也不影响香港。收回香港，只有苏修才挑，赫鲁晓夫提这个问题完全是为了挑拨替美帝效劳。香港问题，主席昨天讲了，还是不动武。……现在香港有百分之十到五十的居民上了街，只是搞定期罢工，你要是长期罢工，他就会找台湾人来接替。过去省港大罢工，可以使香港成为死港，现在情况不同了，时代不同了。……香港百分之七十的日用品，百分之九十的副食品是我们供应，你一退出，日本就占领市场，台湾也会搞人进去，就更不利……。主席说过，把时间估计长一点比短一点好，把斗争估计困难一些比容易一些好。”<sup>[917]</sup>

7月30日，由广州军区副政委晏福生主持，在广州召开了关于当前港九对敌斗争问题座谈会，外交部副部长、“反英抗暴”斗争北京联办负责人罗贵波、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胡继成、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道全、深圳地区对敌斗争领导小组组长王文德、省军管会派驻省委组织部四处（港澳城工委）军管小组负责人曹公和及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sup>[918]</sup>罗贵波谈了如下意见：

……，港英当局镇压进一步升级，可能还会更疯狂些，这是斗争必然规律，但究竟要升到多高？现在很难说，估计最大的可能把我在港九所有的机构搞掉，进行大规模屠杀，现在看这种可能性还不大。如果搞到这个程度，英帝就可能：

一、放弃香港，准备中英关系破裂；二、实行美英联防。目前英帝还不敢这样做。但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准备它升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在边境上镇压敌人，但究竟怎么搞？根据大家的意见，军事上的配合可有三种设想，回去向中央提出建议方案：（一）中印边境式的；（二）沙头角式的；（三）武工队式的。

中印边境式的，规模就比较大，准备把新界的敌人主力吃掉，这样做，对敌人及在世界上震动太大，逼迫敌人太紧，这不符合我们当前的斗争方针。

沙头角式的，就是在沙头角地区出击，把沙头角地区的敌人吃掉。这比中印边境式的规模小一点，很容易组织，不那么费劲，打得痛，但在世界上震

---

作战部部长）。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83年按正兵团职待遇离休。

【917】广东省军管会办公室：《周总理听取黄永胜等同志汇报时的指示纪要》，1967年7月10日。

【918】王道全，1964年晋升少将，1967年8月升任陆军第四十一军军长。曹公和，1965年大校军衔。

动不大，使他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上次我们说边防部队哨兵打了，他就不敢承认嘛！如敌人再升级就迫使我们这样做。我主张以这种形式给敌人以打击。回北京请示总理和军委，但建议军区应拟定方案和做必要的准备，否则就会错过机会。

关于搞武工队的问题，原则上目前不大合适，主要是进去后不易控制，在斗争形式发展后也有可能。沙头角过来的122人中，有60个人要求训练，请领导小组帮助一下，至于他们什么时候回去，发不发装备，待请示中央再定。现在可先搞些训练，主要做好思想工作，搞射击、投弹两大技术及学点简单的战术。

四、群众越界，仍按总理指示，尽可能不越界，不要挑起纠纷。但港英镇压升级，或敌人挑衅激起群众义愤，就可能把事端挑起来了。这方面要估计到，要做好准备，决不能示弱，敌人开枪，我们开枪，敌人打炮，我们开炮，一定要压倒敌人。<sup>【919】</sup>

晏福生最后称：根据罗副部长指示，作战部对几种情况提出几个方案，呈军区首长审定报军委。

后来的事实表明，罗贵波所称的北京最坏估计的情况并未出现。无论军委是否批准了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边境作战预设方案，这些方案都未曾有过实施的机会。

## 第四十六节 军队的造神运动

1967年中，由军队引领的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在全国推广，并很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狂热程度。

### 一、“四个伟大”与对毛的个人崇拜

1967年5月1日，首都各大报在头版发表林彪为“五一”国际劳动节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sup>【920】</sup>

---

【919】 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整理：《关于当前港九对敌斗争问题座谈会纪要》。叶曙明：《支援香港反英抗暴斗争》，<http://ysm2001.bokee.com/4365263.html>，最后访问：2018年7月26日。

【920】 《人民日报》，1967年5月1日。



“四个伟大”的提法，始于1966年8月。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开头就是“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sup>[921]</sup>

“四个伟大”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固定称号，实际上有点类似古代皇帝死后的谥号，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因此心怀忌讳，对“四个伟大”的封号并不领情。1966年12月2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通知》时，将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删去。<sup>[922]</sup>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sup>[923]</sup>

既然毛泽东已表示“不高兴”，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林彪为什么还要作这样的题词？事关林彪可能根本不相信毛泽东的“不高兴”是真心的。因为林彪知道，历史上毛对个人崇拜是明确表明过赞成态度的。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党内对个人崇拜的认识问题说过一番话称，“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随声附和，要打倒个人崇拜（有的是过去压力残余，心理状态复杂）。还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现在既有个人崇拜，也有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

【921】《人民日报》，1966年9月1日。

【9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160。

【923】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时的谈话（节录），1967年2月3日。

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是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sup>【924】</sup>

林蕴晖认为，“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陈伯达在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sup>【925】</sup>



叶群将她树立的学毛著典型顾阿桃介绍给毛，右为林立衡，1966年10月1日。

【924】 林蕴晖：《中国六十年代造神运动的起源》。《党史博览》2005年第11期。原注：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参见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第173-174页。

【925】 《中国六十年代造神运动的起源》。

毛泽东需要个人崇拜，这一点林彪没看错。但毛反感低层次崇拜，如堂皇空洞的套话或念经式的顶礼膜拜，他需要的是“高层次”崇拜，也就是毫无保留地拥护和服从他的领导，不遗余力地推行他的思想主张，将他的思想加以理论性的总结，升华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使之传于后世。而张春桥正是瞅准了毛泽东的心理，摸到了他的脉搏，顺着他的思路，总结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使毛大有“知我者，春桥也”之感，将张视为真正的文革传人。相比之下，林彪搞的“丘八式”个人崇拜就显得粗俗浅陋，相形见绌了。也许这也是后来毛试图以“小张”取代林彪作接班人的一个原因。

## 二、“三忠于”“四无限”

随着军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断升温，有关形式主义物品大量出现：

印制《毛主席语录》。早在1961年4月，林彪授意《解放军报》经常选登毛泽东语录，该报从5月1日开始在每天的报眼上刊登，后来编辑成册，为总政所肯定，加以增补，正式命名为《毛主席语录》，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1965年再版时，改为红色塑套装100开本，发至全军人手一册。很快，《毛主席语录》推广到全国，被称为“红宝书”。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64年至1976年，《毛主席语录》全国发行量约50亿册。

制作毛主席像章。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夏至1971年夏的五年间，全国共制作毛泽东像章达六万种、总数四十亿枚以上。

1967年5月13日，《解放军报》发布“军委决定全军颁发特制毛主席像章”消息。该消息集“四个伟大”、“四无限”、“三忠于”之大成称，“我军全体同志，对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他们早就迫切希望佩戴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章。佩戴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章，象征着我们时刻都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身边，象征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总政治部要求全军同志，戴上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章，要更加忠于毛主席，更加忠于毛泽东思想，更加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新的功勋。要更好地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把我军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sup>【926】</sup>

【926】《解放军报》，1967年5月13日。

此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三忠于”提法，又有所发展。

1967年11月26日，新华社在报道“空军党委全体会议以斗私批修为纲总结文化大革命和‘三支’‘两军’经验”时称，“使空军各级领导班子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使“三忠于”变成了“五忠于”。<sup>【927】</sup>

翌年，“三忠于”的提法又有新发展。1968年3月5日，新华社在报道空军第二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时称：

代表们说，毛主席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最伟大的导师、最敬爱的领袖、最杰出的统帅、最英明的舵手。毛主席是全世界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天才，他经历了最长期、最复杂、最激烈、最多方面的斗争，他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毛泽东思想的崭新阶段，使世界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革命新时代。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很典型地集中了人类的优秀思想，并且在新的条件下大大发展了这些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优秀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代表们说，有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有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革命就一定胜利，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一定能够得到解放，历史就一定前进，共产主义就一定实现；背离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革命就要失败，历史就要倒退，世界就要黑暗。毛主席是我们时代的代表，是真理的化身，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大救星，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千重蓝天写不尽我们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万里长空容纳不下我们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革命战士最根本的立场，最根本的觉悟，最高贵的品质，最大的革命大节。我们千学习，万学习，就是要学习对毛主席的一个“忠”字；千奋斗，万奋斗，就是要为树立对毛主席的一个“忠”字而奋斗。<sup>【928】</sup>

【927】《人民日报》，1967年11月27日。

【928】《人民日报》，1968年3月6日。

这篇报道还将“三忠于”变成了“六忠于”。其表述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无限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限忠于中央文革的钢铁长城。”<sup>【929】</sup>

1967年9月下旬至1968年8月中旬，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十多次接见十余万团职以上干部。毛每次接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军内各大单位报刊都会迅速地加以报道，并在随后数日里连篇累牍地发表各类文章，欢呼庆祝，重点突出对毛的“三忠于”、“四无限”。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及时地摄制相关的纪录影片，在全国各地广泛放映，大加宣传。而受到毛接见的军队干部所在单位，更是一片欢呼，忙碌不已，他们不是有组织地连夜开大会、搞游行、发贺电，就是集体性地立誓言、献锦旗，表忠心，不一而足。而在北京受到毛接见的那些干部，在接见之后纷纷举行各种庆典性的、座谈会式的、宣誓性的仪式或活动，更是热闹非凡，一浪高过一浪，令人目不暇接。因而，差不多是在毛接见军队干部期间，对毛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sup>【930】</sup>

### 三、军队的“三忠于”活动

军队中开展“三忠于”活动的热潮，以海、空军最为典型。

1967年12月，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在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时称：

广大指战员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感情有了极大的加深。大家无限深情地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海洋再深，深不过毛主席的恩情；宇宙再大，大不过毛主席的功勋。”大家用各种形式来表达自己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心情。每天第一件事是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第一句话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一支歌是高唱《东方红》，第一个活动是学习最高指示。大家最爱读的是伟大导师毛主席的书，最爱听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最爱佩戴的是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像章，最爱张贴的是伟大舵手毛主席的像。指战员们说：“潜艇挂上毛主席像，水下充满太阳光；飞机挂上毛主席像，仓里更比仓外亮；海岛挂上毛主席像，好像守卫在毛主席身旁；阵地挂上毛主席像，好像毛主席指挥在战场。”“心

【929】 《人民日报》，1968年3月6日。

【930】 唐少杰：《文革中军官的集体观见》，《二十一世纪》2013年2月号。

中有了红太阳，身在舰艇，能把世界装。”大家日夜想念毛主席。在激烈的战斗中，一喊“毛主席万岁”，就浑身是劲，周身是胆，“敢上刀山叫钢刀卷刃，敢下火海叫火灭烟消”。在战场上身负重伤，清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就是幸福，毛主席万岁就是力量，毛主席万岁就是革命战士最大的希望。大家共同的誓言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海可枯，石可烂，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永不变！”<sup>【931】</sup>

空军第五军 1968 年在有关开展“三忠于”活动的经验中称：

我军“三忠于”活动最突出的特点，是广大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崇高感情，达到了新高度、上升到了新境界。把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真挚最赤诚的强烈的感情，贯注到一切言论行动中。开始出现了人人胸怀一个“忠”。人人培养一个“忠”，事事体现一个“忠”，时时想到一个“忠”的动人局面。从机关到连队，从机场到营房，从干部到战士，从阵地到课堂，从炮位到机舱，大搞思想“忠”字化。学习“忠”字化。工作“忠”字化。战斗“忠”字化。生活“忠”字化。忠于毛主席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正在成为贯穿战斗、工作、学习、生活一切方面的一条最鲜明最突出的红线。广大指战员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站在毛主席像前。向毛主席致敬，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愿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纵情高唱《东方红》，“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打开红色宝书向毛主席请示。部队讲的是“忠”字课，开的是“忠”字讲用会，做的是“忠”字操，训练中进行的是“忠”字飞行日，“忠”字工作日。广大干部、战士写“忠”字诗，画“忠”字画，编“忠”字节目，演“忠”字戏，讲“忠”字的故事，出“忠”字的墙报，放“忠”字幻灯，建立红太阳影集，布置献“忠”室。“一帮一”、“一对红”帮在“忠”字上。红在“忠”字上，谈心活动在“忠”字上。连队在床头立了“促忠袋”，“忠”字栏，“进宝箱”，相互促进一个“忠”。广大指战员怀着对我们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废寝忘食，在紧张战斗工作间隙中，精心制做毛主席像，编毛主席像框，件件作品都凝结着一个“忠”字，他们说：“一针一线绣‘忠’心，一笔一划刻‘忠’心，一点一滴树‘忠’心。永远忠于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深深地刻在广大指战员的脑海中。

该经验还称：

【931】 海军政治部：《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主要材料》，1968年4月，页114-116。



各部队通过大宣传、大发动，开誓师大会，献“忠”表“忠”大会，大造声势，掀起了人人献策、个个动手的群众性献“忠”表“忠”的热潮，大大激发了一个“忠”字。嘉兴基地机务八中队。在代表上北京出席空军第二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前夕，为了向毛主席敬献忠心，全中队刻制了一块凝结七十六颗红心的金匾。许多同志都是第一次绘画，第一次雕刻。在刻制过程中，他们怀着忠于毛主席的一颗红心，克服了许多困难。从星星出到东方红，从太阳升到日西下，连干了五个昼夜，终于刻制成功。不少战士眼睛熬红了，用湿毛巾擦一擦再刻。手土起了血泡，用布包扎起来再刻。有的同志手上的血和布粘在一起，还是坚持刻。战士们说：“血往‘忠’字上流，就是最大的幸福，劲往‘忠’字上使，就有无穷的力量。”高炮三团出国参战部队在他们离开祖国的前夕，战士们集体描绘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绣出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八个大字和一颗“忠”心。他们含着激动的泪花说：“千山万水望北京，千针万线绣个‘忠’，千言万语表心意，千秋万代忠于伟大领袖毛泽东。”“三忠于”活动群众发动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连几岁的娃娃也投入了“忠”字的洪流，芜湖基地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建立了“早请示”“晚汇报”、每餐向毛主席祝愿的制度。有一次吃饭老师没有组织小朋友祝愿，小朋友就说：“没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们就不吃饭。”<sup>[932]</sup>

#### 四、军队对“副统帅”林彪的吹捧

伴随着对毛泽东的吹捧的，是对“副统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的吹捧。值得注意的是，军队此一时期对林彪颂扬的肉麻程度，甚至超越了毛泽东，这不可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与不快。

李作鹏、王宏坤、  
张秀川在毛塑像落成  
典礼主席台上，1968  
年7月1日。



【932】《7350部队开展“三忠于”活动的经验》。7350部队为空军第五军的代号。

对林彪的吹捧，目前所能见到的，以时任海军第一政委的李作鹏 1967 年 11 月在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所作为“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政治报告调门最高。李作鹏在报告中称：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以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远见和智慧，以无比的魄力和毅力，适应时代的需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亲自发动和领导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伟大群众运动，为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全中国，插遍全世界，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还表明，每当出现一个伟大的天才领袖，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同时也必然会出现一个杰出的、天才的政治家，作为他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宣传他的学说，捍卫他的权威，阐明和发挥他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他的事业，帮助世界无产阶级认识自己的伟大的天才领袖。

十九世纪的伟大天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使马克思的天才得以发挥，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恩格斯用尽了毕生的精力，在反动势力的迫害下，恩格斯为了替无产阶级保全自己的领袖，承担了最大的自我牺牲。他同马克思并肩战斗，坚决粉碎了阴谋家巴枯宁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

到了二十世纪，伟大的天才是列宁。……同列宁一起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是斯大林。斯大林用很大的精力宣传列宁主义，捍卫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权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的列宁，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副主席，几十年如一日，一贯忠于毛主席，怀着对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捍卫毛主席的最高领袖和最高统帅地位、宣传和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林彪副主席最全面、最正确、最科学地评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主席是当代的列宁。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我们时代的代表。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谁也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自指挥过那么多重大的政治战役和军事战役；谁也没有像毛主席经历过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多方面的斗争；谁也没有像毛主席那样解决了那么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时代的旗帜，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统一的行动纲领。林彪副主席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所作出的最全面、最正确、最科学的评价，字字句句表达了亿万革命人民的愿望，字字句句说到了亿万人民的心坎里，极大地增强了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的感情，极大地提高了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自觉性。

……

林彪副主席最英明、最积极、最认真地领导和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运动，开创了工农兵直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纪元。……他发出了“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伟大号召。他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随着学习运动的发展，他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不断总结新的经验，不断树立新的先进典型。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务，高度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他把波澜壮阔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从全军推向全国，现在正由全国逐步推向全世界。这种大好局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空前未有的。这是林彪副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最卓越、最杰出、最伟大的贡献。他的这个伟大贡献，深受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热烈最衷心的感谢，值得我们子孙万代大颂特颂、大书特书。他的这个伟大贡献，将作为划时代的伟大创举，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辉史册。<sup>【933】</sup>

【933】《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主要材料》，页82-88。

以上所引李作鹏报告中最后一段话中的“这是林彪副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最卓越、最杰出、最伟大的贡献。他的这个伟大贡献，深受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热烈最衷心的感谢，值得我们子孙万代大颂特颂、大书特书。”笔者在其他地方没有见识过。李作鹏这些话使人产生一个疑问：林彪已经是“最卓越、最杰出、最伟大的贡献”，又“深受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热烈最衷心的感谢”，那么，毛泽东又该往哪儿摆呢？

### 五、中央警卫团首倡的“早请示、晚汇报”

1967年11月13日，中央警卫团（代号8341部队）向毛泽东报告称，“主席指示我们组织支工部队，到火热的群众运动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考验，进行锻炼。这是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我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怀着对主席的无限热爱，对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诚的感情，抱着排除万难，坚决完成主席交给我们的这一光荣而伟大的支工任务的决心，于六月二十六日分别进入北京市针织总厂及其所属的两个分厂，同时还派了一部分同志到北京市化工三厂。至今，已经四个多月了，现将针织总厂这一段工作的情况，向主席汇报。”

报告在谈到“大张旗鼓地推动活学活用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时称：

大造学习声势，建立学习组织，健全学习制度，布置学习环境。运用上班向主席请示、下班向主席汇报（集体学习语录），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办学习班，召开讲用会等形式，向革命职工和家属，广泛宣传毛泽东思想。在较短的时间内，掀起了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高潮。工人们说：

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心明眼亮有方向；

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检查工作和思想。

生产中看看车头镜（语录牌），干劲猛增大；

交班交语录，互相关心互相帮。<sup>[934]</sup>

报告中所谓“上班向主席请示、下班向主席汇报”，就是文革中风行一时的“早请示、晚汇报”的源头。

11月15日，毛泽东在看了中央警卫团的报告和北京针织总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喜信后，批示称：“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

<sup>[934]</sup>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关于北京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1967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7〕350号。

11月1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7]350号中共中央文件告之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称，“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向主席报喜的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关于该厂问题的报告，都很好，是体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一个典范。现将这两个文件发给全国各地、各企业、各机关、各学校普遍阅读。请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虽然中央警卫团的报告没有详细说明“早请示，晚汇报”的具体做法，惟既然毛泽东已称赞“很好，谢谢同志们！”中央又要求各地“请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早请示、晚汇报”还是迅速地推广至全国各地，并发展成一整套程式化的、内容大同小异却又繁简不一的仪式。典型的一套仪式如下：

### （一）早请示

一、向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敬礼！

二、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最伟大的领袖，全中国、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众：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祝愿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光辉榜样林副统帅（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三、“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在新的一天工作学习开始的时候，我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

众：我们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对您老人家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我们永远忠于您，永远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永远忠于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们要一辈子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

四、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让我们共同高唱《东方红》。

五、学习最高指示：（选读语录）

### （二）晚：汇报

一、向毛主席敬礼！

二、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均同早上）

三、学习最高指示：(选读语录)

四、汇报开始：(众)要斗私，批修。(三遍)

(由组织实施的负责同志针对一天来的思想学习和工作情况，对照毛主席的教导进行讲评，表扬好人好事，然后大家发言(简单扼要的)作为集体向毛主席汇报)

五、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让我们共同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sup>[935]</sup>

在浓重的个人崇拜氛围之下，“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毛泽东一句“很好，谢谢同志们！”进而发展成为这样一整套程式化的东西，可能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无论如何，在这个问题上，他本人应该要负很大的责任。

### 六、毛泽东提出制止建塑像而军队未执行

1967年5月4日，一座高8.1米的巨型毛泽东全身塑像在北京清华大学校园内落成。新华社翌日以“阳光普照清华园”为题向全国报道了此一消息，并称，“塑像下面刊刻着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文革中落成的全国首座巨型毛泽东全身塑像。<sup>[936]</sup>

6月28日，林彪指示，“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7月1日，总参、总政在拟定的关于执行林彪指示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稿中称，“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应立即按林副主席的指示执行。”<sup>[937]</sup>

7月5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7月4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280期上刊载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材料批示称：“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sup>[938]</sup>

令人甚觉蹊跷的是，虽然已有毛泽东7月5日的明确批示，到了7月10日，林彪仍将7月1日总参、总政通知稿转送毛泽东审阅。可能林彪仍然认为，毛类

【935】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0期)印。

【936】 《解放军报》，1967年5月6日。

【93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76。

【93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68。

似这样的批示，不过是毛有意做出的高姿态？7月12日，毛泽东对总参、总政通知稿批示称：“退林彪同志。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sup>【939】</sup>

毛泽东所称的“中央已有指示”，是指周恩来根据毛7月5日批示送审、毛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稿，该指示稿全文如下：

### 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

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军管会，各军区、军分区党委，各级人民武装部，各群众组织：

现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转发你们，希望你们认真执行。应当向群众进行耐心的解释：广大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建造毛主席塑像，确实是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但是，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每一座塑像都应当保证政治上、艺术上的高质量，传之千秋万代。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才可能做好。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毛主席七月五日指示：“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希望你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以制止。

此外，各地编印了一些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材料，甚至将别人的讲话、诗词也编进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出现这种事情，也请你们加以制止。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sup>【940】</sup>

1967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的通知》（中发[67]298号中共中央文件），该通知虽声称“无条件地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精神”，惟其实对执行“七一三”指示的力度有所松动。该通知称：

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军管会，各军区、军分区党委，各级人民武装部，各群众组织：

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下达后，许多地区的群众组织直接给中央送来报告，要求兴建主席大型塑像。目前，有的

【93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76。

【940】中发[67]219号中共中央文件。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办公室1967年7月15日翻印。

正在施工，有的积极备料，急切动工兴建。如此匆忙兴建，无统一规划，势必造成不良后果。为此，除重申：无条件地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精神外，特通知如下：

一、凡经中央已批准夺权的省市，建造毛主席塑像，由省市统一规划，报请中央批准后再行兴建。

二、凡未经中央批准夺权的省市，毛主席塑像暂不兴建，待省市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后，再行办理。

三、已经建成或将要建成主席塑像的，严格按照“七一三”指示办事，由省市领导机关或军管会认真检查，不合格的坚决拆除。“七一三”指示后计划或动工建造主席塑像的，立即停下来。

四、人民解放军机关兴建主席塑像，统报军委批准后执行。<sup>【941】</sup>

尤其是该通知称，“人民解放军机关兴建主席塑像，统报军委批准后执行”，实际上为军队机关建造毛塑像开了一个口子。

根据有关资料<sup>【942】</sup>的不完全统计，1967年6月至1968年7月一年间，北京地区各军兵种、大军区级军事院校和国防科研单位机关大院落成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时间、地点如下：

① 1967年6月11日，解放军政治学院大院；② 1967年8月18日，通信兵机关大院；③ 1967年9月25日，装甲兵机关大院；④ 1967年10月1日，第二炮兵机关大院、工程兵机关大院、铁道兵机关大院、防化学兵机关大院；⑤ 1967年12月，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机关大楼前；⑥ 1968年7月1日，总后勤部机关大院、海军机关大院、炮兵机关大院。各大单位中，笔者惟未见空军、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的有关资料。



海军直属机关庆祝毛塑像落成典礼会场，1968年7月1日。

【941】福州军区政治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二），1968年2月，页236-237。

【942】主要根据各有关单位为毛泽东塑像落成而制造的纪念像章。

毛泽东塑像落成有文字记载及照片留存的，仅见海军资料：“1967年7月10日，海军党委常委会议决定，在海军直属机关大院建立毛泽东主席全身巨型塑像。1968年7月1日，举行了塑像落成典礼。”<sup>[943]</sup>

值得注意的是，除解放军政治学院外，其他单位的塑像全部是在“七一三指示”发布之后落成的，可见军队各大单位根本未将该指示放在眼里。

### 七、真正起到冷却作用的中发[69]33号文件

就制止在全国蔓延的建造巨型毛泽东塑像热潮而言，1967年7月13日的中发[67]219号文件及同年9月13日的中发[67]298号文件效果均不显著。而真正对狂热的“忠字化”造神运动的方方面面起到冷却作用的，是直到1969年九大之后中共中央于6月12日发出的[69]33号文件——《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该文件全文如下：

毛主席批示：照办。

#### 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党政各部、委军管会或军代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城乡广大革命人民，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大大地加深了广大革命群众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引起了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增强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推动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了关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

但是，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有的借口宣传毛泽东思想，挥霍国家资财，不经批准，用烧瓷、石膏、塑料、金属等材料，塑造各种毛主席像；有的绘、印、绣毛主席像不认真，不郑重，歪曲了毛主席的形象；有的制作毛主席像章越来越大，样式繁多，质量又差；有的随意随处张贴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有的甚至设置“宝书台”、“忠字室”、“敬仰馆”、展览馆，等，跳“忠字舞”，到处贴“忠”字，大搞“忠字化”运动。这类形式主义的做法，虽则人们出自好意，却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有损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在政治上很不严肃。

【94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海军·综述大事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2月版，页372。

宣传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符合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要节约闹革命”的教导，必须保证政治上、艺术上的高质量。为此，特提出如下改进意见：

一、各级领导要积极引导广大革命群众把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落实到认真、刻苦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方面。把毛泽东思想用到实践中来，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

二、重申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今后，塑造毛主席像，必须严格按此指示执行。印制毛主席像和有毛主席形象的宣传画，必须经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认真讨论和批准。凡是有损于毛主席光辉形象的像一律不得悬挂。悬挂的地方要庄重、整洁、适当。

三、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要尊重、热爱毛主席像章，禁止用毛主席像章在街头进行交换。

凡存有过多的毛主席像章的机关、部队和个人，根据自愿原则，可以献出过多的那部分像章给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各军区、各野战军，由他们分送给边远地区和农村的革命群众。

四、因为旧报纸需要使用和回炉，中央、地方和军内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

五、车辆、机器、武器装备、信封、信纸、办公用纸、生活用品、文具、儿童玩具以及各种商品、商标、包装上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印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

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

六、“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今后，单独的“忠”字，不要乱贴滥用，不要围绕“忠”字随意提一些不妥当的口号（例如：脚往“忠”字上走、血往“忠”字上流、劲往“忠”字上使），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那什么封建式（如小庙、牌坊、门楼、宝塔等）的建筑，如有，应作适当处理。

七、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二日



中发 [69]33 号文件最后注明：“此件发至省、军级，由省、军级各单位负责传达和处理”，规格颇高。值得注意的是，此文件没有标注密级，这说明中央提出的有关对毛形象宣传的改进意见，是要求广大党员和群众周知的。

中发 [69]33 号文件对个人崇拜降温起了较明显的作用，但个人崇拜降温的主要原因并不在发文件本身，而是经历了两年多的文革狂热，毛泽东通过个人崇拜来推行其发动文革的意图已经达到。同时，以毛的睿智及他对历史的了解，他本人已意识到，过度的个人崇拜不仅是虚幻的，而且是极其可笑的，是一种辛辣的讽刺，必然在历史上留下笑柄。于是，毛三番五次表示“讨嫌”，造神运动的高潮也逐渐低落，再疯狂的活动，也有精神疲惫之时，是该停歇的时候了。

个人崇拜不仅仅是满足个人的虚荣心，而且如毛泽东自己所承认的，有其政治目的。虽然个人崇拜中确实有群众对领袖的敬仰，但有意识地推行个人崇拜运动，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愚民政策，目的是强制推行个人意志，并使之成为群体的意志，驱使群众加以实行。从文革前夕开端的个人崇拜运动，就是为了排除党内外异议，维护毛泽东的高度集权，按照毛的意图，强推文化大革命。

对于搞个人崇拜的人来说，也是为了交易。既是政治的交易，即以媚上和表忠心来换取信任，谋取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也是灵魂的交易，即以牺牲个性，奉献自我，来换取集体安全感和成就感。同时放弃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以领袖的大脑，来代替全党及全国几亿人的大脑。

从文革前到文革中，军队率先发起并积极推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中共军队历史上耻辱的一页。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应当对人民忠诚，而非对个人效忠。个人崇拜运动将军队对人民的忠诚变成了对某个人的忠诚，其后果是使军队成为个人的工具。这个人犯了错误，军队就跟着犯错误。

林彪和军中一部分人因推行个人崇拜，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和倚重，从而在不同程度上获取了党政军的权力，使军队权势达到鼎盛时期。但也正因为如此，军队对文革的错误也负有责任。

而军队的权势炽盛，又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以及对军方尾大不掉的猜忌和防范，并且激化了军方与文革派之间的矛盾，反而导致了军方在政治舞台迅速衰落和溃败。搞个人崇拜的人调子越高、越绝对，其下场就越惨。这种政治吊诡，是林彪等人所始料不及的。

# 第六章

1967・下：浊浪排空





## 第四十七节 国务院系统的军事管制<sup>[944]</sup>

### 一、“国务院各部（委）……势非实行军管不可”

由毛泽东本人亲自鼓动发起的“一月革命”，无可避免地迅速波及到国务院系统各机构。据有关群众组织综合的国务院各部一月份夺权情况，大略如下：

**水利电力部**：1月17日，水电学院联合另外四个组织全部接管，实行监督。接管之前，没有和部属单位革命造反派商量，引起一些意见和纠纷。**纺织工业部**：1月18日晨，清华井冈山、地院东方红等组织联合部机关某组织接管纺织部，并成立联合接管指挥部（27日，清华井冈山宣布退出）。**煤炭工业部**：1月16日，部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宣布接管，21日煤炭系统革命造反联络总站（又称夺权委员会）也宣布夺权。两个组织发生争执。部机关分化加剧，辩论形成高潮。**文化部**：1月19日艺术院校、部队文艺工作者革命造反联委会等组织成立联络站并宣布接管。北航红旗、青艺东方红等指责这次接管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冶金部**：1月16日，部机关、钢院红旗等七个组织宣布夺权。后北钢认为这次夺权没有群众基础，徒有虚名而无实权，所以又退出这一组织（叫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现只剩三个单位），与全国冶金系统造反联络站联合，准备春节前搞第二次全面夺权。**卫生部**：1月17日晨，医大红旗公社、机关红色造反团、出版社等九个部直属单位宣布夺权。北医八一八、部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等组织反对这次夺权，两派发生摩擦，越演越烈。**水产部**：1月17日，水产部红色造反接管委员会宣布夺权，夺了大印，但没有群众基础，大遭反对。水产部五个厅、司、局的二十多个组织反对这次夺权。**邮电部**：1月20日，北邮东方红及部机关职工革命造反团等组织发起夺权。联系不够广泛，群众有意见。**第一轻工业部**：1月14日，轻工业学院井冈山和红色造反委员会宣布夺权。接管后困难较多，与部机关有摩擦。**地质部**：大致分为六大组织：地质部革命造反团（一兵团）、地质部东方红革命造反兵团（三兵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二兵团）等。1月19日，一兵团与三兵团宣布夺权，联合几个组织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各组织争权很厉害。**农垦部**：1月21日夜，九个部属组织宣布夺权，并成立全国农垦系统夺权联合指挥部，其中包括二司农大东方红、一司农大红旗和其他组织。**交通部**：1月19日，大连海运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上海红革会等组织夺了交通部的权。有人指责他们脱离群众。北大准备搞大联合夺权，与前述组织发生争论。**劳动部**：1月19日，劳

<sup>[944]</sup> 主要参考资料：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附卷（一），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该书错漏颇多，须慎重使用。

动部革命造反夺权指挥部夺了权，经济学院驻劳动部联络站对指挥部提出质疑，认为夺权指挥部不是大联合而是排除不同观点的人，双方发生争论。**石油部**：1月14日零点，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宣布夺权，19日成立了石油系统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委会，由36个组织组成。随后由石油学院北京公社组织成立了一个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临委会。双方在夺权问题上争论激烈。**化工部**：1月14日，化工学院按十六条革命造反队宣布夺权，成立临委会。后红色战斗兵团等组织成立革命生产委员会，也宣布夺权，双方发生争论。**林业部**：1月15日凌晨，由部机关六个战斗团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接管监督委员会，宣布接管。18日晨东方红公社宣布六个战斗团无权接管，认为是保字号的。东方红成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监督委员会（20日改为接管）。21日，北林院联合五个林业院校宣布前两次接管无效，由他们全部接管。**商业部**：1月19日晚，由造反军和红反团联合夺了商业部的权，成立了七人接管委员会。基层各司、局也都开始了夺权，情况不一。**建筑工程部**：1月20日，由建工部革命造反总部夺了建工部的权。其他组织如红色建工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对这次夺权不满，认为没有做到大联合，夺权时也没有和他们打招呼，两派争论，分歧很大。**物资管理部**：1月19日下午，机关革命造反兵团和经济学院驻物资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夺了权。其他组织对这次夺权有看法，争论较大。**财政部**：1月20日，由各个口战斗队组成的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等组织进行了夺权，22日全部接管。**一机部**：1月16日，一机部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接管一机部，1月19日全部接管。各部属单位也纷纷展开夺权斗争。北京机院东方红公社于19日凌晨偷走了委员会已接管的一机部三枚大印，也宣布夺权。<sup>[945]</sup>稍可庆幸的是，以上乱象纷呈的夺权闹剧，终究无一得到中央的正式承认。

早在3月间，面对日益失控的局面，周恩来即提出国务院系统各部门的军事管制问题。3月18日，周恩来就国防工业各部、院军管一事报告毛泽东、林彪等时附带称，“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国防工业各部。定后将分别报批。”<sup>[946]</sup>3月21日晚，周恩来在接见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造反派代表和各部党组成员时称：请大家来，是要迅速解决铁道、交通、邮电三个部的工作问题。对三部要实行全面军管，不能再耽搁了。<sup>[947]</sup>

**[945]** 中央各部夺权情况报导。一机部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险峰》编辑部：《险峰》第七号，1967年1月31日。

**[946]** 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页25。

**[94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39。

惟迟至两个多月后,5月28日,周恩来才将拟定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送交毛泽东审批。

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业务和生产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昨(廿七)日常委碰头会上通过这一决定(试行草案),现送上,请予审批。”决定(试行草案)内称:“为了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根据毛主席关于‘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以及‘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等重要指示,特决定自即日起对××部(委)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或军管小组,任命×××为军管会主任或军管小组长,×××、×××为副主任或副组长。”“军管会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对部(委)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革命放在首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革命统帅生产,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掀起生产的新高潮,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不久,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这个决定(试行草案),对国务院绝大部分部(委)及直属机构陆续实行军事管制。<sup>[948]</sup>

上述决定列举了军事管制机构的两种组织形式——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军管小组,实际上后来在执行中还有另一种形式为派驻军事代表。派驻军事代表实质上同属于军事管制。

以下对国务院各部(委)及直属单位军事管制简况的叙述,以军管实施时间为序。国防工业各部即第二至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军事管制,专节另述。

## 一、1967年对国务院各部的军事管制

### 1. 铁道部

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颁布关于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sup>[949]</sup>军管人员由总参谋部派遣。任命苏静为军管会主任,杨杰、朱互宁为副主任。10月,朱互宁调任冶金部军事代表。11月15日,中央决定韩卫民任副主任。<sup>[950]</sup>

【948】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60-361。

【949】 对国务院各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颁布,下文简称为“中央决定”。

【950】 杨杰,时任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副部长,1965年大校军衔。朱互宁,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七处(空军处)处长。韩卫民,时任总参谋部军训部副处长。

## 2. 交通部

5月31日，中央决定对交通部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海军派遣。任命赵启民为军管会主任，陈湃、蔡润田为副主任。后又增补王永年、俞侠、张瑞基为副主任。1968年2月，赵启民调离，军管会工作暂由张瑞基负责。1969年9月，由潘友宏任军管会主任。<sup>[951]</sup>

## 3. 石油工业部

6月，中央决定对石油工业部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炮兵派遣。7月6日，军管会主任欧阳毅率军管会成员共40人正式进驻石油部。9月13日，欧阳毅被揪回炮兵机关关押（1968年4月宣布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隔离反省）。宋承志、王星先后继任军管会主任。<sup>[952]</sup>

## 4. 第八机械工业部

7月1日，中央决定对八机部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总参谋部派遣。任命周特夫为军管会主任，王乐天、孙成秀为副主任。10月4日，王乐天调任地质部军事代表。11月，任命孙琪为副主任。<sup>[953]</sup>

## 5. 水利电力部

7月1日，中央决定对水利电力部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铁道兵派遣。任命陈德三为军管会主任，梁其舟、吴志笃为副主任。7月11日，军管会进驻部机关。<sup>[954]</sup>

## 6. 建筑工程部

7月1日，中央决定对建筑工程部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工程兵派遣。任命李良汉为军管会主任，李冠智为副主任。1968年2月，李良汉调任国家建委军管会主任，张国传继任建工部军管会主任。<sup>[955]</sup>

【951】 陈湃，时任职务不详，1979年后任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蔡润田，时任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王永年，时任海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俞侠，时任海军司令部机要局局长。张瑞基，时任海军工程部副部长。潘友宏，时任海军北海舰队后勤部部长。俞侠、张瑞基、潘友宏，1965年海军大校军衔。

【952】 宋承志，时任炮兵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少将。王星，时任炮兵学院副院长，1965年大校军衔。

【953】 周特夫，时任总参谋部政治部副主任。王乐天，时任总参谋部装备部处长。孙成秀，时任总参谋部军训部处长。孙琪，时任总参谋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周特夫、王乐天，1965年大校军衔。

【954】 陈德三，时任铁道兵后勤部政委，1965年大校军衔。梁其舟，时任铁道兵司令部通信处处长。吴志笃，时任铁道兵援越工程第一支队副主任。

【955】 李良汉，时任工程兵副政委，1955年授衔少将。李冠智，时任工程兵副参谋长。张国传，时任工程兵副参谋长，建筑材料工业部军管会副主任，1955年授衔少将。

## 7. 财政部

7月1日，中央决定对财政部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总后勤部派遣。任命殷承祯为军管会主任，王瀑声、刘洪章为副主任。<sup>[956]</sup>在军管会统一领导下，由刘洪章、财政部副部长吴波、预算司司长王丙乾、商业财务司司长谢明、政治部副主任姚进、王程远等组成临时业务领导小组，刘洪章、吴波分别担任正副组长，具体负责主持财政部业务行政工作。

王丙乾后来称，“军管会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对于基本维持财政工作正常进行，保证财政部业务工作不间断发挥了历史作用。特别是军管会主任殷承祯，在原则上坚决贯彻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放手让业务组开展工作，不干涉财政业务，对财政部原来的司局长也采取保护和 supports 的态度，不让他们随便遭到批斗。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背景下，殷承祯对先念同志非常尊重。中央让先念同志就‘二月逆流’事件回财政部作检查的时候，殷承祯亲自去门口迎接。当先念同志做完报告时，他还带头鼓掌，并在会后写了简报，向中央反映先念同志的检查报告好。这在当时是对先念同志很大的支持。”<sup>[957]</sup>

## 8. 物资管理部

7月6日，中央决定对物资管理部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空军派遣。任命刘忍为军管会主任，杨卫群、黄胜真为副主任。10月，杨卫群调任第一轻工业部军事代表。<sup>[958]</sup>

## 9. 化学工业部

7月31日，中央决定对化学工业部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防化学兵部派遣。任命蓝文兆为军管会主任，宁必成、于逢亭为副主任。<sup>[959]</sup>

## 10. 邮电部

8月30日，中央决定对邮电部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通信兵部派遣。任命陈挽澜为军管会主任，龙振彪为副主任。8月31日，军管会全体人员进驻部机关。1968年1月，龙振彪调任劳动部军事代表，马克绍继任部军管会副主任。<sup>[960]</sup>

---

**[956]** 殷承祯，时任总后勤部物资部副部长，1964年晋升少将。王瀑声，时任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刘洪章，时任总后勤部军马部副部长，1965年大校军衔。

**[957]** 王丙乾：《财政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百年潮》2009年第10期。

**[958]** 刘忍，时任空军后勤部副部长，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杨卫群，时任空军军训部副部长。黄胜真，时任空军后勤部军需部副部长，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

**[959]** 宁必成，时任防化学兵部后勤部副政委。于逢亭，时任防化学兵部后勤部订购处副处长。

**[960]** 马克绍，时任通信兵副参谋长，1965年大校军衔。



### 11. 建筑材料工业部

9月5日，中央决定对建筑材料工业部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工程兵派遣。任命李大同为军管会主任，张国传、孙济鲁先后任军管会副主任。<sup>[961]</sup>

### 12. 对外贸易部

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对外贸易部派出军事代表<sup>[962]</sup>。人选由海军负责。任命李东野为对外贸易部军事代表，王安居为副军事代表。1969年2月，李东野回海军学院，军事代表改由王霄汉担任。<sup>[963]</sup>

### 13. 煤炭工业部

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向煤炭工业部派出军事代表。人选由空军负责。任命王素为煤炭工业部军事代表，毛叶舟为副军事代表。<sup>[964]</sup>

### 14. 冶金工业部

10月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冶金工业部派出军事代表。<sup>[965]</sup>人选由总参谋部负责。任命朱互宁为冶金部军事代表，郭俊生为副军事代表。1968年11月，冶金部军代表领导小组决定成立部抓革命促生产业务工作班子，留下180人承担机关日常工作，而将主要领导干部和大批技术人员、机关干部送至云南草坝“五七干校”（后迁到河南淮阳）从事农业生产。<sup>[966]</sup>

### 15. 地质部

10月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地质部派出军事代表。人选由总参谋部负责。任命王乐天为地质部军事代表，蒋成玉为副军事代表。

### 16. 第一轻工业部

10月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向第一轻工业部派出军事代表。人选由空军负责。任命杨卫群为一轻部军事代表，张学让为副军事代表。<sup>[967]</sup>

【961】 李大同，时任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晋升少将。孙济鲁，时任工程兵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962】 向国务院部（委）及直属机构派出军事代表均以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下同。

【963】 李东野，时任海军学院副政委，1964年晋升海军少将。王安居，时任海军学院教研室主任。王霄汉，原海军学院政治部副主任，时任海军学院政治部革命领导小组组长，1965年海军大校军衔。

【964】 王素，时任空军工程部外场部副部长。毛叶舟，时任空军直属政治部干部处副处长。

【965】 《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任命冶金工业部等单位军事代表的通知》，1967年10月4日。

【966】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大事记1949—1990》，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页122。郭俊生，时任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副处长。

【967】 张学让，时任空军政治部处长。

### 17. 第二轻工业部

10月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向第二轻工业部派出军事代表。人选由炮兵负责。任命徐之文为二轻部军事代表，张志昌为副军事代表。后徐之文回部队，李学实继任军事代表。<sup>【968】</sup>

### 18. 商业部

10月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商业部派出军事代表。人选由总后勤部负责。任命范子瑜为商业部军事代表，张崇秀为副军事代表。后张荣欣、黄华龙先后任副军事代表。1968年11月，建立商业部军事代表业务办公室，商业部所属各局、总公司停止对外联系。<sup>【969】</sup>

### 19. 粮食部

10月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向粮食部派出军事代表。人选由总后勤部负责。任命樊省轩为粮食部军事代表，牛德才（后翟梦僧）为副军事代表。<sup>【970】</sup>

### 20. 纺织工业部

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向纺织工业部派出军事代表。人选由海军负责。10月16日，纺织工业部军事代表毛洪祥、副军事代表尹克钧、高科进驻部机关。1968年7月，成立纺织工业部革命委员会，由原副部长、部党委书记钱之光任主任，毛洪祥任第一副主任。<sup>【971】</sup>

### 21. 林业部

10月6日，中央决定对林业部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工程兵派遣。任命王云为军管会主任，李光勋为副主任。<sup>【972】</sup>

### 22. 第一机械工业部

11月3日，中央决定对第一机械工业部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军事科学院派遣。任命李景昌为军管会主任，陈梦还、李大磊、杨泽清为副主任。1968年

---

【968】 徐之文，时任炮兵司令部院校处副处长。张志昌，时任炮兵学院教研室副主任。李学实，时任炮兵学院训练部副部长。

【969】 范子瑜，原总后第二物资计划部部长。1955年授衔少将。1965年9月第二物资计划部改编为国防科委后勤部后任部长、国防科委常委，因病未到职，尚算为总后干部。张崇秀，时任后勤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教员。张荣欣，时任后勤学院后方教研室副主任。黄华龙，时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务部政委，1965年大校军衔。

【970】 樊省轩，时任总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1965年大校军衔。牛德才，时任总后勤部军需部处长。翟梦僧，时任总后勤部军需部办公室主任。

【971】 毛洪祥，时任海军后勤部副部长，1965年海军大校军衔。尹克钧，时任海军装备部订货部潜快艇处处长。高科，时任南海舰队航空兵部政治部副主任。

【972】 王云，时任工程兵后勤部副部长，1965年大校军衔。李光勋，时任工程兵司令部通信处处长。

3月，军事科学院人员全部撤出，由工程兵派员接管。严庆堤任军管会主任。董桂财、宋寿昌任副主任。<sup>【973】</sup>

### 23. 农业部

1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农业部派出军事代表。人选由总后勤部负责。军事代表先后为庞坦直、高子明，副军事代表先后为居建新、向行、刁炳章。<sup>【974】</sup>

## 二、1968年对国务院各部（委）的军事管制

### 1. 劳动部

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劳动部派出军事代表。人选由通信兵部负责。任命龙振彪为劳动部军事代表，欧阳宇、阎钧为副军事代表。12月在军代表领导下成立劳动部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阎钧，副组长欧阳宇、李正亭（原劳动部副部长）。<sup>【975】</sup>

### 2. 农垦部

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农垦部派出军事代表。人选由装甲兵负责。任命郝建刚为农垦部军事代表，王明远为副军事代表。1月24日，军代表小组进驻部机关。<sup>【976】</sup>

### 3. 水产部

1月以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向水产部派出军事代表。人选由海军负责。军事代表先后为胡鹏飞、李树荣，副军事代表先后为林青、王树森。<sup>【977】</sup>

### 4. 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

2月，中央决定对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工程兵派遣。任命李良汉为军管会主任，严宗三、孙明为副主任。2月6日，军管会进驻

【973】 李景昌，时任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党委副书记，1965年大校军衔。陈梦还，时任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室主任。李大磊，时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古代兵法研究室主任，1964年晋升少将。严庆堤，时任工程兵副政委，1955年授衔少将。董桂财，时任工程兵第五十二师政委。宋寿昌，时任第三工程兵学校副政委。

【974】 庞坦直，时任后勤学院军事教研室主任。高子明，时任总后勤部运输部副部长。居建新，时任后勤学院海军教研室副主任。向行，时任后勤学院财务教研室主任。刁炳章，时任后勤学院后方教研室主任。庞坦直、高子明，1965年大校军衔

【975】 欧阳宇，时任通信兵部通信学校副政委。阎钧，时任通信兵部第一通信总站政委。

【976】 郝建刚，时任第一坦克学校政治部主任，1965年大校军衔。

【977】 胡鹏飞，时任海军航空兵部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海军少将。李树荣，时任北海舰队航空兵部副司令员，1964年晋升海军少将。林青，时任海军航空兵训练基地副政委。王树森，时任海军第一航空学校副校长。

委机关。2月9日，停止使用国家建委及党组印章。8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由军代表、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九人组成的业务小组，负责日常业务工作。<sup>[978]</sup>

### 5. 国家经济委员会

2月，中央决定对国家经济委员会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总参谋部派遣。任命苏静为军管会主任。副主任先后为陈彬、李朴群、徐化龙<sup>[979]</sup>。

### 6. 华侨事务委员会

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华侨事务委员会派出军事代表。人选由工程兵负责。任命刘崇仁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军事代表，龙德馥为副军事代表。<sup>[980]</sup>

### 7. 内务部

3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内务部派出军事代表。人选由北京军区负责。任命万海峰为内务部军事代表，尤学仁为副军事代表。12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军代表、内务部军代表和公安部领导小组联合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上报《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毛泽东批示“照办”，内务部撤销。<sup>[981]</sup>

### 8. 体育运动委员会

1967年1月15日，体委曾被群众组织夺权。1967年5月22日，周恩来曾称体委归总政统一管理。1967年8月2日，周又称总政管不过来，体育界暂时由戚本禹管。

5月12日，中央发布命令，宣布对全国体育系统（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实行军事接管。军管人员由多部门派遣。6月19日，军管会进驻体委，曹诚为军管会主任，李青川、符志行为副主任。<sup>[982]</sup>

### 9. 外交部

6月1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外交部政治部派出军事代表。军事代表人选由总参谋部第三部负责。任命马文波为外交部政治部军事代表，韩立业为副军事

【978】 严宗三，时任工程兵后勤部副政委，1965年大校军衔。

【979】 李朴群，时任总参谋部处长。徐化龙，时任总参谋部军训部物资计划处处长，1965年大校军衔。

【980】 龙德馥，时任工程兵技术总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981】 万海峰，时任陆军第二十四军副军长，1965年大校军衔。尤学仁，陆军第七十二师副政委。

【982】 曹诚，时任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1964年晋升少将。李青川，时任海军工程学院副院长，1965年海军大校军衔。符志行，时任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训练部部长，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

代表。周恩来6月19日接见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代表时解释称，“外交大权归中央，为什么还派军代表呢？外交部不能整个的派军代表，但政治部可以派。”<sup>【983】</sup>

#### 10. 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

6月13日，中央决定对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总后勤部派遣。任命刘大煜为军管小组组长，钟羽一为副组长。6月24日，军管小组正式进驻委机关。11月14日起，原对外经委主任方毅恢复工作。<sup>【984】</sup>

#### 11. 卫生部

6月19日，中央决定对卫生部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多部门（主要为总后勤部）派遣。任命邱国光为军管会主任，霍嘉霖、谢华为副主任。<sup>【985】</sup>

#### 12. 教育部

7月24日，中央决定对教育部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南京军区派遣。任命朱奎为军管小组组长，渠维瑛为副组长。1969年5月21日，刘鸿益接替朱奎任组长。<sup>【986】</sup>

#### 13.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

7月24日，中央决定对对外文委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北京军区派遣。任命朱月华为军管小组组长，王志远为副组长。9月9日，军管小组十人上午来到对外文委。下午两派以“革命群众”的名义联合召开欢迎大会。<sup>【987】</sup>

#### 14. 国家计划委员会

8月10日，中央决定向国家计划委员会、全国物价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派驻军事代表。人选由总参谋部负责。任命苏静为上述三个单位的军事代表，陈彬、李少亭为副军事代表。后增加王朋为副军事代表。<sup>【988】</sup>

【983】周总理6月19日接见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代表的重要讲话，外交部大联委。杨荣甲：《共和国外交部秘辛——一个外交官在文革的亲身经历》，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页180。马文波，时任总参谋部第三部副部长，1955年授衔少将。韩立业，时任总参谋部第三部处长。

【984】冯晓蔚：《方毅在“文革”初期的不幸与万幸》。《红广角》，2013年第三期。刘大煜，时任后勤学院政治部副主任，1961年晋升少将。钟羽一，时任后勤学院训练部副部长，1965年大校军衔。

【985】邱国光，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少将。霍嘉霖，时任军事医学科学院政委。谢华，时任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霍嘉霖、谢华，1965年大校军衔。

【986】朱奎，时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副政委。渠维瑛，时任南京军区司令部军事交通部部长。刘鸿益，时任南京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朱奎、刘鸿益，1965年大校军衔。

【987】宋天仪：《一名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文革日记》，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3年，页83、86。朱月华，时任陆军第三十八军参谋长。王志远，时任陆军第一一四师政委。

【988】李少亭，时任总参谋部军务部组织处副处长。王朋，时任总参谋部军务部兵员补充处处长。

### 15. 民族事务委员会

9月，驻中共中央统战部军事代表向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派驻九人组成的军代表小组，组长陈长勇，副组长刘玉田。1970年，驻中共中央统战部军事代表派出第二任军管小组，组长唐铁依，副组长张玉超。

### 16. 科学技术委员会

1967年1月17日，科学技术委员会曾被夺权并成立革命造反司令部。1967年3月，改称革命委员会，张本（原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任主任。1968年3月19日，张本被北京卫戍区逮捕。9月19日，中央决定对科学技术委员会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高等军事学院派遣。任命石煌为军管会主任，崔星为副主任。<sup>【989】</sup>

综上所述，1967—68年，国务院共有部（委）机构共48个，除国防部为虚设，公安部、文化部未实行军管外，实行军管的部（委）共45个，占96%（不计国防部）。本节所列部（委）共39个（第二至第七机械工业部另述），其中组成军管会的18个，组成军管小组的三个，派出军事代表的18个。39个部（委）中，由总参谋部机关负责派遣人员的七个，总后勤部五个，海军四个，空军三个，炮兵两个，装甲兵一个，工程兵五个，铁道兵一个，通信兵部两个，防化学兵部一个，高等军事学院一个，先军事科学院后为工程兵一个，北京军区两个，南京军区一个，多部门或其他三个。

以上所列担任国务院各部（委）军管机构领导或军事代表的军方派出负责人员共113人，最高职务者为各军兵种或大军区副职，最低为团级。多个部（委）第一把手仅为师级干部。其中取消军衔前中将3人，少将20人，大校28人，占113人中的45%。即军方派出负责人员中大校以上高级干部比例不到50%。与派驻省级军管负责人级别不可同日而言。

### 三、对国务院直属机构及秘书厅的军事管制

1967—68年，国务院直属机构名义上共为22个。其中中国农业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实为21个。除中国民用航空总局1967年1月已由空军接管，国家海洋局由海军代管列入军队序列，国家档案局、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情况未详外，其余17个单位及国务院秘书厅先后实行军事管制。

【989】 石煌，时任高等军事学院战役教研室副主任。崔星，时任高等军事学院战役教研室教员，1965年大校军衔。

### 1. 中国人民银行

1967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中国人民银行派出军事代表。人选由空军负责。任命樊九思为中国人民银行军事代表，张桂馥为副军事代表。<sup>【990】</sup>

### 2.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1967年11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任命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军事代表的通知》。人选由总后勤部负责。任命丁江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军事代表，山桥为副军事代表。<sup>【991】</sup>

### 3.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1967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派出军事代表。人选由总后勤部负责。任命柳垣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军事代表。<sup>【992】</sup>

### 4. 中央气象局

1967年11月2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中央气象局派出军事代表。人选由空军负责。任命沈敏为中央气象局军事代表，任涛为副军事代表。<sup>【993】</sup>

### 5. 国家测绘总局

1967年12月，中央决定对国家测绘总局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总参谋部派遣。孟子皿、萧森、杨卓先后任军管会主任。<sup>【994】</sup>

### 6. 广播事业局

1967年12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对中央广播事业局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称，“中央决定派以刘路明同志为首的军管小组，对广播事业局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多个部门派遣。1968年8月张午接替刘路明、1969年11月刘建功接替张午，先后任军管小组组长。<sup>【995】</sup>

【990】 樊九思，时任空军后勤部财务部部长。张桂馥，时任空军后勤部修建部处长。

【991】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大事记编撰委员会：《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大事记1950-1995》，1995年，页362-363。丁江，时任总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1965年大校军衔。山桥，时任总后勤部出版社社长。

【992】 柳垣，时任后勤学院政治部副主任。

【993】 沈敏，时任空军司令部军务部部长，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

【994】 萧森，时任总参谋部第三部二局局长，1961年晋升少将。杨卓，时任技术工程学院第一政委，1961年晋升少将。

【995】 刘路明，时任陆军第六十四军副政委。张午，时任陆军第二十三军政委，1964年晋升少将。刘建功，时任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路明、刘建功，1965年大校军衔。

#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7〕372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对中央广播事业局  
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

一、广播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必须坚决掌握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手里。鉴于目前的领导状况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中央决定派以刘路明同志为首的军管小组，对广播事业局实行军事管制。

军管小组的主要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陆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和反革命的宣传路

— 1 —

中央关于对中央广播事业局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1967年12月7日。

## 7. 新华通讯社

1967年12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称，“中央决定派以张纪之同志为首的十三位同志组成军管小组，对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多个部门派遣。军管小组副组长为甄文君、张政德。<sup>[996]</sup>

【996】张纪之，时任陆军第四十军副政委，1965年大校军衔。甄文君，时任政治学院二大队三队队长。张政德，时任高等军事学院教员。



## 8. 国务院直属口（包括国务院秘书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房产管理局、国家编制委员会、国务院参事室等）

1967年12月2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对国务院直属口派出军代表的通知》，决定派出军事代表对国务院直属口（包括秘书厅、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局、编委、计划生育办公室、参事室、文史馆、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进行领导。人选由总后勤部负责。任命丁江为国务院直属口军事代表，山桥、刘笃庆为副军事代表。1968年夏，“清队”工作开始后，又将国务院财办、文办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划为直属口军代表领导。<sup>〔997〕</sup>

## 9. 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1968年6月13日，中央决定对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防化学兵部派遣。任命施诚为军管小组组长，王洁清为副组长。1970年5月，以施诚为组长的第一批军管小组由于犯了“方向性错误”撤离，以杜万荣为组长的第二批军管小组进驻外文局。<sup>〔998〕</sup>

## 10. 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

1968年6月1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派出军事代表。人选由政治学院负责。任命狄文蔚为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军事代表。<sup>〔999〕</sup>

## 11. 国务院外国专家局

1968年6月13日，中央决定对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由装甲兵派遣。任命李伯时为军管小组组长<sup>〔1000〕</sup>。

## 12. 全国物价委员会、国家统计局

1968年8月10日，中央决定向国家计划委员会、全国物价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派驻军事代表。人选由总参谋部负责。详见本节上文。

## 13.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1968年9月，中央统战部军代表派军代表赵旭东主持宗教事务局工作。

以上直属机构及秘书厅共18个单位，其中组成军管会的一个，组成军管小组的四个，派出军事代表的13个。18个单位中，由总参机关负责派遣人员两个，

〔997〕《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大事记1950—1996》，页362—363。刘笃庆，时任后勤学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998〕《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北京：新星出版社，1995年，页243、256。施诚，时任防化学兵部科学技术研究院院务部政委。杜万荣，时任防化学兵部科学技术研究院副政委。

〔999〕狄文蔚，时任政治学院训练部政治部主任。

〔1000〕李伯时，时任第五坦克学校副政委。

总后八个，空军两个，装甲兵、防化学兵部及政治学院各一个，多部门或其他三个。以上所列军方派出负责人员共23人，最高职务者为大军区政治部主任或军政委，最低为团级干部。其中取消军衔前少将3人，大校5人，大校以上高级干部占23人中35%，明显比向各部（委）派出人员职级还要低。

#### 四、对其他部门的军事管制

##### 1.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为国家最高学术机关，非国务院组成部门，但其工作受国务院指导。

1967年1月被夺权，成立“中国科学院革命造反派（京区）联合夺权委员会”，领导科学院工作的是总理联络员和军代表。首席军代表为粟裕<sup>[1001]</sup>。7月23日，成立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郭沫若。1968年9月20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国科学院，工人和解放军开始参与科学院的领导。

##### 2.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主管主要农副产品，非国务院组成部门。

文革初期，其机关陷于瘫痪。1967年8月，中央派军事代表郭世荣进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1968年12月，成立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军事代表业务组，大批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机关人员由原来的400余人精简为45人。<sup>[1002]</sup>

### 第四十八节 国防工业各部、院的军事管制

#### 一、决策过程

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对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该决定共八条，其中第一条称，“为了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根据毛主席关于‘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以及‘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等重要指示，特决定对各国防工业部<sup>[1003]</sup>、国防科学

【1001】 粟裕同时担任国防工办军事代表组组长、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

【1002】 郭世荣，时任空军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

【1003】 指国务院第二至第七机械工业部。二机部主管核工业，三机部主管航空工业，四机部主管电子工业，五机部主管常规兵器工业，六机部主管舰船工业，七机部主管导弹工业。

技术研究院<sup>【1004】</sup>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第四至第六条称：

四、军管会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对部（院）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部（院）属单位无论是否实行军管的，均受部（院）军管会的领导，分散在各地的单位，同时受所在地革命委员会或军区的领导，但有关生产运输调度业务，必须服从部（院）军管会的集中指挥。

五、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革命放在首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革命统帅生产，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掀起生产的新高潮，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六、实行军事管制后，对外活动如需要以行政首长名义签署或接洽的，仍按过去的规定办理。行政首长已经撤职或停职的，应由上级指定适当人选以代理人名义出面。<sup>【1005】</sup>

上述决策，中央有关负责人其实早于1967年3月间已在构思并付诸实施。在上述决定公布前，国防工业各部、院实际上已经实行了军事管制。

3月11日，聂荣臻签发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分别上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常委、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报告提出：现在各国防工业部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各研究所，大多瘫痪，研究工作停顿，三线建设问题也很多。这种状况十分不利，必须迅速改变。建议将二机部九院、三机部六院、五机部机械研究院、四机部十院、六机部七院、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sup>【1006】</sup>所属各单位，由国防科委军事接管，以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的精神迅速恢复科研和生产工作。<sup>【1007】</sup>

3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所属各部党组成员和群众组织头头时宣布：国防工业口，“主席指示要实行军事管制”。

周恩来称，“军管派军管小组三人组成。造反派搞文化大革命不变，业务由军管小组负责。要开大会，揪人要请示军管小组，军管小组报中央。造反派对业

【1004】指二机部九院、三机部六院、四机部十院、五机部机械研究院、六机部七院及七机部一至四院等。

【1005】佚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9年6月，页312-315。

【1006】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于1960年成立，负责管理全院有关国防尖端科研任务。1966年底归口独立研究机构41个、工厂6个。1967年4月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主任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王建中（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1968年1月，根据聂荣臻提出方案，新技术局及其归口单位共三万人纳入国防科委领导下的各有关研究院。

【1007】《聂荣臻年谱》下，页1056-1057。

务可以批评，但不能监督。最近失密很严重。你们那么大的组织千万分之一的不纯，总是会有的。像二机部提出一些要害部门就不能让你们管，你们要进行整风，……各部门在军管小组和上级党委领导下搞，不能将业务分开。”“国防科委各院、各部、各所及科学院新技术局，局属各单位中，国防科委军事接管，如果接，要搞一计划，正在研究。”“现在中央决定，把和国防有关的任务集中到国防科委，当然要为公，不能为私，如果为私，就会像罗那样搞到自己手上去了。”<sup>【1008】</sup>

3月18日，周恩来就国防工业各部、院军管一事，致函毛泽东、林彪等称：主席、林彪、伯达、康生、向前、萧华、成武各同志：

遵照主席指示精神，经与富春、荣臻、剑英三同志商量（萧华在作报告，未参加），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二机、三机、四机、五机、六机、七机）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每一部门只派出三人的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分别处理，以便最后实现各部门的革命三结合。

对国防工业各部研究院、所和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拟同意聂荣臻同志意见（见附件），交国防科委实行军事接管，并基本同意他所提出的调整改组原则。待方案商定后再报批。

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国防工业各部。定后将分别报批。

这些需要派出的军管代表，拟经由军委、总政从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德才兼备的老干部中选派。

以上各项妥否，请主席批示。<sup>【1009】</sup>

3月2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道：“退总理照办。”<sup>【1010】</sup>

3月25日，聂荣臻、叶剑英在京西宾馆礼堂召集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和群众组织代表会议。叶剑英在讲话中称：“同志们，请你们来，传达一下林副主席的指示，是主席同意的了。就是关于国防科学研究

【1008】《中央首长讲话（3）》，页115-116。罗指罗瑞卿。

【1009】《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页24-25。

【10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70。

单位军管和调整改组的问题，六个部的好几个院和科学院部分单位实行接管，先进军队进行管制，对调整改组要充分发动群众讨论如何把各院系统搞合理，促进国防科研生产的发展，尖端常规都要大力发展，生产使用，人员都要合理的安排。国防科研解放以来是有很大成绩的。但中间有波折，主要是贺、罗他们这些人把我国这个部门搞得有点混乱，否则我们会进展更快，今天聂荣臻同志谈些意见，供大家讨论，经过军管，体制改革以后，更加大力加强我国国防科研工作，聂副主席提出这个意见，林副主席说再不能拖延了，要逐步落实。大家明了，可充分讨论，意见可向军委、科委反映。”

聂荣臻在讲话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第二是关于调整改组问题，第三是军管和改组中的几个问题。”在谈到关于调整改组问题时，聂不忘将罗瑞卿、贺龙狠批了一番，以报文革前“部院合并、厂所合并”的一箭之仇：“65年8月，罗、贺进一步搞厂所合并，不报告中央，在底下大力推行，千方百计想搞国防科研部门，有的研究院、所已不像个研究部门，有的被拆得七零八落，厂所合并把已经形成的科研拳头瓦解了。我写信给总理，总理勒令厂所不要合并，有的人不听，还在底下搞，我也没有办法，只有让他们搞。这次文化大革命，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造反了，揭露了大量事实。不少同志写信给我，找我谈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大家去分析，去认识，去作结论。我也不划框框，现在和大家谈清楚，大家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可以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根据中央批示，将几个院、科学院部分单位，由科委接管，结合斗批改，进行调整改组。1. 把国防科研单位进行调整改组，填补空白，加强薄弱环节，建立各新的研究院。2. 保证各院研制器材、生产的需要，建立一批工厂、车间，必要时也可以抽调部分工厂、车间划归各研究院、所。经过文化大革命，破私立公，我相信，这个问题很好解决。3. 加强充实国防工业部门的研制力量。4. 有的接管单位，如三线建设，涉及面很广，要与工办研究解决。5. 健全各兵种、军种的科研机构，长期以来，技术论证是薄弱环节，今后要大力加强。”<sup>【1011】</sup>

3月27日下午，周恩来召集粟裕、王树声去他那里开会，交代了要军科院负责国防工业口子，对国防工办和第二至第七机械工业部（包含这六个机械工业部在京所属工厂和院所）实行军管。指定粟裕到国防工办军事代表组挂帅，并参加

【1011】《中央首长讲话（3）》，页226-233。

国务院业务组工作。随即粟裕担任了国防工办军事代表组组长、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并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为成员。<sup>【1012】</sup>

实际上，3月中旬一过，国防工业口军管人员已经开始调集。据后来相继担任七机部三院军管会主任、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的国防科委第二十三基地副司令员杨国宇日记，3月22日，“国防科委通知：根据中央关于对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研究院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由你们二十三基地派出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到七机部第三研究院及所属研究所、工厂实施军管。”经过一个多月的集训学习，5月17日，军管人员方正式进驻三院。<sup>【1013】</sup>

4月26日，周恩来与聂荣臻、叶剑英接见国防工业及科研部门军管人员。5月8日，周恩来对军事科学院干部讲话，动员参加国防工业军管。在周恩来动员后，粟裕即率军事科学院干部五百余人，进入国防工业口开始军管。在宣布国防工业军管小组正式开始工作的大会上，粟裕在讲话中指出军管小组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一个管文革，一个管生产任务。<sup>【1014】</sup>

## 二、各部、院军管的实施

国防工业各部、院的军事管制，在1967年至1968年间可分为两个阶段。

### （一）1967年5月至1968年3月

#### 1. 第二机械工业部

此阶段二机部的军管，由军事科学院负责。

5月15日，二机部军管会成立。吕世英任军管会主任，郑需凡、李硕之任副主任。<sup>【1015】</sup>

早在3月4日，聂荣臻即宣布：经周恩来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二机部221厂实行军事管制。军管小组组长为国防科委第二十二器材基地司令员贾乾瑞。<sup>【1016】</sup>

【1012】国防工业军管小组成立时，副组长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王树声、副政委向仲华。1967年10月后增加陈华堂（三机部军管会原主任）、张元培（六机部军管会原主任）、王展（国防工业政治部副主任）、高锐（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部长）为副组长。参见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页659。

【1013】杨国宇：《七机部文革八年》，自印本，2001年，页1-5。杨国宇，1961年晋升海军少将。

【1014】参见《粟裕年谱》，页659。

【1015】吕世英，时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副部长，1964年晋升少将。郑需凡，时任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研究员。李硕之，时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研究员。

【1016】参见《聂荣臻年谱》下，页1055-1056。221厂为位于青海省海晏县的核武器研究基地的代号。贾乾瑞，1964年晋升少将。

## 2. 第三机械工业部

三机部的军管，自始至终由空军负责。

5月25日，三机部军管会成立。陈华堂任军管会主任，周洪波、朱群任副主任。同年10月，陈华堂调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副组长，周洪波接任三机部军管会主任。7月6日，对三机部第六研究院（航空研究院）实行军事管制。罗野岗任军管会主任。<sup>【1017】</sup>

## 3. 第四机械工业部

此阶段四机部的军管，由军事科学院负责。

5月12日，军管会进驻四机部。军管会主任贺光华，副主任张星垣。副部长齐一丁、高峻经国务院业务组批准，协助军管会抓生产、建设工作。同时，四机部第十研究院（军事无线电电子科学研究所）由国防科委接管。<sup>【1018】</sup>

## 4. 第五机械工业部

此阶段五机部的军管，由军事科学院负责。

5月13日，五机部军管会成立。胡兰芝任军管会主任，高兴、梅琪任副主任。<sup>【1019】</sup>

## 5. 第六机械工业部

六机部的军管，自始至终由海军负责。

5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任命张元培为六机部军管会主任，刘世雄、任志习为副主任。同年12月，张元培调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副组长，刘世雄接任六机部军管会主任，又增加赵森、吴绍亮为副主任。<sup>【1020】</sup>

## 6. 第七机械工业部

此阶段七机部的军管，由军事科学院负责。

---

【1017】 陈华堂，福州军区空军原司令员（1966年3月免职），1955年授衔防空军少将。周洪波，时任空军雷达兵部副主任。朱群，时任空军军校部副部长。罗野岗，时任空军工程部副部长，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

【1018】 贺光华，时任军事科学院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政委，1955年授衔少将。张星垣，时任军事科学院研究室主任，1965年大校军衔。

【1019】 胡兰芝，时任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党委副书记，1965年大校军衔。高兴、梅琪，时均为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研究员。

【1020】 张元培，时任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海军少将。刘世雄，时任海军航空兵部司令部副参谋长，1965年海军大校军衔。任志习，时任海军学院教研室主任。赵森，时任海军装备部订货部副部长。吴绍亮，时任海军学院教研室政治教员。

据杨国宇称，4月30日，已内定阎揆要为七机部军管会主任，田地、王紫剑为副主任。5月，军管会进驻七机部。10月27日，七机部三院军管会主任杨国宇调任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sup>【1021】</sup>

七机部下属四个研究院，即：第一研究院（地地和潜地弹道式导弹研究院）、第二研究院（地空导弹研究院）、第三研究院（飞航式导弹研究院）和第四研究院（固体火箭发动机研究院）。四个研究院均实施了军事管制。一院首任军管会主任为黄登保，8月，贺任继任。二院首任军管会主任为王文治。三院首任军管会主任杨国宇。10月，杨调任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后，由陶绍侃接任。地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的四院，3月由内蒙古军区实施军管，军管会主任为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樊尚科。<sup>【1022】</sup>

综上所述，在此阶段，军事科学院负责第二、第四、第五、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军管。空军、海军各负责第三、第六机械工业部的军管。各部属研究院的军管派出单位，大多不同于各部军管主管单位。派出的六个部军管第一把手，取消军衔前中将一人，少将四人，大校一人，军内职级普遍比派驻国务院其他部（委）第一把手高。

## （二）1968年3月的调整

1968年1月，粟裕报告军委办事组并报林彪、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建议将军事科学院军管人员大部撤回院，由驻京三军接替国防工业及一机部的军管任务。3月4日，军委办事组根据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对粟裕建议的批示，拟出了接替军科干部军管的方案。中共中央3月13日通知，同意上述意见。<sup>【1023】</sup>

第二、第四、第五、第七机械工业部军管机构调整情况如下：

### 1. 第二机械工业部

原军事科学院军管人员撤回，由空军承接军管任务。部军管会主任改由袁学凯担任。副主任改由黄炜华、樊洪担任。<sup>【1024】</sup>

【1021】田地、王紫剑，时均为军事科学院干部。

【1022】黄登保，时任炮兵司令部副参谋长，1965年大校军衔。贺任，原任公安部队司令部边防检查部部长。王文治，时任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部编审室主任，1965年大校军衔。陶绍侃，时任国防科委第二十三基地政治部主任，三院军管会副主任，1965年海军大校军衔。

【1023】《粟裕年谱》页663。粟裕建议将军科军管人员撤回的原因，《粟裕年谱》并没有透露。

【1024】袁学凯，时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黄炜华，时任空军科学研究部副部长，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樊洪，时任空军学院领航系主任。



## 2. 第四机械工业部

原军事科学院军管人员撤回，由海军、通信兵派出军管人员。部军管会主任改由彭林担任。副主任改由周涌、赖金华、李夫克担任。<sup>【1025】</sup>

## 3. 第五机械工业部

原军事科学院军管人员撤回，由总后勤部承接军管任务。部军管会主任改由张明远担任。副主任改由杨毓贤、张录增、张文华担任。<sup>【1026】</sup>

1968年10月10日，五机部军管会向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建议调整兵器工业管理体制：将五机部直属的生产厂、基建厂和有关仓库下放给各大军区管理，各大军区成立相应的兵工管理机构。11月1日，五机部军管会决定，调整部机关机构，下设政工、办事、生产、规划建设四个组，原政治部、办公厅及各司局停止办公。同时成立业务领导小组，由原部长邱创成，原副部长张连奎、陈锐霆、王立、李玉堂等组成，在军管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 4. 第七机械工业部

原军事科学院军管人员撤回，由总参军训部承接军管任务。新任军管会主任张翼翔。杨国宇留任第一副主任。副主任先后改由李刚、王镇南、李玉治、王兰麟担任。<sup>【1027】</sup>

调整后的四个部军管第一把手，取消军衔前中将两人，少将两人，规格比调整前高。

### 三、国防科研体制的调整改组

9月20日，聂荣臻将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的方案、报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其核心内容为：

按照毛主席发展国防科学技术的伟大战略思想和指示，充分考虑了当前情况和广大革命群众提出的调整意见，根据集中统一、分工协作、以军为主、军工配合的原则，从我军武器装备发展的需要出发，进行全面规划，统筹安排

【1025】周涌，时任通信兵部副主任，1961年晋升少将。赖金华，时任海军第二航空学校校长，1965年海军大校军衔。李夫克，时任军事科学院副秘书长，1955年授衔少将。

【1026】张明远，时任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1955年授衔少将。杨毓贤，时任后勤技术装备研究院院长。张录增，时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张文华，时任后勤学院院务部政委。杨毓贤、张录增，1965年大校军衔。

【1027】张翼翔，时任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1955年授衔中将。6月，调任铁道兵司令员，仍兼七机部军管会主任。李刚，时任总参军训部合同战术训练处处长。李玉治，时任总参军训部研究室主任。王兰麟，时任总参军训部副部长，1955年授衔少将。

排，拟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编组为 18 个研究院。这些研究院的编组，都经过多次研究讨论，意见已比较一致，基本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研究院是已有或基本上已有的，只是部分地作些调整。或者是原有的研究院承担任务过多，专业庞杂，机构臃肿，许多重大项目挤在一起，得不到发展，为了促进一些重大项目和弥补薄弱环节，将原有研究院一分为二，并从其它方面调入有关力量予以充实加强。这样调整改组的研究院共 12 个：

- 核武器研究院；
- 地地、潜地弹道式导弹研究院；
- 飞航式导弹研究院；
- 固体火箭发动机研究院；
- 航空研究院；
- 舰艇研究院；
- 兵器研究院；
- 坦克、军用车辆研究院；
- 电子工程研究院；
- 特种武器研究院；
- 国防科研工程设计院。

第二种，原来没有研究院，这次调整是将分散在各方面的有关研究所、室，按任务及专业方向集中起来，形成拳头，组成研究院。这些都是目前急需填补和加强的薄弱领域，共 6 个：

- 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研究院；
- 反导弹、反卫星研究院；
- 电子元件器件研究院；
- 国防光学（包括激光）研究院；
- 国防新型材料研究院；
- 空气动力研究院。<sup>【1028】</sup>

10月25日，毛泽东对聂荣臻的报告作出批示：“聂荣臻同志：此件压了很久，很好，照办。”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通知，摘要转发聂荣臻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并要求在关单位遵照执行。聂荣

【1028】聂荣臻：《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聂荣臻科技文选》，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页616-617。

臻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实际上是对1965年开始实行的“部院合并”体制的否定。惟无论聂荣臻此举的初衷如何，在客观上对已备受冲击破坏的国防科研机构人员、设备设施起到了相当的保护作用。

12月2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有关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自1968年1月1日起正式转为军队系统，由国防科委领导。

虽然有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尚方宝剑，聂荣臻方案的执行过程却远非理想。一部分（如七机部的一至四院）并未能移交；费尽心思收编进来的，一年多之后又先后脱离了国防科委的建制领导。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至第四研究院

原拟将七机部第一至第四研究院划归国防科委直接领导，分别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地地、潜地弹道式导弹）、第二（地空导弹）、第三（飞航式导弹）、第四（固体火箭发动机）研究院。惟1967年12月27日国防科委、国防工业军管小组下达《关于各国防工业部所属研究院移交国防科委领导的交接办法》中，明确七机部所属各研究院暂不交接，但从1968年1月1日起，将科研、基建计划转归国防科委管理。

###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

即空间技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研究院。1968年2月组建，代号总字815部队。院长钱学森，政委常勇。1973年7月，划归七机部建制。<sup>【1029】</sup>

###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研究院

即航空研究院。1968年1月，三机部六院转归国防科委建制领导改称，代号总字816部队。1968年4月，院临时领导小组组长曹丹辉。1969年7月，移交空军领导。1973年8月，重归三机部建制。<sup>【1030】</sup>

###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研究院

即舰艇研究院。1968年1月，六机部七院转归国防科委建制领导改称，代号总字817部队。1968年3月，国防科委批准成立临时领导小组，组长为原七院院长于笑虹。1969年7月，移交海军领导。1976年5月，重归六机部建制。<sup>【1031】</sup>

###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研究院

留予反导弹、反卫星研究院的番号，未组建。<sup>【1032】</sup>

【1029】钱学森，时任七机部副部长。常勇，原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副政委，1964年晋升少将。

【1030】曹丹辉，原主持六院常务工作的副院长，1955年授衔少将。

【1031】于笑虹，1961年晋升海军少将。

【1032】直到1970年，七机部二院才一度改为反导弹、反卫星总体研究院。

##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研究院

即核武器研究院。1968年1月，二机部九院由国防科委接管，代号总字819部队。同月九院成立临时领导小组，组长胡若嘏。9月组成新的临时领导小组，组长萧泽泉。1969年开始由青海搬迁至九〇二、九〇三地区（四川绵阳和广元的山区，主体在梓潼县城）。1973年7月，划归二机部。<sup>【1033】</sup>

##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研究院

即电子工程研究院。在聂荣臻的调整改组方案中，建议将原四机部十院分为两个研究院，即第十研究院（主要研制军用电子装备和系统工程）与第十四研究院（主要研制电子元件和红外、激光器件等基础产品）。1968年1月在原四机部十院基础上组建，代号总字820部队。业务领导小组组长张恒。1975年6月，划归四机部。<sup>【1034】</sup>

##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一研究院

即陆军兵器研究院。1968年2月，五机部机械研究院转归国防科委建制领导改称，代号总字821部队。筹建负责人叶超。1969年7月，改归总后勤部建制，与第十二研究院合并组成第二十（常规兵器）研究院。<sup>【1035】</sup>

##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研究院

即坦克装甲车辆研究院。1968年5月，以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为基础组建。归国防科委建制（实际未接管），代号总字822部队。筹建负责人宋昆。1969年7月，改归总后勤部建制，与第十一研究院合并组成第二十（常规兵器）研究院。<sup>【1036】</sup>

##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研究院

即特种武器研究院。根据军委1968年5月27日关于组建第十三研究院的批复，由原五三研究院撤消后划归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部分研究机构，在河南灵宝地区组建，归国防科委建制领导，代号总字823部队。临时党委副书记萧维国、王有政。1979年撤销。<sup>【1037】</sup>

---

【1033】 胡若嘏，时任国防科委二局（核武器局）局长。萧泽泉，时任广州军区炮兵副政委。胡若嘏、萧泽泉，1965年大校军衔。

【1034】 张恒，原四机部十院政治部副主任。

【1035】 叶超，时任沈阳军区炮兵司令员，1961年晋升少将。

【1036】 宋昆，时任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1965年大校军衔。

【1037】 萧维国，时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曾任五三研究院副院长），1965年大校军衔。王有政，时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政委。

###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研究院

即电子元件器件研究院。1968年2月，由四机部、七机部和地质部所属部分厂、所组编而成，归国防科委建制领导，代号总字824部队。业务领导小组组长刘德海，副组长韩钢。1975年6月撤销，所属单位划归四机部、七机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sup>【1038】</sup>

###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研究院

即国防光学研究院。1968年2月，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等单位组编而成，归国防科委建制领导，代号总字825部队。筹备组组长周绍明，副组长王大珩。1970年5月撤销，所属单位分别交常规兵器、电讯、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和中国科学院。<sup>【1039】</sup>

###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研究院

即军用新型材料研究院。1968年2月筹建，归国防科委建制领导，代号总字826部队。筹备组组长邵星北，副组长张大煜、段志超。1972年5月撤销，所属单位分别交常规兵器、电讯、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和中国科学院。<sup>【1040】</sup>

###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七研究院

即空气动力研究院。1968年2月在四川绵阳组建，归国防科委建制领导，代号总字827部队。筹备组组长钱学森，副组长郭永怀、严文祥、刘光奇。1969年划归空军（1970年7月正式接管），改为“导弹、飞机风洞建设指挥部”。1973年8月划归三机部，成为三机部六院风洞建设指挥部。1977年纳入军队编制序列，重归国防科委建制，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试验训练基地”番号。<sup>【1041】</sup>

###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设计院

即国防科研工程设计院。1967年12月，工程兵国防工程设计院院部和特种工程设计所调归国防科委建制，并以此为基础于1968年2月组建，代号总字828部队。第十八设计院行政领导人未任命，1968年7月，将工程兵国防工程设计院

【1038】刘德海，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四机部监察组组长（曾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副院长），1955年授衔少将。韩钢，时任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1965年大校军衔。

【1039】周绍明，时任广西军区副政委，1965年大校军衔。王大珩，原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

【1040】邵星北，时任北京军区工程兵副政委，1965年大校军衔。张大煜，原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

【1041】郭永怀，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1968年12月5日因飞机失事去世。严文祥，时任七机部三院党委副书记，1965年大校军衔。

党委改称第十八设计院党委，原院长高万祥任党委副书记。1969年12月撤销，院机关与第五研究院合并。<sup>【1042】</sup>

上述组建成的十三个研究（设计）院，第一把手取消军衔前为少将的四人，大校六人，无军衔一人（钱学森，任两个研究院的第一把手），规格颇高。

#### 第四十九节 介入铁路系统：从全面军管到国防军护路

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该命令第三条称：“煽动武斗、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秩序和砸毁铁路、交通设施、运输工具的少数坏人以及情节严重的肇事者，必须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各地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和驻铁路、交通部门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军代表、公安值勤人员有权根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公安六条规定负责处理上述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sup>【1043】</sup>

将时间回溯至1967年1月，可以更全面地观察军队介入铁路系统以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过程。

##### 一、混乱的一月

1月13日，铁路系统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铁路系统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周恩来不得不顺应形势，他在大会上称：“在铁路战线上代表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铁道部门的少数领导人。所以在你们的铁道部门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应该集中力量彻底批判吕正操、武竞天这些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的罪行！”不过，周恩来在讲话的下半部分，倒还是对吕、武留有余地。他又称：“现在还剩一个问题，铁道部长怎么办？三天前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我与北京大学造反派也有一部分保守派谈了话，我们宣布了这个事。我们说尽管吕正操、武竞天犯了这些罪行，我们还给他们一个机会，给他们一个最后机会，看他们能否将功赎罪，看他们能不能改。我们向你们呼吁！允许我们国务院给他们十天到一个月的工夫，最后机会，看他们是否能将功赎罪。所以我向你们提议，不要用你揪我抢的办法，这样形式上好像是打击了他，实际上他得到了休息。”“我再向你们提议，住在铁道部的无论如何要让出二层楼办公的地方，让铁

【1042】高万祥，1965年大校军衔。

【1043】福州军区政治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6月，页338-340。

路恢复指挥系统，你们可以派一部分代表，组织一个管理委员会来监督他们的工作好不好？（众：好！鼓掌。）使他们没有任何借口，给他们一个时期，不要东揪西抢，你推我打，让他们做一个月工作，看他们能否将功赎罪。”<sup>【1044】</sup>

1月21日凌晨，周恩来接见铁道部东方红公社等组织。周恩来称：“在这十天当中，抓革命、促生产，先把部内革命造反派组织起来，经过协商，成立领导小组，造成革命气势。”“铁道部本身要把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监督生产筹委会，主要是监督生产。”“第二件事就是要把全国铁路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有路局、工厂、工程局、院校，部机关也要参加进去。”<sup>【1045】</sup>

夺权的迅猛态势，并不是周恩来所能预料。就在他讲话后的第二天，1月22日上午9时，铁道部东方红公社突然宣布全部接管铁道部的一切党政权力。东方红宣称：“立即联合各革命造反派组成铁道部革命委员会”，并要求“机关各局（委、处、室）要相应组成局（委、处、室）革命委员会”。同日，东方红负责人张茂指定由铁道部与外单位共二十三个群众组织，组成铁道部革命委员会筹委会。

然而，东方红的夺权不但没有得到中央的肯定，更遭到部内外其他造反派组织的抵制。1月24日，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贴出大字报，指铁道部东方红公社单方面接管铁道部党、政、财一切大权，是改良主义的假夺权，宣布退出筹委会。首都革命职工造反总部铁路分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铁路联合指挥部等二十四个铁路群众造反组织以及十三所大专院校、中学红卫兵组织发表特急联合声明，强烈抗议东方红公社单方面接管铁道部，宣布东方红公社发出的接管铁道部《公告》无效，倡议铁道部所属各单位造反派另行联合接管铁道部。

1月25日，东方红公社批斗了吕正操、武竞天。又假借铁道部政治部名义，从铁道兵请来了一车全副武装的军人进驻铁道部大楼，以壮声威。

翌日晚，周恩来在国务院接见铁路系统各单位革命造反派代表数十人。周在讲话中指责东方红公社：“请铁道兵是完全错误的。矛盾增加了，使矛盾复杂化了。这件事应该让我知道嘛！……我命令铁道兵马上撤回。东方红公社签发的关于精简下放职工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是错误的，是把矛盾上交，应该取消。”还称：“铁道部与别的企业不同，确实有两重性，不仅铁道部机关，如果不能把基层主要单位联合起来，铁路运输也不能保证。”

【1044】《中央首长讲话（1）》，页111-112。吕正操，时任铁道部部长，兼任军委铁道兵政委、总参军事交通部部长，1955年授衔上将。武竞天，时任铁道部副部长。

【1045】有关铁道部1967年初夺权经过及运动情况，参见铁道部机关革命造反总部：《铁道部机关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油印本，1967年6月。

1月27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再次接见铁路系统各单位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周恩来称：“张茂在夺权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必须认真检查。……你们要成立一个业务小组，要值班，立即就推选，保证业务不中断。……第二件事，就是要筹备全国铁路系统革命造反筹备联络组。”

东方红公社一派单方面请来铁道兵，从常理上说的确可能使矛盾复杂化。惟周恩来对此事的批评，却似乎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有别。毛泽东1月21日即对南京军区党委就造反派要求安徽省军区派出部队警卫会场的请示报告批道：“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sup>[1046]</sup>为什么毛泽东可以令安徽派出军队支持“真正革命派”，铁道兵就不能派出部队支持东方红公社？难道周恩来能断定东方红公社就不算“真正革命派”？

此外，周恩来说要筹备“全国铁路系统革命造反筹备联络组”，既不现实，亦与半个月后中央的政策相抵触。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宣布“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全国铁路系统革命造反筹备联络组”当然属于“全国性组织”之列。可见，在一月夺权的急风暴雨中，即便作为中共第三号人物的周恩来，也难以有效约束国务院系统内造反派的所为，难以跟得上毛泽东瞬息万变的“战略部署”。故而，难免就有些顾此失彼，进退失据。

## 二、铁路系统军管的实施

铁路系统本为一准军事化的组织系统，又是全国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失控，影响非同小可。实际上在1月下旬，铁路系统已发生过重大事故。1月23日，308次旅客列车在沈阳站冒进信号，与正在通过的54次旅客列车侧面冲突，死29人，重伤17人，轻伤81人。铁路上行线中断行车11小时22分，下行线中断行车9小时15分。<sup>[1047]</sup>

2月1日凌晨4时，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部分群众组织代表时声称：“我不愿意军事管理”，“从今年2月1日起，以往的事再不要提了，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希望‘二七’那天能见到你们的大团结。”要求派系林立的铁路系统群众组织“二七”即六天之后就实现“大团结”，显然是天方夜谭。周口头上

【104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197。

【1047】中国铁路史编辑研究中心：《中国铁路大事记（1876-1995）》，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96年，页298-299。



说是不愿意军管，却正表明军管的手段已在周的考虑之中，惟可能因为未得到毛泽东的最终认可，故而，周才将其说得有点模棱两可。

3月5日，齐齐哈尔铁路局所属昂昂溪车站，因引导员、扳道员在工作时间辩论争执，忘扳道岔，盲目接车，造成383次旅客列车与020次货物列车侧面冲突的重大事故。机车大破一台，货车损坏八辆，正线中断行车6小时10分。<sup>【1048】</sup>

3月19日，毛泽东对《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作出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请阅。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此事请研究酌处为盼！”<sup>【1049】</sup>

毛的批示，明确了铁路军管问题。批示是给林、周两人的，惟具体措施，是周恩来落实的，目前尚未见有林彪参与的材料。

3月22日，周恩来与李富春、李先念等在中南海会议室接见交通、铁道、邮电三部群众组织代表共六十多人。周恩来在接见时称：“机关大联合都没有搞好，三结合还没有条件，三个部都不成熟，铁、交、邮刚由部外转入部内，铁道部三十三个组织观点不一致，两大派还要谈判协商。……”“经我们研究，铁路、交通、邮电要实行全面军管。主要物资设备、援外、国防、航空先军管。一月底，我的意见民航局归军队管。那样集中，但到真正实行军管时，有部分人拒绝不干，闹了几天，军事院校和工厂还是说服了，最初闹的人多，一天天闹的人就少了，闹了四五天没闹头了，最后不闹了。现在是三月份，不能再耽搁了。原来二月份又等了一个月，刚才大家鼓掌，可能是不会有意见。总之不能再推迟，无论如何二季度的生产要搞好。铁路、轮船、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先搞大的，邮政先搞省会、直辖市，大的港口，至于地方还可根据需要，实行军事管制。派军管小组或委员会，由谷牧同志负责。军管的目的是过渡的办法，还是要实现大联合，三结合。”<sup>【1050】</sup>

3月2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碰头会，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关于铁道、交通、邮电部门实行军管的决定。<sup>【1051】</sup>

【1048】《中国铁路大事记（1876-1995）》，页298-299。

【104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67。

【1050】《中央首长讲话（3）》，页158-165。

【105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41。

至1967年5月，铁路系统一半以上实行了军管。全国18个铁路局，军管了十个，即齐齐哈尔、吉林、锦州、北京、呼和浩特、柳州、成都、西安、乌鲁木齐、昆明铁路局。51个铁路分局，军管了27个。<sup>【1052】</sup>

惟对铁道部机关军管的实施，延至5月中旬方得以落实。5月19日晚，周恩来接见铁道部临时业务监督小组（1月29日成立）全体成员和部机关两派群众组织一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和联络总站的代表。周指出，联络总站造业务监督小组的反是错误的，并宣布，将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陪同周恩来接见的，有总参军事部部长苏静（拟任铁道部军管会主任），总参军事交通部副部长杨杰（拟任部军管会副主任），这是苏、杨在铁道部的首次亮相。<sup>【1053】</sup>

5月20日，杨杰在铁道部主持会议，传达将铁道部西南工程指挥部移交铁道兵问题。此后数日，拟派驻部军管会的多名军队干部，听取了各群众组织关于部内文革情况的汇报。

然而，铁道部军管事关重大，必须得到毛泽东的最终点头同意，至5月31日，周恩来再接到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报告：郑州、徐州、蚌埠、金华、宣化等铁路枢纽站段因两派武斗，炸毁机车，停止作业，致使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四条主要铁路干线均处于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六十九列。周恩来当即批示同意军领导机关驻徐州市、负责徐州地区三支两军的陆军第六十八军党委常委关于要求对徐州铁路分局和火车站实行军管的急电。中午，周到毛泽东处，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局势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问题不可再拖。毛泽东表示同意。<sup>【1054】</sup>

综合以上材料分析，关于对铁道、交通两部军管问题的文件，应在毛泽东处压了相当一段时间。

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于5月31日正式发布。《决定》共八条，其中第一、四条称：“一、为了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根据毛主席关于‘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以及‘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等重要指示，特决定自即日起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任命苏静为军

【105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页609。

【1053】《铁道部机关文化大革命大事记》，页21。

【105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58。

管会主任，杨杰、朱互宁为副主任。”“四、军管会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对部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部属单位无论是否实行军管的，均受部军管会的领导；分散在各地的单位，同时受所在地革命委员会或军区的领导，但有关生产运输调度业务，必须服从部军管会的集中指挥。”<sup>【1055】</sup>

与对铁道部军管决定同日发布的，还有同样是毛批示“照办”的对交通部军管的决定。该两部是国务院系统最早实施军管的正部级单位，其军管经验对随后国务院各部相继军管起到了启迪、示范作用。担任铁道部军管会正、副主任的总参系统军队干部苏静、杨杰、朱互宁，日后亦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和倚重。

### 三、从军管到国防军护路

5月31日下午，在毛泽东最终同意对铁道、交通两部实行军管后，周恩来召集李富春等开会，商定对策。会后，周恩来去函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送上铁路中断情况电讯八份，请阅。今午在主席处，已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绝不能中断。下午曾约集富春、先念、剑英、萧华、成武、谷牧、秋里各同志会商此事。除已报请批发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命令外，并拟将全国18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运交海军包干，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统一全国铁路轮船运输，免受干扰。这一计划正由总参草拟，明日当可订出送审。此外，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sup>【1056】</sup>

6月1日，军管会正式进驻铁道部。原部临时业务监督小组改为军管会业务协助小组。

6月5日，周恩来召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文件之一，为《对铁道部实行全面军事管制的部署（草稿）》。<sup>【1057】</sup>

6月1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国铁路实行全面军管。<sup>【1058】</sup>

铁路系统由站点及线路构成。所谓“全面军管”，由于派出军管人员数量所限，亦只能管到“点”（包括铁道部机关、铁路局、分局机关、主要枢纽、车站）上，却未能全面铺开解决“线”（至少是主要铁路干线沿线）上的问题。而即便在“点”上实施了“全面军管”，7月，京广、宝成、浙赣、湘桂、沪宁、长大等铁路干线，仍由于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冲突而一度中断运输。在此严重情势下，7月下

【1055】福州军区政治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6月，页333-337。

【1056】《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页119-120。

【105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60。

【1058】《中国铁路大事记（1876-1995）》，页298-299。

旬，周恩来不得不使出了最后一招——派出国防军（主要为陆军野战部队）护路！周亲自拟定详细的国防军部队护路部署，送交仍在南巡途中的毛泽东，经毛批准，8月10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联合发布了《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用明码电报方式向各大单位传达。命令全文如下：

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事管制委员会，并8172部队、7250部队：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切实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现决定派出部分国防军部队担负护路任务。部署如下：

#### 一、任务区分

##### (1) 沈阳军区：

3135部队，负责沈阳（不含）至山海关，叶柏寿至赤峰，高台山至平泉（不含），和大虎山至通辽各段。

3096部队，负责沈阳至旅大段。

3225部队，负责苏家屯（不含）至丹东和沈阳（不含）至清原各段。

3167部队，负责长春（不含）至图们，哈尔滨（不含）至拉法，图们至牡丹江（不含），吉林至莲河（不含）各段。

3009部队，负责沈阳（不含）至陶赖昭（不含），四平至通辽（不含），郑家屯至丰库，四平至辑安，梅河口至清原（不含），让湖路至通辽（不含），哈尔滨（不含）至昂昂溪（不含）各段。

3026部队，负责哈尔滨至陶赖昭、至绥芬河、至泰东，牡丹江至鹤岗，绥化至莲江口各段。

后字201部队，负责白城子至昂昂溪（不含）、至伊尔施、至郭前旗、至太平川各段。

总字505部队，负责昂昂溪至满洲里、至嫩江各段和大兴安岭林区各支线。

##### (2) 北京军区：

4555部队，负责北塘至山海关（不含）段。

4688部队，负责丰台（不含）至塘沽，天津至德州各段。

4800部队，负责石家庄（不含）至琉璃河和密云（不含）至平泉段。

4587 部队，负责石家庄至德州（不含）、至榆次（不含）、至安阳（不含）各段。

4618 部队，负责青龙桥——大同（不含）段和丰沙线。

4642 部队，负责同蒲线、集二线和大同——乌达段。

北京卫戍区，负责北京市近郊区各段。

(3) 济南军区：

6063 部队，负责德州（不含）至蚌埠（不含）和连云港、郑州（不含）——潼关。

6037 部队，负责济南（不含）至青岛段。

6003 部队，负责蓝村（不含）至烟台段。

(4) 南京军区：

6453 部队，负责南京至蚌埠、至马鞍山（不含）各段。

6408 部队，负责淮南线和芜湖至马鞍山各段。

6410 部队，负责南京（不含）至上海段。

6409 部队，负责上海（不含）至杭州、至鹰潭（不含）段。

(5) 福州军区：

6645 部队，负责南平（不含）至厦门段。

6616 部队，负责南平至福州段。

6703 部队，负责鹰潭至南平（不含）段。

6011 部队，负责鹰潭（不含）至株州（不含）和向塘至九江段。

(6) 广州军区：

6900 部队，负责广州至深圳、至蒲圻（不含），和衡阳至冷水滩段。

6975 部队，负责柳州至凭祥、至冷水滩（不含）、至都匀，和黎塘至湛江各段。

(7) 武汉军区：

8172 部队，负责郑州至安阳、至武胜关段。

7250 部队，负责武胜关（不含）至蒲圻，汉阳至丹江各段。

(8) 兰州军区：

8133 部队，负责兰州（不含）至潼关（不含）、至乌达（不含）、宝鸡至广元（不含）各段。

8061 部队，负责兰州至西宁、至玉门镇、武威至干塘（不含）各段。

(9) 成都军区：

7848 部队，负责成都至广元、至资阳段。

7788 部队，负责重庆至资阳（不含）、至石门坎和内江至安边各段。

8815 部队，负责成都（不含）至甘洛段。

(10) 昆明军区：

7557 部队，负责昆明至河口、至凤凰山（不含）段。

7611 部队，负责贵阳至石门坎（不含）、至都匀（不含）、至凤凰山段。

7591 部队，负责昆明（不含）至广通段。

(11) 新疆军区：

负责玉门镇（不含）至乌鲁木齐段。

各部队应在八月十五日以前进至所担负的任务地区。现在担负列车值勤的部队，除国际列车仍按原规定执行外，其它列车，按上述部署进行相应的调整。

二、铁路系统已实行全面军事管制，国防军担负护路任务后，对原铁路局、分局的军管会和站段的军管小组，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或改组，以便更好地实施统一指挥和领导。

为了密切配合，共同完成维护铁路交通秩序的任务，各站段的铁路公安人员，统归所在站段护路部队指挥。

三、担任护路任务的部队，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决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广泛深入的宣传和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和有关方针政策、命令、指示和规定，保证革命和生产双胜利。

四、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群众组织和革命职工，与铁路、交通运输系统以外的群众组织之间一律不许互相冲击。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群众组织，除中央特许者外，暂不参加本单位以外的群众联合组织，但可参加本地区的联合的政治活动，如革命的大批判。

外地、外单位的群众组织在铁路、交通运输部门设置的联络机构，必须撤出。铁路、交通运输部门各单位的群众组织之间，也不要互相设置联络机构。

命令的第四条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单独公布、张贴。<sup>【1059】</sup>

命令第一部分“任务区分”，涉及陆军 27 个野战军，占当时 31 个野战军的 87%。另四个陆军师，空军一个空降兵军，总后一个军级办事处，铁道兵一个军级指挥所，三个铁道兵师。命令虽涉及 30 个军级单位，七个师级单位，惟这些单位的实际派出兵力，据后来军方的统计，则为“至 9 月中旬，全军共派出了 2 个师部、6 个团、28 个营、190 个连、43 个排、33 个班，分别配置在 191 个主要车站和 110 对旅客列车上，执行维护铁路交通秩序的任务”。<sup>【1060】</sup>

对铁路系统的军管至为艰巨，难以奏效。以至毛、周最后不得不动用最后一道杀手锏——国防军。但即便如此，武斗和混乱也仅限于收敛一时，未得根除。从 1968 年初至 1969 年中，徐州、衡阳、柳州、南宁、桂林、昆明、成都、西安、太原、晋中、晋南等地的铁路交通形势再度恶化，以至中央在 1967 年底至 1969 年中针对铁路运输相关问题发出一系列“通令”、“命令”、“布告”，如：1967 年 12 月 2 日《关于确保铁路运输物资安全的通令》、1968 年 2 月 6 日《坚决打击破坏铁路运输的反革命分子的命令》、1968 年 7 月 3 日“七三布告”、1968 年 7 月 24 日“七二四布告”、1969 年 7 月 23 日“七二三布告”。直至“七二三布告”宣布对“负隅顽抗者”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追捕法办等严厉措施，至 1969 年下半年，全国铁路运输方可称之正常。

【1059】《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文件》，南昌：江西师范学院井冈山兵团铁军战斗队，1967 年 9 月，页 192-196。已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校正个别错字。

部队代号与番号对照表：

3135 部队，陆军第四十军；3096 部队，陆军第三十九军；3225 部队，陆军第六十四军；3167 部队，陆军第四十六军；3009 部队，陆军第十六军；3026 部队，陆军第二十三军；后字 201 部队，总后白城办事处；总字 505 部队，铁道兵大兴安岭林区指挥所；4555 部队，陆军第二十四军；4688 部队，陆军第六十六军；4800 部队，陆军第三十八军；4587 部队，陆军第六十三军；4618 部队，陆军第六十五军；4642 部队，陆军第六十九军；6063 部队，陆军第六十八军；6037 部队，陆军第六十七军；6003 部队，陆军第二十六军；6453 部队，陆军第六十军；6408 部队，陆军第十二军；6410 部队，陆军第二十七军；6409 部队，陆军第二十军；6645 部队，陆军第三十一军；6616 部队，陆军第八十四师；6703 部队，铁道兵第十一师；6011 部队，陆军第七十六师；6900 部队，陆军第四十七军；6975 部队，陆军第五十五军；8172 部队，陆军第一军；7250 部队，空降兵第十五军；8133 部队，陆军第二十一军；8061 部队，陆军第五十五师；7848 部队，陆军第五十军；7788 部队，陆军第五十四军；8815 部队，铁道兵第十师；7557 部队，陆军第十三军；7611 部队，陆军第四十九师；7591 部队，铁道兵第一师。

【1060】《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页 611。

## 第五十节 “七二〇事件”

7月20日，在地处中国腹地中心、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省会——武汉市，爆发了保守派群众组织与部分军人合流，顽固抵制中央有关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冲击毛泽东及其他中央要人下榻的东湖客舍<sup>【1061】</sup>和武汉军区营区，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致使毛泽东仓皇离汉的恶性政治事件，史称“七二〇事件”。

### 一、“七二〇”之前的武汉

武汉地区1967年3月底前局势，见本书第四章第三十四节“湖北：‘二八声明’与‘二一八声明’”。

“七二〇事件”前夕，武汉军区在武汉地区驻有两个师级部队。其一为1966年9月由湖北省公安总队整编而成的湖北省军区独立师（8201部队）。该师师部驻武昌傅家坡，原辖四个步兵团，分驻汉口、武昌、襄阳、沙洋。1967年1月，湖北省军区步兵第五、第六团亦划归独立师建制领导，使该师达致六个团的兵力，其中四个团驻于武汉地区。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副师长陈福明，副政委武方侗、冯雨泉，参谋长郝文德，政治部主任梁明。<sup>【1062】</sup>其二为武汉军区直辖的陆军第二十九师（8199部队）。该师辖步兵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团，炮兵第三二三团和坦克第四十五团共五个团，代号依次为8205、8206、8207、8203、8204部队。该师原驻湖北孝感县，1967年2月28日，师部率四千余官兵奉命进驻武汉地区，指挥中枢由孝感花园镇移驻武昌军区大院东侧。师长张绪，政委张昭剑。<sup>【1063】</sup>

脱胎于公安部队的独立师，属地方部队系列，与地方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整体倾向极之保守，与文革激进路线格格不入也就不足为奇。第二十九师属野战部队系列，与地方旧势力关系不深，思想倾向较为中性，在“七二〇事件”中很快就转变了立场。

“七二〇事件”之前，独立师控制了武汉地区的要害部门。据该师有关材料称，“从三月一日开始，我师就接受了军管任务，先后派出大量干部战士参加‘三

【1061】东湖客舍，后称东湖宾馆，文革前为中共湖北省委接待处管辖的政要接待场所。位武汉东湖之滨，占地面积0.83平方公里，由梅岭、南山甲所、乙所、百花等多个区域组成。毛泽东生前曾44次下榻于此。

【1062】参见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军区组织史资料》，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666。蔡炳臣，1955年授衔少将。

【1063】参见陆军第五十六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十六师军史》，1985年10月。张昭剑，1965年大校军衔。



支两军’工作，全师抽调支左人员达一千五百五十五人。”“（一）我师奉命，对武汉市政法系统、电信系统、粮食系统、机电局和省劳改系统等四十七个单位实行了军事管制。对粮、油、金库等处实行了军事看管。”“（二）对省公、检、法、民政厅，武汉主要水运港口、车站、铁路、银行、邮局、工厂、饭店等二十七各单位派出了军事代表。”<sup>【1064】</sup>

该材料对武汉造反派群众组织看法极为负面。如关于二司，称“这个组织犯错误比‘三新’更严重，时间更长。在群众中有个说法，‘工人总部’干过的事他们干了，‘工人总部’没有干过的事他们也干了。”“（1）组织不纯，流氓多，特别是中学和红教工不纯的成员更严重。”“（2）保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积极，不仅保，而且为老右派和报上点过名的三反分子翻案。武汉地区翻案风就是他们刮起来的。”“（3）打解放军，搞军事情报，企图夺军权他们最早，造谣他们最多也最笨，打、砸、抢在学生组织中，他们最厉害。”<sup>【1065】</sup>

4月20日下午，独立师召开各团干部会议，传达武汉军区上午会议精神。蔡炳臣传达军区副政委叶明<sup>【1066】</sup>讲话称，“昨晚陈钟<sup>【1067】</sup>自北京打电话来。陈讲：今天下午我们到中央文革汇了下报，参加的有周总理，文革成员除戚本禹外都参加了，还有萧主任、杨代总长。首先我们作了检讨，对解散工总我们上报了，没等中央文革批准就解散了，这在组织纪律上是有错误的。伯达讲不算错，过去没有明文规定非等批了再执行，今后要报来，批后再执行。……钟讲：关于解散工总问题不再作检讨。”“陈钟对中央文革讲，我们抓得多了点。江青说人抓多了一点，武汉地区情况复杂我了解，那里牛鬼蛇神多，没什么。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不能放。方向路线错误我们不能承认，带枪的刘邓路线我们不能承认。叶说，现在他们有个计划，想尽一切办法压武汉军区，要武汉军区承认方向错误，这样就说你是带枪的刘邓路线。”<sup>【1068】</sup>

上述传达，相信陈、钟并不敢公然造中央的谣。如所言不虚，则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央对武汉军区的支持态度。

5月16日，武汉地区最大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成立。据独立师有关材料称，“‘百万雄师’联络站，是从下而上联合起来的。四月六日由八个组织发起，

【1064】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汇报提纲》，1967年7月15日。独立师机关整训办公室：《一份反革命的汇报提纲》，1967年8月21日。

【1065】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汇报提纲》，1967年7月15日。

【1066】叶明，1955年授衔少将。

【1067】指陈再道、钟汉华，下同。

【1068】独立师机关整训办公室：《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二至五月部分反动言论（下）》，1967年10月10日。

成立了批判刘、邓联络站，经过一些批判、斗争的活动后，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于五月十六日改为‘百万雄师’联络站，召开了成立大会，发表了成立公告，到现在已发展为四十三个组织，约一百三十万人左右。其中有工人六十万，贫下中农二十多万人，学生二十六万人左右，机关干部七万多人，城市居民十万人左右。”<sup>【1069】</sup>

6月4日，武汉军区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简称“六四公告”）。公告声称，四个多月来，武汉军区“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中，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在此前提下，公告对“实际工作中”的“不少缺点和错误”作了轻描淡写的“检查总结”。关于“二八声明”，公告坚称，“‘二·八声明’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符合《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社论精神的。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二·八声明’进行批判，我们积极给予支持并发表‘二·一八严正声明’是必要的，正确的。”关于工人总部处理问题，公告坚称，“‘工人总部’及其下属的某些组织的领导权，被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所控制，做了许多坏事，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公愤。解散‘工人总部’及其下属的某些组织是正确的。”“现在郑重宣布：工人总部不能恢复！”“对‘工人总部’中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采取专政措施，是必要的。”<sup>【1070】</sup>

“六四公告”的口径，与4月19日陈、钟向中央汇报时中央同意的口径几无差别。只是“六四公告”所表现的不退让不检讨态度，在五六月间各大军区、省军区纷纷检讨认错的大环境之下，显得格外扎眼而已。

五六月间，武汉两派矛盾加剧，武斗不止。此时，独立师对百万雄师作了正面评价：“该站成立后，大方向基本是正确的，得到了广大群众和指战员的同情。‘六·六’通令发表以后，出现过一些错误，六月九日发表了一个‘紧急动员令’，与中央精神是相违背的，六月十七日以后，错误地围攻了一些学校和工厂。‘六·二六’通知下达后，他们改正较快，现在看来，他们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sup>【1071】</sup>

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办公室电告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

【1069】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汇报提纲》，1967年7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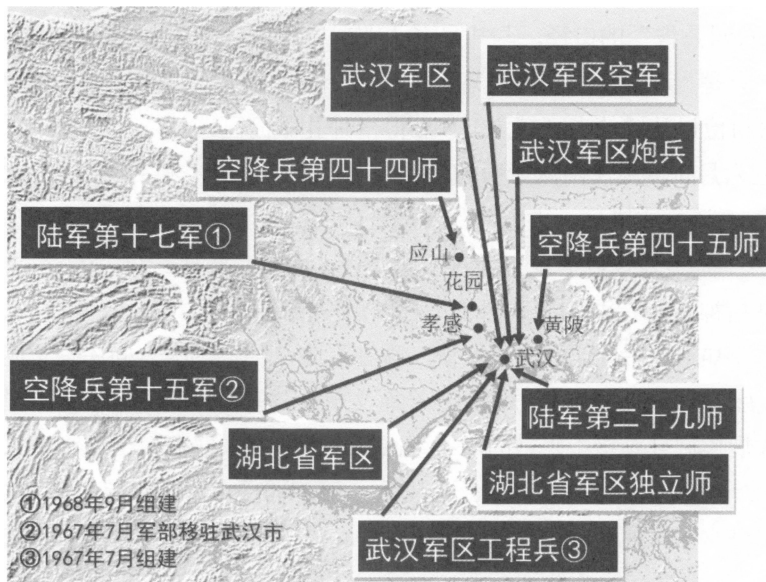
【1070】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页134-135。

【1071】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汇报提纲》，1967年7月15日。

的代表来京汇报。”<sup>[1072]</sup> 6月28日，武汉军区也不得不发出《通告》以表明其试图制止愈演愈烈的武斗的立场，惟聚集于武汉上空的阴霾，远未因此而散去。

7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情报系统，直接向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密报《武汉“百万雄师”的一些内幕》，谈及“一、‘百万雄师’的组织状况”、“二、‘百万雄师’与武汉军区的关系”、“三、‘百万雄师’是如何组织武斗的”。其中第二点内称，“‘百万雄师’宣传部负责人陈秀华揭发：‘百万雄师’第一号头头孙根生、作战部长谢明华和张文等经常与军区联系，但回来后从不传达。‘六·六’《通令》发表的第二天上午，八二〇一部队方参谋长等两人坐着小汽车，到‘百万雄师’核心小组谈了一上午，内容不详。”第三点内称，“在这同时，他们就着手积极组织武斗，首先在江岸分站集结队伍。有六百多人住市人委，四百多人住区委，另外还有一百多人名义是集中学习毛主席著作，实际上白天睡觉，晚上搞武斗。六月六日‘百万雄师’总站又在东湖召集各组织负责人开会，确定‘百万雄师’要组织起来，把他们（革命派）压下去。具体计划是：六月中旬在舆论上压倒对方，占领宣传阵地；六月下旬，拉当权派，使干部都‘亮相’，准备夺权；六月底到七月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sup>[1073]</sup>

### 湖北驻军分布图(1967-1968)



【1072】武汉钢二司新华师总部宣传部：《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1967年8月，页74。

【1073】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快报》，第2914号，1967年7月5日20时。

## 二、毛、周亲临武汉

7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京召集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以及萧华、杨成武开会。毛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提出要去湖北、湖南，并对周恩来说：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不赞成他去。毛泽东说：我不怕乱，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还让汪东兴立刻准备专列，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同车前往武汉，以便在火车上谈河北省的问题。<sup>【1074】</sup>

同日晚，周恩来电话告正在重庆代表中央解决西南问题的谢富治，要其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提出同行的王力、余立金和带去的北航红旗红卫兵一起去，周同意。次日中午，谢、王等抵汉。<sup>【1075】</sup>

7月14日，晨2时半，为给毛泽东打前站，周恩来离京飞武汉，随行的有李作鹏及海、空军的作战部长。抵汉后，周先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并先后与武汉空军及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周本人及毛抵汉的准确时间，事前并未告之武汉军区，毛在汉期间的安全，周亦令武汉空军负责。<sup>【1076】</sup>

同日晨3时，毛泽东乘专列离京，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同行。这是毛一年来第一次离开北京。晚9时，到达武昌。<sup>【1077】</sup>毛入住东湖客舍梅岭一号，周恩来住东湖客舍百花一号，中午抵达的谢、王等住百花二号，陈再道、钟汉华留宿于东湖客舍乙所。

同日晚10时，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到湖北大学校门口看大字报被认出，谢、王等不得已与在场的群众进行了交谈。之后，又于11时抵武汉测绘学院看大字报，与“钢二司”部分群众进行了交谈。<sup>【1078】</sup>

7月15日开始到18日的四个下午，根据毛所确定的方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主持武汉军区及驻汉部队师以上负责人会议，听取了武汉地区支左情况汇报并提出了具体的指示。

7月15日至17日，谢富治、王力到华中工学院、百万雄师总部所在地、武汉测绘学院等会见两派群众及头头，要求两派立即停止武斗，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

【107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98。

【1075】《王力反思录》下册，页1004。

【1076】参见陈再道：《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中国老年》总第1-5期；《陈再道回忆录》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页324-325。

【107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98-99。

【1078】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8月，页80-81。

条件，希望两派坐下来学习中央文件和社论，特别是学习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7月17日，上午，毛泽东在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杨成武、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等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四川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谈到军管问题时，毛泽东说：军管就是难办，谁管谁要犯错误。着重做军队工作，给他们开脱好，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泽东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认识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了，再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了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们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sup>[1079]</sup>都不要打倒。武汉军区要起草个稿子，发表个公开声明：一是有功；二是有错嘛。支工支农有功，支左就有错嘛。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解决好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他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sup>[1080]</sup>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龙书金<sup>[1081]</sup>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最后说，这次我到这里来，一路上基本是白天，到处庄稼很好，特别是湖北庄稼很好。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号听说有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下午四点才下决心来。<sup>[1082]</sup>

### 三、“七二〇”的导火索

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及驻汉部队师以上负责人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周讲话的主旨是批评了武汉军区在前段支左工作中的错误。周称，“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先要把军区的领导问题解决了，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就可以走在廿多个省的前面。”“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二一八’、‘三二一’。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有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一二六’‘二八’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

【1079】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长，时公开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而受到对立面攻击。

【1080】指武汉地区造反派、中间派三司及百万雄师。

【1081】龙书金，时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授衔少将。

【108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100—101。

助。”“‘百万雄师’是4·26开始酝酿的，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3·21完全的有错误，而你们自己是继续了错误的指导思想，……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的发展，‘六六’通令出来以后，6·7百万雄师就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抓办<sup>【1083】</sup>搞的，在军区开过会，6.8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始全市性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人武部、独立师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道听途说，这主要表现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周恩来最后称，“我们几个建议：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工人总部的解散，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解放有关案子。第二，肯定三新、二司、九·一三、工人总部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要以他们为核心。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争取教育，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点名的影响。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报复，这工作中央来帮助。第五，红三司是群众组织，偏保。第六，军区要做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对部队做教育工作，长期的影响，不做好这个工作是不行的。内蒙问题，河南问题。第八，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对解放军的行为要澄清。军区有错误改了就行了，对主席的话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老实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中央要承担。钟汉华（对）问题的处理，有的不果断，要勇于负责。”<sup>【1084】</sup>

周恩来上述讲话尤其是建议中的前四点，是引致“七二〇事件”爆发的导火索。钟汉华“七二〇”后检查承认，“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七二〇’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8日夜，军区会议精神由蔡炳臣决定传达到团级干部，次日又传到排级干部，并把派出去的军人代表叫回听传达。群情激愤之下，牛怀龙、蔡炳臣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暗示把矛头指向王力。<sup>【1085】</sup>

---

【1083】抓办，指武汉市人民武装部及辖下各区武装部成立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

【1084】周总理在武汉、湖北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钢工总五湖四海战斗兵团、华东纺织工学院红卫兵师（筹）：《震撼全国的日日夜夜——武汉“七·二〇”反革命政变材料汇编》，1967年8月于武汉，页3-4。

【1085】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页337-338。

18日晚七时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等和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毛对陈、钟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比湖南、江西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冲击很厉害，要维护军委“八条”。“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现在主要做军队的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一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毛泽东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各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sup>【1086】</sup>

这是毛泽东14日抵汉四天以来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召见陈、钟。会后，周恩来于当晚十一时半飞返北京。据王力称，临行前，周又强调布置让武汉军区空军绝对负责毛的安全。具体事宜，由武空副司令员刘丰和政委萧前负责。<sup>【1087】</sup>

19日凌晨，在送走周恩来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刘丰、萧前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钢工总的总部）。谢富治在对造反派群众讲话时提出两个建议称，“第一条，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所有的群众组织，为了创造一个解决问题的良好气氛和条件，停止一切武斗；第二条，我们好好地坐下来学习。”王力讲话时称，“同志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要叫它一去不复返。”“我们必须懂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受压制、受打击、受排斥这种现象要把它翻过来，但是我们决不能够对别的人、对别的同志、对别的阶级兄弟、对群众采取压制、打击、报复，我们决不能够采取这样的作法。”“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了！检讨了，改正了，就不要打倒了，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辜负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的。”<sup>【1088】</sup>

谢富治、王力激情的倾向性讲话，表达了中央对造反派的支持。惟录音于当日在武汉三镇播放，加剧了百万雄师一派在接下来一天的反弹。<sup>【1089】</sup>

【108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101—103。

【1087】《王力反思录》下册，页1006—1007。时武空司令员为傅传作，刘丰为武空排名第五的党委常委，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萧前，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

【1088】武汉钢二司新华师总部宣传部：《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1967年8月，页88—91。

【1089】《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页286。

19日下午，在军区礼堂，谢富治、王力在军区二级部部长和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四点指示：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组织；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为工总平反；百万雄师是保守势力，不能依靠他们，要做广大群众的工作。王力教训军队干部要从ABC开始认识文化革命。独立师政委、师长相继退出会议，回到师部，该师干部群情激愤。武汉军区连夜向在汉干部、战士传达精神，部队产生较大抵触，形势立即失控。钟汉华事后检查承认：“19日夜晚，<sup>【1090】</sup>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sup>【1091】</sup>

同日下午，省军区独立师的一些干部战士与百万雄师的群众，乘坐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和大卡车，一起涌入了军区大院，要求谢、王接见，回答问题。入夜时分，东湖四周直至五里以外的湖北医学院，都为省军区独立师及百万雄师所控制，通往东湖客舍的两条道路，也被百万雄师层层封锁，水泄不通。

#### 四、7月20日纪事

##### （一）凌晨至清晨，东湖客舍受到冲击

8月，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整训时，有关材料揭露冲击东湖客舍的经过如下：

七月二十日零点三十分许，武昌公安分局的“武汉公安”武昌分部，在军管小组组长王福（我师六团政治处主任）的操纵、煽动下，由坏头头何某（刑警队照相的）、萧某、刘某（萧、刘二人均系东湖公安派出所的干警，过去曾执行过东湖警卫任务，了解客舍情况）带领十二名暴徒，分乘一辆轿车、二辆吉普车冲到客舍北门，被我哨兵拦阻门外。这伙暴徒说“要见谢部长，谢部长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见谢部长是合情合理的。”哨兵回答：“谢副总理不在这里住。”暴徒说：“我们通过各方面的侦察，谢部长肯定住在这里。”问题发生后，警卫队队长秦堂丢、政教张守本、师作战科副科长徐福兴、师作战科参谋吕宗贵、师保卫干事蒋建隆同志先后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处理问题。

.....

从冲击开始，到我们说服劝阻约两个半小时的过程中，秦堂丢同志分别向牛、蔡、中央警卫团卫兵队丁队长、武汉军区负责保卫工作的王副秘书长报告了情况；蒋建隆同志向蔡并四次向武汉军区王副秘书长、王科长报告了情况：

【1090】实应为19日凌晨。

【1091】《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页56-58、433。



徐福兴向牛报告了情况。在我们反复多次的报告中，牛、蔡都是满不在乎，哼哼哈哈地不作指示，只以“注意一下”和“有什么变化再报告”搪塞过去。只有丁队长传达了汪东兴主任的指示“请王力和谢富治同志出面处理”。我们当即将这个指示报告了武汉军区王副秘书长。

二时四十分许，这伙暴徒乘车由北大门冲进院内约五十公尺被警卫队的同志拦住。三时许，军区王副秘书长、王科长在蒋建隆同志再三请求下，来到现场，劝阻无效，僵持不下。

五时四十分左右，“百万雄师”、“武汉公安”在一小撮坏头头的带领下，手持长矛、腰插匕首，头戴安全帽，分乘五辆汽车，一辆同武昌公安局的一伙暴徒相结合，封锁了北门和柳堤；其余四辆冲进风光大门。这伙暴徒不仅不听哨兵的劝阻、警告，反而数人包围了哨兵，控制了电话机。然后冲入“百花”，包围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住房。张守本同志带领警卫队同志将冲进的暴徒组织好坐在草坪上。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出来接见和解答问题。

问题发生后，秦堂丢、吕宗贵、蒋建隆同志分别打电话向牛、蔡报告，但却找不到牛、蔡（经事后查实牛在宿舍不接电话），只好破例地向司令部值班室报告并要求他们找牛、蔡速到东湖处理问题。

五时五十分左右，据说是在军区的指示下，牛才勉强地驱车来到东湖。牛到东湖不到十分钟，部队的车辆接踵而来，我师五团五连两卡车人打头阵，车上架着轻机枪，步枪上刺刀，随后即有海军一车，空军一部分，“武汉公安”的一部消防车，师、团宣传车六部，三七〇医院、“百万雄师”等共约千余人，杀气腾腾，反动气焰不可一世。他们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好，百万雄师就是好”、“王力在那里，老子要揪你，枪毙你，挑了你”等反动口号，冲入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住地。警卫队战士拦车时，他们大骂拦车的战士是“老保”、“八二零一的叛徒”、“不躲开老子就用刺刀挑了你”，迫使拦车的战士躲不及而爬在汽车头上。这些暴徒冲进“百花”后，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正在接见第一批冲进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公安”。他们像土匪一样的闯入会场，拖开警卫战士，围攻、推打谢副总理，并将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误认为是王力，七手八脚地把陈打了一顿，后有人说：“打错了，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才住手。暴徒们找到王力同志就将其推上车绑架走了。王力同志的秘书张根成同志、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尹聚平（女）据理斗争，也遭到围攻、打骂和绑架，王力同志等被绑架走的时间是七时二十分。

……

部队、“百万雄师”撤走后，武昌、江汉公安分局的一伙暴徒，继续围攻谢副总理，经说服、劝阻于九时二十分左右离开。<sup>【1092】</sup>

另据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8月4日在总字151部队（武汉高射炮兵学校）礼堂称，“7月20日凌晨三时四十分，我带一排人到东湖宾馆去执行劝阻公安人员冲击中央首长驻地的任务。到驻地后，被公安人员挡住，不准我们接近中央首长，过了许久，才允许我带二人进去。”后来，“因为当时很紧张，我就带一排人强硬进去了。”<sup>【1093】</sup>按张昭剑的说法，二十九师的部队在东湖客舍并未起到多大作用。

## （二）上午至下午，武汉军区大院受到冲击

有关武汉军区大院受冲击及王力在军区大院内受百万雄师一派围攻殴打的情形，张昭剑在8月4日称，“事态正在继续发展，不一会他们把王力同志拖上汽车，汽车开到军区四号办公楼，这时，军区大院内外、上下，几万人挤得水泄不通，匪徒污辱殴打中央首长。……军区大院立即掀起了险风恶浪，什么‘王力不能代表中央，中央答应斗王力’等等。……此时，我们曾四次找‘公检法’‘百万雄师’头头交涉，据理力争，明确告诉他们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只能欢迎。并叫他们放出王力同志，不许继续污辱、殴打首长。下午二时许，由于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斗争，他们不得不答应让王力同志暂时休息一下。这时我们迅速派了两个半连的兵力封锁了四号楼掩护王力同志从一个偏僻的侧门脱险而走。<sup>【1094】</sup>……就在王力同志上车一分钟后，就被他们发现了。”“下午五点半——六点突然大批暴徒把军区大院死死包围了，为首的‘公检法’‘百万雄师’的四十多个头头冲上了二楼，围攻我、殴打我，要我承认8199部队被造反派打死了好多人，再就是要交出王力同志，说王力同志是我藏的，还说他们已经组织了十六万人的斗争大会斗争王力，……我又说：‘王力同志休息一会是同你们商量的，要问我王力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暴徒们一听，狂叫起来，要带我去找王力，我怕影响完成任务，就同他们斗，同他们磨菇。正当他们要强行绑架我走时，我们的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我共遇患

【1092】独立师师直机关整训办公室：“七·二〇”冲击东湖反革命事件的真相》，1967年8月17日。

【1093】《飞将军自重霄入》。钢工总《五湖四海战斗兵团、华东纺织工学院红卫兵师（筹）：震撼全国的日日夜夜——武汉“七·二〇”反革命政变材料汇编》，1967年8月于武汉，页34。

【1094】据二十九师政治部整理的《七·二〇叛乱实况》，王力于下午三点多乘车抵达二十九师机关驻地。

难建立深厚感情的赵师长<sup>[1095]</sup>上来喊：‘已到吃饭的时候了，军区已准备了饭，请大家进去吃饭，吃了饭再说。’这些暴徒于是乱叫：‘好！吃了饭再算账！’此后，我和张参谋、警卫员三人趁机从楼梯下偏僻处出了大院，从小道奔向我家。”<sup>[1096]</sup>

### （三）下午至晚上，王力被藏在二十九师师部及洪山

张昭剑继续称，“整个师部，连队营房住地都被我不说你就知道的那个部队<sup>[1097]</sup>封锁监视了。王力同志休息的六号楼也被他们守住了。临时来不及调人，我们三个人采取紧急措施，把守卫在六号楼的几个人硬顶了进去，找出王力就走，我们出门后，见后面跟踪着一大批人，此时天已黑，我们就趁机弯上山坡，爬上洪山（当时来不及考虑去那里），洪山丛林密草。我们在洪山侧背找一小路，但被三人堵住路口。这时王力同志已遍体鳞伤，山很陡，不好走，刺树多，我们扶王力同志登山转移，乱刺刺在我们身上很痛，……“8199部队，当时已被百匪包围进行了搜查，不一会又上山来了，他们接近我们一步，我们就移动一下，就这样同敌人磨了整整一个晚上，当时我们请示过王力同志，怎样设法突围，试过了但没有成功，我们突围到铁丝网里面去了，走投无路，恰恰转身又碰上8201放哨的，他问我们，我们回答是151部队的，执行紧急任务的。最后我们临时决定在山上隐蔽。”<sup>[1098]</sup>

### （四）下午，周恩来离京再次到武汉

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各人到林彪处开会研究武汉问题。会后，吴法宪很快安排了一架飞机，送周恩来下午飞赴武汉。在飞往武汉途中，吴法宪突然接到刘丰的电话，说有几十辆汽车冲进了周恩来的飞机预定降落的王家墩机场。为了保证周的安全，吴法宪要飞机临时改为降落在离武汉大约60公里的山坡机场。<sup>[1099]</sup>据当年跟随周同机赴武汉的卫士高振普的回忆，周的专机改降山坡机场后，刘丰等从王家墩机场赶到山坡机场，周与他们商量进城办法，后知王家墩机场聚集的人群已经散去，周决定登机返回王家墩机场，并决定天黑以后，坐吉普车到东湖客舍，与谢富治等研究确定了保证毛安全离开武汉的详细办法。会议结束后，周去看毛，当面报告了请毛离开武汉的安排，毛接受了周的建议，决定当晚乘专机离开武汉去上海。<sup>[1100]</sup>

【1095】指时任二十九师副师长的赵奋，1967年8月，赵任二十九师代师长。

【1096】《飞将军自重霄入》。

【1097】指省军区独立师。

【1098】《飞将军自重霄入》。

【1099】《吴法宪回忆录》下，页687。

【1100】《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页326-328。

### （五）晚上，邱会作带信到武汉

奉林彪之命，邱会作携带一封江青给毛泽东、劝毛速离武汉的信件，于晚上十一时左右飞抵武汉王家墩机场。抵达后邱在机场待命。21日凌晨三时多，在杨成武带领下，见到已从东湖客舍转移至机场的毛泽东。在停靠在机场专线毛的专列上，邱将江青的信面交毛。惟在收到此信之前，毛已决意离汉。故而，邱会作此行意义不大。<sup>【1101】</sup>

### （六）空降兵两个团赴汉执行警备任务

为稳定武汉地区的局势，今日，奉武汉军区空军命令，空降兵第四十四师第一三二团（代号 7255 部队），空降兵第四十五师第一三三团（代号 7213 部队），赴武汉市执行警备任务。<sup>【1102】</sup>

## 五、7月21日纪事

### （一）上午，毛泽东离汉赴沪

#### 1. 官方说法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 103，1967 年 7 月 21 日条称，“晨二时，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具体安排下，乘车离开东湖客舍去机场，上午十一时乘专机到达上海，住虹桥宾馆，直至九月十六日离开。”

#### 2. 王力说法

王力称，“这一次主席打破不坐飞机的惯例，坐飞机到了上海。总理亲自布置主席由宾馆的后门转移到机场，改乘军队的小汽车，用武汉军区空军的车号，大卡车在前面开路。主席对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这是他老人家成为党的领袖以后从未发生过的事情。”<sup>【1103】</sup>

#### 3. 邱会作说法

邱会作称，“大约七点半左右，停机坪上有三架伊尔十八同时发动，接着主席坐杨成武的伏尔加来了，到了停机坪，主席下车和我握手，也和工作人员握手，主席上了飞机，我和杨成武、余立金他们说了几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杨成武接着我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当时也很激动，我对他说：‘你无限忠

【1101】参见《邱会作回忆录》下，页 533-535。

【1102】《空降兵第十五军党组织史资料》。空军政治部：《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 2 集，北京：蓝天出版社，1992 年，页 371。空降兵第十五军领率机关驻湖北省孝感县，代号 7250 部队。所辖之空降兵第四十三师驻河南省开封市，代号 7249 部队。空降兵第四十四师驻湖北省应山县，代号 7252 部队。空降兵第四十五师驻湖北省黄陂县，代号 7212 部队。

【1103】《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1009-1010。

于毛主席，我要向你学习！’说完他又拉着我上机去看主席。实话说，杨成武对我是很关心的，他让我能多见到毛主席。我一下飞机，飞机就起飞了。”<sup>【1104】</sup>

## （二）下午，王力转移到武空驻地

据二十九师整理的材料称，“二十一日上午，张政委<sup>【1105】</sup>只身下山，来到七连，找到钱副连长，含着热泪说明事情经过。钱副连长当即表示，坚决站到毛主席这一边，保卫中央首长安全。……为了掩护王力同志下山，把全连分散在山下边，有的打球，有的学毛著，有的谈心，有的搞副业生产，当王力同志安全来到七连驻地后，战士看到遍体鳞伤的亲人，个个都难过得哭起来了。……”“二十一日下午二点多钟，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同志陪同王力同志登上小车。七连同志在张师长、解参谋长的率领下，分乘两台大卡车，此时，发现附近有人叫喊‘抓王力’，刘丰同志命令小车司机郭景元同志，加足马力冲过封锁，……小车像一颗出了膛的炮弹，冲过重重封锁，向目的地飞驰而去。原来预定由官山空军司令部出来迎接的部队所乘的车刚出营房不远，小车已经顺利安全地把王力同志送到了官山空军司令部。”<sup>【1106】</sup>

## 六、7月22日纪事

### （一）上午，毛泽东在上海谈武汉问题

毛泽东上午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周恩来八时二十分从武汉来电话谈武汉的情况。周恩来提出对外报道武汉发生的事要含蓄，不点名，建议把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毛泽东说：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sup>【1107】</sup>有什么决心，我们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他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表示同意把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上午十一时，召集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武汉和北京的情况，说：总理、富治、王力等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谈就会被包围，强迫签字，要你承认它<sup>【1108】</sup>是革命组织。还是早点离开好。要谈去北京谈，三方面一起谈，也可能谈不拢，会提出什么条件。这件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而且是全国的问题。总理根据具体情况办理。下午一时三十分和

【1104】《邱会作回忆录》下，页534-535。

【1105】指张昭剑。

【1106】8199部队政治部：《七·二〇叛乱实况》。《震撼全国的日日夜夜——武汉“七·二〇”反革命政变材料汇编》，页24-25。

【1107】指陈再道。

【1108】指“百万雄师”。

二时四十分，两次谈到武汉事件，说：军队主要是打思想仗，能锻炼人。军队支左，支错了就改，属于认识问题，如果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属于立场问题。<sup>【1109】</sup>

## （二）上午，周恩来在武汉召集会议

据《周恩来年谱》：周“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李作鹏、刘丰等开会，要孔庆德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指明武汉空军仍是双重领导，要听武汉军区指挥，不能随意表态。并嘱转告陈再道、钟汉华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下午，飞回北京。”<sup>【1110】</sup>

## （三）下午，周恩来、谢富治、王力返京

### 1. 群众组织材料的说法

“王力同志脱险后，与余立金、刘丰等同志一起乘车经关山、流芳岑、五里界、脂肪、郑家店，<sup>【1111】</sup>于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半左右到了7333部队（山坡机场），<sup>【1112】</sup>解放军指战员见到了被暴乱分子打得遍体鳞伤的中央首长，都热泪盈眶，心里十分难过，……不久，周总理、谢副总理乘坐飞机来到7333部队，当总理见到王力时犹如多少年不见的老战友突然相逢，热烈握手、拥抱。……下午，首长们乘飞机到汉口，在7252部队的护送下，一支支银燕像箭一般飞向毛主席的身边，飞抵文化革命的策源地首都北京。在周总理的飞机着落〔陆〕十几分钟后，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乘坐的飞机安全着陆。”<sup>【1113】</sup>

### 2. 王力说法

“当时总理为了主席的安全和查找我的下落，废寝忘食，费了很大的事，每个环节都作了周密的布置。直到见了我的面，和我拥抱，同我贴面，流了眼泪。他几天没刮胡子，长得老长。总理先把谢富治、王力送上飞机先飞，然后自己留下来再作一点工作，自己的专机后飞。到北京后，让我们的飞机在天上绕圈，他先赶到机场再来迎接我们。”<sup>【1114】</sup>

### 3. 新华社说法

新华社今日公开发出电讯称，“由中央派往武汉处理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

【110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103-104。

【11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71。

【1111】应为关山、流芳岭、五里界、纸坊、郑家店。

【1112】7333部队为师部驻山坡基地的空军第三十三师的代号。

【1113】武汉钢二司武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8月，页90。另可参考：《7333部队首长谈周总理抢救王力同志》。武汉钢九一三战报编辑部、钢二司武汉邮电学院：《伟大的武汉七月革命》，1967年8月15日，页59-60。

【1114】《王力反思录》下册，页1010。

长谢富治同志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第一副总编辑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士井冈山、尹聚平、吴介之、胡慧娟同志，今天下午由武汉乘专机光荣地回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北京，受到中央领导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和首都各界革命群众数万人的热烈欢迎。”“到机场欢迎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其他方面的负责同志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叶群等。”<sup>【1115】</sup>

#### （四）晚上，林彪主持会议研究武汉问题

据《苦撑危局——周恩来在 1967》：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听取谢富治的汇报。决定“处理‘七·二〇’事件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果不敢来，就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在林彪处开完会后，周恩来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的电报：

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

周、谢、王、李四同志回京后面报一切。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稳定，拟先约军区和有关方面同志来京一商，请陈再道、钟汉华、傅传作、刘丰、吴世安、周志刚、赵兰田、温锡、张绪、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十二位同志于二十三或二十四日来京。中央已令空军派机往接，何时动身，望告。<sup>【1116】</sup>

起草完后，周恩来嘱用绝密电发出。<sup>【1117】</sup>

### 七、“七二〇”之后

7月23日，武汉军区空军命令，空降兵第十五军机关带直属队和空降兵第四十四师（欠炮团）赴武汉市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军部驻武昌空军东湖疗养院，8月17日，又迁至汉口原高级步校营房。<sup>【1118】</sup>武汉地区原由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控制的要害部门、要害位置，转由空降兵第十五军及陆军第二十九师所控制。

【1115】新华社 22 日讯。《人民日报》，1967 年 7 月 23 日。

【1116】吴世安，时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1955 年授衔少将。周志刚，时任湖北省军区政委，1955 年授衔少将。赵兰田，时任空降兵第十五军军长，1955 年授衔少将。温锡，时任空降兵第四十五师师长，1965 年空军大校军衔。巴方廷，时任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

【1117】《苦撑危局——周恩来在 1967》，页 331-332。

【1118】《空降兵第十五军组织史资料》。

7月25日，据新华社讯：首都百万军民“今天下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且在天安门前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回到毛主席身边，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林彪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以及驻京部队的负责人参加了今天的大会。<sup>【1119】</sup>

同日下午，毛泽东审阅武汉军区党委常委会7月24日送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sup>【1120】</sup>（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晚十时，审阅修改林彪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批示：“退林彪同志酌定。我加了一小段。”毛泽东加写的一段话是：“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sup>【1121】</sup>

同日天安门广场集会后，新华社记者汪波清等人写了新闻稿，当时的新华社负责人王唯真和汪带着新闻稿清样去钓鱼台，交陈伯达、关锋审阅后，正要拿走，关锋提出康生还要看。在康生默许下，关锋在清样上添加“揪出武汉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并要求以后按此口径报道。

7月26日，这篇新闻稿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并提出“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而把“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扩大至全国。

【1119】新华社25日讯，《人民日报》，1967年7月26日。

【1120】该公告称，“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压制打击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以致发展到造成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〇’叛变事件。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对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将迅速作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大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三集，1967年9月，页158-162。）该公告于7月26日公开张贴，7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112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105。



7月27日，林彪主持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林彪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sup>【1122】</sup>

7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任命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随后，调沈阳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徐国夫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调沈阳军区炮兵政委张玉华为武汉军区副政委；调沈阳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唐皎任武汉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11月13日，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组成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由曾思玉、刘丰任书记，常委会由曾思玉、刘丰、徐国夫、张玉华、萧前五人组成。<sup>【1123】</sup>

8月3日，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奉命撤离武汉，改由空降兵第十五军代管。部队分别移驻应山、黄陂、洪湖等地接受政治整训。<sup>【1124】</sup>

8月15日，奉中央军委命令，空降兵第十五军兼新组建的武汉警备区，同时，将陆军第二十九师划归十五军建制。武汉警备区和军属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受武汉军区领导。同日，军委命令，空降兵第十五军军长赵兰田调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军政委王新8月6日已调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副军长方铭任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纯青任军政委兼武汉警备区政委，第二十九师师长张绪任副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师政委张昭剑任军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sup>【1125】</sup>

据《毛泽东年谱》称，8月25日、26日，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两次听取根据周恩来嘱咐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杨成武的汇报，内容是王力八月七日发表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和关锋主持起草《红旗》杂志八月一日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等情况。毛泽东认为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并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

【112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106。陈再道、钟汉华后于1972年同时恢复工作。陈降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钟降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数年后两人恢复大军区正任职务，陈先后任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钟先后任军委装甲兵政委、成都军区政委。

【1123】《武汉军区大事记》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大事记（1955—1985）》，页108。徐国夫，1955年授衔少将。张玉华，1964年晋升少将。唐皎，1965年大校军衔。

【1124】《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军区组织史资料（1949.5—1993.12）》，页666。蔡炳臣、牛怀龙后于1973年三四月间同时恢复工作。牛任湖北省军区副参谋长，蔡任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陈再道任铁道兵司令员后，蔡得关照于1978年5月升任军职的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同年8月病逝。

【1125】《空降兵第十五军党组织史资料》。王新，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方铭，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张纯青，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张昭剑后于1968年9月至1972年10月任新组建的陆军第十七军政委，一年间从师职一跳为副军职后又再跳升至正军职干部。短命的第十七军撤销后，未及50岁的他却未再有新的任命。

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二十六日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的意见。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一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sup>【1126】</sup>

“七二〇事件”由此划上句号。

“七二〇事件”是社会上两派矛盾激化、以至这种激化反映到军内来的一次总爆发。弄得不好，这种激化会蔓延至全国各地，甚至演变为内战。而且“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将文革烈火烧至军队，一旦军队乱了，局面将更加不可收拾。“七二〇事件”对毛本人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反而成为一个契机，使毛看到了文革乱局事态演变下去的严重性，促成了毛改变文革战车的轨迹，开始从“乱”走向“治”。而谁也没预料到的是，毛对陈再道等人网开一面，而王力这位“七二〇事件”英雄，却在一个月后成为毛为实现其急转弯“战略部署”而抛出的替罪羊。<sup>【1127】</sup>

“七二〇事件”半年之后，1968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同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1月28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委会的请示报告，同意湖北省革委会由曾思玉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8人为副主任。<sup>【1128】</sup>省革委会的主要权力，实际掌握在曾思玉、刘丰手上。

1968年，湖北下辖武汉、黄石2市，黄冈、孝感（东风）、咸宁、荆州、宜昌、襄阳、郟阳、恩施8专区，各地市革委会建立简况如下。

1968年1月15日，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准成立宜昌地区革委会，由原地委副书记戴凤岐任主任。1月16日，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准成立襄阳地区革委会，由襄阳军分区政委蔡德清任主任。1月18日，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复空降兵十五军党委兼武汉警备区呈报的《关于建立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成立武汉市革委会，由方铭任主任。1月20日，武汉军区临时党委同意成立东风地区革委会，由孝感军分区司令员朱俊功任主任。1月20日，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准成立恩施地区革委会，由原地委第一书记赵文华任主任。1月22日，武汉军区临

---

【112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113-114。

【1127】王力1968年1月起被囚禁于秦城监狱长达十四年之久，1984年2月被开除党籍，1996年因癌症在北京去世。

【1128】张体学，原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任爱生，最早支持造反派的原省委委员、省委农村政治部主任。梁仁魁，空降兵第十五军副参谋长，拟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朱洪霞，武汉重型机床厂检验员，钢工总主要负责人。饶兴礼，劳模，原湖北省贫协副主席。杨道远，武汉测绘学院学生，钢二司主要负责人。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新华工主要负责人。

时党委批准成立郟阳地区革委会，由郟阳军分区政委陈策任主任。1月26日，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准成立黄冈地区革委会，由黄冈军分区司令员董涛任主任。2月21日，湖北省革委会批准成立咸宁地区革委会，由咸宁军分区司令员周忠甲任主任。3月27日，湖北省革委会批准成立荆州地区革委会，由荆州军分区司令员傅庞如任主任。9月12日，湖北省革委会批准成立黄石市革委会，由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赵文彬任主任。

以上10个地市级革委会一把手，由现役军队干部担任的8个，占80%，由地方干部担任的2个，占20%，现役军队干部占了绝对优势。

## 第五十一节 十二军入院<sup>【1129】</sup>

### 一、周恩来交代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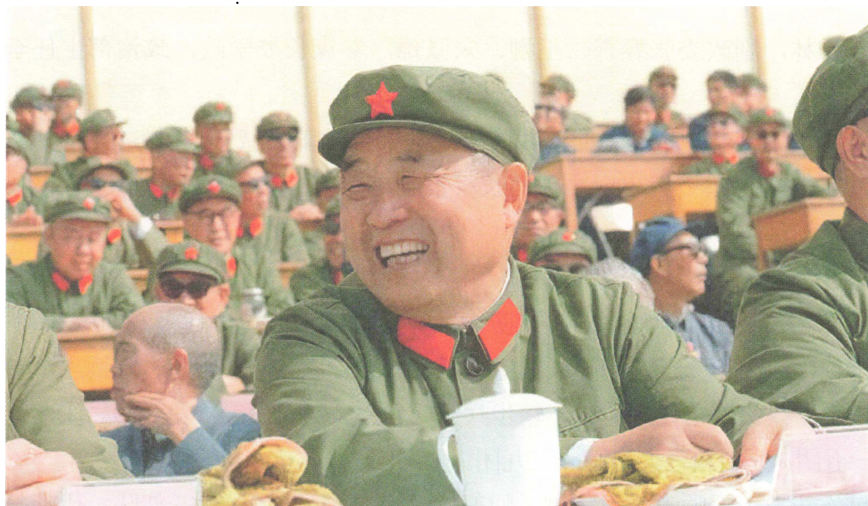
7月29日，周恩来将部署在江苏北部地区的陆军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sup>【1130】</sup>召至北京，交代中央决定十二军进入安徽三支两军的任务。在场的有李富春、杨成武、姚文元。

周恩来首先介绍了安徽的基本情况。安徽1月26日夺权后，出现了“夺权派”喊“1.26夺权好得很”的好派（G派）；“反夺权派”则称“1.26夺权好个屁”的屁派（P派）。两派互相指责，上下串连，武斗不断，全省从上到下，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各自经常相互策应，采取统一行动，使问题涉及面广，解决起来更为困难。当时中央对安徽问题虽然制定了“九条”、“五条”两个文件，同时，为了缓解群众组织在夺权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安徽省军管会，后来钱钧身体不好，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主持军管会的工作，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sup>【1131】</sup>而武斗越演越烈，在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区，两派正酝酿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斗。中央决定十二军立即开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周恩来特别强调，中央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

【1129】主要资料来源：《李德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版；陆军第十二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二军军史（0945.10-1978.9）》，初稿，1981年8月。

【1130】李德生，1955年授衔少将。

【1131】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发出时间署3月27日）称，“根据两个月实践检验，安徽‘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个别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中央认为，应立即成立以钱钧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同日成立的安徽省军管会，由钱钧（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任主任，副主任严光（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宋文（安徽省军区第二政委）、廖成美（第二炮兵五十二基地司令员）、杨广立（陆军第六十军政委）。钱钧、廖容标，1955年授衔中将。



文革中步步高升的李德生。

心，非常着急，在这紧急时刻，派十二军去安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他以非常焦急的心情说：安徽武斗太厉害，已影响到中央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军管会指挥不灵，难以控制局面。你回去紧急动员一下，立即带部队去安徽。去了以后不要陷到派性里去，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搞准确，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群众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sup>【1132】</sup>

周恩来指示的核心，是“军管会指挥不灵，难以控制局面”。唯有吸取武汉“七二〇事件”的教训，以国防军去控制局面。

李德生回忆又称，在场的杨成武，“主要讲了12军到安徽后，兵力部署的基本要求，部队开进的顺序和方式，并规定只带轻武器，重型武器装备暂时留在苏北，组织留守处看管营房和武器装备，继续抓好农副业生产和管理好家属子女。同时明确了将安徽省军区独立1、2师划归12军指挥；所有驻皖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由12军统管；安徽的‘三支两军’由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有关‘三支两军’的问题，直接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请示报告。他还特别强调要处理好军政军民关系，搞好军内军外团结。”<sup>【1133】</sup>

陆军第十二军时辖陆军第三十一、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师，军工区及军直炮兵第一一四团、高炮第三十七团。入皖前，在苏北地区担负海岸防御任务。军领率机关位清江市，代号6408部队。军长李德生，政委张文碧，副军长官俊

【1132】《李德生回忆录》，页345-348。

【1133】《李德生回忆录》，页348-349。

亭、李长林，副政委张春森、王翀、宋佩璋，参谋长娄学政，政治部主任李宝奇。<sup>[1134]</sup>

陆军第三十一师担任军的三线防御，师部位泗阳县城，代号 6424 部队。师长成冲霄<sup>[1135]</sup>，政委尹忠尉，副师长权银刚、甄申，副政委平昌喜，参谋长冀少之，政治部主任马魁鸾。下辖步兵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团，炮兵第三一四团，坦克自行火炮第二三六团。

陆军第三十四师担任军的二线防御，师部位涟水县城，代号 6430 部队。师长张季伦，政委李天茂，副师长任保裕、张双春，副政委崔发育、陈德惠，参谋长崔松山，政治部主任徐钧。下辖步兵第一〇〇、第一〇一、第一〇二团，炮兵第三一五团，坦克自行火炮第二三九团。

陆军第三十五师为一线防御，师部位滨海县城，代号 6445 部队。代师长赵金来，政委于永贤。下辖步兵第一〇三、第一〇四、第一〇五、第一〇六团和炮兵第三一六团。

军工区原辖工程建筑第一三九、第一四〇、第一四一团和船舶运输大队，并代管南京军区汽车运输营。1966 年 5 月，工程建筑第一四〇、第一三九团先后调军区工程兵司令部。

李德生回忆称，“第二天，我就离开北京返回部队，首先向军党委常委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然后召开了有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军党委扩大会，传达任务，统一思想，部署行动计划；同时紧急收拢部队，边作思想动员，边作行动准备。”<sup>[1136]</sup>

十二军奉命赴皖，守备苏北的任务，交予江苏省军区和陆军第六十军第一八一师接替。军船舶运输大队，调归一八一师领导。坦克自行火炮第二三六团、第二三九团，此前（1967 年 7 月）已奉命调归新组建的坦克第九师建制。

李德生回忆称，“从 8 月 6 日开始，除留守部队外，分别采取铁路和摩托输送的方式，向安徽开进，进驻安徽各主要地、市以及武斗最严重的地区。31 师分别进驻蚌埠市、淮北市<sup>[1137]</sup>和宿县地区；34 师分别进驻淮南市和六安地区；35 师分别进驻芜湖市、马鞍山市和安庆地区；独立 1 师驻阜阳地区；军区后勤 14 分部驻铜陵市；12 军工区驻合肥市。12 军的各部队以及原驻皖的二炮、60 军、68

**[1134]** 张文碧、张春森，1955 年授衔少将。官俊亭，1964 年晋升少将。李长林、王翀、宋佩璋、娄学政、李宝奇，1965 年大校军衔。

**[1135]** 成冲霄，1965 年大校军衔。

**[1136]** 《李德生回忆录》，页 350。

**[1137]** 时称濉溪市，1971 年 3 月方改名为淮北市。

军的部队，分别负责该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军部进驻合肥市组织领导全省的‘三支两军’工作，并成立了由军参谋长林有声<sup>[1138]</sup>负责的‘三支两军’办公室。军的主要领导同志，以及军机关的绝大部分同志，都投入了‘三支两军’工作。”<sup>[1139]</sup>

李德生回忆称：

部队进驻安徽后出现的状况是，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表示欢迎毛主席派12军到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但他们也有各自的想法。原来得到支持的一派，希望继续得到支持；原来认为是被压制的一派，希望得到公平对待。12军究竟是什么态度，他们不得而知，因而双方酝酿已久的一场武斗，并没有停止准备。他们想看一看，新来的12军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8月8日傍晚，我们刚到的第二天，武斗在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和安徽工学院附近终于爆发了。一听到报告，我们立即派调几十名机关干部，带领3个连队赶到武斗现场，举着《毛主席语录》勇敢地插到两派武斗火线中间，组成人墙，用高音喇叭宣传政策。干部战士冒着遭受殴打和枪弹袭击的危险，劝阻参加武斗的人员，收起武器，停止斗殴和开枪。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将差点造成一场流血惨祸的大武斗平息。部队将堵在楼梯上的武斗工事拆除，将被围困在三层楼上，也是来参加武斗的年轻学生，一个个全部接下楼来。当时如果不是部队及时赶到，坚决制止武斗，这些年轻娃娃和当地群众会有多大的伤亡就难说了。因为有人早就将几个灌满汽油的大汽油桶推到了楼下，随时准备炸楼，烧楼。

这场武斗制止后，合肥人民争相传颂，赞扬12军是毛主席派来的好部队，真正是为人民利益着想，不顾自身安危的人民子弟兵！

部队制止武斗初次成功后，军党委再次要求已进驻安徽各地的部队，采取一切手段，不惜流血牺牲，坚决迅速制止各地武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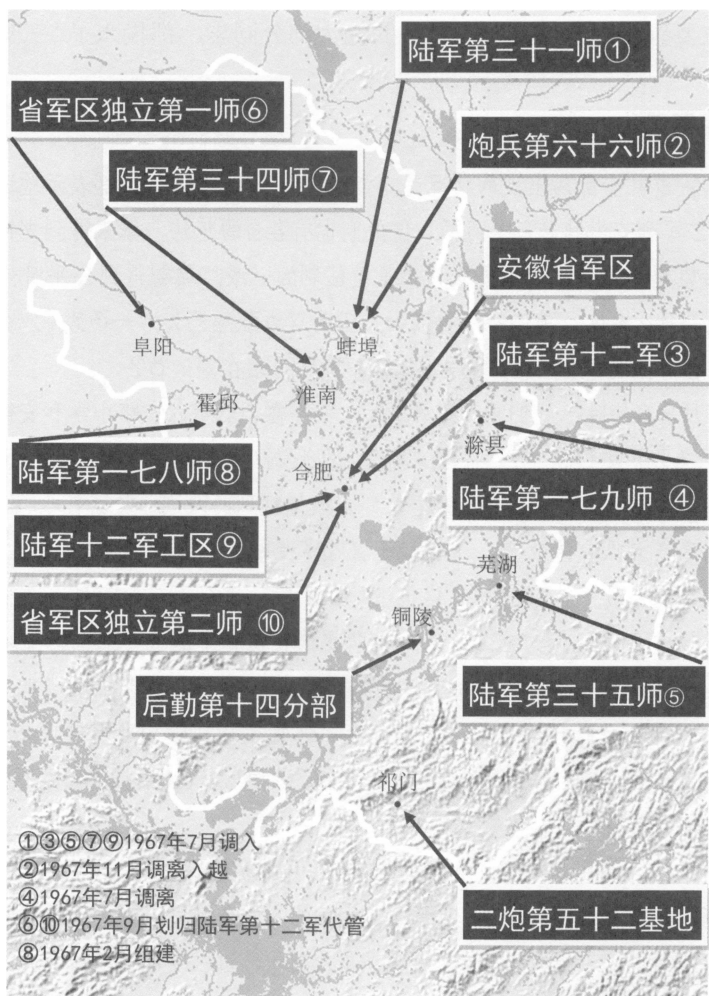
部队执行命令很坚决，在全省范围内制止武斗的活动迅速展开。<sup>[1140]</sup>

【1138】1967年8月，军参谋长娄学政调舟嵎要塞区任副司令员（未到职），副参谋长林有声任参谋长。林有声，1965年大校军衔。

【1139】《李德生回忆录》，页350-351。

【1140】《李德生回忆录》，页353-354。

安徽驻军分布图(1967-1968)



## 二、十二军在皖三支两军态势

安徽辖合肥、蚌埠、淮南、马鞍山、濉溪5省辖市，阜阳、宿县、滁县、六安、安庆、巢湖、芜湖、徽州、池州9专区及铜陵特区。除濉溪市由陆军第六十八军二〇三师负责、阜阳专区由安徽省军区独立第一师负责、滁县专区由陆军第六十军一七九师及坦克第九师负责、巢湖专区由巢湖军分区负责、徽州、池州专区由第二炮兵五十二基地（代号总字121部队）及南京军区后勤十四分部（代号南字331部队）负责、铜陵特区由后勤十四分部负责外，其余4市（合肥、蚌埠、

淮南、马鞍山)、4专区(宿县、六安、安庆、芜湖)的三支两军,由十二军所属部队直接负责。

### (一) 军领率机关、工区在合肥市

8月8日,十二军前指率步兵第九十一团、军工区及工程建筑第一四一团到达合肥市,负责省直属机关暨合肥市的三支两军。军领率机关驻合肥市内省委党校(后移驻安徽农学院),原拟改代号为南字126部队,后决定代号6408部队不变。军工区代号改为南字124部队。十二军抵合肥后,改组原省军管会合肥工作委员会,由军工区主任李全贵任工作委员会主任。

### (二) 第三十一师在蚌埠市和宿县专区

据该师师史称:“八月六日至九月十日,师先后分兵两路,由驻地出发开赴安徽,八月八日,91团徒步行军至新沂,后改乘火车沿陇海、津浦、淮南之线,随军部先行抵达合肥;九月六日,师直和炮团乘汽车沿洋河、泗洪、泗县、灵璧、宿迁之线到达蚌埠;九月十二日,93团沿师直路线进至宿县。”“师进驻安徽后,先后在合肥市、蚌埠市、宿县地区及长丰、全椒、淮北市<sup>[1141]</sup>、蚌埠铁路分局等县市实行‘三支两军’”。<sup>[1142]</sup>

第三十一师入皖后,师部代号改为南字133部队,步兵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团代号依次改为南字134、135、136部队,炮兵第三一四团代号改为南字137部队。

1968年1月30日,南京军区党委第255号电示,对蚌埠市实行军事管制,任命第三十一师政委成冲霄为市军管会主任。

### (三) 第三十四师在淮南市和六安专区

第三十四师入皖后,师部代号改为南字127部队(短时间内仍使用6430部队的旧代号)。该师师史在“在奉命开赴安徽,参加制止武斗”一节中称:

八月七日,师机关、直属队由副师长任保俗率领,乘汽车从涟水出发,经淮阴、洪泽、盱眙、滁县、全椒、合肥,于九日晨抵达淮南市洞山。第一〇〇团(欠重炮连、第二营机枪连)从阜宁县益林镇乘车,经涟水、灌南至连云港海州车站,换乘火车经徐州、蚌埠、水家湖,于八日上午十点到达淮南田家庵地区。第一〇二团(欠第二营炮兵连)从连云港海州乘火车,经徐州、蚌

【1141】时称濉溪市。据《淮北市志》:1967年3月,驻徐州6074部队(陆军第二〇三师)奉命进驻濉溪市支左(同时进驻淮北矿务局)。1970年3月,进驻濉溪市支左部队调整,6074部队撤出,6408部队进驻。

【1142】《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三十六师师史(1945-1985)》页187。步兵第九十二团仍在安徽农场执行军农业生产任务。



埠、水家湖，于八日凌晨三点抵达淮南蔡家岗地区。九月五日，炮兵第三一五团分别由涟水、灌南出发，经泗阳、泗洪、宿县至蚌埠，完成收缴流散在群众中武器任务后，于二十五日同师直喷火连，在副师长张双春、副政委陈德惠率领下，由蚌埠乘汽车，经定远、合肥至六安地区。第一〇一团除抽部分同志配属师机关参加三支两军外，部队仍驻淮安范集农场，执行战备生产任务。

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各单位到达指定地域后，及时进行了动员教育，师对具体任务做了区分：师机关、直属队在淮南市委及矿务局机关；第一〇〇团在田家庵和大通地区；第一〇二团（包括师直工兵营）在蔡家岗和八公山地区；师机关部分同志和炮兵第三一五团在六安地区机关、六安县、肥西县。

八月十日，我师接替安徽省独立一师组成淮南军事管制委员会，师长张季伦任军管会主任，政委李天茂，副师长任保俗任军管会副主任。

当时淮南、六安两地的群众分裂成严重对立的两派，经常发生武斗，工矿停产，学校停课，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我师各部队进驻后，组成各种小分队，深入到煤矿、工厂、学校、街道、公社等基层单位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动员群众复工、复职、复课。广大指战员冒着生命危险制止武斗。八月十九日凌晨，淮南李一矿的两派群众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第一〇二团三营九连、炮兵连干战闻讯出动，在团、营领导的指挥下，插入两派“阵地”之间进行说服教育，迅速制止了武斗。八月二十一日上午，水家湖地区发生了抢夺我师第一〇〇团四连武器弹药事件，四连干战坚持耐心说服，严肃批评，保住了枪支弹药。九月五日夜，淮南两派群众在九龙岗以东地区严重对峙，第一〇〇团三机连部分干战首先赶赴现场说服劝阻，两派头头不听，于九月六日发生武斗。我师领导立即率机关和第一〇〇团三营赶到现场，插入两派群众之间做工作，有的同志负了伤仍然坚持。经过一天一夜的说服动员，两派终于停止武斗，撤出现场。十二月四日，六安地区两派群众在上街游行过程中发生冲突，炮兵第三一五团指挥连、重炮营、榴炮营和师直喷火连的干部战士立即赶到现场，耐心劝解，平息了武斗。

师史在“收交武斗凶器，动员恢复生产”一节中称：

武斗歪风刹住后，我师组织三支两军人员深入到严重对立的两派群众中去耐心说服，还派人带上逃离到寿县、凤台、长丰、合肥、蚌埠、南京、上海等地的部分群众工资、衣物，逐个做工作，动员他们回城。同时组织力量，发动群众，收缴各种武斗凶器。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到十七日，在淮

南共收缴各种枪支五千余支、土炮二十七门、迫击炮四门、土坦克三辆、子弹十二万八千余发、手榴弹一百四十二枚、炸药一百九十公斤、雷管七百六十三个，及其它凶器六百余件。

“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淮南、六安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淮南煤炭生产由过去日产二万五千吨下降到日产二、三千吨，严重影响了华东地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为恢复生产，我师派出干部战士深入到生产第一线，边宣传，边劳动。师团领导带领机关、部队下到矿井和煤矿工人一起采煤。广大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为多生产煤炭而日夜苦战。第一〇〇团二机连战士汪福林在参加夺煤大战中遇到塌方，他临危不惧，为抢救一名老矿工脱险而牺牲，被师党委追记二等功。指战员的行动，赢得了群众赞扬，对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作用。

九月六日，毛主席邀请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淮南。当代表团在李先念副总理陪同下来到时，受到了淮南市的热烈欢迎。代表团和李副总理听了我们师关于淮南情况的介绍，参观访问了谢三矿。

在“完成护路任务，‘三支两军’结束”一节中称：

由于武斗，津浦线上时常发生炸桥断路，抢劫列车，造成交通中断，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一九六八年二月初，我师第一〇〇团（配属第一〇一团一营、第一〇二团八、九两个连）奉命执行护路任务。

二月五晚，第一〇〇团团长吕全金、政治处主任孙燕生率领全团及配属部队，在军区汽车第三十二团的配合下，由淮南出发，经宿县、符离集至夹沟地区；配属行动的第一〇一团一营在副团长秦成新率领下，由江苏淮安范集农场出发，乘汽车经宿县至符离集。护路护桥，捕捉不法分子。

任务完成后，第一〇〇团、第一〇二团八、九两个连返回淮南市，第一〇一团一营返回淮安范集农场。<sup>【1143】</sup>

#### （四）第三十五师在芜湖、安庆两专区和马鞍山市

8月9日，第三十五师（欠第一〇五团，该团留苏北陈家港担负守备任务）抵达芜湖、安庆和马鞍山地区。师指挥机关迁至芜湖市，代号改为南字130部队。步兵第一〇三团（代号南字131部队）进驻安庆市，步兵第一〇四团（代号南字132部队）进驻马鞍山市。第三十五师负责芜湖、安庆两专区和马鞍山市的三支两军，

【1143】 陆军第三十四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四师军史》，1983年6月，页255-258。

并抽调少数人员去池州和徽州地区。12月，芜湖专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由三十五师政委于永贤和芜湖军分区代理司令员王均分别担任正副主任。

#### （五）促进两派联合的努力

8月9日，在十二军主持下，P、G两派达成协议。协议称，“从9日晚8时起，任何一方不得开枪，不得首先进攻对方，谁先挑起武斗，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应由谁负完全责任。”惟实际上两派仍严重对立，武斗不断。

9月5日，康生、江青在接见安徽双方赴京代表团时作了讲话。康生称，“我再讲一讲，有些群众组织对国防军的态度问题，党中央相信六四〇八部队能够搞好安徽的支左工作，领导好安徽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相信六四〇八部队，相信六四五三部队，相信一二一部队，相信省军区绝大多数同志，特别是六四〇八部队，去了不久，就起了很好的作用，六四〇八部队已经去了，而且还要增加，还要再去，（众呼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组织，特别是好派的组织，要紧紧跟上，掌握这个大方向，丝毫不能怀疑，一点也不能动摇，稍为动摇，就要犯错误，甚至至犯方向错误。”

9月20日，安徽P、G两派赴京代表召开首次联合会议，在李德生支持下，双方代表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旧账不记，老账不算，责任不追”，在此基础上双方代表考虑联合。

9月23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的通知。

李德生回忆称，“这时安徽两派对立的气氛已大为缓和，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取得明显效果。我们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了两派思想情绪的基础上，认为实施解决安徽问题的第二步，即实现两派联合的条件已经成熟。军管会提出两派联合开会，两派不但同意开会，还主动提出倒旗联合、并肩游行。9月19日两派组成了大联合委员会，在省‘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军参谋长林有声的主持下，安徽省军区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周密的组织准备，9月20日，两派各组织10万人，共20万人，在合肥市省体育场，召开了‘拥军爱民’群众大会，会后两派并肩在市内游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这一活动，军队没派一个连、一个人参加，两派群众自己组织得很好，说明消除派性、实现联合的思想基础比较好，条件是成熟的。省军管会通过省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两派联合的大会报道和两派群众并肩游行的照片。周总理知道后，让我将这天的报纸，加印20万份，派人乘飞机送北京，由中央分发全国，推广安徽做法。”<sup>〔1144〕</sup>

〔1144〕《李德生回忆录》，页358-359。

10月10日，由十二军直接负责三支两军的合肥、淮南、安庆、芜湖、蚌埠、马鞍山、六安等七地、市赴京汇报代表团、在周恩来主持下达成《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两派立即解散所有武斗组织，实现大联合。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安徽省（地、市）的代理人。

### 三、十二军主皖：从省军管会改组到省革委会成立前后

9月17日，安徽省军区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二师，划归第十二军代管。<sup>【1145】</sup>

根据中央关于安徽的支左工作应以十二军为主的精神，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提出安徽省军管会应作相应改组的建议，并且提出省军管会改组的人选。10月26日，中央批示：同意安徽省军管会作相应的改组，由李德生、张文碧、李长林、宋佩璋、林有声、李宝奇、廖成美、杨广立<sup>【1146】</sup>和安徽省军区一名（暂缺）组成改组后的新的军管会。省军管会由李德生为主任委员，张文碧、廖成美、杨广立为副主任委员。省军管会改组以后，担负整个安徽省的支左任务。

11月11日，李德生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张文碧任省军区政委。

1967年底至1968年初，据李德生称，“从这时起，全省各地两派联合的速度加快，我们也加快了解决安徽问题的步伐，即进入第三步，酝酿‘三结合’，成立革委会。‘三结合’的难点是解放干部。进行这项工作，对于军队来说，不存在什么阻力，12军到安徽后，没有打倒一个地方干部，关键是一些群众组织认为，解放干部是否定他们的成绩，‘前功尽弃’，又担心干部会报复他们。有的地区为了解放一个干部，一直争论不休。如果一个一个地解决，进展肯定很慢，我们决定在合肥举行‘万人学习班’，重点解决这个最突出的矛盾，把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解放出来。群众组织联合后，两派最关心的是本派中，谁能进入革委会，对方进了几个，哪些干部进革委会？等等，这是保持局势稳定的关键步骤，也是最容易引发派性斗争的时候。我们将全省各地、市、县的三方人员全部集中到省里来。让省里的有关头头分别解决各自的矛盾。这一措施，起到很好的作用。”<sup>【1147】</sup>

1968年3月15日，马鞍山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三十五师副师长狄循任主任。这是安徽第一个地专、市级革委会。

【1145】1969年11月，归建安徽省军区。

【1146】廖成美，原安徽省军管会副主任，1955年授衔少将。杨广立，原安徽省军管会副主任，1964年晋升少将。

【1147】《李德生回忆录》，页360。

3月24日，经南京军区和省军管会批准，铜陵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后勤十四分部副政委张翹任主任。

3月26日，经省军管会批准，淮南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由第三十四师师长张季伦任主任。

4月16日，六安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三十四师副师长张双春任主任。

4月18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李德生任主任，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杨效椿、徐文成、张秀英、张家云任副主任。<sup>【1148】</sup>省革委会常委39名，其中军队干部七名，除李德生、廖成美、宋佩璋外，其余四人为程业棠（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sup>【1149】</sup>、娄学政（十二军原参谋长）、熊玉坤（巢湖军分区第二政委）及李康（空军蚌埠基地政治部主任）。

4月18日，合肥市革命委员会与省革委会同时正式成立，由十二军工区主任李全贵任主任。同日，经南京军区党委批准，巢湖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熊玉坤任主任。

5月1日，蚌埠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三十一师师长成冲霄任主任。同日，宿县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三十一师副政委平昌喜任主任。同日，芜湖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三十五师政委于永贤任主任。

6月26日，芜湖事件爆发。据李德生回忆称，“从6月26日开始，有四五百人冲击驻芜湖部队的领导机关。27日全面抢枪，殴打解放军，两派群众分别占领制高点，将部队分别包围。28日，打死解放军司机一名。29日，冲击电台，砸开监狱，放走犯人。以后，又冲击海军驻芜湖机关，抢走机密海图。还先后聚集2000多人，冲击空军雷达站和导航台。我们派省‘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军参谋长林有声带工作组去做工作，那些闹事者根本不听劝阻，而且不让工作组接近，继续冲击部队和抢枪。一周内共抢走各种枪支800多支，子弹、炮弹近10万发，抢走和砸毁汽车34辆。部队1,300多名干部、战士被打，其中被打伤200多人。驻芜湖部队的所有大小单位基本都遭到砸抢。”<sup>【1150】</sup>

驻芜湖第三十五师急电请示处理办法。李德生接报后首先严令部队绝不准向群众开枪。考虑到芜湖驻军已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李决定亲到芜湖去解决。李到

【1148】李任之，原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效椿，原中共安徽省常委。徐文成，工人，原合肥钢厂废钢科党支部副书记。张秀英，女，安徽纺织厂工人。张家云，女，六安寿县戈店公社社员。

【1149】程业棠，1955年授衔少将。

【1150】《李德生回忆录》，页362。

芜湖后，有的组织武斗行动有所收敛，有的反而更加活跃，而有一派最好斗的组织头头，竟提出一个“强硬要求”，称要李军长亲自接见，只要军长一个人来，不准任何人同行。

李德生决定“单刀赴会”，上到该武斗据点二楼去做工作。李德生回忆称，“我的吉普车开到楼底下了，同行的干部看到这种架势，更不让我上去，我不听他们的劝阻，要警卫员王楚林喊他们把梯子放下来，那些武斗头头原估计我不会答应前往，想提些苛刻条件。他们作了错误的判断，没想到我真的去了，而且同意一个人上去。一时间搞得他们手忙脚乱，不得不放下梯子。我沿着竹梯，到了窗口，他们赶忙将我连拉带扶，从窗户翻进屋里。我的警卫员也跟了上来。这时我倒变得很主动，而他们却被动缺理了。我上去坐下后，很严厉地批评他们抢枪搞武斗、违反中央规定的行为。他们没有什么理好讲，只好说当地驻军有偏向，使他们受压，向我诉起苦来。我对他们说，如果对部队有意见，可以坐下来谈，部队真有错误、缺点，可以改正嘛，怎么能抢枪、武斗、冲击部队呢！你们现在先要交出武器，承认冲击部队、抢枪的错误，再坐下来讨论问题。经过我的批评、教育，他们表示：‘我们听李军长的，愿意交出抢夺的武器。’我看他们有认错的表现，原来一些挥舞枪支的人，也悄悄地将枪藏到身后了，我就表扬他们知错能改，改了就好。随后，由他们带着‘参观’了他们的据点。我边看边批评他们的行为造成工厂不能生产，学生上不了课，市民无法过正常生活的严重后果。他们无理可说、不再申辩，都一一认帐。在据点里转了一圈，我又从窗口竹梯上下到地面。他们向我告别，还喊：‘我们听李军长的！’第二天，他们就开始交枪。”“接着一两天内，我带着工作人员，查看了一个个最突出的武斗据点。……有一次我在途中，遇到两派正在武斗，有的同志提出绕道走，避免无谓伤害，我说不行，必须前去制止。随行的同志说让他们去，要我留在车里，我告诉他们，在这种时候，最需要我去。我就叫警卫员将吉普车的帆布篷推到车后，让车子敞开来，我站在车上，举着喇叭，要求两派停止武斗。当他们认出是我，都感到十分惊讶，没想到我会在这个时候出现，更没有想到会在这样武斗的现场来讲话，两派都停止了武斗，围在我汽车旁边听我对他们讲话。”<sup>【1151】</sup>

在紧接着到来的全省性舆论和强大的宣传队伍双重压迫之下，未动一枪一弹，使芜湖的形势迅速改观。7月27日，安徽省革委会和十二军党委联名向毛泽东、林彪、中央并南京军区报送了《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毛泽东阅后，以中央名义批转全国。

【1151】《李德生回忆录》，页365-367。

7月2日，阜阳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安徽省军区独立第一师政委苗扶中任主任。7月10日，徽州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军队干部龙安任主任。7月16日，滁县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坦克第九师政委包可悦任主任。7月21日，池州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军队干部高英任主任。8月18日，濉溪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二〇三师副政委赵鹏程任主任。8月23日，安庆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三十五师副政委张友复任主任。至此，安徽14个地专、市一级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第一把手均为军队干部。其中由十二军（包括代管的独立一师）干部任第一把手的地专、市共9个，占64%。

十二军支左的经验得到毛泽东的赞赏。1968年9月，李德生被提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仍保留十二军军长及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职务。10月，列席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会议开幕那一天，毛泽东表扬李德生称，“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整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复杂了。”毛问李：“你们是怎么搞的啊？”李答：“就是大造舆论。”毛笑了之后认真地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sup>【1152】</sup>半年后，1969年4月，李德生被毛有意破格安排为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央军委委员。他的四方面军背景，使之成为毛着意插进军队高层中几近一方面军——四野一统天下的一个楔子。

## 第五十二节 江西：野战部队入赣

### 一、毛对江西省军区不满

1967年1月江西省军区介入地方支左时，军区负责人为：司令员吴瑞山，政委方志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兼，第二政委林忠照，副司令员倪南山、胡定千、罗元炘、李国良，副政委陈浩、邹日晴，参谋长杨上堃，政治部主任殷及夫。下辖南昌、宜春、九江、抚州、上饶、吉安、赣州7个军分区和景德镇市人武部，及江西省军区独立师。独立师师部位南昌市，代号6797部队，1966年7月由江西省公安总队改编而成，辖步兵第一、二、三团，为一小师。师长陈昌奉，政委李志杰。<sup>【1153】</sup>

【1152】《李德生回忆录》，页373。

【1153】吴瑞山、林忠照、倪南山、胡定千，1955年授衔少将。罗元炘，1964年晋升少将。李国良，1961年晋升少将。陈浩、邹日晴、殷及夫、陈昌奉、李志杰，1965年大校军衔。

1月26日，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发表夺权通告，宣布自当日下午四时起，夺了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委的一切大权。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到会讲话，对夺权表示支持，并承认“前省委烂掉了，是修正主义司令部”。江西夺权并未得到中央承认，后省军区以“中央未表态”为由，否定了这次夺权。<sup>【1154】</sup>

2月4日，省、市造反派和和各省赴赣串连的红卫兵，驻省、市人民解放军十万余人，在南昌市人民广场举行“造八一建军节反”大会。大会发布“造反声明”，否定八一南昌起义，公开宣布彻底砸烂八一起义纪念馆、改变一切以“八一”命名的街道、公园、商店的名称。5日，《江西日报》刊出《彻底摧毁八一建军节》的社论。<sup>【1155】</sup>

2月8日，省、市造反派十万余人召开批斗方志纯大会。吴瑞山出席并代表省军区讲话。因大会对方志纯等施用挂牌、下跪等体罚，省军区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否定了这次大会。4月23日，省、市造反派再次召开批斗方志纯大会，省军区拒绝邀请，没有派代表参加。<sup>【1156】</sup>

3月14日，省军区在省体育馆举行万人大会<sup>【1157】</sup>，副参谋长周子韬作《关于南昌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报告》，重申串联人员立即返回原地和解散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提出要对造反派进行整风。该报告经录音复制，分发到全省各军分区、人武部。

3月15日，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率领工作组到达南昌，帮助指导江西文革。工作组其后陆续取缔了一些造反组织。<sup>【1158】</sup>

4月20日，省、市造反派举行“彻底批判周子韬‘三一四’黑报告大会”。省军区拒绝派代表参加。刘瑞森代表郭光洲、黄先等七人发言，指周子韬的报告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痛加批判，指出江西省军区某些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吴瑞山、林忠照自此次大会后在全省各地掀起一个“反刘（瑞森）高潮”。<sup>【1159】</sup>

---

【1154】 参见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斗批改办公室整理：《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5.9-1967.8）》，1967年8月，页48。

【1155】 《当代江西五十年》页236。

【1156】 《当代江西五十年》页236。

【1157】 《当代江西五十年》称为十万人大会，据《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为万人大会，从后者说。

【1158】 《当代江西五十年》页237。刘培善，1955年授衔中将。

【1159】 参见《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5.9-1967.8）》，页60-61。刘瑞森，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郭光洲、黄先，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4月29日，刘培善、吴瑞山去福州汇报江西文革情况。福州军区党委根据汇报作出指示：①江西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②《十个为什么》打中了要害，必要时可公开点刘瑞森的名；③当前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是一股反革命逆流，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搞起来的，要顶住，不开枪就好办；④要注意巩固部队，注意防止内部坏人跳出来；⑤平反工作要抓紧，越抓紧越主动。<sup>【1160】</sup>

5月15日-21日，江西省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刘培善、林忠照否定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有方向路线错误，称周子韬3月14日报告“基本精神是好的”，称造反派“他们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想把解放军整垮”，“这是逆流的表现”。<sup>【1161】</sup>

5月24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5月20日编印的《快报》第2213号登载的《江西军区和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为何愈演愈烈》一文，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小组阅后，交汪东兴阅。江西军区某些同志对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军区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对，都值得研究。”<sup>【1162】</sup>

5月30日，周恩来电告江西省军区传达毛泽东5月24日对江西问题的批示。迫于压力，6月2日，吴瑞山代表省军区被迫签字接受造反派组织新洪都反逆流联络站在4月13日向军区党委提出的“五项要求”。<sup>【1163】</sup>6月7日，在人民广场举行的大会上向造反派作检查。刘培善、吴瑞山、林忠照坚持不承认支左工作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被造反派绑架，于6月11日被押送到北京，“交给中央处理”。<sup>【1164】</sup>

6月13日，刘培善等在北京拍电报给省军区党委，要求责成各军分区、武装部认真贯彻执行中央6月6日通令，采取果断措施，制止武斗事件的发生。从五月底开始，江西发生多次武斗事件，至12日已重伤1,200余人，死亡十人。农民也已进城参加武斗，武斗规模呈扩大、升级之势。6月20日，周恩来在京接见

【1160】《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5.9-1967.8）》，页62。

【1161】参见《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5.9-1967.8）》，页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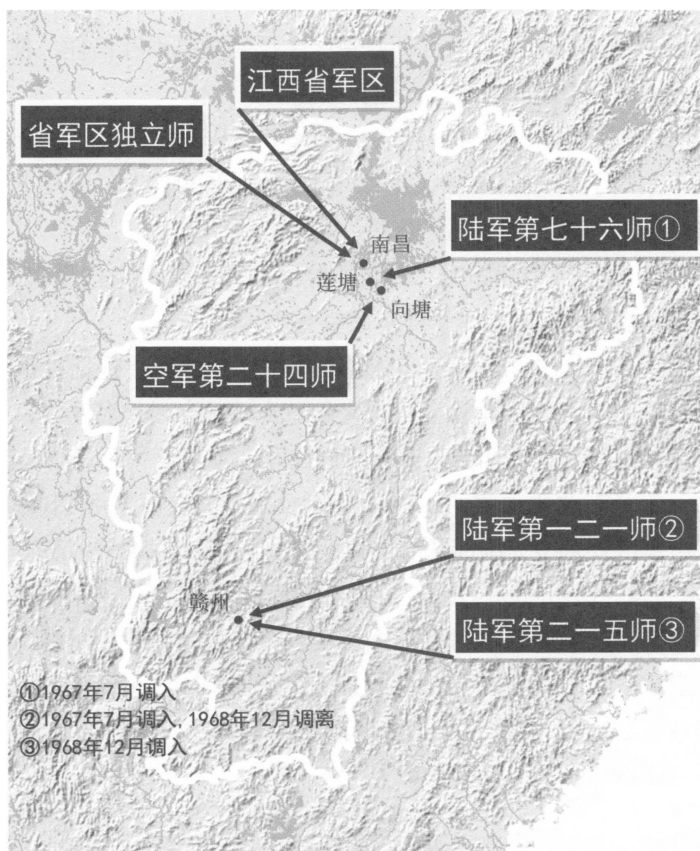
【116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86。《当代江西五十年》页240称，周恩来电告江西省军区传达毛泽东这段批示为，“江西军区与群众对立情绪为什么愈演愈烈，江西军区某些负责人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我很不赞成这种态度。”《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5.9-1967.8）》页69则为“江西省军区与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为什么愈演愈烈，江西省军区吴瑞山等负责人对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我是很不赞成这种态度。”本书从《毛泽东年谱》说。

【1163】“五项要求”要点为：要求交出周子韬“三—四”报告底稿，接受全省造反派审查批判；立即召开万人大会，就军区党委前阶段错误作出深刻检查；取消非法取缔革命群众组织的取缔令、并予以公开平反；各条要求在4月20日前兑现。

【1164】《当代江西五十年》页240。

刘培善、吴瑞山，对江西作出六点指示：不要上街游行；不准武斗；不准乱抓人；不准扰乱铁路运输、车运、航运；农民不准进城搞武斗；不准开枪、夺枪。6月28日，江西农学院造反派与南昌莲塘联络总站发生武斗。6月29日凌晨，省大联筹<sup>【1165】</sup>从省军区所属部队抢夺枪支弹药，组织六批数千人前往莲塘增援造反派，造成死伤数百人的严重流血事件，赣州等地也同时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6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致电江西省军区转省大联筹，令其立即停止夺枪的错误行动，退出军事机关，并将枪支弹药退还军区，返回原驻地，听候中央派员处理。并称，“我们已命令江西军区不许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如果双方任何一方不这样做，不听中央的话，就要犯极严重的错误。”<sup>【1166】</sup>

### 江西驻军分布图(1967-1968)



【1165】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的简称，于6月1日在南昌市正式成立。

【1166】参见《当代江西五十年》页240-241。

## 二、野战部队奉命入赣

6月30日晚十二时至7月1日凌晨三时，周恩来、康生、萧华、张春桥、戚本禹第二次单独接见江西造反派赴京控告团部分代表时，周恩来称，“军区可以承认错误，军分区、武装部也不一定听，他们现在已控制不住了。你们反映的问题，我们在查，死的人不但要抚恤，而且军区要负责任，军分区、武装部责任就更大了。”当代表谈到军区负责人转到地下找不到时，周就问：“你们跟江西军区负责人哪几个接触比较多？你们认为哪几个比较好讲话的？哪几个比较坏？”代表们称：“陈昌奉同志比较好，6月7日开会时，有些战士不明真相，要去冲会场，陈昌奉同志拦车，差一点被压死。”周连连点头称：“我认得，长征时我们很熟。”代表又说：“还有罗元炘同志，他也是靠近造反派的，但他现在已经没有实权了。”周称：“那没有关系。”<sup>[1167]</sup>

周恩来的讲话表明，中央对江西省军区主要领导已不存信任，使用中央可以掌控的军事力量以解决江西问题，已迫在眉睫。

7月以前，在江西境内的野战部队，仅有年初从浙江调入的一个步兵团，即南京军区陆军第二十军步兵第一八〇团。该团代号6300部队，于3月3日奉命入赣，进驻鹰潭地区，担负防空降、防暴乱任务。

此外，还有空军一个师即空二十四师驻江西境内。该师代号7294部队，师部位南昌市郊向塘基地。师长王子祥，政委鲁鸣。

7月3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林彪，汇报江西情况。提请批准调二十六军一个师进驻江西支左和加强军管会及未来的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次日，毛泽东批：调一个师问题，待江西会议开得有了眉目再定为宜。<sup>[1168]</sup>

两天后，毛泽东改变主意。7月6日，毛阅军委办公厅7月4日编印的反映江西赣州武斗严重，要求中央派部队前往制止的《群众来信摘抄》第55号，批示：“林彪、恩来同志：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当天深夜，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已与黄永胜通了电话，他可以调两个团，一个师部驻赣州。”次日，毛泽东批示：“退总理。”<sup>[1169]</sup>

【1167】江西农学院文革筹委会材料组编印：《最大关怀，最大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材料汇编》，1967年9月，页10。陈昌奉、罗元炘随后在8月均为江西省革委会筹备组成员。

【116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68。

【116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97。

以上官方资料表明，在7月6日或之前，中央已决定调陆军第二十六军一个野战陆军师，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地区的三支两军。7月6日，毛、周又决定由广州军区调一个野战陆军师师部及部分部队，管赣南地区的三支两军。

7月9日，根据周恩来指示，广州军区命令：陆军第一二一师组成一个精干的指挥所，率步兵第三六二、第三六三团，于7月16日开赴江西赣州执行支左任务，部队到江西后，政治思想工作及行政管理、供给等归广州军区领导，支左工作归江西省军区领导。7月11日，根据总参谋部指示，广州军区令陆军第一二一师师长张序登等人去北京接受关于江西支左的任务。周恩来等和总参首长接见并作了指示。<sup>〔1170〕</sup>

7月16日，陆军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一师师部（6810部队），率所辖步兵第三六二团（6812部队）、第三六三团（6813部队），由师长张序登、政委于厚德率领，从广东粤东地区调驻江西赣州、吉安地区。入赣后，上述师、团代号不变。该师师史称，“1967年7月，我362团派往江西吉安，363团被派往江西赣州‘支左’。当时的吉安、赣州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派系斗争严重，仅赣州的‘六二九’事件，就屠杀268人，重伤千余人，关押上万人。我部进驻后，立即展开工作。首先是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劝说农民回乡生产，安定社会秩序；其次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广大受蒙蔽群众，孤立坏分子；再次是努力做好善后工作，掩埋死者，抚恤家属，接待群众，调查两派情况，协助分区独立分队抓革命、促生产，恢复交通运输，开展拥政爱民活动。还组织了300多人的工作队，深入各县调查研究建立县一级领导班子。很快就平息了动乱局面，恢复了生产，受到了上级的表扬。1967年10月10日，广州军区向我师驻江西支左部队发出贺电。”<sup>〔1171〕</sup>

7月16日，济南军区陆军第二十六军第七十六师师部（6011部队），率所辖步兵二二六团（6012部队）、第二二七团（6013部队）、第二二八团（欠二营，6014部队），由二十六军副军长杨栋梁及该师师长张元和、政委许洪云率领，赴江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sup>〔1172〕</sup>7月19日，师部率第二二六团抵达南昌县莲塘（师部后

〔1170〕 广州军区司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军事工作大事记》，1995年，页298-299。

〔1171〕 步兵第121师师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21师师史（1937-1997）》，1997年，页193。第一二一师1968年12月离赣归建。广州军区陆军第五十五军第二一五师进驻江西接替一二一师的三支两军任务。师部（代号改0484部队）率步兵第六四三团、六四四团进驻赣州地区；步兵第六四五团、炮兵第五四四团进驻吉安地区。1969年10月奉命划归福州军区建制，受江西省军区领导指挥。1975年4月划归陆军第二十九军建制，并进驻上饶、鹰潭地区。

〔1172〕 杨栋梁、张元和，1965年大校军衔。

驻青云谱省军区第一干休所，二二六团驻南昌市省财校)。第二二七团位宜春，第二二八团(欠二营)位九江。1968年5月底，所辖炮兵第二五六团(6015部队)归建，进驻新建县望城岗原福州军区步校。入赣后，上述师、团代号不变。第二十六集团军军史称，“6月，军委命令我第76师赴江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该师(欠炮团、坦克团、第228团2营)于7月16日从莱阳、马格庄站乘火车开进，7月22日全部到达指定地点。全师分布于南昌、青云谱、宜春、九江等5市、3专区、36个县、261个厂矿企业。部队广大干战在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情况极为复杂、斗争极为激烈的情况下，坚持‘四不’政策，为制止武斗，稳定局势，恢复生产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制止武斗中，坚决执行上级关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规定，坚持说服教育，有的同志不幸牺牲。”“8月19日，第226团6连4排护送南昌县蒋巷区部分学生和群众回乡。途中横渡赣江，行船遇险，危急时刻，4排舍生忘死进行抢救，同当地群众一起救起50多人。抢救中，排长李文忠、副班长李从全、战士陈佃奎英勇牺牲。”“10月26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4排以‘支左爱民模范排’和排长李文忠以‘支左爱民模范’荣誉称号，号召全军向他们学习。”<sup>【1173】</sup>

除上述两师外，7月中旬，步兵第一八〇团奉命负责上饶地区及景德镇市的三支两军。<sup>【1174】</sup>

时江西辖南昌、景德镇两省辖市及六专区。综上所述，入赣野战部队部署为：第七十六师负责南昌市、宜春(包括萍乡市)、九江(包括九江市)、抚州专区；第一二一师负责吉安(包括吉安市)、赣州(包括赣州市)专区；第一八〇团负责景德镇市及上饶(包括上饶市、鹰潭镇)专区。

### 三、程世清赴京受命

7月31日，驻守于胶东半岛、领率机关位于烟台市的陆军第二十六军政委程世清<sup>【1175】</sup>，受命赴京，接受调任江西三支两军第一把手的重任。

程世清晚年回忆称：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午七时半，从济南打来电话，说是杨得志司令员要同我讲话。我拿起听筒，一听声音就听出是杨司令员。他说：“刚才接到

【1173】 陆军第二十六集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六集团军军史》，1989年，页355。  
第七十六师1969年10月奉命划归福州军区建制，受江西省军区领导指挥。1969年12月改称第八十八师，1975年4月划归陆军第二十九军建制，调离江西。

【1174】 步兵第一八〇团1971年3月奉命离赣归建。

【1175】 程世清，1955年授衔少将。

总理电话，要你立即到北京去，中央决定你到江西去工作。目前，江西形势很乱，由你带七十六师到江西。”我说：“不是已确定杨栋梁同志去了吗？”他说：“你到江西就在那里工作，杨去‘支左’，待形势好转后，再同部队一道回来。”我请示说：“‘支左’是一定要去的。到江西工作，恐怕搞不了。请您向总理提一下好吗？”司令员说：“现在这个时候，跟打仗一样，还提什么意见呢！”我回答说：“坚决执行命令。”接着他说：“下午有一架飞机到烟台接你。”我说：“那好，我马上回烟台，再见！”<sup>【1176】</sup>

……

下午两点半，一架专机飞到了烟台机场。我只带一个警卫员和一个旅行袋走上了飞机。

我们的飞机下午四点三十分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杨栋梁同志和秘书王鹤寿同志来接我们，住进了京西宾馆。

当天夜里，杨栋梁同志介绍了江西情况，武斗在全省正盛行，南昌同各地市、县城乡处于隔绝状态，两派仍严重对立。部队（七十六师）已于六月末由杨率部到达江西南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sup>【1177】</sup>师部和二二六团驻南昌西郊，二二七团驻九江，二二八团驻宜春、萍乡。广州的一二一师正在开赴江西途中，他们准备驻在赣南。杨栋梁那里有一部电话，可直接同南昌师部联系。杨说：“周总理直接领导江西的文化大革命，指示及时具体。总理对江西情况了如指掌，事情好办。”

大约是八月七、八日晚，由总理主持召开了一个解决江西领导问题的会议。到会的有总政的萧华主任、福州大区的刘培善政委、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江西省军区的吴瑞山，还有广州军区的黄永胜同志，再就是我和杨栋梁同志。

总理指示说：“毛主席、党中央非常关心江西问题。首先要解决领导问题，中央决定：成立江西革筹小组，改组江西省军区。并决定程世清同志为革筹小组组长，党的核心小组长，主持全省工作。程世清为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司令和政委。江西两个支左师、原江西独立师统属于省军区领导。革筹小组是……（略），中央正在起草一份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

总理指示后，我向总理请示说：“我提点意见好吗？”总理说：“好哇！”

【1176】二十六军负责烟台地区的三支两军，程世清时在莱阳处理当地文革运动的问题。

【1177】据二十六集团军军史：七十六师于7月16日从莱阳、马格庄站乘火车开进，7月22日全部到达指定地点。

我说：“一、我当省军区政委，不兼司令员，由杨栋梁同志任司令员；二、调廿六军廿五师政委文道宏同志任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三、由济南军区从洛阳步校调三十名干部去江西‘支左’；四、我在二十六军的秘书调给我。”

我提了这四点意见后，总理说：“不当司令，真有不愿当官的开明人士。你这四点意见，我都同意。”总理接着指示：“请杨得志司令员办，今晚即打个电话给济南。”

江西革筹小组于第二天，即在京西宾馆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传达了总理指示和中央的决定。初步地研究了江西形势和问题。

以后几天，我们又多次去江西造反派在京住地了解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

当时革筹小组成员：杨栋梁、文道宏、陈昌奉、罗元炘、刘瑞森、黄先、郭光洲、万里浪和我九人组成。核心小组，除万里浪外，都是核心小组成员，因为万不是党员。<sup>【1178】</sup>

八月十七日上午，我们带着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乘飞机离京，机上革筹小组成员大家心情激动，喜笑颜开，都在想：走上新的征途，接受新的考验，如何解决江西的具体问题，担子极重。

在飞机上，万里浪曾多次向我提出：革筹小组到南昌后，不要住在省军区，那里不安全又没有住处，要我们住到洪都机械厂<sup>【1179】</sup>的招待所，说那里既安全，设备也好。我严词加以拒绝，我看出他别有用心，后来的种种事实表明，他是想控制革筹小组为他们服务，我对他的警惕是正确的。<sup>【1180】</sup>

#### 四、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及抚州事件

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其中第一至第三条称：

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并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切断交通。例如：在南昌，军分区某些人大发枪弹给保守派（联络总站），打死打伤大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在

【1178】据《当代江西五十年》：省革筹小组九名成员为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黄先、郭光洲、刘瑞森、鲁鸣、罗元炘、陈昌奉。万里浪（国营洪都机械厂工人，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负责人）并非省革筹成员。

【1179】三机部320厂的对外第二厂名。

【1180】程世清：《程世清回忆录》，未刊稿。

赣州，军分区个别领导人支持了保守派，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进行了武装镇压。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同志为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同志为江西军区司令员，并调文道宏同志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军区吴瑞山等同志，应对所犯错误向革命群众作认真的检讨。<sup>【1181】</sup>

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正陆续进驻江西各地。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关怀。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各群众组织和广大群众，高举拥军的旗帜，坚决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协助他们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坚决揭露的制止保守组织中个别头头煽动攻击、殴打、绑架我支左部队指战员的错误行为。军区及军分区广大指战员，应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革命利益为重，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主动地同进驻江西的兄弟部队紧密合作。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检查和改正了就好。要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

中央决定着成立以程世清同志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名单由各方面协商产生，报中央批准。杨栋梁、文道宏、鲁鸣、罗元炘、陈昌奉等同志，以及黄先、刘瑞森、郭光洲等同志，可先参加筹备小组，并开始工作。筹备小组统一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并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准备条件。

第六条前所未有地特别提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

（六）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目前首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研究实行。革命的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左派群众的强大力量。今后，军分区、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sup>【1182】</sup>

【1181】江西省军区1967年8月改组后，司令员杨栋梁，政委程世清，副政委增加文道宏（兼政治部主任）。除吴瑞山、方志纯、林忠照、殷及夫免职外，其余未有变化。

【118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三集，1967年9月，页185-191。



即便是中央的决定，在江西一些地区，还是遭到了顽强的抗拒，甚至武装抵制。8月下旬，发生抚州事件。据程世清回忆称：

省革筹小组奉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到江西才五天，即八月二十一日，以抚州军分区司令员夏绍林<sup>【1183】</sup>为首的一小部人煽动抚州七二一铀矿近两千人，武装向南昌市进攻。二十一日上午，他们占领了离南昌市三十多公里的温家圳大铁桥。

八月二十二日，我亲自打电话找夏绍林讲话，他两次不接电话。最后，在晚上又一次找他讲话，他才拿起听筒，我向他讲了五条：一、我们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你们是知道的；二、你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进攻南昌呢？！三、限你们于二十三日上午，将全部部队撤回抚州；四、我们派到抚州去的侦察班，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五、你们要作检讨，送来南昌。夏回答说：“你们是什么人？我们还要看。进攻南昌，我不知道。撤回部队，我管不了。”他把电话一放不说了。

二十四日综合情况如下：一、温家圳战斗激烈，互有伤亡。南昌群情激昂，纷纷涌上温家圳的公路上，要求全力出击，革筹小组门口，人山人海。二、南昌又发生抢枪，部分警卫连队的武器被抢一空。三、南昌社会秩序极端混乱，又开始打砸抢，汽车被抢一空。四、二十四日派去抚州上空散发中央文件和省革筹小组告抚州军民书的飞机，被地面击伤。

革筹小组到江西才六天，为什么会出现抚州这样的问题呢？南昌的混乱是抚州问题引起的。革筹小组每天二十多个小时在紧张地工作。

二十四日下午三时许，有三个穿军装的手持短枪的人，撞进我的住房。一进房门，连开三枪。声言：如果不派部队去温家圳增援，就要冲击革筹小组并赶走革筹小组。我一面向他们说明情况和政策，同时，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这种恶劣行为。我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他们不敢说，就溜走了。后来查到是几个战士，就让他们复员了。

我们来到南昌八天八夜没有休息了，饭也吃不下，眼睛都熬红了。我看看室内的温度计已升到零上四十度。打开洗澡间的水龙头，水温足有六十度。洗了一个澡，躺在床上睡着了。起来后，头脑清醒多了，就想起主席说的“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的教导。此时此刻，在江西，在南昌什么是主要矛盾呢？想了很久，想到了是抚州问题。

---

【1183】夏绍林，1965年大校军衔。

抚州，在革筹小组来到南昌后，用武装进攻南昌，做了许多工作，不但不听，反而采取对抗行动：一、击伤散发传单的飞机；二、武装进驻温家圳，打死打伤多人，造成南昌混乱；三、解除了我们派去的七十六师侦察班的武装并扣押了人员。这种行为已大大超出了两派武斗的性质。指挥这种罪恶活动的是抚州军分区的司令员——夏绍林。

这是一种武装叛乱。这是当时对形势分析的结论。

二十五日情况进一步恶化。上午十一时开革筹小组会议，我把上述情况的分析和结论，向大家讲了我的意见，并提出：一、派七十六师一个团进驻抚州。为了避免武装冲突，七十六师团部带两个营沿昌抚公路走，一个营走便道从西边进驻抚州。二、见到抚州武装人员，不准开枪，多做宣传工作，并带好宣传工具（如扩音器等）；万不得已，只准朝天开枪，不准打伤一个人。三、部队到了抚州，不要开枪，多做宣传工作，维护社会秩序，禁止打砸抢。立即派出一个营进驻乐安七二一铀矿，集中武器，防止破坏。四、为了不让南昌市人员进入抚州，由七十六师在昌抚公路温家圳大铁桥处设岗卡，阻止车辆、人员通行。为了防止混乱，准备出一个布告。我说，这样做有三条好处：一、使南昌迅速解围；二、解决了抚州问题，很可能很快解决全省的武斗问题；三、同时解决了七二一铀矿问题，保护了该矿不受损失。如果抚州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全省即可开始收缴武器，形势就会完全改观。最后，我又强调说：“最担心的是开枪问题，要部队进行严格的教育，宁肯自己有伤亡，也不能开枪。”

大家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才能解决江西的问题，一致通过。一边命七十六师积极准备，同时要严加保密。

同时在当日（二十五日）下午三时，我直接向总理汇报了江西的上述情况和省讨论提出的措施。总理听完我汇报后，指示说：“一、完全同意你们对形势的分析和采取的措施。二、这样一举三得，很好。三、无论如何要保护铀矿。四、部队去抚州是做宣传工作的，不是去打仗的，防止开枪死人。部队一开枪，就要死人，就没有理了，要特别注意。五、你们起草的告抚州地区宣言书，我改了几个地方。总理一字一字的把改的地方告诉了我。六、随时向我报告情况。”

二十六日下午四时三十分部队出动。为了防止不出大问题，省革筹小组决定：由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和鲁鸣等负责同志亲自指挥，七十六师师长、副政委同二二六团一同去抚州。十时，我又把部队的位置、任务、应注意事项、

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南昌情况，一一报告了总理。总理指示说：“你们关于解决抚州问题的部署、措施和应注意的问题，我已报告了主席，主席都同意。我再告诉你们两点：一、部队一定不能开枪，主要做宣传工作。二、一定要把夏绍林抓住，不要让他带着电台逃到山区作乱。”我放下听筒后，即把总理指示用摩托车送到杨栋梁同志那里去。

直到二十七日下午，抚州部队行动仍没有消息。部队应在二十七日上午到达抚州。我心里十分焦急。二十七日下午三时，总理打来一次电话问情况，我说：“没有消息，可能是通讯问题，部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我很放心。”总理说：“你有把握那很好，我也放心。”

直到二十八日下午一时，杨栋梁同志从抚州发来第一次电报。电文略称：按计划推迟了行动，原因是夏绍林在沿昌抚公路两侧设有埋伏，在东山一带以机枪封锁路口，在三处顽抗，我方伤亡十七人，亡副连长一人，我未发一枪，即进驻抚州，军分区死一干部，情况待查。抚州秩序良好，商店开始营业。全市未出现打抢现象。我以两个营进驻七二一矿，未发一枪，目前正在集中武器。

我收到这份电报如获至宝，精神和肌肉突然松开了，高兴万分，赶忙打电话给总理。我将上述电文念给总理听，总理一边听，一边说好。总理听完后说：“江西的问题打开了局面，向你们祝贺！我放心了，马上报告主席。”我说再见。<sup>【1184】</sup>

## 五、毛关于江西问题的谈话与省革委会的成立

9月17日，毛泽东南巡途中在南昌听取了江西省革筹小组程世清、杨栋梁、黄先、刘瑞森、郭光洲、陈昌奉等关于江西文革情况的汇报，对江西的工作表示肯定。

毛泽东在谈话中称，“五月底，我写了几句话，给林彪同志、总理，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毛还称：“六、七、八月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当汇报到抚州问题时，毛称：“抚州问题实际是叛乱，是典型之一。说中国没有内战，我看这就是内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还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

【1184】《程世清回忆录》，未刊稿。程世清回忆中关于七十六师部队进入抚州的具体时间，与其他资料有别。一般资料认定为8月24日或25日。

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毛钱。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当汇报到人武部、军分区情况时，毛称：“人武部总是好人多，军分区有很多人受蒙蔽。”“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哪有那么多赵永夫、谭震林？”“你们先把武装部干部训练一下。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古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保的，反对中央对内蒙问题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大闹，都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具，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四十天，都转了，回去还支左不支右，独立营、独立师训一下就转过来了。”<sup>【1185】</sup>

1968年1月5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程世清，副主任杨栋梁、黄先、于厚德、万里浪。主任、副主任五人中，军队代表占三人。常委26名中军队代表占10名，除程世清、杨栋梁、于厚德外，还有文道宏、鲁鸣、罗元炘、陈昌奉、丁士采（福州军区步兵学校政委）、许洪云、李鹏（六十师副师长）。<sup>【1186】</sup>

时江西辖南昌、景德镇2个市和赣州、吉安、抚州、宜春、上饶、九江6个专区。1968年1月成立省革委会后，陆续成立了各市及专区革委会。其中赣州专区革委会由在赣支左的广州军区榆林要塞区副政委刘云任主任；吉安专区（改名井冈山专区）革委会由原吉安地委副书记王士昌任主任；宜春专区革委会由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化东任主任；抚州专区革委会由原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胡惠之任主任；上饶专区革委会由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倪南山任主任；九江地区革委会由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王长川任主任；南昌市革委会由原南昌市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于德馨任主任；景德镇市革委会由原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建华任主任。

以上8个专、市级革委会一把手，地方干部6人竟占75%，军队现役干部2人仅占25%，地方干部所占比例之高，全国罕见。

作为文革期间主政一省、大权独揽的军人，世人对程世清的表现褒贬不一。惟从以上专、市一把手的背景来看，估计人们对程在地方干部解放和使用问题上，还挑不出什么大毛病。不止于此，有论者还客观评述道，对于落难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陈云，“程世清对这两位决定着‘文革’后中国面貌与命运的最重要

---

【1185】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伟大的教导，光辉的真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接见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时的最新最高指示》，1967年9月27日。江西农学院文革筹委会材料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汇编》，1969年9月，页68-70。

【1186】丁士采，1965年大校军衔。

级人物，不但是客气的，而且加以了妥善的保护。”<sup>【1187】</sup>文道宏的秘书武永平告诉笔者：“中央将邓小平、陈云等 286 位老干部疏散到江西，其住所地都是在 76 师的驻防地以内，如邓小平、陈云、童小鹏都在 6012 部队的驻防地：王震、帅孟奇、林默涵、廖沫沙等都在 6013 部队的驻地，他们没有谁受过部队或其他人的批斗或虐待。其中四川、武汉的造反派曾数次来江西要揪斗邓小平，都因程世清明确反对，部队保卫措施得力，其企图未能得逞，武汉的造反派因不听劝阻，还叫程世清下令关了几天，押送出境。”<sup>【1188】</sup>

### 第五十三节 湖南：四十七军主湘<sup>【1189】</sup>

#### 一、以四十七军为首解决湖南问题

1967 年中，湖南两派（工联派与红联派）冲突不断。主持湖南支左工作的湖南省军区及由其主导成立的“驻长沙部队支左领导小组”，被中央认定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失却权威性而未能有效控制局面。7 月 27 日凌晨，周恩来等接见湖南赴京汇报团两派代表。在接见将近结束时，周恩来宣布，中央决定，改以驻湖南的陆军第四十七军为首来解决湖南问题。

第四十七军自 1954 年从朝鲜返国后，即驻防湖南、广西境内。1967 年 7 月，军领率机关位衡阳市南郊黄茶岭，代号 6900 部队。军长黎原，政委缺，副军长刘善福、郑波，副政委李振军，参谋长胡伯华，政治部主任李钦哲。<sup>【1190】</sup>辖陆军第一二七师、第一三九师、第一四〇师、第一四一师共四个师，并直辖炮兵第一五二团、高炮第七十二团。1966 年，全军总人数 53,650 人。<sup>【1191】</sup>

陆军第一二七师，师部位广东省翁源县，代号 6898 部队。1963 年 8 月由广州军区直辖改归第四十七军代管。1964 年 5 月调归第四十七军建制领导。师长马庆功<sup>【1192】</sup>，政委于兴化，副师长王必芝、王恒一、王守勤，副政委王大举、郭

【1187】胡平：《程世清在江西》。《随笔》2009 年第 2 期，页 140-141。

【1188】武永平致笔者函，2001 年 5 月 16 日。

【1189】本节主要资料来源：《黎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 年。李振祥：《四十七军在湖南“三支两军”纪实》，自印本，2004 年。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军史》，1987 年 6 月。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组织史》，1991 年 4 月。

【1190】黎原，1964 年晋升少将。刘善福，1961 年晋升少将。郑波、李振军、李钦哲，1965 年大校军衔。

【1191】据《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组织史》页 221 党员占全军人数比例数据推算。

【1192】马庆功，1965 年大校军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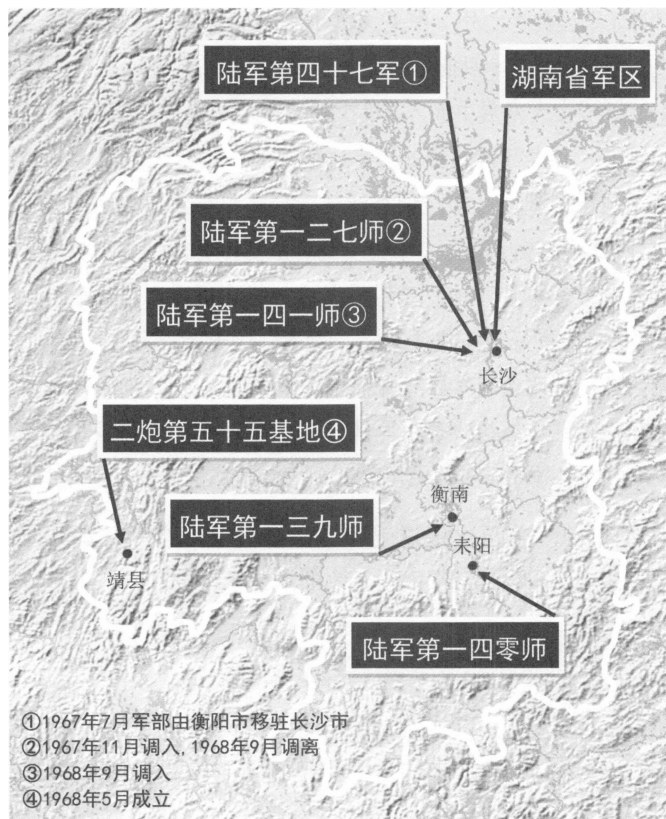
长僧、关光烈（1967年8月任），参谋长马秉臣，政治部主任彭白民。辖步兵第三七九团、第三八〇团、第三八一团及炮兵第五〇七团。

陆军第一三九师，师部位湖南省衡南县，代号 6953 部队。师长朱江，政委王子健，副师长张哲、白二龙、孙涛，副政委王海山，参谋长马伟志，政治部主任王奎贤。辖步兵第四一五团、第四一六团、第四一七团及炮兵第五一九团。

陆军第一四〇师，师部位湖南省耒阳县，代号 6954 部队。师长王金轩，政委蓝天民，副师长孙暮林，副政委杨松实，参谋长李培权，政治部主任温景义。辖步兵第四一八团、第四一九团、第四二〇团，炮兵第五二〇团和坦克第三三三团。

陆军第一四一师，师部位广西桂林市郊奇峰镇，代号 6955 部队。师长陈育才，政委张骥，副师长郝忠云、韩更，副政委赵宝立、桑文重，参谋长任常裕，政治部主任华鲁。辖步兵第四二一团、第四二二团、第四二三团，炮兵第五二一团和坦克独立第九团。

### 湖南驻军分布图(1967-1968)



黎原后来在回忆录中称：“我率领四十七军受命担负湖南的‘三支两军’任务，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也是周总理对我的信任，我决心身挑重担，谦虚、谨慎地进行工作，决不辜负党中央和中央领导的重托。我当即打电话给湖南衡阳的军部，向军里的其他领导同志作了传达。军党委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决定，并确定由副军长郑波带一部分干部战士先到长沙开展工作。同时决定留一三九师继续执行衡阳的支左任务，一四〇师移驻湘潭，一四一师抽调部队到长沙，一二七师抽调一部分干部到株洲执行支左任务。四十七军军部由衡阳移驻长沙。”<sup>【1193】</sup>

8月10日，中央以正式文件下达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决定共四条，其中最重要的头两条称：

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sup>【1194】</sup>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责主要的责任。中央相信，中央和省军区在深刻地检查并认真地改正错误以后，将会赢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sup>【1195】</sup>

该决定在发布前，曾两次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8月4日首次审阅时在第一条中加插了一段话，即“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

【1193】《黎原回忆录》，页330。据《广州军区军事工作大事记》：1967年8月8日，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广州军区命令陆军第四十七军军部从衡阳移驻长沙。

【1194】刘子云，1955年授衔少将。崔琳，1965年大校军衔。

【1195】《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三集，页201-203。华国锋，支持工联派的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章伯森，支持工联派的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湖南省副省长。

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责主要的责任。”8月7日，毛第二次审阅时才批示放行。

决定称要改组省军区，实际上延至半年后的1968年2月才实施。决定最重要的功能，其实在于要树立以黎原为首的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权威。

黎原称，“12日晚9时22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湖南赴京汇报代表团全体人员，公布中央《决定》。……总理逐条宣读，边读边解释。他说：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总理还进一步解释说：中央经多次研究认为，四十七军一定能够领导好湖南的‘三支两军’，黎原军长也一定能组织领导好‘省革筹’小组。”“湖南赴京汇报谈判代表团回到长沙之后，立即根据中央的‘决定’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由我和华国锋、章伯森等与有关各方协商，提出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名单，上报中央审批。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即成立，共由15人组成。组长由我担任，副组长由华国锋、章伯森担任。”<sup>【1196】</sup>

## 二、治理湖南混乱局势的努力

在7月中央决定第四十七军主持湖南三支两军工作之前，该军已担负多条铁路路线的护路任务。第四十七集团军军史称，“‘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保障铁路运输，本军先后从陆军第一二七师三七九团和陆军第一四一师四二一团抽调了二十个连队，开赴京广南段，湘桂、贵柳、黎湛等路段，在三千多公里的铁路上执勤护路。一九六七年又抽调陆军第一二七师师部率三七九团担任广州至深圳、冷水滩至坪石各段，步兵第三八〇团担任长沙、坪石至蒲圻、衡阳至冷水滩各段，陆军第一四一师炮兵第五二一团迫击炮营担任冷水滩至桂林段的护路任务。十一月三日，广州军区命令：解除陆军第一二七师师部和步兵三七九团在广东的铁路支左和护路任务，调湖南省长沙市支左；步兵第三八〇团调整担任岳阳、长沙、株洲、娄底各段的护路任务。陆军第一三九师炮兵第五一九团团部率加农炮营和榴炮营第二、第三连担任衡阳铁路分局军管和执勤任务；该团榴炮营营部率一个连，担任柳州到冷水滩各段的执勤和护路任务。部队在担任铁路军管和护路执勤

【1196】《黎原回忆录》页331-332。



任务中，在沿路广大铁路职工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克服各种困难，基本上保证了当时铁路运输畅通和安全。”<sup>【1197】</sup>

四十七军部队的三支两军，具体可以第一三九师为例。该师师史称，7月，“第一三九师在圆满完成大通湖拦湖筑堤工程后，在第四十七军统一部署下，先后抽调了六千余名干部战士，分赴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区）的九个地区（广东的韶关，湖南的衡阳、郴州、零陵、株州、邵阳、吉首、黔阳，广西的柳州）和三个市（长沙、衡阳、株州）、二十七个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首批‘三支两军’人员由步兵第四一五团的一千三百五十二人组成，于七月二十二日分别进驻长沙市汽修厂、省水陆造船厂、裕湘纱厂，株州市公安局、新华机械厂等十余个单位，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尔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该团又奉命转至黔阳、湘西自治州和衡阳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同年十一月，步兵第四一六团大部进至广西柳州和湖南衡阳等地；步兵第四一七团开始由团领导率领一营进入长沙、新化，二、三营和团机关在衡阳担任‘三支两军’任务。一九六八年底，该团二、三营由衡阳调至黔阳、邵阳、吉首三个地区，十二个县（镇）‘三支两军’；炮兵第五一九团进至衡阳铁路系统；师机关和部分直属队进至衡阳市执行‘三支两军’，师侦察连主要担负了地、市政府机关的警戒任务和后期与步兵第四一六团五连担任了城市的巡逻任务。”<sup>【1198】</sup>

有关治理湖南乱局的过程，黎原在回忆录中称，“自从周总理宣布中央《决定》，以四十七军为首来解决湖南问题后，我就反复思考如何开展工作。面对一片混乱的湖南局势我理出了一条‘稳定中心区，狠抓重点区，以点带面，发展全省’的工作思路。所谓稳定中心区就是稳定省会长沙。稳定了长沙，各地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所以，首先把长沙的问题解决好这是战略要点。所谓以点带面，发展全省，就是要在解决好长沙问题的基础上，大造声势，加强工作，把中央有关政令、规定，通过解放军宣传队广为宣传，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自觉执行，进而把全省的形势稳定下来。我的这个工作思路和想法，首先得到了四十七军党委一班人的积极支持；接着又得到了新成立的‘省革筹’小组成员的支持。这样，在军地双方的领导层达成共识后，也就更加有利于实际工作的开展了。”<sup>【1199】</sup>

【1197】《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军史》，页281。

【1198】步兵第一三九师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三九师师史》，1993年10月，页330-331。

【1199】《黎原回忆录》页339。

关于“稳定中心区”，黎原称，“自四十七军移驻长沙后，首要任务是制止武斗抢夺武器弹药，维护铁路交通和社会秩序。而核心问题是制止武斗。当时，在长沙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集中体现在武斗上。例如8月中旬，发生在长沙郊区易家湾的武斗，连坦克都动用了，双方都有死伤。四十七军当即派代表找双方的头头做了许多工作，才达成了停火协议。8月21、22日发生在长沙的另一起武斗中，部队也有4人负伤，一名救护车司机不幸中弹身亡。在此同时，全省各地的武斗也是此起彼伏，频频告急。搞得支左部队如消防队员救火一样紧张，疲于应付。”“我们抓住这些武斗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损失和后果，发出了《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封公开信》，号召长沙市的人民起来制止武斗，促进革命大联合，再不要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这封信在社会上宣传后，对于教育广大群众，制止武斗起到了一定作用。”“9月2日，‘省革筹’小组与四十七军又在长沙东风广场召开有20万人参加的‘拥军爱民’大会。我在会上讲话时号召全省和全长沙市的军民要增强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把大好形势继续推向前进。通过这些活动，全省特别是长沙的社会秩序和交通运输秩序都有了明显好转。”<sup>【1200】</sup>

黎原接着称，“1968年2月28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从此，长沙作为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逐渐趋于稳定了。在稳定中心区的同时，我们还狠抓各重点区的稳定工作。”<sup>【1201】</sup>

关于各重点区的稳定工作，黎原举了湘潭、衡阳和道县三个地区的例子。有关湘潭地区问题的解决，黎原称，“湘潭紧靠长沙，所属韶山是毛主席的家乡。‘文革’中湘潭的两派，由于受长沙两派的影响，斗争很激烈，武斗不断，严重地影响和威胁到来自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和国际友人前往韶山参观的安全。周总理对湘潭的‘文化大革命’特别重视。因此，我们在抓稳定中心区的同时也狠抓湘潭的治乱工作。先后发出通告，不准在韶山地区设置联络站，派出部队制止武斗，做两派大联合工作，组织部队收缴武器等。但仍有少数不听劝告的人，盘踞在湘潭锰矿等主要据点，拒不交枪，对立情绪很大。为了稳妥解决湘潭问题，我们拟定了以政治攻势为主，同时派武装部队进驻的解决方案。方案得到中央的批准后，在派出飞机散发传单，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的基础上，派武装部队从三个方向进驻湘潭市。部队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据守据点的武装人员被迫交出了武器。部队立即组织两派群众坐下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革命

---

【1200】《黎原回忆录》页339-341。

【1201】《黎原回忆录》页341。

大批判。湘潭地区一年多的动乱局面也好转起来。此后，赴韶山的人和车辆也畅通无阻了。”<sup>【1202】</sup>

有关衡阳问题的解决，黎原称，“衡阳也是湖南的重点区之一，不过与湘潭的问题不同，因此，采取的方法也就不同。”“四十七军根据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抽调了以军政治部副主任<sup>【1203】</sup>为首的一批干部到衡阳支左，与衡阳军分区、广州军区后勤部十九分部等其他驻衡军事单位，共同组成了衡阳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统一领导衡阳地区的支左工作。按照中央‘二四’批示和湖南省军区关于镇压‘湘江风雷’的指令，抓捕了‘湘江风雷’骨干213人并宣布对该组织采取专政措施。衡阳的社会顿时出现短暂平静。当时驻军支左办便按照《人民日报》社论‘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的精神，参照上海‘一月风暴’和山西、贵州、山东等省的做法，和一些群众组织、地市领导干部，于1967年2月15日夺了衡阳地委、专署和衡阳市委、人委的党政大权。夺权之后的领导机构实际上是一派掌权。加上掌握主要权力的解放军领导干部对情况又不太熟，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逐步显露，便引起一些群众组织，特别是那些受过打击和压制的群众组织的反对，而且越来越强烈。‘衡阳革委’没了权威，两派矛盾日趋尖锐，武斗事件频频发生。我在参加湖南赴京汇报代表团期间，知道镇压‘湘江风雷’搞错了，曾先后打电话，指示四十七军和衡阳驻军支左领导小组赶快转弯子，改正错误，但却改得不快。直到《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公布后，衡阳驻军支左领导小组成员在反复学习中，才认识到所犯错误。公开声明退出‘衡阳革委’，并向群众作了检讨。此后，经四十七军研究决定，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成员全部撤回原部队，衡阳的支左任务由一三九师派人接替。衡阳的问题才得以解决。”<sup>【1204】</sup>

惟有关道县问题的起因，黎原的说法却不甚公允。据1980年代调查处理道县杀人事件的参与者和文字综合的执笔人、后任湖南永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谢承年著文称，“湖南零陵地区（1995年改为永州市）道县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7-9月间，发生了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杀和被迫自杀4519人。道县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区其他10个县，造成全区共被杀和自杀9323人，其中‘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

【1202】《黎原回忆录》页341-342。

【1203】指时任四十七军党委常委、军政治部副主任的赵川。

【1204】《黎原回忆录》页342-343。

人 862 人，另外致伤致残 2146 人。零陵地区特别是道县杀人事件，震动了全省，乃至全国。”<sup>【1205】</sup>谢承年称，“调查表明，零陵地区杀人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究其根源，主要有五”，“一是错误估计形势，轻信谣言”，“二是法制遭到严重践踏”，“三是把杀害‘四类分子’看做是革命行动”，“四是派性斗争引发所致”，“五是领导未予制止或制止不力”。谢承年最后称：

8月21日，零陵军分区某副司令员与6952部队某连长到道县调查杀人问题时，他先后三次讲话，没有明确提出制止杀人。他们返回军分区后，将调查情况用《社情电报》报告了47军。8月26日，47军以电报（上报中央文革小组）形式转发零陵军分区关于道县杀人问题的《社情电报》时指出：“我们认为，对‘四类分子’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变天的可以依法惩办外，‘四类分子’不能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与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能争取‘四类分子’子女。”47军的《电报》在各县传达以后，不少地方把《电报》精神理解为“对调皮捣乱的‘四类分子’可以杀”。从各县杀人情况看，杀人时间集中在当年9月（道县除外），也就是说，47军开始发出的电报，没有起到有效制止杀人的作用。8月29日，47军6950部队<sup>【1206】</sup>进驻道县，采取措施制止杀人，9月中旬基本得到制止，其他县杀人事件到10月底陆续结束。零陵县零星杀人持续到第二年7月。东安县于1968年7-9月，采取刑讯逼供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共被杀和被迫自杀422人。<sup>【1207】</sup>

谭合成在《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一书中，借“一位道县当时的主要领导干部”之口，正面评价了炮兵第五二〇团在制止杀人方面所起的作用：

一位道县当时的主要领导干部这样总结这段历史：

“6950部队进驻道县以后，的确不负重望，立即发布命令，将省革筹和47军所发的制止杀人的四条公告在城镇和广大农村广泛张贴；并开动广播机器，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贯彻；同时组织两大派群众组织坐下来面对面地协商谈判，旗帜鲜明地反对武斗，制止杀人，并派部队人员深入杀人的重点乡、镇、村去面对面地做工作，使形势很快得到了稳定。虽有个别不法分子仍然

【1205】谢承年：《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

【1206】6950部队为陆军第一四〇师炮兵第五二〇团的代号。时团长贺增图，政委孙润清。

【1207】《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

顶风作案，但全县大局很快稳定，‘杀人风’逐渐平息。随后又着手帮助群众恢复生产，解决宗派械斗；着手成立新生的革命政权——县革命委员会，使瘫痪数年的领导班子，逐渐得以恢复开始行使职权，形势一步步地向好的方向转化。这是6950部队的历史功绩，也是道县人民的幸福。”<sup>【1208】</sup>

### 三、赞扬声与质疑声

9月18日，毛泽东南巡途中在长沙接见湖南省革筹小组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三人。在谈到抢枪时，毛称：抢枪把你们吓得不得了，名义上抢枪的，实际上是送的，政治干校就把枪发给了造反派了嘛。谈到军队有一段不能拿枪时，毛称：解放军有五不了（指原来的四不加上不拿枪）。现在四十七军组织巡逻队，很好嘛，四十七军大军嘛。谈到军区开展四大，军区招待所也开展四大，内部几个组织意见分歧，大师傅不做饭了时，毛称：大师傅也不是好惹的。汇报到军区犯了错误，影响到军分区，省人委，地专机关瘫痪了，毛称：中央农业部、农垦部不起作用了，气象局还起点作用，宣传部、文化部也不起作用了，不是工厂还在生产，农民还在作田吗？谈到公检法的问题时，毛称：过去好像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很高兴。谈到干部问题时，毛称：清理干部要搞群众运动，这样多的军分区，武装部，不搞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动的，过去这些人是老革命，老资格，谁也搞不动他。过去地方的党政机关没有枪，就靠军事机关。毛又称：最后归结起来，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向群众作了检讨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太宽了不好。<sup>【1209】</sup>

10月8日，周恩来在武汉接见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四十七军副军长郑波带领的湖南造反派代表。据黎原称，“周总理听了有关‘省无联’的情况汇报后，当即表态说，我支持黎原的做法，支持‘省革筹’小组的决定。希望造反派们不要搞无政府主义，并警告极‘左’派代表说：‘你们已经到犯错误的边缘了。湖南的领导权由四十七军掌握，你们只能参与其中。’周总理还说：‘毛主席对黎原同

【1208】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页344。

【1209】根据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传达整理。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1968年1月。个别字句根据佚名编：《毛主席视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武汉、上海等省市时的重要讲话》（1967年10月18日翻印）作了校正。

志很称赞。他对一些问题很耐心。黎原同志处理问题很有思想。当兵打仗的容易急，他很谨慎，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这是对对我的工作的极大支持。”<sup>【1210】</sup>

10月24日，林彪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及广州军区黄永胜、刘兴元的陪同下，在北京接见黎原。当黎原汇报到湖南形势时，林彪称，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其后台有国民党，有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的爪牙。有坏人在后面策划，因此，要发动群众，将坏人揪出来。当周恩来谈到长沙有两个学校<sup>【1211】</sup>，政干校支左是不错的时，林彪称，政干校过去几年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举得高的，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是不错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讲过：政干校是不错的。三三一没有搞好，过去的底子没有打好。三三一和社会上搞到一起，很乱。现在两派要联合起来，要关门整风，不要和社会上的组织挂钩。他们打架，不要他们支左了。黎原汇报到军区问题，说瘫痪了。周恩来称：军区要改组，谭文邦、林国兴可以抓工作嘛，司、政、后要关门整风，不要搞四大了。<sup>【1212】</sup>

进入1968年，据黎原回忆称，“1月24日晚9时，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湖南在京学习班的全体人员。会上，总理明确表态说：‘今天是宣布‘省无联’破产的大会。‘省无联’是旧社会遗留下的社会渣滓的大杂烩。‘省无联’的纲领，是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是反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是反对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他们要重新建党、建政，说现在中国是资本主义，公然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省无联’的问题是个脓包，现在开了刀，小手术，好解决。’”“依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先后召开‘省革筹’小组会议和军民大会，彻底批判了‘省无联’。并发动全省各级群众组织，采用多种形式，深入开展批判‘省无联’的反动纲领和罪行。猖狂一时的‘省无联’立刻‘土崩瓦解’。他们的主要头头畏罪潜逃，逮捕了几个坏头头。2月21日，长沙又召开了有20万人参加的大型集会，庆祝‘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各主要群众组织纷纷宣布撤销总部，所属人员回本单位参加大联合。至此，湖南全省跨行业、跨地区的群众造反组织，开始逐渐解散，全省的形势明显好转。”<sup>【1213】</sup>

---

【1210】《黎原回忆录》页333。省无联，即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为长沙地区造反派群众组织中激进的一翼——以湘江风雷为首的“湘派”的一个松散组合体。

【1211】指解放军长沙政治干部学校和工程兵学院（代号总字341部队）。

【1212】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宣传组根据传达记录整理，1967年10月31日。谭文邦，时为湖南省军区第二政委，1955年授衔少将。林国兴，时为湖南省军区副政委，1965年大校军衔。

【1213】《黎原回忆录》页334-335。

1968年2月9日，中央军委下达以杨大易为湖南省军区代理司令员的任命，组成省军区新的领导班子。同时，广州军区党委通知，由杨大易、张立宪等九人组成湖南省军区临时党委会。杨大易为代理书记，张立宪为副书记。<sup>【1214】</sup>

1968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湖南省革委会。省革委会主任由黎原担任，老资格的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任第一副主任，华国锋、杨大易、章伯森、刘顺文和两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头头胡勇、叶卫东任副主任。常委之中，军队代表共八人，除黎原、杨大易、刘顺文外，还有刘善福、郑波、李振军、张立宪、张骥。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在常委中亦占了相当大的比例。<sup>【1215】</sup>

在省革委会成立前，省直辖的长沙、株洲两市革委会已经成立。长沙市革委会主任由张骥担任，株洲市革委会主任由陆军第一二七师新任政委王大举担任。各地区一级革委会，也在1968年2月至9月间成立，其主要负责人大多为当地军分区司令员或政委，仅两人为三结合的地方领导干部。其中湘潭地区革委会主任为湘潭军分区司令员巫海清，衡阳地区革委会主任为衡阳军分区司令员周新林，邵阳地区革委会主任为原邵阳地委代理书记张厚，岳阳地区革委会主任为岳阳军分区司令员魏凯江，益阳地区革委会主任为原益阳地委书记周继舜，常德地区革委会主任为常德军分区司令员景林，郴州地区革委会主任为郴州军分区政委李明，零陵地区革委会主任为零陵军分区司令员张本林，怀化地区革委会主任为怀化军分区司令员秦永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革委会主任为吉首军分区司令员苟先学。<sup>【1216】</sup>

黎原在湖南的工作虽然得到中央肯定，惟其对造反派群众组织较为宽宏大量的态度，却引致他的直接上级——广州军区尤其是军区政委刘兴元的不满。早有

---

【1214】湖南省军区编纂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史（1949.8—1997.12）》，1998年8月，页146、330。杨大易，此前为位于桂林的广州军区步兵学校校长，1955年授衔少将。张立宪，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工作部部长，1965年大校军衔。文革初期调军委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1968年2月调任湖南省军区副政委。196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复广州军区党委6月5日《关于湖南省军区几个问题的请示》，同意正式成立湖南省军区党委，第四十七军不再代管湖南省军区的工作。同年7月6日，中央军委命令，杨大易任湖南省军区政委，免去谭文邦省军区政委职务。1968年8月，龙书金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革委会主任，杨大易任省军区司令员，张立宪任政委。

【1215】龙书金，1955年授衔少将。刘顺文，时任解放军长沙政治干部学校校长，1965年大校军衔。胡勇，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湖南长沙工联负责人。叶卫东，长沙市第一中学教师，湖南湘江风雷负责人。张骥，原第四十七军一四一师政委，时任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长沙市革委会主任。

【1216】魏凯江、苟先学，1965年大校军衔。

传闻说，四十七军军部（主要是黎原、郑波）支持造反派，第一二七师在广东、湖南，第一四一师在广西也倾向造反派，唯独一三九师、一四〇师支保。<sup>【1217】</sup>四十七军政委一职长期空缺，正好成为广州军区对四十七军渗沙子的口实。1968年5月后，广州军区先后任命刘凌为四十七军政委，韩曙为副军长，许光为军副政委，贾军为军政治部主任，刘、韩、许、贾在1968-69年间均成为军党委常委，在常委中形成了与黎原一派不同的声音。<sup>【1218】</sup>以致黎原在晚年忆及此事尚不免耿耿于怀：“1968年，他们因四十七军在湖南支左时执行中央决定而同军区发生分歧，以反对派性为借口在军区办‘学习班’，将四十七军副军长，副政委，政治部正、副主任，三个师的师长、政委（包括全军战斗英雄、副师长郝忠云）以及团职干部近百人集中到广州。学习班规定了‘十不准’，比如不许请假，不许外出等等，完全是‘坦白运动’时搞的那一套。这批干部都是因为在工作中支持我，因而惹恼了他们。在学习班上便强迫他们交待工作中存在的所谓派性问题、反军区的言论，同时还要求他们揭发黎原反对军区的罪行。学习班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该班结束后，有的干部被分配到生产建设兵团，大部分干部得不到重用。”“1969年‘九大’期间，因我兼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他们仍不甘心，想操纵选举，四处动员、交底。最后我以微弱票数当选，得票数同当时因‘二月逆流’靠边站的老师们差不多。他们想以此丑化、嘲笑我。当时就有同志戏称：‘黎原的得票数同元帅一样多’”。<sup>【1219】</sup>

#### 四、结束在湘三支两军任务

1968年9月1日，广州军区命令，恢复陆军第四十三军番号，第一二七师拨归该军建制领导。第四十七军集团军军史称，“陆军第一二七师于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日起，调归陆军第四十三军建制，并将陆军第一二七师在广东省翁源的营房与陆军第一四一师在桂林的营房对调；陆军第一二七师先组织轻便指挥所率步兵第三七九团进至桂林，接替陆军第一四一师在桂林的‘三支两军’、护路等任务和营房；陆军第一四一师在桂林的部队任务移交后，于九月二十日调至湖南长沙执行新的任务，并派员接替陆军第一二七师在广东翁源的营房。陆军第一二七师主力（师部、步兵第三八〇、第三八一团）于九月中旬解除在湖南的‘三支两军’任务，

【1217】访问蓝天民谈话记录，2001年9月14日。

【1218】与黎原不同意见的，时有“五人小常委”之称。据蓝天民称，五人包括刘、韩、许、贾及1968年3月已调离四十七军的赵川。而刘凌则称五人中除刘、韩、许、贾外还包括1969年5月调任一四一师师长的原一二三师师长张德福（见刘凌：《我的戎马生涯》自印本，页96）。刘凌、韩曙，1965年大校军衔。

【1219】《黎原回忆录》页369-370。



九月三十日，分别从邵阳、株州、岳阳、长沙车站登车进至广西桂林执行新的任务；该师炮兵第五〇七团，于十月底于株州进至江永生产基地，接替陆军第一四〇师炮兵第五二〇团的生产任务。”<sup>【1220】</sup>

1969年10月16日，军委电令：陆军第四十七军辖陆军第一三九、第一四〇、第一四一师，于翌年适当时机进驻灵宝、潼关、渭南地区，归兰州军区指挥。

黎原回忆称，“正当全省军民战备工作日益紧张之时，第四十七军接到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军委命令，决定四十七军‘编入全国战略预备队，在适当时机进驻指定地区’。军党委先后三次召开会议，认真进行学习，表示坚决执行命令，落实战备，搞好调防准备。”“根据军委命令精神，军党委研究决定并报中央军委批准，立即调整了部署。逐步将第一三九师、一四〇师、一四一师部队都撤出‘支左’单位和生产基地，分别移至长沙、衡阳、岳阳等铁路沿线执行战备任务。第一二七师因已调入重建的第四十三军，于1968年10月就撤出了在湖南的‘支左’任务。”<sup>【1221】</sup>

从1967年8月至1969年10月，第四十七军主持湖南三支两军共两年另两个月。黎原又称，“当时，周总理前后两次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是随部队到西北准备打仗，还是留在湖南主持全省工作。总理希望我留在湖南主持地方工作，并要我早作决定，以便及时向毛主席报告。我自己反复权衡了几天，经过认真思考，我决定率军北上，保卫祖国。我是一名军人，自从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军队中工作，从一名普通干部成长为军长，特别是担任着中央战略预备队的军长，当祖国面临外敌威胁时，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此时，湖南省的地方形势也日趋稳定，地方工作基本恢复，华国锋同志完全可以主持全省工作。我向总理汇报了我的情况。最后经党中央批准，同意我率军北上。我立即布置一系列的部队调防的组织准备工作。”<sup>【1222】</sup>

“率军北上，保卫祖国”，可能只是黎原一个极好的藉口。能率部脱离广州军区的掣肘，正是黎原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而将第四十七军调离本区，也应正中广州军区的下怀（这极有可能就是广州军区的提议）。

1970年3月9日，军委命令：陆军第四十七军于五月中旬进驻指定地点。黎原在回忆录中称：

【1220】《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军史》，页280。

【1221】《黎原回忆录》页357。

【1222】《黎原回忆录》页360-361。

1970年3月，四十七军接到中央军委关于调防离开湖南的命令。3月19日、20日，周恩来等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在北京分别接见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和四十七军的主要领导，包括我、华国锋、卜占亚<sup>【1223】</sup>、杨大易、张立宪、刘凌等，对湖南的工作、四十七军调防等有关方面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4月1日下午，四十七军召开三支两军干部座谈会。我在会上讲话时指出：根据广州军区党委指示，三支两军的野战军干部原则上统一交给省军区领导，四月底交接完毕。希望各单位党委和领导要做好工作，“做到回部队的愉快，留下的安心，军里和省军区都满意。留下的不仅要愉快，还要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后来，移交给湖南省军区包括副军长刘善福、副政委李振军等在内的各级干部共1090人。同时，四十七军还奉命将新组建的第一四五师、一四六师和南湾湖等生产基地，也移交给湖南省军区领导。

部队离开湖南前，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设宴为四十七军师以上干部饯行。华国锋代表省革委会讲话，他赞扬四十七军先后两次在湖南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立了功。一次是解放初期的湘西剿匪，为湖南扫除了百年匪患；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中促进了全省各派的革命大联合。他讲得非常动情。我也代表四十七军讲话。因当时我还兼着省革委会主任，所以我一方面代表四十七军对湖南省革委会和全省人民表示感谢，一方面强调搞好军民团结，加强战备，共同对敌。

我调离湖南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华国锋任湖南省革委会代理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sup>【1224】</sup>

黎原率部离开湖南后，淡出政治舞台。1975年7月升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如仍在广州军区，这一提升恐怕是不可能的。1978年12月调北京，历任基建工程兵副主任、临时党委副书记、党委副书记，基建工程兵善后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2008年12月18日在北京病逝。

## 第五十四节 总政瘫痪与军委办事组成立

### 一、总政瘫痪，萧华倒台

七月底至八月初，总政治部与全军文革小组同时趋于瘫痪状态。

【1223】卜占亚，原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1965年大校军衔。决定四十七军调离湖南后，于1970年4月调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并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

【1224】《黎原回忆录》页357-359。



批斗萧华，京西宾馆，  
1967年8月16日。

7月25日，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各人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百万军民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大会”期间，萧力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林彪，向林反映了总政的文革运动情况。据萧力回到军报后向身边的人透露，林彪对她再度表示支持，称：“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10月20日，萧力召集总政一些人开会，在会上正式对外传达了林彪7月25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她表示支持的那句话。

8月4日，萧华与周恩来等一起应邀出席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为由姚文元率领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访阿归来而举行的宴会。此后，就再未在公开场合露面。<sup>【1225】</sup>

8月16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接见三军党委负责人时宣布：鉴于徐向前、萧华主持的全军文革小组已经瘫痪，不能领导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决定由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叶群四人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总政要关起门来乱一阵子，萧华不参加一切公开活动。<sup>【1226】</sup>

---

【1225】《人民日报》，1967年8月5日。

【1226】新湖大革命造反派委员会宣传部主办：《新湖大通讯》第50期，1967年9月8日。另有资料称接见时间为8月10日，见2207工厂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第21期，1967

8月17日，江青称，总政文化大革命没有搞好，主要负责人，中央一保再保，都没有纠正过来。总政的文化大革命要关起门来搞，主要靠本单位。总政究竟谁是什么人，一定要搞清。对萧华要揭开来，将来揭出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要抓大节，不要抓细节。<sup>【1227】</sup>

8月20日，吴法宪、邱会作听取军委文革联络站负责人的汇报。吴法宪称，“萧华的错误是严重的，现在到处揪斗，军委文办现在处于无人管的状态，最重要的是联络站的工作，联络站不能停办，军委、中央文革叫我们四个人组成办事组，对外不公开。”“萧华的问题，先让总政内部揭发批判。总政重新开展四大，你们要宣传文斗，不要武斗，不搞变相体罚，要掌握斗争大方向，搞社会大批判。”邱会作称，“萧华的错误多得多。不是一般问题，从你们那里也可以看出，把材料汇集起来你们要大吃一惊，你们揭发的问题可以上报，我们找你们造反派谈一谈。萧华包庇吴自立，现在又揭发出来反对学毛著一、二十条罪状，要大力揭发，破就是立，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首先就是揭发。”吴法宪又称，“‘三三’前我们替他说了话，<sup>【1228】</sup>以后又发生‘五一三’事件，我们又作了工作，可是他不改，两条路线斗争我们不能调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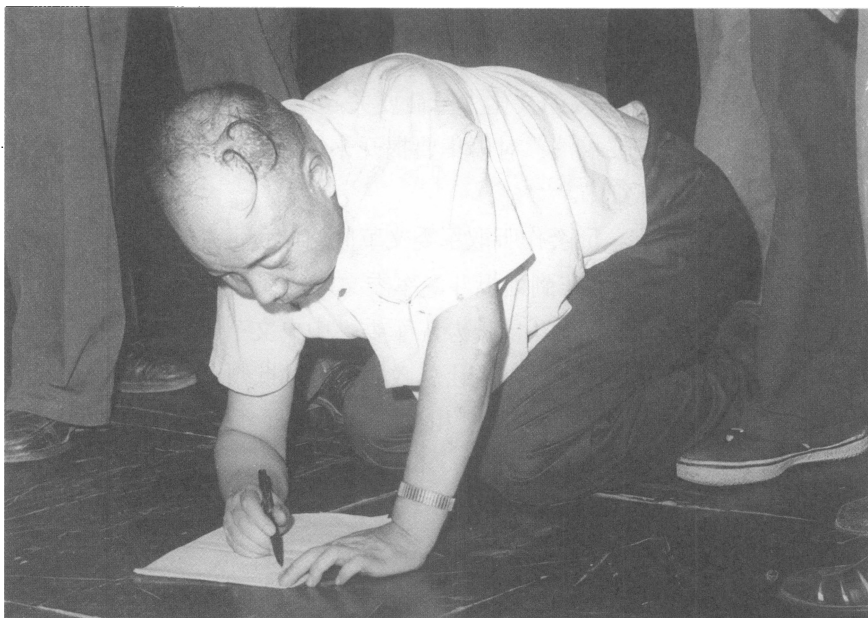
8月25日，总政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筹备处在批斗萧华大会发言中称，“‘五一三’事件，萧华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再次暴露，他的狐狸尾巴被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揪住。这时萧华十分恐慌，生怕总政机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重新起来造他的反，生怕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总政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他继续施展阴谋，进行顽抗，大造舆论，继续替他的反动路线辩解。通过他的御用组织抛出了大字报，叫嚣大抓‘一小撮’是对的，‘三·三’以后‘击退了反革命复辟逆流’。”“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总政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终于在萧华的白色恐怖中杀了出来。芦前安同志的大字报，响亮地提出‘揪出萧华，解放总政’的战斗口号，重新点燃了总政机关革命的熊熊烈火。海军红联总来总政贴大字报，大力支持芦前安同志的革命行动，遭到萧华的百般阻挠，等了八个多小时不让进总政的大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徐立清，急急急忙召集各部部长开会，恶毒地攻击海军红联总的革命行动是‘攻击萧主任’。”“‘一唱雄鸡天下白’。总政机关无产阶级革

---

年8月28日。本书从前者。

【1227】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32期，1967年8月25日。“细节”可能为“小节”之误。

【1228】指1967年3月3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在军委召开的总政机关干部会议上讲话，见《中央首长讲话（3）》，页22、25。



批斗萧华，京西宾馆，1967年8月16日。

命派又重新组织起来了，‘总政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彭、罗、刘、梁筹备处’<sup>【1229】</sup>于七月廿五日宣告成立。萧华先是企图扼杀她，扼杀不了又企图收买她。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压不垮，骗不了的。萧华的阴谋完全破产了。”<sup>【1230】</sup>

12月20日，总政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筹备处就“萧华的罪行和处理意见”报告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内称，“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总政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广大革命群众在批判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志坚的同时，揭发了萧华及其死党的大量罪行。萧华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在后来的几个月里，他大搞资本主义复辟，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他亲自指挥，在革命群众中真抓所谓‘倒萧反党’的‘一小撮’，把总政机关《红色革命造反联络站》及其所属的各革命战斗队打成了‘反革命’组织，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有的关进监狱，有的停职反省。仅总政机关被打成‘反革命’的就有十三人，被迫写请罪书的一百零六人，被点名批判的一百八十人，甚至有的战士、职工也被打成‘野心家’、‘阴谋家’，三个战士被逼成了精神病。总政机关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萧华一手策划的‘五一三’政治流血事件，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反动面目。三军无产阶级革命

【1229】彭，指彭德怀。罗，指罗瑞卿。刘，指刘志坚。梁，指梁必业。

【1230】总政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筹备处：《彻底清算萧华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1967年8月25日。

派炮轰萧华的革命行动，给了我们巨大鼓舞。总政治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转折点，革命的烈火重新燃烧了起来。七月下旬，总政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筹备处’宣告成立。四个多月来，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华，连续发起了四次战役。各总部和三军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召开了历时半月的斗争萧华大会。广大革命群众斗志昂扬，连续战斗、突击，揭露了萧华及其死党的滔天罪行，全面揭开了总政阶级斗争的盖子。在斗争中，我们始终坚持文斗，摆事实，讲道理，让萧华坐着记，可以喝水，可以答辩。揭发的每条重要罪行，都证据确凿，使他无法抵赖。”

报告又称，“萧华盘踞总政长达十七年之久，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组成了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他的六个副主任，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袁子钦、刘西元、傅钟，是清一色的三反分子。在五十一名正副部长中，初步查明，有叛徒和叛徒嫌疑的九名，假党员和入党无证明的四名，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四名。还有蒋匪军政训处主任，军统外围组织学行社分子，伪乡保长训练班中队副，严重特务嫌疑分子以及写诗咒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批斗萧华，京西宾馆，1967年8月16日。

《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华的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最后建议，“一、请中央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华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清除出党。二、把萧华交给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反省。三、驻京各大单位召开批判斗争大会，坚决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华批深批透，斗倒斗臭。四、将萧华的罪行向全军公布，发动全军各级领导机关深入揭发他的罪行，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教育，并请中央考虑在适当时机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彻底肃清他的流毒。五、重建总政党委，彻底改造总政治部。”

1968年1月25日，总政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筹备处向军委办事组、政工组提交《总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内称：

去年十月以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战斗号令，以及军委决定成立政治工作小组，给予了总政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更加增强了斗争勇气，提高了胜利信心。大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学习和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决执行林副主席的战斗号令，在军委办事组和政工组的直接领导下，乘胜前进，连续战斗，运动逐步深入，取得了很大进展，进一步揭开了总政阎王殿阶级斗争的盖子，剥光了萧华的画皮，广大革命群众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形势一片大好。

### (一)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三个多月来，总政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萧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第四次战役”，又进一步翻箱倒柜，大揭大烧大斗，向总政阎王殿发起了猛烈的全面进攻。随后，又以萧华、刘志坚、徐立清，特别是萧阎王为重点，成立了专案组，加强了组织领导，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统一部署，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内查外调，深挖猛攻他们的政治历史和阴谋活动问题，发动群众，开展对萧华的大批判，使运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广大革命群众日以继夜，艰苦奋斗。保守势力瓦解了，受蒙蔽的群众纷纷反戈一击，萧华周围的知情人揭发了许多材料。走资派内部也开始乱起来，揭萧华，互相揭。萧记阎王殿已经支离破碎，土崩瓦解了。

.....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们还对副阎王、判官和牛头马面<sup>【1231】</sup>进行了揭发批判斗争。六个副主任群众都提出打倒，五十一名二级部领导干部中（不包括报社），群众提出打倒的二十八人（其中叛变自首五人，特务二人，历史反革命一人，假党员三人），占正副部长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九。一百五十七名正副处长中（不包括报社、画报社、文艺社、军人俱乐部），群众提出打倒的十名，占正副处长总数的百分之六点四。以上，群众提出打倒的共四十五人，占二百一十五名副处长以上干部的百分之二十一。这些人的罪行有些已基本查清，有的尚待进一步清查。

……

## （二）

……

在第一季度内，我们打算：

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由筹备处统一领导，各战斗队分别编组，每期二十天到一个月，争取把总政机关人员轮训三分之二。

继续抓紧对萧华、徐立清、刘志坚，特别是萧阎王的专案工作，争取尽早地把他们的政治历史和篡军反党阴谋活动问题搞出个眉目。把二级部长以上的叛变自首分子和走资派斗倒、斗垮、斗臭，并作出结论，定案上报。

开展群众性的大批判，掀起对萧华斗争的新高潮。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萧阎王批深批透，彻底肃清其在各方面的流毒，我们计划最近在总政组织若干次对萧华的批斗大会，并随时准备迎接在更大范围内对萧阎王斗争的新高潮。

建议中央军委采取措施，尽快地配备各级领导干部，重建总政。我们也抓紧做好对中层干部的工作，帮助他们勇敢地站出来革命，为重建总政作一些准备工作。

着手进行整顿党团组织、纯洁队伍的准备工作。

## 二、军委办事组成立

8月17日，军委办事组成立。

---

【1231】“阎王”指萧华，“副阎王”指总政副主任，“判官”指总政二级部的正副部长，“牛头马面”指总政机关的正副处长。



该小组成立的目的是及后来的演变，军委办事组10月15日在给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中作了说明：“根据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8月17日指示，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4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由吴负责，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看着总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9月24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办事组成员，并指定杨为组长，吴为副组长。10月4日，我们研究了军委办事组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认为，由于总政目前处于瘫痪状态，军委文革小组目前实际上也处于瘫痪状态，军委办事组是在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至于部队各项建设、战备工作、行政工作、干部工作等等，统由军委常委直接领导进行。提到办事组来的这类问题，均呈送军委常委处理。

“军委办事组除设有几个联络员、几个秘书外，还有一个负责对‘516兵团’调查工作的调查组，和一个负责干部学习班（引者注：当时中央有一个干部学习班，由林彪主持，抽调各省军、政负责人到北京学习，用以解决各省的文革问题）具体工作的办公室。

“军委办事组是个临时性的（引者注：语句不通，原文如此），待政治工作组组成后，即将办事组的工作移交政工组负责，军委办事组即行撤销。”<sup>【1232】</sup>

从上述报告中可以清楚得知，军委办事组成立的目的是，“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看着总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9月增加杨成武为办事组成员、组长后，主要任务仍旧未变。而“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至于部队各项建设、战备工作、行政工作、干部工作等等，统由军委常委直接领导进行。提到办事组来的这类问题，均呈送军委常委处理”。军委办事组职能的改变，应是在其1968年3月改组之后。

【1232】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引文括号内的文字，为王年一所加。王年一及部分学者认为军委办事组开头亦称军委看守小组，应不正确，从吴法宪8月20日讲话可以看出，该小组从一开始即称办事组。

8月20日，吴法宪在听取军委文革联络站负责人汇报时称，“我们几个人要管三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很多，我们还要参加各省会议和调查组，我们主要是管驻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以及联络站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关系。（邱会作插话：吴司令员已变成‘五’军司令了。）今天想了解一下情况，外边传说让我们主持军委文革工作，没有这回事。”“查封档案材料的已经封了，封了总政秘书处，原因是大家都要材料，有很多是党和国家、军队的机密，暂时都不要动，对总政文化大革命我们是帮助看看大方向，我们也找了几个革命干部谈了一下。军委文办的工作，刘西元<sup>[1233]</sup>管一管。”“联络站的工作我们很关心，我们可反映情况，我们不代表全军文革。来访人如果问军委文革是否改组，就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三个人主要是管三军的工作，你们有问题我们可以早反映，上面答复了，我们传达给你们。”<sup>[1234]</sup>

10月16日，周恩来对军委办事组10月15日的报告作出批示：“提议在小组会议上讨论一次，再正式报告主席、林副主席。”10月20日，康生批：“此事必须先请示林彪同志，在林彪同志同意后再正式上报主席。”10月27日，杨成武、吴法宪向林彪报告称：“关于军委办事组问题，向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并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个报告，遵康生同志的指导先报您批示后，报主席批示。现将报告呈上，请阅批。”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毛于10月28日批示：“刚成立又取消，恐怕不妥。”10月29日，林办批：“林彪同志嘱：送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成武、春桥、文元、法宪同志阅，退杨成武同志。”同日，周批示：“我仍建议，此事应先在中央文革扩大会上讨论一次。请伯达同志于30日例会上提出。”<sup>[1235]</sup>

未知军委办事组10月15日的报告是否曾在中央文革扩大会上讨论及讨论结果如何，事情恐怕就如毛泽东所言，刚成立又取消，恐怕不妥。在军委政治工作小组成立后，军委办事组仍旧保留。即便军委政治工作小组在1968年3月撤消，军委办事组却继续存在。

---

【1233】刘西元，原总政组织部部长，1967年6月任总政副主任，1955年授衔中将。

【1234】1968年6月11日，吴法宪在接见军委办事组全体工作人员时说：“原来没有个办事组。文革高潮的时候，‘七二〇事件’武汉发生了陈再道的问题。那时王力、关锋、戚本禹勾结军队内部揪军内一小撮，抢枪，冲击军队。那时毛主席还在外地视察。杨成武回来后，成立了军委办事组，杨担任组长。后来又相继搞了政工组、军报组、文艺组。军委办公厅是军委的办事机构。军委常委、军委办事组的事情都通过那里办。军委办事组的问题经办公厅提交军委常委讨论。……”见《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

【1235】参见《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

11月，增补李天焕、刘锦平<sup>[1236]</sup>为军委办事组成员。11月21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军委政治工作小组成立，刘锦平为负责人。

### 三、军委政工小组成立

12月8日，林彪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接见了军委政工小组、文艺组、军报组的全体人员。林彪在接见时称，“今天和总理、文革的同志接见政工组、文艺组、军报组，三部分都是搞政治思想工作的。政治工作是管思想、管灵魂、管革命化的，是各行各业的总管。政治统帅一切。我军历来靠政治工作靠思想革命化，靠毛泽东思想领导的，离开这个，解放军就不成其为解放军，就成了压迫军；不是马列主义军队，不是无产阶级军队，是资产阶级军队，就不能战胜敌人。我军的主要任务是打仗的，当然还有群众工作、生产、施工等等。多啦，但主要是打仗，打仗历来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武艺高强，艺高人胆大；一种认为，胆大艺高。打仗主要靠什么？打仗主要靠勇敢不怕死。当然，技术、武器、战术都有关系，是综合力量，但最主要是不怕死。不然，平时其他工作搞得再好，拿到战场上去，就会垮掉，完不成战斗任务，见了敌人火力猛，坚强的工事，就打不下来，就垮下来了，问题就大了。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搞好思想革命化，这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党的存亡，政权的存亡，是使人民得到一切或丧失一切的问题。这是政治中间的政治，是灵魂中间的灵魂，是核心中间的核心。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权，没有政权，就没有一切。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没有军队就没有一切。军队靠政治挂帅，靠思想革命化。朝气蓬勃的队伍，要用先进的思想来领导。先进思想，不是凭工人、农民自发产生的，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加以吸取和摈弃的，先进思想就是毛主席的思想。”

林彪又称：“政治工作、文艺、军报组，三部分都是搞政治思想工作的，这些部门必须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坚决反对反毛主席的，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思想的。过去的总政治部、文艺部门和报社，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都垮了，垮得好。原因是方向不对头，立场不稳，不能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不能坚定地拥护毛主席，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不能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一年文化大革命中掉了大队，掉得很远。他们政治旗帜不鲜明，政治面目不清，该拥护的不拥护，该反对的不反对，搞折中，搞调和，搞机会主义，不是红旗，而是白旗、黑旗、灰旗。你们这三部分应该吸取他们的教训。政工、文艺、军报组应该注意了解下边的情况，随时请示报告，向主席、中央、总理、中央文革、军委办

---

【1236】李天焕，时任第二炮兵政委。刘锦平，时任空军党委常委，民航总局政委。

事组请示报告，军报要多找伯达同志、姚文元同志，文艺多找江青同志，政工多找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注意调查研究情况，发现问题，提出意见，向有关部门请示。三个部门，都要有革命干劲，不能闹别扭，要同心协力，把工作搞好。人不在多，只要集中力量，抓住主要问题，不要东抓西抓。抓主要的，可以不要很多人。总政、报社、文艺口当然也有些人是可以吸收的，但不要人多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机关要精简，不要太大，人多了，变成三个和尚没水吃。还是以前说过的，要抓好两头，向上请示报告，向下了解情况。要抓部队活思想，根据上面提出的任务和下边的情况布置工作。下边的活思想，不断变化，上面新任务不断提出，所以要不断地抓两头，不然是搞不好的。政工小组提出的工作的初步设想，今天不能详细地回答和讨论。你们先做一做试一试，文艺组就不详细谈了。”<sup>[1237]</sup>

根据林彪上述讲话，军委政工组、文艺组、军报组似应为独立单位，与军委办事组无隶属关系而仅有“请示报告”的关系。唯据戚本禹、杨成武在同一时期的讲话似并非如此。12月16日凌晨，戚本禹、杨成武接见中直文艺系统一些单位的军代表和各个单位的革命群众代表。戚本禹宣布：“11月12日江青同志在中直文艺系统的代表座谈会上曾经讲过，林副主席已经下令要杨成武同志、军委办事组选几个军、师级的干部，来管文化界的事情，现在杨成武同志已经把人调来了。一个是王宝功同志，他原来是沈阳军区空军的。一个是贾军同志，广州军区来的。还有一个是魏宏武同志，他是二十一军调来的。今后几个样板团，就归他们来领导。”“中央文革请军委办事组，设立这样一个机构，来管文艺界的文化大革命，……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底下的文艺办公室的这几位同志受江青同志领导。日常的事情主要由他们来管。”杨成武接见时也说：“中央、中央文革指示决定，中央直属文艺口和各个样板团，总的是在江青同志、戚本禹同志领导下。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在贯彻江青同志意图下，协助工作。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由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底下的文艺办公室负责。”“他们在江青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重大问题直接请示江青同志。我们协助，卫戍区协助。”<sup>[1238]</sup>

---

【1237】林彪接见军委政工组、文艺组、军报组关于政治思想工作的讲话，1967年12月8日。  
<http://tieba.baidu.com>, 红色之鹰吧, 最后访问: 2014年12月8日。

【1238】中央直属文艺系统斗批联络总站整理:《戚本禹、杨成武同志讲话》,1967年12月16日。王宝功, 时任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 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贾军, 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1968年12月调任陆军第四十七军政治部主任。魏宏武, 时任陆军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三师政委。

根据戚、杨所说，军委政工小组其实是“军委办事组政工组”，而文艺组（戚、杨称之为“文艺办公室”）更是在“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底下的”（按理军报组应亦如此）。即军委办事组领导政工组，政工组下辖文艺组和军报组。戚、杨所说，应为如是。

而据林彪所言，政工、文艺、军报组，均须向中央文革请示报告，“军报要多找伯达同志、姚文元同志，文艺多找江青同志，政工多找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戚称“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底下的文艺办公室的这几位同志受江青同志领导。日常的事情主要由他们来管。”杨称“他们在江青和戚本禹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重大问题直接请示江青同志。我们协助，卫戍区协助。”本来隶属于军队系统的机构，沦为了江青、中央文革的工具。这一不正常的情况，在1968年3月军委办事组改组、政工组撤销以后，才得以根本改变。

## 第五十五节 浙江：驻浙三军的支左态势

### 一、浙江驻军简况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驻军众多。1967年中，驻浙陆、海、空三军军级单位共六个，即：浙江省军区、陆军第二十军、空军第五军、舟嵎要塞区、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部及海军舟山基地。

#### （一）浙江省军区

浙江省军区领率机关驻省会杭州市。司令员张秀龙，第一政委由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兼，第二政委龙潜，副司令员李国厚、刘亨云、何以祥、阮贤榜、万振西、戴克林，副政委郭卓辛，参谋长董毓湘，政治部主任罗晴涛。<sup>[1239]</sup>辖8个军分区（含7个守备团）、1个师级人武部及2个独立师。8个军分区分别为杭州、嘉兴、宁波、温州、金华、台州、丽水、绍兴军分区，1个师级的舟山专区人武部。其中3个沿海军分区辖有守备团，即台州军分区辖守备第八十一团、第八十三团，温州军分区辖守备第八十四团、第八十五团、第八十六团，宁波军分区辖守备第九十一团、第九十二团。2个独立师一为独立第一师，代号6541部队，下辖步兵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师长戚庆连，政委吕允均；二为独立第二师，代号6389部队，下辖步兵第四团、第五团、第六团、第七团，师长文彬，政委李克。

【1239】张秀龙、龙潜、李国厚、刘亨云、何以祥、阮贤榜、万振西、郭卓辛，1955年授衔少将。戴克林，1964年晋升少将。董毓湘、罗晴涛，1965年大校军衔。

## （二）陆军第二十军

陆军第二十军领率机关 1967 年 8 月前位浙江吴兴县，代号 6409 部队。辖陆军第五十八师、第五十九师、第六十师。军直辖炮兵第一二三团，高炮第四十五团。1967 年 8 月，军长熊应堂，政委南萍，副军长曾昭墟、张文和、朱全林，副政委李新源，参谋长林一新，政治部主任沈云章。<sup>[1240]</sup>

8 月 22 日，中共中央作出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决定、令二十军军部进驻杭州后，“二十军机关、直属分队于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进驻杭州市，代行省军区职能，省军区 2 个独立师归二十军建制，各军分区和独立团由二十军领导。”“1968 年上半年，二十军党委根据当时省军区的情况，主动报告南京军区，建议省军区恢复工作。南京军区批准省军区机关恢复工作，恢复对各分区的领导。独立团归建各分区。4 月，二十军机关移交工作后，撤离省军区大院，移驻浙江大学二分部。随后经南京军区批准，2 个独立师归建浙江省军区。”<sup>[1241]</sup>

陆军第五十八师，师部 1967 年 8 月前位江苏宜兴县，代号 6285 部队。师长刘锡文，政委汪石川。辖步兵第一七二团(6286 部队)、第一七三团(6287 部队)、第一七四团(6288 部队)及炮兵第三三八团(6284 部队)。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第五十八师率一七二团、一七三团及军工程建筑第一八一团先后进驻杭州，担负警备任务。五十八师师部为杭州警备区司令部。原担负杭州警备任务的独立二师师部率五团、七团由杭州移驻江苏宜兴县川埠之五十八师营房进行整训。<sup>[1242]</sup>

第五十八师师史称，“警备杭州期间，师还派了部分干部战士到工交文卫的 55 个单位支左。其中工交单位 20 个，文卫单位 35 个。如杭丝联、东升丝厂、东方红丝厂、市交公司、航运公司、人民玻璃厂、杭州烟厂、化工学校等。”“一九六七年八月，浙江诸暨县两派群众武斗，造成浙赣线和萧甬线中断。为迅速恢复铁路交通，保障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省军管会报请中央批准，责成军对该地区实行‘军事包围，政治解决’。军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于九月十三日向军委和南京军区上报了行动方案。当日，师第一七二团二营、三营（欠八连、九

**[1240]** 熊应堂，1955 年授衔少将。南萍、曾昭墟，1964 年晋升少将。张文和、朱全林、李新源、林一新、沈云章，1965 年大校军衔。

**[1241]** 曹学德、陶方桂：《陆军第二十集团军军史》上卷，济南：黄河出版社，1996 年，页 472-473。文中的独立团，应指守备团。1972 年 10 月，报经南京军区批准，军机关率直属分队撤离杭州，返回吴兴白雀营房。随后不久，除少数被结合在省、市、县工作的干部外，支左干部均返回部队。

**[1242]** 《陆军第二十集团军军史》上卷，页 472。1969 年，五十八师后留机构由宜兴川埠移杭州市郊留下。1970 年 1 月，五十八师将杭州市的警备任务分别移交给杭州军分区、独立二师和空五军，移驻留下营房。

连)、一营二连与兄弟部队执行制止武斗、保障铁路畅通任务。十六日,部队达成了对诸暨等地的军事包围,并积极开展政治攻势,迅速制止了当地的武斗,顺利地保障了毛主席的专列于当日十二时通过诸暨。十七日,浙赣线、萧甬线亦随之通车。十月四日后,部队返营。”<sup>[1243]</sup>

陆军第五十九师,师部1967年8月位杭州市郊留下,代号6291部队。师长朱铁谷,政委孟昭玉。辖步兵第一七五团(6292部队)、第一七六团(6293部队)、第一七七团(6294部队)及炮兵第三三九团。第五十九师早于1967年2月即派部分干部战士赴长兴煤矿、丹阳湖农场等地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7年1月至1969年10月,在杭州地区三支两军。1969年11月,第五十九师由杭州留下移驻吴兴白雀原二十军军部。<sup>[1244]</sup>

陆军第六十师,师部1967年8月位浙江金华县,代号6297部队。时师长张孝烈,政委李纯。辖步兵第一七八团(6298部队)、第一七九团(6299部队)、第一八〇团(6300部队)和炮兵第三四〇团。早于1967年3月3日,第一八〇团即以铁路输送进驻江西鹰潭地区,担负反空降、防暴乱任务。后移驻上饶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3月9日,第一七八团进驻永康、武义、丽水执行支农、支工任务。1967年8月后,第六十师负责金华地区的三支两军。

### (三) 空军第五军

空军第五军担负东南沿海地区防空作战任务,领率机关自1954年起即驻杭州市艮山门外机神村。1967年代号7350部队。辖空三师、空十一师、空十二师等部队。军长黄径琛,政委陈励耘,副军长叶泰清、白宗善、孙同盛、王海,参谋长吴云山,<sup>[1245]</sup>副政委及政治部主任缺。6月16日,空军党委常委决定,免去黄径琛空五军党委书记职务,空五军党委以陈励耘为书记,白宗善为副书记,陈励耘此后实际为空五军第一把手。1968年5月,免黄径琛军长职务,遗缺由白宗善接任。空五军为改组后的省军管会主要基础之一,所属部队主要负责杭州地区的三支两军。另所属空十二师(7120部队)驻衢州基地,1967年初即成立三支两

**[1243]** 摩托化步兵第五十八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摩托化步兵第五十八师师史》,1990年12月,页294-295。惟《浙江“文革”纪事》则指责南萍、陈励耘“乘毛泽东主席专列要通过诸暨的机会,于9月13日晚派四个营的兵力由某师及绍兴军分区负责人率领和金华、绍兴等地的造反派武斗队,诸暨县的‘武卫团’分四路围剿诸暨另一派群众组织。打死群众146人,其中有85人是9月15日毛泽东主席专列通过后被打死的。”

**[1244]** 1972年11月,师部由白雀移驻江苏宜兴川埠,二十军军部由杭州移回白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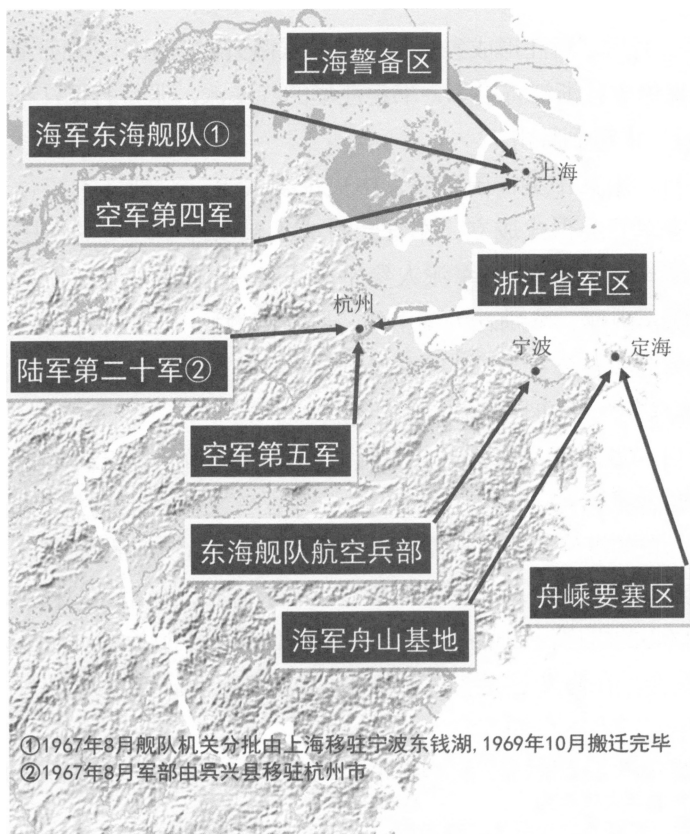
**[1245]** 黄径琛,1955年授衔防空军少将。叶泰清,1961年晋升空军少将。陈励耘、白宗善、孙同盛,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

军联络站（5月改为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介入衢县文化大革命，在衢县支持以衢县联总为代表的造反派。

#### （四）舟嵎要塞区

舟嵎要塞区隶属南京军区建制领导，其领率机关自1958年建立后即驻定海县城关。1967年代号6412部队。辖岱山、定海、普陀、嵎泗四个师级守备区。1967年8月，司令员黄朝天，政委曹思明，第二政委铁瑛，副司令员马龙（海军舟山基地司令员兼）、沈萍、何志聪、黄光裕、王景昆、夏天泰、娄学政，副政委宋献璋（海军舟山基地政委兼）、丁锐，参谋长娄学政兼，政治部主任邱布。<sup>【1246】</sup>舟嵎要塞区及所属部队主要负责舟山地区的三支两军。

### 浙、沪驻军分布图(1967-1968)



【1246】黄朝天、曹思明、宋献璋，1955年授衔少将。马龙，1955年授衔海军少将。铁瑛，1964年晋升少将。沈萍、何志聪、黄光裕、王景昆、夏天泰、丁锐、邱布，1965年大校军衔。



### (五) 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部

东海舰队航空兵部隶属东海舰队建制领导，其领率机关自1955年组建后即驻宁波市。1967年代号4300部队。司令员王学清，政委柴启琨，副司令员李文模、田作成、张祥，副政委侯建华，参谋长姚雪森，政治部主任张茂勋<sup>[1247]</sup>。其领率机关主要负责宁波地区的三支两军。

### (六) 海军舟山基地

海军舟山基地隶属东海舰队建制领导，其领率机关自1950年组建后即驻定海县城关。1967年代号4007部队，辖长涂水警区、温州水警区等部队。司令员马龙，政委宋献璋，副司令员张先军、沈佩华，副政委张明汉，参谋长缺，政治部主任刘友法<sup>[1248]</sup>。其领率机关主要负责舟山地区的三支两军。

## 二、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

1967年2月后，浙江形成省联总和红暴派两大群众组织。浙江省军区介入文革后，支持保原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红暴派，坚持打倒江华的省联总，在“二月镇反”中遭到打击。

3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浙江省实行军事管制。3月25日，省军管会正式成立。军管会组成人员以省军区为主，驻浙舟嵊要塞区、陆军第二十军、空军第五军派人参加。龙潜为军管会主任，阮贤榜为第一副主任，曹思明、南萍、陈励耘为副主任，罗晴涛为秘书长。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和办公室。<sup>[1249]</sup>省军管会内部在支左问题上形成不同意见，参与组成军管会的第二十军和空五军，倾向省联总。

7月23日，省联总、红暴派赴京代表会谈达成解决浙江问题的八条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有：驻浙江空五军、二十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大方向是正确的，以龙潜为首的浙江省军区党委在支左过程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该公开向群众作深刻检查；省联总和红暴派应该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逐步实现以省联总为核心的更广泛的革命大联合，根据目前具备的条件，积极筹备建立杭州市革命委员会。在协议上签字的有省联总和红暴派两派赴京代表。<sup>[1250]</sup>

【1247】王学清，1955年授衔少将。柴启琨，1964年晋升海军少将。李文模、姚雪森、张茂勋，1965年海军大校军衔。

【1248】张先军、沈佩华、张明汉、刘友法，1965年海军大校军衔。

【1249】参见浙江省军事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军事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页89；程超、魏皓奔：《浙江“文革”纪事（1966.5-1976.10）》，杭州：《浙江方志》编辑部，1989年，页40。

【1250】《浙江“文革”纪事（1966.5-1976.10）》，页54。

7月31日，晚上，省联总主持召开“龙潜检查认罪大会”，龙潜、张秀龙、李国厚、罗晴涛等省军区领导到会，龙潜作了《关于在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sup>【1251】</sup>

8月3日，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印刷厂、驾驶班、电影站、俱乐部等单位部分职工发表了《给省军区司、政、后广大指战员、革命职工、革命家属呼吁书》，呼吁广大指战员与龙潜划清界线，掉转矛头，反戈一击。并冲击了省军区党委扩大大会，揪斗了张秀龙、龙潜、阮贤榜、李国厚、何以祥、董毓湘、罗晴涛，同时成立了省军区内第一个造反组织八三造反兵团。8月5日，省军区后勤部宣传队成立了八五造反兵团，8月10日，省军区司令部汽车队成立了八一〇造反兵团。同日，由八三造反兵团等十九个造反组织发起，在省军区司令部大操场召开了省军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总指挥部（简称军联指）成立大会，地方341个造反组织数万人参加大会，会上揪斗了龙潜、张秀龙、何以祥、阮贤榜、李国厚、董毓湘、罗晴涛。会后，组织了挂牌游斗。<sup>【1252】</sup>

8月8日，周恩来批准浙江省军区机关关门开展“四大”（实际上“四大”已经搞了十多天）。<sup>【1253】</sup>

8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决定，全文如下：

根据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更好地使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浙江省范围内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圆满完成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驻浙三军的“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浙江省军区。由二十军、空五军为基础改组省军管会，任命南萍同志为军管会主任，陈励耘、张明汉二同志为副主任，孟昭玉、朱后年、张磊、吴健为委员。

并任命二十军军长熊应棠同志代省军区司令员，南萍同志代政委，二十军军部进驻杭州，对浙江省军区所属独立师、团、营、连、边防部队、军分区、人武部实施统一指挥和领导。

原浙江省军区机关开展“四大”，由龙潜、阮贤榜同志负责领导。省军区革命领导干部，视运动进展情况逐步参加新的军事领导机构和军管会的工作。<sup>【1254】</sup>

【1251】省联总：《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页140。

【1252】《浙江“文革”纪事（1966.5-1976.10）》，页58。

【1253】《浙江“文革”纪事（1966.5-1976.10）》，页59-60。

【1254】《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页149。朱后年，时任陆军第二十军政治部副主任。张磊，时任空军第五军政治部副主任。

浙江省军区改组后，司令员张秀龙、第二政委龙潜免职。余者名义上虽仍保留原职，但多人被不同程度的批斗。

8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省军区“交权”大会，省军区司、政、后机关及部分职工参加。会议一开始，当张秀龙刚宣读中央电报时，军联指造反派头头即上台夺过电报，后勤部机关和工程队一些造反派冲上大会主席台，把张秀龙、龙潜、阮贤榜、何以祥、刘亨云、董毓湘、罗晴涛等省军区领导踢倒，跪在台上，搞喷气式。南萍、熊应堂等人坐在主席台上，会后，张秀龙、龙潜以及省军区党委常委全部关押，被军内外造反组织长期轮流揪斗，从此原省军区司政后机关全部瘫痪，然后由二十军对口接管。省军区机关部队被接管后，群众编了两句顺口溜：“南山来了一只熊，一口吃掉‘两条龙’”。<sup>【1255】</sup>

### 三、从毛泽东召见至省革委会成立

9月16日中午，毛泽东南巡途中乘专列抵达杭州。毛在专列上召见了南萍、陈励耘，对二十军和空五军的工作予以肯定。参加接见的还有张春桥、汪东兴和余立金。有关召见过程及毛的主要谈话内容如下：

“主席！”南萍敬礼，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一边握手，一边打量南萍：“南萍，你就是南萍么。你的祖宗是不是南霁云<sup>【1256】</sup>啊！”毛泽东嘴角流出笑：“你就是南霁云的后代，你处理这些事情有经验。”

“我是照主席指示办。”南萍以为毛泽东是说他处理温州武斗和全省支左问题。

“主席！”陈励耘敬礼，然后用双手去握毛泽东的手。“陈励耘，你应该是在以南萍为中心的领导下，你的空五军比南萍的力量大就不好了。是不是啊？”“是。”陈励耘恭敬回答。

“空五军和二十军要互相学习；二十军向空五军学习，二十军为主嘛，空五军要服从。”

毛泽东朝着刚刚坐下的陈励耘问：“你服从不服从啊？”“服从。”陈励耘答。

“我们的军队历来有两种作风，一是民主作风，官兵关系好，就是互相学习进行自我批评，搞好上下级关系；另一种是训人骂人，摆架子，不平等待

【1255】《浙江“文革”纪事（1966.5—1976.10）》，页68。

【1256】南霁云，唐朝玄宗、肃宗时期名将，生于魏州顿丘（今河南清丰）南寨村农民家庭。在“安史之乱”中协助张巡镇守睢阳，屡建奇功。后睢阳陷落，宁死不降，慨然就义。

人，缺乏民主，上下级关系不好，士兵怕连长，要教育连排长，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一个连长都是了不起呀，如果出了一个营长那就更了不得啦！”毛泽东睁大眼睛表示“了不得”的神情。他又说：“我那个村子里出了个师爷就了不得了。我们的一些元帅，总是训人骂人，如果你真有理就不要训人了。现在我们的干部都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我在上海就反复讲这个上下级关系问题。一个人挨整，一种是自己犯了错误，挨了整；一种是坏人整好人，好人挨了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是一大缺点。南萍，你挨过整没有？”

“没有。”南萍回答。

“这是一大缺点。”毛泽东指点南萍，尔后问陈励耘：“你挨过整没有？”

陈励耘回答：“三反时挨过整。”

“好！”毛泽东声音很高，“红卫兵、工厂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犯个错误好。南萍你们为什么要派独立一师师部到温州去？”“温州军分区瘫痪了，”南萍解释，“派他们去主持温州的工作。”听南萍说温州军分区瘫痪了，毛泽东说：“越瘫痪越好，烂透了的就好解决。”

听了南萍对温州形势的汇报，毛泽东问：“为什么‘温联总’又分三路向温州城反攻？”

南萍说：“‘温工总’控制温州城后，如何对待另一派，在政策上犯了错误，用报复的态度对待‘温联总’。”

毛泽东点头：“分区司令、政委不要在那里层层挨斗，可调到军区来。对龙潜和张秀友不要这样搞，什么喷气式、罚跪。人家犯了错误就很难过，你又这么地层层斗，不好！不要这么搞。我们对黄伯韬、王耀武、杜聿明都不这样搞嘛！我们不要这样搞。上海斗陈丕显、曹荻秋，说比较文明，但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人家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二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了的作风不利，我们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被搞乱了，被破坏了。”

毛泽东告诫南萍和陈励耘：“你们对两派的意见都要听。红暴的观点在一家就有斗争，有的儿女是红暴观点，有的儿女是革联观点……要一分为二，一家也分两派，两派意见都要听。我家里就有两个孩子是造反派，两个孩子是保守派，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过去八条命令中就有一条要教育好孩子，教他们不听，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教育他们。”此时毛泽东谈到了干部子弟，他说如果工农子弟不把他们看成朋友，那他将来就没有希望。

毛泽东要南萍、陈励耘转达他对二十军和空五军军长、副军长的问候，他们向毛主席反映空五军的黄军长表现不大好。

“不要只看他一时一事，他打过仗的嘛，一个同志犯了错误，能帮你们一定要帮，你们对省委、地委的干部要慎重。红卫兵一风吹不好。对一些干部不放过，也不能搞得太苦了，什么喷气式、挂黑牌罚跪、抄家，这些要禁止。”

……

毛泽东谈着谈着，又说到了南霁云。唐朝有个南霁云搬兵。有个叫张巡的被安禄山杀了，南霁云去搬兵报仇，搬不到兵就不走。他说：“我城里老百姓没吃的，不发兵我也不走。”

毛泽东再次望住南萍：“你南萍是不是南霁云的后代呀？”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接着，毛泽东说：“军队在一个地方久了不好，他舍不得亲戚朋友，姻兄大姑，金银财宝，包袱太重了，可以寄给家里嘛！或者是送给贫下中农嘛！不要爱财如命。”

毛泽东将身体仰到靠背上，吸着香烟，带着结束的口吻讲了最后几句话：“孔明都有七擒孟获，我们共产党不仅可以搞七擒，还要可以搞八擒嘛！一次反围剿杀张辉瓒我就不赞成，主要是彭德怀要杀。张辉瓒不仅是个师长而且是个总指挥。”<sup>【1257】</sup>

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称，“毛主席最近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问题，作了重要的批示。”“毛主席说：‘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

196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浙江省“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个文件作出批示，批准这两个协议。其中《浙江“省联总”和“红暴派”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第三条中称，“驻浙三军广大指战员和改组后的省军管会，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大方向正确，特别是七三五〇、六四〇九部队在支左工作中，为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取得了伟大成绩。我们坚决拥护省军管会的正确领导，积极支持和协助驻浙部队、各地支左联络站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支左不支派’的原则。”

---

【1257】水陆洲：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九、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3546> 最后访问：2014年12月21日。个人人名根据史实作了订正。

1968年3月18日晚至19日凌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京西宾馆接见浙江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称，“中央批准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浙江省形势大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批示又称，中央同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五十名委员组成。由南萍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励耘为第一副主任。革命委员会常委共37人，其中军队代表11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朱全林、孟昭玉、白宗善、阮贤榜、戴克林、曹思明、王学清、刘友法。

周恩来在当晚的讲话中称，“在东南方面，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推动江苏，推动福建，推动安徽等等的地方。所以我想，三月份会形成一片高潮。现在在北京等着中央讨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六、七个省，你们是在这六、七个省中第一个得到批准的，这是件好事。……这一次中央批示点了那么多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名，刘、邓、陶、彭、罗、陆、杨、彭、贺，这是最多的一次。你们得到这个批示，要珍惜这个斗争。因为你斗私批修也好，学习毛泽东思想也好，总要有个目标嘛！党内最大的一小撮就是主要的目标。他们是代表一小撮。党内走资派里面有叛徒，甚至有特务，里头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央在这里列举出来，但不止此，这是一个举得比较多的一次。”<sup>【1258】</sup>

3月24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 四、驻浙三军在全省各地的三支两军

1967年，浙江省辖8专区、3地级市。除省军管会统管全省三支两军外，杭州市主要由二十军及空五军直接负责；金华地区主要由六十师负责；绍兴、嘉兴、丽水、台州地区主要由军分区负责；温州地区（包括温州市）主要由独立一师负责；宁波地区（包括宁波市）主要由东海舰队航空兵部负责；舟山地区由舟嵎要塞区及海军舟山基地负责。

##### （一）杭州市

1967年11月28日，新华社播发了《解放军报》刊登的驻杭州6291部队（即第五十九师）党委领导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文章称，6291部队自1967年1月即成立支左机构，介入杭州文革，公开表态支持省联总。文章高度赞扬6291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顶逆风，战恶浪，对浙江省和杭州市的

【1258】《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页204-205。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12月20日，杭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为原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王子达，副主任为陆军第五十八师兼杭州警备区政委汪石川等三人。

## (二) 金华地区

据《浙江“文革”纪事(1966.5-1976.10)》：1967年8月8日，“省军管会、省军区及‘省联总’分别发表《关于金华‘八·三’反革命事件的公告》。10日，《杭州日报》刊登《金华‘八·三’严重政治事件真相》提出：‘金工总’非法绑架殴打和审讯省军管会派往青田县调查组的五位同志，杀害了调查组工作人员蔡寿山。《浙江日报》报道：省军管会和‘省联总’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宣读通告怒斥‘金工总’一小撮坏头头在黑后台支持下制造‘八·三’严重政治事件真相的文章。12日，省市造反派和驻军代表五万人在少年宫广场集会，声讨‘金工总’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在其黑后台支持下，公然非法拦车、绑架、殴打、杀害省军管会赴青田调查组人员的滔天罪行，沉痛哀悼在这次严重政治事件中，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光荣牺牲的战友——蔡寿山同志。参加集会的造反派表示：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混进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倒‘金工总’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在会上发言的有‘省联总’代表、省军管会代表周文江、杨家骏以及各地造反组织代表。15日，《浙江日报》报道：全省各地造反派和群众纷纷集会游行示威，坚决支持金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愤怒声讨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支持‘金工总’一小撮坏头头制造‘八·三’严重政治事件的滔天罪行。16日，《浙江日报》刊登：驻金华6297部队发表公告坚决支持‘金二司’等造反派，坚决拥挤省军管会的严正立场和措施，‘金工总’一小撮坏头头和杀人、打人凶手必须依法严办。”<sup>[1259]</sup>

1968年4月24日，金华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为第六十师政委李纯。

## (三) 绍兴地区<sup>[1260]</sup>

1967年2月初，绍兴军分区在全地区党政机关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下，成立支左联络站，进驻地专机关，执行三支两军任务。2月23日，绍兴军分区和各县人武部相继建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领导本地区工农业生产。

2月28日，诸暨县人武部发出公告，支持一派群众组织。7月14日，又发出布告，支持另一派群众组织。诸暨局势动荡不定，两派武斗不断升级。7月28日，

【1259】《浙江“文革”纪事(1966.5-1976.10)》，页61-62。

【1260】主要资料来源：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绍兴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诸暨县实行了军事管制。9月14日至18日，诸暨县红总武卫团和金华、绍兴两地造反派及支左部队五个营，与诸暨县联总发生枪战，双方死亡146人。

6月29日至7月4日，嵊县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一派被赶出县城。此后武斗不断升级，枪弹交锋，死伤惨重。7月12日，嵊县实行军事管制。

1968年5月15日，浙江省革委会批准成立绍兴地区革命委员会。19日举行成立大会，全地区十万人参加。绍兴军分区代政委叶剑华<sup>[1261]</sup>为地区革委会主任。

#### （四）嘉兴地区<sup>[1262]</sup>

1967年1月下旬，驻嘉兴部队奉命介入文化大革命。2月，以驻嘉2607、6284部队<sup>[1263]</sup>为主，成立嘉兴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简称支左联络站）。3月9日，嘉兴军分区成立生产办公室，各县人武部相继成立县生产办公室，分别行使专署和县级指挥生产、经济的职权。7月，嘉兴支左联络站公开表态支持浙江省联总下属的嘉兴联总指。嘉兴城内连续发生“八一〇”、“八一五”和1968年的“一一五”（1月15日）三次大规模武斗，死11人，伤300余人。1968年2月26日，海宁县两派组织在硖石镇发生武斗，当场死五人，伤215人。

1968年9月16日，嘉兴地区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主任为嘉兴军分区司令员王民。

#### （五）丽水地区

1967年，丽水地区两派分别为：2月17日成立的丽水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丽联总）与7月6日成立的丽水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丽水革联总）。

1968年11月24日，丽水地区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主任缺，主持工作的第一副主任为丽水军分区副司令员何纪明。

#### （六）温州地区

温州地区为浙江文革的重灾区。

1967年1月，温州地市各级党政机关受“一月风暴”冲击，处于瘫痪及半瘫痪状态。3月31日，温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对温州地、市实行军管。军管会以温州军分区第二政委张序昭为主任，海军温州水警区政委廖云台、温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汪国璋为副主任。

【1261】叶剑华，1965年大校军衔。

【1262】主要资料来源：《嘉兴市志》编纂委员会：《嘉兴市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

【1263】2607部队为空军嘉兴基地的代号，6284部队为陆军第五十八师炮兵第三三八团的代号。



1967年5月后，温州两派——温联总与工总司矛盾逐步激化。温联总据称得到了军分区和人武部的支持。7月10日，两派开始武斗，7月底起武斗升级，动用枪炮，武斗持续两年之久。7月27日至8月3日，温州五马街口邮电分局、新华书店、钟表店、美术公司和县前头解放电影院以及周围民房计二万四千多平方米，在武斗中被烧毁。<sup>[1264]</sup>8月1日，6517部队（独立第一师三团）奉命进驻温州，9日，6299部队（第六十师步兵第一七九团）进驻温州，公开表态支持工总司派。11日，经省军管会批准，联合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温州支左部队联合指挥部”。<sup>[1265]</sup>8月14日，“省总联”发表《关于温州地区目前形势的声明》。声明提出，“7月份以来，江华、龙潜、王芳等走资派，支持‘温联总’，对支左部队断粮、断煤，矛头指向解放军”，声明称誓与温州无产阶级革命派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坚决打倒“温联总”的黑后台及一小撮坏头头。8月15日，省军管会发表《关于温州地区当前局势的公告》（简称八一五公告）。《公告》提出，温州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支持“温联总”保守组织，温州军分区和水警区人武部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8月20日，《浙江日报》刊登北京专电，称首都及全国各地在京的一千多个革命派组织的代表隆重集会，坚决支持温州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温州革命派赴京代表在会上控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温联总”一小撮坏头头的滔天罪行。《浙江日报》发表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sup>[1266]</sup>10月12日，独立第一师师部率直属队进驻温州。12月28日，经省军管会批准，改组原温州军管会，成立新的温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独立一师政委吕钧任主任；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温州支左部队联合指挥部”。

1968年8月5日，省革委会就温州紧张局势问题发出布告，称温联总须“立即无条件停止军事进攻，解散一切武斗组织，拆除工事、据点，撤除包围。如继续进攻，挑起武斗，一切后果完全由‘温联总’一小撮坏头头和幕后策划者负责。”<sup>[1267]</sup>12月3日，温州地区和温州市革命委员会同时正式宣布成立。温州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为独立一师师长戚庆连，温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为独立一师政治部主任毕庶璞。

【1264】参见温州市志编纂委员会：《温州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页62。

【1265】据《陆军第二十集团军军史》：“遵照中央关于处理温州问题的指示精神和中央军委命令，由浙江省军区派员率独立一师三团和六十师一七九团于8月进驻温州，担负隔离两派，制止武斗的任务。后奉中央军委指示，二十军派独立一师师部率直属队进驻温州，统一指挥温州军分区所属部队。”

【1266】《浙江“文革”纪事（1966.5—1976.10）》，页62—63。

【1267】《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页252。

### (七) 台州地区

1967年4月，成立台州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为台州军分区政委徐舒民。因两派对立严重，地区革委会无法开展工作。9月，由台州军分区组成“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维持地区的工作，原台州地区革委会实际解体。1969年1月20日，重新成立台州地区革委会，由台州军分区司令员蒋玉和任主任。

### (八) 宁波地区<sup>[1268]</sup>

1967年2月11日，宁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无联总或联总指)成立，得到驻宁波部队支持。此前，宁波造反派组织为宁波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宁工总司)及宁波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宁总司)。2月22日，市公安局军管会通令取缔宁工总司。25日，通令取缔宁总司等六个群众组织，先后逮捕八人(5月26日宣布平反，释放被捕人员)。3月14日，宁波地区、宁波市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地区革委会主任为东海舰队航空兵部政治部主任张茂勋，市革委会主任为宁波军分区副政委郑若鸿。由于两派对立严重，革委会无法正常工作。6月24日，浙江宁波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工联总)宣布成立。7月30日，宁波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宁联总)也宣告成立。随之，形成两大派较长时间的对峙、抗衡，武斗不断。11月23日，宁波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3月成立的地区、市革委会解体。宁波军管会由驻宁波东航部队、宁波军分区、舟嵎要塞区七位负责人组成，主任为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部司令员王学清。

1968年8月8日，宁波军管会通告，立即解散各派的武斗队，并要求各派迅速联合起来。8月10日，宁波军管会发出通知，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严禁擅自抄家。10月上旬，宁波军管会部署“清理阶级队伍”。

1969年1月30日，宁波地区、宁波市革命委员会重新成立。地区革委会主任为东海舰队航空兵部政委柴启琨，市革委会主任仍为郑若鸿。

### (九) 舟山地区<sup>[1269]</sup>

舟山地区亦为浙江文革的重灾区。

1966年12月20日，中共舟山地委曾宣布中共中央关于舟山地区文化大革命暂缓进行的指示。在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压力下，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

【1268】主要资料来源：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宁波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1269】主要资料来源：舟山历史大事记(唐—1988年)，<http://www.cseac.com>，最后访问：2014年12月22日。

务院同意舟山地区在带渔汛期基本结束时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月，舟山地区革命造反总部<sup>【1270】</sup>与舟山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sup>【1271】</sup>相继成立。

3月17日，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舟山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曹思明任主任，黄朝天、宋献璋任副主任。地区军管会“行使领导与监督舟山地区党、政、财、文一切权力”。7月28日，军管会召开大会，为2月份被取缔的舟山地区革命造反总部等组织和被拘捕人员平反。

1968年至1969年，两派武斗不断。1968年底，一派在全区范围内大批抢夺民兵仓库武器，另一派动用海上民兵武器，各据一方。

1969年3月上旬，两派动用枪炮进行大规模武斗，省革委会就舟山武斗事件给舟山地区军管会发出“紧急电报指示”，指责舟总指“少数坏头头”“置省革命委员会的多次指示于不顾，变本加厉，有组织、有计划地向‘舟联总’及其所属组织发起全面的武装进攻”。

1970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70]18号文件，同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南京军区党委关于解决舟山问题的报告。3月20日，舟山地区军管会举办两大派群众组织头头参加的学习班。1971年春，两大派实现大联合，11月，“倒旗”解散。

1971年4月6日，舟山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铁瑛任主任，沈佩华任第一副主任。这是全国最迟成立的一个地级革委会。

以上十一个地专级革委会，仅有一个是在1967年成立（未计宁波、台州），六个在1968年成立，三个在1969年成立，一个在1971年成立。浙江堪称“老大难”省。

## 第五十六节 天津：实际上是军人一统天下<sup>【1272】</sup>

### 一、天津驻军简况

1967年1月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时，天津市驻有2个军级单位：

【1270】9月15日改称舟山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舟联总。

【1271】12月13日改称浙江省（地、县）红色暴动委员会舟山地区总指挥部，简称舟总指。

【1272】主要资料来源：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大事记》，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王辉：《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

### （一）陆军第六十六军

陆军第六十六军领率机关 1967 年驻天津市新华路 28 号，<sup>【1273】</sup>代号 4688 部队。辖陆军第七十四师、第一九六师，代管北京军区工程兵第五工区，直辖炮兵第一七三团，高炮第九十一团。1967 年 2 月，军长郑三生，政委杨银声，副军长刘政、许诚，副政委杨子安、宋长庚，参谋长宋中和，政治部主任倪子文。<sup>【1274】</sup>

陆军第七十四师，师部 1967 年位天津杨柳青镇，代号 4701 部队。师长董光继，政委费国柱，副师长郑东明，副政委段曙光、罗倬、黄建民，参谋长郭铁，政治部主任刘明森。辖步兵第二二〇团、第二二一团、第二二二团，炮兵第三五二团，坦克自行火炮第四〇三团。该师师史称，自 1967 年 1 月后，“全师抽调干部 557 名、战士 1159 名（其中 11 个建制连队），分布在 53 所学校，74 个工厂，33 个公社和农场，6 个军管单位，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后来又在天津成立支左联络站。”1967 年“8 月 15 日，奉命派出炮兵团一连、九连，师直防化连，220 团七连等 4 个连队，担负天津西站至德州站的护路任务。师组建护路指挥组，隶属天津铁路分局军管会及师双重领导。”1966 年底，“220 团及师直、炮兵团部分兵力和在大站农场生产的步兵第 221 团、步兵第 222 团一起投入了垦荒造渠劳动。”1967 年 2 月，“220 团也担负大站农场生产任务。自此到 1969 年 10 月，三个步兵团主力全在大站农场执行生产任务。”<sup>【1275】</sup>

陆军第一九六师，师部 1967 年位河北武清县杨村，代号 4717 部队。师长袁涛，政委张波，副师长董正海、汪治平，副政委王克、郑重，参谋长庞秀廷，政治部主任王东方。辖步兵第五八六团（4798 部队）、第五八七团（4720 部队）、第五八八团（4735 部队），炮兵第五七六团（4760 部队）、坦克自行火炮第四〇一团（4681 部队）。“遵照北京军区和第 66 军的指示，3 月底，我师从北京撤回 586 团。该团同师侦察连等单位率先进入天津市，参加地方‘三支两军’工作。4 月初，师又陆续抽调部分部队进入天津市，在塘沽区、和平区、南开区、二机局、一轻局、二轻局、交通局、科技局和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以及武清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8 月，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588 团 1 营进入天津市，执行巡逻任务。

【1273】军领率机关 1969 年 11 月迁至八里台东风大学（原天津师范学院），1972 年 7 月迁回新华路 28 号。

【1274】郑三生、杨银声，1955 年授衔少将。许诚，1964 年晋升少将。刘政、杨子安、宋长庚、宋中和、倪子文，1965 年大校军衔。

【1275】步兵第七十师简史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七十师（原七十四师）简史》，1989 年 1 月，页 213-214。

从1967年到1972年，我师先后有58个建制连队5000余名干部战士走出营房，分散在天津市有关单位执行任务。”<sup>【1276】</sup>

第五工区于1964年10月由六十六军负责组建并代管，代号京字416部队。1967年2月工区主任丁春秋，政委冀敬先，参谋长张连珠，政治部主任张凡平。辖工程兵建筑第一五九团、第一六〇团、第一六一团、第一六二团。担任天津、唐山、秦皇岛地区的国防工程施工任务。

## （二）天津警备区

天津警备区原属河北省军区领导的师级单位。1967年1月天津恢复为直辖市后，天津警备区升格为军级单位，改由北京军区直接领导。1967年2月，军委命令第六十六军军长郑三生兼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政委缺，5月后，第一副司令员王一，副司令员朱彪，副政委王元和、韩德富，参谋长吴志远，政治部主任韩德富兼。<sup>【1277】</sup>下辖13个区人民武装部。

## 二、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的活动

1967年1月2日，中央决定河北省省会由天津迁往保定，天津恢复为中央直辖市。并决定，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解学恭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为第二书记。1月至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被毛泽东派到天津，以躲避批李的风头。

1月7日始，天津日报社、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电视台、市电信局、市公安局等先后被夺权。天津党、政机关迅即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

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重要目标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对仓库、电台、监狱和重要工厂等58个重要目标实施军管和警卫。1月底，天津驻军正式介入天津文化大革命。2月4日，天津驻军支左机构，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驻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联络站”（简称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参加该联络站的驻军军级单位两个，即陆军第六十六军和天津警备区。师级单位为海军司令部航海保证部、河北省军区独立第二师、北京军区后勤部第八分部、空军高炮第八师和空军第七师等。

【1276】步兵第一九六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九六师师史》，1996年6月，页290。据师史称，1966年8月中旬，奉命派遣五八六团赴京，9月又增派五八七团和五八八团一营，在北京卫戍区领导下，在北至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南至中越边界的凭祥，东至山海关，西至宁夏石咀山的铁路线上执勤。另据师史大事记记载，全师参加三支两军累计4,353人，其中干部872人，战士3,421人。

【1277】王元和，1962年晋升少将。朱彪、王一，1965年大校军衔。

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实际以六十六军为核心。联络站成立后，与李雪峰、解学恭均倾向于天津大学八一三、南开大学卫东，而与天津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等组织感情疏离。

1月29日，天津驻军军事接管了天津日报社。30日，《天津日报》停刊。31日复刊，出版军字第一号《天津日报》。后因一批造反派占领警备区大楼，反对军管天津日报社，2月12日，驻军撤出报社。<sup>【1278】</sup>

2月14日<sup>【1279】</sup>，公安部、天津警备区司令部发布联合布告称：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天津警备区司令部接管天津市公安局，建立军事接管委员会，任命刘政为军管会主任，韩德富、张振江<sup>【1280】</sup>为副主任，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事管制。同日，天津市公安局军管会发布两个通告，一号通告为宣告成立公安机关军管会，二号通告宣布公安局系统群众造反组织“政法公社”是“万张反党集团”<sup>【1281】</sup>的御用工具，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sup>【1282】</sup>

3月3日，天津市“三结合”夺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成员有解学恭、萧思明、郑三生、杨银声、胡昭衡及九名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解学恭任组长，萧思明任副组长。6月19日，该小组更名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sup>【1283】</sup>

3月7日，毛泽东对六十六军郑三生、衣瑞伦、杨竹亭<sup>【1284】</sup>三人署名、3月6日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报告作出批示称：“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sup>【1285】</sup>

【1278】刘小荣：《1966-1976年的天津》，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页74-75。

【1279】根据萧思明、郑三生、杨银声三人1967年11月26日的检查，军管日期为2月13日。

【1280】张振江，时任六十六军后勤部副政委。

【1281】万张，指已被打倒的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已于1966年9月19日在批判大会后心脏病发去世）及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淮三。

【1282】《1966-1976年的天津》，页75、80-81。

【1283】《天津通志·大事记》，页409。萧思明，河北省军区原政委（1965年5月由曾美接任），1955年授衔少将。胡昭衡，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市长。

【1284】衣瑞伦，时任六十六军副参谋长。杨竹亭，时任六十六军政治部副主任。

【128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51。

同日，天津警备区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警备区副参谋长牛喜元<sup>【1286】</sup>负责领导。指挥部下设工业和农业办公室。各区和基层单位也成立相应的生产指挥机构。

3月15日，天津市夺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宣布：天津市工人、农民、大学红卫兵、中学红卫兵、干部等五个代表会议筹备小组成立。到22日，先后召开了五个代表大会，产生了天津的“五代会”。

3月27日，天津市夺权筹备小组组成天津市代表团，赴京向中央汇报成立天津市革委会准备工作情况。代表团成员有解学恭、萧思明、郑三生、胡昭衡等和50名“五代会”代表及特约代表。4月7日、9日和10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三次接见天津市代表团全体代表。4月10日，周恩来在接见时称：“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两个系统领导——省委和市委。后来天津划为直辖市，省委不管了。开始省委管大学，市委管中学、工矿企业、财贸。有这个复杂情况。从市委讲，今天你们清楚了，知道有个万张反党集团。开始很迷惑了一些人。我们发现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万晓塘死了以后，几十万人悼念，搞什么名堂？我们很奇怪。”“万晓塘死了，跟着出来个张准三，不仅继续执行反动路线，而且还继续布置搞阴谋，在工交口安插了他的亲信。刚才江枫<sup>【1287】</sup>同志的揭发就说明了问题。首先揭露万张反党集团的是江枫同志。伯达同志看了他的信，注意了这件事，派解学恭同志去天津，把张准三调到山西。他心里有鬼，没等找他谈话就自杀，没有死又调回来了。接着又搞公安局的反革命夺权。有些小将受了骗，承认了错误。在天津，万张集团控制达七、八个月之久，执行和发展了刘邓路线。这是主要的。”“全国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刘邓，他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天津主要是万张反党集团。一个死了，一个还在嘛！十七年的统治影响很深。”由此，天津开展了揭发批判“万张反党集团”的一系列行动。4月23日，天津市工、农、学、干代表会和驻军，在中心广场举行了有20万人参加的“揭发批判党内最

【1286】牛喜元，1967年2月前任原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警备区升格后调整为警备区副参谋长。

【1287】江枫，原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据王辉《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称：江枫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长期从事公安工作。天津解放时，江枫属于来自于晋察冀社会部和冀中公安局的那一部分人，他们主要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市委书记万晓塘带着来自于冀鲁豫公安局的一些人，主要负责经济保卫工作。两批来自于不同山头的人马，过去就有矛盾。文革开始后，支持江枫的一些人成立了公安局造反总部，反对江枫的一些人成立了政法公社。前者反市委，后者保市委。万晓塘心脏病猝死后，江枫最早提出怀疑是自杀的。1967年2月14日，市公安局军管会成立后，即宣布天津政法公社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之后成立干代会时，公安造反总部又成了干代会的主要成员，成为江枫进入市革委会领导的重要支持力量。

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爪牙——天津市委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sup>【1288】</sup>

据《天津通志·大事记》：4月24日，有20多个组织三千多人冲击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28日停止。4月27日，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体育学院、河北大学等院校学生组织，在南开大学发生万人卷入之武斗事件。<sup>【1289】</sup>5月5日，石油部641厂造反派组织二千人左右冲击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5月12日，天津铁路分局总调度室被砸，致使津浦、京山线指挥中断23小时。5月13日，北京军区司令部发出布告，奉命对天津铁路分局及所属各站、段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5月19日，天津警备区司令部发出布告，奉命对天津钢厂及所属分厂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同日，对天津市民政局所属之卫南洼农场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管小组。5月21日，天津警备区司令部发出布告，奉命对石油部641厂及所属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5月22日，天津市话剧团在人民剧场彩排话剧《新时代的狂人》<sup>【1290】</sup>，市夺权筹备工作小组、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负责人参加了审查，同意作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重点剧目，23日开始公演。<sup>【1291】</sup>

6月27日，天津市革委会筹备小组、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中共天津警备区委员会联合发出《重要通知》，公开号召批判万晓塘和张淮三，宣布他们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天津的忠实代理人，天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sup>【1292】</sup>

---

【1288】参见晨蓝新光：各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纪事第九章天津市

<http://blog.163.com/shg0515@126/blog/static/32501372201281211950144/>，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12月15日）。

【1289】据当时资料称，武斗以南开卫东和天大八一三为一方，体院思想兵、河大八一八等十余组织为另一方，双方都有伤亡，甚至打伤了劝阻的解放军。

【1290】《新时代的狂人》以当时闻名全国的“陈里宁事件”为蓝本创作编排。陈里宁原是湖南湘潭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从1960年代初期起，他就给中央写信、撰文批判刘少奇，曾三次被送进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后被公安部作为反革命要案审查，再后被关进北京公安部十三局看守所，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陈里宁在审讯和治疗间循环不止，总计四次送进安定医院。文革开始后，北京一些高等学校的群众了解到陈里宁的情况，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称他们发现了一个因为批判刘少奇而被公安部门抓起来关在精神病院的人，得到戚本禹的支持。陈里宁在一段时间里被宣扬为反刘少奇的英雄，被誉为“新时代的狂人”。六场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在六十多天共演出了47场（包括在北京12场），观众达五万余人。未几，陈里宁又被发现还有攻击毛泽东等言行，很快就被重新收监。1968年1月戚本禹倒台后，《新时代的狂人》也随之被中央认定为“黑戏”，成为1968年2月天津“二二一事件”的主要诱因。

【1291】《天津通志·大事记》，页411。

【1292】《天津通志·大事记》，页412。



### 三、天津市革委会中的军人

8月15日和16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先后在北京接见了有天津“五代会”和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天津两大派群众组织之一）的代表参加的天津市赴京汇报代表团，指出要搞“停止武斗、扩大加强五代会、扩大加强革筹小组”三个协议。根据中央要求，天津市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群众组织分别于8月18日、24日达成了《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8月25日，天津市制止武斗执行协议监督小组成立，其任务是执行“六六通令”，确保协议的实施。<sup>【1293】</sup>

9月12日，天津赴京代表团双方群众组织达成《关于收回抢用、非法占用车辆及维护交通秩序的协议》。10月19日，天津市革委会筹备小组、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联合发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的通知。从10月18日至20日两天之内，全市220多个工厂按车间、班组实现了联合。<sup>【1294】</sup>

11月26日，萧思明、郑三生、杨银声就六十六军自1967年1月底介入天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向毛、林、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并北京军区作出检查。检查中称：

我们介入天津市文化大革命的第四天，即二月一日，有一部分群众组织开始冲击天津警备区。当时，我们虽然没有采取压制行动，但对他们的这种行动看得太重。二月中旬以后，有些群众组织，为冲击天津警备区的问题而作了某些可以不作的检查，这是同我们的态度直接有关的。更为不对的是，在二月下旬，组织革命大联合的初期，对领头冲击天津警备区的几个革命造反组织，曾一度以他们对这一事件检查的情况，作为他们能不能进入革命大联合的一个条件。这就给这几个组织造成了压抑。

二月十三日，遵照中央的指示，我们对天津市公安局实行了军事管制，取缔了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直接操纵的、公安局内的反动组织“天津政法公社”，天津市的阶级阵线明确了，天津市的形势稳定了，革命秩序恢复了。这时，我们就依靠一部分革命造反派，组织革命的大联合，接着就筹备召开几个代表会议，急于在三月份夺权。由于时间过于仓促，加之当时投入支左的力量较弱，又缺乏经验，因而，几个代表会议都联合得很不够。由于我们对

【1293】《天津通志·大事记》，页412。

【1294】《天津通志·大事记》，页413。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认识不够，调查研究不够，尽管多数支持对了，但是，也有少数支持错了的。因为有些站错了队，在这段时间里，使少数工厂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压抑。

上述这些错误，大多是在四月上旬中央接见天津代表时，我们才认识到的。回天津以后，我们立即着手改正，但是仍在组织革命大联合的工作上，由于有些应该联合进来而当时没有能够联合进来，同时又有支持错了的，这就引起了一部分造反派的不满。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这部分造反派的不满情绪，千方百计地煽动挑拨，使天津市出现了反复。

我们在天津支左工作中有过的缺点和错误，应该由我们几个主持支左工作的同志负主要责任，参加支左的广大指战员没有责任。<sup>【1295】</sup>

同日，郑维山、解学恭、萧思明联名给中央写了《关于建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12月1日，经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中央的批复，对天津驻军三支两军工作作出了肯定。称：“中央认为天津驻军在无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在天津某些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经改正。萧思明、郑三生、杨银声三同志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天津支左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检查’态度是好的，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中央的批复还称，“中央同意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筹备小组的意见，立即成立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九十七名委员组成，并由解学恭同志任主任，萧思明、郑三生、江枫同志任副主任。”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97名委员（批复时实际有86名，暂缺11名）中，军队干部22名，虽只占23%，但掌握实权。除萧思明、郑三生外，其他20人为：杜文达（六十六军原军长，1955年授衔少将）、杨银声、刘政、王一、朱玉学（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朱彪、杨柱（海司航保部副部长）、王元和、张逸群（河北省军区独二师师长）、董献珍（北空副部长）、李恩贵（炮五师五〇团政委）、周建华（陆军第七十四师副参谋长）、张旭之（北京军区后勤部八分部部长）、乔喜增（陆军第一九六师五八八团副团长）、韩德富、秦胜云（空军高炮八师副师长）、衣瑞伦、张波、费国柱、姜精武（空军第七师副参谋长）。

【1295】《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附件一：《关于在天津支左工作中的检查》，1967年11月26日。中发[67]361号中共中央文件。

12月6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9日，《参考消息》刊登两则外电消息，对此作出评论。其中合众国际社香港7日电称：

北京电台今天宣布，中国的主要工业和商业中心之一的天津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

这是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支持者能够建立起一个得到毛泽东的北京权力中心批准的革命委员会的第三个大城市。

在迄今已建立的所有的革命委员会中，军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天津的这个委员会看来也是如此，虽然一个非军人被任命为新委员会的主任。

他就是北京政权最高级的外贸专家之一的解学恭。

解以前曾担任外贸部副部长，并且曾任北京外贸学院院长数年。他曾任外贸部共产党委员会的领导人，也是党的重要的华北局的一名书记。

这个委员会的三名副主任中至少有两人是军人。一个是萧思明。

另一位军人的副主任是郑三生。

由于天津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它是毛泽东的政策和据说是失宠的主席刘少奇过去所推行的倾向于资本主义的政策发生争论的主要地区之一。过去几个月内在对刘的攻击中所发表的许多材料是关于他“包庇”天津以前的资本主义工厂主的。<sup>【1296】</sup>

市革委会下设办公室、政治部、政法组、生产指挥部、财贸组、文教组、农业生产指挥部等部门。其中办公室负责人为六十六军政治部副主任郭祥；政治部负责人为一九六师政委张波（1968年7月后为七十四师副政委段曙光）；政法组负责人为江枫（1968年7月政法组改为人民保卫组，负责人为六十六军副军长刘政）；工业生产指挥部负责人为七十四师政委费国柱；文教组负责人为警备区副政委王元和；农业生产指挥部负责人为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萧大鹏。

1968年10月，萧思明升任新疆军区第二政委。1969年4月，郑三生当选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被毛泽东调侃他“三生有幸”。<sup>【1297】</sup>同年10月，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他们两人的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1970年4月分别由六十六军新任军长刘政、天津警备区新任司令员王一接替。

---

【1296】《参考消息》，1967年12月9日。

【1297】毛泽东的原话是：野战军，华北有几个？（有人说：六个），六个军只出了一个郑三生，三生有幸。

#### 四、“二二一事件”

1968年2月21日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以及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北京军区负责人，接见了天津市革委会及驻京部队文艺系统的代表。中央领导人提出了天津“黑会”、“黑戏”及“彻底地揭开”公检法的问题。

会议首先由江青讲话称，“我们想有这几个问题和同志们谈一谈，在你们天津，去年‘全国工农文艺战士座谈会’，有这么一个黑会，知道吧？（众答：知道。）黑的！还有一个黑的戏，叫《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众答：有。）黑的！今天就和同志们谈一谈，这是个什么原因，讲一讲道理。现在请陈伯达同志给我们讲话。”

陈伯达称，“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全国，在我们国家内部，有周扬为代表的一条文艺黑线，它在全国有一个相当的黑网。比如在天津，他就有一伙，像方纪、孙振、白桦、李超、董阳等等，比如他们所表演的黑戏《新时代的狂人》，就是由方纪编排的，参加导演的。在天津出现这样的黑会、黑戏，都不是孤立的现象，他是反映了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社会上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潮，而且反映了这个思潮形成的组织，比如在天津有‘大联筹’、‘政法公社’，在河北，在保定有‘省委兵团’、‘八五风暴’、‘农大红色造反团’。石家庄，比如‘狂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吧？（众答：知道。）在唐山、邯郸等地都有代表他们反动思潮的这些流派。所以天津这个黑戏、黑会，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个是一个侧面。在天津、在河北，还有组织上的联系。”

陈伯达在讲话中还极力地撇清与他相熟的一些天津地方干部的关系，称，“在这里我想说一下我在天津工作的情况，我大概是五七年冬天，同康老一块到天津，康老调查教育问题，我是调查工业问题，后来做了一些四清的工作，当然，在这里面接触了一些人。……还有，有些人，象方纪之流去年不知道什么道理，到北京来，因为过去在四清工作中认识他们，因此我也跟他们谈过话，我那时跟他们说了三条，要他们不要登台，不要伸手啊，不要上当啊，是跟他们这样说的吧，你们小报上反映的，我都看了，是我说的这个意思，但方纪他们还是要表演呀，要登台呀，所以我跟他们说是一回事，他们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这又是一回事。”

在姚文元讲话后，江青接着称，“出现这样一些怪事情，不简单、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的。在历史上看，天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城市，也是产业工人很多的城市，各国租界比较多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一

个万张集团，你们扫干净没有？能不能说把万张集团搞清楚了？（众答：没有。）在你们那里有这么一个组织，整总理的黑材料，整伯达同志的黑材料，整康老的黑材料，整我的黑材料。请整！这个组织不坏，是混进了坏人，这个组织是立过功勋的。（呼口号）这个万张集团，你不搞清楚，反而整我们，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我去年九月五日讲的第一条，他们就是要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呼口号）对万张集团兴趣不大，搞我们，好，搞吧！请！不过我给同志们提供一点线索，在河北省这么两个县，有大叛徒集团。一个叫献县，孙振的家乡，他都回去安置了的，布置了的，不让搞调查，不让你查出东西来，现在要广大群众动员起来，认识他这个叛徒的面貌。（呼口号）还有一个县叫深泽县，也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也向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建议，方纪他们到北京来坐的汽车就是公安局的，我有证据，上次我和总理就点过，天津文化界，公检法，现在我再一次郑重提出，公检法的问题，一定要彻底地揭开。（鼓掌，呼口号）当然喽，不是公检法一个没有好的，主席教导我们总要一分为二相信大多数，是有许多好同志，坏人只是一小撮。但是万张集团经营很久。建议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学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改造公检法的办法，就是用复员的革命军人、革命干部一千多人？（谢富治同志插话：两千人）三千人也可以，只要需要。”

在康生、杨成武发言后，周恩来作总结性讲话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告诉我们，不要放松警惕。所以中央、中央文革邀请天津一千二百多位同志来北京开会，讲一讲刚才的事情。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每个地方都有，为什么讲天津？因为天津有一个黑会、黑戏，它代表了全国的阶级斗争的，有它的典型性。……过去江青同志在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讲了文艺界要清理队伍，要阵线分明，抓坏人，开展了广泛的群众运动。天津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就要搞他的，作垂死的挣扎，打着‘红旗’反红旗，以‘工农兵文艺座谈会’进行反扑，证明伯达同志刚才说的，北京也有，石家庄也有，还有其他地方也有。找的都是渣滓，听说天津开不成，他们要到长沙去开，有个省文联支持，也是一批渣滓，正受批判。为了把盖子揭开，就是抓天津这个典型。文艺界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但周扬以及叛徒、特务掌握的文艺界盖子没有彻底揭开，我们现在抓住天津典型，不仅要在天津，像方纪、孙振、白桦、李超、杨润身等，其他地方也有周扬的死党，必须号召广大文艺界革命派，擦亮眼睛，分清敌我，树立起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把这一小撮坏人揪出来。夺权，他们要夺谁的权？他们要夺以毛主席为首和林副主席为副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我们必须认

识这个问题。揭穿他这个阴谋。这就是我们今天开会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判党内最大的刘邓陶，联系到文艺界的黑线周扬、夏衍，进行批判。不仅是天津，上海、北京也有，他们勾结在一起，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批臭批倒，好不好？（众答：好。）使他们抬不起头来。正是因为这样，康老讲得很对，他们要进行反夺权，编成剧本，在天津演，在北京演，欺骗了一些人。他们就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中国共产党。我们就要揭穿。……听说这个剧本还要搬到国际舞台上，诬蔑文化大革命。你们想一想，我们能忍受吗？（众答：不能。）所以我们要把编剧的人、导演的人，中国的外国的叛徒、特务、坏人揪出来批判，批倒批臭。广大人民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只要伟大的毛主席司令部一说，中央文革一说，就会响应。所以我们今天召开这个会，告诉大家，他们开黑会，反夺权，都必须彻底批判。”<sup>【1298】</sup>

在2月21日的会议之后，天津立即展开了批判“二黑”（黑会黑线）及“一砸”（砸烂公检法）运动。3月2日，市革委会、驻军支左联络站分别召开全市文化系统和公检法系统大会，传达“二二一”讲话，动员“摧垮文艺黑线”和“彻底改造公检法”。3月9日及26日，市革委会先后召开“彻底砸烂反革命文艺黑会电视批斗大会”和“彻底砸烂反革命黑戏电视批斗大会”。<sup>【1299】</sup>

“二二一”接见给天津地方干部带来震撼性的冲击。市革委会副主任江枫在散会后立即被隔离审查。市革委会常委、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于3月1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其他原被结合进市革委会的地方领导干部禁若寒蝉。时任市革委会办事组秘书组组长的王辉后来称，江枫“他在革筹小组又因为个性太强，与驻军负责人发生过顶撞，把他拿下来，正符合驻军的意愿。把他清除掉之后，除了上边还有个解学恭以外，天津市实际上是军人一统天下了。”<sup>【1300】</sup>

---

【1298】北京矿业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京矿院东方红：《东方红》第85、86期，1968年3月24日。

【1299】《天津通志·大事记》，页415-416。

【1300】《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江枫从这次会后一直被监护审查，直到1971年12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1978年1月，中共天津市委对江枫予以平反。